

第3卷

经济思想通史

蒋自强 张旭昆 著
袁亚春 曹旭华

浙江大学出版社

经济思想通史

第三卷

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的经济思想以及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
与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30年代)

目 录

第一编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 西方经济学的演进

第一章 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先驱	3
第一节 边际革命的兴起及其原因	3
第二节 边际革命的先驱者以及古诺、戈森的经济思想	9
第二章 奥地利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	16
第一节 门格爾的经济理论	16
第二节 维塞尔对门格爾经济思想的发展	33
第三节 庞巴维克对门格爾经济思想的发展	38
第三章 英国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	47
第一节 杰文斯的经济理论	47
第二节 埃奇沃思及威克斯蒂德的经济理论	56
第四章 法国、意大利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	59
第一节 瓦尔拉斯的经济理论	59
第二节 帕累托的经济理论	78
第三节 巴罗尼的经济理论	83
第五章 美国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	91
第一节 约翰·贝茨·克拉克的经济理论	91
第二节 欧文·费雪的经济理论	102

第六章 马歇尔的综合经济理论体系 ·····	114
第一节 马歇尔生活时代的英国·····	114
第二节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116
第三节 对需求的分析·····	119
第四节 对供给的分析·····	123
第五节 均衡价格·····	126
第六节 垄断理论·····	132
第七节 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134
第八节 货币理论·····	139
第九节 国际贸易理论·····	140
第十节 经济波动·····	143
第十一节 马歇尔综合体系的意义·····	143
第七章 威克塞尔的综合经济理论体系 ·····	147
第一节 经济学的性质、分类及其研究方法·····	147
第二节 价值理论·····	149
第三节 生产—分配理论·····	151
第四节 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与累积过程理论·····	155
第五节 政策主张·····	162
第六节 威克塞尔综合体系的意义·····	163
第八章 英国剑桥学派对马歇尔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 ·····	166
第一节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周期理论、失业理论和货币理论·····	166
第二节 斯拉法和琼·罗宾逊对马歇尔综合体系的发展·····	176
第九章 美国经济学家对马歇尔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 ·····	188
第一节 陶西格在传播马歇尔经济学中的作用·····	188
第二节 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191
第三节 其他美国经济学家的贡献·····	198
第十章 威克塞尔以后北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	200
第一节 卡塞尔的经济思想·····	200
第二节 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理论体系的发展·····	202
第三节 林达尔对威克塞尔理论体系的发展·····	208

第四节	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	219
第十一章	奥地利学派的新发展·····	226
第一节	米塞斯的经济思想·····	226
第二节	哈耶克的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	231
第三节	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理论和周期理论·····	241
第四节	哈伯勒的经济周期理论·····	257
第十二章	新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	261
第一节	德国新历史学派·····	261
第二节	美国制度学派·····	264
 第二编 19 世纪下半叶国际工人运动中非无产 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第二国际 各派理论家的经济思想 		
第十三章	19 世纪下半期国际工人运动中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	271
第一节	19 世纪下半期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概述 ·····	271
第二节	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275
第三节	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思想·····	287
第十四章	第二国际各派理论家的经济思想·····	298
第一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演化·····	298
第二节	伯恩斯坦的经济思想·····	306
第三节	考茨基的经济思想·····	316
第十五章	第二国际各派理论家的经济思想(续)·····	335
第四节	希法亭的经济思想·····	335
第五节	拉法格的经济思想·····	353
第六节	卢森堡的经济思想·····	366
第七节	第二国际时期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385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以及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 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第十六章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 马克思主 义在俄国的传播以及列宁主义的诞生	389
第一节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及其以后俄国的经济政治概况	389
第二节	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	39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普列汉诺夫的革命活动	397
第四节	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405
第五节	列宁的早期革命活动,列宁主义诞生的标志	407
第十七章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 义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411
第一节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研究	411
第二节	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分析	412
第三节	列宁关于市场和再生产的理论	421
第四节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和纲领	426
第十八章	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	433
第一节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帝国主义的系统研究	433
第二节	列宁对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揭示和阐述	435
第三节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443
第四节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 衡规律以及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	447

第四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 改良派和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 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 以及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第十九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453
-------------	---------------------------------	-----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经济思想演化·····	453
第二节	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457
第三节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464
第四节	严复的经济思想·····	469
第五节	谭嗣同和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474
第二十章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	481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	481
第二节	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484
第三节	章太炎和朱执信的经济思想·····	490
第二十一章	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与近代西方经济 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495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495
第二节	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501
第三节	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506
	本卷主要参考文献·····	512

第一编

——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
西方经济学的演进



第一章 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先驱

第一节 边际革命的兴起及其原因

1871年,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边际革命的发端。这一年,奥匈帝国的卡尔·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分别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1873年,瑞士洛桑的法国人瓦尔拉斯发表了《纯粹经济学要义》。这三本书被后人公认为是边际主义的开山之作,他们三个人则被公认为是边际革命的奠基人。

与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其他几次革命相比,边际革命具有两个特征:(1)三个国家的三位经济学家,在事前并无联系的情况下,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2)这场革命与斯密革命及以后的凯恩斯革命不同,并不以政策主张上的标新立异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两个特点,如何说明边际革命兴起的原因,便成为经济思想史上一个饶有兴味但迄今未有圆满答复的课题。

国内的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大多数的论著,一般沿袭苏联经济思想史专家布留明的论点。^①认为边际革命的兴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有联系,边际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杜撰的新的辩护理论,同时也是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的实用理论。但这种观点忽略了几个史实,一是杰文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译成英文是1887年)之前5年(1862)就已经形成了他的基本观点,同时三位奠基人在其开山之作中都是明确地向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而非马克思挑战。因此,说他们是有目的地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传播,为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辩护理论,未免失之牵强。二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以自由竞争为分析前提,论证自由竞争的优

^① 参阅[苏]伊·戈·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上卷)第一章第十节,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越,门格尔虽然主要分析的是垄断状况下的交换和价格,但同样指出垄断比竞争要降低产量。他们的后继者则很快通过对货币的边际效用的分析而论证收入的再分配能实现社会满足的最大化。因此把边际主义完全归结为资产阶级(或其中某一阶层,如布哈林所说的食利者阶层或布留明所强调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未免失之牵强。¹

当代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则倾向于从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包括本专业学术团体的主导倾向及知识素质,与进行公开发表见解的机会有关的制度,学术地位的晋升制度,学者之间通讯方式的性质,以及邻近学科的诸情况等等),从三位奠基人的个人性格及知识结构等方面来探讨边际革命的兴起。²但他们一般(并非每个人)比较忽略社会环境(指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及社会普遍的思想倾向)对边际革命兴起的影响。

我们认为,需要同时从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内在逻辑以及个人心理素质、知识结构诸方面来探讨边际革命兴起的原因。为此,首先需要把边际革命看作是一个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的一个绵延连续的过程。而不能把它看作是发生在1871年的一个事件。从过程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必须对边际主义起源及传播的原因分别进行分析。其次,必须破除一种成见:相同的思想若为不同的人提出,则这些人一般总会处于相同的环境之中。殊途可以同归,既然相同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背景会产生不同乃至对立的经济思想,那为什么相同的经济思想就不能源自不同的环境呢?因此,不需要到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去寻找导致边际革命起源的共同因素,只要分别研究每位奠基者特定的环境是如何使他得到边际主义观念就行了。

边际主义的最早表现形式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三个奠基人对这一理论的系统阐述,显然与他们的个人境况及学术环境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少有关联。因为在他们之前的约一个半世纪中,西欧各国不断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思想火花。因此,如果说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话,那就很难解释何以早在1738年,瑞士数学家伯努里便已经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

从个人境况方面来讲,三位奠基人都出身于中等富裕家庭,都接受过高等教育。除了门格尔的情况有待进一步了解之外,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从小

¹ 上述有关史实,可参阅陈俗孙为晏智杰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² 参阅R. D. C. 布莱克等《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就在家庭中受到经济学的启蒙,杰文斯从他母亲那儿听到过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ately, 1787-1863)的一部宣传效用价值论的小册子的内容,瓦尔拉斯则直接受其父亲(一位主张稀少性决定价值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同时,这两个人也都学习过微积分。门格尔的弟弟是一位数学家,估计门格尔也熟悉微积分。他们三人的知识结构无疑是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必要条件。

从学术环境方面来看,三位奠基人面临的学术背景差别甚大,19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远不如今天这样能够跨国界地传播,各国经济学家多少有点处于隔离状态,联系是有限的。在英国、法国、奥匈帝国,经济学的传统是各不相同的。在英国,占据正统地位的是以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其工资理论(工资基金说和维生工资说)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遭受多方面的攻击,它的正统地位受到削弱,工资理论的挫折连带影响到它的价值理论(生产成本说)。从内在逻辑上讲,古典经济学缺乏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缺乏对需求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的分析。因此,杰文斯从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出发提出的边际效用理论,在当时确实是针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他本人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总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以穆勒为代表的理论观点。杰文斯的理论在英国是以正统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

奥地利的学术背景是另外一种情况。19世纪中期,德国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Roscher, 1817-1894年)、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 1821-1878年)、克尼斯(Knies, 1821-1898年)的学术影响逐步上升。他们强调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否认英国古典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有普遍意义,主张用国民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他们否认理论概括的意义,主张用所谓的历史方法代替抽象方法。同时,他们也对价值问题发表了大量见解。

除了旧历史学派之外,当时还有相当一批非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也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如劳(Rau, 1792-1870年)、赫尔曼(Hermann, 1795-1868年)、曼戈尔特(Mangoldt, 1824-1868年)等人,他们有的赞同英国古典学派,有的持其他观点。对于这些非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我们今天知之甚少。

从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引证情况来看,旧历史学派和上述非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对他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他谦恭地认为自己的见解不过是以这些德国经济学家观点为基础的进一步改革,是对卓越的德国经济

学家的“一个微弱的回声”。^① 他明确肯定历史学派的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以及非历史学派的谢夫勒对价值理论的贡献。^② 可以说,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许多对于只熟悉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人来说的新观点,实际上大都被那些德国经济学家提到,他的贡献在于提出“边际”这一概念并巧妙地应用于分析之中。^③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施莫勒(1839--1917年)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界取得正统地位。新历史学派在方法上否定普遍规律,否定建立经济理论的必要性,否定抽象方法,主张运用历史统计方法研究各国的经济史。在观点上,他们强调心理、伦理、法律、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主张由国家实行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以解决当时的经济政治问题。

对于新历史学派,门格尔最初并非以自己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向其挑战,只是在他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12年之后,才向施莫勒在方法论而非价值论方面进行挑战,主张抽象演绎的分析方法,反对新历史学派那种过于极端的归纳方法。这或许是占正统地位的新历史学派对他成就的冷漠态度造成的后果。但即便如此,在门格尔反对运用数学于经济学的态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上的二元观点,仍然表明他与历史学派的方法上有某种共同之处。值得提出的是,这种二元论的方法观后来被哈耶克所继承并发挥。

所以门格尔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产生,可以说是德国19世纪中叶经济学(包括历史学派和非历史学派)的发展和延伸,并非对抗德国历史学派的一场革命。只是在是否要建立抽象演绎的理论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上,门格尔才在以后与新历史学派分道扬镳。

瓦尔拉斯面对的学术背景与前两人都不相同。法国有着效用价值论的悠久历史,就连宣传斯密理论的萨伊也同样把价值的决定归结于效用。瓦尔拉斯的父亲更是一位主张效用价值论、并提出稀缺性概念的经济学家。但是老瓦尔拉斯无法找到一种可以对稀少性进行定量估算的方法,就把它作为效用价值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遗留给了瓦尔拉斯。瓦尔拉斯用边际效用作为衡量稀少性的尺度,从而解决了老瓦尔拉斯未解决的问题。因此,瓦尔拉斯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不是对法国传统(或正统)经济理论的革命,更

①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序言”。

② 参阅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页,注。

③ 参阅T. W. 哈奇森《“边际革命”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落》,载《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恰当地说,应当是对法国传统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瓦尔拉斯对法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之处与其说是在于边际效用这一概念上,不如说是在于一般均衡观念及表述这一观念的数理方法方面。但运用数理方法,是瓦尔拉斯受到法国数理经济学家古诺影响的结果,因此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是一般均衡的观念,以及这一观念与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

虽然三位奠基人面临的学术背景差别甚大,但他们的学术环境中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可能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同时提出起着催化作用。这就是数学的发展,当时微积分对物理学的贡献已为科学界所明了,同时微积分也已开始得到普及。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一因素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发挥了作用,也有一定的证据表明它对门格斯的创造有影响。杰文斯的边际效用概念就完全是以标准的导数形式表述的,瓦尔拉斯则通过与洛桑大学一位显然精通微积分的力学教授的交流,解决了从边际效用递减率推断出需求函数的难题。^①数学的发展对经济学产生促进作用,这不是唯一的一次,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若干次重要发展,都得力于数学。同时,经济学也反过来推动了数学的某些分支的进步。不同学科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也许是任何科学得以发生重大进步的少数几个共同因素之一。一门学科中的新思想往往诞生于精通(起码是了解)几门学科的人的头脑中。在边际革命中,也就是诞生于那些熟悉经济学和数学的人的头脑中。

应当承认,对于三位奠基者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原因的分析,我们上面所作的分析仍然是肤浅的,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从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

如果说社会环境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起源并无多大关系的话,但对于边际主义的传播就不能再得出同样的结论。每一特定的时代,在某一科学领域中,总会出现许许多多思想萌芽和火花,它们可能引导这一学科的主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些潜在发展方向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竞争中究竟哪一种潜在发展方向成为实际的方向,对于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起着一种筛选作用,使某些思想萌芽茁壮成长,而另外一些思想萌芽则被暂时、也许永久埋没。

一种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要得到广泛传播,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一思想所显含的或隐含的政策主张要符合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二是这一思想所采取的分析工具和表达方式要符合传播者和被传播者

① 参阅威廉·雅费《里昂·瓦尔拉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中的作用》,载《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的知识素质。

社会环境方面有利于边际主义传播及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由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否认价值的根源是劳动,其隐含的政策主张是反对一切财产归劳动者,因此它便成为对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起码在三个国家:美国、奥地利、日本,边际主义的传播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火药味。在美国, J. B. 克拉克提出并传播边际生产力论是为了对抗社会主义思想,而在奥地利和日本,由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所以那里的边际主义者便采取了激烈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诘难;日本边际主义者小泉信三在 20 世纪 20 年代挑起的、由河上肇应战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大论战。¹

但是单纯从对抗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这一角度来寻找边际主义传播的原因,就难以解释它何以在英国得到传播并获得重大发展。因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从未在工人运动中产生过它在德语国家中的那种巨大影响,并且英国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如费边社会主义,甚至欢迎边际主义。英国社会环境中有利于边际主义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其改良主义思潮的强大。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出现了垄断,但并没有使社会截然地分化为暴富和赤贫两个极端,而是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中产阶级:技术工人、熟练工人、白领雇佣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等等。这些人并不喜欢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喜欢用费边式的改良来改善资本主义。同时他们也对垄断造成的祸害表示不安,对社会的贫富悬殊感到不满。而边际主义蕴含的政策主张——自由竞争和收入再分配——正好符合这些人的利益或价值取向。英国 1889 年初版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就采纳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德语世界和北欧诸国,边际主义也日益成为越来越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理论。因此可以说,边际主义广泛传播的阶级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那种把边际主义说成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任何人只要读几本边际主义者的原著,就可以知道他们大多都通过经济分析证明只有竞争才能保证效率,而垄断则降低效率,反对垄断恰恰是边际主义分析的结果。只有一位受边际主义熏陶的大经济学家熊彼特,才对垄断持肯定态度,但他恰恰同时又是坚信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代

¹ 参阅日本松浦保《边际主义在日本》,载《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粹的极少数西方经济学家之一,对此该给他贴上什么标签呢?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导致边际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例如意大利在1861年统一后的几十年中,始终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它成为意大利经济学者关心的主要问题,而边际主义关于有限资源合理配置的思想,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税收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应当如何,政府开支应当如何分配于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均可以用边际分析方法予以回答,于是通过杰文斯以及奥地利学派的萨克斯(Sax, 1845—1927年),以潘塔莱奥尼(1857—1924年),G.里卡·萨莱诺和德维蒂·德·马尔科为代表的意大利经济学家,迅速接受了边际主义,并且在运用中建立了当时高水平的财政理论。这一理论直接影响到当代美国的公共选择学派,成为后者的先驱。

从学术环境方面来看,导致边际主义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经济学学术环境的迅速良性化。19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是伦理学或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增多的大学开始开设经济学专业;专门的经济学期刊物开始大量发行。这意味着经济学家之间的通讯渠道有了质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在一个国家之内,尔后很快在国际范围内组成各种专业集团;这些集团也越来越由受过高等教育、研习过高等数学的人员组成。边际分析所采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和表述方式,无疑更能迎合这些成员的知识素质。相比之下,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便不太受欢迎了。在这里有一个正反馈机制,边际分析的数理性质使那些富有数学造诣而又有兴趣于社会科学的年青人愿意献身于经济学,从而使经济学家群体的数学素质得到提高;而这又反过来促使边际分析所采用的数学工具更高深更复杂,使经济学的数理性质越来越强烈。这一正反馈机制可以从两件事情中看出来。第一,西方那些接受并发展了边际主义的大经济学家,大多都有较深的数学修养:马歇尔,曾是剑桥大学的数学讲师;维克赛尔,是乌普萨拉大学的数学硕士;欧文·费雪,曾是耶鲁大学的数学教师;帕累托,则具有出色的数学才能。第二,忽视数学的奥国学派,虽然在边际主义传播的初期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以后影响越来越小;而注重数学方法的数理学派的命运则完全相反。

第二节 边际革命的先驱者以及 古诺、戈森的经济思想

科学思想的发展并不表现为一种理论一旦形成之后,便会一代代地传

递下去,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思想的发展是会出现中断的,一种理论形成之后,也可能被世人忽视,从而被埋没相当一段时间,直到后来这种理论又被重新形成,原先形成的那种理论才被重新发现,受到后人重视,被尊为先驱。

由此看来,思想史上的先驱者有两种类型:一类好比是一场接力赛中的先跑者,他们直接影响到后跑者的成绩;第二类好比是登山运动中的先登者,他们对后登者的成绩并无直接影响。第一类先驱者对后继者的思想有直接影响,第二类先驱者对后来者的思想无直接影响,很可能他们的贡献也正是由于后来者的成功才为社会所承认。第一类是对后人具有启发作用的前驱者,第二类则是被后人所追认的先驱。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难以对边际革命的所有先驱者进行上述分类,只能依照惯例,按时间的先后,简介各位先驱者,同时尽可能指出他们各自属于哪一类。

根据现有资料,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思想最早由比方便道尔夫在1675年发表的《人与市民的义务》中提出。¹这一思想后来被比尔拉马基(1694—1718)所转述,发表在他死后(1754)出版的《自然法的基本原理》一书中。²比尔拉马基的思想经由瓦尔拉斯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直接影响到瓦尔拉斯。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大段摘录了比尔拉马基关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论点。³因此可以说,比方便道尔夫和比尔拉马基是第一类先驱者。

可以称为边际革命的先驱者的人及其论著还有如下一些:1738年发表《测定风险新理论之解说》的瑞士数学家伯努里(1700—1782年)、1750年出版《货币论》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加利阿尼(1728—178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杰诺维西(1712—1769年)、⁴1776年出版《商业与政府》的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1715—1780年)、1826年出版《孤立国》第一卷的德国经济学家杜能(1783—1871年)、1831年出版《财富的性质和价值的起源》的法国经济学家老瓦尔拉斯(1801—1866年)、⁵183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讲义》的爱尔兰经

1 参阅威廉·雅费《里昂·瓦尔拉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中的作用》,载R. D. C. 布莱克等人编《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1—132页。

2 参阅威廉·雅费《里昂·瓦尔拉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中的作用》,载R. D. C. 布莱克等人编《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1—132页。

3 参阅里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3—205页。

4 参阅里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5页。

5 参阅里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5页。

经济学家朗菲尔德(1802-1881年),1836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1790-1864年),¹1837年发表《关于价值概念的讲义》的英国经济学家劳埃德(1795-1852年),1838年出版《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的法国数学家古诺(1801-1877年),1844年发表《公共工程效用的测量》,1849年发表《论通行税和运输费用》的法国工程师杜普特(1804-1866年),1851年出版《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的德国经济学家戈森(1810-1858年)。

这些先驱者之间在思想上有何联系,根据现有资料难以作出判断。他们中间可能只有老瓦尔拉斯和古诺,因对瓦尔拉斯都有直接影响,所以可算作第一类先驱者,其他人可能都只能算是第二类先驱者。尤其是戈森,他的贡献是由杰文斯在1871年以后发现并告知瓦尔拉斯的,他被两人公认为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先驱。下面简介古诺和戈森的贡献。

一、古诺(Cournot, 1801-1877年)的经济思想

作为数学家的古诺(有时译为古尔诺或库尔诺),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他1838年出版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²(以下简称《研究》)一书中。该书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到研究方法;二是涉及到若干具体的经济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古诺可以说是第一个说明了数学方法对经济学的巨大用处³,与以往一些经济学家用数例来表达经济思想不同,他是运用数理模型(函数、联立方程,对函数求微分求极值)推导出经济思想的。数学方法在他那儿不再是一种表达已有经济思想的方式,而是推导出新的结论的手段。

在具体经济问题上,古诺可以说是最早提出了需求函数($D=D(P)$)这一概念,⁴指出个人需求函数的间断性和市场需求函数的连续性。连续需求函数的提出为把微分方法引进经济分析求解优化问题奠定了基础。根据连续需求函数,他给出了销售额最大化的条件(以导数形式和几何图形两种方式)。他指出,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对于不同的商品是不相同的。这是关于需求价格弹性的思想火花。他还提出了后来马歇尔特别强调的需求随价

1 参阅里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95页。

2 该书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8页。

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0-331页。

格下降而上升的法则,并给出了后来被称作凡勃伦商品的反例。¹

以需求函数为基础,古诺在其《研究》一书的第五、六章研究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的垄断价格决定问题,给出了垄断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并分析了垄断条件下各种税收对厂商、消费者和政府的影响。这两章的内容使他成为现代垄断理论的先驱。²

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古诺最为人注意的贡献是他在《研究》第七章中提出的双寡头模型。该模型在当前经济博弈论的研究中再次成为范例。从双寡头模型出发,通过假设生产者人数不断增多,他在第八章中研究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量和价格决定,正确地指出完全竞争的特征是个别厂商的产量变化无法影响价格,指出保持竞争的条件是各厂商的边际成本递增,否则便会由竞争导向垄断。他还在第九章用数理方法研究了复合商品(如黄铜)与其原料(铜和锌)三者之间的价格互动关系,从而成为马歇尔同类研究的先声。

古诺对瓦尔拉斯的影响无疑是极重要的,而这种影响大致可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古诺在其《研究》一书第十一章中提出了与局部均衡相区别的一般均衡的观念。他写道:“我们已经对各商品单纯地进行了研究:与商品的生产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商品需求规律,如何确定其价格,并调节其生产者的收入,我们把其他商品的价格以及其他生产者的收入,都考虑为已知和不变的;但现实的经济系统,却是所有的部分都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一个整体,……所以,要完整而严整地解答与经济系统中几个部分有关的问题,全面考虑整个系统,看来似乎是必不可少的。”³二是他在其书第三章分析多国汇率决定时采用的联立方程法,可以说是瓦尔拉斯展开一般均衡分析时所采用的联立方程方法的雏形。任何看过两人之书的人都不会怀疑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可以说,古诺提出了一般均衡分析的初步观念和初步方法,而瓦尔拉斯则把一般均衡分析发展成一座宏伟的理论大厦。

二、戈森(Gossen, 1810—1858年)的经济思想

曾做过地方政府税务官和经营过保险公司的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对于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在他那本初始大受冷遇,后来久享盛名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中,运用图表和数理

¹ [法]奥古斯丹·古诺:《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第四章,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²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9页。

³ [法]奥古斯丹·古诺:《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

方程,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几乎所有重要命题,以致杰文斯和瓦尔拉斯都推崇他为先驱。

戈森假定人以追求享乐最大化为目的,即使是禁欲主义者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是以死后进入天堂为目的。^[1]从这一基本前提假定出发,他提出后人所谓的戈森第一定律,也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把这一定律表述成两种形式:一是在一次持续的消费过程中各消费品单位的效用逐次递减,如图 1-2-1 中(a)图所示。二是在隔期的重复消费时第一个消费品的效用递减,如图 1-2-1 中(b)图所示。图中横轴为消费品数量,纵轴为边际效用。图(b)表示随消费次数的增多和消费活动的重复,边际效用曲线的位置由 AB 下移到 A_1B_1 ,再下移到 $A_{11}B_{1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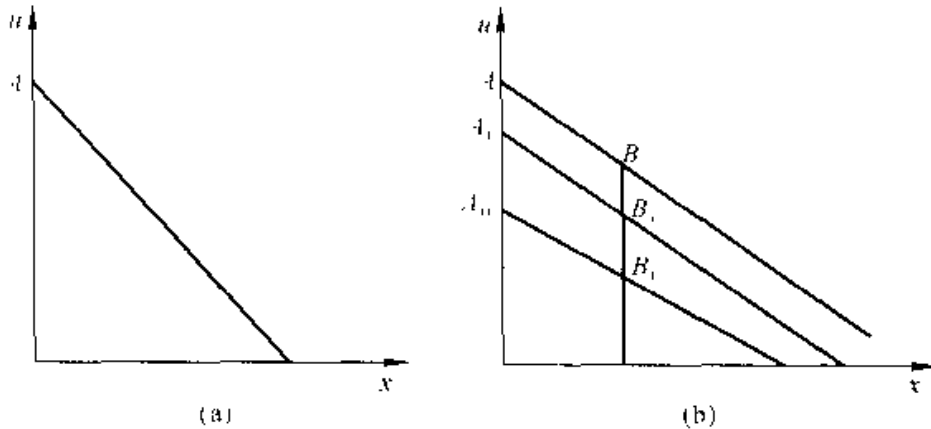


图 1-2-1

戈森的第二定律就是后人所说的消费活动中的等边际原理,即在消费时间一定或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一定,而消费项目不止一个时,要使享乐最大化,就必须如此分配时间和货币,使各项目中获得的边际效用相等,或各项目上每单位货币换得的边际效用相等。^[3]

戈森否定与人的享受无关的绝对价值,认为物品的价值由它为人提供的享受来决定,为此他把各种物品分为二人类:直接消费品、互补消费品及生产用品。第一类物品价值由享受直接决定,第二类互补品的价值需共同由

[1]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6 页。

[2]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 页。

[3]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 页。

享受决定,第三类物品价值决定也同样如此,与它们生产消费品时的贡献成正比。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接近但尚未达到后来门格尔等奥地利学派所达到的结论。

戈森分析了劳动与人的享乐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刚开始时对劳动者具有正效用,但它随劳动时间的延长而不断递减至零,尔后时间的劳动将带来不断增加的负效用。当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的绝对值与劳动所带来成果的边际效用相等时,就是劳动者自愿停止劳动的临界点,这一思想后来被杰文斯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发现。

戈森以享乐定律为基础分析了交换行为,以为人们通过交换实现享乐最大化的条件,是交换后两种物品在每个交换者那儿的边际效用都恰巧相等。这可以说是以基数效用论形式表达的帕累托交换最适度。

除了在基本理论方面所做出的上述贡献外,戈森在政策主张方面的一些见解也值得注意。他主张保护私有制,指出“各民族在福利水平上所取得的进步的程 度,与它们成功地保护私有制的程度几乎是一样的”¹。因为公有制会导致懒惰,而“只有通过确立私有制,才能找到确定每种物品按照情况以最合理的方式应该生产出的数量的尺度……因此,尽可能地保护私有财产——不论是占有者享用这种财产本身还是想转交其他人享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绝对必要的条件”²。同时,他也主张经济自由,“允许每个人具有自由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³。主张人们相互尊重私有产权,要求每个商人以诚待客,“每个人都有义务在出卖时以诚待客,也就是说把待出卖物品的优缺点如实地告诉要购买的人”⁴。为了克服失业现象,他反对由政府去设立保护性关税、特许和优惠、行会制度等,主张政府应当使工人便于跨部门转移,以消除过剩部门中的失业现象。⁵ 为了克服通货膨胀,他主张废除

— — —

1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2页。

2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1页。

3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2页。

4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3页。

5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2页。

纸币。¹ 最有意思的是,他虽然主张私有制,却坚决主张土地国有化,主张通过政府收购使土地从私有者手中转移给国家,再由国家将它租给出租金最高的承租人使用。² 他认为土地国有将扫除经济自由的最后障碍,并使政府获得可观的收入。

1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1页。

2 「德」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4页。

第二章 奥地利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

第一节 门格爾的经济理论

卡尔·门格爾(Carl Menger, 1840—1921年),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缙绅家庭,其父亲为一律师,他1859年进维也纳大学读书,第二年转入布拉格大学,于1867年在克拉科夫大学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奥国内阁新闻局从事新闻工作,1872年回维也纳大学任经济学讲师,第二年升任教授。1876年受聘为奥匈宫廷教师,为皇太子讲授经济学和统计学,1877年随皇太子游历瑞士、英、法各国,1878年重回维也纳大学任教授,直至1903年退休,又被聘为名誉教授。他曾在政府的通货审议会、币制调查委员会工作,1900年被选为奥匈上议院终身议员。门格爾一生论著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有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有中译本)、1883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方法的研究》。

一、规律、目的、方法

经济学史上任何一位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对诸如经济规律、经济学的目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类问题,通常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些独特的看法是他们能有所建树的必要条件。门格爾也不例外。他坚持经济现象具有规律性,从而认为经济科学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精确的科学。在当时的德语世界里,只重描述,不重分析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占据着正统地位。经济学界洋溢着一种否认规律性的气氛。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异军突起,坚持经济现象的规律性,其思想的独创性,由此可见一斑。

承不承认经济现象的规律性,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门格爾看来,承认经济现象的规律性,就意味着承认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上有着相通之处,就意味着经济科学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原子论而非整体论的方法,其特征便是把研究对象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

然后分别加以研究,最后把分别研究的结果加以综合,形成对研究对象整体的看法。这种原子论的方法对门格尔深有影响。门格尔以至整个奥地利学派,把商品价值这一人类经济的复杂现象,还原成孤立的经济人对财货的主观评价,从而提出了著名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门格尔的经济人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有重大区别。这种区别是门格尔以至整个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理论出现重大分歧的根本原因。亚当·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是作为生产者的经济人,尤其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经济人。通过生产和交换使既定资产获取最大收益,是这样一种经济人的必然行为动机。在这种动机下,商品生产者的投入决策和产出决策都受到外生的交换价值的制约。斯密所关心的价值,就是这样一种独立于单个经济人主观意识之外,同时又约束着经济人行为的客观的经济信号。对这样一种价值的决定机制的探索,就构成了从斯密开始直到约·斯·穆勒为止的价值理论的主线。门格尔所假设的经济人是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而且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最抽象的消费者,是舍象掉制度因素约束的消费者。他们的行为动机是在财货既定的条件下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而达到这种最大化的条件,便是门格尔所认为的经济学所应研究的对象。

由于把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消费者作为分析起点,门格尔便着重分析了人的主观欲望的各种特征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就使他的理论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对于经济人的生产、交换、消费诸行为,他都从主观欲望这一角度去加以分析解释,从而对财富的定义、分类、价值、价格、分配、资本积累等问题,都提出一整套与以往经济理论不同的见解。

以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为分析起点,是门格尔方法上的基本特征之一,其理论的革命性质和局限性盖源于此。

门格尔方法上的又一基本特征是采用了边际分析方法。“边际”这一术语并非门格尔所首创,但他是在经济分析中运用边际概念的首批经济学家之一。在门格尔这里,边际分析方法对经济科学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初步的揭示,这就是用边际效用来说明消费者对财货的主观估价,用两种财货的边际效用来说明它们的交换比例的确定。在后一种运用上,边际分析方法与经济生活中一系列优化原则的关系得到披露。

门格尔在方法上的又一特征,是他的理论在逻辑结构上的连贯性。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在叙述上与历史学派完全不同,采用的是从基本命题出发演绎出全部结论的方法,从而给人们强烈的体系感,它不是一些资料或若干缺乏联系的思想火花的简单堆砌,而是一座理论大厦。

二、消费者的欲望,财货的稀缺

作为门格尔分析出发点的消费者,是具有理性即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消费者。为了分析他们的行为特征,就有必要首先对他们的欲望进行分析。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虽然没有专门分析消费者欲望的章节,但全书都贯穿了这种分析。这种分析为他的价值论(含分配论)、交换论和资本理论奠定了基础。

门格尔指出了消费欲望的多样性、层次性及满足上的协调性和递减规律。即消费者在每一个时点上都有多样欲望需要相互协调地同时满足,并且各种欲望的满足对于消费者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同时一种欲望已经满足的程度愈高,进一步满足的重要性就越低。

门格尔用他那著名的欲望分类分级表¹¹,表述了上述思想: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10	9	8	7	6	5	4	3	2	1
9	8	7	6	5	4	3	2	1	0
8	7	6	5	4	3	2	1	0	
7	6	5	4	3	2	1	0		
6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4	3	2	1	0					
3	2	1	0						
2	1	0							
1	0								
0									

表中罗马数字表明重要性依次递减的十种欲望,其中第一种欲望是最重要的。表中的阿拉伯数字则表明同一种欲望的不同强度。其中10代表最高的强度。任一欲望随着满足程度的提高,其强度不断减弱,且进一步满足所具有的意义也不断递减,直至0。需要说明的是,门格尔构造这样一个表,只是为了说明欲望满足过程中的心理规律,并非认为人类千差万别的欲望可归结为十类,而每一类的强度可依此排列。

门格尔认为,不仅任一特定时点上的各种欲望,其满足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同一欲望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后,继续满足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而且

¹¹ 《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

同一种欲望的同程度的满足,如果是发生在当前或以后的不同时点上,其重要性也不一样。他谈到:“经验告诉我们,现在或最近将来的享乐,比之于遥远将来的同一程度的享乐,对于我们总是更为重要的。”¹

对消费欲望的分析,一直是门格尔以前经济理论的薄弱之处,他则从这个薄弱之处出发,分析了经济现象,于是他的价值论、交换论、价格论等便有了自己的特色。

门格尔关于消费者欲望的上述见解属于静态分析。静态分析的意义在于说明,当消费者的欲望系统一定时(即假定引起消费者欲望系统变化的诸因素不变时),这个系统及其满足有何法则。从静态分析的眼光来看,上述见解无疑是符合实际的,其局限性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偏重于静态分析,忽略(但不能说没有)了对消费者欲望的长期动态分析,他所谈的主要是在欲望的种类和强度都已确定的条件下,其满足的规律;而不是欲望系统在长期中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局限性使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具有静态分析的性质。第二个局限性在于他忽略了孤立状态下的消费者与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消费者的欲望上的区别。第三个局限性在于他没有意识到,他关于欲望的上述见解,仅仅适用于消费欲望,并非适应于人的全部欲望,而且不谈其他社会身份,仅仅作为经济人,也不单纯是一个消费者,他同时还是一个要素所有者,一个生产者。而作为要素所有者和生产者,其欲望和作为消费者是不尽相同的。而那些欲望和消费欲望一样,也对人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此,仅仅分析人的消费欲望,即便是得到正确结论,单凭这些结论去推导整个经济现象,也仍然会失之偏颇。因此,虽然他赋予自己理论体系的功能是替代以往的体系。但实际上它们是互补的,是无法相互替代的。

在分析经济人消费欲望的基础上,门格尔认为一物之所以成为财货,并不完全依存于其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它能满足人的某种欲望。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认为能满足人的欲望的有用人类行为(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务)也是财货,但他分析的主要是物质财货。

门格尔把经济人“为满足其欲望所必需的财货数量”叫做“个人需求”,并认为它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从消费欲望的多样性和满足上的协调性出发,门格尔认为经济人对满足不同欲望的各种财货的需求是相互制约的。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不满足于单纯拥有一种财货,而是力图拥有满足不同欲望的各种财货,并且要使不同财货在数量上保持一种有机

¹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8页。

²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页。

的格局。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当代消费经济学中消费者均衡思想的萌芽。

门格尔认为,并非人所需求的各种财货都能得到充分供给,经济人消费欲望的满足往往受到财货稀缺的约束。根据各种财货的不同供求状况,门格尔把需求大于供给的财货称为经济财货,把需求小于供给的财货称作非经济财货。他所说的经济财货,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具有相对稀缺性的财货。他强调财货的经济性质不是财货本身的属性,而是财货供求关系上的一定特征。不论财货是不是劳动的产物,都不能成为决定财货经济性质的因素。他还认为,经济财货与非经济财货的区别,并不依存于社会经济制度,对自然经济中的孤立经济主体来说,也会有经济财货,他甚至认为财货的经济性质具有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作用。

门格尔认为,由于经济财货的存在,人们将力图使有限的经济财货得到最好的使用。首先用于满足最重要的欲望,然后再满足次要欲望。门格尔的经济人的行为动机是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而其行为方式是在财货稀缺的约束下优先满足重要欲望。即求经济财货的最佳使用,这种见解对以后经济学的发展深有影响。以后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出稀缺资源的最佳利用条件。

经济财货的存在,对消费者欲望的满足造成了约束,使消费者按约束最优化的原则来行事。不仅如此,经济财货的存在,在门格尔看来,还是财货私有制制度存在的根源。他提出,经济财货“无论怎样分配,都要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或虽得到满足而不完全,这样就使这部分人对于这类财货的利害关系与那些占有这类财货的人的利害关系发生矛盾。因而就使占有这类财货的人,感觉有通过社会法制,来对付可能发生的他人暴力行为,保护其所占有财货的必要。在这里,我们就发现现代法律秩序的经济起源,而尤其是发现了为所有权之基础的财产保护的经济起源”^①。这就是说,经济财货是导致私有制的根源。从这一见解出发,门格尔进一步肯定,只要财货的相对稀缺性没有消除,想废除所有权制度是不可能的。“因而一切社会改革方案,都只应朝着经济财货的合理分配的方向去努力,而不企图废除所有制本身。”^②

门格尔关于“经济财货”的概念。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使门格尔能够出色地把人类经济活动概括为获求财货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使他能正确地描绘消费者在财货约束下争取欲望最大满足的方式。它也是

①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②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

门格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前提,只有经济财货才有价值这样一种观念的提出,促进了人们对价格现象的经济功能的认识。这一点在他的弟子维塞尔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但他的经济财货的概念也有如下两点不足:首先是他没有区分对个别消费者而言的经济财货和对整个社会而言的经济财货,前者不仅与既定财货的数量有关,而且与既定财货的分配方式有关;后者则完全依存于一定时期中的资源和生产力状态,与分配方式无关。第二,他不正确地把私有制当作是存在经济财货的必然后果,把经济财货看作是比所有制更基本的经济范畴,而没有考虑所有制性质对经济财货的反作用。实际上经济财货有两种不同的起因:一是真正的稀缺,即无论什么经济制度在一定时点下都将不可避免地稀缺,它是资源有限的结果。二是由于制度不合理,伤害了生产效率而引起的稀缺。门格尔显然只认识到导致经济财货的第一个原因,同时他也没有把消费品的私有制与资本品的私有制加以区分,笼统认为一切私有制都是经济财货造成的无法避免的后果。

三、资本理论

门格尔从物财与人的欲望满足的关系出发,把物财区分为与人的欲望满足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低级财货和有间接因果关系的高级财货。在高级财货中,根据对欲望满足保持较近和较远的因果关系,又可以分为若干级。如果把低级财货称作第一级财货,那么直接生产低级财货的财货,就是第二级财货;直接生产第二级财货的是第三级财货,以此类推。

门格尔所说的低级财货,相当于人们今天所说的消费品,高级财货则相当于资本品,其中包括生产资料和尚未最终售于消费者的消费品存货。对财货的这样一种分类,清楚表明门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因为只有对于消费欲望而言,消费品和资本品才有直接满足与间接满足之分。

门格尔指出,某种高级财货之所以具有财货性质,是因为它所生产的低级财货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一旦这些低级财货不再满足人的欲望,那么生产它们的高级财货也将失去财货性质。因此,人们对低级财货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对高级财货的需求是派生的,这种派生需求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低级财货的需求以及生产低级财货的技术条件。

门格尔指出,某种高级财货具有财货性质的另一个条件,是存在着与之相配合以生产低级财货的其他高级财货。由于高级财货之间的互补性质,人们对某种高级财货的需求是与跟它有互补关系的其他高级财货的需求同时发生的,高级财货的财货性质对低级财货的依存性,以及高级财货相互之间的互补性,对高级财货的价值决定有重要意义。

门格尔认为,高级财货对于人类的福利有重要意义,“人类愈能不断地增加对高级财货的利用,其结果就会使得人类对于支配享乐资料的能力变得愈大”。

门格尔认为,高级财货转变为低级财货,“是在时间之中进行的”²⁾。而且,这个时间随着高级财货级次的提高而延长。这就是说,支配高级财货,一方面使人类有可能支配更多的享乐资料,但另一方面又使人类不能立即支配这些享乐资料,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因此,在高级财货一阶段一阶段地转化为低级财货,以至最后达到人类欲望之满足状态的变形过程中,时间就成为我们进行考察的一个本质要素。”³⁾关于这个转化时间,门格尔有两个见解:一是它是无法完全消灭的,虽然能够通过技术与交通的进步使其缩短。二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总是伴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因而反映不同迂回程度的各种高级财货之间,在数量上总是趋向一种均衡状态,任一特定迂回程度的高级财货若有较高的现值,那么其他的高级财货都将转化为这一特定迂回程度的高级财货,从而压低其现值,直至等于其他迂回程度的高级财货的现值。这样一种均衡状态,以各种迂回期的高级财货可以无阻碍地相互转化为前提。这是门格尔的均衡所暗含着一个前提。

门格尔认为,由于高级财货转化为低级财货需要时间,而人们又总是注重当前和最近将来的欲望满足,较少注意遥远未来的欲望满足,因此人们积累高级财货的能力便受当前和近期欲望满足的制约,只有在当前和近期欲望满足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才可能积累高级财货。上述这些见解,说明门格尔把积累看作是消费者对当前满足与未来满足进行平衡的结果。从这种见解出发,他很自然地否认资本积累是节欲的结果,并否认利息是节欲的报酬。认为利息不过是资本利用与其他财货相交换时的比例。

对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来说,门格尔提出了如下有价值的见解:(1)区分物财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两大类;(2)提出用资本品进行生产具有高生产率,但生产所需时间更多,即生产的迂回性问题;(3)积累资本品的动机不在于节欲,而在于当前满足与未来满足之间的平衡。这些见解,尤其是(1)、(2)两点,为庞巴维克系统地考察资本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门格尔以前,经济学家大多承袭斯密的传统,依照作为生产者的经济人的眼光,按物财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而区分资本和

1)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

2)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7页。

3)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收入,而由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界限难以确定,所以物质财富区分为资本和收入的界限也难以把握,而由于资本在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上的一致,更加重了分类上的困难。门格尔使分类问题摆脱了传统的“资本”与“收入”的范畴,使分类问题的解决不再依存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他提出了全新的划分依据——与人(实际上仅仅是消费者)的欲望满足的关系。门格尔所作出的这样一种分类现在已经作为基本的常识被西方经济学所广泛接受,虽然“低级财货”与“高级财货”这两个术语已经被更通俗的“消费品”和“资本品”所代替。

虽然门格尔的上述见解为后来的资本理论,尤其是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准备了出发点,但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甚至认为将物财区分为生产资料和享乐资料,与把财产区分为资本与非资本是两回事。他认为资本是一种为将来的需要而于现在支配着的,并能给所有者带来收入的经济财货。门格尔一方面受到前人资本概念的影响,把它看作是带来收益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倾向于(但并不完全)把资本看作是高级财货。他还没有像庞巴维克那样意识到“资本”一词在分配领域和生产领域的不同含义,没有意识到私人资本(获利资本)与社会资本(生产资本)之间的差别,而是力图用一个定义把两者都包含到一个“资本”概念中。正因为此,庞巴维克虽然接受了他的价值论,接受了他关于高级财货、低级财货区别的观点,以及关于生产迂回问题的观点,但对他的资本理论却持否定态度。

四、价值理论

门格尔从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的眼光出发,定义价值为人们所意识到的财货的一定支配量,对于生命和福利所具有的意义。从这一定义出发,他认为价值的本质不在于财富的客观属性,而在于经济人对财富所具有的意义判断,是依存于经济人意识的主观的东西。他强调价值在于人所意识到的财货对生命和福利的意义。但他并不认为任何对人生命和福利有意义的财货都有价值。只有经济财货(即具有相对稀缺性的财货)才有价值。门格尔把财货对人的生命和福利所具有的意义,或者说财货满足人类欲望的能力,定义为效用,于是从质上来看,价值就是具有相对稀缺性的经济财货的效用。

一旦把价值的质规定为效用,那么衡量价值的尺度也自然是效用的大小了。财货价值量的差异是由于财货在满足欲望上对人们所具有的意义有大小不同,是由于人们对各种欲望的不同意义的认识。

由于各种欲望的重要性有不同,所以某种财货一单位的价值就由该种

财货所能满足的各种欲望中最不重要的欲望(即边际欲望)获得满足后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来决定,也就是由边际效用来决定。

门格尔把它的价值论确定为四个基本命题:(1)财货的价值源于财货导致的欲望满足意义。(2)由于各种欲望的满足在保护生命和福利方面的重要性有区别,所以各种满足的意义是不同的。(3)财货价值的差异源于财货所导致的欲望满足的意义不同。(4)边际欲望获得满足的意义决定财货的价值。从这些基本命题可以看出,门格尔的价值论是不折不扣的主观价值论。为了论证其主观价值论的正确性,门格尔以古董、古画及旧机器为例,说明财货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和其他财货都不决定财货价值。

由于价值的主观性质,门格尔认为人们对财货价值的认识是会出错的,会把实际上不具有任何价值,即实际上不能增进经济人福利的东西,误认为是有价值的。他把这样形成的价值称之为“虚拟价值”。

到此为止,门格尔的价值论只适应于低级财货,因为只有低级财货才具有满足人类欲望的功能。为了使理论具有普适性。门格尔在说明低级财货价值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高级财货的价值决定。他认为,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相反,不是高级财货决定低级财货的价值,而是高级财货的价值由其所产生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所决定。

门格尔认为,虽然高级财货的价值由其所产生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所决定。但两者并不相等,前者要略低于后者。这是因为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要减除两个项目后,才是高级财货的价值。这两个项目:一是高级财货的使用价值(与高级财货本身的价值不同)。二是企业家活动的价值。这两个项目之所以也有价值,是因为要生产出一定的低级财货。单凭拥有高级财货还不够,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使用高级财货,而这种使用又离不开企业家的活动。生产一种低级财货所需要的高级财货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每一种高级财货的价值如何决定呢?门格尔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某种高级财货的价值由支配该种财货一单位而能生产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所决定,而是要由支配它时所实现的欲望满足的意义与缺少它时所实现的欲望满足的意义二者的差额决定。

具体说来,他考虑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某种高级财货 A 与其补足财货 B 之间的生产某种产出 Q_1 时具有的互替性,即财货 A 减少一单位所造成的产出 Q_1 的损失,可由其补足财货 B 的增加来弥补。这时,该高级财货 A 的价值将由其补足财货 B 从其他产出 Q_k 转移来生产该种产出 Q_1 所引起的其他产出 Q_k 的减少所造成的损失来决定。显然这里的前提是高级财货充分就业,不存在闲置。第二种情况是某种高级财货 A 与其补足财货

B 在生产某种产出 Q_i 时不具有互替性,即该高级财货 A 减少一单位所造成的产出 Q_i 的损失,不能由其补足财货 B 的增加来弥补。这时,因该高级财货 A 减少一单位而显得多余的补足财货 B ,能转用于生产其他产出 Q_k ,于是该高级财货 A 的价值便等于产出 Q_i 损失的价值减去产出 Q_k 上增产的价值后的差额。他所讲的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涉及配合比例可变化的生产函数,第二种是涉及配合比例固定的生产函数。

关于一个高级财货的价值,门格尔最终建立了如下基本命题,“即一个高级财货的价值,在生产一个生产物所必要的其余补足财货的价值不变的条件下,与该生产物的预期价值成正比例,即该生产物的预期价值愈大,则这个高级财货的价值也愈大;同时,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这个高级财货的价值,又与其余补足财货的价值成反比例,即其余补足财货的价值愈小,则这个高级财货的价值就愈大”^①。

门格尔关于高级财货价值决定的理论,为他的分配论奠定了基础。他认为经济学在讨论地租、利息时,不应考虑它们是否公正、是否应当存在,而应当考虑它们为什么会存在。他认为地租、利息,分别是土地利用、资本利用的价格,而这种价格又来源于它们的价值。来源于它们的经济性质,即稀缺性质。于是它们的价值决定就遵从高级财货价值决定的一般原理,而不能把地租和利息还原于劳动数量或生产费用。

门格尔从失业现象出发,认为劳动力不一定是财货或经济财货,不一定有价值,因而不存在最低生活费用决定劳动工资的铁则。劳动工资是具体劳动力的价格。其决定也与其他一切财货的价格相同,受制于其价值,而其价值也同样遵从于高级财货价值决定的一般原则。

门格尔认为,企业家的活动也应算作劳动,并且是一种经济财货,但它有两个特性:(1)不是商品,故没有价格;(2)其数量受到资本利用数量的限制。

门格尔反对那种认为劳动者收入低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原因是由于存在剥削的见解,而认为收入悬殊的原因在于对人类欲望的满足来说,土地和资本比劳动更重要得多。

综上所述,门格尔实际上把分配看作是三类特殊高级财货的价值论,并按高级财货价值决定论的一般原理来说明分配论。他这种按统一原理来说明价值论与分配论的作法,对以后经济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总的说来,他的分配论还是非常简单的,并没有像他的价值论那样具有系统性,他只是

^①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8页。

给出了进一步研究分配问题的三个出发点：(1)收入分配问题被归结为高级财货的价值决定问题。(2)三要素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产品，而非相反。(3)要素的价值与它们的稀缺有关。维塞尔正是从这三点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分配理论。

门格尔关于要素价值决定的看法启迪了后人，但他对于分配现状的肯定态度却说明他是社会改革的反对者。他为社会贫富不均辩护的看法反映了他的保守的政治态度。但这种保守态度，在维塞尔和威克塞尔以后，即使在边际效用学派的范围内，也失去了理论上的合理性。

门格尔的价值论与古典学派是完全不同的，但两者的区别实际上不在于对同一种经济现象的不同解释上，而在于分析了不同的经济现象。古典学派价值论的研究对象是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带有客观性质的价值，目的是要说明客观交换价值的决定机制。而门格尔的价值论的研究对象则是消费者对其拥有的财货（不论是如何获得的）的主观估价，其研究目的则是说明这种主观估价的决定机制。门格尔的错误不在于边际效用论本身的内容，不在于他对主观估价规律的说明，而在于他赋予这个理论的使命，在于他力图以其边际效用论为基础来说明市场上的价值现象。而在商品经济中，正如布哈林和布留明所指出的，消费者的主观估价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主观估价不可能成为决定市场价格的最终原因。^①如果剔除门格尔对其价值论性质的误解，单纯考虑其价值论的内容，那么可以把他的价值论正名为消费者个人估价理论，简称估价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估价理论，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消费者看来，财货价值难道不是与其拥有量成反比吗？高级财货的估价不是要取决于它所参与生产的低级财货的估价吗？作为一种估价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以成为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合理出发点，事实上它就是后来的消费经济学的一个出发点。

五、交换理论与价格理论

门格尔的理论体系中，真正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所对应的是他的价格理论，他的价格理论试图说明市场交换价值是如何决定的。门格尔认为，价格是经济人在进行财货交换中的一个偶然现象，是经济活动中经济平衡的一个表征。为了说明价格的决定，门格尔首先建立了自己不同于古典学派的

^① 参见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第一、二章，载于《布哈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05页；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167页。

交换理论。

门格尔认为,交换行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人的天性就喜欢交换。经济交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交换能更好地满足交换双方的欲望。门格尔这里所说的欲望,实际上仅是指消费欲望,他所说的交换者,实际上都是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他实际上是以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消费者的眼光来看待交换行为的。这一点从他分析交换基础时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认为经济人进行交换的基础有三点:(1)交换双方都认为,对方财货的一定量的价值超过自己财货一定量的价值;(2)双方都认识到这一点;(3)双方有力量进行交换。这就是说,交换的基础在于对交换双方来说被交换财货相互之间都是不等价的。显然,只有当交换者是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消费者时,换进的财货的主观估价才有可能高于让出的财货的主观估价的。不等价交换只是在主观估价不一致的意义上才存在。从对交换基础的这样一种认识出发,他赋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术语以完全不同于古典学派的含义。他认为财货的使用价值是指财货被我们自己使用时所具有的价值(实际上是主观估价),交换价值是指财货不由我们自己使用而用于交换别种财货来满足欲望时所具有的价值。可见,他的交换价值是一种主观交换价值,而不是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同一件财货,自己使用所带来的欲望满足和用于交换所带来的欲望满足,其意义往往是不同的,这说明财货的使用价值往往和交换价值不一致,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财货的价值究竟应当按哪一个决定。门格尔认为两种价值中哪一个较高,财货的价值就应当按哪一个计算。这样,门格尔就从孤立的消费者的估价行为过渡到了有交换的消费者的估价行为了。在后一种情况下,估价已不再仅仅依存于消费者的主观欲望,还要依存与之有交换关系的其他消费者的主观欲望,估价已不再是由个人决定的了,而是由“社会”决定了。

当财货的交换价值高于使用价值时,消费者倾向于进行交换,门格尔认为交换会进行到一个静止点,在这个静止点上,两种财货对交换者双方的边际效用都相等。这样一个静止点之所以存在,源于边际效用递减律,交换后交换者原有的财货数量减少,从而增加了边际效用。而换得财货数量增多,从而边际效用下跌,因此最终总会达到两种财货的边际效用相同之处。门格尔所说的这个静止点,也就是后来帕累托所说的交换最适度。

从交换是不等价的这样一种信念出发,门格尔重新规定了价格理论的任务。他说:“在供给价格与需要价格间所存在的差额,绝不只是一个偶然,而实为经济的普遍现象……因此,一个正确的价格理论的任务,并不在说明

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在两个财货数量间的表面上的价值相等性……一个正确的价格理论所应说明的是经济人在企图尽可能地满足其欲望的努力中，如何以一定量的财货相互交换。”¹ 在古典学派那里，问题是等价交换如何实现，在门格尔这里，问题是如何通过交换来最大限度满足欲望。

门格尔从交换双方都追求欲望的最大满足这一前提来说明价格的决定。他首先从两个孤立的交换者所确定的交换比例开始。这种孤立交换中所形成的交换比例，在不考虑其他条件时，是两个交换者各自的意愿的比例的中间点。

然后他分析了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如果垄断产品是唯一的，那么它将落入出价最高的买者手中。而价格将落在出价最高的买者所愿支付的最高价格和出价次高的买者所愿支付的最高价格之间的某一点上。在这样一个价格可能区间上，买卖双方将像两个孤立的交换者那样决定交换价格。如果垄断产品不是唯一的，则这些产品将落入那些出价较高的买者手中，其价格将落在购得产品的买者中出价最低的那个人所愿付出的最高价与被排除的买者中出价最高的那个人所愿出的最高价之间的某一点上。

门格尔认为，一定的财富出售量，不论是由一个垄断者提供于市场，还是由众多竞争者提供于市场，必形成一定的价格；同时一定的价格，必产生一定的销量。这就是说，价格取决于供给量，而与供给者是垄断者或竞争者无关。而价格与销量之间的关系是反比关系。

综上所述，门格尔分析了卖方垄断时规定销量下的价格决定。但没有分析卖方竞争时的价格决定。他实际上是把垄断当作普遍的情况，因此几乎完全没有分析完全竞争条件下均衡价格的决定，这是他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一个重大差别，对完全竞争条件下均衡价格的决定机制的忽略，据有的学者的分析，是门格尔之所以不着重数学方法的原因，因为他那时的数学手段还难以处理非均衡的现象。² 他看到了供给对价格以及价格对需求的决定作用，但没有考虑价格对供给的反作用。他研究的是供给既定时的价格决定，以及价格一定时的需求，而不是价格与供需相互作用下的价格决定。他的价格理论，为庞巴维克用边际对偶说明双方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决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¹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

² 参阅奥·埃里希·施特赖斯勒：《奥地利学派在多大程度上是边际主义者？》，载《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六、垄断厂商理论

门格尔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垄断现象比竞争出现得更早,至于竞争是如何从垄断状态中产生的,他认为这是由于文明的发展。文明发展引起需求增加,使原先处于垄断地位的产品价格上升,结果新生产者出现,原先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代之以竞争状态。由此可知,他所说的垄断并非那种作为自由竞争高度发展的结果的垄断,而是一种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状态相联系的垄断。

门格尔正确地指出垄断者的目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指出垄断者由于其特殊地位,可以不受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完全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决定能产生最大收益的价格,或者决定能产生最大收益的销售量,但不可能同时决定价格和销售量。这说明门格尔已经意识到垄断者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外生决定的。因此,垄断者一旦决定价格(或销量),其销量(或价格)也就由外生的需求曲线唯一地决定了。垄断者不可能在价格已定条件下在需求曲线所决定的销量之外再决定另一个销量。但门格尔没有说明,导致垄断者收益最大的价格(销量)是怎样决定的。只是指出,为了获得最大收益,垄断者会人为地毁弃部分商品,或有意闲置部分生产资料。门格尔关于垄断者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的说明基本上是正确的。

门格尔还分析了垄断与竞争对产量和价格的不同影响。他分析了某种产品的供给者由一个垄断者变为两个竞争者时的产量价格变化,他的结论是,竞争与垄断相比,有两方面好处:(1)不会有人为毁坏部分商品和闲置部分生产资料的现象。因为这种做法虽然能为垄断者带来好处,但无益于竞争者;(2)不仅不会出现毁弃已有存货的现象,在生产资料不受自然限制的范围内,还将增加商品总量,从而使价格低廉,造福于消费者,并使低收入阶层也能享用该商品。

门格尔的垄断理论,蕴含了他反对垄断提倡竞争的政策主张。这与比他早一百年的亚当·斯密是一致的。

七、理论体系中的动态成分

门格尔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静态性质的,但它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动态成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分析;二是对经济的某些长期趋势的判断。门格尔谈到经济生活中两种不确定性:一种是未来消费欲望的不确定;另一种是过回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第一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未来的一定期间内,究竟某种欲望是否一定

会发生,往往是难以确定的”¹;二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些欲望将要发生,但这些欲望的强度如何,……则是不能同样于事前精确知道的”²。这就是说,人们难以确定未来究竟有哪些欲望将发生。即使能够确定,也往往难以了解其强度。第二种不确定性的产生是因为一定量的高级财货能转变为多少低级财货,能转变为具有什么质量的低级财货,都是事先难以准确了解的。门格尔认为这是造成“人类经济不确定性之最重要因素之一”³。

对于经济生活的长期趋势,门格尔作出了三点判断,一是人类欲望种类的发展是无限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望的系列是无限的,但系列的每一项则是有限的”⁴。遗憾的是,门格尔只是从后半句话出发分析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建立起关于消费者行为的静态分析理论;而没有相应地考虑欲望系列的无限发展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可以说,他虽然看到了欲望的有限和无限两个方面,但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是围绕欲望的有限这一点展开的。他对长期趋势的第二个判断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原先的非经济财货将转变为经济财货,其原因或者是由于可支配量的减少,或者是由于需求量因人口增加,欲望发展及财货新用途的发展而增加,涉及到他认为经济财货将导致私有制的见解。可以说他的第二个判断蕴含着的结论便是私有制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永远存在下去。第三个判断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财货的种类将增多,从而社会的职业也增多,分工也就日益细化。

八、关于制度演化的观点⁵

随着近几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门格尔关于制度起源及演化的观点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被尊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世祖。在他那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的渊源关系。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相比较而言的非正统特征,不在于前者与后者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而在于前者恢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对制度问题的关注。

门格尔区分了制度起源的两种方式,认为有些制度是人们共同愿望(协

1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

2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页。

3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4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页。

5 本节的内容参阅 Viktor Vanberg (1989): "Carl Menger's Evolutionary and John R. Commons' Collective Action Approach to Institution: A Compariso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3), November 334-60.

议、明确的法律等)的结果,而另一些制度则是人们各自努力追求个人目标时的无意识(或非刻意)的后果。他把前者称作“协议”方式,称后者为“有机”方式。在他看来,协议方式与有机方式在解释制度起源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协议方式较易说明,而有机方式则构成对社会科学家的智力挑战;许多与公共福利关系重大的制度,怎么会在人们并无建立它们的共同意愿的条件下发展出来呢?他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清楚地表明他把制度的起源问题与制度的社会功能问题区分了开来,经过深思熟虑而创建的制度与出乎意料而成长起来的制度都有可能有利于社会福利,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门格尔认为,对有机形成的制度的起源的说明,非常类似于对市场价格、利率等经济现象的说明,因为两者都是大量行为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所导致的意料不到的结果。因此,他提出,解释有机形成的制度的起源所用的方法,与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的方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具体地讲,他在解释有机形成的制度的起源时所用的方法,就是亚当·斯密在说明市场机制时所采用的“看不见的手”。依照这种方法,他遵循以下步骤解释了货币制度的起源。

第一步:假定在初始状态中,有待说明的制度即货币并不存在,只存在物物交换。

第二步:假定个人在一定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即致力于通过交易来改进自身的处境。

第三步:假定个人可以采取某种行为将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即个人用较难销售的物品交换较易销售的物品将使他更容易得到自己所想往的东西。

第四步:假设人群中有一些创新者迟早会发现这类行为以及它们的有利后果。

第五步:假设这种行为一旦被某些先行者发现并采纳,先行者的成功就会引起其他人去模仿他们。

第六步:某种行为被普遍模仿而扩散后,就将成为一种制度,例如货币制度

门格尔对货币等制度的起源的这种说明方式的魅力在于它只依靠非常简洁的假设,只要有人能发现或发明一种有利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能得到模仿和扩散,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或制度便形成了。这里不需要任何深思熟虑的共同努力。

九、门格尔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地位

对于熟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读者来说。门格尔的经济思想很难说有什么新奇感。因为他的理论在今天都有极为精致的,往往是数理形式的表述。然而这也说明,他的思想并没有被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所销蚀。在经济学史上,门格尔属于这样一类经济学家,在前人的理论似乎已经接近完善,理论家似乎已经无话可说的时候,他们洞察了以往理论的重大缺陷,从而令人意想不到地重新构造了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尔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经济学凭借他们所创造的概念体系,循着他们所预定的方向,不断地发展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门格尔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从科学动力学的角度看,门格尔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型,或者说新的研究纲领,这个范型对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如下几点重要影响:

1. 在德语世界里重新确立了演绎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使德语世界中的经济学在方法上克服了历史学派的偏狭性。

2. 以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消费者代替英国古典经济学中那种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生产者作为经济分析的起点,详细分析了静态条件下消费欲望的特征及其满足时的规律。为消费者行为分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门格尔是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中消费理论的奠基人。

3. 门格尔揭示了经济财货(其同义语是稀缺财货)与价值价格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此,财货的稀缺性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前提之一。通过稀缺性这一概念,人们终于认识到了价格在配置资源、分配产品方面的经济功能——使有限的财货得到经济的使用。把稀缺性概念注入经济体系,改变了价值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在英国古典学派那里,价值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价值如何决定、如何测量。从门格尔以后,价值论所要回答的问题逐步转变为价值的经济功能是什么。

4. 把财货区分为低级财货和高级财货,为尔后的生产理论、资本理论和周期理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显然是以这样一种区分为前提的,他自己也承认门格尔关于财货等级的见解对后来的研究者深有启发。

5. 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交换——价格理论,实际上是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出发说明了市场机制。从此,对价格现象的分析不能再像门格尔以前那样单纯从供给方面展开了,而必须同时兼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需求的决定因素不再被排除于经济分析以外,而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了。

4. 边际概念的提出对经济学所发生的深远影响也许是门格尔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它启发后来者提出边际生产力、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等概念,最后它与微观经济的几乎所有变量都有关系,成为经济分析中一个极有用的基本概念。随着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人们最终认清了,边际概念与经济活动的优化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边际概念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提炼出的少数最有价值的概念之一,而门格尔则是首先发现它的人之一。

5. 对有机形成的制度(如货币)的起源的解释,使门格尔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世祖,成为今天人们所说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最早提出者。虽然他这方面的贡献被承认得晚了一些,但他关于制度起源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也仍然给人以深刻启示。新的理论范型的提出,使门格尔成为西方经济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他直接影响了维塞尔和庞巴维克,通过这两个人,他又影响了以威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影响了米塞斯、熊彼特和哈耶克。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范围,成为西方经济科学中难以磨灭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维塞尔对门格尔经济思想的发展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 1851-192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1874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875—1877年赴德留学,师从历史学派的罗雪尔、克尼斯和希尔德布兰德。回国后任文官,1883年任维也纳大学讲师,1884年到布拉格大学,1889年成为政治经济学教授。1903年接替其退休的岳父卡尔·门格尔成为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直至1922年。他还曾任奥匈帝国上院议员(1917年)和帝国最后两届内阁的商业部长。其主要论著有:《经济价值的来源及其基本法则》(1884年),《自然价值》(1889年,有中译本),《社会经济理论》(1914年),《权利法则》(1926年)。下面主要依据《自然价值》一书介绍其经济思想。

价值与价格的决定在消费品价值决定理论方面,维塞尔除了一些微小的修正外,全盘接受了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并在《经济价值的来源及其基本法则》一书中,首次提出“边际效用”这一术语。维塞尔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主要有:关于货币的边际效用及货币对价值决定的影响,用归属法求解高级财货的价值,以边际效用论为基础解释成本现象及提出机会成本的概念。下面分别介绍之。

门格尔没有谈到货币的边际效用,维塞尔则提出了货币的边际效用,并认为货币的边际效用也遵循递减规律,进而指出同量货币对富人和穷人有

不同的边际效用。这一见解后来成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理论依据。门格尔在分析价格时实际上分析的是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即相对价格,并没有谈到货币。维塞尔则不同,他认为价格是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两者的边际效用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所谈的价格,是以货币表现的价格。由于看到货币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他指出财富分配会影响价格,因为财富分配影响人们对货币的估价。他的结论是,价格不仅取决于效用,而且取决于财富的分配状况。关于财富分配状况影响价格的见解,为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所没有,这是一个崭新的看法。它最终影响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局限性的看法。

门格尔关于生产要素的价值有如下基本见解:(1)高级财货的价值决定于低级财货,而非相反;(2)高级财货的价值与它们的稀缺有关,与它们是经济财货有关;(3)收入分配问题被归结为高级财货的价值决定问题;(4)用类似偏微分的方法求出某种具体的高级财货的价值。维塞尔以前三点为出发点,但提出用求解联立方程组的方法来确定某种具体的高级财货(尤其是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贡献。他假设了一个例子,设有 x, y, z 三种要素,有下面三个产出方程:

$$x + y = 100$$

$$2x + 3z = 290$$

$$4y + 5z = 590$$

这里 $x = 10, y = 60, z = 70$,分别为 x, y, z 三者的生产贡献。维塞尔之所以要用联立方程组求解要素的生产贡献而不采用门格尔的偏微分方法,是因为他感到一具体高级财货的数量变化将影响与之配合的其他高级财货发挥作用,因此用门格尔的方法很可能把其他高级财货因得到某一高级财货配合而增加的作用归结为某一高级财货的价值上。用联立方程组求解各生产要素的生产贡献,被维塞尔称作归属。

维塞尔提出,由于某一要素的生产贡献会在其他条件一定时,随其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决定该要素价值的是其边际生产贡献,即当要素可生产多种产品时,其边际生产贡献由这些产品中具有最小边际效用的产品价值所决定。他还分析了影响要素的边际生产贡献大小的诸因素。它们是要素的供给量、需求量,与其他要素的互补情况,技术条件,独立程度、质量。其他条件一定时,要素供给量越多,质量越好,其边际贡献越小。需求量越大,其边际贡献越大。社会偏好一定,补足要素更丰富时,被补足的要素的边际生产贡献将提高,即相对减少的要素其边际生产贡献将提高。技术进步若变动了互补要素之间的技术比例关系,将使相对充裕(稀缺)的要素的边际生产贡献减少(增加)。当某一要素是数量无法增加的独立财货时,其生产贡献

较大。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耐久高级财货的价值决定问题,认为耐久高级财货的价值是通过对其使用期中各期的生产贡献进行贴现的方法求得的。

由上可知,维塞尔大大丰富了门格尔关于高级财货价值决定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是后来的边际生产力论的先驱。

按照门格尔所建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高级财货的价值由低级财货决定。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当高级财货生产不同的低级财货时,其价值也应不同,但实际上同一高级财货总是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如何使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这种现象相协调,就成为边际效用论者必须回答的问题。与这一问题相联系,在一般人心目中,商品的价值由其成本决定。如何从边际效用论出发去说明成本现象呢?维塞尔指出,一种产品的成本是由所有与该产品使用相同要素的产品(他称之为同源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若成本小于该产品的边际效用,就说明与该产品(记为A产品)同源的其他产品中,起码有一种产品(记为B),其生产中所使用的某种要素一单位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低于A产品生产中所使用的同样要素的一单位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在此情况下,这种生产要素便会从B产品的生产中流出,投入A产品的生产中。生产要素这样流动的结果,B产品产量下降,生产要素一单位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提高,这种提高在A产品那儿便反映为成本上升;同时,A产品产量增加,生产要素一单位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下降。于是A产品边际效用大于成本的差额趋于消失,直至成本等于边际效用为止,生产要素才停止由B产品生产向A产品生产的流动。由于上述过程在相反方向(A产品成本大于其边际效用)上也存在,并且对所有同源产品都存在,因此最终将达到所有同源产品的成本都与其边际效用相等的局面。由此可知,所谓某种产品的效用与成本的关系,实际上是该产品的效用与其他与其同源的产品之间的效用与成本的关系,一切成本归根结底是机会成本,即为了得到某种产品增量单位所带来的效用而牺牲的其他产品的产量所蕴含的效用。不同产品之间的成本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它们的边际效用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因此,该产品价值由成本决定与说它由该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两者并不矛盾。

通过这样一种说明,门格尔关于高级财货价值决定于低级财货价值的命题就不再与成本现象相冲突了。维塞尔的上述成本理论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贡献在于说明成本这种表面上直观上与边际效用论相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完全可以用边际效用加以说明。他还进一步证明,要素价值定于产品价值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原始社会、孤立的鲁滨逊,而且适用于存在复杂分工交换关系的现代社会。

维塞尔还指出,技术条件只是决定同源产品集合中各种产品的比价关

系,并不决定绝对价值,绝对价值由边际效用决定。他认为,同源产品要用不同数量的同一要素生产,这就使人们对这些产品的主观估价之间产生一定比例,这种比例源于生产中的客观技术条件,但产品的绝对价值量始终是由主观估价决定的。

一、价格制度的功能

维塞尔对西方价值理论的最大贡献,也许是改变了价值论的研究目的。在门格尔那里,价值理论的目的是说明价值价格如何决定;而在维塞尔那里,目的是说明按边际效用决定的价值价格有什么经济功能。门格尔只是研究了消费品价值的功能,认为按边际效用原则决定消费品价值,促使消费者合理地消费稀缺财货,达到满足最大化,但他没有进一步分析高级财货的价值有何功能。在门格尔那里,经济原则是从既定财货出发求最大满足;而在维塞尔那里,经济原则则是进一步从既定要素出发求最大效益。在维塞尔看来,价格的功能有如下几点:(1)在财富分配既定的条件下,使生产适合需要,但价格不可能改善财富分配的状况。(2)由于价格除了受边际效用影响外,还受到财富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价格不一定能反映财货的社会重要性。这一见解指出了价格的局限性,表明单凭价格机制虽然能解决生产对需求的适应问题,但不能改变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这一看法是自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的社会功能的看法的一大突破,在此之前,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是不清楚的。从此以后,市场机制不能改善财富分配这一局限性便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常识了。(3)价格是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因素。(4)按要素的边际生产贡献决定价值,有助于促使企业采取合理的要素组合,有助于整个社会把有限资源用于最需要的产品生产上,当然这种需要是一定财富分配下形成的需要。即归属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从既定要素出发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从这一认识出发,维塞尔对收入分配现象有了新的认识,它实际上是归属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定解决方式。通过收入分配所表现出来的要素价格,保证了特定财富分配方式下,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维塞尔并非单纯为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辩护,而是为这种分配的背后潜伏着的增进经济效益的归属现象辩护。相比之下,维塞尔比门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更不满。(5)由于认识到价格的经济功能,维塞尔认为如果按劳动价值论来确定共产主义社会中产出的价值,那么稀缺的非劳动资源将没有价值,它们的配置将成问题。因此,他认为,即便共产主义的管理是尽善尽美的,管理者是廉洁的,公民是无私的,其他失误是不存在的,但只要要素、产品的相对稀缺仍然存在,那就仍然应当

存在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产品的自然价值,应当存在边际产品的效用所决定的资本的自然利息,土地的自然地租,就是说仍应当计算各要素的边际生产贡献,以便按最合理的方式使用产品和各种要素。当然利息和地租将不再成为私人收入,不再是分配范畴,而是经济核算的范畴。由此可知,他所探讨的自然价值(包括自然利息、自然地租),实际上是超越经济制度的,是合理分配稀缺资源所必需的纯经济范畴。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及赋税原则

维塞尔考虑了门格尔所未考虑的问题:政府的经济职能。对这个问题,维塞尔有下述值得注意的想法: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应当是个人无力干的事,个人不愿干的事,个人不适宜干的事。前两条早已为斯密所提出,但后一条则是新的,它是指私营将导致垄断的活动应由政府出面主办。

门格尔也有反垄断的思想,但他的反垄断的思想与他的边际效用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维塞尔则从边际效用论出发,论证了反垄断的重要性、必要性。维塞尔指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故财货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其总效用和总价值会向相反方向变动。当企业的目标是价值而非效用,同时又具有垄断地位,那么它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即减少总效用)来达到目标。这说明,当出现垄断时,厂商的利益(总价值增加)可能与社会的利益(总效用增加)发生冲突。因此,反垄断,由国家来从事可能导致私人垄断的事业,便成为国家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

维塞尔从边际效用论出发论证了合理的税负原则及累进税制。维塞尔提出合理的税负要达到两个平衡:一是赋税额要与国家提供的服务的价值相当;二是个人收入在满足公共利益的赋税和满足私人开支两方面的平衡。即赋税给纳税人带来的边际效用应当和私人开支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对累进税制,维塞尔提出它可以从富人和穷人对财富的不同边际效用上说明其合理性。

维塞尔提出,为了兼顾平等和效率,同一社会应当保有私人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前者不利于平等,但有助于效率,后者则能促进平等。关于平等与效率之间的不一致,实际上导致了国家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不协调。维塞尔是较早指出公平与效率之间冲突的经济学家。

第三节 庞巴维克对门格尔经济思想的发展

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年),生于奥地利,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法学系,曾与维塞尔同赴海德堡、莱比锡和耶那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881—1889年任因斯布鲁克大学教授。1889年入奥匈帝国财政部任职,于1895年、1897--1898年和1900--1904年三任奥匈帝国内阁财政部长。1904年离开政府,任维也纳大学教授。1911年曾被选为奥地利科学院院长。其主要论著有:《资本与利息》(1884年,有中译本),《商品价值理论纲要》(1886年),《资本实证论》(1888年,有中译本),《奥地利的经济学家》(1890年),《价值、成本和边际效用》(1892年),《财货价值的最后尺度》(1894年),《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终结》(1896年,有中文节译本)。庞巴维克对门格尔经济思想的发展,主要是在价值论、价格论,尤其是在资本、利息、利率方面。

一、价值论

庞巴维克完全接受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他的发展主要是详尽论述了当物品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及互补关系时,边际效用如何决定物品的价值。他指出,一物的价值不单纯取决于其本身的边际效用,而且取决于可用来替代它的其他物的边际效用。由于人们一般是通过交换来取得替代物的,因此上述观点的提出使边际效用价值论从门格尔的孤立人那里走进了交换经济,有助于说明交换经济下物品的主观估价如何形成。

关于互补物品的价值,庞巴维克指出,一组互补物品的总价值等于它们互补使用时的边际效用,除非它们中间每种物品都可被替代。关于它们中间每种物品个别的价值,要区分几种情况:(1)若每种物品都不可替代且只有一种用途,则每种物品都具有全组的价值。(2)若每种物品虽都不可替代但都还有其他的用途,则每种物品都将有两个价值,一个是作为互补物品使用时的价值,另一个是在其他用途上的价值,但通过自由竞争下的交换会使二者趋于相等。(3)若一组互补品中有些可被替代而另一些则不可时,那些可被替代物品的价值不会高于它们独立使用时的价值,而不可被替代的物品的价值将等于全组物品的总价值减去可被替代物品价值后的剩余。互补品价值决定的理论,为其分配论奠定了基础。

二、价格论

在价格理论上,庞巴维克对门格尔的主要发展是提出了买卖双方竞争时,价格由边际对偶决定。如前所述,门格尔在分析价格决定时,只看到既定的供给对价格以及价格对需求的决定作用,但没有看到价格对供给的决定作用,没有分析卖方竞争时的价格决定。庞巴维克的边际对偶正好克服了门格尔价格理论的缺点。下面是庞巴维克在说明边际对偶如何决定市场价格时所采用的一个例子:

假定有 10 个买主和 8 个卖主,每人都打算买进或卖出 1 匹马,每人对 1 匹马所作的主观评价如下:

买 主		卖 主	
对 1 匹马的最高估价		对 1 匹马的最低估价	
A1	30 镑	B1	10 镑
A2	28 镑	B2	11 镑
A3	26 镑	B3	15 镑
A4	24 镑	B4	17 镑
A5	22 镑	B5	20 镑
A6	21 镑	B6	21 镑 10 先令
A7	20 镑	B7	25 镑
A8	18 镑	B8	26 镑
A9	17 镑		
A10	15 镑		

假定这些买主和卖主同时来到市场,各匹马的优劣相同,每个人都判断准确。这时马的价格的上限由实际进行交换的最后的买主(即 A5),和被排斥在交易以外的最有能力的卖主(即 B6)的评价来决定;其下限则由实际卖出货物的能力最小的卖主(即 B5)和被排斥的最有能力的买主(即 A6)的评价来确定。A5 和 B6,以及 A6 和 B5,就构成边际对偶的四方,由这个边际对偶决定的价格将在 21 镑 10 先令和 21 镑之间。如果价格高于或等于 21 镑 10 先令,卖主将超过买主,卖主之间的竞争将压低价格;如果价格低于或等于 21 镑,买主将超过卖主,买主的竞争将抬高价格。

庞巴维克的边际对偶已经接近于马歇尔后来提出的均衡价格论,他已经包含着供给是价格的递增函数,需求是价格的递减函数这两方面的意思,已经看到价格由供求均衡点决定。边际对偶的思想也被庞巴维克用来说明借贷利率的决定。

边际对偶的意义在于表明价格是在无数买者与卖者的个人估价的相互冲突中形成的,但又不是依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它表明社会经济现象是在无数人的意向冲突下,按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原则产生的。这里既排除了个人意志决定论,也排除了宿命论。社会客观经济现象是千万人意志冲突而造成的,因此社会不存在纯客观的与任何人意志无关的经济现象,否认这一点,就是宿命论。社会客观经济规律的意义不在于规律与人的意志无关,而在于个人意志不可能扭转千万人意志的合力。边际对偶描绘了从许多人的主观估价过渡到社会评价的机制,因此把边际对偶简单地看成主观价格理论,是值得怀疑的。边际对偶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将反过来影响个人主观估价,这就造成了替代效用,所以边际对偶实际上是他的替代效用说的逻辑前提。边际对偶决定的价格并没有排斥个人估价,只是把后者隐蔽了起来。当价格低于个人估价时,个人将按价格购买,只要价格不超过个人估价,购买将继续进行,一旦价格高于个人估价,购买行为就将停止。

边际对偶的局限性在于它只说明了暂时的均衡价格。由于庞巴维克没有分析决定供给者供给价格的种种因素,没有联系成本考虑供给价格,因此,也没有说明短期和长期的均衡价格的决定。这就是说,他没有说明古典学派经常考虑的那种在或长或短的时期中社会决定的价格。尽管有此不足,但他的思路是极富启发性的,因为它在对商品的个人主观估价和社会客观评价之间建立了第一座桥梁。

三、资本与利息理论

前面已经指出门格尔在资本问题上所提出的新见解,以及由于他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见解而导致的资本概念上的混乱。庞巴维克通过区分两类资本概念澄清了这一混乱。他把人们所说的资本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资本是指生产资本或社会资本,它是中间产品的集合,包括除消费品以外的一切产品:原料、固定资本。广义资本则是指获利资本和私人资本,它除了包含中间产品外还包括用于交换的消费品(包括企业家预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等)。

上述划分的意义在于把作为中间产品、作为“物”的资本,与反映了社会关系的资本,在概念上区分开来(虽然二者在实际上常常是结为一体的),从而使庞巴维克有可能从中间产品的角度去探讨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功能。他接受了门格尔关于使用中间产品(门格尔称之为高级财货)的迂回生产比直接生产具有更高生产力但需要更多时间的命题,进一步提出了生产期的概念,用于指称生产消费品所需要的迂回时间。生产期的长短与维持基金密切相关,维持基金是他特别提出的一个概念,指迂回生产过程中处于各

个不同生产阶段上的(包括最后阶段的)、最后用于形成工人逐期所需消费品的产品(包括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总和。他关于生产期长度与维持基金之间关系的公式可归纳如下:

$$S = [x + (x-1) + (x-2) + \dots + 1]y/x = (x+1)y/2$$

S 为总维持基金, y 为工人每年所需要的维持基金, x 为生产期长度。由该式可知, 当 y 一定时, S 越大, 所允许的生产期 x 便越长; 或者说 x 越长, 所需要的维持基金 S 便越大。

在关于迂回生产的观点中, 庞巴维克最大的问题是定义资本主义生产为使用中间产品的迂回生产。该定义的问题在于它只涉及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一方面的特征, 即生产中使用大量中间产品这一特征, 而其他的特征都无法从该定义中反映出来, 并且, 按此定义便无法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因为后者在生产方面也具有迂回的特征。合理的表述应当是: 资本主义生产是使用中间产品的迂回生产的诸形式之一。

迂回生产的根本特征是使用被称作社会资本的中间产品, 但这些社会资本(中间产品)从何而来呢? 庞巴维克指出, 社会资本(中间产品)的形成与积累既依存于生产又依存于储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 就是节约一部分生产力不用于生产当年消费品(通过储蓄行为), 而用于生产中间产品。这就结束了以前长期存在于西方经济学界中的关于资本是生产的结果还是节约的结果的争论。

庞巴维克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资本积累的三种方式: (1) 减少生产当年消费品的劳动力, 转而生产资本品; (2) 减少生产当年消费品的资本品; (3) 改变资本品的用途, 使原先用于生产消费品或较低级的高级财货的资本品转而生产较高级的高级财货。

庞巴维克还提出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分派较多的工人去从事较迂回的生产方式, 减少直接生产消费品的人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则是由消费者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于是在价格机制作用下, 使消费品生产减少, 资本品产量增加。

根据上述这些关于社会资本(中间产品)的功能及其形成机制看法, 庞巴维克认为, 作为资本收益的利息的根源不是节欲, 也不是迂回生产造成的生产资本的较大生产力, 而是由于人们对现在物品比同种同量的未来物品具有较高的主观评价。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三个原因: (1) 预计未来生活状况会更好, 供给会更充裕, 故现在物品较未来物品更有价值; (2) 由于缺乏想像力, 意志不坚决, 无法抵御当前消费享受的诱惑, 人生无常而导致低估未来; (3) 对将来某一特定时间而言, 现在物品比未来物品允许用更迂回的生产方

式,例如对于今后第 10 年而言,现在的物品便比今后第 5 年的物品允许用更迂回的生产方式,前者允许 10 年迂回期的生产方式,故现在物品在技术上有优越性。(1)、(2)两个因素通常在穷人身上和不经心的人身上起作用,使他们高估现在物品。在富人那里(1)、(2)两个因素也许不存在,但因素(3)会发挥作用。结果几乎不论什么境况的人,穷困的、富有的,不经心的、节约的,或者由于(1)、(2)因素,或者由于因素(3),都将高估现在物品,而低估同种同量的未来物品。

庞巴维克认为利息的具体来源有三个:借贷利息、企业利润、耐用品租金。借贷利息是当前物品与同种同量未来物品相交换时的价格。它的决定也可以用边际对偶来说明。

现在物品 买主	现在物品 单位估价	来年期 物品单位	现在物品 卖主	现在物品 单位估价	来年期 物品单位
A1	100=	300	B1	100=	99
A2		200	B2		100
A3		150	B3		101
A4		120	B4		102
A5		110	B5		103
A6		108	B6		105
A7		107	B7		106
A8		106	B8		107
A9		104	B9		108
A10		102	B10		110

按照上表假设的情况,100 单位现在物品将值来年期物品 106 单位与 107 单位之间。借贷利息在 6 和 7 单位之间。

庞巴维克所分析的企业利润并不是由于经济的动态因素造成的,超过正常利息的那种企业家利润,而是资本家把钱贷给企业家后所要求获得的利息。他认为企业利润的形成是由于企业家购买的劳动及其他高级财货,虽然在物质上和物理上是现在财货,但在经济意义上是将来财货,即它们要到将来才能变成消费品。因此,虽然它们的未来价值与它们转变成的消费品价值一致,但由于这些未来消费品的现值将要打一个折扣,所以这些高级财货及劳动的现值也要打同样折扣。随着生产过程的进行,它们逐步转变为现在财货,于是其价值也逐步得到提高。到生产过程结束时,高级财货和劳动这些以前的将来财货和现在由它们转化成的当前财货的价值差额,就构成企业利润。耐用品的租金在庞巴维克看来等于它在一年的使用中所获得的总

收益减去所丧失的价值,即租金等于净收益。耐用品的价值决定由下式给出:

$$V = R_0/(1+r)^0 + R_1/(1+r)^1 + R_2/(1+r)^2 + \dots + R_n/(1+r)^n$$

V 为总价值, R_0 为当年服务的价值, R_1 为尔后第一年服务的价值, R_2, \dots, R_n 以此类推, r 为利率, n 为耐用品的使用期限。由上式可知,即使耐用品在未来的一系列年份中提供的服务是一样的,但越遥远的服务的现值越小。当新耐用品使用一年后,得到的收益是当年服务的价值 R_0 ,失去的价值等于最后一年服务的价值的现值 $R_n/(1+r)^n$ 。再使用一年后得到的收益仍是当年服务的价值 R_0 ,失去的是 $R_{n-1}/(1+r)^{n-1}$,于是可由下式给出耐用品使用到第 k 年时的租金:

$$N_k = R_0 - R_{n-k}/(1+r)^{n-k}$$

如果耐用品是消费品,则租金由上式给出,如果是资本品,则其当年服务的价值还要按该服务最后转化为消费品所需要的年限来进行贴现。其租金也同样是按上述原则贴现的结果。

综合上述三种利息来源,可知在庞巴维克看来,利息的根源在于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的价值差额。

庞巴维克认为利息的功能在于防止那种其剩余收益低于利息的过于迂回的生产方式。因此,利息是一个纯经济范畴,而非历史—法权范畴。于是他提出,社会主义也将有利息,如果计划当局不愿犯重积累而忽略当前消费的错误的话,社会主义的利息将继续保持其控制生产迂回程度的经济功能。但不再像资本主义那样成为少数资产者的收入,而是作为全体人的收入,即利息在社会主义中将保持资源配置功能,失去分配功能。

庞巴维克关于资本和利息的理论,使他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这一理论直接影响到瑞典学派创始人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以及当代经济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经济波动理论。对于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的理论,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而应一分为二地进行评论。他其实是并不自觉地时而在一般意义上考虑迂回的社会化大生产,时而在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上考虑迂回的社会化大生产,他关于社会资本(中间产品)的功能和形成机制的观点,关于利息的经济功能(防止生产过于迂回化)的观点,显然是在一般意义上考虑迂回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因此这些论点不仅适应资本主义也同样适应社会主义。而他关于利息来源的观点,则更像是他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形式上考虑迂回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因为在他分析利息来源时,利息不再是仅仅与社会资本(中间产品)相联系的现象,而是和私人资本收益资本(即他所说的广义资本)相联系的现象了。他关于利息

来源的观点,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也相异于后来美国经济学家 J. B. 克拉克提出的,目前在西方占正统地位的边际生产力论。

四、利率的决定

庞巴维克的利率理论,不是说明单纯的资金借贷市场上利率的决定,而是要说明资本和劳动各自的收入如何决定,因此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他独特的分配理论。他认为,利率是现在物品与同样的将来物品交换时的价格,当现在物品的买卖双方对现在物品与将来物品的交换比例(贴水)都有确定看法时,利率由边际对偶决定。这就是发生在单纯的资金借贷市场上的事情。

他进一步认为,资金借贷市场上利率的上限,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实际上要由企业正常利润率(利率的特定形式之一)来决定。而企业正常利润率从全社会角度来看,正是以消费品形式出现的现在物品与劳动这个将来物品相交换的贴水。

因此,从整个社会来看,在现在物品与将来物品的交易中,占有重大比例且起主导作用的是劳动这个未来物品与资本家阶级拥有的消费品(现在物品)之间的交易。而劳动与其他物品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买者没有关于它的预先决定好的主观评价,因此劳动是按照它的未来产品而评价的。但劳动所能带来的未来产品的多少是随生产迂回程度(生产期)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生产期未定之前劳动这个未来物品与现在物品的交换比率,即企业正常利润率,也难以确定。

他认为,生产期的长短取决于工资率,而工资率在资本家看来恰好是劳动所能带来的未来物品的价值的贴现值。但如刚才所说,劳动所能带来的未来物品多少又要定于生产期,且未来物品价值贴现时的贴现率又要定于企业正常利润率。这就陷入了循环决定之中。

为了摆脱困境,庞巴维克运用文字和数表,构造了一个理论模型,用来说明利率(企业正常利润率)和工资率是如何同时决定下来的。为了便于理解,下面我们改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表达方式来说明他的模型。他给模型规定了如下前提:(1)劳资双方全体集中于一个统一市场。(2)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随生产期变动而变化的比率都一致。(3)资本家追求利息(利润)最大化,利率(利润率)等于最大化时的利息(利润)与资本之比。(4)对现在物品的需求完全由工资收入者形成。(5)维持基金为一常量(他称之为资本)。(6)劳动供给也为一常量。(7)通过自由竞争,劳动的供求趋于相等,即劳动需求总是趋向固定的供给。庞巴维克的思路可以通过图 2-2-1(a)、(b)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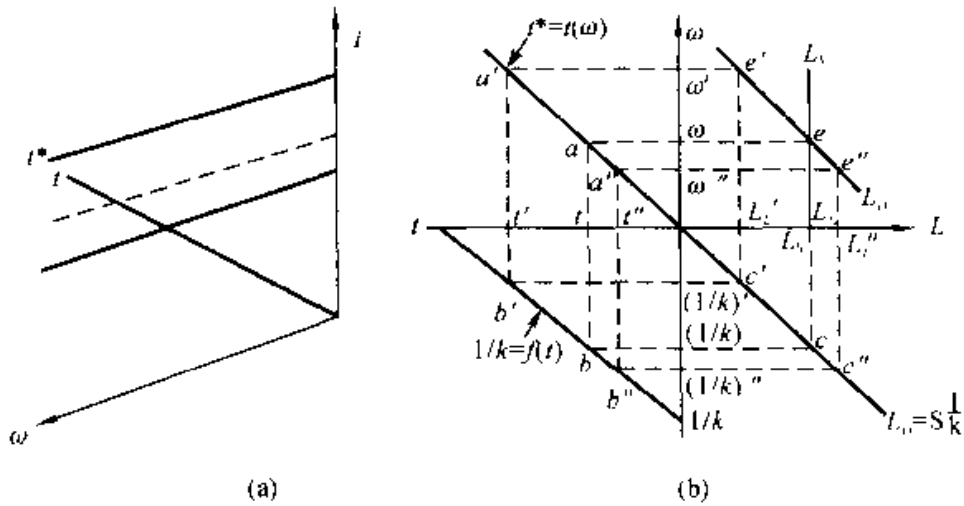


图 2-2-1

(a)图为一立体图,横轴表明实际工资率 ω ,纵轴为生产期 t ,竖轴为利率 i 。该图表明 i 是 ω 和 t 的二元函数,对于任一 ω ,可以有許多 t ,但只有一个 t (记为 t^*)才使 i 最大。而 t^* 依 ω 的变化而变化,形成图中的 t^* 曲线。该图表明 i 的图像是一个曲面,该曲面类似一座以 t^* 线为山脊,从右向左逐渐下降的山。它表明 i 随着 ω 和 t 的增加而下降。

(a)图进行与 i 轴平行的投影后,转变为平面图。即(b)图的第二象限,其中 $t^* = t(\omega)$ 曲线表明,随着 ω 的变化,企业家为追求 i 最大化而变动的 t 的轨迹。b图第三象限中的纵轴为单位资本(维持基金)所承担的就业劳动者 $1/k$, $1/k$ 的倒数 k 就是就业劳动者的人均维持基金。该象限中的曲线 $1/k = f(t)$ 表示单位资本承担的就业劳动者是 t 的递减函数,或者说就业劳动者的人均维持基金是 t 的递增函数。这一结论可以从前面介绍的维持基金与生产期之间关系的公式中方便地推论出来。第四象限横轴为劳动的供给和需求 L ,象限中的曲线 $L_D = S(1/k)$ 表明当维持基金 S 一定时,随着 $1/k$ 的增加,劳动需求 L_D 也不断增加。第一象限中的垂线 L_S 表示固定的劳动供给,而负斜率的斜线 L_D 表示劳动需求,表明随着工资下降,劳动需求增加。

由(a)图可知,当工资率为 ω' 时,沿虚折线 $a'b'c'e'$,可得到 ω' 时使 i 最大化的 t' , t' 所决定的 $(1/k)'$ 以及 $(1/k)'$ 所决定的 L_D' 。这时劳动需求小于供给,引起工资下降的压力,使 ω' 趋于下降。当工资率为 ω'' 时,沿虚折线 $a''b''c''e''$ 可得到相应 t'' , $(1/k)''$, L_D'' 。这时劳动需求大于供给,造成工资上涨压力,使 ω'' 趋于上升。当工资率为 ω 时,由虚折线 $abce$ 可知,劳动供求相等。此时的 ω, τ 为均衡时的工资率和生产期,而由 ω 和 τ 所决定的利率 i 也就

是均衡时的利率。由此可知,庞巴维克是以劳动市场均衡和资本不存在闲置为前提条件,决定均衡的工资率、生产期及利率。它的思想实质上可以表达为一个非线性的规划。该规划的目标函数为:

$$i - i(\omega, t), \frac{\partial i}{\partial \omega} \begin{cases} > 0 & \omega < \omega^* \\ = 0 & \omega = \omega^*(t) \\ < 0 & \omega > \omega^*(t) \end{cases}$$

$$\frac{\partial i}{\partial t} \begin{cases} > 0 & t < t^*(\omega) \\ = 0 & t = t^*(\omega) \\ < 0 & t > t^*(\omega) \end{cases}$$

$$\frac{\partial^2 i}{(\partial \omega \partial t)} - \frac{\partial^2 i}{(\partial t \partial \omega)} < 0$$

约束条件由劳动需求函数推导出来,劳动需求函数为:

$$L_D = S(l/k) = S \cdot f(t)$$

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劳动供求趋于相等。即

$$L_s = L_D = S \cdot f(t)$$

由此可得充分就业时的生产期,记为 t_L

$$t_L = f^{-1}(L_s/S), f^{-1} \text{ 为 } f \text{ 的逆函数}$$

这就是约束条件。故这个非线性规划可表达如下:

$$\begin{aligned} \max \quad & i = i(\omega, t) \\ \text{s.t.} \quad & t = f^{-1}(L_s/S) \end{aligned}$$

该规划是说,在生产期由 L_s, S 和 f 三者(其中两个为常量,一个是函数)决定之后,寻找该生产期中使 i 最大化的 ω ,由此便同时求得了 ω 和 i ,解决了分配问题。

在建立基本模型之后,庞巴维克又进一步考虑了改变模型的参数 S, L_s 以及 t^* 曲线的斜率和其他前提对利率和工资率的影响,由此他得到如下一些结论:

1. 其他条件不变,既定的资本量(维持基金)越大,则利率越低,工资率越高。
2. 其他条件不变,既定的劳动者越多,则利率越高,工资率越低。
3. 其他条件不变,技术愈是进步,则利率越高。
4. 其他条件不变,地租越高则利率越低。
5. 其他条件不变,整个社会的储蓄欲望越高,则利率越低。

第三章 英国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

第一节 杰文斯的经济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年),出生于英格兰利物浦。1863年毕业于伦敦大学。1863—1876年任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逻辑学与伦理学指导教师、讲师、教授。1876—1881年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70年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长。1872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其主要论著有《煤炭问题》(1865年),《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有中译本),《货币与交换机构》(1875年),《政治经济学入门》(1878年)等。

一、经济学的目的与方法

杰文斯是从作为消费者的经济人的个人角度去理解经济学的,因此他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幸福,认为经济学是关于效用和自利心的力学,并认为这种经济学可以建立在三个最基本的归纳性命题上:(1)每一个人都选择较大的明白和利益;(2)人类欲望或迟或早会满足;(3)延长的劳动会愈益成为痛苦的。鉴于对经济学的目的、性质及基本前提的上述看法,杰文斯认为有必要改动本学科的名称,由政治经济学更名为经济学。

杰文斯强调要用数学手段来研究经济学,理由之一是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各种经济量及其相互关系,而一切量与量的关系都属于数学的范围。理由之二是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量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数学方法比通常的文字分析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些复杂关系。他认为经济学家一向是不自觉地采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故所犯错误甚多,因此,明确经济学的数学性,自觉采用数学方法,将使经济学理论获得进步。他并且进一步认定,经济学所涉及的都是变量,因此应当采用微积分法来研究经济。他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其数量可精确计算的科学才能运用数学的观点,强调必须把一门科学的数学性

和精确性加以区分。而经济学虽然由于缺乏完善的统计而不是精确的科学，从而使其用途较小，但它仍然具有数学性，应当而且必须采用数学方法，尤其是微积分法。同时他也冷静地看到，并不是一旦承认经济学的数学性质，采用了数学方法，便可获得真理。他关于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表达出来：“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①从以上论述可以概括如下几点：(1)经济学的本性是数学的，因此采用数学方法是其本性所使然。(2)变量无法精确测定并不妨碍经济学的数学性，不妨碍数学方法的采用。(3)经济学所用的数学方法主要是微积分法。(4)数学方法是使经济科学进步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

对数学方法的强调，是杰文斯方法论方面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优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强调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数学方法从那个时候以来给经济科学带来的进步，是极其巨大的。经济科学的数学化就像物理科学的数学化一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杰文斯对经济科学的数学性与精确性的区分，从当时为经济学的数学性辩护这一点来看，是机智的。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一见解预示了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区分，前者具有数学性，但不考虑变量的精确测定，只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以前者的研究结果为基础，通过对变量(参量)的精确测定来检验理论预测前景，具有精确性。上述数学性不等于精确性的见解也表明杰文斯对于数学的本质有着较深的洞察力。19世纪数学的基本概念是数和形，以致许多人认为只有可以测定数量的东西才可以成为数学的对象。只有对数学的本质有深刻洞察力的人，才能破除以上成见，坚信经济学(其研究的变量在当时几乎都难以精确测定)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杰文斯虽然正确地肯定了经济学的数学性，但限于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他在采用什么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这一方面却表现出了狭隘性：只看重微积分。

除了强调数学方法之外，杰文斯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二个特点是强调统计对于经济科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要验证演绎的经济学所得出的结论，要使经济学成为不仅是数学的而且是精确的，从而具有实用价值，就必须依靠健全的统计。虽然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他并没有运用统计资料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但注重统计资料，运用统计资料来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却是他的学术生涯的一大特征。例如对于英国煤炭资源问题的研究，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当然他在这方面也有失败的纪录(如提出太阳黑子周期论)，但其注重统计，运用统计资料进行研究的方法还是值得称道的。

^①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

杰文斯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三个特征是主张细分经济学科,主张各种研究方法兼容并蓄。他认为当时经济科学的混乱状态是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太多,且理论研究层次与应用研究层次没有区分。因此需要从题材和研究方法方面实行分科。同时又以某种一般原理为共同的基础。这一见解,也显示了杰文斯的远见。今天的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个门类众多、分工细化的大家族,这种分科给经济科学带来了明显的进步。

杰文斯在方法论上的第四个特征是静态分析。他承认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类似于物理学中的静力学,而动态分析还有待发展。因此他在分析中抽象掉人口变动,集中力量分析人口、土地及其他资源既定时,如何配置劳动,使生产物的效用最大化。在他看来,这就是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

杰文斯的方法论上的第五个特征是广泛运用合成推理,即认为对个人来说适用的结论也必定适用于整个社会,反之亦然。这种方法大大简化了他的分析,但也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许多缺陷和不足,概源于此。

二、效用理论

杰文斯认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消费而非生产,因为生产的目的是消费,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要依消费需要来决定。

在研究消费时,杰文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基础,认为人们消费的目的便是追求快乐、减免痛苦。而物品能给人带来快乐(或负痛苦)的性质便是物品的效用。因此,效用并非物品的客观属性,而是在与人发生关系时才具有的属性。

杰文斯用图形和数学方式,表达了边际效用递减律以及总效用与边际效用之间的区别。图 3-1-1(a)、(b)图分别表达了个人和全国的边际效用递减律。由于对个别人来说,某种商品的数量(x)不是无限可分的,故其边际效用曲线为阶梯形。但对于全国来说,某种商品的数量可以看成是无限可分的,故其边际效用曲线为一光滑曲线。

杰文斯用 u 表示消费 x 量某商品所带来的总效用,而 du/dx 表示边际效用,他称之为效用程度。由此可知边际效用是总效用对消费数量的一阶导数,是消费量的函数。他认为效用程度 du/dx 会随 x 的增加而减少,即 $d^2u/dx^2 < 0$ 。这样他使用数学方式表达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以边际效用递减律为基础,杰文斯进一步探讨消费者在既定商品数量下获取最大效用的条件。他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商品 x 可用于若干种用途上,二是商品 x 可用于从现在起的不同时间上。

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假定某物的一定数量 S 可用于两种用途:第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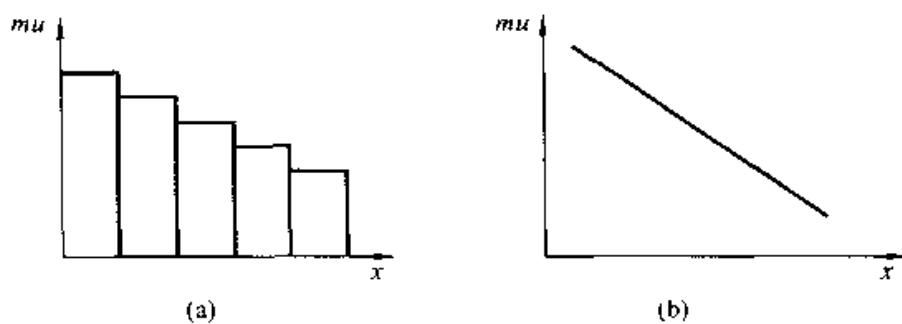


图 3 1 1

用途上用去 x , 总效用为 u_1 ; 第二种用途用去 y , 总效用为 u_2 ; 且 $x + y = s$, 则获取最大效用的条件为:

$$du_1/dx = du_2/dy$$

即两种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相等。

第二种情况下, 他假定某物的一定量要分配于未来几个时期内使用。 v_1, v_2, \dots, v_n , 分别是各期消费的边际效用。 p_1, p_2, \dots, p_n , 分别是获得 v_1, v_2, \dots, v_n 的概率, 因为物品在储藏中可能损失, q_1, q_2, \dots, q_n 分别是现在的快乐对于未来各期的同样程度快乐的比率,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个比率通常不等于 1。现在获取最大效用的条件为:

$$v_1 p_1 q_1 = v_2 p_2 q_2 = \dots = v_n p_n q_n$$

杰文斯关于效用、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递减律, 以及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条件的思想, 其主要特色是运用图形和公式来表达。

三、交换理论

在交换论中, 杰文斯首先下了三个定义: 定义使用价值为总效用, 价值(或估价)为效用程度(即边际效用), 价格(交换价值)为两种物品之间的交换率。然后他把市场规定为具有完全知识的自由竞争市场。为了考察这种市场中的交换规则, 他提出了“贸易体”这一概念和无差别法则。贸易体是指买者或卖者所组成的集团, 可以只有一个人, 也可以由全体居民组成。这一概念在它的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 使他不必要再区分个别的孤立交换与有众多人同时参加的交换。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以下述信念为基础的: “市场虽有广狭, 交换原理在性质上总是相同的。一个贸易体, 或是一个人, 或是一个人的团体。”^① 即这两种情况下, 交换都通行相同的原理。无差别法则的含义是, 在完全知识的自由竞争市场上, 两种物品的交换率在同一时间中, 不论

①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第 83 页。

在哪两个人的交易中,都是相同的,无差别的。这一法则实际上是完全知识的自由竞争市场的必然结果。由该法则所得出的推论便是:任一时点上两种物品在任何局部范围中交换的比率,必与全部范围中的交换率相等。写成公式便是:

$$dy/dx=y/x$$

杰文斯认为交换中通用的基本原理是“二商品的交换率,是交换后诸商品量(可供消费的诸商品量)的最后效用程度的比率的反数”^①。该原理保证了交换者通过交换获取最大利益。他用以下二个联立方程表示了这一原理,它就是有名的杰文斯交换方程式:

$$\phi_1(a-x)/\Psi_1y-y/x=\phi_2x/\Psi_2(b-y)$$

a 为贸易体 A 在未交易前拥有的 A 商品量, x 为用于交易的数量, $a-x$ 为交易后拥有的 A 商品量, $\phi_1(a-x)$ 为交易后 A 商品对贸易体 A 的边际效用, y 为通过交易贸易体 A 所得到的 B 商品量, Ψ_1y 为贸易体 A 从 y 量 B 商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 b 为贸易体 B 交易前拥有的 B 商品量, y 为用于交易的数量, $b-y$ 为交易后拥有的 B 商品量, $\Psi_2(b-y)$ 为交易后 B 商品对贸易体 B 的边际效用。 ϕ_2x 为交易后 A 商品对贸易体 B 的边际效用。该方程组的推导如下:由交换的基本原理,交易后贸易体 A 和 B 都实现下述平衡式:

$$\phi_1(a-x)dx=\Psi_1dy \quad \text{即} \quad \phi_1(a-x)/\Psi_1y=dy/dx$$

$$\phi_2x dx=\Psi_2(b-y)dy \quad \text{即} \quad \phi_2x/\Psi_2(b-y)=dy/dx$$

由这两个平衡式,再考虑无差别法则使 $dy/dx=y/x$,便可得到交换方程式。

以上述交换方程式为基础,杰文斯进一步考虑了以下几种稍微复杂的情况:(1)三种物品三个贸易体时的情景。(2)三个贸易体两种物品,其中两个贸易体提供同一种物品时的情景,即卖方竞争时的情景。(3)当交易存在着诸如运费、佣金、包装费以及关税等种种费用时的情景。(4)当物品不能无限分割时的情景。在这几种复杂情景下,交换方程式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此我们不再作进一步的介绍。

杰文斯建立交换论的目的是想说明交换价值的决定,这从他对交换的基本原理的陈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认为二商品交换价值由二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的倒数决定。但实际上,他的交换论只是指出了消费者在既定交换价值下通过交换实现满足最大化的条件,以及个人在既定交换价值下

①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7页。

追求满足最大化所形成的供给和需求。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关于交换的基本命题的逆命题,交换后诸商品量的最后效用程度的比率的倒数,要等于二商品的交换率,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消费者均衡的条件。

杰文斯在建立交换价值决定理论的过程中,无意之中建立了消费者均衡理论,这就是他的交换论的主要价值,也正因为如此,他时常被称作现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的先驱。但杰文斯的交换论作为一种交换价值决定理论,是不成功的。他没能说明交换价值的决定。作为一种交换价值决定理论,他的交换论有如下几个问题:(1)混淆孤立的两个人之间的交换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交换,这表现在他的“贸易体”的概念上,以及两种情况下都用同一个交换方程式来说明边际效用之比的倒数决定交换价值。问题在于,当贸易体是由众多的买者或卖者组成时,如何从个人的边际效用形成贸易体的边际效用,这是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用贸易体对两种物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的倒数来决定交换价值,就非常可疑。(2)忽略了完全竞争条件下,个别交易者的边际效用之比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只强调边际效用之比对交换价值的决定,忽略了交换价值对边际效用之比的影响。事实上,完全竞争条件下两种商品均衡的交换价值的形成是一个交换价值与边际效用之比相互作用的过程。任何一种交换价值,都使交换双方的每一个人按满足最大化的原则(使两种物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的倒数等于交换价值)形成自己的供求。这些个人的供求加总后形成整个市场的供求,这个供求可能相等也可能不相等。若不相等,则交换价值将变动,并进一步使每个交易者按照与新的交换价值的倒数相等的边际效用之比来调整自己的供求,然后加总成新的市场供求。这个过程反复进行,直到市场供求相等为止。这时,每个交易者都会通过交换活动使两种物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的倒数等于均衡的交换价值。但不能仅根据这一点,不考虑整个调整过程,就断言说边际效用之比的倒数决定交换价值。杰文斯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分析达到均衡交换价值的整个过程,于是把供求均衡时的均衡关系(交换价值与边际效用之比的倒数相等)错误地当作函数关系,认为是边际效用之比的倒数决定着交换价值。他的出发点是想用边际效用来说明交换价值,但他并没有真正搞清边际效用在交换价值决定(趋于均衡)过程中的作用。

四、劳动理论

杰文斯的劳动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均衡的劳动时间的决定;劳动在各种产品生产均衡分配的条件。

杰文斯定义劳动为:“心或身所忍受的任何含有痛苦的努力,而以未来

利益为全部目的或一部目的者。”¹⁾他把劳动所带来的痛苦称之为负效用,且劳动时间越久,边际负效用越大。但他也承认,只要劳动时间不超过一定长度,也会给劳动者带来正效用。另一方面,劳动时间越久,带来的成果也越多,因此这些成果的边际效用将越来越小。他认为均衡的劳动时间将由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与劳动成果的边际效用相等的这一点所决定。这可以用图形或数学方程来表示。图 3-1-2 横轴为时间,纵轴为边际效用和边际负效用。 pq 曲线为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曲线, bcd 曲线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曲线。该曲线表明,在 Ob 时间内,劳动由一开始的不习惯不舒服变得有味道,在 bc 时间内劳动带来正效用, c 点之后,劳动产生边际负效用。在 m 点,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md 正好等于劳动产品的边际效用 mq ,故 m 点便是均衡的劳动时间。均衡的劳动时间还可以由以下微分方程表示: $dx/dt = dx/dt \cdot du/dx$, v 为劳动的负效用, dv/dt 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 x 为劳动产出, dx/dt 为劳动产出对时间的导数, u 为劳动产出的总效用, du/dx 为劳动产出的边际效用。杰文斯上述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的概念,以及劳动时间均衡的思想,为以后边际主义者提出劳动的供给曲线,准备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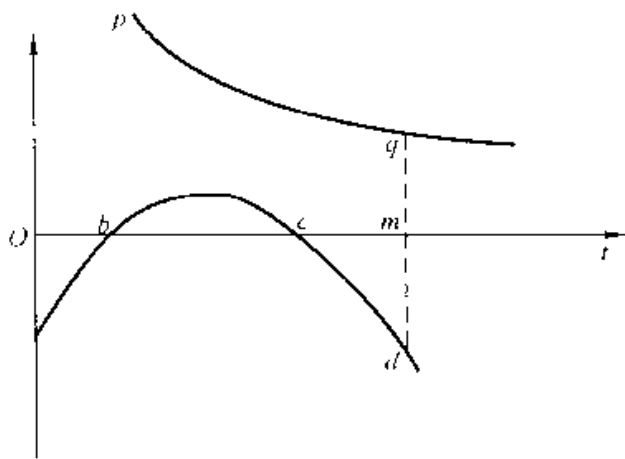


图 3-1-2

杰文斯认为,劳动在各种产品生产中均衡分配的条件,对于整个社会和对于个别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考察了个别人劳动均衡分配的条件。他假定这个人能生产两种商品,则他均衡分配劳动的条件可表示为一组联立微分方程:

$$\begin{aligned} du_1/dx \cdot dx/dt_1 &= du_2/dy \cdot dy/dt_2 \\ t &= t_1 + t_2 \end{aligned}$$

¹⁾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3页。

$$du_1/dx \cdot dx/dl_1 = 1$$

u 为 x 产品的总效用, du_1/dx 为 x 产品的边际效用, l_1 为用于 x 产品的劳动量, dx/dl_1 为 x 产品对 l_1 的一阶导数, 可称之为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 u_2 为 y 产品的总效用, du_2/dy 为 y 产品的边际效用, l_2 为用于 y 产品的劳动量, dy/dl_2 为 y 产品对 l_2 的一阶导数。第一个等式表示单位劳动在生产 x 产品中带来的边际效用与生产 y 产品中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这就是均衡分配劳动的条件。第二式表示总劳动量分解为用于生产 x 和生产 y 的两部分劳动, 或者说这两部分劳动之和不能超出总劳动量。第三式是劳动时间均衡的条件, 即单位 x 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和造成的边际负效用(用 dl_1/dx 表示)正好相等。三个方程, 共有三个未知量, 即 l, l_1 和 l_2 , 故整个方程组可解。

这里, 杰文斯实际上是在劳动这一特殊资源上, 提出了资源优化配置的一般原则。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便是边际主义的主要成就。

杰文斯从上述均衡分配劳动的条件进一步推导出劳动在 x, y 的两种产品上的边际生产力的比率与 x, y 两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之间的关系:

$$(du_1/dx)/(du_2/dy) = (dy \cdot dl_2)/(dx \cdot dl_1)$$

由此又进一步推导出 x, y 两种产品的交换率、价格之比、边际效用之比、生产率之比、生产费用之比的关系:

$$\begin{aligned} \text{交换率} &= y/x \\ &= x \text{ 的价格} / y \text{ 的价格} \\ &= x \text{ 的边际效用} / y \text{ 的边际效用} \\ &= x \text{ 每单位的生产费} / y \text{ 每单位的生产费} \\ &= y \text{ 的生产力程度} / x \text{ 的生产力程度} \end{aligned}$$

他认为这是市场均衡的条件。

杰文斯的效用论、交换论和劳动论实际是作为一个整体, 考虑了完全竞争条件下, 市场均衡(或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但他并没有完全搞清实现均衡的机制。他只是认识到了这个机制的几个要点, 但并没有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对这个机制作出完整的描述。这表现在他时而用边际效用之比去决定交换率, 时而又承认交换率会影响两种货物的相对消费量(也就影响了边际效用之比)和相对产量, 但始终未能从交换率与边际效用之比的相互作用中看到趋向市场均衡的机制, 虽然他已看到交换率与两种产品的产量之比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把杰文斯的这部分理论与奥国学派^①作一番

^① 这里的奥国学派是指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三个人。

比较。杰文斯的市场均衡条件中,不仅有消费—效用一面,而且还有生产—费用一面;而奥国学派的市场均衡条件中只包含消费—效用一面。因此,杰文斯的市场均衡条件比奥国学派更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但另一方面,奥国学派对于市场均衡的形成机制有比较详尽的分析:从个人的边际效用推论出市场的供求,然后用供求的相互作用说明均衡价格的决定;而杰文斯则失足于混同孤立的两人间交换与无数人参加的交换,从个人的边际效用直接推导出均衡价格。这就使他比奥国学派更远离现代西方经济学。概括地说,在均衡条件的表述上,杰文斯胜过奥国学派;但对于实现均衡的机制的说明,他不如奥国学派。

五、分配理论

杰文斯关于分配的理论是比较简单的。他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土地、知识与资本,关于劳动的报酬——工资的决定,他只是明确地反对李嘉图的维生工资论和以后的古典学派的工资基金论,但并没有系统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是简单地认为工资等于生产物减去地租、赋税及利息后的剩余。关于土地的报酬——地租的决定,他只是用数学方式重新表述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关于资本,他定义为“维持各种有工作的劳动者所必要的诸种商品的总称”^①。他认为资本的功能“是使劳动者能够等候长久工作的结果”^②。这一论点与门格尔相近,是后来庞巴维克所提出的生产迂回性论点的发端。杰文斯认为资本的报酬是利率,而利率决定于资本边际生产力,并由此论证资本数量在技术不变条件下的不断增加,是利率下降的原因。

在工资与利率的相对关系上,他反对李嘉图的那种认为两者处于对立状态的论点,认为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是可以同向变化的。

杰文斯并没有建立起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系统的分配理论。这个工作是由以后美国经济学家 J. B. 克拉克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完成的。

六、杰文斯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地位

杰文斯是边际革命的三位奠基者中最早发表自己观点的人。同时也是观点最不严谨、最不成熟的人。所以在英国,他的影响很快被马歇尔的巨大声望所淹没。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①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68 页。

②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68 页。

1. 在英语世界里首先强调了数学对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在这方面,他不像瓦尔拉斯在法语世界里那样有古诺作为自己的先驱。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更为突出的。

2. 用微积分法清楚地表达了效用、边际效用概念以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用边际效用去解释价值。他虽然不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用数学方法清楚地说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人。

3. 在建立交换理论的过程中,他给出了消费者均衡的条件。为后人进一步分析消费行为奠定了基础。

4. 在劳动理论中,他提出了边际负效用概念,它是英语世界里后来分析劳动供给的基本概念。

5. 他的资本理论接近后来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先驱。

6. 从各方面来看,如果说马歇尔是使英国的主流经济学由古典经济学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帅的话,那么杰文斯便是这一转变的急先锋。

第二节 埃奇沃思及威克斯蒂德的经济理论

自19世纪70年代初,边际革命的三位奠基者发表他们的开山之作以后,整个70年代不再有边际主义的新著问世。直到1881年,英国的埃奇沃思发表《数学心理学》一书,以此为开端,整个80年代中,英国的威克斯蒂德、奥地利的维塞尔、庞巴维克、萨克斯三人,以及意大利的洋塔莱奥尼等人,相继发表专著,宣扬并发展边际主义经济学。由此形成持续到20世纪最初10年的边际主义广泛传播、迅速发展的浪潮。在1881年到1911年的这30年中,大多数最著名的边际主义者都已亮相,大部分最著名的边际主义专著也都问世。

本节主要介绍英国的埃奇沃思和威克斯蒂德在深化边际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一、埃奇沃思的经济思想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1845—1926年),出生于爱尔兰朗福德郡埃奇沃思镇。曾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逻辑学讲师,图克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1891—1922年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德拉

蒙德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研究员,1891—1926年《经济学杂志》编辑。与经济学有关的主要论著有:《数学心理学》(1881年),《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论文》3卷(1891—1921年)。

埃奇沃思早期钻研的是数学和逻辑学,研究如何应用数学于社会科学。以后据说受到了杰文斯等人的启发,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他的主要成果是在《数学心理学》一书中提出无差异曲线、契约曲线和交换经济的“核”。这些都成为后来边际分析的基本工具。此外,他以论文形式论述税收、垄断和货币价值等课题。

在《数学心理学》一书中,埃奇沃思对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作了重要修正。在杰文斯那里,对一个交易者来说,各种商品的效用是互相独立的;一种商品的效用只由它的数量决定,是该商品数量的一元函数,不受其他商品的数量影响。从而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也只是它数量的一元函数,而与其他商品的数量无关。而埃奇沃思则认为,各种商品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对交易者产生效用的,因此交易者的效用要由各种商品的数量来决定,是各种商品的拥有量的函数,可记为:

$$U = F(x_1, x_2, \dots, x_n)$$

U 为总效用, x_1, x_2, \dots, x_n , 分别为 n 种商品的数量。于是,一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便是总效用函数的一阶偏导数: $\partial U / \partial x_i (i=1, 2, \dots, n)$, 它不仅由该商品自身的数量所决定,还受到其他商品数量的影响。

以上述修正为基础,埃奇沃思分析了交换均衡。他沿袭杰文斯,假定 A 、 B 二人以 a 、 b 两种商品的 X 量和 Y 量进行交换,成交后 A 的总效用为 $U_A = F_A(x, y) = F_A(a-x, y)$, B 的总效用为 $U_B = F_B(x, y) = F_B(x, b-y)$, 交换均衡的条件是:

$$(\partial U_A / \partial x) / (\partial U_A / \partial y) = (\partial U_B / \partial x) / (\partial U_B / \partial y)$$

即 A 、 B 二人对两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相等。这其实就是杰文斯的著名的交换方程式的发展,区别在于,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现在改用偏导数来表示了。

埃奇沃思进一步认为,均衡时,进一步的交换不可能使 U_A 和 U_B 同时增加,只能以一方的牺牲为代价而使另一方的效用增加,而未达到均衡时,进一步的交换则可能使 U_A 和 U_B 同时增加。在用图形说明上述道理时,他提出了无差异曲线和契约曲线,从而为以后边际分析的发展,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工具,作出了重大贡献。具体地说,他对于帕累托在 25 年之后提出序数效用论起了重要作用。

二、威克斯蒂德的经济思想

菲利浦·亨利·威克斯蒂德(Philip Henry Wicksteed, 1844—1927), 生于英国利兹, 伦敦大学文学硕士, 1867—1897 年任牧师, 1887—1918 年任大学分校讲师。早年他爱好文学、哲学及史学。中年时, 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引起他对经济学的兴趣, 而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使他成为杰文斯的最早的主要追随者。他的主要贡献: 一是用非数学的方式阐明边际效用价值论, 二是说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协调。他的主要论著有:《经济学入门》(1888 年),《论分配法则的协调》(1894 年),《政治经济学常识》(1910 年)。

在《论分配法则的协调》一书中, 威克斯蒂德指出以往的分配理论往往为不同的要素建立不同的分配法则, 而且不考虑按不同法则进行的分配是否正好将产品分光这一问题。他为自己的分配理论规定了两项任务: 一是为各种要素建立一种统一的分配法则; 二是证明按此法则进行分配, 将正好将产品瓜分完毕, 既不多也不少。

威克斯蒂德认为, 统一的分配法则就是边际生产力论, 即每种要素在总产品中所得到的份额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数量的乘积。设产出 Q 的生产函数为 $Q = F(X_1, X_2, \dots, X_m)$, X 为某种要素的投入量, 则该要素的分配份额为 $(\partial Q / \partial X_i) X_i (i = 1, 2, \dots, m)$ 。

威克斯蒂德进一步认为, 只要满足下述前提条件, 则按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的结果将正好使产出在各要素之间分配完毕。这些前提条件为: (1) 生产函数是线性齐次的, 其经济意义是规模报酬不变; (2) 自由竞争; (3) 要素投入不是无限的; (4) 各要素可按其价值进行比较。在这些前提下, 下式成立:

$$Q = (\partial Q / \partial X_1) X_1 + (\partial Q / \partial X_2) X_2 + \dots + (\partial Q / \partial X_m) X_m$$

抽象掉该式的经济意义, 它就是欧拉定理^①。

虽然比 J. B. 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早发表 5 年的威克斯蒂德的分配理论不如前者的名气大, 但威克斯蒂德关于收入分配满足欧拉定理的前提条件的分析, 以及这个问题的提出, 都表现了他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贡献。

① 欧拉(Leonhard Euler, 1707—1783 年), 瑞士数学家。

第四章 法国、意大利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

第一节 瓦尔拉斯的经济理论

马利-埃斯普里·里昂·瓦尔拉斯(Marie-Espit Léon Walras, 1834—1910年),出生于法国埃夫勒。1851、1853年分别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士和理学士。曾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辑、铁路官员、创办生产合作银行和教学,但都未获成功,1858年在其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1801—1866年)的鼓励下开始研究经济学。1870—1892年任瑞士洛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退休后继续担任该院名誉教授。其主要论著有:《政治经济学和公正》(1860年)、《社会理想的研究》(1868年)、《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年,有中译本)、《复本位制数理经济学》(1881年)、《社会财富的数学理论》(1883年)、《社会经济学研究》(1896年)、《应用经济学研究》(1898年)。

一、经济学的目的与分类

任何一位在经济学说史上进行创新活动的经济学家,都首先在经济学的目的和对象方面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瓦尔拉斯也同样如此。他提出,为了认清经济学的目的和对象,首先需要区别科学、技术和伦理学,“它们各自的标准是真、效用(指的是物质福利)和善(指的是公道)”^[1]。科学的职能是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现象进行观察和解释,但并不对人类的行为进行指导,指导人类的行为是技术和伦理学的职能。而人类行为有一个基本的区分,一类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类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对第一类行为进行指导,而伦理学则指导第二类行为。

根据上述区分,瓦尔拉斯把经济学分为纯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三部分。纯粹经济学研究社会财富本身,应用经济学研究财富的生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6页。

产,社会经济学研究财富的分配。

瓦尔拉斯定义社会财富为有用但却稀缺的一切物质和劳务。有用和稀缺这两个性质造成了三个后果:(1)社会财富是可以占有的,无用的东西没人愿意占有,有用但无限的东西没有必要占有;(2)社会财富是可以交换从而具有交换价值的;(3)社会财富是可以经由生产而增加的,对占有活动和生产活动加以指导是社会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任务,对交换现象进行观察和解释是纯粹经济学的任务。因此,纯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财富的交换价值,其目的是说明交换价值的决定。

瓦尔拉斯认为,纯粹经济学需要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研究,他对自己所采用的数学方法作了如下说明:“从现实类型概念抽出经它下定义的理想类型概念,然后以这类定义为基础,在演绎推理下构成其定理和证明的整个体系。然后它又回到经验,但不是借此证实它的结论而是要应用它的结论。”¹⁾通过数学推理得到的并不是对现实逼真的写照,而只是对现实的近似描绘。他反对某些并不懂得数学的经济学家对于数学方法的责难,坚信他们“决不能阻止在自由竞争下确定价格的理论成为一个数学理论”²⁾。

瓦尔拉斯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说明交换价值的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由从简到繁的几个部分所组成。这几个部分都以下述几个假设为前提:

1. 关于市场结构的假设。他假定交换总是在完全竞争的拍卖市场中进行,该市场中不存在任何摩擦,并有着最完善的组织。这意味着交易总是在均衡价格下才实际进行,而在未达到均衡时,交易各方并不实行真实的交换,只是表达各自的供求意愿,按瓦尔拉斯的说法,便是显示出表明供求数量的“票证”。

2. 关于经济人行为的假设。他假定经济人总是追求其目标值的最大化。

3. 关于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性状的假设。他假设个人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或供给是价格的非连续函数,但整个社会对于某种商品的需求或供给(由所有个人的需求或供给加总而成),由于大数定律,是价格的连续函数。这一假设在他那儿,是运用数学方法分析交换价值的决定所必不可少的。除了上述三个共同的假设前提之外,一般均衡理论的各组成部分还有各自特殊的假设前提。随着理论由简到繁地展开,这些特殊假设逐步逼近现实,但共同的假设则始终未变。

1.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7页。

2.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6页。

二、两种商品相互交换时的均衡

瓦尔拉斯从只有两种商品这种最简单的情况开始,他假定这两种商品(A和B)的总量是既定的,并假定交易者追求的目标是满足或效用的最大化。这两个特殊假定意味着把生产活动抽象掉了。

当两种商品(A和B)相交换时,在A商品的有效供给(O_a)、有效需求(D_a)、以B计的A的价格(P_a)、和B商品的有效供给(O_b)、有效需求(D_b)、以A计的B的价格(P_b)之间,存在下述恒等式:

$$\begin{aligned} O_a &= D_b P_b & D_a &= O_b P_b \\ O_b &= D_a P_a & D_b &= O_a P_a \\ P_a P_b &= 1 \end{aligned}$$

同时,有效需求是价格的函数:

$$D_a = F_a(P_a) \quad D_b = F_b(P_b) \quad (2-1)$$

由上述恒等式和(2-1)中两式,有效供给也可表示为价格的函数:

$$\begin{aligned} O_a &= D_b P_b = F_b(P_b) P_b = F_b(1/P_a)(1/P_a) \\ O_b &= D_a P_a = F_a(P_a) P_a = F_a(1/P_b)(1/P_b) \end{aligned} \quad (2-2)$$

当两种商品供求均衡时,有:

$$\begin{aligned} F_a(P_a) &= F_b(1/P_a)(1/P_a) \\ F_b(P_b) &= F_a(1/P_b)(1/P_b) \end{aligned} \quad (2-3)$$

(2-3)是由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P_a, P_b)组成的联立方程组,由之可解出均衡价格 P_a 和 P_b 。

由(2-2)可知,供给可表示为需求函数与价格之积,由(2-3)可知,均衡价格取决于需求函数 F_a 和 F_b 。因此瓦尔拉斯认为均衡价格取决于决定需求函数的因素,于是他便进一步分析这一因素。

瓦尔拉斯假定交易者对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他称之为稀少性)是递减的连续函数。在此假设下,他认为个人需求函数是交易者追求满足最大化行为的结果,交易者以一种商品换取另一种商品时,满足最大化的条件是它们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既定的价格之比。设交易者以商品B换商品A, d_a 为对A的需求量, $\Phi_a(d_a)$ 为边际效用函数, P_a 为以B计的A的价格, B的价格为1, q_b 为交易者初始拥有的B数量, $Q_b(-d_a P_a)$ 为B的供给量, $\Phi_b(q_b - d_a P_a)$ 为保留的B的边际效用函数,则该交易者实现满足最大化的条件为:

$$\Phi_a(d_a) - P_a \Phi_b(q_b - d_a P_a) = 0 \quad (2-4)$$

若交易者初始拥有的不仅有 q_b 量的B,且有 q_a 量的A,并且他希望以一定量的B换取一定量的A,则上述条件变形为:

$$\Phi_a(q_a, d_a) - P_a \Phi_b(q_b, d_b, P_a) = 0 \quad (2-4')$$

上两式都是关于需求 d_a 与价格 P_a 的隐函数,可推出需求关于价格的显函数,并以初始拥有量为参变量。各交易者的个人需求函数加总之后,合成整个市场的需求函数。

由以上分析,瓦尔拉斯认为,是全体交易者各自的边际效用函数和初始拥有量,决定了两种商品的市场需求函数。从而决定两种商品的均衡价格。同时,均衡时两种商品的价格之比也一定等于任一交易者拥有的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否则便不可能是均衡状态。由此,他得出三点结论:

1. 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两种商品在任何一对交易者之间都必定按完全相同的比率成交,即只有一种价格,故一切交易者都能在均衡时获取满足的最大化,即交换均衡具有最优性。

2. 交换价值与边际效用成正比,边际效用是交换价值的起因。

3. 其他情况不变时,一种产品的均衡价格将由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交易者对该产品的边际效用函数的提高(减少)而提高(减少),或由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交易者对该产品的初始拥有量的增加(减少)而减少(增加),除非这两种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互相抵消。

三、多种商品相交换时的均衡

在分析多种商品交换时,瓦尔拉斯假定:各种商品的总量既定,交易者追求满足或效用最大化。为了便于分析,他首先假定每个交易者只拥有一种初始商品,尔后再考虑交易者可以拥有一种或一种以上初始商品这种更一般的情形。他还指出,在多种商品相交换时,会有两种交换均衡,第一种均衡出现在下述情况中:假定每种商品与其他各商品交换是分别进行的,不允许套购活动的存在;第二种均衡是允许套购活动存在时的均衡。

瓦尔拉斯设立了下述符号: $D_{a,b}$ 为以 B 换取 A 时对 A 的有效需求, $D_{a,c}$ 为以 C 商品换取 A 时对 A 的有效需求,…… $P_{a,b}$ 为以 B 计的 A 的价格。 $P_{a,c}$ 为以 C 计的 A 的价格。……

在每个交易者只拥有一种初始商品,且不允许套购活动的条件下, m 种商品会有 $m(m-1)$ 种有效需求函数:

$$\begin{aligned} D_{b,a} &= F_{b,a}(P_{b,a}, P_{c,a}, P_{d,a}, \dots) \\ D_{c,a} &= F_{c,a}(P_{b,a}, P_{c,a}, P_{d,a}, \dots) \\ D_{d,a} &= F_{d,a}(P_{b,a}, P_{c,a}, P_{d,a}, \dots) \\ &\dots\dots \\ D_{a,b} &= F_{a,b}(P_{a,b}, P_{c,b}, P_{d,b}, \dots) \end{aligned}$$

$$D_{c,b} = F_{c,b}(P_{a,b}, P_{c,b}, P_{d,b}, \dots)$$

$$D_{a,b} = F_{d,b}(P_{a,b}, P_{c,b}, P_{d,b}, \dots)$$

.....

同时还有 $m(m-1)$ 个交换恒等式:

$$D_{a,b} = D_{b,a}P_{b,a}; D_{a,c} = D_{c,a}P_{c,a}; D_{a,d} = D_{d,a}P_{d,a} \dots$$

$$D_{b,a} = D_{a,b}P_{a,b}; D_{b,c} = D_{c,b}P_{c,b}; D_{b,d} = D_{d,b}P_{d,b} \dots$$

.....

共计有 $2m(m-1)$ 个方程, 这些方程共计有 $2m(m-1)$ 个未知变量, 其中有 $m(m-1)$ 个价格, $m(m-1)$ 个交易量。因此可以解出均衡的价格和均衡时的供求量。

但若允许套购活动的存在, 则一般均衡的实现便还要增加一个条件, m 种商品中任何一对商品, 其中的一种以另一种计的价格, 必须等于它们各自以任一第三种商品计的价格的比率。否则便会因套购活动的存在而破坏一般均衡。这一条件可表示为由 $(m-1)(m-1)$ 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 被称为全面平衡方程组:

$$P_{a,d} = 1/P_{b,a}; P_{c,b} = P_{c,a}/P_{b,a}; P_{d,b} = P_{d,a}/P_{b,a} \dots$$

$$P_{a,c} = 1/P_{c,a}; P_{b,a} = P_{b,c}/P_{c,a}; P_{d,a} = P_{d,c}/P_{c,a} \dots$$

$$P_{a,d} = 1/P_{d,a}; P_{b,d} = P_{b,c}/P_{d,c}; P_{c,d} = P_{c,a}/P_{d,a} \dots$$

.....

出现全面平衡方程组之后, 与 $m(m-1)$ 个有效需求方程和 $m(m-1)$ 个交换恒等式一起, 共有 $2m(m-1) + (m-1)^2$ 个方程, 但未知数只有 $2m(m-1)$ 个。因此必须设法减少方程数。减少的方法是首先由 $m(m-1)$ 个交换恒等式列出 m 个供求平衡方程:

$$D_{a,b} + D_{a,c} + D_{a,d} + \dots = D_{b,a}P_{b,a} + D_{c,a}P_{c,a} + D_{d,a}P_{d,a} + \dots$$

$$D_{b,a} + D_{b,c} + D_{b,d} + \dots = D_{a,b}P_{a,b} + D_{c,b}P_{c,b} + D_{d,b}P_{d,b} + \dots$$

$$D_{c,a} + D_{c,b} + D_{c,d} + \dots = D_{a,c}P_{a,c} + D_{b,c}P_{b,c} + D_{d,c}P_{d,c} + \dots$$

$$D_{d,a} + D_{d,b} + D_{d,c} + \dots = D_{a,d}P_{a,d} + D_{b,d}P_{b,d} + D_{c,d}P_{c,d} + \dots$$

然后将全面平衡方程组得出的价格记入, 并以 A 商品为通货, 即其价格为 1, 并以 P_b, P_c, P_d, \dots 表示以 A 计的 B、C、D 的价格, 则上述供求平衡方程组变形为:

$$D_{a,b} + D_{a,c} + D_{a,d} + \dots = D_{b,a}P_b + D_{c,a}P_c + D_{d,a}P_d + \dots$$

$$D_{b,a} + D_{b,c} + D_{b,d} + \dots = D_{a,b}(1/P_b) + D_{c,b}(P_c/P_b) + D_{d,b}(P_d/P_b) + \dots$$

$$D_{c,a} + D_{c,b} + D_{c,d} + \dots = D_{a,c}(1/P_c) + D_{b,c}(P_b/P_c) + D_{d,c}(P_d/P_c) + \dots$$

$$D_{d,a} + D_{d,b} + D_{d,c} + \dots = D_{a,d}(1/P_d) + D_{b,d}(P_b/P_d) + D_{c,d}(P_c/P_d) + \dots$$

最后,在上边第二个方程两边乘上 P_i ,第三个方程两端乘上 P_i ;第四个方程两端乘上 P_i ,……然后将它们相加,便可得到第一个方程。因此可知,第一个方程是非独立的,是其他方程的线性组合,故可以略去。于是便剩下 $m-1$ 个供求恒等式,加上 $m(m-1)$ 个有效需求方程, $(m-1)^2$ 个全面平衡方程。共有 $2m(m-1)$ 个方程,正好用于求解 $2m(m-1)$ 个未知数(其中一半是价格,另一半是均衡的供求量)。

在假定交易者初始拥有的商品不止一种,且允许套购的条件下,若把供给定义为负需求,并以第一种商品作为货币。则在一般均衡时,所有商品的市场需求函数必定同时等于零。即:

$$F_b(P_b, P_i, P_d, \dots) = 0$$

$$F_i(P_b, P_i, P_d, \dots) = 0$$

$$F_d(P_b, P_i, P_d, \dots) = 0$$

……

且作为货币的那种商品的供给对应于对其他商品的需求,货币商品的需求对应于对其他商品的供给。因此对货币商品的市场需求函数,可以看作是其他所有商品的市场需求函数的线性组合,并且在均衡时,它也同样为零。即:

$$F_b(P_b, P_i, P_d, \dots) = P_b F_b(P_b, P_i, P_d, \dots) + P_i F_i(P_b, P_i, P_d, \dots) \\ + P_d F_d(P_b, P_i, P_d, \dots) + \dots = 0$$

于是,有 $m-1$ 个互相独立的非货币商品的市场需求函数,它们在均衡时同时为 0,构成 $m-1$ 个独立方程,正好用于求解 $m-1$ 个非货币商品的以货币商品计的均衡价格,并且在此套价格中,已不存在进行套购的机会。

瓦尔拉斯认为,多种商品交换时的有效需求函数,无论在每个交易者初始只拥有一种商品的特殊情况下,还是在初始便拥有多种商品的一般情景下,都是交易者追求满足最大化行为的结果。与只有两种商品相交换时的情况相比,现在满足最大化的条件变为任何一对商品对交易者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它们各自以某种作为货币的商品计的价格的比率。或者说,不作为货币的商品与作为货币的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不作为货币的商品的价格(以作为货币的商品计)。

根据对需求函数成因的上述看法,瓦尔拉斯认为在多种商品的交换均衡状态中,任何一对商品以货币计的价格比率也必定等于任何一位交易者对这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否则便不可能是均衡状态。因此,均衡状态同时也是交换的最优状态。

瓦尔拉斯指出,在实际的市场中,均衡价格并不是通过求解上述联立方

程组得到的、而是通过他所说的摸索过程,通过价格的上下波动而逼近的。具体地讲,就是每个交易者都根据一定的价格体系(不一定是均衡的),按照满足最大化的目标,来决定自己对各种商品的供求意愿,由此形成的所有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又反过来影响价格体系,某种商品供大于求,其价格下跌;供小于求,价格上升。新形成的价格体系又改变每个交易者原先的供求意愿,形成新的市场供求状况,这种反复的调整过程终将达到所有商品供求相等的地步,此时的价格便等于用联立方程解出的均衡价格。

为了保证摸索过程必然趋向均衡。瓦尔拉斯还分析了均衡的稳定性问题。稳定的条件有两条:首先是任何一种商品的需求必须随价格上升而下降,而供给则随价格上升而起初上升而后下降,且需求曲线必须在某一正数价格上与上升阶段的供给曲线相交。第二个条件是,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在趋于均衡时,对该商品造成的,促使其趋向均衡和背离均衡的影响,大都相互抵消,且剩余的纯影响将不能抵消该商品本身价格变动所造成的趋于均衡的主要趋势。只要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则摸索过程必然趋向全面均衡。例如初始的一套以 A 计的价格(P_1', P_2', P_3', \dots)不能实现均衡,但在其他价格不变时,总能有一 B 的价格(P_1'')能保证商品 B 的均衡。于是得到第二套价格(P_1'', P_2', P_3', \dots)。在这第二套价格下,其他价格不变,适当变动 P_1' , 便能实现商品 C 的均衡,于是得到第三套价格($P_1'', P_2'', P_3', \dots$)。以此类推,在第 m 套价格($P_1'', P_2'', P_3'', \dots$)下,第 m 种商品将实现均衡,并且在此套价格下, B 商品的供求虽不一定均衡,但其差距将比在第一套价格时小,只要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这意味着通过逐个商品的摸索,将向全面均衡逼近。

瓦尔拉斯总结了多种商品相交换时平衡价格的确定定律:“假定有多种商品,以金钱为媒介,互相进行交换;要使市场处于平衡状态,也就是,要使每一种商品以通货计的价格稳定,则必需的和充分的条件是,在这类价格下,每种商品的有效需求应等于其有效供给。如果不存在这一均等,要获得平衡价格,就得使有效需求大于其有效供给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上升,使有效供给大于其有效需求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下降。”¹ 同时他还总结了均衡价格变动规律,在其他情况一定时,某种非货币商品以货币商品计的均衡价格,将由于一个或几个交易者对该商品边际效用函数的提高(降低)而提高(降低),或由于一个或几个交易者对该商品的初始拥有量的增加(减少)而减少(增加),除非这两种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互相抵消。

¹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7—168页。

对于多种商品交换,瓦尔拉斯还提出并证明了商品持有量等值再分配定理:“假定在处于全面平衡状态的一个市场中有多种商品,只要各个参与交换者保有量的总和的价值不变,不管这些商品的各个数量的所有权在各个参与者之中有了什么样的再分配,这些商品的现期价格仍然不变。”^①该定理是说,尽管一定总量的商品在各交易者之间发生了实物意义上的再分配,但只要各种商品再分配的结果不改变各交易者初始拥有的各种商品的价值(按再分配以前的均衡价格计)总和,则均衡价格将保持不变。这一定理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引起均衡价格变化的第三个因素:价值意义上的财富的再分配。尽管整个社会实物财富的总量不变,但只要财富的总价值(按初始的均衡价格计)在各交易者之间的分配有了变化,则均衡价格也将变化。

四、考虑生产时的均衡

在分析了多种商品的交换均衡之后,瓦尔拉斯放弃了商品总量不变的假定,认为各类商品的数量将由于生产活动而变化。但他对生产活动的技术特征作了三条重要的假定:生产活动是不消耗时间的,生产系数(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生产要素的服务量)既定,资本品(固定资本)数量既定。

为了分析生产活动,瓦尔拉斯首先给出了他的关于资本和收入的定义。他定义资本为一切耐用品,不论它是用于生产的厂房机器或是用于消费的住宅家具。他定义收入为一切非耐用品,包括用于生产的种子、织物,亦包括用于消费的面包或肉。资本的本质在于能生产收入,收入的本质在于能直接或间接地构成资本。他把使用资本所取得的收入称作服务。他把服务分作两大类:消费服务和生产服务。前者包括房屋的居住,家具及衣物的使用,医生的会诊等等。后者包括土地肥力,工人的劳动及机器的使用。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瓦尔拉斯把整个社会财富分成四大类,前三类属于资本,第四类属于收入。第一类是土地资本或一切种类的土地,它产生土地服务或土地收入。第二类是人力资本或个人,它产生人力服务(即劳动)或个人收入。第三类是土地和人力之外的一切其他资本品,简称为狭义资本,它产生资本或资本收入。第四类是非耐用的消费品及生产原料。

根据上述消费服务与生产服务之间的区别,瓦尔拉斯进一步将社会财富(包括资本和收入)和货币分为13类。

关于资本的种类是:

(1)、(2)和(3):产生消费服务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和狭义资本品。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3—184页。

(4)、(5)和(6):产生生产服务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和狭义资本品。

(7):暂时不提供任何服务从而不产生收入的,作为产品存货的新狭义资本品。

(8):消费者家里的非耐用消费品的存货。

(9):生产者的原料存货。

(10):作为生产者产品存货的新消费品和新原料。

关于货币的类目是:

(11)、(12)和(13):消费者手持现金、生产者手持现金和货币储蓄。

他认为货币具有特殊身份:对社会而言,它是资本,但对个人而言是收入。

瓦尔拉斯认为生产活动就是土地资本、人力资本和狭义资本品三者结合在一起共同提供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的结果是产品。他把社会上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分为两大类: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人(提供劳动的工人、提供土地服务的地主及提供狭义资本品服务的资本家),需要各类生产性服务来生产商品的企业家。而整个社会存在两大类市场:一是服务市场,工人、地主和资本家是卖主,企业家是买主,该市场形成三种服务的价格:工资、地租和利息。二是产品市场,企业家是卖主,而工人、地主和资本家则成为买主,该市场形成各种产品的价格。他假定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作为生产产品的买主,追求的是满足最大化,作为服务的卖主,追求收入最大化,而企业家则追求利润最大化。于是服务的供给和产品的需求都是服务价格和产品价格

的函数。令 O_t, O_p, O_k, \dots 代表 n 种关于土地、劳动和资本品的服务, D_a, D_b, D_c, \dots 代表 m 种产品的需求, $a_t, a_p, a_k, \dots; b_t, b_p, b_k, \dots; c_t, c_p, c_k, \dots; d_t, d_p, d_k, \dots$ 代表产品 A, B, C, D 关于投入 t, p, k 的生产系数,共有 nm 个。 $P_t, P_p, P_k, \dots; P_b, P_c, P_d, \dots$ 代表 n 种服务和 $m-1$ 种产品价格,并令 A 商品为货币。

现在,均衡状况可以由下述四套方程给出,首先是关于服务的 n 个供给方程:

$$O_t = F_t(P_t, P_p, P_k, \dots, P_b, P_c, P_d, \dots)$$

$$O_p = F_p(P_t, P_p, P_k, \dots, P_b, P_c, P_d, \dots)$$

$$O_k = F_k(P_t, P_p, P_k, \dots, P_b, P_c, P_d, \dots)$$

.....

关于产品的 m 个需求方程:

$$D_a = F_a(P_t, P_p, P_k, \dots, P_b, P_c, P_d, \dots)$$

$$D = F_i(P_s, P_p, P_k, \dots, P_b, P_c, P_d, \dots)$$

$$D_i = F_d(P_s, P_p, P_k, \dots, P_b, P_c, P_d, \dots)$$

.....

$$D_s = O_s P_s + O_p P_p + O_k P_k + \dots = (D_b P_b + D_c P_c + D_d P_d + \dots)$$

关于生产的 m 个方程:

$$a_i D_a + b_i D_b + c_i D_c + d_i D_d + \dots = O_i$$

$$a_j D_a + b_j D_b + c_j D_c + d_j D_d + \dots = O_j$$

$$a_k D_a + b_k D_b + c_k D_c + d_k D_d + \dots = O_k$$

.....

它表明各种产品生产中所耗费的“生产服务量”等于其有效供给量。

关于产品价格的 m 个方程:

$$a_i P_i + a_p P_p + a_k P_k + \dots = 1$$

$$b_i P_i + b_p P_p + b_k P_k + \dots = P_i$$

$$c_i P_i + c_p P_p + c_k P_k + \dots = P$$

$$d_i P_i + d_p P_p + d_k P_k + \dots = P_i$$

.....

它表明产品价格等于产品生产过程中所用的生产服务的费用,或产品价格等于生产成本。

若生产不是通过直接消耗生产服务,而是通过消耗中间产品来进行的,可以通过一定步骤把对中间产品的消耗折算为对生产服务的消耗,则上述四套方程组仍然成立。只是生产系数不再反映产品对服务的直接消耗,而是反映产品通过中间产品对服务的间接消耗。

上述四套方程组暗含着两个重要的被后人所明确指出的假定。首先是服务的供给函数及产品的需求函数都是零次齐次的,其经济意义是说,当所有价格(包括服务和产品)都变动相同倍数时,服务的供给和产品的需求将保持原来水平。这意味着可以在所有价格上乘以某种产品(比如说产品 A) 的价格的倒数 $1/P_A$, 结果 A 的价格变为 1, 不再是未知变量, 而其他价格都是以 A 计的相对价格。于是四套方程组的未知变量可减少一个, 为 $2m + 2n - 1$ (服务供给的 n 个总量, n 个价格, 产品需求的 m 个总量, $m - 1$ 个价格)。

第二个重要的暗含假定就是后人所说的瓦尔拉斯法则, 即所有人购买所有产品的总支出恒等于他们出售服务的总收入。该法则由上述第二套方程组中的最后一个方程表示。它可以通过其他方程推出。推出的方法是将第三套方程的两端分别乘以 P_i, P_b, P_k, \dots , 然后将这些方程全部相加; 将第四套方程两端分别乘以 $D_i, D_b, D_c, D_d, \dots$, 然后将这些方程也全部相加; 如

此得到两个方程,它们的左端完全一样,因此其右端也相等,这就得到第二套方程组中的最后一个方程,即瓦尔拉斯法则。因此该方程是非独立的,可以从整个体系中略去,于是四套方程组共有 $2m+2n-1$ 个独立方程,正好用于求解相同数量的未知变量。

由上述四套方程式,瓦尔拉斯强调指出,生产均衡与交换均衡是同时实现的,实现交换均衡的条件是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同时实现供求均衡,实现生产均衡的条件是所有产品的售价等于其成本。只要生产和交换有一个均衡尚未实现,另一个均衡也就建立不起来。

瓦尔拉斯并不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均衡值是通过求解上述四套联立方程组得到的,而认为是通过摸索过程逼近的。他分析了存在生产活动时的这一摸索过程。他首先假定服务的价格不变,以便集中分析达到生产均衡和产品市场均衡的摸索过程。假定企业家们先随便决定一套产量,为使该套产量正好相等于需求,就需要一套特定的价格,这套价格一方面要排除套购机会,另一方面要与产品市场上任一买者所购买的产品的边际效用之比成同一比例。因此这套价格便是既定产量下实现产品市场均衡的那套价格。达到这套价格的摸索过程在前一节分析多种产品的交换均衡时已经介绍,不再赘述。若这套价格正好等于生产成本,则生产均衡和产品市场均衡同时实现。但这套价格很可能与生产成本不一致,从而使企业家们有的获得利润有的出现亏损。于是企业家们增产有利产品,减产亏损产品,由此形成一套新的产量。这套产量又会导致一套新的使产品市场均衡的产品价格。这套价格若仍不等于生产成本,则上述调节过程将重复开始。

瓦尔拉斯认为,在上述摸索过程中,要使每套新的产品市场均衡价格都比原先那一套更逼近生产成本,即生产均衡要具有稳定性,需要两个条件:(1)一种商品产量的变动,总归使其价格与成本相接近。(2)其他各种商品产量变动,有的使该商品价格与成本相接近,有的使它们相分离,但这两种影响大都相抵消,且剩余的纯影响不能抵消该商品产量变动造成的价格与成本相接近的趋势。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则摸索过程将导致产品市场均衡和生产均衡同时出现。

然后,瓦尔拉斯放弃了服务价格不变的假设前提,开始分析使服务市场趋向均衡的摸索过程。分析中假定货币商品的产量不变。他认为某种服务的供给是其价格的增函数,而它的需求是由产品需求派生而来,与产品需求同向变化。产品需求是产品价格的减函数,产品价格又是服务价格(成本因素)的增函数,因此某种服务的需求是其价格的减函数。随着服务价格的变化,供给同向变化,需求反向变化,这就提供了趋向服务市场均衡的首要条

件,除非在服务价格上升过程中,供给还为零时,需求已降至零以下。趋向均衡的次要条件是其他各种服务的价格变动对该服务的供求均衡的趋势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大多相互抵消,且剩余的纯影响不能抵消该服务自身价格变动所导致的趋向供求均衡的趋势。只要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则均衡便具备了稳定性,摸索过程将趋向服务市场的均衡。由于任何一套服务价格都能导致产品市场和生产的同时均衡,所以当服务市场达到均衡时,也必然会出现与服务市场的一套均衡价格相适应的产品市场均衡和生产均衡。

最后,瓦尔拉斯放弃货币商品产量不变的假定,分析了货币商品的价格与成本趋于一致的摸索过程,这里不再细述。

通过对上述摸索过程的分析,瓦尔拉斯提出了服务和产品的均衡价格的确定定律:“假定能够用以制成各种产品的有多种服务,并且假定这些服务是以通货为媒介来交换其产品的,那么,要使市场处于平衡状态……其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是(1)在这样的价格下,各种服务和各种产品的有效需求相等于其有效供给;(2)产品的售价相等于制造这类产品时所使用的服务的成本。如果这两种均等并不存在,那么,为了要实现第一种均等,就得提高有效需求大于有效供给的那些服务或产品的价格,降低有效供给大于有效需求的那些服务或产品的价格;为了要实现第二种均等,就得增加售价大于生产成本的那些产品的产量,减少生产成本大于售价的那些产品的产量。”^①

瓦尔拉斯还指出,由自由竞争所达到的这种生产与交换同时均衡的状态,也就是各经济主体的满足或效用最大化的状态。

瓦尔拉斯还提出了服务和产品的价格的变动规律。在其他情况一定时,某种服务或非货币商品的以货币商品计的均衡价格,将由于一个或几个交易者对该服务或商品边际效用函数的提高(降低)而提高(降低);或由于一个或几个交易者对该服务或商品的初始拥有量的增加(减少)而降低(提高)。除非这两种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互相抵消。若其他情形不变,而一个或几个交易者拥有的某种服务的初始量增加(减少),则在生产中使用这种服务的那些产品的价格将降低(提高);若其他情形不变,而一个或几个交易者对某种产品的边际效用函数提高(降低),则这一产品生产中所用的服务的价格将提高(降低)。

五、资本形成条件下的均衡

在上一节的分析中,瓦尔拉斯假定资本品数量既定,现在他在保留上-

^①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63-264页。

节的其他假定前提下放弃了这一假定,认为各类资本品的数量是在某一特定的产品市场——资本品市场中决定的,该市场中的大多数买主,购买资本品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该资本品所能提供的服务。于是从需求一方来讲,资本品的价格便取决于其服务的价格,即其收入,同时还与其折旧情况及保险费有关。可用下式给出:

$$P = p / (i + u + v)$$

P 为资本品价格, p 为其服务的价格,即其总收入, u 为其折旧率, v 为其保险费与其价格 P 之比, i 为其净收入率,等于 $[p - (u + v)P] / P$, 该式分子为净收入。

瓦尔拉斯认为,与整个社会新资本品形成相对应的是: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三部分人作为整体,其消费低于其收入,即存在储蓄行为,他把储蓄看作是一种能产生永久净收入的商品(E),其价格(P_e)被定义为以货币商品计的净收入率 i 的倒数,即 $P_e = 1/i$,其需求(D_e)亦同样以货币商品计算。

瓦尔拉斯在分析中先暂时略去存货资本(包括产品存货和原料存货),集中考虑固定资本的形成问题。现在,整个体系共有 8 套方程:

(一)关于服务的 n 个供给方程:

$$\begin{aligned} O_i &= F_i(p_i \cdots p_p \cdots p_k, p_k, p_k \cdots p_b, p_i, p_d \cdots p_e) \\ &\cdots \cdots \\ O_p &= F_p(p_i \cdots p_p \cdots p_k, p_k, p_k \cdots p_b, p_i, p_d \cdots p_e) \\ &\cdots \cdots \\ O_k &= F_k(p_i \cdots p_p \cdots p_k, p_k, p_k \cdots p_b, p_i, p_d \cdots p_e) \\ &\cdots \cdots \\ O_{k'} &= F_{k'}(p_i \cdots p_p \cdots p_k, p_k, p_k \cdots p_b, p_i, p_d \cdots p_e) \\ &\cdots \cdots \end{aligned}$$

式中脚码 k, k', k'', \dots 分别代表各种资本品。

(二)关于产品的 m 个需求方程:

$$\begin{aligned} D_b &= F_b(p_i \cdots p_p \cdots p_k, p_k, p_k \cdots p_b, p_i, p_d \cdots p_e) \\ D_c &= F_c(p_i \cdots p_p \cdots p_k, p_k, p_k \cdots p_b, p_i, p_d \cdots p_e) \\ D_d &= F_d(p_i \cdots p_p \cdots p_k, p_k, p_k \cdots p_b, p_i, p_d \cdots p_e) \\ &\cdots \cdots \\ D_e &= O_i p_i + O_p p_p + \cdots O_k p_k + O_{k'} p_{k'} - O_{k''} p_{k''} + \cdots \\ &\quad - (D_b p_b + D_c p_c + D_d p_d + \cdots + E) \end{aligned}$$

(三)关于储蓄的一个需求方程:

$$E - D_e p_e = F_e(p_i \cdots p_p \cdots p_k, p_k, p_k \cdots p_b, p_i, p_d \cdots p_e) p_e$$

$$=F_e(p_i, \dots, p_p, \dots, p_k, p_k', p_k'', \dots, p_b, p_c, p_d, \dots, 1)$$

(四)关于生产性服务的使用与供给的 n 个等式:

$$a_i D_a + b_i D_b + c_i D_c + d_i D_d + \dots + k_i D_k + k_i' D_k' + k_i'' D_k'' + \dots = O_i$$

.....

$$a_p D_a + b_p D_b + c_p D_c + d_p D_d + \dots + k_p D_k + k_p' D_k' + k_p'' D_k'' + \dots = O_p$$

.....

$$a_k D_a + b_k D_b + c_k D_c + d_k D_d + \dots + k_k D_k + k_k' D_k' + k_k'' D_k'' + \dots = O_k$$

.....

$$a_k D_a + b_k D_b + c_k D_c + d_k D_d + \dots + k_k D_k + k_k' D_k' + k_k'' D_k'' + \dots = O_k$$

.....

式中 $k_i, k_i', k_i'', \dots, k_p, k_p', k_p'', \dots, k_k, k_k', k_k'', \dots, k_k, k_k', k_k'', \dots, k_k, k_k', k_k'', \dots$, 分别为生产资本品 $k, k', k'' \dots$ 时对土地、劳动、资本品的服务的生产系数。

(五)关于消费品售价与其生产成本之间的 m 个等式:

$$a_i p_i + \dots + a_p p_p + \dots + a_k p_k + a_k' p_k' + a_k'' p_k'' + \dots = 1$$

$$b_i p_i + \dots + b_p p_p + \dots + b_k p_k + b_k' p_k' + b_k'' p_k'' + \dots = p_b$$

$$c_i p_i + \dots + c_p p_p + \dots + c_k p_k + c_k' p_k' + c_k'' p_k'' + \dots = p_c$$

.....

(六)关于新资本品售价与其生产成本间的 l 个等式:

$$k_i p_i + \dots + k_p p_p + \dots + k_k p_k + k_k' p_k' + k_k'' p_k'' + \dots = P_k'$$

$$k_i' p_i + \dots + k_p' p_p + \dots + k_k' p_k + k_k' p_k' + k_k' p_k'' + \dots = P_k'$$

$$k_i'' p_i + \dots + k_p'' p_p + \dots + k_k'' p_k + k_k'' p_k' + k_k'' p_k'' + \dots = P_k''$$

.....

(七)关于新资本与储蓄在价值上的一个均等式:

$$D_k P_k + D_k' P_k' + D_k'' P_k'' + \dots = E$$

(八)关于新资本品需求价格的 l 个方程:

$$P_k = p_k / (i + u_k + v_k)$$

$$P_k' = p_k' / (i + u_k + v_k')$$

$$P_k'' = p_k'' / (i + u_k + v_k'')$$

.....

这 l 方程还表示了对所有的新资本品来说,它们的净收入率是相等的。

这 8 套方程组共有 $2n + 2m + 2l + 2$ 个方程,但可以缩成为 $2n + 2m + 2l + 1$ 个方程,方法是以 $P_i, \dots, P_p, \dots, P_k, P_k', P_k'' \dots$ 分别相继乘以第四套方程的 n 个方程,然后全部方程相加;再以 $D_a, D_b, D_c, D_d \dots D_k, D_k', D_k'' \dots$ 分别相继乘

以第五、六套方程的 $m+1$ 个方程。然后 $m-1$ 个方程相加；由此可得两个方程，其左端完全相同，故它们的右端相等，即：

$$\begin{aligned} & O_i P_i + \dots + O_p P_p + \dots + O_k P_k + O_k P_k - O_k P_k + \dots \\ & = D_a + D_b P_b + D_c P_c + D_d P_d + \dots + D_k P_k + D_k P_k + D_k P_k + \dots \end{aligned}$$

该方程的左端与第二套方程中第 m 个方程左端的正值部分完全相同，故由它们可推出：

$$D_k P_k + D_k P_k - D_k P_k - \dots = E$$

这正是第七套方程组中唯一的那个方程，由此可知该方程是非独立的，是可消去的。这 8 套方程组的 $2n+2m+2l+1$ 个独立方程，正好可用于求解 $2n+2m-2l+1$ 个未知量： n 种服务的供给， n 种服务的价格， m 个产品的需求，以货币商品计的 $m-1$ 种产品的价格，储蓄价值量，新资本品的 l 个产量， l 个价格，净收入率或储蓄的价格。

当然，这些变量的均衡值在实际中并非是通过求解上述 8 套联立方程组获得的，而是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通过摸索过程逼近的。瓦尔拉斯分析了这个摸索过程。他首先假定随机决定了净收入率和 l 种新资本品产量。由上一节所分析的摸索过程可以知道，在 l 种资本品随机决定的产量为常数的条件下，通过初步的摸索过程，可以得出 $m-1$ 种非货币消费品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 n 种服务的均衡价格和相应的供求量。而由 $m-1$ 种消费品和 n 种服务的价格，可推出储蓄量。以及 l 种新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但如此决定的储蓄量未必相等于 l 种新资本品的需求价格及随机决定的产量所共同决定的新资本品的总价值（即投资），并且 l 种新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也未必等于它们的需求价格，即可能出现下述关系式：

$$D_k' P_k' + D_k' P_k' - D_k' P_k' + \dots \neq E'$$

$$P_k' \neq p_k' / (i' + u_k + v_k)$$

$$P_k' \neq p_k' / (i' + u_k + v_k)$$

.....

这说明， $m-1$ 种非货币消费品和 n 种服务的均衡价格及其相应的供求量都是局部均衡的。同时也说明，对应任何一套新资本品的 l 种产量，都可得到相应的 $m-1$ 种非货币消费品和 n 种服务的局部均衡价格及其相应的供求量。

瓦尔拉斯进一步分析使上述不等式转化为等式的摸索过程，他指出，由于投资的总价值 $[D_k' P_k' + D_k' P_k' + \dots = D_k' p_k' / (i' + u_k + v_k) + D_k' p_k' / (i' + u_k' + v_k') + \dots]$ 是 i 的减函数，而 $E = F_i(p_1' \dots p_p' \dots p_k', p_k', \dots, i)$ 是 i 的先增后减的函数，所以 i 的变动将使两者趋向均衡，这是 i 变化的第一功效

果。 i 变化的第二种效果在于当储蓄由于 i 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时,总消费将下降(或提高)。这一下降(或提高)将使一切价格(包括消费品和服务)在假定用于直接消费和用于生产的服务总量不变时,出现下降(或上升)。这种价格效应将使投资的总价值下降(或上升),也使储蓄值下降(或上升),因为整个收入值下降(或上升)了。只要第二种效果对均衡的不利影响小于第一种效果的有利影响,则摸索过程将使投资的总价值与储蓄值逐步逼近,最后在某一正数 i 值上,两者达到均衡。

瓦尔拉斯进一步认为,货币资本市场上的利息率总是向实际资本市场上的净收入率 r 看齐的。如果利息率高于净收入率,则储蓄者将倾向于将其储蓄以货币形式贷出,而不是先购买实物资本后再在服务市场贷出。而企业家将倾向于从服务市场租借实物资本而不是在货币资本市场上借入货币资本。结果货币资本的供给增加而需求减少,利息率将下降。若利息率低于净收入率,将出现相反情况。

在摸索过程使 i 向均衡值逼近,投资与储蓄逐步靠拢的同时,企业家也调整各种新资本品的产量,以使其售价与生产成本相逼近。瓦尔拉斯假定,由于这类调整使有的资本品增产、有的减产,故对于净收入率很少产生影响,故也很少使资本品售价受到显著影响,产量的这种调整主要影响生产成本;并且由于某类资本品产量变动造成的使生产成本与售价相接近的趋势,大于其他各种资本品产量变动所可能造成的,使该类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与售价相分离的趋势,所以产量的调整最终将使各种资本品的生产成本等于其售价。由于前面已经说明,对任何一套资本品产量和任何一个净收入率来说,都会导致消费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均衡,以及消费品生产的均衡,所以对于均衡的资本品产量和均衡的净收益率来说,也一定存在着这种消费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均衡。这时便出现了全面均衡。

通过上述对摸索过程的分析,瓦尔拉斯总结了均衡的净收入率和新资本品均衡价格的确定定律:“假定有多种服务,并且有可能从这些服务的代价扣除收入对消费的一个超过量,使之转变成新的狭义资本品,这些资本品以通货为媒介时,就可以与各种消费品和各种新资本品进行交换。这时要使资本品市场处于平衡状态,或者是要使以通货计的新资本品价格处于稳定状态,其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1)于售价相等于净收入对现期净收入率之比时,以通货计的这类新资本品的有效需求须等于其有效供给;(2)新资本品的售价与其生产成本相等。如果这两种均等并不存在,那末,为了要实现第一个均等,于有效需求大于有效供给时,就必须压低净收入率来提高售价,于有效供给大于有效需求时,就必须提高净收入率来压低售价;为了要

实现第二个均等,对于售价高于其生产成本的那些新资本品,就必须增加其产量,对于生产成本高于其售价的那些新资本品,就必须减少其产量。”^①

瓦尔拉斯还论证,当所有新资本品的净收入率一致,即净收入率达到均衡时,则无论从产生消费服务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产生生产服务的角度来看,新资本品都达到了最大效用。

瓦尔拉斯还总结了净收入率及新资本品价格的变动定律:由于净收入的价格 P_i 是净收入率 i 的倒数,故若其他情况不变,而一个或多个参与者的净收入的效用函数有提高(降低);则净收入率将降低(提高);或者一个或多个参与者的净收入增加(减少),则净收入率将提高(降低)。除非两种变化对净收入率的影响互相抵消。若其他情况不变,而资本品服务的价格提高(降低),则资本品本身的价格将提高(降低);折旧率或保险费提高(降低),则资本品本身价格将降低(提高);净收入率提高(降低),则资本品本身价格将降低(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瓦尔拉斯也看到了预期变化对资本品本身价格的影响。

瓦尔拉斯在对固定资本形成下的一般均衡考虑完毕之后,又进一步考虑了存在着投入(原料)存货与产出存货时的一般均衡,其做法是把存货看作是提供贮藏服务的流通资本。于是只要把各类存货的服务价格、供求量,以及它们在生产各种产品时的技术系数(存货—产出系数)分别纳入到前述那 8 套方程组中去,结果将增加 $3m + 2s$ 个方程,其中有关于产出存货的 m 个供给方程,关于产出存货及原料存货的 $m + s$ 个需求方程,以及关于产出存货及原料存货的服务价格的 $m + s$ 个方程。这些方程正好用于求解新增加的 $3m + 2s$ 个未知变量:产出存货的服务的 m 个交易量,产出存货与原料存货的 $m + s$ 个产量,产出存货与原料存货的 $m + s$ 个服务价格。

瓦尔拉斯还分析了那种本身并非商品因而毫无效用的流通媒介(如纸币)的价格决定。他假定流通媒介的数量(供给量)一定,它的需求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消费者出于交易动机所保留在手头的现金;二是货币储蓄;三是生产者出于交易动机所保留在手头的现金。他把前两部分之和称作理想的现金余额,它的大小由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以货币形式储备的各种产品和储蓄的效用方程决定。第三部分的大小由各生产者根据以货币形式储备的各种产出存货和原料存货的需求来决定。而流通媒介的以某种商品(例如 A)计的服务价格,由下述方程决定:

$$Q_a = (D_a + R_a + E_a) / P_a'$$

^①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307—308 页。

Q_0 为流通媒介的既定供给, P_s' 为其服务价格, D_s/P_s , R_s/P_s , E_s/P_s 分别为由消费者掌握的现金、由生产者掌握的现金和货币储蓄。瓦尔拉斯以这一方程表达了他的货币数量论, 当 Q_0 增加时, 若分子项不变, 则 P_s 将减少, 从而商品以流通媒介计的价格将升高。

从两种产品的交换均衡开始, 到此为止, 瓦尔拉斯完成了他的一般均衡的整个体系。然后, 他在两个方面改变了这个体系的假设, 首先是关于市场只在一般均衡时才实际成交的假设。他提出了持续市场的概念, 意思是说交换会随时随地不断地进行, 并不是只在达到一般均衡时才成交。因此, 经济体系是不断地趋向一般均衡状态, 但永远不会实际上达到这种状态。因为在特定的均衡状态尚未实现时, 整个体系的参变量(商品和服务的初始拥有量、商品的边际效用函数等)可能已经变化, 从而均衡状态变动了。于是经济体系又开始趋向新的均衡状态。改变的第三点假设是关于生产系数不变的假设。他指出实际生活中生产系数并非常数, 而是变数。它有两种变化: 一是生产某种产出所需的投入种类不变, 但生产系数在数值上发生了变化, 他把这种变化称作经济的发展, 因为这种变化往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用一种服务替代另一种服务的结果。二是生产系数性质变了。即生产某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在种类上有了变动。他把这种变化称作技术的发展。但瓦尔拉斯并没有把作为变量而非常量的生产系数纳入其一般均衡体系, 理由是如此将使他的一般均衡体系更加难以理解和掌握。

六、瓦尔拉斯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得到了熊彼特的高度赞扬, “经济均衡理论是瓦尔拉斯的不朽贡献。这个伟大理论水晶般明澈的思路以一种基本原理的光明照耀着纯粹经济关系的结构”¹⁾。与另外两位边际革命的奠基人相比, 虽然在强调边际效用决定价值这一点上, 他们是共同的, 但瓦尔拉斯的贡献更具有永久的魅力。这种魅力首先在于, 他抓住了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 一般均衡问题, 它的存在, 最优和稳定。他说明均衡的价格体系是边际效用、要素服务的数量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相互影响的结果, 这既摆脱了另外两位奠基人只注重分析个别商品均衡的局限性, 也摆脱了他们过于从边际效用这一个因素去说明价值起源的局限性。其次, 他在处理一般均衡问题时, 选择了正确的方法: 数学方法。这是他在方法上的一大创新。这一创新, 使他远远走在了另外两位奠

¹⁾ 美 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大经济学家》, 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第 79 页。

基人的前面；门格尔不欣赏数学方法，杰文斯只是运用了简单的微积分。事实上，只有数学方法，更确切说只有数学中的大型联立方程组，才能清楚地表达经济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才能回答均衡的存在性问题。因此，只有掌握了这一数学方法的瓦尔拉斯，才能解决一般均衡问题。除了所选择的问题意义重大，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坚实有力之外，最重要的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为以后几代西方经济学家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市场经济甚至计划经济的出发点。确实，这个体系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但正是后人克服这些不足纠正这些错误的努力，每一次都推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瓦尔拉斯对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是有缺陷的，他以为只要独立方程的数量与未知量相等，体系便有解。这对于线性方程组是正确的，但对于非线性方程组来说则未必，而他体系中的方程式恰有许多是非线性的。为了纠正这一缺陷，20世纪50年代，阿罗和迪布鲁运用拓扑学的成果完成了对均衡存在性的严格证明。

瓦尔拉斯对均衡稳定性条件的说明是不够严格的，这一不足引起希克斯在20世纪30年代对均衡稳定性的严格分析。

瓦尔拉斯的需求函数，隐含着效用可测性假定，这遭到了帕累托的反对，正是从这种反对中，产生出序数效用论及一整套的分析工具。

瓦尔拉斯体系是没有空间概念的，忽略了市场总是被空间距离所分隔的问题，对这一不足的重视和纠正，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俄林对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卓越分析。

瓦尔拉斯体系中，技术系数是不变的，这无疑是背离现实的。但在20世纪初，巴罗尼和林达尔便通过把技术系数作为要素服务的价格的函数，把变化的技术系数引进了一般均衡体系。而借助于不变技术系数的假定，以及瓦尔拉斯体系中的要素服务的供求平衡方程式组，列昂惕夫在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投入—产出分析。

瓦尔拉斯体系中，假定实际的交易行为只有在达到均衡时才进行，而在未达均衡时的“摸索过程”中，交易是不会进行的。这是一个远离现实的假定。对这一假定的不满，导致当代西方非均衡分析的发展。

瓦尔拉斯体系中，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结果人们的储蓄行为也就同时成为投资行为。对这一假定的抛弃，构成了凯恩斯体系的基础之一。

瓦尔拉斯体系长于对均衡状态的描述，短于对实现均衡的过程的分析，短于对均衡移动过程的分析。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概念，建立了说明资本主义动态过程的经济发展理论。

最后有必要简单说明一下瓦尔拉斯体系对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的意义。正是在瓦尔拉斯体系的基础上,巴罗尼证明了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着一般均衡问题,而计划当局可以通过直接求解联立方程组(不需要通过摸索过程),使资源达到与自由竞争条件下同样好的配置。而兰格则进一步提出了资源配置的试错法和社会主义分权模式。近年来,以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实证分析而出名的科尔纳,在他的短缺经济学中,也把瓦尔拉斯均衡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分析社会主义短缺经济中的均衡。

第二节 帕累托的经济理论

严格说来,作为一个派别,洛桑学派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但若没有1893年瓦尔拉斯退休后继任洛桑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帕累托,就不可能出现洛桑学派。

维尔费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父亲拉斐尔·帕累托是热那亚的贵族,是19世纪前半叶热烈拥护意大利统一的玛志尼主义者。他的母亲则是一位法国人。他1858年回到意大利,1869年获都灵工艺研究所工程学博士学位,1870—1892年期间以工程师身份从事工程和工业管理工作,曾任意大利钢铁公司总经理。1893—1906年由瓦尔拉斯推荐为洛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其主要论著有:《政治经济学讲义》(1896—1897年),《社会主义体系》(1902—1903年),《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1909年),《思想与社会:社会学通讯》(1916年)。他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学手册》一书中。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

一、序数效用论与无差异曲线

作为瓦尔拉斯教席的继承人,帕累托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但同时又作出重大修正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理论。重大修正之一是用序数效用论代替基数效用论,并用无差异曲线来分析消费者的需求行为。

帕累托认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大缺点是把需求函数建立在效用可测性的假定之上。他赞同费雪的观点,认为效用是难以测定的,并且一种物品的效用并非只与其本身的数量有关,还与其他物品的数量有关。效用虽不可测,但从人们日常行为来看,不同物品或不同物品组合,其效用是

可比较的。即效用虽不能用基数加以测定,但完全可用序数排列其大小。而在序数效用论的基础之上,完全可以推演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所需要的需求函数。为此,他采用了埃奇沃思在多年以前所提出的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但他对埃奇沃思的观念作了重要修正。埃奇沃思的无差异曲线是以效用可测性为前提,根据测定的效用来绘制的,而他的无差异曲线则以经验事实为根据,并不需要以效用的测定为前提。

帕累托详细列举了当两种物品具有不同关系时的无差异曲线:(1)两种物品(A、B)中只有一种(A)具有效用(见图 4-2-1);(2)两种物品(A、B)严格互补(见图 4-2-2);(3)两种物品(A、B)虽互补但并不严格;(4)两种物品(A、B)效用各自独立;(5)两种物品(A、B)可互替但替代比例不定(见图 4-2-3);(6)两种物品(A、B)以不变比例互替(见图 4-2-4)。不论这些无差异曲线有何不同,其共同特点是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代表越大的效用。这些不同形状的无差异曲线,广为后人所采用的是第(2)、(5)、(6)种,尤其是第(5)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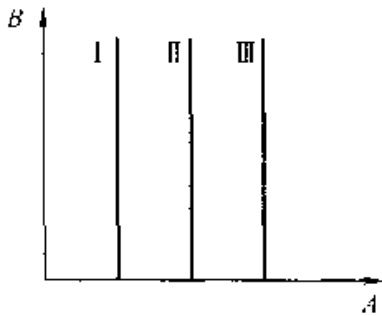


图 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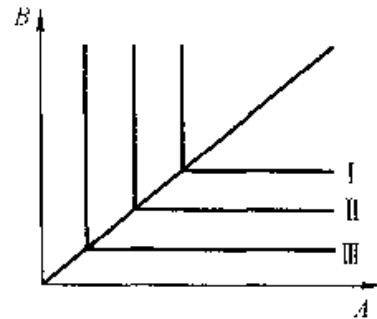


图 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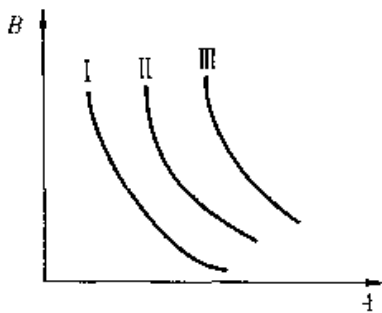


图 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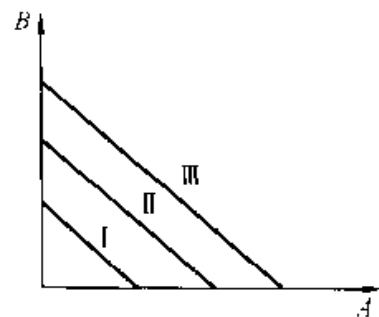


图 4-2-4

由埃奇沃思提出,而由帕累托(还有费雪)所修正发展的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成为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分析消费者行为和市场需求的有力工具。

二、一般均衡理论

帕累托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作出的发展之一,是大大拓展了一般均衡这一概念的内涵。在瓦尔拉斯那里,主要是分析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而他则进一步分析了包括自由竞争在内的各种市场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在瓦尔拉斯那里,一般均衡仅仅是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而他则认为经济中的一般均衡只是整个社会的一般均衡的一部分。在瓦尔拉斯那里,一般均衡是个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的结果,而他则进一步把均衡看作是需求和满足需求时所遇到的障碍(不仅仅是资源的稀缺)之间冲突的结果。在他看来,需求是经济行为的刺激和动力,而障碍则是广义的对经济行为的限制。

帕累托和瓦尔拉斯一样,分别分析了交换均衡和生产均衡,他的新发展之一是大量借助于无差异曲线,用图示方法来分析均衡。新发展之二是把交换均衡分为两种情况加以分析,一是交换者双方都不能事先确定价格时的情况,二是有一方能决定价格(即竞争不完全)时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交换均衡可由交换双方无差异曲线的切点来表示;在第二种情况下,交换均衡可由不决定价格的一方的无差异曲线与价格线(他称之为行走线)的切点决定。他的第三个新发展则是区分两种情况下的生产均衡,一是投入物的生产率随产出量的增加而增加的情况,二是投入物的生产率随产出量的增加而减少的情况,这表明他比瓦尔拉斯更深入地分析了生产活动,考虑了投入—产出系数因产量规模变动而变化时的生产均衡。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投入—产出系数完全被当作常数看待。

帕累托用五套方程式给出了生产均衡体系,第一套方程是:

$$1/P_x \cdot \psi_{1x}(x_1') = \dots = \psi_{1a}(a_1') = 1/P_b \cdot \psi_{1b}(b_1')$$

$$1/P_x \cdot \psi_{2x}(x_2') = \dots = \psi_{2a}(a_2') = 1/P_b \cdot \psi_{2b}(b_2')$$

.....

$$1/P_x \cdot \psi_{mx}(x_m') = \dots = \psi_{ma}(a_m') = 1/P_b \cdot \psi_{mb}(b_m')$$

式中 P_x, \dots, P_b 分别为各种商品及服务的价格,假定服务 a 的价格为 1。 $\psi_{1x}(x_1')$ 和 $\psi_{1a}(a_1')$ 分别为第一人关于商品 x 的边际效用及关于服务 a 的边际效用。以此类推,显然该方程组表达了满足最大化条件。

第二套方程是:

$$a_1' - a_{10} + P_b(b_2' - b_{10}) + \dots + P_x x_1' + P_y y_1' + \dots = 0$$

$$a_2' - a_{20} + P_b(b_2' - b_{20}) + \dots + P_x x_2' + P_y y_2' + \dots = 0$$

.....

$$a_m' - a_{m0} + P_x(b_m' - b_{m0}) + \dots + P_x x_m' - P_y y_m' + \dots = 0$$

式中 a_{10} 为第一人对 a 服务的初始拥有量, a_1' 为第一人对 a 的均衡拥有量, $a_1' - a_{10}$ 为第一人所买或卖的数量, x_1' 为第一人对 x 商品的均衡需求量, 以此类推。显然该方程组表明任何主体的总支出相等于总收入。

第三套方程是:

$$\begin{aligned} x_1' + x_2' + \dots &= x' \\ y_1' + y_2' + \dots &= y' \\ (a_{10} - a_1') + (a_{20} - a_2') + \dots &= A' \\ (b_{10} - b_1') + (b_{20} - b_2') + \dots &= B' \\ &\dots\dots \end{aligned}$$

式中 A' 为市场上出售的服务 A 的数量, 以此类推。显然该方程组表示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平衡。

第四套方程是:

$$\begin{aligned} P_x &= a_x \cdot P_a b_x + P_c c_x + \dots \\ P_y &= a_y \cdot P_a b_y + P_c c_y + \dots \\ &\dots\dots \end{aligned}$$

式中 a_x 为单位 x 所消耗的 a 服务量, 以此类推。该方程组表示价格等于生产成本。

第五套方程是:

$$\begin{aligned} A' &= a_x x' + a_y y' + \dots \\ B' &= b_x x' + b_y y' + \dots \\ &\dots\dots \end{aligned}$$

该方程组表示服务的供求平衡。

上述五套方程组中, 第三套方程的前半部分, 即关于产品供求平衡的那一部分, 显然类似与费雪体系中的有关方程组, 而后半部分 (即关于服务的供求平衡的那一部分) 近似于瓦尔拉斯生产均衡体系中的第一套方程 (服务供给方程); 第一、二套方程是瓦尔拉斯的第二套方程 (产品需求方程) 的基础, 它们显然也类似于费雪体系中的有关方程。第四套方程、第五套方程与瓦尔拉斯的价格方程、生产方程完全一致。由此可见, 帕累托的生产均衡体系是综合瓦尔拉斯体系和费雪体系¹⁾ 的结果。

帕累托明确指出他和瓦尔拉斯等人用经济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价格的观点, 与其他人用各种唯一的最终决定因素来决定价格的观点之间的

1) 关于费雪的一般均衡体系, 可参阅本卷第五章第二节。

区别：“价格或交换价值是在经济均衡时同时决定的，交换价值来自障碍和需求之间的对抗。只看其一方面，而且只考虑需求的人认为，需求决定价格，并且相信价值的原因是效用（满足欲望的能力）。看到另一方面，而且只考虑障碍的人认为，唯有障碍决定价格，并相信价值的原因在于生产成本。如果在障碍中他只看到劳动，他发现价值的原因仅仅在于劳动。”^[1]

三、帕累托最适度

帕累托适度又可以称作是集体满足最大化的状态。帕累托认为，当生产和交换同时达到均衡时，就实现了帕累托最适度。因为任何偏离均衡的状况中，都起码使个别人受损而其他则不增加福利。所以他又把最适度看作是一种特定状态，任何对它的偏离都不可能在不降低某些人福利的条件下增加其他人的福利。

在帕累托之前，也曾有人探索过集体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如边沁和马歇尔，他们都是从基数效用论出发的，假定不同人之间的效用可以进行比较。因此一定的分配状态也就成为集体福利最大化的部分条件。若其他条件不变，只是某种物品的一定量通过再分配由 A 转归 B 所有，于是 A 的总效用下降而 B 则相反，只要 A、B 两人总效用的变化额的代数和为正，则再分配以后的状况就要优于以前的状况。只有任何类型的再分配都是不可能使各人总效用的变化额的代数和为正时，初始的那种分配状况才是对应于集体福利最大化的状况。帕累托最适度与这些人的区别在于它以效用不可测定，从而不同人之间效用不可比较为前提。因此，帕累托最适度并不以一定的分配状况为条件，它也无法判定分配状况不同时集体满足的大小，它只是说，在既定的分配状况下，集体福利最大化的条件是生产和交换都达到均衡。于是对应任何一种分配状况，都会有一特定的帕累托最适度，而在不同的最适度状况（对应于不同的分配状况）之间，是无法进行集体福利的大小比较的。

帕累托最适度的提出，对以后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集体福利的评价和比较，要涉及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与生产和交换有关，可以通过分析予以确定；另一方面则与分配有关，无法通过分析予以确定。因为这方面的标准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而这种观念往往是冲突的。

^[1] 帕累托：《政治经济学讲义》，第 176—177 页，转引自晏智杰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5 页。

四、帕累托法则

帕累托虽然未能指出哪一种分配状况是最优的,但却根据英、法、德、美、奥等国的统计资料,提出了一个经验性的分配法则,即帕累托法则,该法则可用下述公式表示:

$$N = A/(x-a)^{\alpha} \quad \text{或} \quad \ln N = \ln A - \alpha \ln(x-a)$$

x 表示一定量的收入, N 表示其收入不低于某一定水平的人数, A , α 和 a 分别为从统计资料中求得的参数, a 表示最低收入水平, α 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它越大,不平等程度越高。帕累托分配法则亦可用下述图4-2-5中的双曲线或对数直线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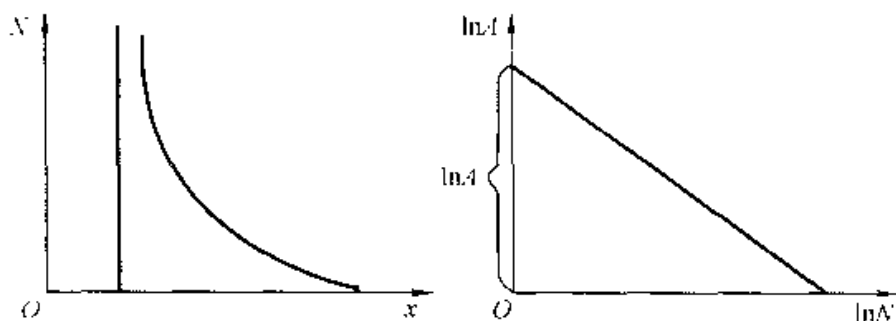


图 4-2-5

帕累托根据多国多个地区的资料得到的结论是 α 介于 1.2~1.9 之间,平均值为 1.5。帕累托认为,由于统计材料显示,上述法则很少因时代、地理位置和经济组织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产生这一法则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本性。

帕累托法则从两个方面促进了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一是促进了对分配(包括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状况的实证分析,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专门分析分配状况的分析工具;二是帕累托在给出该法则时所采用的方法,为以后经济计量学的发展提供了样板。

第三节 巴罗尼的经济理论

一、概 说

意大利边际主义者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在通常的经济思想史论著中往往被忽略。实际上意大利是相当早便接受了边际主义思想的少

数几个国家之一。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由于杰文斯及奥国学派(尤其是其中的萨克斯)的影响,意大利的经济学家马费奥·潘塔莱奥尼(1859—1924 年)、德维蒂·德·埃·马尔科等人,以公共财政领域为出发点,开始运用边际分析方法于经济科学之中。至 19 世纪 90 年代边际主义在意大利已成为经济学的上流。^① 意大利的著名边际主义者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两位,以及后来成为洛桑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帕累托之外,还有恩里科·巴罗尼、雨果·马佐拉(1863—1899 年)等人。意大利边际主义者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价值理论和财政理论。价值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帕累托和巴罗尼为代表,他们发展了瓦尔拉斯所开创的一般均衡分析。财政理论方面的贡献,以马尔科及马佐拉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为当代西方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所继承和发展。

二、巴罗尼的生平及论著

恩里科·巴罗尼(Enrico Barone, 1859—1924 年),出生于意大利。曾任图林军事学院军官,教授,并在意大利参谋本部担任过上校。1907 年 58 岁时退役,任罗马经济科学研究所教授,1911 年被聘为罗马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在潘塔莱奥尼等人的影响下,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其主要成就在于国际贸易理论、厂商理论、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他利用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证明保护政策有减少经济福利的趋势。在厂商理论中,他以边际生产率分析为基础,建立厂商的产出供给函数和对投入的需求函数。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他证明在集体主义国家中,只要具备一定条件,计划部门也可能使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也就是帕累托最适度状态。这是他最著名的贡献。巴罗尼的主要论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1908 年),《经济著作集》3 卷(1936—1937 年),《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1908 年,有中译本)^②。

三、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

这是巴罗尼最出名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在这篇论文中,他运用瓦尔拉斯—帕累托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分析了集体主义制度下达到集体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及其机制。

① 关于边际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过程,详见皮耶罗·巴鲁奇《边际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 1871—1890 年》,载 R. D. C. 布莱克等人所编《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② 该文的中译文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 年第 3 期。

为了与集体主义制度相比较,巴罗尼首先建立了自由竞争制度(他称之为个人主义制度)下的一般均衡体系。该体系的已定量是各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他统称之为资本)的数量、技术条件以及个人偏好。由此可得:(1)整个体系在一定时间内可提供的 n 种要素的总量: Q_1, Q_2, \dots 。(2)用 n 种要素生产 m 种产品(A, B, ...)的技术系数: $a_1, a_2, \dots; b_1, b_2, \dots$ 。巴罗尼强调,这些系数不仅取决于特定的技术条件,而且由于要素之间的替代性,它们还取决于生产成本最低化的条件,即归根结底取决于各种要素的数量即相对稀缺性,因此这些系数是由既定的要素数量,既定的技术条件和既定的个人偏好三者共同决定的。(3)一定的价格体系与每个人对产品(包括生产要素直接提供的消费性服务)的需求与要素的供给之间既定的函数关系。巴罗尼特别强调,这种函数关系可以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不必以效用理论为基础。

以上这些是体系的常量和既定的关系,巴罗尼以下表给出了体系的未知量:

		未知量	未知量数
产 品	需求和产量	R_1, R_2, \dots	m
	生产成本	u_1, u_2, \dots	m
	价格	$1, P_1, \dots$	$m - 1$
现有 资本	直接用于消费性服务的量	R_1, R_2, \dots	n
	服务的价格	P_1, P_2, \dots	n
新资本	制造出的数量	R_1, R_2, \dots	n'
	生产成本	u_1, u_2, \dots	n'
储蓄或积累的总额		E	1

共有 $(m + 2n + 2n')$ 个未知量。

巴罗尼把体系所拥有的方程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m - n - 1$ 个价格为自变量的函数,第二类是均衡方程。他遵照瓦尔拉斯法则,认为个人在 $m + n - 1$ 个价格体系下所需要的产品量(r_1, r_2, \dots)和直接消费的要素的服务量(r_1, r_2, \dots)以及储蓄量(e)与所供给的要素的服务量(q_1, q_2, \dots)之间,满足下列关系:

$$P_1 r_1 + P_2 r_2 + \dots + P_n r_n + P_{n+1} e = P_1 q_1 + P_2 q_2 + \dots$$

若价格体系不同,则个人所需要的各种产品的数量,直接消费的要素服务的数量以及储蓄也将不同。由此可总给出整个社会以 $m - n - 1$ 个价格为自变量的 $m + n - 1$ 个需求函数,其中 m 个是产品的需求函数, n 个是关于要素服务的需求函数,还有一个是关于储蓄 E 的需求函数。关于这些需求函数,巴罗尼并未给出其具体形式。

巴罗尼给出了四组均衡方程。第一组表示生产的物质条件,共有 n 个方程:

$$Q_i = R_i + a_i R_a + b_i R_b + \dots + h_i R_h + k_i P_k + \dots$$

$$(1) \quad Q_i = R_i + a_i R_a + b_i R_b + \dots + h_i R_h + k_i P_k + \dots$$

$$\dots\dots$$

其中 h_i, k_i, \dots 分别为用 n 种要素生产 n' 种新资本的技术系数。

第二组方程只包括一个方程,它表明储蓄全部用于制造新资本品。

$$(2) \quad E = \omega_a R_a + \omega_b R_b + \dots$$

第三组方程表明最终产品和新资本的生产成本是生产要素服务的价格的函数,共有 $m+n'$ 个:

$$\omega_a = a_1 P_1 + a_2 P_2 + \dots \quad \omega_h = h_1 P_1 + h_2 P_2 + \dots$$

$$(3) \quad \omega_b = b_1 P_1 + b_2 P_2 + \dots \quad \omega_k = k_1 P_1 + k_2 P_2 + \dots$$

$$\dots\dots \quad \dots\dots$$

第四组方程表明自由竞争的特征之一,即最终产品的价格和新资本品的服务的价格等于其生产成本,共有 $m+n'-1$ 个:

$$1 = \omega_1 \quad P_h = \omega_h P_1$$

$$(4) \quad P_b = \omega_b \quad P_k = \omega_k P_1$$

$$\dots\dots \quad \dots\dots$$

式中 P_1 为周转资本(自由资本)的价格,它同时又是资本的利息。

由四组方程及 $m+n+1$ 个需求函数,共可得出 $3m+2n+2n'-1$ 个方程,但其中有一个是非独立的。于是体系的未知量与独立方程的个数都是 $3m+2n+2n'$ 体系可得到确定解。

巴罗尼的这个体系,与瓦尔拉斯那个考虑资本形成时的一般均衡体系实质上是一致的。形式上的区别有三点:(1)瓦尔拉斯体系中,要素服务的供给量是价格体系的函数,而巴罗尼体系中是常数。(2)瓦尔拉斯体系中不显现关于要素服务的消费性需求的函数,而巴罗尼体系中则显现。(3)瓦尔拉斯体系中不区分产品的成本方程和价格方程,二者合而为一套方程,而巴罗尼体系则区分为两套方程。之所以把上述区别称之为形式上的,是因为考虑到:(1)从巴罗尼体系中作为常数的要素服务供给量中,减去作为价格体系的函数的对要素服务的消费需求,便可得到可用于生产产品的要素服务的量,它们显然是价格体系的函数,而这套函数便正好是瓦尔拉斯体系中的要素服务的供给函数。(2)巴罗尼体系中的产品价格方程组与生产成本方程组可合并为一个方程组,而这就是瓦尔拉斯体系中的产品价格方程组。

关于集体主义制度,巴罗尼首先作了下述制度性假定:(1)有 l 项资源

仍是个人财产,记作 M, N, \dots 。 $n-l$ 项资源为国家的集体财产,记为 S, T, \dots 。(2)没有货币,从而没有以货币记的价格,但生产部仍然要规定不同服务(包括社会化资源的服务)、不同产品以及产品与服务之间的相对价格。(3)由于社会化资源的服务也有相对价格(λ, λ),故整个社会由社会化资源所得到的总收益为 $Q_1\lambda + Q_2\lambda + \dots = r$,其中 Q_1, Q_2 为社会化资源 S 和 T 的数量。(4)在人民意见一致的条件下,总收益 $r (= Q_1\lambda + Q_2\lambda + \dots)$ 按一定的分配制度直接分配给每个人,每个人得到 γ_i 量 γ 对于每个人都可能不同,但 $\sum \gamma = r$ 。(5)为了鼓励储蓄,生产部对延迟消费实行奖励,并通过奖励率的变动来调节整个社会的储蓄量,以使之适应新资本形成的需要,同时规定个人储蓄的使用权只能由生产部行使。(6)个人收入由两部分相加而成:一是用自有资源的服务换得的,二是 γ_i 。个人用这些收入按相对价格和延迟消费的奖金率(即利率)自由地换取各种消费品和用于消费的社会化资源的服务。并自由地决定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比例。于是对每个人来说,下述关系式成立:

$$r = \lambda_1 r_1 + \dots + \lambda_n r_n + \lambda_0 r_0 = r = c + \lambda_0 q_0 + \lambda_1 q_1 + \dots + \gamma r$$

式中 λ 为相对价格, $\lambda_0 = 1, q_0, \dots$ 为个人所出售的自有资源的服务量。上式右端为收入量,左端为开支加储蓄。

在上述 6 项制度性假定下,巴罗尼首先分析了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条件。他认为,当集体主义的生产部在始终满足前述方程组(1)的条件下变动相对价格时,将使每个人对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上式左端的相应变动。

$$\Delta r = \lambda_1 \Delta r_1 + \dots + \lambda_n \Delta r_n + \lambda_0 \Delta r_0 + \dots \Delta c$$

这一变动的总和可记为 $\Delta\theta$,当 $\Delta\theta$ 为正(负)时,意味着个人境况的改善(恶化)。

巴罗尼进一步指出,若生产部选择了这样一套相对价格,对它作任何进一步的变动,都将使所有人的 $\Delta\theta$ 为负,则这套相对价格便无疑是导致集体满足最大化的价格,但他认为这样一套相对价格是不存在的。因此他提出,只要生产部找到这样一套相对价格,对它作任何进一步的变动都将使所有人的 $\Delta\theta$ 的总和 $\sum \Delta\theta$ 小于 0,即一部分人的改善不能抵消另一部分人的恶化。则这套相对价格便可算作集体满足最大化的价格,于是 $\sum \Delta\theta = 0$ 便是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条件。他指出:

$$\sum \Delta\theta = \Delta R_0 + \lambda_1 \Delta R_1 + \dots + \lambda_n \Delta R_n + \lambda_0 \Delta R_0 + \dots + \Delta E$$

而其中的 ΔE 又等于 $\Delta_0 \Delta R_0 + \Delta_1 \Delta R_1 + \dots$,其中 $\Delta_0, \Delta_1, \dots$ 分别为制造新资本品 H, K, \dots 为一单位所需要的储蓄量。由此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条件又可写

成：

$$\Sigma \Delta \theta = \Delta R_0 + \lambda_0 \Delta R_1 + \dots + \lambda_1 \Delta R_1 + \lambda_2 \Delta R_2 + \dots + \Delta_1 \Delta R_1 + \Delta_2 \Delta R_2 + \dots = 0$$

巴罗尼指出,由该条件可推出四套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条件:

a. 假设产品 B 增加了产量 ΔR_b , 生产 ΔR_b 所需的资源服务只能靠减少这些资源的消费性服务来得到, 于是 $\Sigma \Delta \theta = \lambda_b \Delta R_b - (\lambda_1 b_1 + \lambda_2 b_2 + \dots) \Delta R_b$ 。当 $\Sigma \Delta \theta = 0$ 时, $\lambda_b = \lambda_1 b_1 + \lambda_2 b_2 + \dots$ 。以此类推, 可得到关于 $\lambda_1, \lambda_2, \dots$ 的一套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条件:

$$\lambda_a = 1 = \lambda_1 a_1 + \lambda_2 a_2 + \dots$$

$$[I] \quad \lambda_b = \lambda_1 b_1 + \lambda_2 b_2 + \dots$$

.....

该条件的经济含义是该产品的价格要等于其生产成本。

b. 假设新资本品 H 增加了产量 ΔR_h , 生产 ΔR_h 所需的资源服务只能靠减少这些资源的消费性服务来得到, 于是 $\Sigma \Delta \theta = \Delta_h \Delta R_h - (\lambda_1 h_1 + \lambda_2 h_2 + \dots) \Delta R_h$ 。当 $\Sigma \Delta \theta = 0$ 时, $\Delta_h = \lambda_1 h_1 + \lambda_2 h_2 + \dots$ 。以此类推, 可得到关于 $\Delta_h, \Delta_k, \dots$ 的一套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条件:

$$\Delta_h = \lambda_1 h_1 + \lambda_2 h_2 + \dots$$

$$[II] \quad \Delta_k = \lambda_1 k_1 + \lambda_2 k_2 + \dots$$

.....

该条件的经济含义是说制造新制本品 H, K, \dots 一单位所需的储蓄量等于这些资本品的生产成本。

c. 假设技术系数 b_i 增加了 Δb_i , 由于替代关系, 这意味着 b_j 减少了 Δb_j , 即生产中用 S 替代了 T 。于是 $\Sigma \Delta \theta = \lambda_i \Delta b_i + \lambda_j \Delta b_j$, 当 $\Sigma \Delta \theta = 0$ 时, $\lambda_i \Delta b_i + \lambda_j \Delta b_j = 0$ 。以此类推, 可得到关于技术系数的一套集体满足最大化条件:

$$[III] \quad \lambda_i \Delta b_i + \lambda_j \Delta b_j = 0$$

.....

d. 关于储蓄 E 的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条件:

$$[IV] \quad \lambda_0 / \Delta_0 = \lambda_k / \Delta_k = \dots = \lambda_e$$

λ_e 为储蓄的利率。该条件意味着 E 在各种新资本品的生产中的配置是最佳的。

上述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条件: [I]、[II]、[IV] 恰好就是自由竞争下一般均衡体系中的均衡方程组 (3) 和 (4)。而 [III] 正是成本最低化的条件, 由此巴罗尼得出三点结论: (1) 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为了实现集体满足最大化的目标, 即 $\Sigma \Delta \theta = 0$, 必须继续保留价格 (包括非劳动的生产资源的价格)、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等经济范畴, 必须按下述原则组织生产活动: a. 生产

成本最小化；b. 最终产品和新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应等于其生产成本。(2) 集体主义制度下为实现集体福利最大化所需求解的方程组体系与自由竞争制度下实现一般均衡的方程组体系完全一样。因为两者都包含以价格为自变量的 $m+n-1$ 个需求函数，以及四套平衡方程，其中第一套方程(1)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不论哪种制度都须遵守，而另外三套平衡方程则为集体主义生产部在追求集体满足最大化时所必须求解的。(3) 由第2点结论可知，集体主义制度下的一般均衡体系也是完全确定的：方程数等于未知量数。

巴罗尼进一步分析了集体主义制度下实现均衡，即实现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机制。他指出由于集体主义制度也必须遵从的方程组[1](物质生产条件)共有 n 个方程，而待求的相对价格有 $m+n-1$ 个，故肯定有无限个相对价格体系都满足方程组[1]。因此可以任选其中一个解作为出发点，然后观察由这个解过渡到另一解时， $\Sigma\Delta\theta$ 的变化，只要 $\Sigma\Delta\theta$ 不等于零，就不断地调整价格体系(在满足方程组[1]的范围里)，直至 $\Sigma\Delta\theta$ 等于零为止。

巴罗尼进一步指出，只要生产部进行大量的组织活动，充分了解每个人对各种产品和服务以及储蓄的需求函数，那么在技术系数不变的前提下，是可以数学方法解出实现集体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价格体系的。因为在技术系数不变的前提下，生产部面临的只是一个线性方程体系，从理论上讲，用数学方法求解是可能的。求解时的困难只是在于众多的个人和众多种类的货物所造成的巨大数量的线性方程。然而，由于要素之间的替代性，技术系数不可能是外生的不变量。它将随着生产要素的服务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生产成本最小化这一条件。于是在追求集体满足最大化时，生产部所面对的便不再是一个由线性方程组成的体系，而是一个包含着非线性方程的体系。因此，导致最大集体福利的均衡价格体系是不能用数学方法先验地解出的。只能通过试错法，通过不断地变动价格体系来逐步逼近最大集体福利的均衡状况。而在这一逼近过程中，那些高成本企业的破产将像自由竞争条件下一样不可避免。

除了上述对最大集体福利均衡的条件及实现均衡的机制的分析之外，巴罗尼还有三点值得重视的看法：(1) 对于最大集体福利这一目标来说，总收益 x 的直接分配比间接分配更有利。这里的间接分配是指通过不规定社会化资源的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产品价格所实现的分配；而直接分配是指首先按均衡价格确定总收益 x 的数量，然后按某种一致同意的方式把 x 直接分配给每个人。(2) 对于最大集体福利这一目标来说，取得积累资金的最好方法是首先把总收益 x 全部分配给个人，然后通过适当的利率来形成积累所需要的储蓄；而不是由生产部首先截留一部分 x 作为积累资金，

再把剩余的 x 分给个人。(3)总收益 x 的分配的变动,将引起最大集体福利的均衡值的变化。这意味着 x 的分配方式是集体主义制度下最大集体福利均衡的参数变量。

巴罗尼上述思想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证明了瓦尔拉斯—帕累托一般均衡分析决不仅仅适用于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经济,同样也适用于追求集体满足最大化的集体主义经济;在这两种经济中,资源合理配置的条件是相同的;从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两种经济内在的同一性。主要贡献之二在于指出了追求集体满足最大化的集体主义经济必须具备哪些制度性特征(如保留价格体系,给社会性资源同样规定均衡价格,社会性资源所带来收入的分配方式,消费者自由选择等等)及哪些行为准则(如生产成本最小化、价格等于生产成本)。主要贡献之三是指出集体主义经济实现集体满足最大化的机制,不是通过事先的精确计算来获求均衡价格体系,而是用试错法不断逼近均衡。因此,其逻辑的结论必然是需要市场机制。由于这三方面的贡献,巴罗尼的上述思想完全可以称作是后来 O. 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先驱。巴罗尼所缺少的只是没有给试错法规定具体准则,没有指出试错过程中价格以什么为依据进行调整,向什么方向调整。而兰格则明确指出应根据商品的供求态势来决定价格是否调整以及向什么方向调整,从而为试错法规定了具体准则。巴罗尼的重点是强调了集体主义经济中最大集体福利均衡与自由竞争均衡的同质性,而兰格的重点则是为实现均衡的试错法规定具体准则。

尽管 O. 兰格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极为接近巴罗尼的集体主义经济,但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断定兰格是在了解巴罗尼的思想之后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还是在事先并不了解巴罗尼的思想的情况下,独立地然而几乎是重复地提出了他的思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为了纪念巴罗尼的贡献,应当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称作巴罗尼—兰格模式。

第五章 美国边际主义者的经济理论

在美国,边际主义思潮部分是自发形成的,部分是从英国和奥地利引进的。在自发形成的过程中,约翰·贝茨·克拉克起了主要作用。他系统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虽然像瓦尔拉斯、威克斯蒂德、马歇尔、威克塞尔等人也分别以不同形式提出了这一理论,但由于克拉克对分配问题的格外强调,以及对这一理论系统而详尽的阐述,使他成为这一理论的主要创建人。此外,他还独立提出了别具特色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除克拉克之外,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边际主义者还有费雪、陶西格、奈特等人。费雪在只了解杰文斯交换方程式的条件下,独立发展了与瓦尔拉斯相接近的一般均衡体系,该体系在某些方面显然优于瓦尔拉斯体系。同时,他作为边际效用论由基数论向序数论转变中的过渡性人物,促进了这一转变。此外,他的利息理论和货币数量方程式也都名噪一时。陶西格主要是复述了马歇尔的体系,但在国际贸易领域有其独特贡献,后来俄林在建立其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时,无疑受益于他。奈特则以提出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本质区别,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利润理论而著名。

由于资料限制,本章只准备介绍克拉克和费雪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思想。

第一节 约翰·贝茨·克拉克的经济理论

约翰·贝茨·克拉克(Clark John Bates, 1847—1938年),出生于美国罗德岛,1872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获文学士学位。后留学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曾与庞巴维克一同师从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克尼斯三年。返美后历任斯密学院教授(1891—1893年),阿默斯特学院教授(1893—1895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895—1923年)。作为1888年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于1893—1895年任该会会长。他早期学术倾向受德国学术界社会主义教师的影响,批评资本主义。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学术观点逐渐转变为全力支持资本主义。他被称作是边际主义的美国学派的创始人。

其主要论著有：《财富的哲学》（1885年），《财富的分配》（1899年，有中译本），《经济理论要义》（1907年）。在《财富的哲学》一书中，克拉克还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其基本倾向是反对古典学派，主张社会改良主义。在《财富的分配》中，他以系统的边际生产力论为资本主义辩护。

一、静态与动态：经济学新的分类

由萨伊创始，经穆勒父子的修正，经济学习惯上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克拉克反对这种传统的划分。他指出，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生产活动，则它包括了交换和分配。首先，通常在交换理论中所讨论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收入在各产业团体之间的分配问题。交换论实际上是关于社会产业组织的理论，因此应划归分配理论。这样分配理论便涉及两种分配现象：收入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以及在各产业团体之间的分配。其次，不论哪种类型的分配，都与分配者（要素所有者或产业团体）在收入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份额或创造财富的功能有关。因此研究分配便是研究贡献份额或创造财富的功能，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生产问题。

在破除了传统的划分之后，克拉克首先把经济学划分为两部分：研究生产和消费的一般规律为第一部分，研究这些一般规律在各种经济中的具体表现为第二部分。他认为主要的一般规律有三条：消费品级差效用规律、生产工具的级差效用规律和劳动的级差效用规律。这里的“级差”一词，实际上就是“边际”概念。他认为这三条一般规律存在于任何经济之中。

克拉克把经济划分为不存在分工交换从而不存在分配问题的原始自然经济，与存在分工交换从而也存在分配问题的所谓有组织经济（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对这两种经济，他认为又可以从两种角度去进行研究，分为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他用图 5-1-1 表述了他的上述划分。3 区是静态有组织社会经济，4 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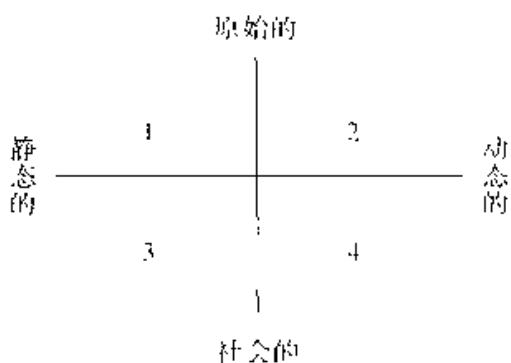


图 5-1-1

是动态有组织社会经济。他重点分析了静态有组织社会经济和动态有组织社会经济。

按照克拉克的看法，所谓静态，就是人口、资本、生产方法、产业组织以及消费者偏好这五个动态因素保持不变，从而产品的品种和产量也不变；但生产不断持续、劳动和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今天人们所

说的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均衡状态。而静态分析则要研究上述三条一般规律在静态有组织经济中的具体表现。他认为,三条一般规律在有组织经济中成为分配的自然规律的基础,消费品级差效用规律成为自然价值的基础,生产工具级差效用规律和劳动级差效用规律分别成为自然利息和自然工资的基础。因此,静态分析就是要研究静态条件下自然价值、自然利息和自然工资的决定。他承认,静态并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但是静态分析所确定的自然价值、自然利息和自然工资,为并非静态的实际经济生活提供了变化的标准和变化的方向。

克拉克认为,有组织社会经济的动态分析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实际状态与静态标准存在偏离的原因及后果,以及偏离将以什么方式、什么速率趋于消失;二是研究五个动态因素分别变化或同时变化时,静态标准本身如何变动及这种变动所导致的后果,他认为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更重要的。

克拉克对经济学的上述划分,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区分了一般规律与其在不同经济中的特殊表现,当然对于什么是一般规律,我们不一定要同意他的看法;二是区分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这一区分一直影响到今天西方经济学的分类,虽然在以后的发展中,静态和动态,尤其是后者的含义有了很大变化。从边际革命的角度来看,静态与动态的划分实际上是揭示了边际革命的局限,虽然克拉克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整个边际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静态假定的前提下重新构造价值理论,克拉克的作用在于既肯定了静态分析的意义也指出其局限。他力图打破这一局限建立动态分析,但并未成功,只是指出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规律:边际生产力论

克拉克主要分析了静态条件下的分配(包括生产和交换)问题。而在前面所说的两种分配现象中,他首先分析了收入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他认为,收入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就是各种要素在收入的生产中的贡献份额的确定。他把各种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和资本两大类。所以收入分配也就是劳动和资本这两大类要素在收入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份额的确定。

克拉克特别强调把资本和资本货物加以区分。这一区分是他的利息理论区别于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的关键所在。他把资本理解为体现在生产财富所用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笔基金,而资本货物则是各种具体的生产手段(包括土地),两者之间有两点重要区别:首先,资本是永久存在的,而资本货物则是不能流动的。资本,作为一笔基金,而且在静态条件下是一笔数额固定

的基金,可以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即改变其所体现的资本货物的具体形态,这就是资本的流动性,而资本货物则不具备这种可能,因此是不流动的。资本与资本货物之间的区别,也反映在它们各自不同的收入范畴上,资本的收入是利息,而资本货物的收入则是租金。从整个社会来看,利息和租金在总数上是相等的。而且租金的多少基本上是受到利息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租金这一收入范畴的研究就可以归结为对于利息范畴的研究。

在区分资本和资本货物的基础上,克拉克反对庞巴维克的利率决定理论,认为利率的决定仅仅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数量有关,与庞巴维克所说的生产期的长短(或生产的迂回程度)无关。因为在静态条件(意味着资本存量不变)下,生产的迂回程度仅仅和资本货物从而和租金有关,而与资本从而和利息无关。他认为,同样的资本可以体现为不同的资本财货(这些不同的资本财货可以体现不同的生产迂回程度),但这两组不同的资本财货所提供的总租金将是一样的。

由于区分了资本和资本货物,克拉克不再把土地作为一种与劳动和资本并列的生产要素,而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货物,和其他资本货物处于同等的地位,而地租也就自然成为一种特殊的租金了。

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可概括为如下一点:(1)在静态条件下,自由竞争(要素可无阻碍地流动)将使工资趋向于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他称之为最后生产力),利息则趋向于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力。(2)由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这个存在于任何社会中的一般规律,所以当劳动(资本)在资本(劳动)不变时逐渐增加,将导致工资(利息)的下降。对这一命题,克拉克作了如下补充说明:A.当劳动要素增加时,劳动组织不能被改善,否则就相当于出现了技术进步,且各单位劳动要素是同质的,相互间具有完全的替代性。B.当资本要素逐渐增加时,资本将体现在价值日益贵重质量不断提高的资本货物上,使数量不变的劳动和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的资本货物相结合。即资本增加表现为劳动者人均资本增加,表现为资本货物具体形态的变化。由此可知,克拉克谈到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时,以劳动要素的质量不随数量变化而变化为前提,但谈到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时,则以资本要素的质量随数量变化而变化为前提。这意味着资本货物质量的改进不能抵消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趋势。这一结论不同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结论。同时,这一结论显然也违背静态假定,因为这意味着技术进步,资本货物性能随其数量增多而改进。由此可知,克拉克关于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论述是不够严谨的。(3)静态条件下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利息乘以资本

量等于资本要素的总收入,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工资乘劳动量等于劳动要素总收入,两种要素收入之和等于两种要素在一起所生产的收入总和,克拉克用如下图形(图 5-1-2)表达了以上所述的命题:图中横轴代表要素(劳动或资本)数量,纵轴代表边际生产力。 BC 曲线表明当要素由 $A1$ 增加到 $A6$ 时,边际生产力递减的状况。线段 AE 表示只有 6 单位要素时的报酬(工资或利息)率,矩形 $AEC'D$ 表示要素(劳动或资本)的总收入,三角形 EBC' 表示另一种要素(资本或劳动)的总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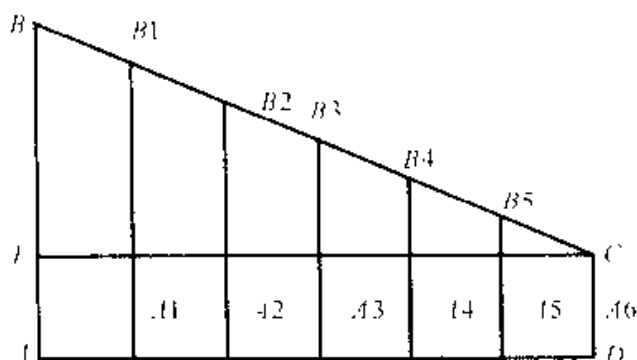


图 5-1-2

值得提出的是,虽然西方经济学界时常把上述边际生产力论与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时常把它看作是克拉克的主要成就,但这一理论并非克拉克首创,虽然这无疑是由克拉克在并不了解其他人的贡献的基础上独立提出的。¹在克拉克之前,德国的经济学家杜能已经提出了类似的理论。²尔后法国的瓦尔拉斯在 1874 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所建立起来的一般均衡体系中,也已经蕴含了边际生产力论的基本要点。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尼则进一步根据帕累托所修订过的一般均衡体系,给出了边际生产力论的严谨的数理表述。³克拉克独立发现边际生产力论的时间显然要早于《财富的分配》出版的 1899 年,因为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对以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加以整理的结果,但他发现的时间也不会早于 1881 年,因为他在《财富的分配》一书的序言中谈到该书是 1881 年以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综述。由于资料限制,我们无法断定他是在 1881—1899 年这 18 年中的哪一年发现边际生产力论的。与他大致同时提出边际生产力论的则还有英国

¹ 参阅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序。

² 参阅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序。

³ 参阅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附录。

的威克斯蒂德、¹ J. A. 霍布森以及美国的 S. 伍德。²

克拉克对边际生产力论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指出了它的静态前提，即肯定它是说明静态条件下的分配规律。二是区分了资本与资本货物，即明确肯定是资本而非资本货物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³ 边际生产力论之所以更经常地和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克拉克用比其他人都更通俗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理论，而这种表达方式正好适应当时英语世界中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知识素质。二是他为捍卫这一理论而与庞巴维克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实，克拉克与庞巴维克的分配理论并非像表面所看到的那样水火难容。从表面上看，克拉克认为利率由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数量来决定，而庞巴维克则主张利率由生产的迂回程度（或生产期）决定，似乎无法统一，但从前面第二章所介绍的庞巴维克的利率决定理论（即他的分配理论）来看，他并不认为静态条件下可以出现任何一种迂回程度（生产期），只有能导致劳动供求均衡的生产期才会稳定存在。可以把这种导致劳动供求均衡的生产期称作均衡的生产期，只有均衡的生产期才决定稳定的利率水平。而生产期的长短又可体现为劳动者人均资本的多少，而后者又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数量相关。所以均衡的生产期的长短可以看作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数量的函数。所以均衡生产期决定利率的说法和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数量决定利率的说法实质上是-一致的。当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增加时，均衡的生产期也将延长，于是无论按克拉克的观点还是庞巴维克的观点，利率都将下降。两人的差别在于资本相对增加后引起利率下降的传导机制方面。克拉克认为资本相对增加将直接引起资本边际生产力从而引起利率的下降。虽然他也看到资本相对增加对资本体现形式——资本货物的具体形态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种形态的变化不是引起利率变化的因素。庞巴维克则认为资本相对增加首先引起资本体现形式的变化：用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建造更费时间的资本货物代替较低生产力但建造较少费时的资本货物。正是这种资本财货的具体形态的变化才引起利率下降。两人传导机制方面的差别如图 5-1-3 所示：

1 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2 参阅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256 页，注(2)。

关于霍布森及伍德的生平情况，可参阅，英！马克·布劳格等《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 英国经济学家威克斯蒂德在 1891 年出版的《论分配法则的协调》一书中，也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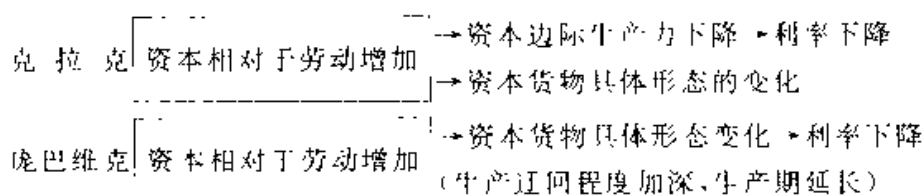


图 5.1.3

三、产业团体之间的分配规律:克拉克规律

克拉克认为,产业团体之间的分配取决于产品的价值或价格,因此他关于产业团体之间的分配理论,就相当于通常所说的价值理论。克拉克认为产品的价值由边际效用决定。他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在 1881 年,在并不了解奥国学派和杰文斯的价值理论的条件独立发展起来的。他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奥国学派和杰文斯的价值理论的共同特征是承认边际效用递减率,并用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但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有着重大区别。首先,在奥国学派和杰文斯那里,一单位某商品往往只具有一方面的效用,而在克拉克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单位某商品往往同时具有多方面的效用。例如一艘豪华游艇便具有五方面的效用:使人能浮在水上,使人能渡过很深的水流,使坐船的人能安逸地渡过水去,而不至于被打湿衣服,能轻快地航行,能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爱好。因此大多数商品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多方面用途的组合,确定价值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这样一个组合,而应当是商品的某方面的用途,所以克拉克不是以单位商品为基本价值单位,而是以商品所具有的属性为基本价值单位。

第二个差别是:在奥国学派和杰文斯那里,商品的价值由边际单位的效用商定。而在克拉克看来,商品的价值由其多方面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的总和来决定。克拉克认为,人们在收入增加时,典型的行为不是增加对同一种商品的消费,而是用性能更好质量更优的商品来代替性能较差质量较低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商品往往是只需要一单位而不需要第二单位的,如手表等,因此谈论边际单位是无意义的,无法用边际单位的效用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只能用该商品多种用途上的边际效用之和来决定其价值。

第三个区别是:在奥国学派和杰文斯那里,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价格则由交换双方的竞争决定,即由社会决定。而在克拉克看来,商品价值应当由社会来决定。因此,财富的分配情况也就成为影响商品价值的因素了。并且在克拉克看来,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没有区分的。

参阅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83 页,注(1)。

可以用下列图式 5-1-1 来说明克拉克的价值决定^①。

字母 A, B, C, D, E, F 分别表示效用顺次递减的六种不同商品或同一种商品的六种用途(或性能), 罗马数字 I, II, III, IV, V, VI 表示富裕程度顺次递减的各级买主, 阿拉伯数字表示具有六种性能的商品的某种性能或只具有该性能的某种商品对某一级买主的效用, 或该买主对该性能所愿支付的最高价格, 如 100 表示第 I 级买主购买性能 A 所愿支付的最高价格(或 A 对于 I 的效用)。任何一行阿拉伯数字都表明 A, B, … 等性能对某一级买主递减的效用。任何一列(除最右边一列)阿拉伯数字则表明某一种性能对 I, II, … 各级买主具有递减的效用。最右边一列阿拉伯数字则分别表示各种性能对各级买主的总效用。

	A	B	C	D	E	F	$\Sigma U'$
I	100	90	80	70	60	50	450
II	90	80	70	60	50	40	390
III	80	70	60	50	40	30	330
IV	70	60	50	40	30	20	270
V	60	50	40	30	20	10	210
VI	50	40	30	20	10	5	155

图 5-1-1

现假设具有 A 性能的商品有 6 单位, 则其价格由边际买主 VI 的效用决定, 为 50; 具有 B 性能的商品有 5 单位, 其价格由边际买主 V 的效用决定, 为 60; ……具有 F 性能的商品有 1 单位, 其价格由边际买主 I 的效用决定, 为 100。在上述假设下, 从 A—F 这六种性能的市场价值都是 50, 于是对于同时具有这六种性能的商品的价值便等于 $50 \times 6 = 300$ 。当 I 购买这种同时具有六种性能的商品时, 得到的消费者的剩余为 $450 - 300 = 150$ 。

克拉克的上述价值决定理论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克拉克规律。克拉克和奥国学派同样是以基数效用论来说明商品的价值, 但克拉克规律显然更适合说明那种每单位都能同时满足消费者多方面欲望的商品的价值, 而奥国学派的价值理论则更适合说明那种每单位只能满足消费者一方面欲望的商品的价值。克拉克规律一直未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充分重视。但他那种分析商品性能的价值而非分析整件商品的价值做法, 在当代西方经济

^① 该图式及其说明取自 [苏]伊·戈·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 卷,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311—322 页, 有修改。

学家兰开斯特所提出的消费经济学的属性分析方法^①中,得到了再现。

四、动态分析初探

在完成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克拉克对经济的动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进行动态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假定只要静态标准不变,则无论实际状态初始对静态标准有多大偏离,最终都趋向标准。这说明他把静态均衡的稳定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他的动态分析大致含有三部分内容:(1)说明实际状况偏离静态标准的原因;(2)说明动态因素对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的影响;(3)用动态分析方法说明世界划分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原因。

在上述假定前提下,造成实际状况偏离静态标准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存在着各种阻力,使实际状况不能迅速逼近静态标准,但他认为这个原因不是主要的,故对阻力没有展开说明,但从他的全文来看,阻力主要是指妨碍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行业之间及区域之间)即妨碍自由竞争的各种因素。二是静态标准本身的变化。他认为这才是导致实际状况偏离静态标准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静态标准本身的变化速度快于实际状态向任何既定静态标准逼近的速度,才使得实际状况始终不能与静态标准达到一致。

克拉克认为静态标准的变化起源于五种动态因素:人口不断增长、资本不断增长,生产方法不断改良、产业不断集中、人们的欲望不断增长。他进一步考察了五种因素分别变化和同时变化对静态标准的不同影响。若其他因素不变,只是人口(或资本)增加了,由于这种增加通常总是带有局部性的,故一定会引起劳动力(或资本)发生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若其他因素不变,只是生产方法改良了,若这种改良只发生在个别部门,则该部门产品的标准价值将相对下降;若改良同时发生在各部门,则产品相对价值(标准意义上的)的变动将小得多。若其他因素不变,只是人们的欲望变化了,若这种变化只是对原有产品的质量性能方面的要求提高,则对原有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冲击不会太大;若这种变化是要用一种完全新的产品来满足一种新的欲望,则将对产业结构产生很大的扰乱作用。

克拉克还指出,实际状态向既定静态标准逼近所需要的时间,随两者的差别由哪种因素的变动引起而有很大不同。一般说来,新生产方法普及所需

^①关于消费理论中的属性分析方法,可参阅周泰然的《微观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参阅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1页。

^③参阅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1页。

要的时间较短,工人跨地区移动所需时间甚长。若前一种调整约需5年,后一种调整可能需50年。克拉克认为,实际生活中这五种动态因素往往同时变化,这就使它们对静态标准的影响往往互相抵消一些,使静态标准的变化不如个别因素单独变动时来得大。他进一步分析了五种动态因素同时变化以及实际状况向静态标准的调整,对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首先,生产方法的改良会提高工资的静态标准,但由于实际工资不会迅速调整到提高了的标准上去,这就造成企业家的利润。正是这种生产方法的改良和工资调整的滞后,构成企业家利润的源泉。而这种利润又是企业家进行改良的动机。由于改良连续出现,工资调整的滞后持续存在,就使得企业家利润始终存在,所以利润是经济动态的结果。同时,改良的连续出现也使得实际工资尾随持续提高的工资静态标准而不断提高。第二,由于在长期中,资本增长快于劳动增长,故在边际报酬递减率的作用下,利率相对于工资来说处于下降趋势中,但利息总额会增加。

克拉克对产业结构长期变动趋势的分析值得注意。为便于分析,他用图5-15表示一个经济社会的产业结构:¹⁾ A, B, C, …表示各种产品的初级产业或基础产业,如粮食生产、森林、金属矿产等。A', A'', A''', …表示加工程度逐渐深化的各部门。例如棉花生产、纺纱、织布、印染、服装等部门。B系列、C系列、……表示其他各种最终产品从原料生产到最后成品的各级部门。

A	B	C	…
A'	B'	C'	…
A''	B''	C''	…
⋮	⋮	⋮	⋮

图 5-15

克拉克认为,在动态因素的长期变动下,劳动和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流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基础部门(如A)向加工部门(如A')的流动,由初加工部门(如A')向深加工部门(如A'', …)的流动,这种流动是单向的,另一种是在加工程度差不多的各部门(如A''与B'', B''与C'')之间的平行流动,这种流动是双向的。他认为前一种流动是规则的,而后一种则是不规则的。前一种流动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基础产业部门与后续加工部门相比,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的改良速度较慢;二是人们对基础产业部门的产

¹⁾ 参阅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页,引用时有修改。

品的需求与后续加工部门的产品需求相比,只有较弱的伸缩性。他指出,若改良导致更多的原有产品和更新的产品,则劳动和资本会出现第一种流动。若改良只是节约劳动,并不导致旧产品的增多和新产品的出现,则资本和劳动将因上述第一个原因而由后续加工部门流向基础部门。即出现与第一种流动反向的流动。由此可知,克拉克实际上是用基础部门与后续加工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的相对差异以及两大部门产品的需求弹性的相对差异,来论证第一种流动的存在原因。

克拉克认为,要素的第二种流动,即在加工层次差不多的各部门之间的平行的来回流动,是由于这些部门改良的非同步性。当A"部门出现节约劳动和资本的改良时,要素便流向B"和C"。尔后若B"出现了节约劳动和资本改良,则要素又将从B"中流出。

克拉克认为,生产组织这一动态因素的变化,在长期中导致集中化的趋势,但这种集中化并不会破坏竞争局面,只是使竞争的方式发生变更。因此,他以竞争为前提所建立起来的静态和动态分析,将长期有效。

克拉克最后还运用其动态分析方法来说明世界上存在文明中心(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地区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于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受到阻碍。同时也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的改良速率在上述两个地区有差别。这就使文明中心出现一种相对于本地区而言的局部静态社会,他称之为准静态。准静态下的工资标准,包含着的一部分准利润,它们是由于文明中心与不发达的外界的界限而保留下来的,因此它们和企业家利润一样,都是由于动态过程中调整的滞后所造成的收入。但克拉克相信,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准静态终究要向全世界范围中的完全静态逼近。因此,不发达地区工人的工资最终会赶上文明中心的工资水平。

克拉克是西方经济学家中较早关心世界范围中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他把不发达现象看作是世界范围中的动态过程所导致的后果,是由于各种阻力妨碍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所导致的后果,这种阻力存在于实际状况向全世界意义上的静态标准接近的调整过程中。所以从长远看,他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态度虽然不会为今天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所接受,但他把不发达看作是动态过程中的现象,这还是一种可取的论点。

总的看来,克拉克的动态分析不如他的静态分析那么成熟,但其中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有待于发展的思想萌芽。

第二节 欧文·费雪的经济理论

欧文·费雪^① (Irving Fisher, 1867—1947) 生于美国纽约州。1891、1898 年分别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士和哲学博士。1892—1895 年为数学教师, 1895—1935 年为经济学教授, 1926—1947 年曾在雷明顿·兰德公司任职。他在价值理论、资本理论、货币理论及统计学方面, 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 他还投身于各种活动, 发明了便于查阅的卡片索引系统, 参加了世界和平运动、禁酒运动、预防医学及优生学等活动, 其主要论著有:《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数理研究》(1892 年),《资本和收入的性质》(1906 年),《利息率》(1907 年),《货币的购买力》(1911 年),《经济学基本原理》(1912 年),《稳定美元》(1920 年),《指数的制定》(1922 年),《货币幻觉》(1928 年),《利息理论》(1930 年, 有中译本),《繁荣和萧条》(1932 年),《通货膨胀》(1933 年)。本节简介其价值理论、利息理论及货币数量论。

一、价值理论

费雪的价值理论发表于 1892 年出版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数理研究》一书中。他是继瓦尔拉斯之后, 较早运用一般均衡方法研究价值决定问题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一般均衡理论包括四套方程组^②。首先是供求平衡方程组:

$$\begin{aligned} & D_{a,1} + D_{a,2} + D_{a,3} + \cdots + D_{a,n} = A \\ (1) \quad & D_{b,1} + D_{b,2} + D_{b,3} + \cdots + D_{b,n} = B \\ & D_{c,1} + D_{c,2} + D_{c,3} + \cdots + D_{c,n} = C \\ & \dots\dots \\ & D_{m,1} + D_{m,2} + D_{m,3} + \cdots + D_{m,n} = M \end{aligned}$$

式中 A, B, C, \dots, M 为 M 种商品各自的总量, 假定为常数; $D_{a,1}, D_{a,2}, \dots, D_{a,n}$, 分别为第一人、第二人、……第 n 人各自对 A 商品的需求量, $D_{b,1},$

① 欧文·费雪在陈彪如先生所译《利息理论》中, 译为菲歇尔。在宁嘉风先生所译《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中, 译为欧文·费希尔。在王梦奎先生等所译《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中, 译为伊尔文·费雪。

② 这四套方程组转引自[苏]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407—409 页, 转引时符号有变化。

$D_{b,2}, \dots, D_{b,n}$, 分别为各人对 B 商品的需求量, 以此类推。

收支平衡方程组:

$$\begin{aligned} D_{a,1}P_a + D_{b,1}P_b + D_{c,1}P_c + \dots + D_{m,1}P_m &= Y_1 \\ (2) \quad D_{a,2}P_a + D_{b,2}P_b + D_{c,2}P_c + \dots + D_{m,2}P_m &= Y_2 \\ D_{a,3}P_a + D_{b,3}P_b + D_{c,3}P_c + \dots + D_{m,3}P_m &= Y_3 \\ \dots\dots\dots \\ D_{a,n}P_a + D_{b,n}P_b + D_{c,n}P_c + \dots + D_{m,n}P_m &= Y_n \end{aligned}$$

式中 $Y_1, Y_2, Y_3, \dots, Y_n$ 为 n 个交易者各自的收入总量, 假定为常数; $P_a, P_b, P_c, \dots, P_m$ 分别为 m 种商品的价格。

边际效用方程组:

$$\begin{aligned} du_1/dD_{a,1} &= F(D_{a,1}); du_1/dD_{b,1} = F(D_{b,1}); \dots; du_1/dD_{m,1} \\ &= F(D_{m,1}) \\ (3) \quad du_2/dD_{a,2} &= F(D_{a,2}); du_2/dD_{b,2} = F(D_{b,2}); \dots; du_2/dD_{m,2} \\ &= F(D_{m,2}) \\ \dots\dots\dots \\ du_n/dD_{a,n} &= F(D_{a,n}); du_n/dD_{b,n} = F(D_{b,n}); \dots; du_n/dD_{m,n} \\ &= F(D_{m,n}) \end{aligned}$$

式中 u_1, u_2, \dots, u_n , 分别为 n 个交易者的总效用函数; $du/dD_{a,1}, \dots$, 分别为 n 个交易者对 m 种商品的边际效用, 它是总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 本身又是需求量的函数; $F(D_{a,1}), \dots$, 分别为 n 个交易者对 m 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函数, 假定为已知的。

满足最大化条件:

$$\begin{aligned} (1) \quad (du_1/dD_{a,1}) / (du_1/dD_{b,1}) / \dots / (du_1/dD_{m,1}) \\ = (du_2/dD_{a,2}) / (du_2/dD_{b,2}) / \dots / (du_2/dD_{m,2}) \\ = \dots = (du_n/dD_{a,n}) / (du_n/dD_{b,n}) \cdot \dots / (du_n/dD_{m,n}) \\ = P_a : P_b : P_c : \dots : P_m \end{aligned}$$

该条件可分解成 $n(m-1)$ 个方程方式。

上述四套方程组共有 $2mn+m$ 个方程式 (m 个供求平衡方程式、 n 个收支平衡方程式、 mn 个边际效用方程式以及 $n(m-1)$ 个满足最大化条件), 正好可用于求解 $2mn+m$ 个未知变量 (mn 个需求量、 mn 个边际效用值以及 m 个价格)。

值得指出的是, 费雪是在除了阅读杰文斯的著作之外未接触任何其他数理经济学家 (包括瓦尔拉斯) 的论著的情况下, 提出他的一般均衡的四套

方程式的。^① 因此,他的理论可以看成是对杰文斯著名的交换方程式的发展。杰文斯的交换方程式只涉及二人二商品间的交换均衡,而费雪则推广到 n 人 m 商品间交换的均衡。他的边际效用方程,正是杰文斯的最后满足程度理论,两者所用的数学表达方式也几乎完全一致。他的满足最大化条件,也正是杰文斯的交换方程式推广到 n 人 m 商品交换时的结果,区别只在于杰文斯认为与边际效用之比相等的是交易量之比,而他认为是价格之比。但这两个比例实质上是一回事。他的供求平衡方程与杰文斯的交换方程式有共同的前提:商品的总量既定。其实杰文斯的交换方程式也蕴含着同样的供求平衡方程(但只是两人两商品交换的情况中的),他把杰文斯蕴含着的这个供求平衡方程推广到了 n 人 m 商品的交换中。他的收支平衡方程则是一个创新。所以他对杰文斯理论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杰文斯交换方程式推广到 n 人 m 商品交换的情况中;二是提出了收支平衡方程组。

从形式上看,费雪的四套方程组与瓦尔拉斯的体系有不少差别,但他的体系与瓦尔拉斯多种商品交换时的均衡体系是同样的。首先,他的供求平衡方程组与瓦尔拉斯的供求平衡方程组实质上是一致的,尽管两者在供给的表达方式上有一定区别。其次,他的价格显然满足瓦尔拉斯的全面平衡方程组,即不允许存在套购机会。第三,他的边际效用函数的反函数,在他的满足最大化条件以及他的收支平衡方程组的约束下,便可转化为瓦尔拉斯的有效需求方程组。满足最大化条件决定了各种商品需求的相对比例,而收支平衡方程组则进一步决定了各种商品需求的绝对量。这一思想就是通过消费者均衡分析来推导出个别乃至全体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他以无差异曲线和现在人们所说的“预算线”(他称之为部分收入线)为工具分析了消费者均衡。^②

费雪体系与瓦尔拉斯体系的主要差别之一,是他明确地把各人的收入水平,各种商品的总量和每个人对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函数三者并列为决定均衡价格的参变量。而瓦尔拉斯只明确承认后两个因素的作用,至于收入水平对价格的影响,只是在证明商品持有量等值再分配定理时间接地隐含地提到。明确肯定各人收入水平(也就是肯定收入的分配状况)对价格的决定作用,是他的体系优于瓦尔拉斯体系的地方。另一个重要差别是他把边际效用值作为体系的未知变量,而瓦尔拉斯体系中,边际效用只是决定需求这

① 参阅[美]熊彼特《欧文·费希尔(1867—1947)》,该文载于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人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 参阅[匈]马迪亚斯《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二篇第二章。

一未知变量的因素之一,本身并不作为一个明显变量出现在体系之中。这是他的体系劣于瓦尔拉斯体系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他的价值理论必须解决一个瓦尔拉斯所不会面临的难题:边际效用值的测量。他对于这一难题的回答表现了他的两面性。^①一方面,他在任何一种或至少一种商品的效用只定于它自身的数量而和其他商品的数量无关这一前提下来说明效用的单位,研究测量的方法;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一商品的效用应看作是一切商品数量的函数,这接近后来的序数效用论。他的这种两面性表明他是从基数效用论向序数效用论转变的过渡人物。他和埃奇沃思一起,对于后来帕累托提出序数效用论具有重要影响。

二、利息理论

费雪首先定义了收入与资本。他把个人收入分作三种形态:享用收入(由满足的感觉或体验所构成)、实际收入(由带来满足的种种物品和服务组成,用生活费用来进行加总和衡量)、货币收入(个人用来支付生活费用所得到的货币)。由此可知,他的收入概念类似于今天西方经济学中的消费。他认为资本就其价值而言,是将来收入的贴现,或将来收入的资本化。他用图 5-2-1 表明了资本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即资本财货导致从现在起到未来的一系列收入流量,这一流量决定了收入的价值,而收入价值再反转来决定资本财货的价值。把收入和资本区分为流量和存量,这是他对西方经济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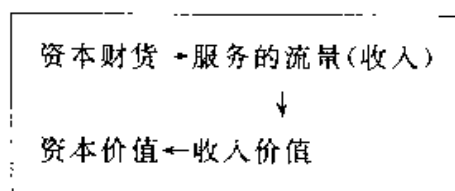


图 5-2-1

费雪倾向于对资本做最广义的理解,他认为一切能带来收入的东西都可以称作资本,这些东西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带来的收入流量的资本化。甚至人本身也可以称作资本,只要他能带来收入流量。与这种对资本概念的广义解释相对应,他反对把利息作为与地租、工资及利润并列的收入范畴,而认为利息作为广义资本的收入,包括了地租、工资和利润。

费雪把利率看作是联系收入与资本之间的桥梁,他认为资本的价值与

^① 参阅[美]熊彼特《欧文·费希尔(1867—1947)》,该文载于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利率呈反向运动,而与储蓄呈同向运动。他把利率定义为:“对某一日期货币所支付的贴水的百分率,这一贴水是以一年后货币来表示的。”^①因此,利率实质上是把各市场上的不同时点联系起来的一种价值。所以各种产品,只要其所提供的服务是跨时间的,则其价值便要受到利率的影响。跨越的时间越长,利率影响越大。同时任何生产要素,只要是运用于迂回生产的,其价格也要受到利率的影响,生产越是迂回,利率影响越大。“只要有时间的因素存在,便有利率的问题存在。利率是整个价格结构中之最为普遍的价格。”^②

费雪认为,作为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相交换时的价格,利率由两大因素决定,一是主观心理因素,即人性不耐或时间偏好(现在财货优于将来财货的边际偏好)。二是客观因素,即投资机会。

费雪认为,一个人的时间偏好主要由其收入川流的四大特征决定。这四大特征是:(1)流量的大小。(2)川流的时间形态,即收入是随时间而不变、递增、递减亦或波动。(3)川流量构成。即收入由那些实际项目(饮食、住所、娱乐和教育等)组成。(4)川流量的或然性,即风险大小或不确定的程度。他认为,在其他条件一定时,收入流量越小,时间偏好越强;其他条件一定时,递增的收入流量将提高时间偏好;其他条件一定时,当前的风险或不确定以及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风险或不确定,将提高时间偏好,而未来的风险或不确定将降低时间偏好。除了收入流量的四大特征之外,其他影响时间偏好的是下述个人因素:远见、自制、习惯、寿命预期、对后人的关怀以及习尚。这些个人因素中,导致时间偏好增强的是目光短浅、缺乏自制、乱花钱的习惯、预期寿命短或不确定、不关心后人以及盲目追随时尚。

费雪首先分析了不存在投资机会[即每个人只面临一条唯一的收入川流,无法通过变动资本(广义的)的使用方式来改变之,只能经由借贷改变之]时的利率决定,他称之为利息的第一近似理论。他假定:(1)每个人的收入川流在开始时是确定的固定的;(2)借贷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单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影响利率;(3)每个人可以自由进出借贷市场,并依据市场利率借贷任何数额;(4)个人只能通过借贷和资产的买卖来变更收入川流,即不存在投资机会,不能通过变动资本(广义)的使用方法来变更收入川流。在此四项假定下,每个人将依据初始的市场利率来决定自己的借贷行为,变更收入川流,以调整自己的时间偏好使之接近市场利率;由此造成整个借贷市场上的借贷总量,而市场利率将依据借贷总量之间的差额而调整。最终实现均

① [美]菲歇尔:《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

② [美]菲歇尔:《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页。

衡时,市场上所有人的时间偏好将相等并与均衡的市场利率相一致,同时借贷总量之间实现均衡。

费雪还用下述四套方程组来表达利息第一近似理论。第一套方程组是时间偏好方程组,共有 $n(m-1)$ 个:

$$f_1' = F_1'(c_1' + X_1', c_1'' + X_1'', \dots, c_1^{(m)} + X_1^{(m)})$$

$$f_2' = F_2'(c_2' + X_2', c_2'' + X_2'', \dots, c_2^{(m)} + X_2^{(m)})$$

.....

$$f_n' = F_n'(c_n' + X_n', c_n'' + X_n'', \dots, c_n^{(m)} + X_n^{(m)})$$

$$f_1'' = F_1''(c_1'' + X_1'', c_1''' + X_1''', \dots, c_1^{(m)} + X_1^{(m)})$$

$$f_2'' = F_2''(c_2'' + X_2'', c_2''' + X_2''', \dots, c_2^{(m)} + X_2^{(m)})$$

.....

$$f_n'' = F_n''(c_n'' + X_n'', c_n''' + X_n''', \dots, c_n^{(m)} + X_n^{(m)})$$

.....

式中 f_1', f_2', \dots, f_n' 分别为 n 个人的第一年收入与第二年收入相比较的时间偏好率, $f_1'', f_2'', \dots, f_n''$ 分别为 n 个人的第二年收入与第三年收入相比较的时间偏好率……; c_1', c_2', \dots, c_n' 分别为 n 个人第一年的初始收入, $c_1'', c_2'', \dots, c_n''$ 分别为 n 个人第二年的初始收入……; X_1', X_2', \dots, X_n' 分别为 n 个人第一年的借款(贷款)量, $X_1'', X_2'', \dots, X_n''$ 分别为 n 个人第二年的借款(贷款)量,……它们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也可以为零; $c_1' + X_1', c_2' + X_2', \dots, c_n' + X_n'$ 分别为 n 个人第一年的经过借贷调整后的收入, $c_1'' + X_1'', c_2'' + X_2'', \dots, c_n'' + X_n''$ 分别为 n 个人第二年的经借贷调整后的收入,……该套方程组表明时间偏好是收入川流的函数。

第二套方程组为时间偏好率均等方程组,共有 $n(m-1)$ 个:

$$i' = f_1' = f_2' \dots = f_n'$$

$$i'' = f_1'' = f_2'' \dots = f_n''$$

.....

$$i^{(m-1)} = f_1^{(m-1)} = f_2^{(m-1)} \dots = f_n^{(m-1)}$$

式中 $i', i'', \dots, i^{(m)}$ 分别为 m 年中各年的均衡利率。

第三套方程组是借贷平衡方程组,共有 m 个:

$$X_1' + X_2' + \dots + X_n' = 0$$

$$X_1'' + X_2'' + \dots + X_n'' = 0$$

.....

$$X_1^{(m)} + X_2^{(m)} + \dots + X_n^{(m)} = 0$$

该方程组表明每年的借贷额的代数和为零,即借贷平衡。

第四套方程组是借贷现值平衡方程组,共有 n 个:

$$\begin{aligned} X_1' + X_1''/(1+i') + \cdots + X_1^{(m)}/(1+i')(1+i'') \cdots (1+i'^{(m-1)}) &= 0 \\ X_2' + X_2''/(1+i') + \cdots + X_2^{(m)}/(1+i')(1+i'') \cdots (1+i'^{(m-1)}) &= 0 \\ \cdots \cdots \\ X_n' + X_n''/(1+i') + \cdots + X_n^{(m)}/(1+i')(1+i'') \cdots (1+i'^{(m-1)}) &= 0 \end{aligned}$$

式中 $X_1''/(1+i')$ 为第一人第 2 年借(贷)款额的贴现值,以此类推。该方程组表明每人在 m 年中的借贷额的现值的代数和为零。

四套方程共有 $2mn + m - n - 1$ 个方程式,但可化简为 $2mn + m - n - 1$ 个方程,方法是将第四组所有方程加总,由此可得第三组的第一个方程式:因此可将其略去。未知数正好也有 $2mn + m - n - 1$ 个(包括 $n(m-1)$ 个 f , mn 个 X , 以及 $m-1$ 个 i)。整个体系有确定解。

费雪进一步考虑存在投资机会时的利率决定,他称之为利息的第二近似理论,他把投资机会定义为投资者经由选择从一种收入川流移向另一种收入川流的机会。这种收入川流的转移与单纯的借贷(它也具有改变收入川流的作用)不同,它涉及投资者所拥有的要素的使用方法的变更,技术的变更。

当存在投资机会时,资本(广义)所有者将从许多不同的收入川流中选择一条依据既定利率其现值最大的收入川流,然后通过借贷来变更其时间形态。所有人的借贷行为将调整利率,利率的变化将引起所选择的收入川流的变化。如此不断地反复调整,最终实现均衡时,将满足下述条件:

所有人的时间偏好相等并与均衡的利率相一致;借贷总量均等;每个人所选择的收入川流按均衡利率计算,具有最大现值,即每个人所选择的收入川流的边际收获超过成本率(r)将相等并与均衡利率相一致。收入川流的边际收获超过成本率(r)是指该收入川流带来的边际效益与其机会成本的比例。它会由于投资数量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是随投资数量的增加而递减。上述这些条件可用下述六套方程组表示出来,第一套时间偏好方程组共有 $n(m-1)$ 个:

$$\begin{aligned} f_1' &= F_1'(Y_1' + X_1', Y_1'' + X_1'', \cdots, Y_1^{(m)} + X_1^{(m)}) \\ f_2' &= F_2'(Y_2' + X_2', Y_2'' + X_2'', \cdots, Y_2^{(m)} + X_2^{(m)}) \\ \cdots \cdots \\ f_n' &= F_n'(Y_n' + X_n', Y_n'' + X_n'', \cdots, Y_n^{(m)} + X_n^{(m)}) \\ f_1'' &= F_1''(Y_1'' + X_1'', Y_1''' + X_1''', \cdots, Y_1^{(m)} + X_1^{(m)}) \\ f_2'' &= F_2''(Y_2'' + X_2'', Y_2''' + X_2''', \cdots, Y_2^{(m)} + X_2^{(m)}) \\ \cdots \cdots \end{aligned}$$

$$f_n'' = F_n''(Y_n'' + X_n'', Y_n''' + X_n''', \dots, Y_n^{(m)} + X_n^{(m)})$$

.....

式中 $Y_1', Y_2', \dots, Y_n'; Y_1'', Y_2'', \dots, Y_n''; \dots, Y_1^{(M)}, Y_2^{(M)}, \dots, Y_n^{(M)}$ 分别为 n 个人第一年、第二年、.....第 m 年的初始收入,它们取决于投资者对收入川流的选择,不再是常量而是变量。其他符号照旧。该套方程表明时间偏好是收入川流的函数,而这些收入川流是投资者在众多投资机会中进行选择再由借贷加以调整的结果。

第二套是时间偏好率均等方程组,共有 $n(m-1)$ 个:

$$i' = f_1' = f_2' \dots = f_n'$$

$$i'' = f_1'' = f_2'' \dots = f_n''$$

.....

$$i^{(m-1)} = f_1^{(m-1)} = f_2^{(m-1)} \dots = f_n^{(m-1)}$$

第三套是借贷平衡方程组,共有 m 个:

$$X_1' + X_2' + \dots + X_n' = 0$$

$$X_1'' + X_2'' + \dots + X_n'' = 0$$

.....

$$X_1^{(m)} + X_2^{(m)} + \dots + X_n^{(m)} = 0$$

第四套是借贷现值平衡方程组,共有 n 个:

$$X_1' + X_1''/(1+i') + \dots + X_1^{(m)}/(1+i')(1+i'') \dots (1+i'^{(m-1)}) = 0$$

$$X_2' + X_2''/(1+i') + \dots + X_2^{(m)}/(1+i')(1+i'') \dots (1+i'^{(m-1)}) = 0$$

.....

$$X_n' + X_n''/(1+i') + \dots + X_n^{(m)}/(1+i')(1+i'') \dots (1+i'^{(m-1)}) = 0$$

第五套是投资机会方程组,共 n 个:

$$\Psi_1(Y_1', Y_1'', \dots, X_1^{(m)}) = 0$$

$$\Psi_2(Y_2', Y_2'', \dots, X_2^{(m)}) = 0$$

.....

$$\Psi_n(Y_n', Y_n'', \dots, X_n^{(m)}) = 0$$

它表明每个人的收入川流的变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即某一川流在某一年的流量若比另一川流同一年的流量要大,则前一川流必定在另外某些年中,其流量要小于后一川流。至于那些任一年的流量都小于其他某一川流的川流,是被排除于选择之外的。

第六套是表明收入川流的最优选择的方程组,共有 $n(m-1)$ 个:

$$i' = r_1' = r_2' = \dots = r_n'$$

$$i'' = r_1'' = r_2'' = \dots = r_n''$$

.....

$$i^{(m-1)} = r_1^{(m-1)} = r_2^{(m-1)} = \dots = r_n^{(m-1)}$$

式中 $r_1', r_2'', \dots, r_1^{(m-1)}$; $r_2', r_2'', r_2^{(m-1)}$; $r_n', r_n'', \dots, r_n^{(m-1)}$ 分别为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 n 个人在相继 m 年中各年的边际收益超过成本率。

上述六套方程共有方程 $3mn + m - n$ 个,未知数 $4mn + m - 2n - 1$ 个(包括 $n(m-1)$ 个 f , mn 个 x , $m-1$ 个 i , mn 个 Y , 以及 $n(m-1)$ 个 r)。从上述第三、四套方程组中可以减去一个方程,故独立的方程式共有 $3mn + m - n - 1$ 个。同时,任一个 r 都只不过是相邻两年的 Y 进行替代时的替代率,因此它们并不是独立的变量,可以从确定的 mn 个 Y 中推导出来,因此可以从 $4mn + m - 2n - 1$ 个变量中减去 $n(m-1)$ 个 r ,剩下 $3mn + m - n - 1$ 个未知量,与方程数恰好相等,故该体系有解。

最后,费雪考虑了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利率决定,他称之为利息的第二近似理论。当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时,每个人面临的各种收入川流都将带有或然性,而不是确定性,从而这些川流的边际收益超过成本率也将是不确定的,时间偏好率也将带有或然性。同时整个借贷由于呆账风险而未必一定平衡,个人在一个长时期中的借贷的现值的代数和也未必一定为零。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任一时点上的利率决定,是难以用数学方法加以说明的。他把风险和不确定性称作利率决定中的搅乱因素,并认为尽管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这类搅乱因素,但还是可以用他的第二近似理论说明实际生活中利率的基本倾向。

在众多的导致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中,费雪重点分析了发明发现对利率的影响以及起因于货币的物价变动对利率的影响。他认为发明与发现对利率的最初影响是促其升高,因为发明与发现所导致的投资机会会促使借款增加。但发明与发现对利率的最终影响是促其下降,因为收入川流在数量上增加了,这将减低时间偏好。

对于货币、物价对利率的影响,费雪花费了较多的篇幅进行考察。他首先是区分了货币利率(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就是由时间偏好和投资机会所决定的利率,而货币利率往往等于实际利率与币值变动率(一般物价水平变动率)之和。当币值变动率为零时,货币利率便等于实际利率。当币值变动时,货币利率才会与实际利率发生差异,除非币值变动被准确地预见,并在契约中加以考虑。但由于人们普遍存在货币错觉,币值变动不会很快被人们所觉察,所以币值变动在短期中难以影响货币利率。费雪还进一步

根据英美两国的统计资料,运用计量分析方法,考察了货币利率对币值水平和币值变动的依存关系,得到四点结论:(1)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利率一般有增高的倾向,物价水平下降时利率一般有降低的倾向。(2)货币利率变动往往落后于物价变动率,因而对两者进行同期的直接比较时,两者间的关系往往模糊不清。(3)货币利率与物价变动的滞后分布的加权平均值(权数依滞后期的延伸而递减,滞后期的长短依具体情况而言)高度相关。(4)物价水平高时货币利率也肯定地倾向于高,物价水平低时利率也肯定地倾向于低,同时也指出物价水平依货币利率的变动而反向变动的另一种因果关系,即人为压低(提高)货币利率将提高(下降)物价水平。他强调后一种因果关系发生在较短时期中,而较长时间中是前一种因果关系起支配作用。“在一定限度内,利率下跌可以而且往往几乎是促使物价即刻地上涨,商业活动即刻地增加。这种影响可以延续到好几个月,一直到上涨的物价又占取了优势,从而再度提高利率为止。”^①

费雪的利息理论,最初面世于1907年发表的《利息率》一书之中,尔后修订于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一书中。这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约翰·雷^②和庞巴维克乃至杰文斯的资本理论。费雪对时间偏好的分析,可以说几乎完全源自庞巴维克,但他在几个方面不同于庞巴维克:一是他把利息看作是一种与时间有关的广义资本的收入,利率是一种把不同时点联系起来的价格,不赞成把利息与工资、地租和利润并列起来;而庞巴维克则赞同后一种论点。二是他把利率看作是与其它有关变量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决定的。所以运用联立方程组来同时求解利率及其它有关变量;而庞巴维克显然不赞同这种相互作用说,倾向于用主观心理因素来作为利率的最终决定者。三是把投资机会或边际收益超过成本率作为客观因素,并列于时间偏好这一主观因素,两者共同决定利率;而庞巴维克则只承认时间偏好这一主观因素,而其他客观性的因素不是与时间偏好并列,而是通过时间偏好才对利率发生影响。四是他认为决定时间偏好的主要是收入川流的特征,而庞巴维克认为是另外三种原因。

费雪的利息理论,按他的本意,也是对瓦尔拉斯、帕累托一般均衡理论的补充。他认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解决了同一地区同一时间中的价

① [美]菲歇尔:《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7页。

② 约翰·雷(John Rae, 1796--1872),生于苏格兰,曾在加拿大、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任校长,主要论著是1834年出版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新原理》,其主要贡献是在几乎完全孤立的状态中成功地创造出使庞巴维克和其他人受益匪浅的资本理论。

格决定问题,但没有回答不同时间的同一货物之间交换的价格决定,而解决后一问题便是利息理论的目的。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利息利率的决定问题,一直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种是忽略时间因素来说明利率的决定,如维塞尔、瓦尔拉斯、克拉克、马歇尔等人,他们或者是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或者是用资本的供求平衡来说明利率的决定。另一种是强调时间因素来说明利率,把利率看作是经济活动需要在时间之流中进行的結果,如庞巴维克、费雪等人。但他们重视时间与后来凯恩斯及其后人重视时间因素又有区别,他们更侧重于确定性条件下的分析,因而总是把利率看作是资本现象而非货币现象;而凯恩斯则开始重视时间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把它看作是对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并以此为依据把利率看作是货币现象而非资本现象;而凯恩斯的学生之一罗宾逊夫人则干脆把时间看作是不确定性的代名词。总的看来,庞巴维克—费雪的传统比瓦尔拉斯—克拉克—马歇尔的传统更接近于凯恩斯,凯恩斯自己也认为他的资本边际效率与费雪的边际报酬超过成本率是很接近的。^①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费雪利息理论中最有价值的是他关于物价水平与利率之间关系的见解,这些见解以及他得到这些见解时所采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表明他不仅是计量经济学的先驱,同时也是现代货币主义关于这方面见解的先驱。^②其次,他虽然未能充分阐述风险对于利率的影响,但他对风险的重视,很可能启发了今天耶鲁大学的詹姆士·托宾,后者完成了费雪未完成的事业,建立了考虑风险因素的数理模型,说明利率等变量的决定。

三、货币数量论

费雪经济思想中对后人最有影响的当属他的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主要发表于1911年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之中。在该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式: $MV = PT$, M 为包括金属货币和纸币在内的货币数量, V 为每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速, T 为社会总交易量, P 为一般物价水平。

当考虑银行支票存款时,方程式变为: $MV + M'V' = PT$, M' 为支票存款量, V' 为支票存款的平均流速。费雪提出该方程式的目的,在于说明均衡状态下物价水平(货币的币值)的决定。同时他也指出,在尚未达到均衡的过

^① 参阅凯恩斯《通论》、熊彼特《欧文·费希尔》,载于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② 参阅M. 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任务》,载《美国经济评论》第8卷第1期,1968年3月。该文是弗里德曼就任美国经济学会第80届年会会长的演讲稿。

渡时期,并不能简单地运用该方程式来说明物价的决定。所以只有在均衡状态下,物价水平才正比于货币数量 $M+M'$,而在过渡时期,这种正比关系并不存在。因在过渡时期, M 的增加并非全部作用于 P ,而是会导致 M' 对 M 的比例趋大,且使 V 和 V' 增加,结果又进一步引起 T 的变动,而 P 是否相应增加以至与 M 同比例增加,取决于以上种种变动的结果。由此可知,不区分均衡时期和过渡时期,简单地依据费雪的交换方程式。认为 P 将与 M 做同比例变动,是不符合费雪的原意的,费雪还列举了除 M 外,通过影响 T 和 V 而影响 P 的诸因素: I. 影响 T 从而影响 P 的因素:(一)生产方面:(1)天然资源地区分布状况;(2)劳动分工状况;(3)技术知识;(4)资本积累。(二)消费方面:人类欲望的范围及其变动。(三)生产和消费的共同因素:(1)交通状况;(2)交易的自由程度;(3)货币银行制度;(4)商业信心。 II. 影响 V 从而影响 P 的因素:(一)个人习惯:(1)节俭与窖藏的习惯;(2)记账的习惯;(3)使用支票的习惯。(二)社会支付制度:(1)收支次数的多寡;(2)收支规律化的程度;(3)收支间距与金额的大小。(三)一般社会背景:(1)人口密度;(2)交通运输的快速程度。

第六章 马歇尔的综合经济理论体系

19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在其演进过程中发生了第二次综合。其内容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这次综合实际上是由两个人完成的,一个是英国的马歇尔,另一个是瑞典的威克塞尔。由于语言壁垒^①,后者体系的综合性历来被低估了,下一章将详尽说明威克塞尔体系的综合性质。本章则着重介绍马歇尔的思想体系。

第一节 马歇尔生活时代的英国

阿尔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年),出生于英国克拉彭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成为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甲级及格者,名列第二,随即成为研究生,打算研究分子物理学。1867年,他由开始关心物理学经由关心伦理学而最终转向献身于经济学。1863年,为研究康德哲学,他去了德国,在那里接触了历史学派罗雪尔的经济思想。同年回国,任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讲师。法德战争期间他再次去德国研究黑格尔哲学。1875年,他为了研究保护主义政策而去美国考察,此行给他以重大影响。1877—1882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负责人。1881年因病辞职赴意大利休养。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经济学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其主要论著有:《工业经济学》(1879年),与其夫人合著,《经济学原理》(1890年,有中译本),《工业与贸易》(1919年),《货币信用与商业》(1923年,有中译本)。

马歇尔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正是英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自由竞争逐步被私人垄断所取代。这一转变给他的经济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产生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即不

^① 威克塞尔的思想晚在20世纪30年代才被介绍给英语世界。像这种由于语言不同而导致的各国经济学家思想交流的困难,可称之为语言壁垒。

再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认为用竞争这个词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征是不恰当的,应当用“经济自由”来概括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对于竞争,他认为既要看到它促使人们保持活力和自主精神而有益于社会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破坏性;对于经济自由,他也同样认为,既要看到自由企业制度对英国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也要看到它被那些缺乏教养的商人滥用而导致的罪恶现象。因此他认为应当由政府对于自由企业制度进行一定的干预,以增加自由企业制度好的影响并减少它坏的影响。他并且提出这种干预是需要由经济学家进行研究的实际问题。^[1]由此可知,虽然马歇尔把自由竞争作为自己理论分析的前提,但并不反对由政府进行一定的干预。

马歇尔从事学术活动时期的英国,一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贫富不均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英国工业的发达以及废除谷物条例之后廉价农产品的大量输入,英国穷人的生活比产业革命前还是有所提高,比其他一些落后国家也要好。这种状况也同样给马歇尔的经济思想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由凯恩斯为他所写的传记可知,^[2]他曾经利用假期访问数个城市的贫民区,了解社会上穷人的生活状况。正是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心,出于对工人阶级何以无法有更好生活条件的疑问,他才转向研究经济学,并使他把“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当作经济学应予最大关心的问题,^[3]把财富的分配不均看作是英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缺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大部分技术工人已经不再属于下等阶级,其中有些人所过的生活已经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人所过的生活更美好。在上述这种思想状态下,他提出渐进的改良主义。他的改良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宣扬劳资合作,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如同纺纱工和织布工之间的合作一样重要。二是主张在保持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进行谨慎的改良,反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他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是认为公有制会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精神,从而阻碍经济进步,而这又是因为不可能使全体人民养成并长期保持利他主义的习惯。如若不然,公有制是会比私有制更高级的。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这种态度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他由于热心肠而愉快地同情社会主义理想,又由于有冷静的头脑而悠然自得地驳倒社会主义者。”^[4]

[1] 参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0页。

[2] 参阅J.M.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页。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4] 熊彼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载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5页。

第二节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规律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和人,是研究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力和阻力,^①但这些动力和阻力的强度必须是能够以货币衡量的。他认为货币一般购买力、物质财富,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并非因为它们是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而是因为它们是用来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

在马歇尔看来,经济规律的存在是毋须说明的,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规律的性质。他认为经济规律相当于较为复杂和较不精确的自然科学的规律,它表达的不是各种现象之间带有必然性的确切的数量关系,而是带有概率性质的大致趋向。

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在马歇尔的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特征有三点:连续原理、边际分析、局部均衡分析。^②马歇尔从生物学和数学得到启示:“‘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③他强调自己学说的特点是“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④。该原理的含义是说在经济现象中难以划出非此即彼的界限,任何不同的经济现象之间都存在连续的关系。例如他认为在正常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对一定时间而言的正常价值,对更长时间来说不过是市场价值。地租和利息的区别,同样应视时间长短而定,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新投资与旧投资,也是同样。在算作资本和不算作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也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他还把连续原理运用到经济学说史的发展上,认为“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

① 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

② 参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页。

④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

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¹。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课题之间也贯穿着连续原理,例如分配问题和交换问题便不能截然分开,可以用供求平衡的一般原理来说明这两者。马歇尔承认,他关于发展的连续性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观点,从实质上讲是受到生物学、历史和哲学的影响,而在形式上则是受到数学的影响。

综上所述,马歇尔把连续原理用于两类现象上:一类是与发展变化有关的现象,如经济思想的变化,经济制度的变化等等,对这类现象来说,连续原理意味着变化过程不存在突变和飞跃。另一类现象是指同时并存的各种现象,如资本和非资本、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利息和地租等等。对这类现象来说,连续原理意味着它们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在他的体系中,连续原理导致三个主要成果:(1)使他看到经济学各领域中分析方法的统一性,从而把边际分析方法贯穿到各领域的分析中。(2)使他把交换理论和分配理论统一在供求均衡论的基础上,不像在古典学派那里分别受不同原理所支配,从而使他的体系具有逻辑上统一简洁的美感。(3)使他把边际主义与古典学派在价值论分配论方面的观点进行了综合,从而使得古典经济学好像变成了边际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便使得古典经济学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直到很久之后,人们才重新发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如人口变动、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等,在马歇尔的综合中被排斥或不再占据重要地位了。而在这些方面,古典经济学具有比马歇尔综合体系更丰富的内涵。

对连续原理的笃信,微分学在研究连续变量中的重要作用,再加上古诺和杜能的影响,使马歇尔深信对于经济学来说,增量是比总量更重要的概念,从而引起他对边际增量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他大大拓宽了边际分析方法的使用范围,把早期边际效用论者仅仅用于分析需求和效用的方法,用于经济学各种领域的分析之中。他不但运用这个方法分析欲望、效用和需求,还分析成本、收益和供给,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商品的价值;而且还运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从而使他成为边际生产力论的发明者之一。在边际生产力论的基础上,他不仅解决了收入分配问题,也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各类资本的配置问题以及诸生产要素配合时的替代问题。

边际分析方法的广泛使用,是马歇尔在方法上区别于早期边际主义者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对西方经济学以后的发展极有影响,影响到经济学的方法甚至内容。边际分析在本质上是微分学在经济学中的表现,而微分学又与数学中的古典优化理论联系密切,所以边际分析便在以后的发展中

¹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页。

演化成优化分析,许多经济问题最终被归结为寻求不同场合下的极值问题。而边际—优化分析方法所取得的成功,又使得经济学中那些可以运用此种方法的内容扩展起来,而难以运用此种方法的其他内容逐渐萎缩,使经济学从一门涉及制度变动,资源增减,交换价值,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内容的学科演变为既定制度,既定资源条件下合理配置资源的学科,它以牺牲研究领域的广阔为代价换来了对某部分内容研究的深入。

局部均衡分析,是马歇尔研究方法的第二大特征。均衡概念是从力学中吸收过来的,表明各种方向相反的力互相抵消时的一种状态。他的均衡状态则是表达各种相反的经济力量相互抵消时的状态,也就是古典学派所说的正常状态自然状态,只是古典学派未用“均衡”这一字眼来表达之,所以注重分析均衡状态并非马歇尔方法上的创新。古典学派也注重分析均衡状态,只是对于构成均衡状态的经济力量的分析,马歇尔与古典学派有所不同。马歇尔侧重从供求两个方面来说明均衡状态,而古典学派侧重从资本在各种产品生产之间自由流动的停止来说明市场均衡状态。马歇尔对于均衡分析方法所增加的新东西,主要不在于提出“均衡”这一名词(当然这也是他的贡献之一),而在于提出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他之所以要提出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特征何在,最好是以他本人的话来阐明之:“我们要研究的力量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作出若干局部的解答,以辅助我们主要的研究。……我们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1] 由此可知,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分析复杂的经济现象的一种近似方法。这一方法实际上一直为古典学派甚至除洛桑学派之外的边际主义者所不自觉地使用着,只是马歇尔明确指出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和合理性。正因为如此,他才能非常熟练地运用这一方法,同时又不至于掉入这一方法所造成的陷阱。能够指出自己分析方法的局部性质,这正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一般均衡方法的存在,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经济学原理》的正文可以说明,它的附录更足以证明马歇尔完全掌握了一般均衡观念。”^[2] 只是他没有把一般均衡方法作为自己的分析方法。

虽然以局部均衡作为主要分析方法,但马歇尔的分析绝不仅仅是静态的,而是以静态分析为基础,大量地涉及动态成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2] 熊彼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载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1页。

书”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¹。他体系中的动态成分主要表现于以下三点:一是引进短期、长期这一对概念,比较了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的区别,分析了引起短期均衡向长期均衡变动的因素。二是分析了各种生产要素数量(有时还有质量)的变化趋势,尤其是产业组织这一要素的变化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影响。而这方面的变化在他看来是会改变供给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从而最终引起均衡状态的变更的。三是分析了经济进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按照克拉克关于动态分析的分类,马歇尔的动态分析主要侧重于不同均衡状态之间的比较分析,以及旧均衡向新均衡过渡的原因分析,较少涉及失衡向均衡的趋近过程。

第三节 对需求的分析

一、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到市场需求规律

对需求的分析,是马歇尔体系的基础之一。他的需求分析是建立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多种多样的,但每一特别的欲望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当时间足够短以至消费者在性格和爱好上不发生变化,则“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²。他进一步把上述结论推广到货币身上,其结论是“一个人越是富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就越小”³。

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基础,马歇尔展开了对需求的分析。他首先分析个别消费者的需求,提出了需求价格的概念。它是消费者在货币购买力和拥有的货币量既定时,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愿支付的最高价格,它由这一定量商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

由于商品的边际效用随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所以“一个人所有的一物的数量越大,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就是货币购买力和在他支配下的货币数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十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2—113页。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5页。

量不变),则他对此物稍多一点所愿付的价格就越小;换句话说,他对此物的边际需求价格是递减的¹⁾。这种情况便是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这一规律表明了需求价格对于商品数量的依存关系。

但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又反映了一个人在其货币拥有量及货币购买力一定时,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与各种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依存关系,这一依存关系可以看作是前面那种依存关系的逆函数。表达后一种依存关系的表便称作个人需求表。表达后一种依存关系的曲线便称作个人需求曲线。而只要把个人需求表或个人需求曲线进行加总,便可得到市场需求表或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曲线可以用图 6-3-1 表示之;其中 DD 线便是市场需求曲线,它表达了一个普遍的市场需求规律:“需要的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大,并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减少”²⁾。这表明市场需求是价格的递减函数。

上述需求规律,实际上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已经存在,只是没有如此明确地表达出来。所以马歇尔的新贡献不在于提出需求规律,而是在于以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为中介,把市场需求规律建立在无数个人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这就把古典学派的市场需求理论与边际效用论结合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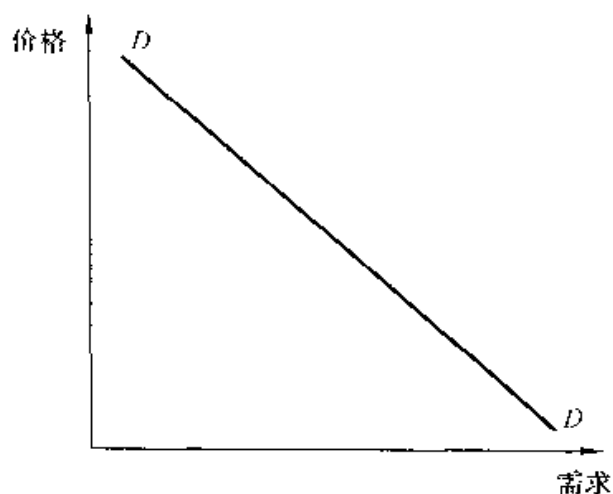


图 6-3-1

通过对货币的边际效用的分析,马歇尔进一步认为需求还受到货币拥有量的支配。当一个人的货币拥有量(作为资财的代表)增加时,由于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他对任何一定的利益所愿支付的需求价格就随之增加,即他对既定市场价格下的商品的需求会增加。当进入市场的大多数人都增加了货币拥有量时,图 6-3-1 中的 DD 曲线就会相应右移。这表明古典学派理论中已经涉及的关于收入或财产变化对需求的影响,被马歇尔用货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加以说明了。除了价格和资财这两个因素外,他还简略提出了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风尚、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14 页。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19 页。

代用品价格,等。

综合来看,马歇尔实际上是把市场需求看成是价格、资财、风尚、替代品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函数。价格及资财对于需求的影响是以商品本身的边际效用递减律和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律为基础的。所以,马歇尔是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市场需求理论的。但与奥国学派及杰文斯相比,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那么直接了,而是通过一些中介环节;而且把商品的边际效用和货币的边际效用作为并列的因素来解释市场需求,不像奥国学派及杰文斯那样只考虑商品本身的边际效用。

二、需求弹性

马歇尔用需求弹性这个概念表明需求量对 market 价格的变动作出反应的程 度。需求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表明了弹性的强度。当比 值小于 1 时,谓之需求弹性小;当比值等于 1 时,谓之需求弹性为 1;比值大 于 1 时,谓之弹性大。他还利用图 6-3-2 指出了在需求曲线上求某一点的弹 性的方法:如 P 点的需求弹性便等于 $MI:MO$ 或 $PT:Pt$ 。

马歇尔进一步列举了影响需求弹性的诸因素,主要有:A. 消费品的性 质,一般说来,用途单一的绝对必需品(如食盐)的弹性很小,而有多种用途 的商品(如水)的弹性往往很大。B. 价格水平,同一种商品在不同的价格水 平上有不同的弹性。随着价格的低落,需求弹性将逐步下降。C. 消费者的收 入水平,工人、中等阶级以及富人,他们对同一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往往是不 一样的。

弹性这一概念,后来成为 马歇尔体系中最富有活力的一个 概念。由此引申出各种各样的 弹性,成为经济分析的有力 工具。需求弹性的初步概念,在 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 原理》一书中已经出现,但从传 记材料来看,马歇尔显然是 独立发现这一概念的,并且也 正是他把这一概念放在重要的 地位,并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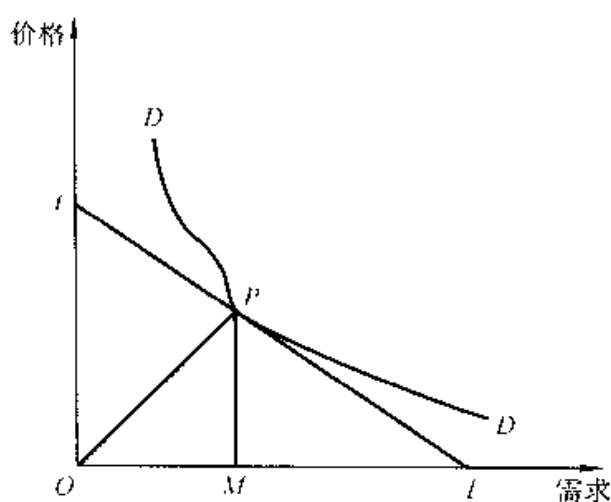


图 6 3 2

① 参阅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84 页。

而使这一概念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

三、消费者选择行为与消费者剩余

马歇尔还以边际效用为基础分析了三个问题：一是一种物品在不同用途上的选择；二是一种物品在现在使用与将来使用之间的选择；三是消费者剩余。前两个问题涉及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在这两个问题上，他基本上是重复了戈森第二定律以及奥国学派的见解。但消费者剩余却是他独创的概念。消费者在购买一定量商品时，支出的总费用等于价格与商品量之积。而这个价格在他看来等于商品的边际单位的效用。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边际单位之前的各单位商品的效用要高于边际单位的效用，所以他对边际单位之前的各单位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也将高于边际单位的价格。这样，为了得到这一定量的商品，消费者所支出的总费用便低于他为了得到这些商品而愿意支出的最高费用。二者之差便是消费者剩余。它表明消费者在购买中获得的额外利益，可以用图 6-3-3 表示消费者剩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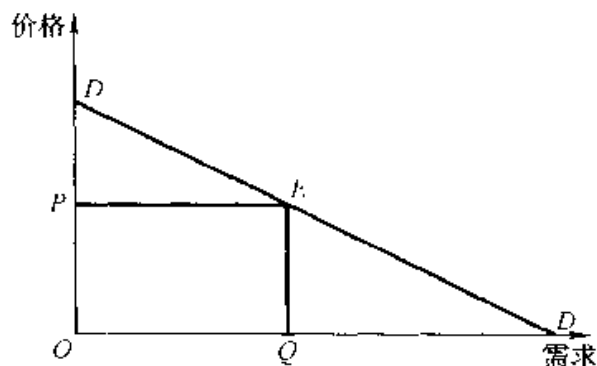


图 6-3-3

其中面积 $PEQO$ 表示消费者为购买 QO 量的商品所实际支出的总费用，面积 $DEQO$ 表示消费者为得到 QO 量商品所愿意支出的最高费用，两者之差为面积 DEP ，便是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又可看作是消费者从某商品 (A) 一定量中所获得的总效用 (U_A) 与所支付的总费用 (C_A) 之间的差额，设需求价格 (P_A) 为需求量 (Q_A) 的函数： $P_A = f_A(Q_A)$ ，则该商品 (A) 总效用 (U_A) 可由下式求得：

$$U_A = \int_0^a f_A(Q_A) dQ_A \quad \text{其中 } a \text{ 为需求量}$$

该商品 (A) 总费用 (C_A) 可由下式得出：

$$C_A = P_A \times a$$

则该商品的消费者剩余便等于

$$U_A = C_A - \int_0^a f_A(Q_A) dQ_A = P_A \times a$$

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在后来的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

马歇尔还给出了一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通过消费各种商品所获得的总效用(U)函数:

$$U = \sum_{i=1}^n U_A = \sum_{i=1}^n \int_0^a f_A(Q_A) dQ_A$$

他承认,由于该函数形式假定总效用由各商品效用加总而成,没有考虑各商品间的替代和补充,即没有考虑其他商品的数量对某种商品效用的影响,故这一函数缺乏实用价值。虽然如此,它仍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建立总效用函数的初步尝试。对总效用函数以后的发展来说,马歇尔的贡献不在于给出了上述形式的总效用函数,而在于指出了上述形式的总效用函数的缺点。

第四节 对供给的分析

一、生产四要素与报酬变动的三种情况

在对供给的分析中,马歇尔首先对决定产品供给的生产要素进行了分类,并研究了各类要素的变化对产品供给的影响。

马歇尔认为,生产要素共有四类:除了以往人们多次提出过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外,还有一类,他称之为工业组织。关于土地,他着重论述了土地报酬递减律的含义和作用。关于劳动要素,他认为劳动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加以及移民,并肯定马尔萨斯人口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过低估计了生活资料对人口增加的承受能力。他还强调了劳动要素的质量,认为使劳动者保持精神和身体上的健康状态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认为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有重要作用。国家应当舍得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关于资本要素,他认为资本的供给来自储蓄。储蓄是消费或享乐延期,而利息则是延期享受所牺牲的报酬,他不赞成把利息看作是忍欲的报酬,而强调它是等待的报酬。关于工业组织,他认为它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分工、机器的改良、有关产业的相对集中、大规模生产以及企业管理。

马歇尔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这一对概念,来说明第四类要素的变化何以能导致产量的增加。所谓内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内部的各种因素(如劳动者工作热情、工作技能的提高、内部分工协作的发展完善、先进设备的采用、管理水平的提高及管理费用的减少,等等)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节

约。所谓外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因素(如企业离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远近、市场容量的大小、运输通讯的便利程度、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水平等)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

马歇尔把四种生产要素的变化对产品供给的影响概括为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这两种基本情况。他指出:“概括地说,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①这是因为自然资源数量有限,若自然在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在数量上无法增加,或必须以日益昂贵的方式增加,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和资本又在几乎不变的工业组织下不断增加,则将出现报酬递减倾向,产品的边际生产费用将增加。然而,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会引起工业组织的改进,从而提高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这将导致报酬递增倾向,产品的边际生产费用将下降。

马歇尔提出,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这两种倾向,是不断地互相压制的。当二者的作用相互抵消时,便出现报酬不变的情况。他谈到,农业部门是报酬递减倾向占上风,非农业部门则往往出现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增,而大多数原料费用无足轻重的工业部门中,报酬递增倾向占主导地位。

马歇尔进一步指出:“报酬递增的趋势在短期内一般是不存在的。”^②因此,在短期中,在任何一种生产部门,都存在一个关于产量的边际水平:“在那边际之内,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都是有利的;但是超过了这个边际,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有增加,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除非需要有增加,同时要与某一生产要素合用的其他生产要素随着也有适当的增加。……这个关于边际的概念不是一律的和绝对的;它是随着所研究的问题的条件而变化的,特别是随着与它有关的时间之长短而变化”^③。这就是说,由于短期中工业组织这一要素往往保持不变,所以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将出现报酬递减,而在长期中由于工业组织的改进会使产量的边际水平(将出现报酬递减的临界水平)不断增大,从而出现报酬递增。

由于一个行业往往同时存在许多企业,有的趋向兴盛,有的趋向衰退,有的趋向稳定。因此,为了分析报酬变动对于产品的边际生产费用的影响,马歇尔提出了代表性厂商这一概念。它是指“能正常地获得属于一定的总生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8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6页。

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产量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¹⁾的企业。这个代表性厂商可作为一个行业的缩影,对它来说(从而也就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产量增加所引起的边际生产费用可能会有三种变化情况:(1)费用递减(报酬递增),即随产量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边际生产费用逐步减少。(2)费用递增(报酬递减),即随产量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边际生产费用逐步增加。(3)费用不变(报酬不变),即随产量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边际生产费用不变。

二、供给价格、供给曲线

一种商品的供给价格是代表性厂商在提供一定数量的商品时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它由这一定量商品的边际生产费用所决定。马歇尔提出了两个关于生产费用的概念:实际生产费用和货币生产费用。他的实际生产费用由“直接或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各种不同的劳作,和节欲或储蓄商品生产中所用资本所需要的等待”相加而成,即由“劳作和牺牲”组成。²⁾他的货币生产费用则由“对这些劳作和牺牲所必须付出的货币额”组成³⁾。在一定时间里,对应于同种商品的不同商品量,有不同的供给价格,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表达这种函数关系的表称作供给表,表达这种关系的曲线称作供给曲线。

由于供给价格取决于边际生产费用,而边际生产费用如前所述,在产量变动时会有三种变化,分别以(图 6-4-1 的(a)、(b)、(c)示之。图中的三条 ss 线分别是报酬递减(费用递增)、报酬不变(费用不变)和报酬递增(费用递减)三种情况下的供给曲线。它们表明,在报酬递减(不变或递增)的情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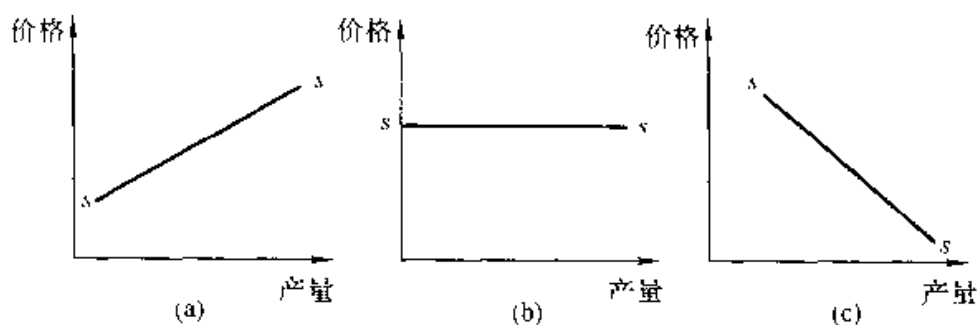


图 6-4-1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7页。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页。

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页。

随着产量的增加,代表性厂商的供给价格将上升(不变或下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们表明,为使代表性厂商提高产量,在报酬递减情况下,市场价格必须提高;在报酬不变情况下,市场价格可以不变但不能降低;在报酬递增情况下,市场价格可以下降。

三、供给弹性

马歇尔用供给弹性这个概念表明供给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作出反应的程
度,它的强度由供给变动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百分比的值确定。他指出,在
使用供给弹性这一概念时,必须注意它与需求弹性的差别。首先,需求对价
格变动作出反应的速度一般说来比较快,同时需求弹性一般不会因时间的
长短而有不同。但供给就有所不同,因为供给的变动要涉及生产规模的变
化,所以供给对价格变动作出反应所需要的时间间隔,取决于生产规模作出
变动所需要的时间。马歇尔指出了两种极端的情况:那些需要大型设备而原
有设备已充分开工的工业部门,生产规模扩大所需时间较长;而那些工具简
单的手工制品,生产规模可迅速变化。在生产规模无法作出相应变动的短时
间里,供给弹性的大小要视产品的储备及卖主对市场价格进一步走向的预
期而定。在生产规模可以作出相应变动的长时期中,供给弹性的大小还需视
产品属于哪种报酬倾向而定。他指出:“遵守报酬递加甚或报酬不变规律的
那种商品的供给弹性,对长期来说在理论上是无限大的。”^①综上所述,产品
的供给弹性将依时间的长短、报酬倾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五节 均衡价格

一、稳定均衡、非稳定均衡

马歇尔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来考虑均衡价格的决定的,并且分别按照
报酬递减、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增三种情况来考虑均衡价格的确定。他认为,
均衡价格就是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时的价格,或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时
的价格。三种报酬情况下均衡价格的确定可用下面图 6-5-1 中的四个图表
示出来。

图 6-5-1 中横轴都为供求量,纵轴都为价格。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3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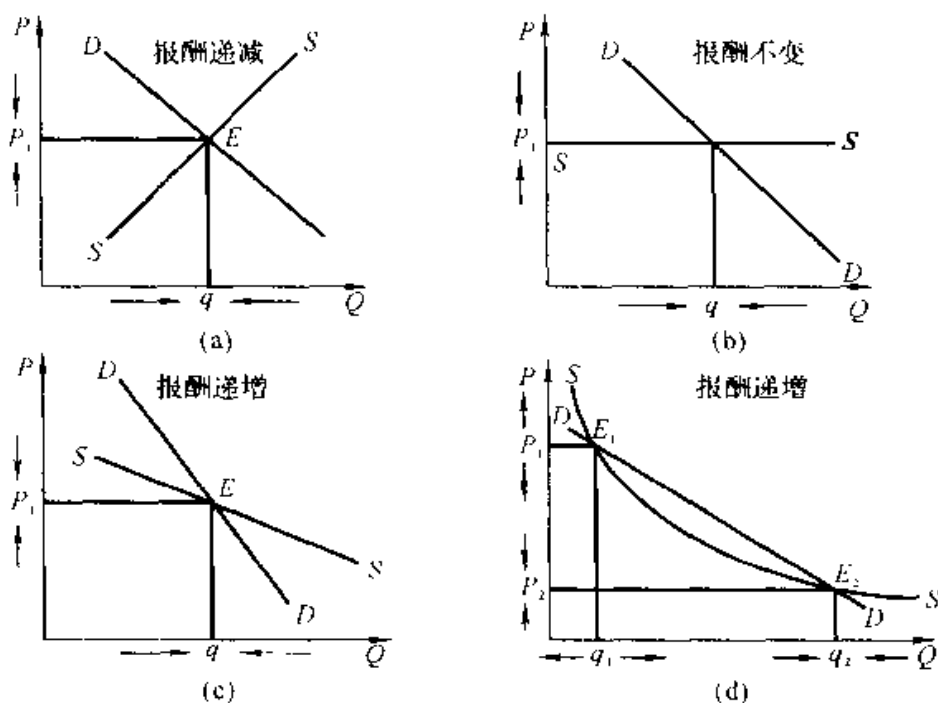


图 6-5-1

点 E 为均衡点,其对应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对应的供求量为均衡供求量。(a)、(b)、(c)三图各有一个均衡点,(d)图则有两个: E_1 、 E_2 。马歇尔认为,(a)、(b)、(c)三图中的 E 及(d)图中的 E_2 所对应均衡都是稳定均衡,即如果出现对它的偏离。无论是价格的偏离还是供给量的偏离,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由于供求双方追求自身利益,故会产生一种自发运动,使偏离趋于消失;而(d)图中的 E_1 则是一种不稳定均衡,即一旦出现对它的偏离,则偏离会越来越大。

马歇尔认为,稳定的均衡价格便是古典学派所说的正常价格,它为市场价格的摆动提供了一个环绕的轴心。

二、因时间长短而异的四种均衡

马歇尔在分析均衡价格或古典学派所说的正常价格时,强调了时间因素,认为随时间的长短不同,均衡价格也将不同。他把均衡价格分成三种类型:(1)暂时均衡价格;(2)短期均衡价格;(3)长期均衡价格。最后还有一种处于长久性运动中的正常价格。

所谓暂时,是指时间如此短暂,以致无法变动供给量,所以供给曲线为一垂直线,于是均衡价格主要取决于需求,需求增减则均衡价格也相应增减,而与生产费用无关。对此可用图 6-5-2 示之。

所谓短期,是指在这段时间里无法通过增加生产设备、改进生产技术和

工业组织来改变产量；但设备利用率、工人人数和工作时间可以变动，从而使产量可以在一定范围中变动。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形成的均衡就叫做短期均衡。

所谓长期，是指在这段时间里一切生产要素都可适应需求的变动而在数量和性质上发生变动，从而引起供给量的变动。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形成的均衡就叫做长期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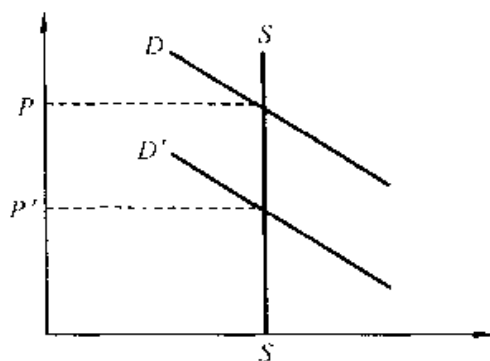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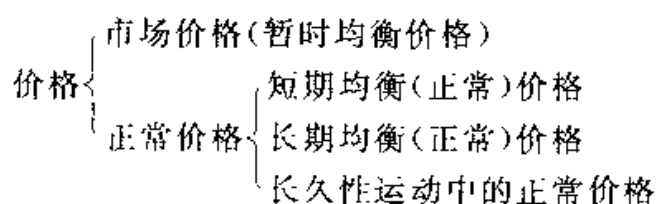


图 6-5-2

马歇尔认为，短期与长期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差别是供给价格的内涵不一样。他把产品的总生产费用分成直接生产费用和补充生产费用，直接生产费用一般是指工资、原材料消耗等；补充生产费用包括设备厂房的折旧维修费、高级职员的薪水等等。短期中，供给价格不能低于直接生产费用，但可低于全部生产费用。这就是说，短期中只要价格可以抵补直接生产费用，则相应的产量便会被供应出来。而在长期中，供给价格要取决于除地租外的一切生产费用（包括直接生产费用和补充生产费用），以致包括资本利息和正常利润。

所谓长久性运动中的正常价格，是指“一个世代到一个世代知识、人口和资本的逐渐增长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变化”^①的结果，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均衡价格在动态过程中的变化途径。而前三种均衡则都带有静态性质。

下表表明了马歇尔四种价格的分类：



三、价值由需求和生产成本共同决定

马歇尔认为，价值由需求和生产成本共同决定。他说：“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用所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和讨论一张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由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②但对应于所考虑的时间的长短不同，需求和生产成本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他的结论是：“就一般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8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0页。

而论我们所考虑的时期愈短,我们就愈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时期愈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将愈加重要。因为生产成本变动对于价值的影响与需求变动的影晌比较起来,一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①因此,在暂时均衡中,价值就可以看成是单独由需求决定,而“商品的价值在长时期内有等于它的生产成本的趋势”^②。另外,在报酬不变场合,只要在时间允许产量相应于需求作出调整的范围中,价值也都可以看成是单独由生产成本所决定。

四、产量调节:均衡的动态分析(1)

马歇尔并不以上述静态均衡分析为满足,而是深入进行动态的均衡分析。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失衡走向稳定均衡的调节机制;二是关于均衡的移动。

马歇尔认为市场从失衡向稳定均衡的恢复是通过产量的调整进行的。他假定初始有一个既定的产量水平,若该产量的需求价格高于(低于或等于)供给价格(即初始产量小于(大于或等于)均衡水平,将刺激厂商增加(减少或不变动)产量水平,从而使均衡得以实现(保持)。这种调节机制与瓦尔拉斯体系中把价格调节作为恢复均衡的机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报酬递减和报酬不变的场合不会造成不同的动态变化,但在报酬递增的场合却会导致不同的动态变化。这可以下图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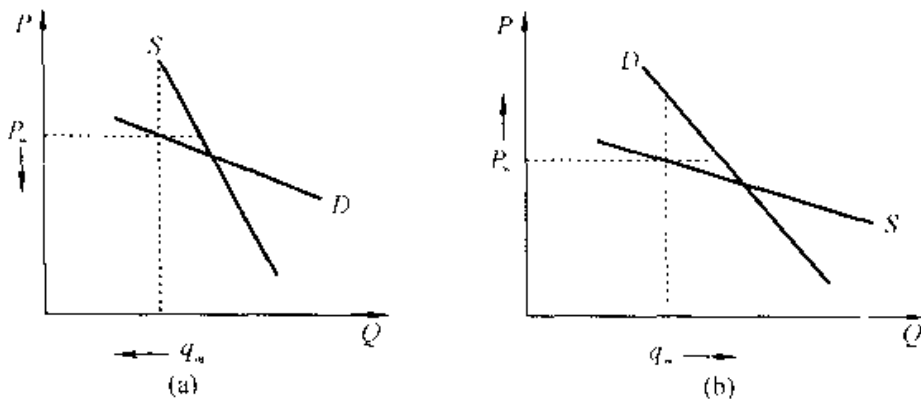


图 6.5.3

(a)、(b)两图分别表示报酬递增时供求曲线之间的两种关系。在(a)图中,马歇尔的初始产量 q_m 将引起背离均衡的产量运动,而瓦尔拉斯的初始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

价格 P_w 所引起的负值超额需求却引起趋向均衡的价格运动。在(b)图中情况恰恰相反,马歇尔的初始产量 q_m 引起趋向均衡的产量运动,而瓦尔拉斯的初始价格 P_w 所引起的正值超额需求却引起背离均衡的价格运动。^①

五、均衡位置的移动:均衡的动态分析(I)

马歇尔认为,除了存在着由失衡趋向均衡的运动之外,还存在着均衡位置本身的运动。他认为有许多因素都通过移动正常需求或(和)正常供给而引起均衡位置本身的运动。引起正常需求增加的因素有:商品日益时新、开发出商品的新用途或新市场、代用品供给的减少,社会财富或一般购买力的长期增长,等等;这些因素的反面将引起正常需求的减少。引起正常供给的增加的因素有:新供给来源的开辟,技术进步、新机器或新制造方法的发明,以及获得生产补贴,等等。这些因素的反面将导致正常供给的减少。

马歇尔进一步用下面三个图来分析正常需求增加在供给不变时对均衡价格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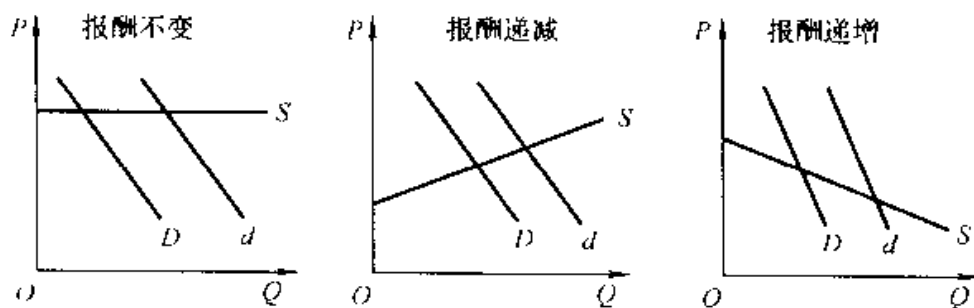


图 6-5-4

由图可知,需求增加(表现为需求曲线右移)时,报酬不变的产品均衡价格不变,报酬递减产品均衡价格上升,报酬递增产品均衡价格下降。

图 6-5-4 表明供给因技术进步等原因而增加而需求不变时,均衡价格将如何变化。由图可知,供给增加(表现为供给曲线向右向下移动)时,报酬不变产品均衡价格下降。报酬递减产品均衡价格稍有下降,报酬递增产品均衡价格大幅度下降。

六、满足最大化:对均衡的福利分析

马歇尔指出,巴师夏等人所认为的自由竞争下的均衡意味着满足最大化的论点是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均衡仅仅是满足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

^① 参阅[英]布赖恩·摩根《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29 页。

充分条件。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均衡并不会自然地导致收入的均等化，即不会使得货币的边际效用在所有人那儿都一样，因此，均衡并不意味着交换各方的满足实现了最大化，因为还可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社会全体人的福利总和进一步增加。其次，由于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这两种情况的存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不一定意味着满足的最大化。他认为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来降低生产成本，将使消费者剩余的增加超过补贴额，并且使价格大幅度下降。在报酬递减条件下，可以通过政府税收来提高生产成本，将使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小于税收额，并使价格略有上升。因此，若对报酬递减的产品进行征税，再用所征税款来补贴报酬递增的产品，则消费者剩余比不这样做时增加。由此可知，通过政府的上述税收和补贴行为而形成的新均衡将比政府不采取上述行为时的均衡（即自由竞争下的均衡），导致更大的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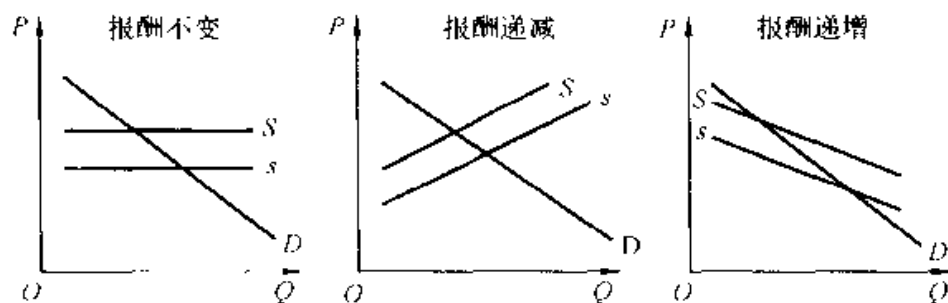


图 6-5-5

马歇尔的上述分析，以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为工具，说明了自由竞争并不一定导致社会满足的最大化，这与早期的边际效用论者是有很大差别的。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马歇尔是第一个人表明，完全竞争不总是能够使产量达到最大程度。……这是一个古老城池的第一个缺口。”^① 马歇尔的上述论点蕴含的政策主张是，可以通过政府的税收和补贴政策，使产量以及社会的满足水平超过自由竞争所能达到的水平。由此可知，他并不是无条件地主张自由竞争的，而是像约·斯·穆勒一样，主张由政府对经济进行一定的干预。

七、连带需求与复合需求，连带供给与复合供给

马歇尔清醒地意识到，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是以忽略各种产品之间错

^① 熊彼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载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107 页。

综复杂的关系为前提的。然而现实生活中,这些关系对产品的均衡价格会发生各种影响的。因此他在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建立了均衡价格论之后,便着手研究了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价格的影响。^①

马歇尔首先分解需求为直接需求和间接(派生)需求。前者是对直接满足人的消费需要的商品的需求,而后者则是对于生产商品的原料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它是由对前者的需求派生而来的。因此商品的价格便影响到生产商品的原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

马歇尔用“连带需求”和“复合供给”这两个概念表达了今天人们所说的商品之间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并认为具有这类关系的产品的价格会相互影响。他又用“连带供给”这一概念表达今天人们所说的联合产品之间的关系,认为具有这种关系的两种产品的价格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他还用“复合需求”这一概念说明对一种产品的多种用途上的需求,认为各种用途上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竞争,从而影响着该产品的需求价格。

总的说来,马歇尔是指出了各种产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是已经意识到一般均衡问题。但并没有展开深入的分析。

第六节 垄断理论

在研究了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均衡产量之后,马歇尔又研究了垄断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他首先分析了垄断者的行为目标,认为垄断者“所关注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纯收入”^②,因此他们所提供的产量总是能够使它们获得最大纯收入的产量。他以这一命题为前提展开对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的分析。但他同时也承认,垄断者有时也会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暂时不以纯收入最大化为其行为目标。

马歇尔以图 6-6-1 表述了追求纯收入最大化的垄断者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决定;图中横轴为产量,纵轴为价格, DD 为需求曲线, SS 为供给曲线, yy 为纯收入曲线,它上面的任一点到横轴的垂距,都等于其垂足所代表的产量水平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之间的差额,即纯收入额。当产量为 K 和 H 时,供求曲线交于 B 和 A 纯收入为零。低于 K 和大于 H 产量,供给价

① 这一研究中马歇尔受到德国经济学家曼戈尔特(1824—1868)的影响。关于曼戈尔特的情况,可参阅马克·布劳格等的《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08 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5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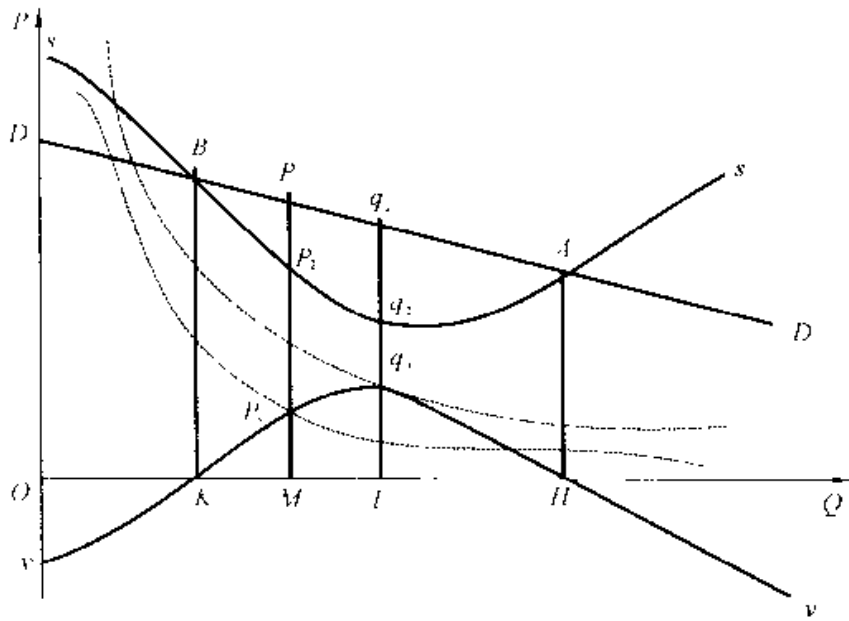


图 6.6.1

格大于需求价格,纯收入为负值。图中虚线为直角双曲线,其方程为 $xy=g$,即曲线上任一点的两座标值之积为一常数 g ,离原点越近的双曲线,其 g 值越小,图中 xy 曲线上的 q_1 点相切于较高的双曲线,而 xy 曲线上的其余各点,如 p_1 点则相交于较低的双曲线。由此可知, q_1 点代表最高的纯收入,由于线段 q_1I 等于线段 q_1q_2 ,即在产量 OL 时,需求价格超过供给价格的数额最大。由此可知,均衡产量为 OL ,而均衡价格由该产量下的需求价格决定,为 q_1I 。

马歇尔进一步比较了垄断条件下的均衡产量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产量。他指出,与竞争条件下的厂商相比,“垄断者往往能够保持企业上的节约”^[1]。这是因为竞争条件下的厂商无法利用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内外部经济,无法拿出像垄断厂商那样多的资金来改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同时相互之间还要互相竞争以致用于各种广告的总费用将比一个厂大得多。因此,虽然垄断条件下的均衡产量不像竞争条件下那样由供求曲线的交点所决定,而是低于交点所对应的产量,但垄断条件下的均衡产量还是可能会大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产量。这是因为若垄断者经营有方,那么“一般可以得出结论:非垄断产品的供给表所表示的供给价格比我们的垄断供给表要高些;因此,在自由竞争下所生产的商品的均衡产量小于需求价格等于垄断供给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0页。

价格的那一产量”¹。这就是说,如上图所示,虽然 L 在 II 的左方,但若没有垄断,商品的供给曲线将高于图中的 ss 曲线,以致它与 DD 曲线的交点位于 L 点甚至 q 点的左方。

从上述论断来看,马歇尔并不是无条件地认为垄断不如竞争,从理论上讲,垄断的产量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竞争的产量,垄断的价格也同样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竞争的价格。他的这一思想后来为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大加发挥,论证了垄断比竞争在产量和价格两方面的优越性。

第七节 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一、收入分配的一般原理

马歇尔认为,国民收入是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收入分配问题,就是如何把国民收入分解为各生产要素的贡献份额的问题。他认为虽然纯产品作为实物是由生产要素生产的,但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取决于纯产品的价格,即要素的收入由产品价格决定,而不是要素的价格决定产品价格。这一见解与奥国学派等边际主义者用低级财货价值决定高级财货价值是一致的。他还认为各生产要素收入的总和正好等于纯产品的总价值。那么纯产品的总价值按什么原则分解为各生产要素的收入呢?对此,他的观点是:“一般说来,劳动、资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要成比例的。但这种需要不是总需要,而是边际需要。所谓边际需要,是在一点上的需要,在该点,不论人们略多购买某种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或用他们的额外资金购买其他要素的服务(或服务成果),对他们都毫无区别。”² 这就是说,对各种要素的服务的边际需要决定了它们的收入份额。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命题,就需要了解他的替代原理。

马歇尔的替代原理是指企业家们将不断地用相对于一定纯产品来说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来代替较贵的生产要素,从而使得生产要素不断从该要素服务价值较小的使用方面移向服务价值较大的使用方面,最后达到两点结果:一种要素在它的各种用途上的价值趋于一致;二是同一种用途上任

¹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2页。

²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8页。

何两种要素的边际纯产品之比等于他们各自的价值之比。由此可知,他的替代原理实际上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企业家们选择最佳要素组合的行为的结果。由于这种行为,便决定了各种要素在整个经济中的边际需要,并进而决定了收入在各种要素之间的分配比例。

由上述替代原理可知,决定要素收入份额的边际需要,是由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边际纯产品)和要素的成本(要素的价格)共同决定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了企业家们对要素的需求价格,而要素的成本取决于要素的供给价格。于是要素收入的份额问题便归结为要素的均衡价格问题,归结为要素的供求问题。于是,分配的决定便与价值的决定一样,同样取决于供求均衡。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取决于它在替代原理作用下的边际生产力;而供给“不论什么时候都首先取决于它的现有存量,其次取决于它的所有者把它运用到生产上的意向”¹⁾。因此,虽然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互不相同,但它们从根本来讲都服从供求规律。

马歇尔还进一步分析了各种要素相对数量的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他认为任何一种要素所得份额越大,若其他条件不变,则其数量相对其他要素来说将增加(土地除外)越快,结果其边际生产力将下降,并使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得份额减少,而使其他要素的收入份额增加。

二、工资理论

马歇尔用劳动的供求均衡来说明工资的决定。他写道:“需求和供给对工资起着同样的影响,其中是不容有轩轻的,如同剪刀之两边,拱门之双柱一样。工资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一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²⁾他强调,在计算劳动的成本时,不仅要考虑生存和维持效率的必需品,还要考虑习惯上的必需品。从这种供求均衡论出发,他否定古典学派的工资铁律和工资基金学说,也不同意某些边际主义者单纯从边际生产力来说明工资的决定。

马歇尔认为,在现代文明中并不存在所谓一般工资率。劳动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和阶层,每一劳动种类和阶层都有其自己特殊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一般工资率”这种概念只是为了方便地考察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关系。

马歇尔还以供求均衡论为基础,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的工资决定。他指出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4页。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4—205页。

不发达国家的“劳动阶级所能消费的奢侈品最少,甚至习惯上的必需品也不多。他们报酬的增加引起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使他们的报酬又迅速降低至仅能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费用的原有水平线上。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工资几乎是按所谓铁律或铜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资固定在培育和维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级的费用上。”¹ 这一论点似乎是肯定工资铁律,否定不发达国家的工资由供求决定,其实不然,他恰恰是把所谓的工资铁律建立在供求均衡论的基础之上。他的上述思想可用图 6-7-1 表达出来:横轴为劳动供求量,纵轴为工资率。OS 为维生工资率, e_0 为初始的均衡,初始均衡工资率高于维生工资率,结果引起劳动供给迅速增加,使供给曲线由 SS_1 右移为 SS_2 , 于是新的均衡为 E_1 , 恢复维生工资率。当需求曲线因需求增加而从 D_1D_1 右移为 D_2D_2 后,均衡点为 D_2D_2 和 SS_2 的交点 e_2 , 工资率再次超过维生工资率,但又引起劳动供给增加,供给曲线 SS_2 右移为 SS_3 , 出现均衡点 E_3 , 又恢复维生工资率。余类推,结果从长期看,虽然不断有工资高于维生水平的事情出现,但最终总是回落到维生水平,出现工资铁律。由此可知,不发达国家维生的工资率或工资铁律现象完全可以用供求均衡论加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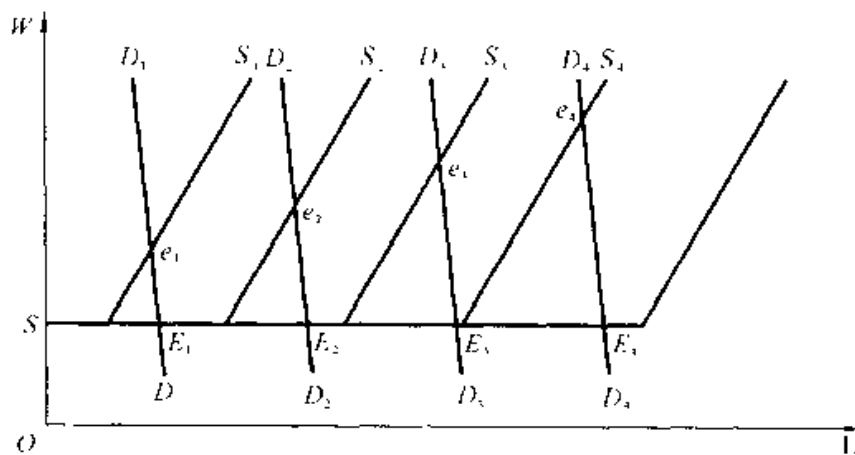


图 6-7-1

而西欧发达国家之所以有比不发达国家高的工资率,马歇尔认为是由于发达国家中工人的必需品中不仅含有维持生存的必需品,还含有维持效率的必需品。即相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劳动供给曲线有更高的位置。

由此可知,无论发达或不发达国家,工资率都由劳动的供求均衡来决定。区别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供给价格中包括了维持效率所必须的费用,而

¹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203 页。

不发达国家则不包括这部分费用。

马歇尔不仅对工资问题进行了上述实证性分析,还提出了自己的规范性要求,即主张实行效率工资。因为能提高效率的高工资,“不仅能提高工资领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率,……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地是有效率的劳动,因此,不是昂贵的劳动”¹⁾。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提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面的资本”²⁾。

三、利息理论

马歇尔认为,利息对于获得利息的人来说,是延迟享受所含有的牺牲之报酬,或等待的报酬;对于付出利息的人来说,则是使用资本的代价。他把通常的利息区分为毛利和纯利,只有纯利才是等待的报酬,毛利则除了包含纯利之外,还包含风险、债权者的麻烦等因素所带来的报酬。他认为纯利的利率有趋向一致的趋势,但毛利的利率则没有这种趋势。

马歇尔认为,利息率的大小也和工资率一样,取决于资本的供求。而资本的需求取决于增量资本所提供的纯产品,即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资本的供给从根本上来讲取决于资本家对延期消费或等待所期望的报酬。但具体说来,供给情况要依据资金市场的大小、时间的长短而有所不同。对于局部地区的资金市场来说,需求增加后,可以通过向邻区抽调资金而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但对于全国或全世界来讲,需求的增加、利率的上升,并不会在短期中引起资金供给的增加,只有在长期中才会使资本总供给缓慢增加。

四、地租与准租理论

在地租问题上,马歇尔基本上是重述了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他首先区分地租为狭义和广义。狭义地租完全是自然界的恩赐,非人力所为,而广义地租则还包括对土地进行投资改造所得的报酬。他重点分析了狭义地租的决定。他认为虽然对个人来说,土地也可以算是一种具体资本,可以变动它的数量,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土地是数量不变的,且无生产成本,是大自然的赐物,因此土地没有供给价格。因此地租便决定于对土地的边际投资的纯产品。他从土地报酬递减律出发,认为随投资的不断增加,最终会达到某个边际,处于该边际上的投资所生产的纯产品,仅提供正常利润而无剩余。而边际投资以前的各份投资的纯产品,则除去正常利润外尚有剩余,这些剩

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4页。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2页。

余使构成地租。

准租概念是马歇尔富有独创性的一个收入范畴。准租是指在短期中,因为对各种在长期中数量可变但短期中数量固定的生产要素的需求所引起的报酬。如生产设备、工业组织、管理技能、个人的特殊才能等。短期内都不会适应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像土地一样,它们在短期中的报酬完全由对其服务的需求所决定,往往高于其供给价格,类似于地租。但长期中它们数量可变,故其长期报酬又由对其服务的供求双方决定。趋于其供给价格,因此又不具有地租的性质。生产设备的准租(短期收益)可以高于也可以低于均衡的利率,但它的长期收益必须也必然趋近均衡利率。否则,若是低于均衡利率,则生产设备数量将减少;若是高于均衡利率,则其数量将增多。而这些数量变动最终将迫使其长期收益向均衡利率逼近。

准租概念使马歇尔能依据时间长短的不同来说明要素收入与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短期中,要素收入中能否包括准租是由产品的价格决定的,因此是产品价格决定要素收入;而长期中,要素收入中不再包含准租成分,趋向于其供给价格,并且要素收入通过影响产品供给价格,成为产品均衡价格的决定因素之一,于是长期中是要素收入决定产品价格。

五、利润理论

马歇尔区分了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他认为超额利润是企业家特有天赋的产物。正常利润则是企业家经营管理和组织企业活动的报酬。他认为企业家有两种能力:(1)生产的组织者;(2)人的领导者。而这两种能力是专门教育训练和天赋才能的产物。为培养这些才能而付出的代价决定着企业主“劳动”的供给价格。而企业家“劳动”的需求价格取决于企业经营的边际纯产品,这个纯产品表现为企业家在最合理地使用和安排其他各生产要素的条件下所能获得的纯收入,亦即在支付工资、利息和地租以后所能得到的正常利润。

总的说来,马歇尔的利润理论比较单薄,不像他对其他收入范畴的说明那样有力。

六、劳资调和论

马歇尔坦率承认:“分配论研究的主要意义是使我们知道:现有的社会经济力量使财富的分配日趋完善;这些力量是经常起作用的,日益壮大的;它们的影响大多是积累性的;社会经济组织比乍看起来要更加微妙而复杂;

考虑不周的巨大改革会引起严重的后果。”^① 这表明,他相信现存制度会逐步改善,而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不必要的。他承认在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资本会排斥劳动。但他同时又认为,资本的增加会增加国民收益,虽然从短期看,劳动者不能从这种增益中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但从长远看,资本的增加会增加就业,更重要的是随着资本的增加,利率必然下降,从而减少资本所得在国民收益中的份额,增加劳动所得的份额。他的结论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值也很快。由于资本和知识,西方国家的普通工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的王公吃得好,穿得好,甚至住得也好。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如同纺织工和织工的合作一样重要……一方的发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动分不开的;不过一方用牺牲他方的办法可以暂时(如果不是永久的)取得较大的国民收益份额”^②。

第八节 货币理论^③

马歇尔认为,货币的职能主要有两种:交换媒介和价值标准。而为了履行第二种职能,就需要保持货币价值或货币的一般购买力的稳定性。他指出,货币的一般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在实际生活中会发生波动,但人们必须区分它的短期波动和长期波动。而为了知道这种波动就需要用算术加权法或几何加权法来计量货币的一般购买力,即编制物价指数。他看到了编制物价指数的各种困难,承认不能希望得到一种没有大缺点的购买力标准,但考虑到长期借贷活动的需要,应当确定一种官方的一般购买力单位,也就是由政府定期公布物价指数。

在分析了货币价值的计量问题之后,马歇尔进一步探讨了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认为货币的价值与其他商品一样,取决于其本身的供求状况。他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3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3页。

^③ 本节内容参考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一编;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指出,决定货币价值的因素在供给方面是贵金属的生产成本,在需求方面是人们建立在贵金属基础上的对购买力的需求,再加上工业以及炫耀性消费对贵金属的需求。从这一看法出发,他对费雪的交易方程式 $pV = MV$ 提出了异议,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恒等式,并未说明决定货币流通速度 V 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原因必须从国民愿意以通货形式保存的购买力总额,即国民对货币的需求来说明。他认为这种需求的大小与人口、财富、人均交易额,货币交易占交易总额的百分比,货币的代用品如支票、汇票等发行情况,货币的交易效率,个人的职业和性情,运输,生产和交易方式等有关。若国民对货币的需求既定,则物价水平将会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尤其是不兑现纸币的增加而上涨。他关于货币供求决定其价值的思想,为以后他的学生庇古提出货币的剑桥方程式奠定了基础。

马歇尔认为,通货要能有效地发挥交易手段的功能,就必须保持其购买力的稳定,而只要政府能防止伪币流通,并使人民绝对相信货币不会发行过多,则纸币也能够保持这种稳定性。为此,政府必须编制物价指数,并据此调节通货的数量,使物价指数保持不变。他还提出,要考虑信用正常时期和信用失常时期人们对货币的不同需求,并据此调节货币的供给。这些观点表明马歇尔已经有了管理通货思想的萌芽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思想的萌芽。

在分析商业信用问题时,马歇尔指出了实际利率与货币利率之间的区别,指出了货币利率的变化与货币购买力变化,从而与信用周期的关系,即物价上涨一般伴随着货币利率的上升,而物价下跌一般也伴随着货币利率的下降。这一思想可能影响到费雪关于物价与利率之间关系的看法,并经由当代的货币主义而广泛传播,成为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以一定的利率水准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理论依据。

马歇尔对货币理论的最后一个贡献涉及国际金融,他在穆勒关于金本位制国家之间货币汇率的决定机制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购买力平价论,从而解决了不可兑现的纸币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汇率决定问题。

第九节 国际贸易理论^①

马歇尔的国际交易理论以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为基础。他指出,只要有利的条件不是平均地分配在各个行业之间,开展贸易就对双方都有利,即使其

① 本节内容参阅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三编及附录J。

中一方在各方面都比另一方强。同时,他也承认,在两种情况下实行进口关税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是不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其新兴产业;二是地域辽阔,在内地征税成本很高的国家。但他担心为了保护新兴产业而实行的保护性关税往往在新兴产业已经成长起来之后还继续实行下去。

马歇尔以为,由于劳动和资本能够在国内自由流动而在国际间的流动受到很大障碍,所以商品在一国之内的交换价值与国际间的交换价值有很大不同,国内价值的决定机制与国际价值的决定机制两者是不一样的。他以图 6-9-1 表达了国际价值的决定;横轴表示 E 国的产品的数量,纵轴表示 G 国产品的数量。OE 表示 E 国所意愿的贸易条件,表明 E 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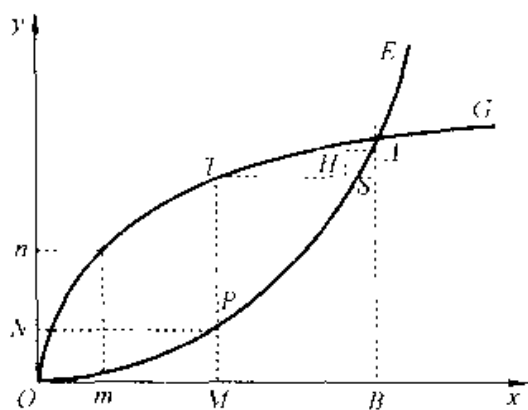


图 6-9-1

一定数量的产品所希望换得的 G 国的产品量。例如 E 国希望用 M 量的产品换得 G 国 N 量的产品。OE 曲线凸向横轴表明随着 E 国出口产量的增加,它所希望换回的 G 国产品按递增速度增加。OG 曲线表示 G 国意愿的贸易条件,表明 G 国用一定量的本国产品所希望换得的 E 国的产品量。例如 G 国希望用 n 量的本国产品换得 m 量的 E 国产品。OG 曲线凸向纵轴表明随着 G 国出口产量的增加,其所希望换回的 E 国产品按递增速度增加。OE 曲线与 OG 曲线的交点 A 反映了两国产品均衡的交换比例,或两国产品的交换价值。当实际的交换比例偏离它的时候,将自发地趋向这一均衡比例。例如初始的比例为 P 点时,虽然 E 国愿意以 M 量本国产品换回 N 量 G 国产品,但 G 国却愿意以大于 N 量的本国产品去交换 E 国的 M 量产品,愿意把交换比例由 P 点移向 T 点;而 E 国进一步愿意把交换比例由 T 移向 S;G 又进而希望移为 H;……最后在 A 点达到均衡。概括地讲,当实际的交换比例落在 OE 曲线的右边,则它将向左移动;若落在 OE 线的左边,将右移。同理,若实际交换比例落在 OG 线的上边,将下移;而落在 OG 线下边将上移。

马歇尔进一步运用上述图形为基本分析工具,研究了两个国家对对方产品的需求弹性的大小以及关税的大小对均衡交换比例的影响。其基本结论是:当 G 对 E 的产品具有较大需求弹性(即 OG 线较陡)时,E 对 G 产品需求的增加(表现为 OE 曲线右移)不会引起均衡交换比例的太大变化;若 G 的需求弹性较小(即 OG 线较平),则 E 对 G 产品需求的增加将使均衡的

交换比例向着不利于 E 的方向变化,即 E 需要用更多的本国产品来换取一定数量的 G 国产品。当 E 对其向 G 的进出口征收关税时,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其进口,在更大程度上减少其出口,从而使均衡的交换比例变得有利于 E ,即 E 可用更少的本国产品换得一定量的 G 国产品。同时,若 G 对 E 的商品有很大需求弹性, E 对进出口征收中等程度关税,将在 E 对 G 商品需求有弹性时降低双方的贸易欲望,而在 E 对 G 商品需求无弹性时将不会影响交换比例。

马歇尔还研究了关税对两国利益的影响。他指出,若 E 对其进出口征收一般性关税,并用其购买本国商品和劳务,则 E 将使 G 两方面受害,一是降低 G 的出口欲望,二是恶化 G 的交换比例,迫使 G 用更多的本国产品来交换同样数量的 E 国产品;同时, E 国本身将既有利又有弊,弊在于将减少其进口,利在于改善 E 的交换比例;若把 E 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一起计算,这种关税是有一些好处的。

马歇尔还进一步分析了关税的归属转嫁问题。他的结论是,若一国对别国的产品需求弹性越大,且别国对其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小,则它越能将关税负担转嫁给别国。

虽然对关税的各种影响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肯定了关税在一定条件下的各种好处,但马歇尔基本上是倾向于自由贸易的。他对自由贸易的论证首先是依据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同时他也从政治角度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论证。他提出,贸易保护政策会腐蚀国家的政治生活,对政治家的道德素养造成损害。因此,他以为,自由贸易的政策现在是将来或许仍然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它不是一种对策,而是无对策。为应付一时所需而订的政策,将由于时过境迁而过时。但自由贸易这种朴素而自然的做法,将胜过操纵关税所获得的各种小利,不管税收征管的方法多么科学多么高明。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关税保护政策何以比自由贸易主张更易获得成功的原因,即利益明确的小团体往往比利益模糊的大群体更容易在政治生活中实现自己的目标。主张关税保护的人能够清楚地说出这种政策将使哪些人受益,而主张自由贸易的人则往往讲不清楚关税保护将具体伤害哪些人。马歇尔因此而以为自由贸易政策在英国的实施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因为以往对进口货课征的保护性关税碰巧都挑选得很不好,给英国公众带来了明显的伤害。

马歇尔上述从政治角度对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所作的分析,可以说是今天的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为理论的先驱。

马歇尔也考虑了今天发展经济学所考虑的新兴国家的产业选择问题,认为它们最需要发展的是依据本国资源及人力密集的产业,而不是那种耗

资甚巨,需要高度专门技术的产业。

马歇尔对国际贸易的长期趋势有下述判断,即受自然资源的差别所支配的贸易额比重将增加,而受工业发展阶段的差别和制造业种类的不同所支配的贸易额的比重将下降。

第十节 经济波动

马歇尔认为在以往商业交往不发达的时候,经济的波动往往与农业收成的变化、战争和瘟疫有关。而在现代经济中,导致商业危机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少数企业的破产,但危机的真正原因还不在于少数企业的破产,而是许多信贷没有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他基本上是从信贷因素,从现代经济的广泛交往联系来寻找波动原因的。

马歇尔对物价的波动原因也进行了分析,以为物价长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贵金属的数量相对于必须以贵金属为媒介的交易量发生了变化。而短期波动则与通货量及贴现率的变化有关,当通货增加后银行将降低贴现率以促进贷款,从而刺激投资需求,提高价格水平,而这将提升贴现率和长期贷款利率。

总体上看,马歇尔更多地是描绘了信用与经济波动的现象,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他承认技术进步会使小部分工人暂时失业,但从长远看将利大于弊。他肯定市场机制能很好地解决不同劳动力的配置问题。他指出现代化大工业往往使失业问题表现得格外严重。

第十一节 马歇尔综合体系的意义

马歇尔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他的综合性。这一综合体系的主要思想源流当属约·斯·穆勒。只要比较一下他的《经济学原理》和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便可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他晚年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也承认深受穆勒上述之书的启发。^①熊彼特谈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像马歇尔这样一个彻底受过数学训练并决心攻读经济学的人来说,“对于穆勒在证明的中肯性和结论的确定性方面所

^①参阅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页。

表现的模糊和粗疏,必然会感到惊异;其次,他马上会动手清除各种限制并使命题概括化。要把穆勒的结构转化为马歇尔的结构,除了上述两点以外,实际上不需要很多的东西了”¹。在对穆勒体系进行的改造中,马歇尔加进了边际分析方法,相互作用的观念,对欲望、效用和需求的分析,以及图解表达方法。边际分析方法,他受惠于古诺和杜能。²相互作用的观念,他是从古诺那里获得的。³正是这一观念,使他一方面把供求看作是价格的函数,另一方面又以供求的均衡来决定价格。而不再像穆勒那样穷究决定价值的最后原因。对于欲望、效用和需求的分析,则是他自己独立发现的,虽然它们迟至1890年才被发表,但从凯恩斯为他所写的传记来看,从他对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并不感激的态度来看,这一点是无疑的。他和美国的克拉克一样,都是在不依靠边际革命的二位奠基者的贡献的情况下,独立然而重复地发现了边际效用理论。但马歇尔由于深信连续原理,所以他并不是把他发现的边际效用论作为反对古典学派的利器,如杰文斯所做的那样,而是把这一发现与古典学派的体系进行了综合,把边际效用和生产费用作为决定价值的两股力量。至于他的图解表达方法,则是他的数学基础所导致的后果。

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是马歇尔对穆勒的体系进行上述改造的结晶。⁴对于这一新的综合性体系,可以从马歇尔以后两位西方经济学界的大师凯恩斯和熊彼特的下述评价中,了解他对西方经济学的重大影响。

凯恩斯认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西方经济学作出了七点贡献:⁵(1)最终澄清了经济学发展史上关于需求和生产费用哪个决定价值的争论。(2)一般均衡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由于马歇尔导入两个有影响的辅助概念,即边际和替代,而更有力更灵验了;边际这个概念被他引申出效用的范围之外,以说明任何一种经济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均衡点;而替代这个概念则用以描述恢复或趋向均衡的过程。运用这种方法,工资和利润等收入范畴,也像商品的价值一样,由供求均衡的机制所决定。(3)通过短期和长期这

1 熊彼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载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98页。

2 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

3 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

4 马歇尔的思想也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正文中很难找到它的痕迹。他对于经济史所做的研究,主要发表在《工业与贸易》一书中。该书本来是打算作为《经济学原理》的第一部分的,后来才决定另行成册。

5 参阅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7-42页。

一对概念,把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从而进一步引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这一对概念,以及主要成本与辅助成本这一对概念,借助于长短期的区分给出了正常价值的确切含义。借助于准租和代表性企业这两个概念,形成了正常利润学说。(4)提出了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为分析自由放任条件下的福利问题提供了工具。通过这一工具,马歇尔证明在某些条件下,自由放任并不能导致社会的最大福利。这一思路为日后庇古建立福利经济学开辟了通道。(5)以外部经济和报酬递增为基本分析工具建立了对垄断的分析。(6)引进弹性概念。(7)重视对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这一点在《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正文中并不明显。

熊彼特认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对西方经济学作出了六点贡献:¹ (1)这部著作的论点和分析工具指导了1890年以后30年间整整一代人的工作。(2)区分长期与短期,这最终导致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部门的兴起,这就是短期分析。(3)由于提出报酬递增(成本递减)现象,所以马歇尔应当说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创始人。这在斯拉法1926年发表的论文《生产成本和生产数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4)在《经济学原理》第六篇里,马歇尔运用一种既别于局部均衡又异于一般均衡的“总合的”分析方法,对整个经济过程进行了广泛的概括,从而为货币理论成为关于总产量和就业的理论而开辟了道路。(5)尽管未能引起读者的充分注意,马歇尔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6)马歇尔是促使现代经济计量学出现的最有力的影响者之一。

但马歇尔的综合体系,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并非没有缺憾。有两点不足降低了这一综合性体系的价值:一是这个体系的需求理论建立在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没有吸收后来的序数效用论的成果,而这一成果在马歇尔在世之时已经出现。这就使这一部分理论无可避免地具有基数效用论的各种不足之处。二是这个体系过于偏重局部均衡方法,从短期来看,这是这个体系能比瓦尔拉斯的体系更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优点,但从长期来看,这无论如何是一个缺憾。这两点不足表明,马歇尔实际上是以边际革命的初期成果与古典理论进行了综合,并没有对边际革命所造成的各种成果进行综合。对边际革命的几乎全部成果加以总结的工作,是由后来的希克斯和萨缪尔森完成的。

马歇尔在西方经济学史上一代宗师的特殊地位,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¹ 参阅熊彼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载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6—111页。

首先是他创立了剑桥大学的经济系,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这些学生以后都在他的旗帜下对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索。正如凯恩斯所说:“马歇尔成为当代英国经济学之父,主要是由于造就了众多的学生;有宏丰的著述,倒在其次。”^①

第二个原因是马歇尔的表述方法符合当时经济学界的知识素质,这是他优于瓦尔拉斯的地方,也是他不如瓦尔拉斯的地方。与瓦尔拉斯的体系相比较,他的体系以简洁雅致见长,具有雅俗共赏的特征,而瓦尔拉斯的体系更严谨、更全面、更富有逻辑上的美感,但也更深奥更难懂。瓦尔拉斯的体系注定主要是为20世纪的经济学家准备的,而马歇尔的体系则在当时便适应人们的需要。所以在短时间里,马歇尔比瓦尔拉斯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经济学界整体知识素质(尤其是数学水平)的提高,瓦尔拉斯所获得的声誉相对于马歇尔来说则日渐升高。

第三个原因是马歇尔的体系在结构上具有可分解的特征。即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理论都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这就使他的后继者们可以各自以他的某部分理论为基点,深入研究某个局部领域,如福利理论、厂商理论、消费理论,等等。而瓦尔拉斯的体系在结构上则不具备这种特征,很难设想瓦尔拉斯的后继者们可以进行局部领域的深入研究,对于他们来说,或者是发展完善瓦尔拉斯的整个体系,或者什么也别干。而发展完善整个体系所需要的知识素质,在瓦尔拉斯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具备的。因此这一工作总的来看便只能推迟到20世纪。可以打一个比方,表明马歇尔体系与瓦尔拉斯体系在结构上的差别。瓦尔拉斯是盖了一座宏伟的结构联系紧密的建筑,而马歇尔则是盖了一批联系松散的建筑。瓦尔拉斯的后继者必须对那个宏伟的大建筑进行整个的装修,而马歇尔的后继者们则可以只专注于装修其中一座小建筑而不顾及其他的建筑。所以马歇尔有一大群门人弟子,而瓦尔拉斯只有一个帕累托。

① 凯恩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页。

第七章 威克塞尔的综合经济理论体系

19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发生的第二次综合,在英语世界是由马歇尔完成的,而在非英语世界中则由威克塞尔完成。威克塞尔体系的综合性质,由于语言壁垒,历来被人们所忽视。系统地反映了他理论体系的两本书:《价值、资本和地租》、《利息与价格》,分别发表于1893年及1898年,前者距离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晚三年。所以从时间上看,他与马歇尔大致在同—个时期建立了各自的综合体系,从现有接触到的资料难以确定他的综合体系是否受到马歇尔体系的启示,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从体系的内容和渊源来看,他的体系与马歇尔的体系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所以在没有新的资料证伪之前,我们可以假定他是不借助于马歇尔而独立地建立起自己的综合体系的。

克努特·威克塞尔¹(Knut Wicksell, 1851—1926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1876年获乌普萨拉大学数学硕士学位,任讲师、记者和小册子作家等职。至35岁转向研究经济学,尔后5年遍游英、德、法、奥各国,研习经济理论,1895年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898年任乌普萨拉大学助理教授,1900年任隆德大学副教授,191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03—1917年任隆德大学教授。他从青年时代起便关心社会及伦理问题,思想激进,曾于1905年因发表思想偏激的演说“王座、祭坛、宝剑与财货”而遭到两个月的监禁,其主要论著有:《价值、资本与地租》(1889年),《财政理论考察,兼论瑞典的税收制度》(1896年),《利息与价格》(1898年,有中译本),《国民经济讲义》(1901—1906年,有中译本)。

第一节 经济学的性质、分类及其研究方法

一、经济学的性质与分类

由于资料限制,我们无法了解威克塞尔建立其理论体系时瑞典的社会、

— — —

¹ 威克塞尔还有下述译法:魏克赛尔、维克塞尔

经济和政治状况,因此不能像介绍马歇尔那样结合时代背景来介绍威克塞尔对经济科学的看法。

威克塞尔指出,经济学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在实行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时代,它是关于国家计原理的科学,而在自由竞争的私有制时代,经济学“已愈来愈成为相互依存着的可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现象的学说”¹。而所谓的经济现象,便是人们利用既定手段达到尽可能大物质满足或利用尽可能少的手段达到既定物质满足的活动。概言之,经济学便是关于人们谋取物质利益的活动的学说。

从经济学的上述性质出发,威克塞尔首先区分经济学为“理论的”和“实用的”两部分,并进一步将“实用的”部分区分为两部分:既定制度条件下基本理论的应用和对既定制度条件的评价及改进。于是,他把经济学分为三大块:(1)理论经济学,主要涉及对经济规律的论述。(2)实用经济学,主要涉及经济规律在具体经济生活中的应用。(3)社会经济学,主要涉及应当如何应用经济规律及应当对现存的经济制度进行何种改革。这样一种分类法,据他自己所称是源自瓦尔拉斯。但两者之间关于第三部分内容的看法是有着重要差别的,这就是对于自由竞争的私人财产制度的态度,瓦尔拉斯是全盘维护,而威克塞尔则有不同意见,两人的区别可以从他们对于巴师夏的不同态度中表现出来,瓦尔拉斯是力图从新的角度来论证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而威克塞尔则认为经济和谐论恰恰是巴师夏的错误。

对于理论经济学,威克塞尔又将其分为若干部分:(1)价值与交换理论,涉及消费和需求,及自由竞争和非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值决定。(2)生产与分配理论,涉及生产三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及产品分配中的相对份额,但这部分内容并不包含生产要素财产权的分配问题。它属于社会经济学领域,明确区分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是威克塞尔体系的长处之一。(3)资本理论,主要涉及动态条件下资本的积累及收益问题,而前两部分主要涉及的是静态分析。(4)货币与信用的理论。这部分内容进入理论经济学的范围,是威克塞尔的一大创造。但这部分内容本身,如以后所述,又是他结合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与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的结果。可以说,马歇尔是在价值理论上对古典学派和边际学派进行了综合,提出了相对价格的决定理论,而威克塞尔则是在货币和信用理论方面对古典学派和边际学派进行了综合,提出了一般价格的决定理论。

¹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威克塞尔认为,经济研究方法主要是抽象推理法,即从某些假设的前提出发,运用逻辑的方法,推导出相应的结论。他指出,采用抽象推理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取决于两点:(1)假设前提的现实性如何;(2)被抽象掉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前提的现实性越强,被抽象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越小,则结论越可能接近现实。同时他也指出,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时可以先把某些重要的因素抽象掉,以使研究对象简单化,然后再进一步考虑被抽象掉的重要因素的作用。

威克塞尔的抽象推理法,包含了数学方法。他认为数学方法并不能保证不产生错误的演绎,但与单纯描述的方法相比,其优点在于不会长久地隐蔽错误。在推崇抽象推理法的同时,威克塞尔也肯定了历史学派归纳方法的作用,认为两种方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分工关系。

第二节 价值理论

威克塞尔指出,如果对“交换”这一概念作广义的理解,理解为“人们在同一种生产资料或完成品的各种用途之间或在达到同一目的的各种手段之间一直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着选择”¹⁾,则价值理论就不仅对于自由竞争的经济而且对于自然经济和集体主义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把价值理论作为理论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

威克塞尔的价值理论也像马歇尔一样是一种供求均衡价格论,但马歇尔以局部均衡为特征,而他却以一般均衡为特征。他写道:“如我们所发现的存在于交换价值与边际生产费间的关系一样,边际效用与交换价值或价格基本上也保持着同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假如交换价值事先已定……,则边际效用就将为交换价值所调节。……假如交换价值并非事先一定而为市场本身决定,则边际效用与价格就将在一个单一的均衡体系内相互决定,而可以像征地和假设地以一个方程式体系将其表现出来。……最终的均衡问题即依靠交换以形成的生产与消费间的均衡问题,在未知数之中就包含着生产和消费的数量、货品的相对交换价值及与此成比例的对各特定个人的边际效用等数量。另一方面,已经明确知道的数量是每一特定时刻存在的生产资料

¹⁾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量,即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数量以及消费者的个人癖气等。于是交换价值就决定在双方力量相平衡的水平上。在这双方力量中,一方面是消费的愿望(效用或消费的满足),另一方面是生产的困难,制造的不便利和不舒适(有时叫做负效用或反效用)。”¹ 由此可知,他既肯定边际生产费用对交换价值的决定作用,也肯定边际效用对交换价值的决定作用,把边际生产费用和边际效用作为在一般均衡体系中与交换价值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的两股力量,由它们的均衡决定着交换价值。因此,他的价值理论实质上也像马歇尔一样,是综合了古典学派的生产费用论和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论的结果。但由于他是以一般均衡作为基本分析框架来进行综合,同时他又不像马歇尔那样对古典学派的生产费用价值论表示一定的尊重,而是在行文中时常表露出对边际学派的偏爱,所以他的价值理论的综合性的综合性从表面上看便不像马歇尔那样明显。人们往往容易把他的价值理论看作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复述,但从前面所引的那段话可以看出,他的价值理论实际上既与古典的生产费用论也与边际效用价值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肯定了边际效用论,但并没有完全赞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实际上是两个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理论,前者是关于边际效用的定义、变化趋势的理论,后者则是用边际效用说明价值乃至市场价格的理论)。因此不应当把它简单地看作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他的价值理论在本质上是以一般均衡为前提的供求均衡价格论。这个理论及马歇尔的以局部均衡为前提的供求均衡价格论与古典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及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后两种理论实际上都认为价值有一个唯一的最终的决定因素,而前两种理论则否认这一点。

上面指出了威克塞尔价值理论的本质特征,下面不准备全面详述这一理论,只是对其中一些富有特色的论点简介如下:

1. 威克塞尔不认为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仅仅依存于该商品本身的数量。而是强调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强调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对所有商品的数量依存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奥国学派详细说明其边际效用价值论时,已经就不少特殊情况加以分析,但威克塞尔则用数学方式对这种关系作出了一般性的表述。他把消费者的总效用定义为在某一单位时间里一切商品的数量函数: $U=U(X_1, X_2, X_3, \dots)$,其中 U 为总效用, X_1, X_2, X_3, \dots 分别为各种商品的数量。这一效用函数与马歇尔的效用函数有明显的不同,后者是把总效用定义为各种商品的效用的总和,其前提实

¹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9页。

质上是否定了各种商品的效用之间的相互依存。根据上述总效用函数,威克塞尔把某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定义为一阶偏导数 $\partial U / \partial X_i (i=1,2,\dots)$,对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上述数学表达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中。

2. 威克塞尔认为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在价值问题上的根本错误是忽略了生产边际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价值与生产边际上的生产费用相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由这种生产费用决定。两者之间不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3. 威克塞尔也和马歇尔一样,认为只要财产分配不均等,货币的边际效用在穷人和富人那里有区别,那么自由竞争所形成的交换均衡就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一论点同时由两位学者提出,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一论点实际上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逻辑结论,只是有些边际主义者发现了它而有些则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它。威克塞尔与马歇尔对自由竞争均衡的这一看法,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弟子门人,对以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边际主义思潮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主张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的思潮。威克塞尔对国家的干预提出了如下保留意见:即如果干预导致总产量减少,即使收入分配更均等化了,也未必是可取的。

4. 威克塞尔不仅考虑了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值决定问题,还考虑了不完全竞争问题。他指出,在竞争与垄断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他分析了垄断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假设边际成本一定,需求曲线线性,则垄断利润将在纯收入函数 $f(P)(P-C)$ 的一阶导数 $f'(P)(P-C) + f(P)$ 等于零时,实现利润最大化,式中 P 为价格, C 为边际成本, $f(P)$ 为产量。他还指出,由于消费者信息不完全,以及产品的空间差别,造成了零售贸易中的不完全竞争(或用他的话讲是相对不存在的竞争),这导致比完全竞争条件下更高的价格和更多的零售商。这些思想后来为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所发挥。

第三节 生产--分配理论

在生产--分配理论中,威克塞尔认为不同经济制度下生产与分配之间有不同的关系。他指出,若一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则生产将纯粹是一个追求某个目标极大化的技术问题,而分配将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问题,它要受到纯经济之外的考虑所制约。但在自由竞争的私营企业制度之下,生产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安排生产,而利润的大小又受到成本从而

受到工资、利息及地租这些生产要素所要求的产品份额的影响。因此“生产与分配问题是不能分离的；并且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①。

威克塞尔认为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还包括以专利营业秘密的形式存在着的技术发明和商誉。但在以后的分析中，他仍然坚持把三要素作为分析对象。因为他认为技术发明和商誉这类生产要素，会限制自由竞争，因此在分析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生产和分配时，不必加以考虑。

威克塞尔以产品市场价格既定为前提，对生产—分配问题进行静态分析，先研究非资本主义生产（即基本上不使用工具设备的生产），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即使用工具设备的生产）。

在分析非资本主义生产时，威克塞尔的核心论点是用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来说明劳动和土地要素的增加对生产量的影响，以及这两种要素的收入份额——工资和地租——的决定。他的论点和前面第五章所介绍的克拉克的论点基本一致。但他并不是依靠克拉克，而是独立提出这一理论的，所以他和克拉克等人并列为边际生产力论的发明者，他的独特之处是用数学方式表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从而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理论的适用前提。

威克塞尔假定生产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P = a \cdot f(b/a)$ ， P 为产量水平， a 为劳动要素量， b 为土地要素量。由此函数，边际生产力可表示为 P 对于 a 和 b 的一阶偏导数。当该函数是线性齐次时（其经济含义是指规模报酬不变），则各要素按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收入份额之和正好等于总产量，即： $a(\partial P/\partial a) + b(\partial P/\partial b) = P$ 。若规模报酬递增，则 $a(\partial P/\partial a) + b(\partial P/\partial b) > P$ ，即要素按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收入份额之和大于总产量，如此则自由竞争局面将无法维持，要素报酬也无法按边际生产力支付。若规模报酬递减，则 $a(\partial P/\partial a) + b(\partial P/\partial b) < P$ ，即要素按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收入份额之和小于总产量，这意味着企业总会获得利润（它等于总产量与收入份额总和之差），因此人人争当企业家，一切企业都将最终分裂为个体企业，结果收入分配也将不再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由此可以知道，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论要依存两个前提：一是整个经济的规模报酬不变，这保证总产出正好可以按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不多不少。二是各个企业都要在相对于市场需求的较小规模上，便达到由规模报酬递增发展为递减的临界点，这保证了完全竞争的局面。所以边际生产力论要依赖关于整个经济和各个企业的规模报酬的特殊假定。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威克塞尔关于资本和利息的观点可概括为如

①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5 页。

下几点：

1. 不赞成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来说明利率。他写道：“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利息与工资和地租也并不完全类似。关于劳动和土地……边际生产力规律在一定保留之下是适用于整个国民经济和任何私营企业的。……但……这个理论只有我们从个别企业家的观点……来观察时才适用于资本。假如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增加(或减少)，那就决不是随之发生的社会总产量的增加(或减少)将会决定资本的利率。”¹

2. 认为要“绝对精确地规定社会资本的概念，将它作为一个确定的量，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²。在他用来说明利率决定的一个数字例子中，他指出在既定产品价格条件下，只有先确定均衡利率，然后才能通过确定工资额再确定以货币计的社会资本的价值。而由此求得的社会总资本额，是无法用来证明社会总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均衡利率的。³威克塞尔的上述数字例子还表明，当均衡利率变动时，社会总资本将反向变动，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伪威克塞尔价格效应。他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社会资本总额对利率的依存关系，即利率变化将引起各种资本品再生产成本的变化。⁴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利率变动的真实威克塞尔价格效应。

3. 威克塞尔指出，在社会资本的某些特定水平上，或者说在由此而决定的某些特定均衡利率下，“在同一产业(如在瑞典制鞋工业所发生的情况)内，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或多种生产方法，这两种生产方法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资本数额和不同的生产期间(例如手工制鞋和机器制鞋)。只有随着资本(连同工资)的增加，长期投资才能在最后取代短期投资(某些专门行业可能除外)”⁵。由此可知，他并不认为企业家对生产方法(劳动力人均资本、生产期)的选择是社会资本量和利率的单值函数。

上述三点看法表明，威克塞尔是当代西方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边际生产力论和总量资本概念的先驱。

1. 威克塞尔认为利息是由于劳动和土地要素不直接用于生产消费品，而用于更迂回从而更有效的生产消费品的方法所造成的，在这种更迂回的生产方法中，劳动和土地以资本的形式被储存起来，所以资本在实质上“是

1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页。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170页。

3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45页。

4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储存的劳动和储存的土地。利息则是储存的劳动和储存的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与现在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力的差额”^①。而这个差额之所以经常是正值的,则是因为储存的劳动和土地比现在劳动和土地有更大效率,而这又是因为“现在的劳动和土地相对于它所可使用的目的是丰富的;而储存的劳动和土地在同样的程度上对于许多有利的用途则是不足的”^②。由于储存意味着被储存的劳动和土地要经历更长时间才能变为消费品,所以他又把时间要素看作是资本概念的真正核心,把利率看作是“期待”的边际生产力。

由此可知,威克塞尔基本上同意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强调时间因素在说明利息现象时的重要性。他与庞巴维克的重要区别在于他抹去了后者理论中的主观估价成分,即不再用人们对同种同量现在物品与将来物品的主观估价的差异来说明利息,而是用边际生产力概念来说明时差,即用储存的劳动和土地比现在的劳动和土地在边际生产力上的优越性来说明利息的产生。所以可把他的利息理论称作是强调时差的客观性质的时差利息论,以区别于庞巴维克的强调时差的主观性质的时差利息论。

5. 威克塞尔还分析了资本增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他区分了两种情况:技术不变时的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时的资本增加。技术不变时的资本增加,会使得现在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增加,而使资本(储存的劳动和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减少,从而首先使工资和地租增加,利率下降,但资本在总收入中的相对份额仍然会增加。但随着资本的继续增加,其相对份额将会减少,到最后其绝对份额也将减少。他把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归结为生产期的延长、或采用更迂回的生产方法,用他的话说便是资本的“深度”增加。因此,在技术进步时,一定量增加的资本将分散用于比以前更长期的投资中,从而使以后每年增加的资本量将少于未发生技术进步时的数量,这成为抵消资本增加对利率的不良影响的因素。若技术进步发生在资本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则资本“深度”增加,而“幅度”变小,即每年分配到的资本额变小,这甚至会使工资地租发生暂时的下降,^③所以他的结论是:“进行储蓄的资本家基本上是劳动者的朋友,而技术的发明则往往是他的敌人”^④。同时他也承认,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对工资和地租的不良影响将由于资本积累而抵

①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②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③ 林达尔认为这是威克塞尔在资本理论方面作出的最大贡献。参阅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1页注。

④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消。

6. 威克塞尔认为储存的劳动与土地之间均衡的比例必须满足下述条件:储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与现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之比,等于储存土地与现在土地的边际生产力之比。

7. 威克塞尔认为投资于不同期限的资本相互间的均衡比例要满足下述条件:较长期投资与较短期投资的边际生产力之间,保持着按照复利计算的比例关系。于是利率的降低将使得较长期投资相对增加、较短期投资相对缩减。

从总体上看,威克塞尔的分配理论是边际生产力论(用于说明工资和地租的决定)和时差利息论的结合,它不像马歇尔的分配理论那样具有统一的结构,但却包含了不少置后者于死地的思想观点的萌芽。

第四节 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与累积过程理论

威克塞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在综合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利率为基本变量的一般物价水平(以后简称物价)决定理论,以及物价在利率影响下发生变动时的累积过程理论,从而建立了前凯恩斯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并使得关于经济生活的实际面的理论与货币面的理论之间建立了联系,结束了以往理论中的货币中性论(即货币因素不影响经济的实际面的一种论点)。

威克塞尔研究物价水平的背景是资本主义世界从18世纪中叶到1873年,物价水平呈现持续上升,而1878年以后则出现持续下跌。他认为物价水平的波动与相对价格的变化不同,后者造成的损害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调整,而前者造成的危害则难以调整。因此,最好是在不影响相对价格的前提下,通过人为干预使物价水平保持稳定。这就需要研究物价水平的决定机制及其变化时的特征。

一、相对价格与货币价格

威克塞尔认为货币有三项职能:价值尺度、价值贮藏与交换媒介,后一职能是货币的最重要特征。为了履行这一职能,货币本身便应具有价格,而物价水平的倒数恰好是货币价格。

威克塞尔指出了相对价格与货币价格的不同决定机制。首先相对价格受到边际原理的制约,受商品供求关系的制约;而决定相对价格的因素并不

从而单纯用货币数量来说明物价水平是不够的。并且信用制度的发展有可能使货币完全脱离流通,因此单纯用货币数量来说明物价水平就更显得不合理。由此可见,需要对物价水平的决定作出新的说明。

通过对杜克为代表的银行学派的理论的分析,威克塞尔还进一步指出,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的逻辑推论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变化,货币价格和利率将同向变化,而银行学派却依据统计资料表明,两者将反向运动,即货币价格上升(物价下跌)时,利率将下降。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不统一,表明货币数量论包含着重大缺陷。

三、利率与物价水平、物价变动的累积过程

在以利率为基本变量说明物价水平时,威克塞尔创造性地区分了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前者是指在实物借贷条件下,由对于实物资本的供求所决定的利率,它是投资与储蓄相一致时的利率,它等于新资本的预期收益率,“它对商品价格的关系是中立的,既不会使之上涨,也不会使之下跌”^①。后者则是指通常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决定的贷款利率。他认为两种利率完全一致的可能性是极少的。这是因为平均来说,自然利率往往是连续变化的,而货币利率的变化往往是间断式的。自然利率的变动是由于技术变动、资本存量变化等生产领域内的因素。而货币利率的变化主要决定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政策。因此,自然利率的变动最终将牵动货币利率,在经历一段时滞之后向它靠拢。但在这个时滞过程中,货币利率很可能维持原状甚至与自然利率的变化背道而驰。

威克塞尔认为,并不是货币利率的绝对变化引起物价变动,而是货币利率相对于自然利率的变化引起物价变动。当不论是自然利率的变动或货币利率的变动还是两者的共同运动,导致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物价将趋于上升。另一方面,当不论是自然利率的变动或货币利率的变动还是两者共同的运动,导致货币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时,物价将趋于下降。只有当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时,物价才保持稳定,才出现货币中性的局面。

威克塞尔进一步分析了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不一致时,引起物价变动的具体机制。这一分析涉及如下一些假设条件:(1)资本存量不变。(2)各个行业的生产期都为一年,且不可缩短或延长。(3)各行业的生产都始于年初终于年末而后互相交换。(4)企业家都无自有资金,都通过银行这一中介向资本家借入所需资金。(5)一年的工资和租金都在年初一次支付。(6)企业

① 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3页。

家也在年初便备好一年所需的投入存货。以上6点是他明确提出的假定。此外还有下述隐含假定：(1)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不随货币收入变化而变化。(2)人们普遍预期本年度的物价水平在下年度将继续维持。(3)经济中不存在垄断成分。^①

在上述假设下,威克塞尔指出,若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企业家们只能获得管理报酬,无法获得利润,不会产生扩大业务的要求,不会产生对生产要素的额外需求,结果物价保持稳定。若无论什么原因使自然利率高于货币利率,则企业家们通过贷款从事经营就会获取一定利润,利润率等于自然利率减去货币利率的差额。利润刺激了企业家们扩张业务的要求,从而使对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而这种追加需求所需的资金,将由企业家们按不变的货币利率从银行贷得。这又引起这些要素的价格(货币收入)的提高。这种提高并不会降低企业家的利润率从而抵消他们扩张业务的要求。这是因为要素所有者会按照货币收入提高的幅度增加其对消费品的需求。由于消费品数量一定,则消费品价格乃至一切产品的价格都将按需求增加的幅度而增加。这就使企业家们能够在要素价格上涨时继续获得因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而造成的利润。如此,只要自然利率始终高于货币利率,则企业家们便始终在利润的刺激下不断增加贷款,不断增加对要素的需求,从而使要素价格不断上升。而要素所有者又由于货币收入增加而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从而使消费品乃至一切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将形成产品价格上涨的预期。正是在这种预期的支配下,企业家们才可能不顾要素价格的上升而始终不减少甚至增加对要素的需求。这表明,一旦物价水平发生上涨,由此形成的预期行为将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这一上涨运动,甚至在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恢复一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预期因素仍然起着提高物价水平的作用,但实际提高的幅度将低于预期的幅度,从而使物价水平上升的过程最终停止,以上所讲的这一过程,便是物价上升的累积过程。^②另一方面,若由于无论什么原因使自然利率低于货币利率,则将发生物价下跌的累积过程。

威克塞尔还指出,由于两种利率不一致所造成的物价变化,与因为技术

^① 该隐含假设由缪尔达尔指出。参阅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2-123页。

^② 威克塞尔后来发现,引起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全是两种利率之间的差距,货物供应不足也可能造成物价上涨,即意识到两种利率的不吻合是物价不稳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可参阅《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附录。

或其他实际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物品数量变化所引起的物价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一种是累积性的,而后者则是一次性的。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威克塞尔主要是从两种利率不一致时企业家们和要素所有者的行为来说明累积过程。在《国民经济学讲义》一书中,他写道:“某一特定商品价格的上涨或下落,都以该商品的供求均衡的搅乱为前提。……凡对于每一商品是真实的,则对于一切商品的总体也必然是真实的。因此,物价之普遍上涨便只能在这个假定下才可以想像:即商品的一般需求由于某种理由已经大于其供给,或可预期其大于供给。这一点听起来好像是个矛盾的理论。因我们同萨伊一样,已经习惯于认为商品本身是相互构成其需求并相互限定其需求的。并且,最终说来,货品的确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却正是那个首先发生的环节,即一商品与其他货品最终交换的中间环节,亦即由货币对商品的需求与商品对货币的供给所形成的环节。因此,凡是值得称为货币理论的任何理论,都必须能够论证在一定的条件下,货币对商品的需求是如何地并由于何种理由超过商品的供给或不足于商品的供给。”^[1]这段话表明,他开始从总供求的不一致来说明累积过程,从而顺便指出了萨伊定律的局限性在于它只适用于物物交换经济,而不适用于货币经济。这一点,与他认识到货币不仅具有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职能,还具有价值贮藏职能是有密切联系的。注意到货币的存在可能导致总供求不一致,这也许是威克塞尔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的实际理论相结合所产生的最可取的成果,同时也表明他是西方经济学家中早于凯恩斯而反诘萨伊定律的人。

在上述对累积过程的分析中,威克塞尔以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始终存在差距为前提,着重分析企业家和要素所有者的行为对形成累积过程的影响。但他留下两个问题:(1)两种利率间的差距何以长期存在。(2)这种差距最终何以消失从而结束特定方向上的累积过程。对这两个问题,他主要通过分析银行行为的分析来回答。

威克塞尔指出,若不考虑银行的行为动机及其所受到的行为限制,则从理论上讲,银行有可能使货币利率始终高(低)于自然利率,从而使物价的向下(上)的运动持续累积下去。但事实上银行是追求其自身利益的,且其行为受到各方的限制。

首先,单个银行必须和其他银行同步,不可能独自任意决定货币利率,若个别银行要保持过高或过低的货币利率,则将失去一切客户或破产。

就单个国家来说,若其货币以金属本位为基础,则它的银行面对国外银

^[1]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行时,其地位也如上述,若货币利率过低,则贵金属将分流,若货币利率过高,则造成外来贵金属流入,而银行须以存款形式接受并照付利息,同时由于货币利率过高其借户又相应减少,结果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减少而存款利息支付增加。

以上是从银行间的相互制约来说明单个银行或单个国家的银行不可能随意决定货币利率。但假设所有银行都自觉采取相同的货币利率,那么货币利率所受到的限制便具有另一种情况。这时,货币利率持续低于自然利率所造成的物价上涨的累积过程,将导致公众对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纸币与支票)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这在金属本位制度下,便意味着银行的准备金相对来说处于越来越不足的状态。同时物价上涨的累积过程还将打击黄金生产,刺激工业增加对黄金的需求,当需求超过生产的供给时,便只能取自银行的库存。这又从另一方面使银行的黄金准备处于绝对减少的状态。上述两种状态的发展将危及银行的信用甚至生存。另一方面,货币利率持续高于自然利率所造成的物价下跌的累积过程,将导致公众对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的需求不断减少。储蓄存款不断增加,而银行则必须为这些存款支付略低于贷款利率的利率。这将使银行的经济利益受到危害。因此,无论是货币利率高于还是低于自然利率,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到一定时候银行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或者生存,自然会采取行动消除两种利率之间任何方向上的差距,从而结束累积过程。

同时,威克塞尔又指出,虽然货币利率最终会由于银行的利己行为而趋向不断变动中的自然利率,但这个过程往往是很费时间的。其中的原因只有在洞悉银行技术方面的奥妙之后方能回答,但有两个突出原因,即银行家们往往按习惯和常规办理,不愿轻易变动货币利率;以及个别银行或个别国家的银行须和其他银行或其他国家的银行协调行动,而协调便需要时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若不考虑银行行为,只考虑企业家和要素所有者的行为,则累积过程一旦开始便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宏观经济的自发趋势是走向非均衡。但若同时考虑银行行为,则累积过程便不可能无止境地持续,虽然往往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同时,物价变动的累积过程现在成为恢复均衡的力量,它最终将迫使银行采取行动使货币利率趋向自然利率。于是宏观经济在失衡之后的自发趋势是依靠物价变化的累积过程来走向新的均衡。

威克塞尔指出,当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时,物价变动的累积过程结束,此时货币价格处于均衡状态。但货币价格的均衡与相对价格的均衡是不同的。“后者或可比之于一种满足稳定平衡条件的机械装置,譬如摆锤。每

一个离开平衡地位的变动,就促使一些力量发生作用,使之回复到原来地位,变动范围越大,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增大,……就货币价格言,……可以比之某种容易转动的物体,譬如一个圆柱,它在所谓随遇平衡的状态下停留在平面。……需要某种力量来推动这个‘价格圆柱’,使它不停地运转。但是当这个力量——利率的提高和降低——在发生作用时,圆柱将依不变的方向移动,……运转迄某点为止是一个加速的过程,这时即使力量已停止发生作用,它仍将活动一个时期。圆柱一旦静止以后,就不再有恢复到原来地位的倾向。”¹ 简言之,对于相对价格来说,均衡通常是稳定的,而对于一般物价水平来说,均衡是不稳定的。

威克塞尔认为上述理论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在理论上,它说明了人们争论不休的关于物价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利率的独立变化所造成的两种利率间的差异引起物价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则是货币利率发生与物价同方向运动的主要原因。而银行准备金的多少、贵金属的生产、纸币发行及信用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对货币利率的决定起次要作用,它们对于货币利率向自然利率的移动,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我们可以用下述环形图(图 7-4-1)来表达他所提出的物价与利率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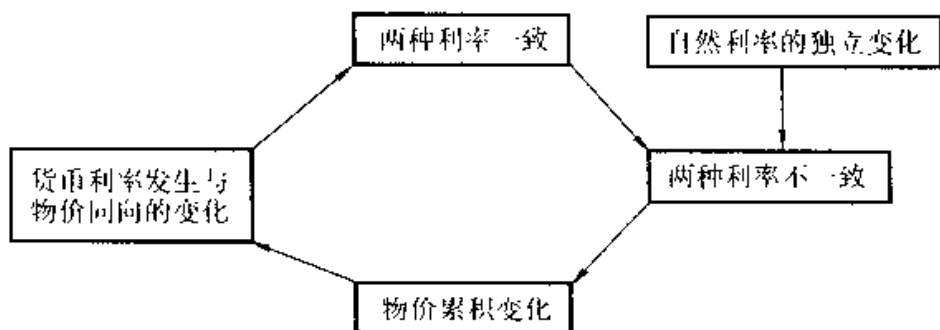


图 7-4-1

这样,他就解释了传统货币数量论所无法说明的货币利率何以会与物价水平作同向运动的原因。在实践上,这个理论将使银行能够自觉地采取行动,以保持物价稳定,从而“对世界经济将发生无可争辩的利益”²。

综合来看,威克塞尔的上述理论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均衡条件的分析,用他的话讲便是货币均衡价格的决定理论;二是宏观经济的失衡与复衡的过程分析,用他的话讲便是累积过程理论。第一方面的理论以静态假设为隐含前提,不涉及技术进步和由新投资引起的资本积累。第二方

¹ 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82 页。

² 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42 页。

面的理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动态分析,因为它涉及了时间过程,但严格来说并不是那种涉及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的动态分析,而是对于宏观经济由均衡到失衡再到新的均衡的过程的分析。前后两个均衡从物价水平方面来看是不一致的,但从经济的实际面来看,并无区别。因此这种失衡—复衡的过程分析仍然是以经济实际面的静态假设为前提的。所以这部分理论虽然涉及了时间过程,具有动态分析的外观,但实质上仍是一种静态分析,严格讲是静态假设下的过程分析。这种静态分析的局限性后来被缪尔达尔所指出并克服。此外,这两方面的理论都以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为当然前提,因此都是关于物价而非关于产量和就业的理论。前一方向涉及均衡的物价水平的决定,后一方面涉及物价水平的变化。采纳还是放弃充分就业这一前提,便构成他和凯恩斯(1936年以后的)的分水岭。其实他已经意识到,若尚未充分就业,则信用的松弛便可能导致产量的增加。¹⁾他之所以采纳这一前提,很可能与他那时的瑞典的实际情况有关。他谈到,通过向实业家们进行调查,得知在萧条时出现的是存货的增加而非产量和就业的下降。²⁾

第五节 政策主张

威克塞尔的政策目标可概括为两点:(1)保持宏观经济的均衡状态,消除经济波动。(2)改进收入分配状况,促进社会福利。

威克塞尔认为,为了实现上述第一个目标需要银行随时自觉调整货币利率,使之跟上自然利率的变动,具体做法是:“只要价格没有变动,银行的利率也不变动。如果价格上涨,利率即应提高;如果价格下跌,利率即应降低;以后利率即保持在新的水平上,除非价格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动,要求利率向这一方或那一方作进一步的变动”³⁾。为此,首先需要同一国家内的各银行在规定利率时要彼此合作。当这种合作不能顺利实现时,还可以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贷款资金的数量,进而影响货币利率。⁴⁾此外,还需要各国中央银行彼此合作,调整相互间的利率差别,共同维持物价的稳定,具体做法是各国银行都以平价兑现汇票及各国货币,不

1) 参阅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3页。

2)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88-392页。

3)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4)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考虑汇率的任何差异,同时以利率为手段保持国际收支平衡。¹这可以说是固定汇率制度的思想萌芽。

为了防止金币数量变化对物价的影响,威克塞尔提出要废除金币的私人自由铸造制度。他指出金本位制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信用的发展使黄金储备成为不必要;另一方面,对于稳定币值来说,它又是必要的。只有废止自由铸造金币的制度,使货币价值与金属分离,才能克服金本位制的上述矛盾。这可以说是主张废除金本位制的思想萌芽。

威克塞尔虽然强调物价稳定的重要,但也清醒看到,不可认为价格稳定便可克服萧条。

关于第二个目标,威克塞尔根据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论证财产分配不均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此,需要由政府收入分配进行正确的干预,并需要限制工人的工作时间。

威克塞尔虽然看到自由放任无助于实现上述两项政策目标,但也并没有明确提出要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第一个目标,他更多的是寄希望于银行家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心。对于第二个目标,他提到了政府干预,但同时提出了这种干预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即政府必须是建立在民主主义原则上的,并且干预的结果不应当以减少总产量为代价来实现收入再分配。他写道:“一般说来,不加限制的自由总比错误的限制和强制制度为可取。只要一国的政府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原则上,那就存在着这种措施只在其有利于大多数人时才被采取的确实(虽然不是常常可靠的)保证。而当商业和工业政策掌握在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手中时,那就很可能推定其将走上相反的方向。”²

第六节 威克塞尔综合体系的意义

熊彼特把威克塞尔和瓦尔拉斯、马歇尔一起并列为1870—1914年间,在纯理论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这一评价把威克塞尔放到了与马歇尔相匹敌的地位上,是恰如其分的。威克塞尔也像马歇尔一样,在大致相同的的时间里,建立了综合古典经济学和边际效用论的理论体系。关于他的价值理论的综合性质前面已经有所分析,不再赘述。他的分配理论,则是综合

¹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312页。

²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边际主义者内部两种理论(边际生产力论和时差利息论)的结果。他的累积过程理论(或从另一角度来看的货币均衡理论)则是在综合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庞巴维克、杰文斯的资本利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 所以把威克塞尔的体系称作综合体系是不过分的。

威克塞尔与马歇尔的又一共同之点,是他们通过各自的综合体系,分别创建了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两个寿命最长的学派——瑞典学派和剑桥学派。他们二人的区别在于:(1)马歇尔综合体系的主要成就在于微观方面,而威克塞尔综合体系的主要成就在于宏观方面。(2)马歇尔以局部均衡为框架综合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思潮;威克塞尔以一般均衡为框架综合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思潮,并且对边际主义思潮内部的不同观点也进行了一定的综合,如在分配理论方面。(3)对于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综合体系中的肯定语调较浓,威克塞尔综合体系中的肯定语调较淡。(4)马歇尔综合体系与后来的凯恩斯革命的逻辑联系较弱,威克塞尔综合体系与凯恩斯革命的逻辑联系较强。

威克塞尔综合体系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开辟了静态条件下的宏观均衡分析和宏观过程分析的新领域。他的宏观均衡分析,后来在缪尔达尔那里得到了更为精确的表述,并发展为动态条件下的均衡分析。他的宏观过程分析后来被米塞斯、哈耶克发展为解释经济周期的一种理论。但他本人显然并不认为累积过程理论便是解释经济周期的全部理论。他承认货币价格波动与经济周期有联系,但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且充分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的时断时续。^[2]

2. 提出了以稳定物价为目标,以银行自觉调节利息率为特征的宏观货币政策,这一政策构成凯恩斯革命之前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同时,这一政策预示了货币制度由金本位制向管理通货制的过渡。

3. 威克塞尔的分配理论和资本理论中,包含了以后新剑桥学派反对新古典主义边际生产力论的思想萌芽,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帕西尼蒂就指出:“在最近技术再转折争论中已显现出来的传统资本理论中一些困难可以追溯到威克塞尔关于资本积累的分析。”^[3] 威克塞尔的资本和利息理论,并不是纯粹的边际生产力论,也不是单纯的时差利息论,它似乎是以后一种理论为主体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一种综合。但实际上又包含着许多不利于这

[1] 参阅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著者自序。

[2] 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页。

[3] 转引自史晋川《斯拉法革命》,《复旦大学研究生论文》(1984年),第40页。

两种理论的论点。¹可以说,这是威克塞尔研究中一个尚待深入的领域。

4. 威克塞尔用线性齐次的生产函数(它意味着技术系数未必是常数)代替了瓦尔拉斯体系中的固定技术系数的生产函数,从而深化了一般均衡理论。深化的另一方面便是引入了时间因素。

5. 在分析方法上,威克塞尔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比较静态分析乃至动态分析,为以后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分析奠定了基础。

¹ 参阅乔安·罗宾逊《资本积累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63页。在这里,罗宾逊指出了威克塞尔对庞巴维克资本理论的批判。

第八章 英国剑桥学派对马歇尔 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

自从马歇尔创建了剑桥学派之后,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剑桥大学涌现出一个经济学家群体,包括阿瑟·塞西尔·庇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丹尼斯·霍姆·罗伯逊、皮罗·斯拉法、琼·罗宾逊等。本章只考虑这些经济学家截至30年代为止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庇古发展了马歇尔的福利思想,提出了系统的福利经济学,并专门研究了与福利问题密切关联的失业问题、产业波动和货币问题。凯恩斯主要是建立了系统的货币理论体系。罗伯逊主要是对货币和经济周期的研究。斯拉法的贡献比较特殊,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在马歇尔体系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贡献,而是对马歇尔体系的基础提出了疑问,进而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进行了重新检验。罗宾逊主要是在斯拉法的启发下,开拓了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本章第一节介绍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周期理论、失业理论和货币理论。第二节介绍斯拉法和罗宾逊夫人对马歇尔体系的突破。至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则放到第三篇介绍凯恩斯革命时再一并介绍,而罗伯逊的贡献由于资料限制,暂付阙如。

第一节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周期理论、 失业理论和货币理论

庇古·阿瑟·塞西尔(Pigou Arthur Cecil, 1877-1959年),出生于英格兰怀特岛赖德。1900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1901年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讲师,1902年任研究员,1908-1943年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是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继任者。其主要论著有:《工业和平的原理与方法》(1905年),《福利经济学》(1920年),《论失业问题》(1914年,有中译本),《工业波动理论》(1927年,有中译本),《公共财政研究》(1928年),《失业理论》(1933年),《静态经济学》(1935年),《就业与均衡》(1941年),《凯恩斯的“通论”的回顾》(1950年)。

一、福利经济学

关注福利问题,是马歇尔研究经济学的出发点,但他并没有建立系统的福利经济学体系,只是提出了一些对后来庇古所建立的福利经济学深有影响的概念,如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外部经济和不经济,等等。作为马歇尔的嫡传弟子,庇古继承了他关心福利问题的传统,于1912年发表了《财富与福利》一书,后经修改充实,于1920年易名为《福利经济学》出版。这部巨著是庇古的代表作,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第一部系统论述福利经济学问题的专著。

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使社会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因此,它的性质不同于实证经济学,后者研究“是什么”、“会是什么”这类问题。它是一种规范经济学,或实用经济学,致力于研究“应当是什么”、“应当如何”这类问题。

庇古对经济福利的含义进行了几方面的说明。首先经济福利是一种狭义的福利,与广义的福利不同,广义的福利包括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经济福利是与货币尺度相关联的那一部分福利,是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的那一部分福利。经济福利虽然有时会与广义的福利发生不同向的变化,但一般来说经济福利的增长总是意味着广义福利的增长。第二,个人的经济福利与其他福利一样,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满足感。第三,虽然非经济福利难以度量,但经济福利是可度量的,从而不同人的经济福利是可比较的,可加总的。第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是各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由这四点说明可以看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以及基数效用论的基础上的。因此,他所建立的福利经济学后来被称作旧福利经济学,以区别于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新福利经济学。

庇古认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取决于两个基础因素:国民收入(国民净产品)的大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一定时,国民收入越多,从而人们消费的商品和劳务越多,从中获得的满足越大,则全社会的经济福利越大。当国民收入一定时,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的经济福利越大。这是因为人们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而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又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所以,高收入者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将使后者增加的福利超过前者减少的福利,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由此增加。庇古又指出,在下述两种情况中,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是否增加是不确定的:一是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收入的分配更加背离了均等化的方向;二是收入分配趋向均等化的同时,国民收入减少

了。

在肯定社会的经济福利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大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这两个因素之后,庇古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国民收入大小的因素。他认为,关键因素是既定资源在不同部门中的配置。为了说明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他提出了边际社会净产值这个概念,它等于边际社会净产品与售价的乘积。而边际社会净产品是个流量概念,指既定资源合理使用时,其边际增量引起的,从社会角度来看的总产品的增量。它是有用产品和有害产品的代数和。例如火力发电厂生产电是有用产品,但其烟囱所冒之烟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是有害产品,两者的代数和才构成从社会角度来看的净产品。

庇古提出,在资源既定且不考虑资源转移成本的前提下,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化的资源配置(即最优配置)条件是:任何一种资源在每一种用途中的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因为把资源从边际社会净产值较小的用途中转移到边际净产值较高的用途中,总会增加国民收入。但若考虑到转移成本,则转移到新用途所获得的增加收益应大于转移成本。

庇古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源配置是通过私人的自发行为实现的,而私人则是在追求最大收益这一目标的支配下,根据不同用途上的边际私人净产值,来确定自有资源的投向,力求达到各种用途上的边际私人净产值相等这一状态。边际私人净产值是指在某一用途上追加一单位资源给私人带来的增量收益。若边际私人净产值在任何用途上恒等于边际社会净产值,则私人的自发行为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庇古认为,实际生活中存在种种原因使边际私人净产值背离边际社会净产值。这种种原因之一是因不确定性和私人企业的保密行为所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它使人们对投资的预期收益估计过高或过低,从而导致资源的误置。原因之二是某些资源的不可分性,这使得这些资源无法充分转移和配置以实现边际私人(社会)净产值处处相等。原因之三是某些耐用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这使使用者过度使用这些资料,以致边际私人净产值大大超过边际社会净产值。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边际私人净产值背离边际社会净产值:一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因素的存在;二是经济行为的外部影响。他侧重分析了后一种因素。他提出,内部经济与内部不经济这两个概念描述的是厂商的产量与单位成本间的关系,若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下降,便是内部经济;若产量增加单位成本上升,便是内部不经济。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这一对概念描述厂商的经济活动对部门内和部门外其他厂商及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若厂商的行为给其他厂商及其他经济主体带来无需付酬的利益,便是外部经济;若厂商的行为给其他厂商其他经济主体带来得不到补

偿的损失,便是外部不经济。存在外部经济的场合,边际私人净产值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值。因此,由于经济行为的外部影响的存在,即使在排除了垄断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也无法像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使私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干预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必不可少的手段。

这里有必要指出,庇古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是从马歇尔那里借用和引申来的两个术语,其所表达的含义与马歇尔赋予它们的含义并不相同。马歇尔主要提到“外部经济”,其含义是指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因其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单位成本降低。¹所以马歇尔的“外部经济”与庇古的“外部经济(不经济)”是两回事情。前者指企业活动从外部受到的影响,后者指企业活动对外部的影响。鉴于这一区别,应当把庇古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这对概念看作是他的一个新创造。这一对概念已成为今天分析市场机制优劣的重要工具。

庇古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干预的方式,他主张运用税收和津贴来克服外部影响所造成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对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即对于边际私人净产值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场合,政府实行奖励和津贴,以鼓励厂商增加产量;对于边际私人净产值大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场合,政府进行征税,以迫使厂商减少产量。这类促使边际私人净产值向边际社会净产值靠拢的措施被后人称作是庇古式税收。为了克服各种形式的垄断对资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响,庇古主张运用间接控制或直接控制手段来消除或限制垄断。间接控制便是运用法律手段禁止出现垄断组织,或限制垄断组织损害社会的产量和价格行为。直接控制就是由政府规定销售价格或其浮动区间,或者干脆由政府直接经营某些必定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

除了上述促进资源最优配置的干预措施之外,庇古还主张政府以收入分配均等化为目标对自发形成的收入分配进行干预。具体措施之一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但要注意不能损害资本形成,因此征课的对象不应当是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具体措施之二是由政府向穷人转移收入,转移可以是直接的,如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服务设施等;也可以是间接的,就是补贴那些专门生产穷人的必需品的部门和厂商,以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但要反对施舍性质的收入转移,强调任何收入转移措施都应当防止助长懒惰和浪费。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外部影响对资源最优配置的干扰,从而论证了由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以及收入分配

¹ 参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七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8-280页。

对于提高全社会经济福利的重要性。他的体系,可以说是马歇尔体系向实用化方向的一个重大发展。马歇尔的主要成就在于描绘了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但他并没有详细探讨并充分论证政策主张。这一步工作则由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体系中完成了。

二、周期理论

庇古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见于他1927年发表的《工业波动理论》一书。在书中,他主要涉及了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周期的一般特征、原因及周期性;二是消除波动的方法。

庇古指出,通常所说的经济波动有三种情况:一是“长期延续的广泛变动”;二是“延续数年的较短波长的摆动”;三是“随正常年度的季节变换而来的短期变动”^①。而他所研究的主要是第二种类型的波动。他认为可用产量指标和就业指标来衡量和描绘经济周期,但由于统计资料方面的原因,使用就业指标更合适。

庇古指出,经济周期具有五个一般性特征:一是国际性,即经济周期往往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二是相似性,即不同的经济周期都有许多很相似的地方;三是相关性,即不同行业的周期在时间上和方向上一般是吻合一致的;四是波幅的差异性,即资本品工业比消费品工业有更大的波动幅度;五是异步性,即资本品工业的波动往往领先于消费品工业。

庇古认为,经济周期的直接原因是工商业者变动不定的预期。^②而导致获利预期变动的则有三方面的原因:“真实原因,心理上的原因以及自发的货币原因”^③。真实原因包括农作物收成的变动,新技术新产品的发明与改进,新矿床的发现与开采,劳资纠纷,偏好的改变,国外需求的变动。^④他以为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要清楚地区分各个因素的影响也是做不到的,但有一点比较明确的就是收成的变动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影响越来越小。同时,货币工资的刚性或劳动供给的弹性,以及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对导致和加剧经济周期都起着重要作用。

心理上的原因是指工商业者“在对企业前景的预测中所犯的过分乐观

①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页。

②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页。

③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页。

④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8页。

或过分悲观的错误”¹。工业经济中的经营决策离不开预期,而上述种种真实原因往往导致预期的失误。庇古认为决定预期错误大小的因素有以下六点:²“首先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偏好的变化莫测,变化越是莫测,则预测错误越大。二是不同智能的人在工商经营活动和其他活动中的分布,以及他们参与经营决策的程度,高智能的人参与企业经营越高,参与决策的程度越高,则预测错误越小。三是决策者可得的信息,信息越全面越真实,则预测错误可能越小。四是经营管理权的分散程度,这种分散,尤其是产销决策权的分散,往往导致供求信息沟通上的困难,以及订货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预测错误。五是产品生产周期的长短,生产周期越长,则预测越可能出错。六是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范围越大,则预测越有可能出错,而只为自己进行生产一般是不会发生大的预测错误的。他进而分析了使预测错误得以扩散或普遍化的三个因素:³“一是企业家之间在心理上的相互依赖,相互感染。二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当一个行业的企业家预期乐观增加其投入时,往往导致其上游行业的销售旺势。三是企业家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链。他还指出,过于乐观的预期错误和过于悲观的预期错误并不是互相隔离的,而是相互孕育的,这是导致经济波动周而复始的重要原因之一。”⁴

自发的货币原因在庇古看来,对于金本位制国家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⁵“一是金矿的发现和关闭及提炼黄金的新技术。二是外国货币政策及黄金贮量的变化,尤其是信贷的扩张及收缩。三是与国外金融业务有关的短期的黄金流出入。他比较详尽地探讨了货币原因导致经济周期的一些具体机制。这些机制之一是货币信贷的扩大与收缩引起投资的增加与减少;机制之二是货币信贷的松紧助长了企业家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机制之三是货币信贷的松紧影响一般物价水平。他依据统计资料指出了银行信贷创造量的波动与就业量的波动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探讨了引起一般物价水平变化的因素,提出它与货币流通量同向变化,与实际收入或劳动生产率,与货币流通期的平均长度反向变化。”⁶他提到了价格水平变动对于企业家预期的相互影响,以及对于长期合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经济周

1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0页。

2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1—80页。

3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3—86页。

4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7—89页。

5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9—103页。

6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2页。

期。

庇古认为经济周期是上述三大类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坚决反对从单一原因去说明周期的观点,如货币论、心理论、收成论等等。

从总体上看,庇古对经济周期原因的分析是一种多因论,既强调客观原因,也重视主观心理因素;既看到了经济实际面的影响,也承认货币面的作用。其不足则是缺乏对于各种原因的一个清晰的层次分析,使人难以分清哪是主要原因哪是次要原因。虽然他在书中也想进行这种分析,但效果不理想。对照一下熊彼特的周期理论,就能清楚地看到其不足。

关于消除经济周期的办法,庇古认为,首先是要认清经济周期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他认为,如果周期是人们对工作和闲暇的偏爱的周期性变化,那么就不能认为它一定是祸害。^①同时,如果没有经济周期,没有萧条所形成的压力,企业家技术改进的动力便会下降,低能的企业家就不容易被淘汰,从而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便不利。^②尽管有上述两点似乎是为经济周期辩解的看法,他总的说来还是强调了经济周期所造成的失业对人力资本造成的危害,“大量的短期失业可以损害一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损害他的一般性格”^③。

庇古提出,在克服周期时,也要考虑成本—收益原则,要使克服周期的边际费用与周期被克服后的边际收益两者相等。^④至于克服周期的具体措施,由于他往往着眼于克服失业现象,故在下面失业理论中再详细介绍。

三、失业理论

作为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的庇古,对于失业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早在1914年,他就发表了一本《论失业问题》的小册子。1927年,他出版了《工业波动理论》一书,再次谈到了失业的救治问题。1933年,面对大萧条的恶劣局面,他又出版了《失业理论》一书。

庇古首先给“失业”下了定义:“如果作出某些保留和解释,所谓失业就等于一般所了解的‘非自愿赋闲’。”^⑤这就是说,他所说的失业就是非自愿失业。而这种非自愿失业有两种形式:完全失去工作和被迫缩短工时。

①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4—225页。

②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2页。

③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8页。

④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6页。

⑤ [英]庇古:《论失业问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1页;参阅该书第3页、第97页。

庇古认为：“失业现象完全是由于工资率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失调而引起的。”并指出，在劳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除了因不同等级的劳动需求发生变动而引起的暂时失业之外，不可能存在长期失业现象，但劳动市场并不是自由竞争的，工资率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由自由的竞争力量决定的，因此便出现了失业。为了分析其原因，他区分了静态和动态。在静态条件下，失业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于工会或其他因素，使得工人所要求的工资率高于自由竞争条件下自发形成的工资率。二是根据人道原则制订的最低工资立法，使得一些愿意接受也只能接受更低工资的人失业。三是一部分工人的素质和教育水平低下，无法满足工作岗位所需。而在动态条件下，对劳动需求会由于季节变化和经济周期而发生有规律的变动，还会由于偏好、技术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不规则的变动，这就使均衡工资率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这时，出现失业的原因还要加上工资率的刚性。工资率向下的弹性为工人所阻挠，向上的弹性则为业主所阻挠。刚性工资不能适应动态条件下均衡工资率的不断变动，于是便造成了失业。此外，劳动力由于存在流动费用缺乏流动性或流动的盲目性，也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因素。

根据对失业原因的上述看法，庇古提出了五条消除或减少失业的措施：(1)发展教育和培训事业，提高工人尤其是最低等级工人的素质。(2)成立调解委员会以解决劳资纠纷，并采取富有弹性的工资制度。(3)运用货币手段缓和波动，减缓劳工需求量的波动幅度。(4)把各地的劳工介绍所组织成全国相互联系的系统，改善劳工市场的信息状况，增加劳动的流动性，减少流动的盲目性。(5)实行政府干预。

庇古认为，政府可以调整直接与己有关的工业来控制劳工需求，也可通过补助金及赋税来调节私营工业的劳工需求。政府可以调节供给，采取逆经济风向的调节措施，在萧条中增加产量，在繁荣时削减产量。但这种调节只适用于耐用品工业，不能用于非耐用品工业。因为萧条时政府若增加非耐用品的产量，从而增加就业，势必扩大供给，降低价格，结果未被政府调节的厂商更加减产，进一步减少劳工需求；而繁荣时正相反；结果是加剧了波动。而在耐用品工业中，政府在萧条时增加产量，扩大就业可增加储备而不一定增加市场供给，这样未被调节的厂商也不会减产和削减劳动需求。政府也可以调节自己的需求，使它逆经济风向而变动，当私人需求减少时，便增加政府需求，当私人需求增加时，则相应减少政府需求，如此使经济保持稳定，减少就业的波动。但这种逆风向变动政府需求的措施是否能减少失业要取决于

① 英·庇古：《论失业问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2页。

劳动的流动性,若劳动在生产私人用品的产业与生产政府需要产品的产业之间具有流动性,则上述逆向行使的调节措施将有助于减少失业;若劳动缺乏流动性,则上述调节措施未必能减少失业。

至于政府的具体调节措施,庇古似乎更看重控制信贷进而稳定物价水平的货币手段。¹¹在萧条时增加信贷投放而在繁荣时则缩小信贷规模。他进而提出了控制信贷规模的两种做法——信贷定额配给与贴现控制——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他的结论是贴现控制比定额配给更优越,因为前者会扭曲价格信号。¹²他还提到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在效果上的不对称性,即克服过热较为有效而克服萧条不太有效。但他从繁荣孕育着萧条的观点出发,认为有效地防止了过热也就有效地预防了萧条。¹³他还不无正确地提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必须是稳定物价,而不能是保持一定数量的储备金,若以后者为目标,就难以克服萧条。¹⁴他颇有预见地看到了纸币本位制由于解除了黄金对货币量的束缚,从而有助于避免通货缺乏引起的萧条,但另一方面有孕育通货膨胀的危险。¹⁵为此他主张由国会给予银行发行纸币的权力以一定的制约。¹⁶这两点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表现出它们的价值。他还谈到金本位制条件下,稳定物价的目标与稳定汇率的目标之间的冲突:“任何一个国家自己都难自由地既能得到一个严密的稳定物价制度而同时又得到一个严密的稳定汇兑制度”¹⁷。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当前克鲁格曼“魔鬼三角关系”的先驱。

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庇古也谈到了财政政策,包括相机抉择的政府订货行为及公共工程以及相机抉择的税收和津贴行为。¹⁸但他似乎对相机性的税收政策的可行性有所怀疑。¹⁹

此外,庇古还主张各种收入政策,比如由政府编制物价指数,并激励公众将各种契约尤其是长期的加以指数化。²⁰主张由政府限制繁荣时期的加

①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9页。

②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0—258页。

③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1—252页。

④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0页。

⑤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8—279页。

⑥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0页。

⑦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4—286页。

⑧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9,318—319页。

⑨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8页。

⑩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4页。

班加点,以防止过度繁荣从而加深随之而来的萧条。¹他还希望公众自愿采取逆经济风向的行为,如萧条时自觉增加购买而在繁荣时则反向行为。²

庇古认为,上述各种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失业,但剩下的失业应当尽可能采取比较可取的形式,如普遍缩短工时,或轮流工作,而不要急于解退部分工人,使失业之苦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他还具体分析企业主采取何种失业形式的原因。³对于熟练工,使用贵重原料和精密机器的工人,掌握专利技巧的工人,业主通常是不愿解雇的;对于工资难以精确计量的计量工,业主往往倾向于解雇之;至于轮流工作,则往往由于组织困难,业主一般不愿采用。

庇古肯定了失业保险稳定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的功能,⁴指出若无失业保险,工人一旦失业,消费水平将大减,而如果要使失业后的消费维持原状,就必须大大增加平时的私人储蓄,从而减少平时的消费。他还分析了失业保险中存在的今天人们称作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问题,并指出了若干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具体措施。

由以上所介绍的失业理论可以看出,在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前,庇古就已经肯定存在着非自愿失业,但在对失业原因的分析上,庇古完全是站在新古典的立场上,强调市场机制不健全,竞争不完全,强调工资缺乏弹性,劳动缺乏流动性。正因为此,他被凯恩斯选中,作为新古典学派的代表,在《通论》中大加鞭挞。但庇古关于消除失业的措施,则完全突破了传统理论,比凯恩斯早20多年便提出了用政府干预来消除失业的主张,甚至提出了相机抉择的原则。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相机抉择原则的有效性的微观基础是劳动力的流动性。由此看来,凯恩斯与他所批判的对手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他所渲染的那么大,在消除失业的措施方面,两者是很接近的。区别在于对失业原因的分析。庇古的不足在于他所分析的是宏观现象,但采用的方法则是微观的,缺乏总量分析工具,缺乏总需求函数,没有短期概念,没有乘数概念,没有对收入水平决定机制的说明,这就使得庇古对失业的解释不如凯恩斯,同时也使得他关于政府干预的主张缺乏充分的理论根据。

1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1页。

2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5页。

3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7-329页。

4 [英]庇古:《工业波动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5-336页。

四、货币理论

庇古在货币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在1917年发表的《货币的价值》一文中把马歇尔的货币需求理论表达为数量方程式,即著名的货币余额方程式(又被人称作剑桥数量方程式):

$$M_d = kPy$$

M_d 为货币需求量, y 为实际收入水平, k 为保持在货币形态上的收入对总名义收入的比率, P 是一般物价水平。

庇古运用该方程式所表达的意思是:由于人们获取收入和与支出收入有一定时距,因此,为了便利交易,也为了应付不时之需,人们需要以货币形式保存收入。但由于货币形式上的资产不会给所有者带来收益,故人们往往只需要以货币形式保存部分而非全部收入。这就是人们的货币需求。这种需求的大小由上式可知,取决于名义收入水平 Py 和比例系数 k , 并与这两者同向变化。

庇古所提出的上述货币余额方程式,为以后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货币需求函数,以及再以后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需求函数,提供了最原始的基础。

第二节 斯拉法和琼·罗宾逊对马歇尔综合体系的发展

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 1898—1983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毕业于都灵大学。1924—1926年任佩鲁贾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26—1927年任卡利亚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27年任剑桥大学讲师,后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其主要论著:《意大利的银行危机》(1922年),《论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1925年),《竞争条件下的收益法则》(1926年),《收益递增和代表性厂商》(1930年),《哈耶克博士论货币与资本》(1932年),《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与莫里斯·多布合编《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共11卷(1951—1973年)。

一、斯拉法宣言:对马歇尔均衡价格论的挑战

斯拉法于1926年发表的论文《竞争条件下的收益法则》,被后人称作斯拉法宣言。在该论文中,他对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的供求价格论提出了挑战。

如前面第六章所述,马歇尔在其综合体系中,用一种商品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该商品的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建立了局部均衡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同时,在分析商品的供给时,又谈到了由于存在内部经济(不经济)和外部经济(不经济),会引起收益随产量扩大而递增(递减),从而使供给曲线向下(下)倾斜和向下(上)平移。

斯拉法指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与他对商品供给的分析是不和谐的,均衡价格论依赖于两个假设性前提:一是完全竞争;二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即一部门生产条件独立于其他部门的生产条件。第一个前提保证了均衡价格取决于供求均衡的交点,第二个前提保证了局部均衡方法的合理性。但是,马歇尔在分析商品供给时所提出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却使上述两个假设前提难以存在。他认为,内部经济使厂商的供给曲线向下倾斜,势必导致垄断,从而使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不再取决于供求均衡。而外部经济则意味着有关的不同部门的产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这就破坏了局部均衡方法的合理性。因此,内部经济与完全竞争不能并存,外部经济与局部均衡不能并存,这就是斯拉法对马歇尔体系的两难推理。

斯拉法两难推理的提出,深深影响了西方微观经济学后来的发展。这一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马歇尔以行业为基本分析对象过渡为以厂商为基本分析对象;二是从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分析过渡为不完全竞争分析。在斯拉法的影响和启发下作出这一发展的便是剑桥经济学家琼·罗宾逊。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03—1983),出生于英格兰坎伯利。1925年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1929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助理讲师,1937年升副教授,1965年升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其主要论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有中译本),《就业理论引论》(1938年,有中译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41年,有中译本),《资本积累论》(1956年,有中译本),《异端经济学》(1971年),《现代经济学导论》(1974年,有中译本),《发展与不发展》(1979年),《经济论文集》(1979年)。下面主要介绍《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的内容。

二、边际分析方法

琼·罗宾逊在分析方法上的最主要特征,也是最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所称道的特征,就是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效用、成本、收入、要素生产力诸方面。从而使厂商(无论是垄断的还是竞争的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的行为分析由边际分析方法统一了起来。这对马歇尔体系来说是一个推进。马歇尔在分析垄断厂商行为时,主要通过总量(总收益总成本)概念。这与他在

分析其他问题时主要运用边际方法是不一致的。琼·罗宾逊则主要运用边际概念说明了各类厂商的行为。她的分析工具现在是当代西方厂商理论的标准工具。

琼·罗宾逊指出了边际函数与平均函数之间的关系：若边际曲线位于平均曲线之下，则平均曲线必下降；若边际曲线位于平均曲线之上，则平均曲线必上升；若边际曲线与平均曲线相交，则交点必为平均曲线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如图 8-2-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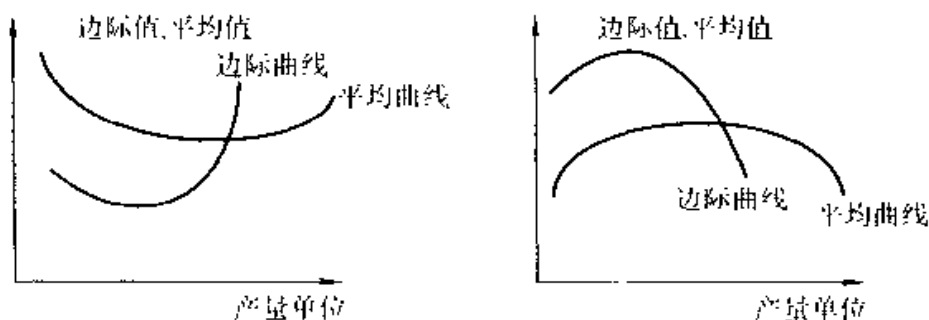


图 8-2-1

琼·罗宾逊进一步指出了边际曲线和平均曲线之间的基本关系，对任意产量来说（如图 8-2-2 中的 OQ ），边际曲线下的面积 $AEQO$ 等于平均曲线对应的矩形 $BDQO$ 。因此，当平均曲线为直线时（如图 8-2-3）边际曲线必定穿过 BD 线的中心 C ，且三角形 ABC 全等于 EIX' ，线段 AB 等于 E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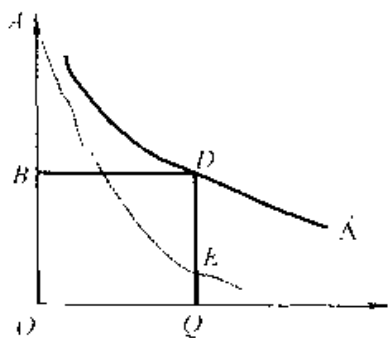


图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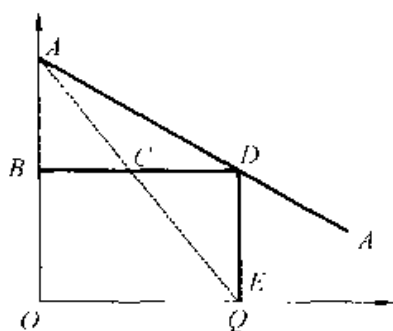


图 8-3

由上述结论，琼·罗宾逊给出了由已知平均曲线绘边际曲线的方法：对于直线性的平均曲线，其方法如图 8-2-3 所示，对于非线性的平均曲线，如图 8-2-4 图所示，在曲线任一点如 D 点作一切线，交纵轴于 A ，作一水平线交纵轴于 B ，在 D 点下方垂线上，离 D 点距离为 AB 处，即 E 点，便是产量为 OQ ，平均值为 QD 时的边际曲线的位置，边际值为 QE 。依照此法，便可根据已知的平均曲线绘出相应的边际曲线。

琼·罗宾逊还指出了一定产量下的平均值 (A) 与边际值 (M) 以及平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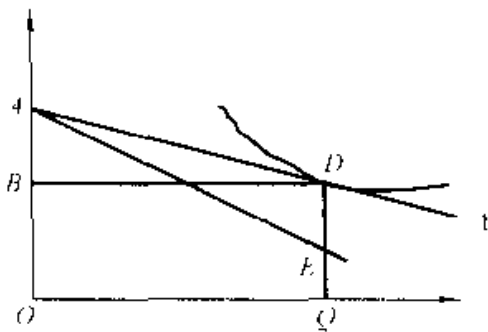


图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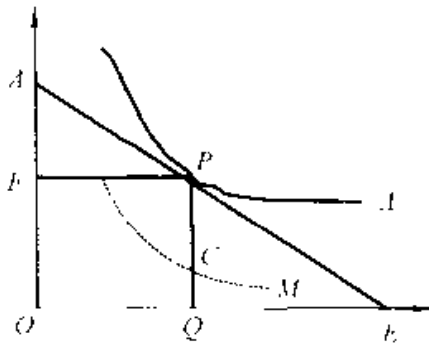


图 8-5

曲线弹性值(ϵ)者之间的关系:

$$\epsilon = A \cdot (A - M), \quad A = M\epsilon / (\epsilon - 1), \quad M = A(\epsilon - 1) / \epsilon \quad (8-1)$$

这可用图 8-2-5 证明:图中曲线 A 为平均曲线,虚线 M 为边际曲线,设 PQ 为产量 OQ 的平均值,CQ 为边际值。过 P 点作一切线,交纵轴于 A,交横轴为 E。平均曲线在 P 点的弹性为 $PE \cdot AP$ 。因三角形 PEQ 相似于三角形 APF,故 $PE/AP = PQ/AF$,因 $AF = PC$,故 P 点的弹性 $PE/AP = PQ/PC = \text{平均值} / (\text{平均值} - \text{边际值})$ 。

三、垄断均衡与竞争均衡

琼·罗宾逊假定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恰好是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产量,这无论对于垄断厂商还是竞争厂商都无例外。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分别是总产量增加一单位时总收入和总成本的增量。

琼·罗宾逊用图 8-2-6 表明了垄断厂商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的决定。图中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AR 同时又是厂商的平均收入曲线。由于 AR 曲线向下倾斜,故边际收入曲线 MR 位于 AR 下方。平均成本曲线 AC 向上倾斜,故边际成本曲线 MC 在其上方。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入曲线相交于 C 点,决定了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水平为 OQ,以及相应的价格为 P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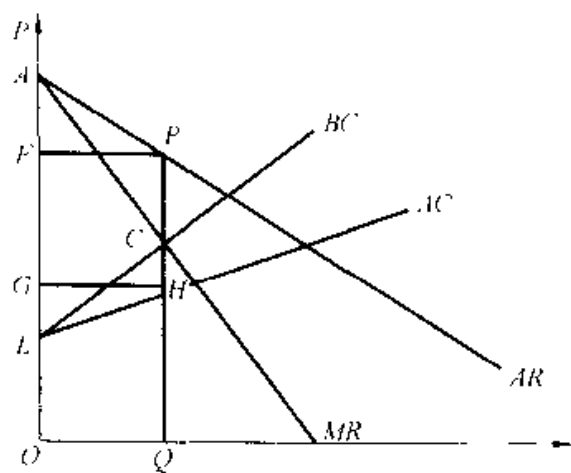


图 8-2-6

垄断利润为三角形 ACL 的面积,它正好是产量为 OQ 时边际收入曲线以下的面积减去边际成本曲线下的面积后的剩余。同时,垄断利润又等于长方形 FPHG 的面积,它等于总收入(等于面积 FPQO)减去总成本(等于

GIHQ)。

当均衡时,由前述平均值、边际值及弹性值三者关系可知,均衡价格 PQ 与边际成本 CQ 之间满足下列关系: $PQ = (CQ \times \epsilon_p) / (\epsilon_p - 1)$ 。 ϵ_p 为需求曲线(平均收入曲线) AR 在 P 点的弹性。由该关系式,可分析需求变动和成本变动(需求曲线移动和成本曲线移动)对价格的各种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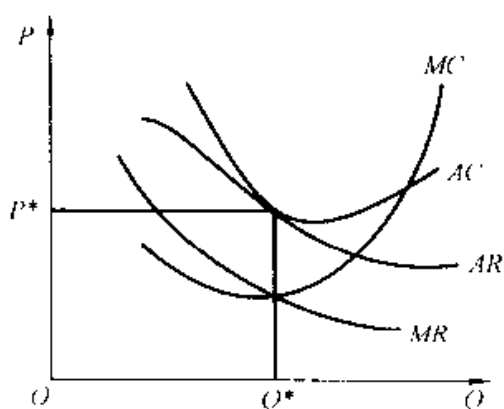


图 8-2-7

琼·罗宾逊提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均衡与整个行业的均衡是不同的,后者不仅要求行业中各厂商处于均衡状态,且要求厂商的数目固定不变,即不再有新厂商加入也没有老厂商退出。这就要求厂商只能获得正常利润而无超额利润。她把行业的均衡称作完全均衡,它需要两个条件: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平均收入(或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图 8-2-7 表明完全均衡时厂商的价格、产量和利润:产量为 OQ^* ,价格为 OP^* ,该产量的平均成本也是 OP^* ,厂商不再有超额利润,只有包含在平均成本中的正常利润。

琼·罗宾逊分析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厂商均衡和行业均衡。如图 8-2-8 所示:(a)图表示厂商均衡,(b)图表示行业均衡。由于完全竞争,厂商面临水平的需求曲线,同时又是平均收入曲线与边际收入曲线。产量仍由边际成本曲线与边际收入曲线的交点所决定。(a)图中,均衡产量的价格 PQ 大于平均成本 HQ ,存在超额利润(等于长方形 $FPHG$ 的面积)。(b)图中,由于厂商数目的变动,消除了超额利润,均衡产量的价格 PQ 等于平均成本 HQ ,实现了行业均衡的两个基本条件: $MC = MR, AC = AR$ 。

琼·罗宾逊在分析了垄断均衡和竞争均衡之后,比较了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都不变时,垄断产量和竞争产量谁低谁高。她的结论是:只有存在稀缺要素,且垄断者不必为使用稀缺要素支付全部租金,同时又有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则垄断产量方可能大于竞争产量。此外各种情况下,垄断产量总是小于或等于竞争产量。

四、价格歧视

琼·罗宾逊把价格歧视称作是同一个厂商“生产出来的同种商品按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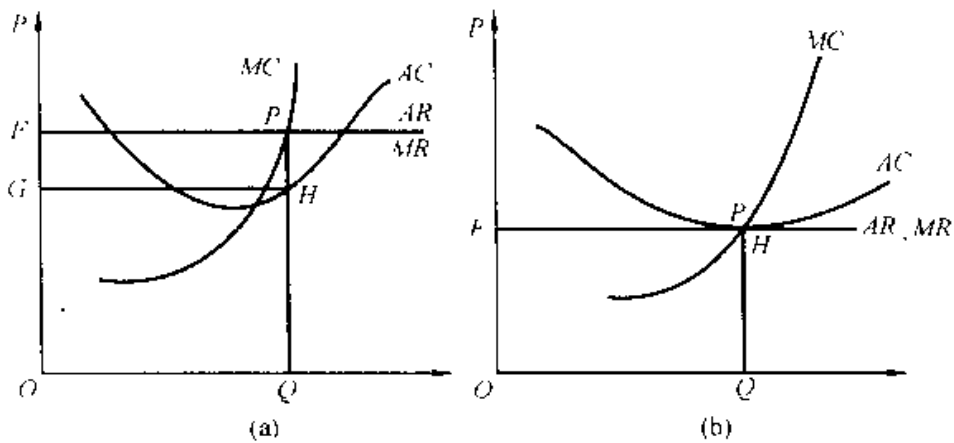


图 8 2 8

不同价格售于不同买主的行为”^①。她指出,实行价格歧视需具备几个条件:(1)该厂商要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即使市场分成各自分离的几个部分,任一厂商也无法实行价格歧视。(2)该厂商要能够为自己的同一种商品找到或人为创造出两个或更多的市场,且各市场的买者之间不可能转手倒卖。(3)不同市场的需求弹性必须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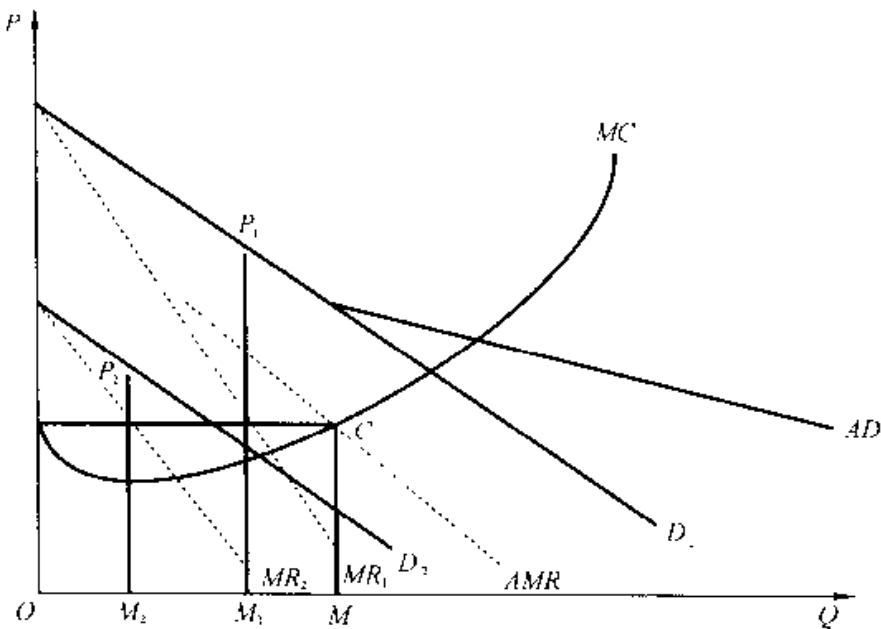


图 8-2-9

琼·罗宾逊以图 8-2-9 表达了价格歧视下的厂商均衡。其中曲线 AD 、 D_1 、 D_2 分别为总的需求曲线、第 1 市场的需求曲线、第 2 市场的需求曲线。

① 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54 页。

曲线 AMR 、 MR_1 、 MR_2 分别为总的边际收入曲线、市场 1 的边际收入曲线、市场 2 的边际收入曲线。 MC 为边际成本曲线。均衡的产量由 MC 与 AMR 的交点 C 决定, 为 OM 。市场 1 的销量为 OM_1 , 其边际收入等于总产量的边际成本, 价格为 P_1 , 市场 2 的销量为 OM_2 , 其边际收入也等于总产量的边际成本, 价格为 P_2 。由此可知, 产量均衡的条件是总的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 销量分配的均衡条件是各市场上的边际收入相等。把这两个条件联系起来, 便得到价格歧视下的厂商均衡条件: $MR_1 = MR_2 = MC$ 。满足该条件时, 厂商利润最大化。

由该条件及前述平均值、边际值、弹性值三者关系式可知, 因两个市场的边际收入在均衡时相等, 故其平均收入(价格)不同的条件只能是需求的弹性值不一致。

琼·罗宾逊进一步比较了价格歧视下的产量与单一价格下的垄断产量, 得到的结论是, 价格歧视下的均衡产量大于、等于或小于单一垄断价格下的均衡产量的条件是 $\epsilon_1 x_1^2 f_1''(x_1) > = < \epsilon_2 x_2^2 f_2''(x_2)$ 。⁽¹⁾ 式中脚码 1 代表需求弹性较大的市场, 脚码 2 代表需求弹性较小的市场。 x_1, x_2 为市场 1 和市场 2 的均衡销量, $f_1''(x_1)$ 和 $f_2''(x_2)$ 为市场 1 和市场 2 的需求函数的二阶导数。 ϵ_1 和 ϵ_2 为市场 1 和市场 2 当销量分别为 x_1 和 x_2 时的需求弹性。由该条件可以得知, 若弹性较大的需求曲线是凹形(即 $f_1''(x_1) > 0$), 而弹性较小的需求曲线是凸形或直线(即 $f_2''(x_2) < 0$), 则价格歧视下的均衡产量大于单一垄断价格下的均衡产量。若弹性较大的需求曲线是凸形(即 $f_1''(x_1) < 0$) 或直线(即 $f_1''(x_1) = 0$), 而弹性较小的需求曲线是凹形(即 $f_2''(x_2) > 0$), 则价格歧视下的均衡产量小于单一垄断价格下的均衡产量。若两条需求曲线都是线性(即 $f_1''(x_1) = f_2''(x_2) = 0$), 则两种情况下的产量相同。若两条需求曲线都是凹形或都是凸形, 则要按照上述条件来确定两种情况下的产量谁大谁小。

价格歧视与单一垄断价格相比, 哪一个更好, 要取决于两种情况下的产量比较, 不能一概而论。在罗宾逊之前, 庇古曾认为价格歧视下的产量相等于单一垄断价格下的产量。且价格歧视意味着消费者剩余有所减少, 故价格歧视比单一垄断价格更坏。罗宾逊通过以上分析确定两种情况下的产量未必是一致的, 因此从增加产量这一点来看, 价格歧视在一定条件下要优于单一垄断价格。指出这一点, 被认为是罗宾逊对西方垄断理论作出的贡献之

⁽¹⁾ 参阅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第 167 页注③。

五、买方独占

琼·罗宾逊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买主的行为。她首先假定买主追求满足最大化,因此,任何买主必须按照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支出的原则来决定自己对任何一种商品的购买量。然后她区分两种情况来分析买主的行为:一是许多买主情况下的行为,即买主之间存在完全竞争时的行为;二是只有一个买主即买方独占时的行为。

买主中间的完全竞争有赖于三个条件:(1)买主人数众多。(2)每个买主面临的是水平的(或完全弹性的)供给曲线,即他在既定价格下可以买进他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商品,或他的购买行为不影响价格。(3)卖主们对任何买主一视同仁地供给商品。

罗宾逊认为,在上述完全竞争条件下,买主的边际支出便等于价格,因此使买主满足最大化或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支出的需求量便是边际效用等于价格的需求量。于是个别买主的边际效用曲线便是他的需求曲线,而整个市场的需求曲线便是所有买主边际效用曲线的总合。

罗宾逊认为,在独买条件下,买主面临的供给曲线便是整个市场的供给曲线。若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则该买主的需求将和竞争条件下的需求一致。若供给曲线是上升或下降的,则该买主的需求可由图 8 2 10 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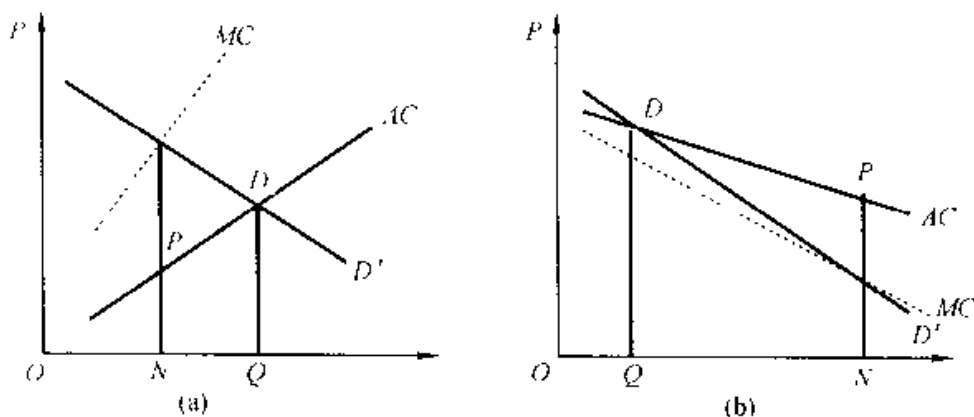


图 8 2-10

(a)图中 AC 是上升供给曲线或独买主的平均支出曲线,故边际支出曲线 MC 位于其上, DD' 是需求曲线。独买主将购买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支出的商品量 ON ,并支付低于竞争价格(DQ)的价格(PN)。(b)图中的 AC 是下降的供给曲线或独买主的平均支出曲线,故边际支出曲线 MC 位于其下, DD' 是需求曲线。独买主购买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支出的商品量 ON ,并支付价格(PN)。

由此可知,假定独买主的需求与完全竞争下的买主全体的总合需求相等,若供给价格递增,前者的均衡需求量和均衡价格都将低于后者;若供给价格递减,前者的均衡需求量大于后者,均衡价格低于后者;若供给价格不变,则两者的均衡需求量和均衡价格相同。

六、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

琼·罗宾逊以劳动要素为代表,分析厂商对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为此,她提出了四个概念:(1)平均总生产力:每人平均产值;(2)边际总生产力:相应增加其他要素条件下增加一个人而增加的产值;(3)平均纯生产力:每人平均产值减每人所用的其他要素的平均成本;(4)边际纯生产力:边际总生产力减其他要素的成本增量。她还用下述图 8-2-11 给出了上述四个变量在个别厂商那里随人数增加而变化的情况:

AGP 是平均总产值曲线, MGP 是边际总产值曲线, ANP 是平均纯产值曲线, MNP 是边际纯产值曲线。当人数为 OQ 时, AC ($MGP - MNP$) 是其他成本的边际增量, BD ($AGP - ANP$) 是每人其他要素的平均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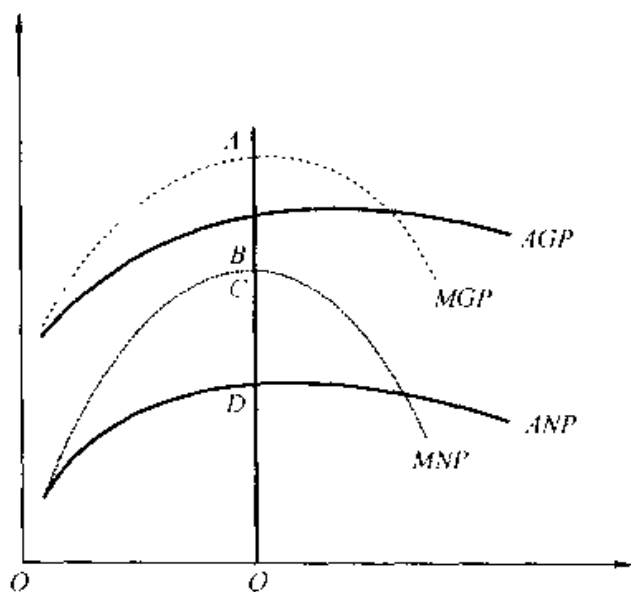


图 8-2-11

琼·罗宾逊首先分析了个别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她假定

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按照劳动边际成本等于劳动的边际纯生产力的原则确定其需求。因此其劳动的需求曲线可由劳动的边际纯生产力曲线表示。如图 8-2-12 所示:若工资为 OC 时劳动供给完全弹性,则边际劳动成本等于工资,厂商的劳动需求 OQ ,其边际纯生产力(EQ)等于工资(OC)。劳动需求为 OQ 时,其平均纯生产力 DQ 大于边际纯生产力(工资),这意味着有超额利润 $BDEC$ 。在这种情况下,将有更多厂商拥入该行业,竞争劳动要素,从而使工资上升。当整个行业均衡时,个别厂商对劳动的均衡需求和工资如图 8-2-13 所示为 OQ 和 OC 。即均衡工资为平均纯生产力的最大值,或边际纯生产力等于平均纯生产力时的值。若个别厂商的劳动供给不是完全弹性的,则行业均衡时的劳动需求和工资如图 8-2-14 所示为 OQ 和 DQ 。这时均

衡工资将低于劳动的平均纯产值的最大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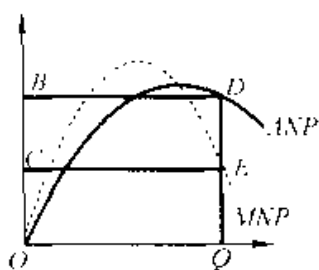


图 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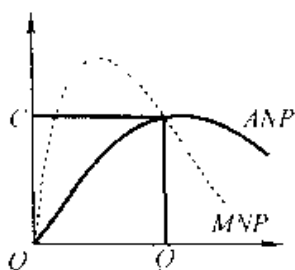


图 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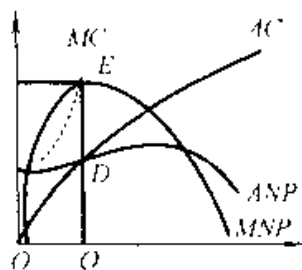


图 8-14

由上述可知,个别厂商对劳动的均衡需求取决于两个条件: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纯生产力,工资(平均成本)等于平均纯生产力。

琼·罗宾逊进而分析了整个行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对劳动的需求。她认为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便是行业的劳动平均纯生产力曲线,行业劳动需求曲线上的任何一点所对应的工资水平,都同时等于行业内各厂商的劳动边际纯生产力和平均纯生产力;该点所对应的劳动需求,正好是其中各企业均衡需求的总和。

琼·罗宾逊进一步分析了整个行业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她指出,在行业的劳动供给弹性完全,且无大规模经济的场合,若要素之间无替代可能,则劳动的需求弹性将小于其所生产的产品需求弹性。若要素之间可以替代,则替代弹性愈大,劳动的需求弹性也愈大。替代弹性是由生产技术条件决定的,它等于要素数量比例的变化百分比除以要素价格比例的变化百分比。若存在大规模经济,则劳动的需求弹性趋向增大,即使在要素不可替代的情况下,劳动的需求弹性也可能等于甚至大于其产品的需求弹性。

琼·罗宾逊比较了垄断和竞争下的劳动需求。她指出,在各种要素之间比例固定的条件下,垄断下的劳动需求将少于竞争。如图 8-2-15 所示。ANP 和 MNP 分别是竞争下和垄断下的劳动需求曲线。AC 和 MC 分别是行业的劳动供给曲线和边际劳动成本曲线。竞争下所雇人数为 OQ,垄断下所雇人数为 OM,若垄断者在购买劳动时实行完全的价格歧视,则所雇人数为 OM'。她指出,在各种要素之间比例不固定时,垄断下所雇人数有可能大于竞争。

七、三种剥削

罗宾逊定义剥削为工资低于劳动者的边际物质产品的售价。她认为,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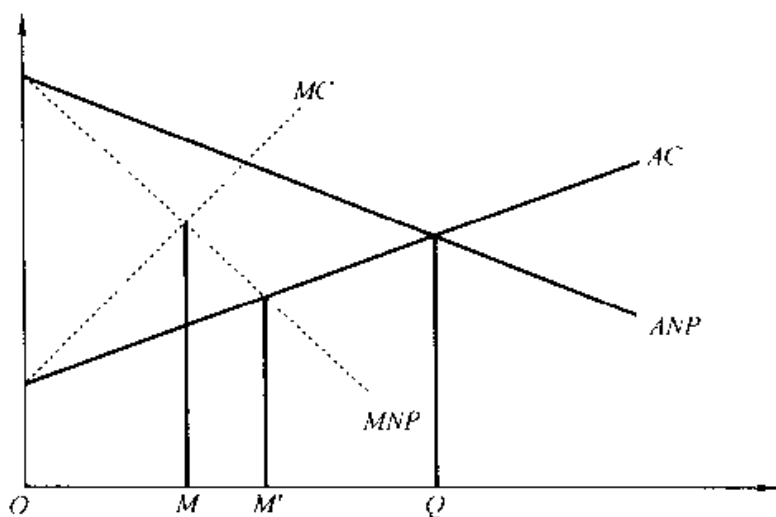


图 8 2 15

本主义条件下“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供给或商品需求缺乏弹性”¹⁾。她把由此产生的剥削分为三类：(1)劳动供给完全弹性时由商品垄断造成的；(2)商品市场完全竞争时由劳动供给的不完全弹性造成的；(3)劳动供给不完全弹性时雇主购买劳动中的价格歧视造成的。第一种剥削与商品垄断有关，第二、三种与买方独占有关。

第一、第二种剥削可由图 8-2-16 给出。AC 和 MC 分别为劳动的供给曲线(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 ANP 和 MNP 分别为劳动的平均纯生产力和边际纯生产力。MC 和 MNP 的交点决定均衡的雇佣量 ON, 工资率为 OM。FH 为单个劳动者的总剥削量, 其中 FG 为商品市场的垄断造成的, GH 为劳动市场的买主独占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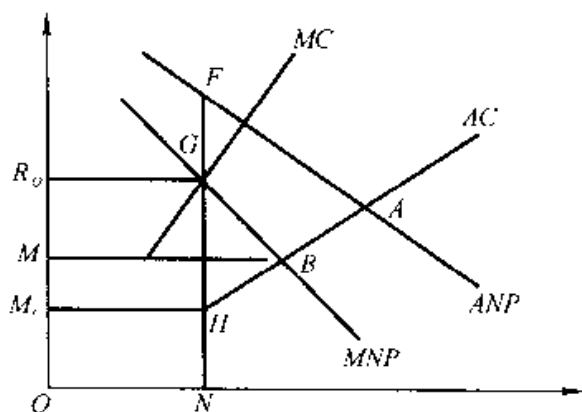


图 8-2-16

第三种剥削可以图 8-2-17 给出：假定厂商对两组工人实行价格歧视， S_1 和 M_1 分别为第一组工人(比如说男工)的供给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 S_2 和 M_2 分别为第二组工人(比如说女工或童工)的供给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 M_T 为总的边际成本曲线， D 为劳动需求曲线。 M_T 与 D 的交点决定总的

1. 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23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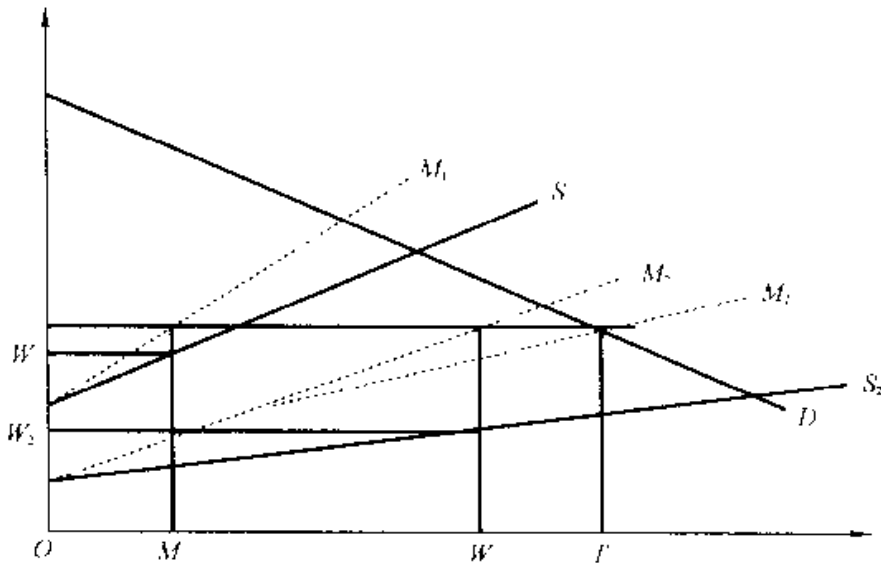


图 8.17

劳动需求为 OT ，其中 OM 和 OW 分别为男工的雇佣量和女工（或童工）的雇佣量。在这两个雇佣量上男工和女工的边际成本相同且都等于劳动的边际纯生产力。但他（她）们的工资分别为 OW_1 和 OW_2 ，都低于其边际纯生产力。

琼·罗宾逊认为，要消除垄断造成的剥削不能用提高工资的办法，那只能增加失业。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把价格控制得能从垄断者那儿取得竞争产量。对于买方独占造成的剥削，可能通过规定最低工资或消除市场的不完全，但前一种方法可能导致失业。

第九章 美国经济学家对马歇尔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

在美国,早在1872年,被称作美国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的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 1835—1909年),在当年4月份的《北美评论报》上登载的他对杰文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中,就已经预见到了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我们担心商品对卖者或生产者的效用会从方程式中完全消失,所有的关系将作为一边是生产条件和另一边是商品对买者的效用之间的关系”。但是对马歇尔的综合体系的传播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一时期也正好是美国边际主义者开始逐渐占据经济学正统地位的时期,同时也是美国经济学不再步欧洲大陆各派经济学的后尘,开始提出自己独立见解,形成自己独立流派的时期。从那个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段时间中,对马歇尔的综合体系的传播和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美国经济学家有陶西格和张伯伦。

第一节 陶西格在传播马歇尔经济学中的作用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 1859—1940年),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圣路易斯。哈佛大学1879年获文学士,1883年获哲学博士,1886年获法学学士。1885—1892年任哈佛大学讲师,1892—1935年任经济学教授。1896—1936年任《经济学季刊》编辑。曾任威尔逊总统顾问,并先后担任数项公职。其主要论著:《美国关税史》(1888年),《工资与资本》(1896年),《经济学原理》(1911年),《关税问题面面观》(1915年),《国际贸易》(1927年)。

一、国际贸易

陶西格在学术领域的主要成就是在国际贸易尤其是在关税问题方面。

① 转引自R. D. C. 布莱克等《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5页。

他于1888年出版,尔后至1931年重版8次的《美国关税史》一书,是美国关税历史和一般关税问题的古典名著。其中的内容包括美国早期对幼稚产业的保护与贸易保护运动的发展、南北战争前的关税立法及自南北战争至1888年的关税立法动向;书中作者特别重视纺织、钢铁等产业的发展与关税的关系。该书通俗介绍了国际贸易和关税理论,不仅考虑了贸易和关税问题的经济方面,还考虑到政治及社会方面,熊彼特指出:“这部经典著作确立了他是这一领域中美国第一位权威的声誉,并且,作为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分析,事实上在任何领域中都无出其右者。”¹⁾

作为国际贸易学说中新古典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陶西格将李嘉图、穆勒等人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加以汇总概括,形成内容广泛的国际贸易通论。它的主要内容有:把一百多年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汇集整理;修正补充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使之尽量符合实际情况;分析不兑换纸币下国际贸易的自动调节机制;把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区分为“总物物交换比率”与“净物物交换比率”。其核心是以修订过的“比较成本说”为依据提倡自由贸易。

陶西格认为,两国间商品成本的比较可分为三种差别:成本的绝对差,成本的同等差与成本的比较差。同时认为,国际贸易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应将货币因素纳入“比较成本说”。

他还认为,商品成本由工资和利息组成,这并不影响“比较成本说”,但为了简略,他假定商品的国内供应价格单纯由货币工资决定,然后他首先举例分析了存在成本绝对差的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格局:

	每日工资	总工资	10个劳动日产品		国内供给价格(每磅或每码)
美国	1.5元	15元	铜	30磅	0.50元
			麻布	15码	1.00元
德国	1.0元	10元	铜	15磅	0.67元
			麻布	15码	0.33元

由该例可知,在德、美两国中,美国对铜、德国对麻布各享有绝对利益。且当美国日工资多于德国50%时,铜的国内价格美国低于德国,麻布的国内价则是德国低于美国。于是美国将向德国出口铜,而德国向美国出口麻布。

陶西格第二步分析了存在成本同等差情况下两国贸易的格局:

¹⁾ 熊彼特:《弗兰克·威廉·陶西格》,载《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6页。

	每日工资	总工资	10个劳动日产品		国内供给价格(每磅或每码)
美国	3.0元	30元	铜	30磅	1.00元
			麻布	15码	2.00元
德国	1.0元	10元	铜	20磅	0.50元
			麻布	10码	1.00元

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在两个国家内部正好相等,进行贸易无利可图。

陶西格又以以下例分析了存在成本比较差时两国贸易的格局:

	每日工资	总工资	10个劳动日产品		国内价格
美国	1.5元	15元	小麦	20蒲式耳	0.75元
			麻布	20码	0.75元
德国	1.0元	10元	小麦	10蒲式耳	1.00元
			麻布	15码	0.66元

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美国都优于德国,但程度不同,在小麦生产上,美国优势更为明显,产量比例为20:10,而在麻布生产上比例是20:15。这意味着美国在小麦生产上有比较利益,即美国与德国相比生产小麦比生产麻布更为有利。德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效能都比美国差,但程度也不同,在麻布生产上不利程度较低。美国工资与德国相比多50%时,美国将向德国出口小麦进口麻布。

通过上述三个例子,陶西格说明,当用货币工资代替李嘉图的劳动时间作为比较基础时,“比较成本”说依然成立。他进一步论证说,假使各国内部不同生产部门的货币工资不同,“比较成本说”依然成立。他还指出,当商品的单位成本发生变动时,成本递增相当于比较利益下降,成本递减相当于比较利益增加,其结果都不妨碍“比较成本说”的同样成立。

陶西格以比较成本说为核心论点的国际贸易理论,成为后来瑞典经济学家俄林的以要素禀赋说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来源之一。⁽¹⁾

① 参阅俄林《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

二、传播马歇尔综合体系

在马歇尔 1890 年出版《经济学原理》后的第三年,即 1893 年,陶西格便在这一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丛刊》上发表了论文《马歇尔教授的价值论和分配论》,这“表明了他在当时和以后同马歇尔的理论结成联盟,并把马歇尔的理论作为他自己课堂讲义的主要来源之一”¹。熊彼特的这段话,表明陶西格在哈佛自 1885—1935 的 50 年教师生涯中,以很大一部分时间向学生传播了马歇尔的体系。这使他对于美国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部门的文职人员的影响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美国经济学家。

1911 年,陶西格经过多年的教学和深思熟虑,出版了自己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这部得到广泛使用的教科书被认为是介于老的古典著作(斯密—李嘉图—穆勒)和当代理论著作之间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是复述了马歇尔的综合体系。

除了从事长时间的教学之外,陶西格在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担任《经济学季刊》的编辑。由于他的出色工作,使这份刊物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刊物,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陶西格及其他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多年的努力,使 19 世纪末还显得落后于欧洲大陆的美国经济学,到 20 世纪 30 年代,便达到了与欧洲大陆同等程度的水平,并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经济学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在美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爱德华·黑斯廷斯·张伯伦(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 1899—1967 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毕业于依阿华大学,1922 年获密执安大学文学硕士,1927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27—1967 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48—1958 年任《经济学季刊》编辑。其主要论著:《垄断竞争理论》(1933 年,有中译本),《关于更加一般的价值理论》(1957 年)。本节主要介绍他的《垄断竞争理论》。这部使他跻身于 20 世纪六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列的专著,是以他 1927 年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它与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

¹ 熊彼特:《弗兰克·威廉·陶西格》,载《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98 页。

经济学》同于1933年出版,被并列为西方厂商理论的两部开山之作。与罗宾逊夫人不同的是,后者是在斯拉法1926年12月发表的论文的启发下建立自己的理论的,而张伯伦则最迟在1927年4月便已经独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并未受惠于斯拉法,主要是从陶西格1891年发表的论文《论铁路运费理论》及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一个脚注中受到启发^①,经过努力,建立了垄断竞争理论体系。陶西格的论文使他认识到产品差别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意义,马歇尔脚注使他认识到分析厂商的供求曲线的重要性。

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无论是从其思想渊源来说,还是从其内容来看,与其说是对马歇尔价值理论的革命,不如说是一种补充。它并不是在马歇尔所考虑的问题中提出与马歇尔相对立的意见,而是涉及了马歇尔所未涉及的现象,提出了可以补充马歇尔体系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并不把它以及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看作是对于马歇尔综合体系的革命或突破,而是把它看作是对于马歇尔综合体系的深化和拓展。

一、纯粹竞争下的价值论

张伯伦以纯粹竞争作为研究的起点。纯粹竞争是指没有任何垄断因素掺杂其中的竞争。他认为如此定义的纯粹竞争有别于完全竞争,因为后者除了排除垄断之外,还可解释为包含其他方面的完全性,如要素的完全流动性,对未来的完全了解等等。指出市场的纯粹性与完全性的区别,是张伯伦市场理论的一大特征。

张伯伦指出,纯粹竞争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有人量的卖者与买者;(2)产品是标准化的同质的,卖主也是标准化的,即任何卖主对购买者所贡献的效用是一致的。这两个必要条件合为一体就是没有一个卖主能通过控制市场的供给从而控制价格。

张伯伦认为,在纯粹竞争市场中,均衡的条件是供求相等,这与马歇尔的意见是一样的,但张伯伦更进一步指出:纯粹竞争下价格之所以等于供求平衡点,是因为它正好是使每个卖者获得最多利润的一点,即是使每个卖者的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一点。这是因为在纯粹竞争条件下,每个卖主所面临的是水平的需求曲线,其高度等于当时的市价,于是这条需求曲线便同时又是每个卖主的平均收入和边际收入曲线。

张伯伦的上述分析实际上是通过个别厂商的行为来说明纯粹竞争下

^① 参阅晏智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361页;杨德明《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4页。

的价格何以由供求均衡决定。这种对厂商行为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垄断和垄断竞争下的价格决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揭示了各种市场条件下厂商行为的一致性：以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来决定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水平。

张伯伦进一步从个别厂商的角度分析了纯粹竞争条件下实现长期均衡的条件：(1)每个厂商都在均衡价格下获得最多利润，即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2)每个厂商都实现了最有效的生产规模，即都在平均成本的最低点处进行生产；(3)整个市场处于供求均衡状态。这三个条件可见图 9-2-1 所示。(a)图表示整个市场在价格为 OM 时达到供求均衡，(b)图表示均衡价格为 OM 时，某一厂商的产量为 Oa ，它是整个市场的均衡产量 OA 中的很小一部分。当该厂商产量为 Oa 时，其边际成本曲线 MC 正好与边际收入曲线 Md 相交，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同时， Oa 产量也正好是平均成本曲线 AC 最低点上的产量，即实现了生产的最佳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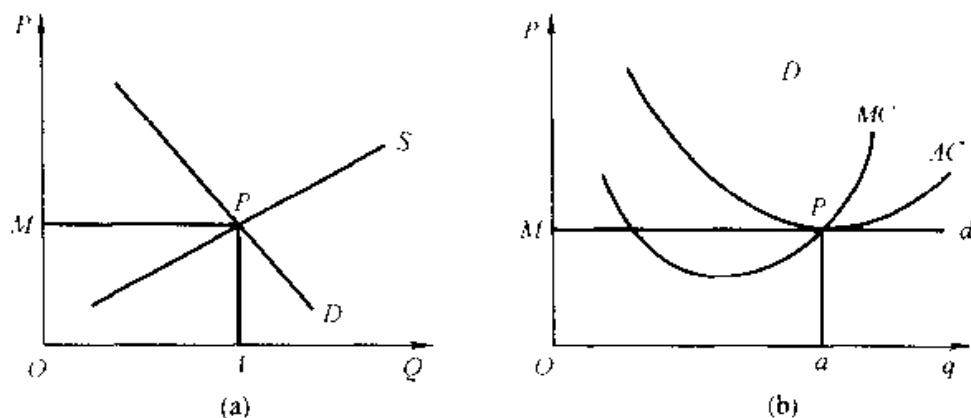


图 9-2-1

张伯伦指出，纯粹竞争市场中出现实际价格背离均衡的原因在于各种不完全性。而趋向均衡的调整所依靠的，不是拍卖性的减价，而是实际价格的波动。

二、非纯粹竞争下的价值论

张伯伦认为，以往的价值理论大多只是研究了两种极端情况下的价格决定：纯粹竞争和垄断，不承认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没有探讨中间状态下的价格决定理论。而他的任务便是要探讨这种中间状态下的价值理论。

张伯伦把介于纯粹竞争和垄断的中间状态分为两种：一是起因于售卖人数过少以致售卖者可操纵价格的双垄断和寡头；二是起因于产品差别的垄断竞争。对于双垄断现象，前人如古诺和埃奇沃思已经提到并进行了一定

的研究,故他只是对前人的分析进行了概略的述评。垄断竞争现象则是他首先提出并进行了重点研究的。

张伯伦在述评前人的双垄断理论后,提出如下五点结论:(1)前人如古诺和埃奇沃思对双垄断的分析之所以会得到不同结论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前提不一样。由此可知,双垄断和寡头垄断问题不存在单一的答案。需要把它细化,分为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得出不同的答案。(2)假如双垄断和寡头垄断下的售卖者们注意到他们对于价格的总影响,则价格将与垄断条件下的价格一致。这里所谓的总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一个售卖者作出决策时不顾及其决策对其竞争者的影响,单纯只考虑自己所作决策对价格的影响。间接影响则是指一个售卖者的决策影响到其竞争者后,其竞争者的行为对价格的影响。(3)若假定售卖者不考虑其决策的间接影响,都以其竞争者不会受其影响为前提来作出决策,则价格的决定要依据下述不同的假设而有不同。若每人假定其竞争者的供给一定,则均衡价格随着竞争人数的增多而由垄断条件下的价格逐步下降,当人数无限多时,降至纯粹竞争下的均衡价格水平。若每人假定其竞争者的价格一定,并假定可以重订契约直至对任何人都没有不利而不需要进一步变动价格为止,则均衡价格在双垄断条件下也将等于纯粹竞争价格。若每人假定其竞争者价格一定;但同时假定售卖者可以不顾买者的利益而控制其价格,则价格将在一定限度内摇摆,该限度将随竞争者的增多而逐步缩小,接近纯粹竞争价格。(4)若售卖者既不考虑他对价格的直接影响,也不考虑间接影响,则不论有多少售卖者,结果都将是纯粹竞争价格。(5)由以上四点可知,双垄断和寡头垄断下的均衡价格的确定,依存于一个售卖者对其竞争者的行为作何假定。因此便产生了下述不确定因素:(a)别的竞争者是否保持其产量和价格不变;(b)其他竞争者是否有远见。(c)其他竞争者可能的市场份额,等等。由于这些不确定性,实际生活中双垄断和寡头垄断下的价格也是捉摸不定的。

张伯伦重点分析了与产品差别相联系的垄断竞争。他指出,实际生活中许多产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同时又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替代性。产品差别的存在使得售卖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价格,即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替代性又使得不同产品的卖者之间存在着竞争性。这就造成了垄断竞争的局面。他指出,产品之间的差别可以是产品本身之间存在的差别,也可以是产品的售卖条件方面的差别。前一种差别包括独有的专利权,商标、商店名称,包装特点、品质、设计、颜色、式样等。后一种差别包括售卖者的地址的便利程度,商店的一般风尚和特点,做生意的方法,公平交易的信誉,待人接物的

方式、工作效率等。

张伯伦认为,在产品差别造成的垄断竞争中,厂商不再像纯粹竞争中那样单纯通过调整产量来谋求利润最大化,也不再像垄断厂商那样通过操纵产量从而操纵价格来谋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一方面通过产量和价格行为,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产品品质,即制造产品差别,以及通过广告和其他各类销售费用,来谋求利润最大化。

张伯伦首先分析了个别售卖者调整其产量和价格的行为,假定一切替代品的性质和价格已知,厂商的产品既定。这种调整可以图 9-2-2 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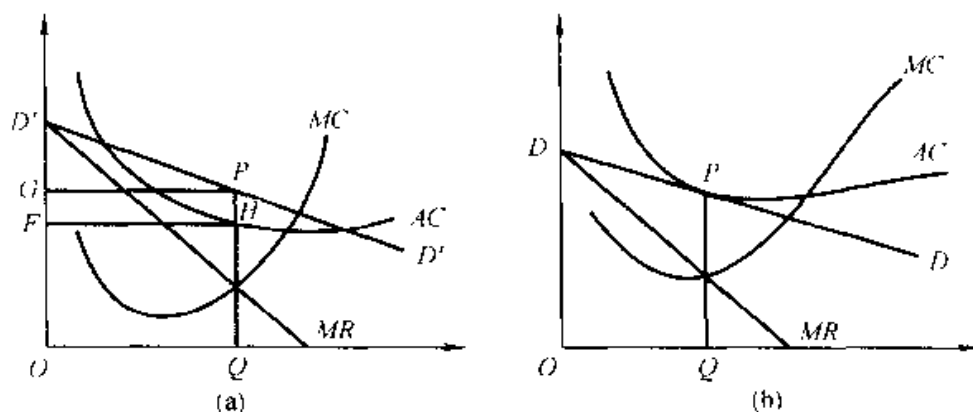


图 9-2-2

(a)、(b)两图中均衡产量都由边际收入曲线(MR)和边际成本曲线(MC)的交点决定,为OQ,从而均衡价格由需求曲线上相应的点决定,为PQ。(a)图中均衡价格(PQ)高于该产量上的平均成本(HQ),存在超额利润为GPHF。(b)图中均衡价格(PQ)等于该产量上的平均成本,不存在超额利润但保证了正常利润。若进一步考虑到其他厂商的反应行为,当现出(a)图的情景时,因存在超额利润,吸引了新厂商的加入,原有的其他厂商也会开始生产富有替代性的产品,结果该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会向左向下移动,同时成本曲线会因此而移动,可能上升、下降,也可能保持不动,依据通常成本理论中所分析的各种情况而定。最终,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移动的结果,将使单个厂商的产量和价格的状况如(b)图所描绘的一致,即不再获得超额利润,但能获得正常利润。

由上图可知,由于存在垄断因素,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不是水平而是向下倾斜的,从而使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水平OQ不再是平均成本最低点上的水平,而是要低于之,同时均衡的价格也不再是平均成本的最低点,而是要高于之,这表明与纯粹竞争相比,垄断竞争下的厂商的产量较低,价格较高。

张伯伦进而分析了个别售卖者调整产品的行为。假定价格一定,其他售卖者的产品和价格也既定,这一分析就能说明,在价格一定时,个别厂商如何选择能带来最高利润的产品。这种调整可以图 9-2-3 表示。假定价格为 OE , AC_A 为产品 A 的平均成本曲线, AC_B 为产品 B 的平均成本曲线, OQ_A 为产品 A 在价格为 OE 时的需求量, OQ_B 为产品 B 在价格为 OE 时的需求量。A 产品的利润为 $EMRC$, B 产品的利润为 $ENGD$, 大于 A 产品。显然厂商将选择 B 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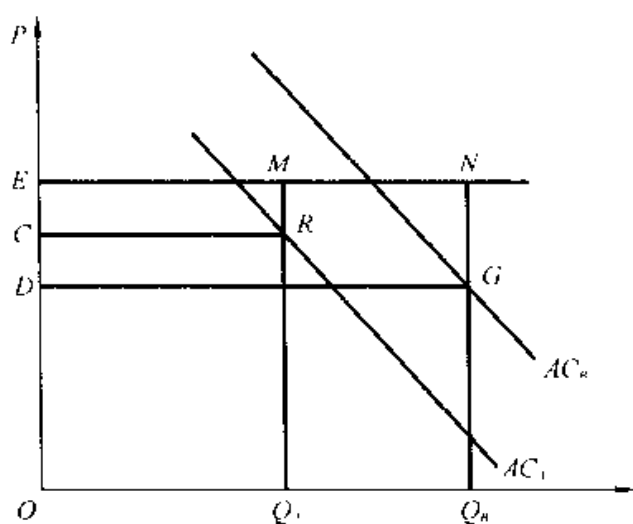


图 9 2-3

若考虑到其他厂商的反应行为,当该厂商选择 B 产品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时,将引起新厂商的加入,原有的其他厂商也将选择生产对 B 具有替代性的商品,结果导致该厂商的需求由 OQ_B 下降,同时也可能使 B 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右移上移。最终将使该厂商的超额利润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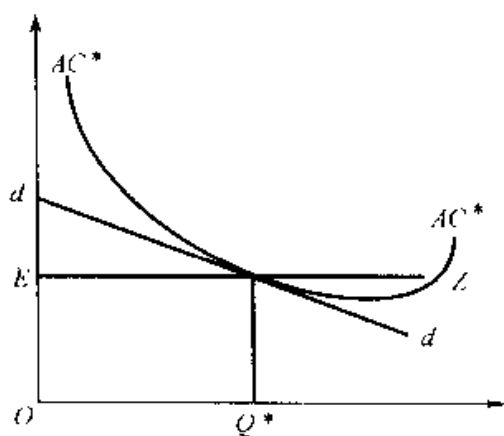


图 9 2 4

在分别分析了厂商的产量 价格行为和产品行为之后。张伯伦把两种调整行为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并充分考虑到其他售卖者的反应。这时,个别厂商的均衡可以图 9-2-4 示之。 AC^* 为充分考虑其他厂商反应时,对该厂商来说最有利(“最好”)的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 dd 为充分考虑到其他厂商反应的需求曲线。 OE 为均衡价格。 OQ^* 为最好产品的均衡产量。若厂商变动其产量,无论是大于还是小于 OQ^* ,都将使其成本超过价格,遭致亏损。若厂商选择其他成本曲线位置更高(低)的更好(坏)的产品,则更好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将不会超过更高成本曲线与 EZ 线的交点,或更坏产品的需求量的减少将超过更低成本曲线与 EZ 线的交点,从而两种情况都将给该厂商带来损失。

根据分析,张伯伦认为,与纯粹竞争相比,若产品既定,则垄断竞争下的

均衡价格较高,不是等于平均成本的最低点;若价格既定,则垄断竞争下的产品较差。但同时他也指出,垄断竞争与纯粹竞争相比较时的这些弱点,由于前者较之后者能增加产品种类从而扩大消费者自由选择的范围而得到弥补。

在垄断竞争厂商三种调整行为中,张伯伦重点分析了厂商调整销售成本的行为对价格的影响。他指出,销售成本是非纯粹竞争情况下的特有现象,在纯粹竞争条件下,厂商是不需要销售成本的。

张伯伦分析了销售成本与生产成本的区别。他指出:生产成本使产品适应需求,满足需求;销售成本使需求适应产品,影响需求。生产成本影响厂商的供给曲线,而销售成本则影响需求曲线,使需求曲线富有弹性,并向右上方移动。销售成本是如何影响需求的呢?他认为销售成本对于需求的影响依存于两个因素:(1)购买者对商品了解的不完全。(2)广告等销售方法能改变人们的欲望。广告及其他销售方法使人们对某种商品增加了解,结果便使这种商品的需求曲线富于了弹性,并向右方移动。同时广告等销售方法也会制造出某种新的需求,为厂商所生产的产品打开销路。所以广告往往起到两种作用:一是增进购买者的商品知识;二是帮助厂商在与其他厂商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提高其垄断程度,使购买者对某类可互相替代的商品的总需求发生有利于该厂商的分配。

张伯伦认为,由于两方面的理由,使单位产品的销售成本随产量的增加先是递减而后递增。一是重复宣传和宣传手段的改进往往使单位销售成本曲线开始呈下降局面;二是由于市场潜力的逐渐减少和其他欲望的重要性逐渐增加,使曲线最终要出现上升。在考虑到销售成本之后,厂商的平均成本不能再仅仅包括生产成本,而是要同时包括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成为生产—销售综合成本,这意味着考虑销售成本与不考虑销售成本相比,将使厂商的平均成本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同时,销售成本也往往使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于是厂商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便由如此移动后的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入曲线的交点所决定。

在考虑销售成本之后,张伯伦沿用前面已使用过的分析方法,先假定其他厂商行为既定,分别考虑个别厂商进行价格(产量)调整,产品种类调整,销售费用调整时的均衡,再综合考虑三方面调整同时进行时的均衡,然后在考虑其他厂商反应行为的前提下考虑个别厂商的均衡,由于篇幅所限,这部分的内容不再赘述。

第三节 其他美国经济学家的贡献

从马歇尔和威克塞尔于19世纪末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第二次综合之后,在美国,除了陶西格和张伯伦之外,还有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在深化第二次综合中作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

一、蛛网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 1893—1938),在1930年提出了蛛网模型。同年提出这一理论的还有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意大利经济学家里西。他们的论文均发表于德国。

蛛网模型是对马歇尔供求均衡价格论的进一步发展。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论主要局限于静态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虽然他本人把这种比较静态分析看作是动态分析),对于市场实现供求均衡的动态过程和必要条件,并没有展开深入的分析,蛛网模型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分析。

该模型假定:(1)非垄断市场,即供求双方人数众多,无人能影响价格。(2)市场供给对价格变动反应滞后,即 t 期供给 S_t 定于 $t-1$ 期的价格 P_{t-1} 。(3)市场需求对价格变动反应及时,即 t 期需求 D_t 定于该期价格 P_t 。市场价格总是能扫清市场。

该模型可由下述三个方程组成:

$$D_t = D(P_t)$$

$$S_t = S(P_{t-1})$$

$$D_t = S_t$$

该模型揭示了市场趋于均衡还是相反的条件:若 $dD/dP > dS/dP$,则市场趋向均衡;若 $dD/dP \leq dS/dP$,则市场不趋向均衡。假定供求都是线性函数,则可用图9-3-1来表明上述结论:(a)图中价格和产量通过阻尼振荡而收敛于均衡,(b)图中是扩散振荡不收敛于均衡,(c)图中是等幅振荡,也不收敛于均衡。

蛛网模型属于早期的动态分析,可用于说明农产品和其他需要较长生产时间的产品的市场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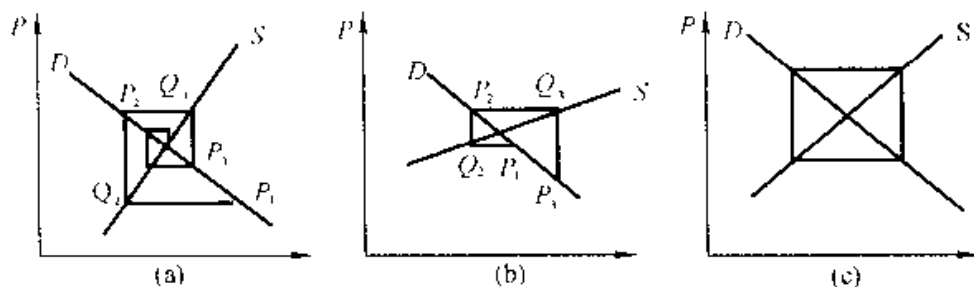


图 9 3 1

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前面第七章已经谈到,威克塞尔在建立其综合体系时,提出了线性齐次的生产函数 $P = a \cdot f(b:a)$, P 为产量, a 为劳动要素, b 为土地要素,这一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先驱,但我们目前还无法判定道格拉斯在提出其生产函数时是否曾受到威克塞尔的启发。

保尔·霍华德·道格拉斯(Paul Howard Douglas, 1892—1976)是美国经济学家,是 J. B. 克拉克的学生。他与友人、数学家查尔斯·柯布合作,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其老师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在 1934 年发表的《工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后来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 = AL^a C^{1-a}$ 。 Q 为产量, L 为劳动, C 为资本, A 为广义技术系数, a 和 $1-a$ 分别为产量对于劳动和资本的弹性,同时又分别是劳动和资本各自的收入份额。柯布和道格拉斯还具体测算了 A 和 a , 使该函数具体化为 $Q = 1.01L^{0.75}C^{0.25}$ 。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具有下述两条性质:(1)其一阶偏导数大于零而二阶偏导数小于零,这被认为是反映了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2)线性齐次性质,这被认为是反映了规模报酬不变法则,而该法则保证各要素按边际生产力所分得的收入之和,正好等于总产出。由于这两条性质,该函数被认为是验证了边际生产力论。

第十章 威克塞尔以后北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与威克塞尔同一时代的,瑞典还有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古斯塔夫·卡塞尔(Karl Gustav Cassel, 1866-1945年)和大卫·戴维森(David Davidson, 1854-1942年)。他们三位共同奠定了北欧学派的基础。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缪尔达尔1927年的博士论文《价格构成和变化因素》为标志,北欧学派正式形成。北欧学派早期的主要代表为缪尔达尔(1898-1987年)、林达尔(1891-1960年)、伦德伯格(1907-)、俄林(1899-1979年)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家林德贝克(1930-)崭露头角,成为新一代代表人物。除上述瑞典经济学家之外,著名的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1895-1973年)也是属于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北欧学派的主要特点是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对封闭经济的宏观总量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对国际贸易进行静态分析,从而提出了独立于凯恩斯的宏观动态理论和赫克舍尔-俄林定理;并且提出了国家从宏观和收入分配两个方面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

本章主要介绍卡塞尔的思想,缪尔达尔、林达尔对威克塞尔理论体系的发展,以及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

第一节 卡塞尔的经济思想

卡塞尔1866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其主要论著有:《社会政策》(1902年),《利息的性质和必要性》(1903年),《社会经济理论》(1918年),《世界货币问题》(1921年),《凯恩斯的〈通论〉》(1937年)。

一、一般均衡的简化模型与价值无用论

卡塞尔对瓦尔拉斯考虑生产时的均衡方程组进行了简化。与瓦尔拉斯不同的是他假定生产要素服务的供给是既定的常量,而瓦尔拉斯则把它看作是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的变量。除了要素服务的供给之外,卡塞尔方

程组体系中的既定因素还有两项,技术系数和需求函数的形式。未知变量是 n 种产品的需求量(N_1, N_2, \dots, N_n)和供给量(A_1, A_2, \dots, A_n) n 种产品的价格(P_1, P_2, \dots, P_n), m 种要素服务的价格(q_1, q_2, \dots, q_m)。他的方程组体系包括下述四套方程:

$$\begin{aligned} a_{11}q_1 + a_{12}q_2 + a_{13}q_3 + \dots + a_{1m}q_m &= p_1 \\ a_{21}q_1 + a_{22}q_2 + a_{23}q_3 + \dots + a_{2m}q_m &= p_2 \\ &\dots\dots \\ a_{n1}q_1 + a_{n2}q_2 + a_{n3}q_3 + \dots + a_{nm}q_m &= p_n \end{aligned} \quad (1)$$

式中 a_{ij} 为技术系数,表明一单位 j 产品所消耗的 i 要素服务量。该式表示产品价格等于生产费用。

$$\begin{aligned} N_1 &= F_1(P_1, P_2, P_3, \dots, P_n) \\ N_2 &= F_2(P_1, P_2, P_3, \dots, P_n) \\ &\dots\dots \\ N_n &= F_n(P_1, P_2, P_3, \dots, P_n) \end{aligned} \quad (2)$$

式中 F_k 表示第 k 种产品的需求函数的形式,该式表示产品需求是产品价格的函数。

$$(3) \quad N_1 = A_1, N_2 = A_2, \dots, N_n = A_n$$

该式表示均衡时各种产品的供求相等。

$$\begin{aligned} R_1 &= a_{11}A_1 + a_{12}A_2 + \dots + a_{1n}A_n \\ R_2 &= a_{21}A_1 + a_{22}A_2 + \dots + a_{2n}A_n \\ &\dots\dots \end{aligned} \quad (4)$$

$$R_M = a_{M1}A_1 + a_{M2}A_2 + \dots + a_{Mn}A_n$$

式中 R_h 为第 h 种要素服务的数量。该式表示要素服务的供求相等。上述四个方程组共有方程式 $3n + m$ 个,而未知量也恰好是这个数字,故该体系有确定解。¹ 这一简化的方程组,得到后人广泛的传播和运用,被称作瓦尔拉斯-卡塞尔均衡模型。

根据这一体系,卡塞尔认为产品的价格实际上取决于体系中的三个既定因素:需求函数形式、技术系数和要素服务的既定供给。前一因素带有主观性质,而后两个因素则带有客观性质。于是他认为产品的价格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就力图把价格归结为一个客观因素或主观因素的意义的理论来说,‘客观的’或‘主观的’价值学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¹ 卡塞尔方程组转引自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151页。转引时有改动。

因此,这些价值学说之间的全部论争,在文献中如此不相称地占了浩繁的篇幅。只不过是白费力气而已。”^①

卡塞尔还进一步认为,抽象掉价格决定问题的价值理论是无用的、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交换经济从一开始就必然是货币经济,所以研究交换就是要研究价格的形成,而抽象掉货币因素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具有客观意义的,还是边际效用论者的具有主观意义的,都是无用的。这种价值理论对于经济科学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上述价值理论无用论,使卡塞尔名噪一时。

二、购买力平价说

卡塞尔对西方经济学的另一贡献,是提出了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说,这一理论的要点早已为李嘉图所表述,但它的系统说明当推卡塞尔。该理论的基本点是说,在自由贸易和运费为零这两个条件下,当用某种共同货币来表示时,一国的价格必等于另一国的价格,或者说两国货币的汇率将等于两国物价水平之比。设 γ 为以A国货币表示的B国货币价格, P_A 、 P_B 分别为两国的物价水平,则购买力平价说可以下式表达之: $\gamma = P_A/P_B$ 。该理论主要用于说明废除金本位制以后的汇率决定。

第二节 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理论体系的发展

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年),出生于瑞典古斯塔夫教区。1923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1927年获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该校政治经济学讲师,1925—1927年留学德国和英国,1929—1930年作为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学者访问美国进行学术研究。1931—1932年任日内瓦国际研究生院副教授,1933—1939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拉尔斯·希尔塔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1938年受纽约卡纳基公司委托,进行对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1934—1936年、1942—1946年被选为瑞典国会参议员;1945—1947年任瑞典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瑞典商务部长;1947—1957年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1957年受20世纪基金会委托,对南亚和东南亚11国的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1961,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1961—196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

① 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4页。

经济学教授；1962年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理事会理事长。1974—1975年任纽约市立大学杰出客座教授。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此外他还获得30多项荣誉称号，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英国科学院、美国艺术科学院的院士，经济计量学会会员，美国经济学会名誉会员，其主要论著有：《货币均衡论》（1933年，有中译本）等。

一、货币均衡的条件

缪尔达尔在30年代主要是研究宏观经济，40年代以后开始研究不发达国家问题和经济制度，成为一名制度经济学家。本节根据他的《货币均衡论》一书，介绍他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时对威克塞尔经济思想的发展。

威克塞尔建立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分析利率与物价的关系，说明物价水平（货币价值）的决定和变化，挽救货币数量论。这一理论可分为有着内在联系的两部分：货币价值均衡的条件；物价水平变化的特征（即累积过程理论）。第二部分是以第一部分为基础的。但他显然更偏重于第二部分，所以人们通常把他的理论称之为累积过程理论。

缪尔达尔的主要贡献在于：（1）突出强调了威克塞尔宏观理论中第一部分内容的重要地位和基础性质；（2）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大改造，经过这番改造，原先表述不清的变清楚了，原先错误的被剔除了。更重要的是，这部分内容由原先主要用于说明静态条件下币值均衡条件的理论，转变为说明动态条件（技术进步、资源积累）下宏观经济均衡条件的理论。虽然缪尔达尔的书名是《货币均衡论》，但其内容之一恰恰是说明动态条件下当宏观经济均衡时，物价未必是稳定的，即币值未必是均衡的。（3）在改造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事先、事后、静态、动态、时点、时期、预期、风险等，为以后宏观经济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缪尔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说明，若经济体系偏离了均衡，累积过程便会在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开始。因此，“货币均衡的概念在全部威克塞尔货币理论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①。关于货币均衡的条件，威克塞尔在《利息与价格》一书中谈到两条：（1）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2）物价稳定。在《国民经济学讲义》一书中又增加了一条：总供求相等。这三个条件在威克塞尔那儿是有一定的逻辑顺序的。作为基础的是第一个条件，由它保证了总供求的相等这一条件，而这一条件又保证了物价的稳定。所以物价稳定这一条件是依存于前两个条件，归根结底依存于第一个条件的。但另一方

①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页。

面,三个条件中只有物价稳定这一条件才具有可观察性,因此威克塞尔特别注意分析这一条件,并主张银行根据这一条件是否满足来制订利率政策,保证第一个条件的实现。

缪尔达尔根据林达尔的意见,¹把威克塞尔的总供求相等这一条件,转述为储蓄与投资相等这一条件。这样,他就清楚地把威克塞尔关于货币均衡的条件概括为三条:(1)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2)储蓄等于投资;(3)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然后,他对于这三个条件的含义及相互关系进行详尽的分析。

缪尔达尔首先分析了第一个条件,在这一条件中,他认为自然利率作为一种摆脱任何货币因素的纯粹实物意义上的概念,是难以捉摸的。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不存在这种纯实物意义上的自然利率。同时,决定企业家投资行为的也不是这种难以捉摸的自然利率,而是投资的收益率。他进一步运用“时点”、“时期”和“事前”、“事后”这两对概念,区分了事后的投资收益率和事前的投资收益率。前者是指已经过去的一段时期的簿计意义上的收益率。后者则是指在当前这一时点上,对未来一段时期的预期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贴现之后所得到的收益率。由于它带有预期性质,所以它包含了企业家们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估计和态度。他认为企业家正是通过这种事前的预期的投资收益率,与货币利率的比较,决定着是否投资。于是威克塞尔第一个均衡条件中的自然利率就应当被事前的预期的投资收益率所代替,均衡条件应当表述为货币利率与所有企业的预期的投资收益率相等,即 $i (= e/c) = y (= e/r)$ 。 i 为货币利率, e 为预期的投资收益, c 为资本价值, y 为预期投资收益率, r 为带来收益 e 的资本的再生产成本。

缪尔达尔进一步指出,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着单一的货币利率 i ,它实际上是各种具体的信用条件在理论上的抽象代表。同时预期的投资收益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预期,所以也难以计算,故上述均衡条件最好表述为 $c = r$ 。即“现有实际资本的资本价值与它的再生成本二者均等的条件”²。这一表述,避开了难以把握的货币利率和预期收益率,但资本价值这概念综合反映了以货币利率为代表的各种信用条件,以及未来的预期收益。

缪尔达尔再进一步指出, $i = y$ 或 $c = r$ 这一条件,从另一角度来看,就是说利润为零。因此,这一条件只有在不存在技术进步不存在由新投资形成资本积累的静态条件下,才是货币均衡的基本条件。而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

¹ 参阅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

²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3页。

的动态条件下,它不可能再成为货币均衡的基本条件。这时,基本的条件将是第二个条件:投资等于储蓄。

缪尔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理论中隐含的基本论点是强调投资并非任何时候都恒等于储蓄,但他本人并未明确讲清这一点,相反,他常把储蓄描绘成把生产要素从消费财货生产转移到实际资本生产上。这种含义的储蓄是不可能有别于投资的。同时,从事后的观点来看,以往发生的储蓄和投资也总是相等的。因此,与第二个均衡条件有关的是事先的与预期有关的意愿投资和意愿储蓄。前者是指将要进行的资本积累,后者则是指收入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或者说是对于企业家而言的可自由处理的资本。这两者不像事后簿计意义上的储蓄投资,并不会必然恒等。考虑到动态条件下难以准确区分总投资中的重置部分和新投资,所以威克塞尔的第二个均衡条件就是“如果货币利率能使实际投资总额与储蓄加上实际资本预期价值变动总额(即是加上现有实际资本的预期减少的价值,减去它预期增加的价值)二者相等,这种货币利率就是正常的”。用公式表示即为“ $R_t = W - (S + D)$ ”。^① R_t 为实际投资总额,包括新投资和重置投资,它取决于各企业的预期利润状况。 S 为储蓄, D 为折旧减去实际资本的增值。 W 为 S 与 D 之和,表示对企业家而言的自由资本。他把这一公式称作基本均衡条件。

依据上述公式,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第三个均衡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动态条件下,物价水平的稳定并不像威克塞尔所强调的那样是货币均衡的必要条件。不论物价水平向哪方面变化,变化幅度多大,变化是否被预期,只要它不使 $R_t = W$ 不再成立,那么货币均衡就仍然保持。也就是说, $R_t = W$ 所维持的均衡并不要求物价水平的稳定不变,而是可以和若干种不同的物价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基本均衡条件虽然与物价水平不相干,但却依存于若干重要的相对价格关系:制成品的价格、进入实际资本生产成本的要素价格、使用价格、营业费用等等之间的关系。

缪尔达尔认为,虽然货币均衡并不一定要求物价或消费品价格指数保持稳定,但它对物价还是有一定要求的。他谈到,各种产品的价格由于契约关系、垄断因素等,具有不同程度的刚性;同时,不同产品的价格变化对于企业家的投资决策的影响也不相同。由于这两个因素,一方面使得物价水平稳定与否不再成为判断货币均衡与否的标准;但另一方面,货币均衡要求一种特殊的价格指数具有尽可能大的稳定性,这种价格指数是根据各种产品的价格刚性程度和价格变动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加权的一种价格

^①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4—85页。

指数。

通过对威克塞尔三个均衡条件的上述分析,缪尔达尔的结论是:第二个均衡条件是货币均衡的基本条件,但这一条件的实现是货币利率和计划投资的收益率相对变化的结果。因此,经过必不可少的修订后的第一个均衡条件虽然不再是均衡的基本条件,但却是第二个均衡条件必不可少的补充,至于第三个均衡条件,则完全是错误的。

二、预期变动和储蓄变动对均衡的影响

缪尔达尔运用货币均衡的基本关系式 $R_2 - W = (S + D)$, 分别考察了因货币利率、预期和储蓄变动而造成的失衡现象。货币利率变动的影响已为威克塞尔所详尽考察,但预期和储蓄变动的影响则为他所忽略。对这两个因素变动的影响的考察是缪尔达尔的新贡献。

缪尔达尔假定在货币利率不变时企业家对实际资本的未来收益产生了更乐观的预期,这意味着预期利润的增加。这种预期将导致投资 R_2 的增加。另一方面这种预期将导致资本价值增加,这一方面使资本收入增加从而储蓄 S 作同额增加(假定消费支出不变),另一方面又使得折旧减资本增值的余额 D 发生同量的减少,因此将使得 W 保持不变,即可自由支配的资本不变,结果 R_2 大于 W , 发生向上的威克塞尔累积过程。若消费支出在资本收入增加时也出现增长,则 W 将减少,仍将发生向上的累积过程。

缪尔达尔认为,若货币利率维持不变,而储蓄增加了,则由于投资 R_2 未因货币利率的下降而增加,相反,还因为储蓄增加引起消费减少,消费品价格下降,再引起企业家悲观预期降低预期利润,而出现下降。结果便出现 $R_2 < W$ 的现象,引发向下的威克塞尔累积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银行因储蓄增加而降低货币利率来抵消储蓄增加造成的投资 R_2 的下降,才可能使 R_2 与 W 之间重建平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很可能因顾虑到企业的清偿能力而不愿降低货币利率放宽信用,结果累积过程便不能终止。

三、垄断条件下的货币均衡

分析垄断条件下货币的均衡与失衡,是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体系的又一发展。他认为,威克塞尔体系是以排除经济中的垄断因素为分析前提的。因此,一旦把垄断因素考虑进去,则将会给出一些新的结论。他把垄断定义为物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被长期维持在不能扫清市场的水平上。这种垄断现象在劳动市场上是非常典型的,而对于其他市场也有重要意义。因此他着重分析了劳动市场中的垄断对于货币均衡和失衡的影响。

缪尔达尔假定：(1)工资对于因货币政策而引起的变化反应不灵敏即工资带有刚性，但其他价格是灵活的。(2)劳动市场垄断因素仅存在于供给一方，故工资受到供方垄断的影响。(3)初始状况是货币均衡，且货币政策唯一目标是维持均衡。(4)失业为零。(5)唯一的初始变动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在上述5点假定下，若进一步假定所有物品的预期价格都随工资的增加而立即增加，则结果将是随着工资的增加而立即出现一个物价的全面上涨，由于失业假定为零，则工人将再次要求增加工资，物价将再次全面上涨，出现一个物价—工资持续上涨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类同于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均衡自始至终保持着。这说明，在上面的假定下，物价的上涨并不是货币失衡的结果。

若物品的预期价格并不会随工资增加而全部立即增加，货币利率也没有下调，则工资增加的结果将出现货币失衡，产生向下的威克塞尔累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资因垄断的作用而不会充分下降，于是将出现失业的增加。这时，若降低货币利率，诱使其他价格追随工资的上升而上升，则新的货币均衡将建立起来。在建立这一新的均衡的过程中，因为并不存在着压低工资的力量，故新的均衡下工资将因垄断因素的作用而保持较高的水平。从而其他价格也比旧均衡时为高，同时存在着失业现象。

若其他假定不变，只是劳动市场上的垄断因素仅存在于需求一方，则企业家压低工资的初始变动在预期完全的情况下将出现物价的持续下降局面，但货币均衡始终维持。在预期不完全且货币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将出现货币失衡，出现向上的威克塞尔累积过程。这一过程只能通过提高货币利率才能终止。在新的货币均衡建立后，工资由于垄断(需求一方)因素仍将较低，同时企业家对劳动的需求在此种工资水平下并未充分满足。

根据上述分析，缪尔达尔得出结论，在垄断条件下，“货币均衡只能在同时存有某些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某种差异的情况下，才能维持。更详细地说：这些差异的大小必须正好足够满足供给和需求的垄断条件”^①。当这种差异表现为劳动市场中的失业时，“货币政策必须根据这种失业来决定，否则，其结果不是一个经常不变的货币均衡以及整个价格体系不终止的向上平行移动，便是一个背离均衡向下发展的威克塞尔的过程”^②。上述结论表明，缪尔达尔已经意识到在垄断条件下，宏观经济均衡要以微观的非均衡为条件，意识到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凯恩斯

①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

②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6页。

的区别仅仅在于他把非充分就业均衡看作是劳工市场上供方垄断的结果。而后者则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上述结论还表明,缪尔达尔已经意识到,货币政策的目标若是消除与劳动市场的供方垄断相适应的失业,结果将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与今天货币主义者用自然失业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解释通货膨胀有惊人相似之处。

四、政策主张

在政策主张方面,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点:(1)强调理论分析中的货币利率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只有各种信用条件的不同的体系”。因此在确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在一定情况下对实现货币均衡有同等影响的各种不同利率的各种组合,和利率与其他信用条件的各种组合”^①。这些组合虽然在实现货币均衡这一目标方面是无区别的,但对于实际投资的方向及收入分配,则具有不同影响。这意味着银行当局在调节货币利率时,必须对一系列无区别的信用条件组合加以选择,以兼顾其他目标。(2)强调货币政策并非万能,它的功效取决于其他方面的政策,因此货币政策必须与其他政策相协调。(3)货币政策的目标应当是通过维持货币均衡来缓和(但绝不是消除)经济波动。因为经济波动的根源不在于经济的货币方面。而在于经济的实际方面,货币失衡只是加剧但绝不是制造波动。但在缓和经济波动时,不能像威克塞尔那样以稳定物价为目标,因为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稳定的物价与货币均衡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若能在维持货币均衡的前提下尽可能稳定物价,仍是有意义的,这有助于企业家们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有助于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

第三节 林达尔对威克塞尔理论体系的发展

埃里克·罗伯特·林达尔(Erik Robert Lindahl, 1891-1960年),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1919年获隆德大学博士学位,1920-1924年任隆德大学助理教授,1924年任乌普萨拉大学助理教授,1932年任哥德堡大学教授,1939-1958年任隆德大学教授。他还兼任瑞典中央银行顾问。其主要论著有:《征税的权利》(1919年)、《货币政策的范围及手段》(1929年)、《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1929-1939年,有中译本)。本节主要介绍《货币和资

^① 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2页。

本理论研究》一书中的思想。这本书由三部分相互独立的篇章组成,其中第二篇《资本在物价理论中的地位》发表时间最早,为1929年,其内容主要是把瓦尔拉斯—卡塞尔一般均衡理论与庞巴维克—威克塞尔资本理论结合起来,分析资本更新和资本形成条件下的价格决定。从今天眼光来看这是林达尔在微观方面对威克塞尔体系的发展。第二篇《利息率和物价水平》发表于1930年,其内容主要是在宏观方面对威克塞尔体系的发展。第一篇《动态理论研究》是该书发表时才公开印行,其内容主要是对以往经济学家运用均衡方法分析动态过程表示异议,主张运用事前—事后方法分析动态过程。这是一篇侧重探讨分析经济动态过程的方法的论文。

一、资本更新与新资本形成条件下的价格决定

林达尔认为,瓦尔拉斯虽然在《纯粹经济学要义》第24章中建立了考虑到资本形成的一般均衡模型,但“他把生产资料的更换比率看作已知数,因此也把生产资料的经用时间当作已知数,这样,他排除了研究投资期间与利息率的重要关系的可能性”¹。这就是说,瓦尔拉斯忽略了生产的过回程度对利息率的依存关系。

威克塞尔考虑了资本存量一定时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均衡问题,也考虑了资本形成中利息率对投资期间的影响,但没有建立起包括资本形成的一般均衡模型,于是林达尔便把瓦尔拉斯—卡塞尔的一般均衡理论与庞巴维克—威克塞尔关于资本形成中利率对投资期间影响的理论加以综合,从而使威克塞尔体系的微观部分的两方面内容结合了起来。

林达尔首先提出了五点基本假设:(1)人人对本期中的有关价格都有充分认识。(2)企业家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都追求满足最大化。(3)生产要素和产品具有完全的流动性。(4)规模报酬不变。(5)不存在垄断因素。

在上述基本前提下,第一步,林达尔用五套方程组表达了不存在资本更新和新资本形成时的瓦尔拉斯—卡塞尔一般均衡体系:

$$(1) y^s = F^s(\pi^1, \pi^2, \dots, \pi^n; p^1, p^2, \dots, p^M) \quad s=1, 2, \dots, n$$

$$(2) x^r = F^r(\pi^1, \pi^2, \dots, \pi^n; p^1, p^2, \dots, p^M) \quad r=2, 3, \dots, m$$

$$(3) y^s / x^r = F^{sr}(\pi^1, \pi^2, \dots, \pi^n) \quad s=1, 2, \dots, n; r=2, 3, \dots, m$$

$$(4) P \cdot x^r = \sum_{s=1}^n \pi^s y^s; \quad r=1, 2, \dots, m$$

$$(5) y^s = \sum_{r=1}^m x^r; \quad s=1, 2, \dots, n$$

$x^1 \dots x^M$, 为 m 种产品和服务各自的需求。 $p^1 \dots p^M$ 为上述产品和服务的

¹ 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8页。

价格, $y^1 \cdots y^n$ 为 n 种生产性服务各自的供给量。 $\pi^1 \cdots \pi^n$ 为 n 种生产性服务各自的价格。 y^r 为制造 x^r 所使用的 y^s 的总量。 y^r/x^r 为技术系数, 有 mn 个。

该体系与瓦尔拉斯—卡塞尔同类体系的差别在于把技术系数看作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的函数, 而不再是常数。该体系有 $2m+2n+mn$ 个未知数, 令 $p^1=1$, 则剩下 $2m+2n+mn-1$ 个未知数; 有 $2m+2n+mn-1$ 个独立方程式, 故体系有解。

第二步, 林达尔分析了存在着资本品更新但不存在新资本形成时的一般均衡问题。在前述五点基本假设下, 他又增加了下述假设前提: (a) 对未来的完全预期, 即人们对未来经济状况都有完全的知识, 以致他们的行动恰恰导致他们预期的结果。(b) 社会处于静正状态, 即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函数、消费品需求函数、技术系数的函数以及资本存量都保持不变。(c) 生产需要时间, 即某一期所用的生产设备, 往往是在以前几期开始建造的, 而且迂回的生产具有更大的生产力, 而迂回程度则与利率有关。

在上述补充假设下, 林达尔进一步把生产设备分为永久和非永久的, 他把非永久的生产设备所提供的服务用生产这个设备时所投入的原始要素的服务来表示, 若生产该设备的原始服务来自不同时期, 则逐期的原始服务都可看成是单独的投资, 于是便可把一件生产设备看作是“一束”单独投资, 资本品便可按威克塞尔的意见看作是储积起来的劳动和土地的服务。

林达尔用下述七套方程组表达了资本更新条件下的一般均衡:

$$\begin{aligned}
 (1) \quad & y^s = F^s(\pi^1, \pi^2, \dots, \pi^n; p^1, p^2, \dots, p^m; i) \quad s=1, 2, \dots, n \\
 (2) \quad & x^r = F^r(\pi^1, \pi^2, \dots, \pi^n; p^1, p^2, \dots, p^m; i) \quad r=2, \dots, m \\
 (3) \quad & y^r/x^r = F^r(\pi^1, \pi^2, \dots, \pi^n; i) \quad s=1, 2, \dots, n; r=1, 2, \dots, m \\
 & y^r/x^r = F^r(\pi^1, \pi^2, \dots, \pi^n; i) \quad s=1, 2, \dots, n; r=1, 2, \dots, m; T=1, 2, \dots, u \\
 (4) \quad & p^r x^r = \sum_{s=1}^n \pi^s [y^s + y^s_1(1+i) + y^s_2(1+i)^2 + \dots + y^s_u(1+i)^u] \\
 & \quad \quad \quad r=1, 2, \dots, m \\
 (5) \quad & y^s = \sum_{r=1}^m (y^s_r + y^s_{r+1} + y^s_{r+2} + \dots + y^s_u) \quad s=1, 2, \dots, n \\
 (6) \quad & y^s_1 = \sum_{r=1}^m (y^s_{r+1} + y^s_{r+2} + y^s_{r+3} + \dots + y^s_u) \quad s=1, 2, \dots, n \\
 & y^s_2 = \sum_{r=1}^m (y^s_{r+2} + y^s_{r+3} + y^s_{r+4} + \dots + y^s_u) \quad s=1, 2, \dots, n \\
 & \quad \quad \quad \dots \dots \\
 & y^s_u = \sum_{r=1}^m y^s_u \quad s=1, 2, \dots, n \\
 (7) \quad & \sum_{r=1}^m \pi^r y^r (1+i)^r = \sum_{s=1}^n \pi^s \sum_{r=1}^m [y^s_r + y^s_{r+1}(1+i) + y^s_{r+2}(1+i)^2 + \dots \\
 & \quad \quad \quad + y^s_u(1+i)^u]
 \end{aligned}$$

其中新出现的符号 i 为利率, $y^s_1, y^s_2, \dots, y^s_u$ 分别为以往前一期、前二期、

……前 u 期储积起来的,投入到本期第 r 种产品生产中的第 s 种生产服务量。

其中第(1)、(2)套方程组分别表示 n 种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和 m 种产品的需求,都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产品价格,以及利率的函数。第(3)套方程表示本期和以往前一期、前二期、……前 u 期的技术系数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以及利率的函数。第(4)套方程表示某种产品的价格均衡时将等于其成本,成本中包括按复利计算的以前各期原始服务的价格。第(5)、(6)套方程组表示本期和以往前一期、前二期、……前 u 期的生产性服务的供需平衡,表明任何一个时期积存下来的用于本期产品生产的服务的总量(等式右端),必须和该期所供给的服务量相平衡。这意味着任一期的生产性服务,不仅要有一部分用于直接生产产品,还要有一部分补偿以往各期储存下来(以资本品形式)的用于本期产品生产的生产性服务。第(7)个方程左端的指数 \bar{t} 代表投资的平均期间,它是各种期间的投资的加权平均值。该式通过第(4)套方程组可变形为 $\sum_{t=1}^u \pi_t^r y^r (1+i)^t = \sum_{s=1}^n p_s^r x^s$,表示只存在资本更新的静态社会中,一个社会的消费等于它的收入。

上述七套方程共有方程式 $2m+2n+mn(u+1)+nu$ 个,未知数比它多一个,但只要令 $p^1=1$,则该体系有确定解。

第三步,林达尔分析了存在着新资本形成时的一般均衡问题。他基本保留了第二步时的各项假设前提,只是放弃了静态假设,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函数、消费品需求函数、技术系数函数以及资本存量不再保持不变,从而均衡价格也处于变化之中。

为了分析动态条件下的均衡,林达尔把时间细分为一个个的时期,每一时期本身都处于静止状态,从而均衡价格一定,只是在两个时期之交时才出现动态变化。同时他又假定经历了 V 个时期之后将进入静止状态。于是他用了下述五套方程组来表达均衡体系:

$$(1) y_t^s = F_t^s(\pi_1^s, \pi_1^s, \dots, \pi_n^s; p^1, p_1^s, \dots, p_n^s; i_1; \pi_2^s, \pi_2^s, \dots, \pi_n^s; p_2^s, p_2^s, \dots, p_n^s, i_2; \dots, \pi_n^s, \pi_n^s, \dots, \pi_n^s; p_n^s, p_n^s, \dots, p_n^s; i_n) \\ s=1, 2, \dots, n; t=1, 2, \dots, v$$

$$(2) x_t^r = F_t^r(\pi_1^r, \pi_1^r, \dots, \pi_n^r; p_1^r, p_1^r, \dots, p_n^r; i_1; \pi_2^r, \pi_2^r, \dots, \pi_n^r; p_2^r, p_2^r, \dots, p_n^r, i_2; \dots, \pi_n^r, \pi_n^r, \dots, \pi_n^r; p_n^r, p_n^r, \dots, p_n^r; i_n) \\ s=1, 2, \dots, n; t=1, 2, \dots, v$$

$$(3) y_t^m r_t^r = F_t^m(\pi_1^m, \pi_1^m, \dots, \pi_n^m; i_1; \pi_2^m, \pi_2^m, \dots, \pi_n^m; i_2; \pi_n^m, \pi_n^m, \dots, \pi_n^m; i_n) \\ r=1, 2, \dots, m; s=1, 2, \dots, n; T=1, 2, \dots, t; t=1, 2, \dots, v$$

$$\begin{aligned}
 (4) \quad & p_1^t x_1^t = \sum_{s=1}^n \pi_1^s y_{11}^s \quad r=1, 2, \dots, m \\
 & p_2^t x_2^t = \sum_{s=1}^n [\pi_2^s y_{22}^s + \pi_1^s y_{21}^s (1+i_1)] \quad r=1, 2, \dots, m \\
 & \dots\dots \\
 & p_m^t x_m^t = \sum_{s=1}^n [\pi_m^s y_{m1}^s + \pi_{m-1}^s y_{m-1,1}^s (1+i_{m-1}) + \dots + \pi_1^s y_{1m}^s (1+i_{m-1}) \dots \\
 & \quad (1+i_1)] \quad r=1, 2, \dots, m \\
 (5) \quad & y_1^t = \sum_{s=1}^M [\pi_1^s y_{11}^s + y_{12}^s + y_{13}^s + \dots + y_{1n}^s (1+i_1)/i_1] \quad s=1, 2, \dots, n \\
 & y_2^t = \sum_{s=1}^M [\pi_2^s y_{22}^s + y_{23}^s + y_{24}^s + \dots + y_{2n}^s (1+i_1)/i_1] \quad s=1, 2, \dots, n \\
 & \dots\dots \\
 & y_n^t = \sum_{s=1}^M [\pi_n^s y_{n1}^s + y_{n-1,1}^s + y_{n-2,1}^s + \dots + y_{1n}^s] \quad s=1, 2, \dots, n
 \end{aligned}$$

其中方程组(1)、(2)表示,由于各期的均衡价格不同,且由于人们都有完全的预期,所以 t 期的第 s 种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和第 r 种产品的需求是1至 V 期中各期的服务价格、产品价格及利率的函数。方程组(3)中, y_{rs}^t 表示用于 t 期的 r 产品生产中的 $T(T \leq t)$ 期的 s 生产性服务。该方程组表示技术系数是自1至 V 期各期的服务价格与利率的函数。方程组(4)表示均衡时每一期任一种产品的价格将等于其生产成本,成本中包括按复利计算的以往各期原始服务的价格。方程组(5)表示在进入静态以前的各期中,每期的原始服务部分用于当期的消费品生产,剩余部分用于投资;而 V 期的原始服务则部分用于当期消费品生产,剩余部分用于资本更新。

上述体系共有 $V[2m+2n+1/2mn(1+V)]$ 个方程式, $V[2m+2n+1/2mn(1+V)+1]$ 个未知数,未知数比方程式多 V 个。但只要假定各期皆以某一商品的价格为单位货币,则整个体系有确定解。

林达尔指出,根据上述体系可推出各期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价值,收入及储蓄。各期期初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资本化总价值(k_0, k_1, \dots, k_n)可用下列方程组表示:

$$\begin{aligned}
 (6) \quad & k_0 = \sum_{s=1}^n [\pi_1^s y_1^0 / (1+i) + \pi_2^s y_2^0 / (1+i_1)(1+i_2) + \dots \\
 & \quad + \pi_n^s y_n^0 / (1+i_1)(1+i_2) \dots (1+i_n) i_n] \\
 & k_1 = \sum_{s=1}^M [\pi_1^s y_1^1 - \pi_1^s y_1^0 + \pi_2^s y_2^1 / (1+i_1) + \pi_3^s y_3^1 / (1+i_1)(1+i_2) + \\
 & \quad \pi_n^s y_n^1 / (1+i_1)(1+i_2) \dots (1+i_n) i_n]
 \end{aligned}$$

其中第2个方程式右端中的负项,由上面方程组(4)可知,与上期消费的价值相等。而第2个方程式右端中的其他各项(正项)之和,正好等于第1个方程式右端乘以 $(1+i_1)$ 后的结果,于是可以一般地把方程组(6)写成:

$$(6a) \quad k_t = (1+i_t)k_{t-1} - \sum_{s=1}^M p_s^t x_s^t \quad \text{或} \quad k_t - k_{t-1} = i_t k_{t-1} - \sum_{s=1}^M p_s^t x_s^t$$

其中 $i_t k_{t-1}$ 为全部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期初的资本化价值(k_{t-1})在 t 期所

得的利息,若把它解释为总的净收入,并把净储蓄(S_t)解释为净收入与消费额之差,则可得:

$$(7) S_t - i_t k_{t-1} - \sum_{i=1}^M p_i x_i = k_t - k_{t-1}$$

该式表明,均衡时净储蓄等于净投资或资本的增加价值。

林达尔承认,他的上述分析都依赖于完全预期这样一个不现实的假定,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预期只可能在短时期中是接近完全的。而在稍长一点的时期中,由于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人们只能具有不完全的预期。他对于不完全预期条件下的一般均衡问题提出了如下四点意见:(1)不能再仅仅运用一个方程式体系来描述一般均衡,而是需要起码两个方程式体系,其中一个适用于意外事件发生之前,另一个适用于意外事件发生之后。(2)人们预期的变动将导致社会的资本价值的利得和损失,这就使得资本价值不再完全由储蓄来决定其变动。(3)资本品更新所需要的重置投资不再和资本品原来的生产费用相符合,而是和各期再生产的费用相符合。(4)由于每个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同。所以一般均衡方程式体系中函数将更趋复杂,但他并没有给出不完全预期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方程体系。

由以上所述可知,林达尔上述一般均衡体系的特点在于,他按照威克塞尔的见解,把更新的和新增加的资本品,都表示为生产它们时所用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服务,这样就可以把经由若干期才能建造起来,或要经由若干期才能耗尽的资本品,表示为积存的原始要素的服务。通过这种处理方法,消费、投资(储蓄)以及投资期间,便与利息率一起,作为未知变量处于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之中。这就使资本的更新与形成,尤其是投资期间(或生产迂回程度)诸问题(后一个问题正是为瓦尔拉斯所忽略而为庞巴维克所重视的),纳入了一般均衡分析,使资本积累与价格体系、各种产量水平成为同时决定的变量。这就把威克塞尔用一般均衡为分析框架构造微观体系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利息率与物价水平

为了分析利息率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林达尔对货币制度规定了下述四点假设:(1)封闭经济。(2)货币制度已经脱离金本位或任何其他本位制,从而货币当局可自由执行其信用政策。(3)一切银行信贷业务集中控制在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4)信用制度已发达到无须保有现金。

林达尔主要分析了利息率与消费品价格之间的关系,故提出了消费品价格的基本方程式: $E(1-S) = PQ$ 。 E 代表名义国民收入, S 代表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 P 代表消费品价格水平, Q 代表消费品数量。他认为, $E, S,$

P, Q 四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但 P 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因素,一般规律是“ P 的变动通常可看做是由其他因素的变动产生的结果”^①。因此,大体上可以把 P 看作是 E, S, Q 三者的函数。于是对 P 的变动的分析便归结为对 E, S, Q 的变化的分析。

林达尔认为 E 受到货币利率和人们预期的影响。长期利率影响到资本价值的计算,短期利率则决定各期资本价值的收入,同时利率变动还影响人们的预期,这些都影响到 E 。他认为 S 也受到利息率的影响,利率变动虽然对每个人影响不一,但一般倾向是利率提高则净储蓄增加。此外,利率变更还影响其他经济因素,尤其是收入分配,从而对储蓄产生次级影响。除了利息率之外, S 还因国民收入在数额和分配上的变化而变化,因人们预期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 Q 也受到利息率的影响,短期利率下降,会使 Q 的存货增加从而使出售下降,而长期利率下降,会使生产要素向资本品生产部门转移,首先使 Q 的出售下降,而后等增加的资本品能生产消费品时才导致 Q 的增加。除利率外,预期也是影响 Q 的一个因素。根据以上分析,影响 P 的三个因素 E, S, Q 都受到利息率的影响,因此,利息率便成为影响 P 的基本因素了。

林达尔指出,利息率降低的直接后果一是通过提高资本价值来降低名义总收入,二是使收入在借贷双方之间发生有利于借方的再分配,而这对储蓄的影响将是不确定的。这两方面的结果倾向于稍微降低消费品价格。但除了这两条直接结果之外,利率降低还有其他的影响,这些影响将视情况的不同而不同:(1)若投资期限一定且无闲置资源,则消费品价格将因名义收入的下降而下降。(2)若投资期限不固定但无闲置资源,则消费品价格将由由于消费品存货的增加以及由于资源从消费品业转移到资本品产业而提高;若因此而形成消费品价格上升的预期,则资本品价格将随之提高;消费品和资本品价格的上升将使生产要素所有者收入增加,而这又将引起消费品价格的进一步上升;这就导致了物价上升的累积过程。(3)若投资期限不固定,资源无闲置,但利率下降引起的收入再分配使储蓄能适应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则物价上升的累积过程可能不会出现。(4)若投资期限不固定、资源有闲置,并且闲置同时存在于消费品部门和资本品部门,则将出现两个部门实际产量的增加,而物价不会有多大提高;若闲置资源只存在其中一个部门且无法流动到另一个部门,若闲置资源存在消费品部门,则由于资本品部门生产无法增加,则收入水平和消费品物价都不会有明显增加;若闲置资源存在资

① 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8页。

本品部门,则该部门产量将增加,而消费品价格将上涨。

林达尔进一步分析了利息率上升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以及依不同情况而导致的不同结果。他的结论是利率下降有可能使未充分就业资源投入使用从而增加产量,而利率上升则可能导致资源失业产量下降,因此“物价下降所带来的灾难,往往大于物价上升所带来的灾难”¹⁾。

林达尔还区分了长期贷款利率和短期贷款利率,区分了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考虑它们的变动对物价的影响,他的结论是,短期贷款利率变动对物价发生影响较快,但时间较短;长期贷款利率的变动则结果相反。存款利率变动对物价的影响不如贷款利率变动的影晌大。

林达尔还分析了消费需求的变更、储蓄的变更、消费品生产部门及资本品生产部门生产力的变更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并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采取政策来抵消这些因素的变动所能引起的物价变化。

林达尔提出,货币政策的目标准可以有二个:一是物价稳定,二是使物价适应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实现第一个目标常常需要剧烈变动利率,从而对企业产生较大的干扰;实现第二个目标则只需要和缓地变动利率。因此第二个目标比第一个更可取。

至于实现政策的手段,林达尔提出五点意见:一是要公开宣布货币政策的目标准。二是通过变动贴现率及变动短期放款利率来管理物价。三是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影响债券价格的变动,从而不仅达到管理物价的短期目标(在这方面这一手段可替代贴现率手段),而且通过影响长期放款利率来影响未来的生产组织。四是运用各种利率差别来达到目标。五是在上述货币政策手段无效或低效时可通过变动政府开支来实现目标,具体地讲就是在繁荣时实行盈余预算,而在萧条时实行赤字预算,以熨平周期或波动。

综上所述,林达尔对于威克塞尔宏观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下述几点:(1)把威克塞尔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概念分解为资本品供给(储蓄)和消费品供给,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对概念,从而运用消费、储蓄、投资等概念代替威克塞尔的两种利率的概念,来分析宏观经济,说明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²⁾(2)提出消费品价格基本方程式,为分析消费品价格变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该方程式虽然不以利率为明确变量,但包括了利率变动影响消费品价格的几个重要的中介变量,从而有助于说明利率变动影响消费品价格的机制和条件。(3)详尽分析了导致威克塞尔累积过程的各种前提条件,尤其是

1) 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4页。

2) 参阅林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

资源充分就业和投资期间不固定这两个条件。(4)指出非充分就业条件下利率下降对实际产量而非价格的刺激作用。这使威克塞尔宏观理论大大接近了后来凯恩斯的理论。(5)区分了不同利率尤其是长、短期放款的不同作用。(6)把物价反比例于生产力的变动而不是物价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7)提出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手段,并主张以财政政策来弥补货币政策之不足。

经过林达尔的发展补充,威克塞尔的宏观理论大大接近了后来凯恩斯所建立的宏观理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对于马歇尔所进行的综合来说是一场革命,而对于威克塞尔所进行的综合来说,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三、动态分析方法

前面介绍林达尔关于资本更新和新资本形成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时已经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完全预期这一不现实的假定前提。可能正是放弃这一假定给一般均衡分析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促使他开始考虑动态分析的方法问题^①。

林达尔首先分析了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的关系,他指出,人们以往是以静态均衡分析为基础,展开动态分析的,这往往使得动态分析变成对于围绕均衡点的变动过程的分析,而不是均衡点本身变化的分析。这就大大束缚了动态分析的内容范围。他在肯定静态分析作为一种使复杂经济现象简单化从而近似描述经济现象的分析工具的前提下,指出不能以静态均衡分析作为经济学基础,而要以他所说的一般动态理论作为基础,然后展开静态分析和针对特殊问题的动态分析。他用图 10-3-1 表明了这三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以往的处理方法是沿虚线从 B 到 C,而正确的处理方法应当是沿实线从 A 到 B,从 A 到 C。图 10-3-1 表明,他对于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在经济学中的相互关系和相对重要性,有了新的看法。他明确宣布:“一切能达到说明目的的经济理论一定都具有动态的性质。”^②

关于一般的动态理论,林达尔首先给出了一个作为该理论基础的关于人的活动的基本假设:“这些人在将来一个可长可短的时期内的活动,不过是为着完成某些计划,而这些计划是在该时期初订定,由某些原则决定的。……这些原则应该说明:这些计划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拟订的,它们是以人们对于将来的期望为根据而这种期望又受到人们对于过去事件的看

^① 参阅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6—17 页。

^② 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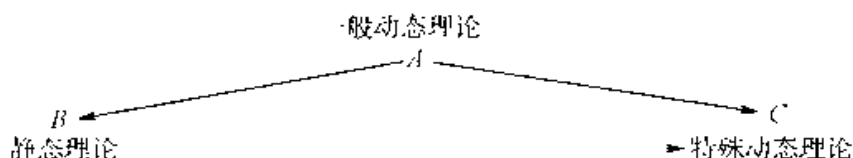


图 10 3 1

法的影响”¹⁾。根据该假设,他认为一般动态理论应由三部分构成:(1)关于决定着计划的原则及实现计划的行为的后果的技术条件、社会制度和心理状态的说明。(2)关于经济计划的理论,即计划(广义的指任何经济主体在开始行动前的任何打算和企图)的内容和修订计划所依据的原则。(3)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他重点说明了后两部分内容。

关于经济计划的理论,林达尔首先指出计划者订立计划所经历的两个阶段:(1)提出各种可行方案并分析不同后果。(2)选择最优方案。他指出,计划者在一定时期所作的选择,将影响到他以后时期中的选择范围。然后他按照计划的确定程度对计划进行了三种分类:(1)不以制定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发生的事件为先决条件的计划,和以这些事件为先决条件的计划;(2)确定具体行动的计划,和只确定可采取行为的范围的计划;(3)不可变更的计划和可修改的计划。对于可修改的计划,他又提出了计划修改的四种分类:(1)由于预期变动而引起的修改和因价值判断标准变动而引起的修改;(2)起因于经济事件的修改和起因于非经济事件的修改;(3)影响到近期行动的修改和影响远期行动的修改;(4)以原计划为基础的修改和完全改变原计划的修改。根据上述分类,他认为经济学家最应关心的是那些影响到近期行动的修订。他认为修订计划的过程由四个环节组成:(1)与计划者有关的各种因素的实际变化情况;(2)计划者对这些变化的观感;(3)由这些观感引起的预期变动;(4)由预期变动造成的修订计划的行动。他认为,对计划的具体内容的分析不是一般动态理论的任务,而是特殊动态理论要做的工作。

关于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林达尔认为应当把发展过程划分为一个个相对短的时期:他称之为“意识时期”,在该时期中,经济主体只是实施期初拟定(修订)的计划,并不进行计划的修订。意识时期中经济主体的计划行为及客观形势将导致经济变量及其他因素发生变化,经济主体在意识到经济变量和其他因素变动时将修订其计划,从而开始一个新的“意识时期”。他认为经济主体是根据事先计划的数值与事后实际数值之间的差异来修订计

1) 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9 页。

划,再实施修订后计划,而实施行为和各种客观因素将导致某种事后的实际值,经济主体再根据这个新的实际值与计划值之间的差异来进一步修订计划,如此不断循环,便构成了经济生活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过程可用图10-3-2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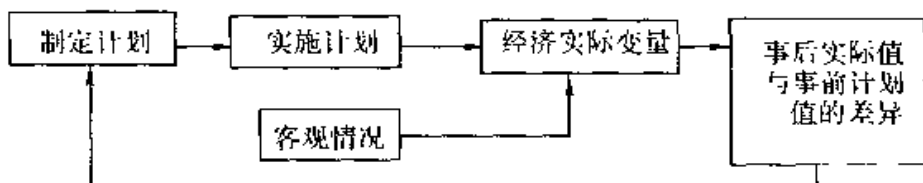


图 10 3 2

分析这种动态过程的方法,一是事前-事后方法,即重视分析事前(实施计划之前)的计划值与事后(实施计划之后)的实际值之间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计划和行为的影响;二是期间分析方法或序列分析方法,即重视经济实际变量逐期的变化。

林达尔将上述一般动态理论用于分析两个经济问题,建立了特殊的动态理论。一个是价格形成的动态过程分析,另一个是对于储蓄和投资的事前-事后分析。通常介绍林达尔的动态理论时往往介绍这两部分内容。但它们实际上只是他的一般动态理论的两个特殊应用。

林达尔的动态分析方法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弥补了均衡分析的不足;二是使经济分析突破了均衡分析所适用的范围。均衡分析一般是西方经济学家的主要方法。任何均衡分析实际上都以经济主体的一定行为方式为前提,但对这种行为方式都缺乏详尽分析。林达尔的事前-事后分析方法弥补了这一不足。这一方法肯定经济主体是以一种反馈控制的方式进行行动的,而事前计划值与事后实际值之间的差别便是一种反馈信号,它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从而影响计划影响行为。除了弥补均衡分析的不足之外,林达尔的动态分析方法比均衡分析方法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它不但适用于趋向均衡的经济,同时也适用于并不趋向瓦尔拉斯式均衡的经济,或者适用于虽然最终会趋向均衡,但趋向均衡的过程相当漫长的经济,林达尔自己便承认,他的分析动态过程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也许特别适合”^①。

^① 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页。

第四节 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

贝蒂尔·戈特哈德·俄林(Bertil Gottart Ohin, 1899—1979年),出生于瑞典克利班。1924年获斯德哥尔摩大学文科博士学位,1925—1930年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教授,1930—1965年任斯德哥尔摩经济学和商业学院教授;1938—1970年任瑞典议会议员,1944—1967年任瑞典自由党首领,1944—1945年任瑞典贸易部长。197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主要论著有:《贸易理论》(1924年),《世界经济萧条的过程与阶段》(1931年),《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1933年,有中译本),《货币政策与公共工程:解决失业的工具》(1934年),《重建国际经济》(1936年),《资金市场与利率政策》(1941年),《就业稳定问题》(1949年),《对外贸易政策》(1955年)等。

俄林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与缪尔达尔、林达尔等人一起,继承了威克塞尔的传统,注重分析宏观经济问题,运用总需求、总供给等概念,通过事先—事后分析方法,在凯恩斯《通论》发表之前,便提出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建立的理论。在1934年发表的《货币政策与公共工程:解决失业的工具》一书中,他强调了公共工程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并研究了乘数问题。但是他关于宏观经济的许多论著尚未译成英文,更未译成中文,所以关于他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便无法作更详细的介绍了。俄林的第二点贡献是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¹,下面将展开介绍。

一、区间贸易的基本模型

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汇合两股经济思想的结果,一股是哈佛经济学院以陶西格、范伊纳、威廉斯等人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理论;另一股作为他理论的一般背景的是瑞典经济学家,尤其是卡塞尔、赫克歇尔、缪尔达尔以及威克塞尔等人的经济思想。

俄林把国际贸易看作是广义的地区间(包括国与国之间和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贸易的特殊类型,并进而把国际贸易理论看成是一般的生产布局理论的一部分。这一思想使他能够从生产的角度去考虑区间贸易问题。

¹ 在俄林提出其国际贸易理论的同一年,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分别出版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这两本书与俄林的《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起,被并列为国际贸易理论上的三大名著。

俄林认为,要有效地分析国际贸易及更一般的区间贸易,必须采取一般均衡分析这种充分考虑各种价格相互依存关系的方法。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建立国际贸易及广义区间贸易的理论。

俄林以经过卡塞尔简化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基础,^①但认为这个模型忽略了市场的空间分布,暗中假定所有商品和要素都集中在一个区域中成交。因此该模型基本上排除了生产布局问题以及由布局问题而带来的区间贸易问题。为了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建立区间贸易理论,他建立了如下模型:

假定只存在两个地区 A 和 B;假定每个地区之内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和可分性,这就排除了规模经济现象,即假定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假定两个地区之间不存在要素的流动,只存在商品的流动;假定各生产要素的供给既定不变;假定两个地区具有相同的技术知识,从而具有同样的生产函数形式,即如果两个地区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有所不同,那并非由于技术知识不同,而是由于各种要素的相对比价不同;假定不存在与商品的空位移移有关的任何费用。

规定两个地区有关变量的符号如下:

	A	B
技术系统	$a: f(\quad)$	$a': f(\quad)$
要素价格	q	q'
商品价格	p	p'
个人收入	$I = \sum_1^r t_h q_h$	$J = \sum_1^r d_h q'_h$
	t_h 为某人拥有的 第 h 种要素量	d_h 为某人拥有的 第 h 种要素量
商品需求	$D = F(\quad)$	$D' = \Phi(\quad)$
要素供给	R	S

在两地区互相孤立时,可各自建立自己的均衡体系,以 A 区为例,该体系由五套方程组组成:

$$(1) a_{11} = f_{11}(q_1, q_2, \dots, q_r)$$

.....

$$a_{nr} = f_{nr}(q_1, q_2, \dots, q_r)$$

该方程组表明技术系数 a_{ij} 是生产要素的价格的函数,而该函数的形式是已知的,为物质条件所决定。

① 参阅本章第一节。

$$\begin{aligned}
 (2) \quad & a_{11}q_1 + a_{12}q_2 + \cdots + a_{1n}q_n = p_1 \\
 & a_{21}q_1 + a_{22}q_2 + \cdots + a_{2n}q_n = p_2 \\
 & \cdots \cdots \\
 & a_{n1}q_1 + a_{n2}q_2 + \cdots + a_{nn}q_n = p_n
 \end{aligned}$$

表明商品价格等于成本。

$$\begin{aligned}
 (3) \quad & D = F_1(p_1 \cdots p_n, I_1 \cdots I_n) \\
 & D_2 = F_2(p_1 \cdots p_n, I_1 \cdots I_n) \\
 & \cdots \cdots \\
 & D_n = F_n(p_1 \cdots p_n, I_1 \cdots I_n)
 \end{aligned}$$

表明商品的需求是各种商品的价格和各个人的收入的函数。

$$\begin{aligned}
 (4) \quad & I_1 = t_{11}q_1 + t_{12}q_2 + \cdots + t_{1r}q_r \\
 & I_2 = t_{21}q_1 + t_{22}q_2 + \cdots + t_{2r}q_r \\
 & \cdots \cdots \\
 & I_i = t_{i1}q_1 + t_{i2}q_2 + \cdots + t_{ir}q_r
 \end{aligned}$$

表明某个人(i)的收入由其拥有的各种要素(t_{ij} , $j=1, \dots, r$)量及其价格所决定。

$$\begin{aligned}
 (5) \quad & a_{11}D_1 + a_{12}D_2 + \cdots + a_{1n}D_n = R_1 \\
 & a_{21}D_1 + a_{22}D_2 + \cdots + a_{2n}D_n = R_2 \\
 & \cdots \cdots \\
 & a_{n1}D_1 + a_{n2}D_2 + \cdots + a_{nn}D_n = R_n
 \end{aligned}$$

表明各种要素的供求平衡。

孤立条件下均衡的相对价格体系由要素供给、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的技术系数函数和消费者欲望所决定的商品需求函数所唯一决定。

现假定原先孤立的两个地区 A 和 B 现在开始商品交易,于是出现一新的变量:汇率 $x (=v_1/p_1 = v_2/p_2 = \cdots = v_n/p_n)$ 。当 x 处于均衡时,假定从 1 到 m 种商品在 A 区的生产成本从而价格较低,而从 $m+1$ 到 n 种商品在 B 区的生产成本从而价格较低。这样便会出现商品交易,现在两个地区存在商品交易时的均衡价格体系由如下六套方程组给出:

$$\begin{aligned}
 (1) \quad & a_{11} = f_{11}(q_1 \cdots q_n) \\
 & \cdots \cdots \\
 & a_{m1} = f_{m1}(q_1 \cdots q_n) \\
 & a_{m+1,1} = f_{m+1,1}(g_1 \cdots g_r) \\
 & \cdots \cdots \\
 & a_{nr} = f_{nr}(g_1 \cdots g_r)
 \end{aligned}$$

这是技术系数函数,包括了两个地区的技术系数。

$$\begin{aligned}
 (2) \quad & a_{11}q_1 + \cdots + a_{1r}q_r = p_1 \\
 & \cdots \cdots \\
 & a_{m1}q_1 + \cdots + a_{mr}q_r = p_m \\
 & a_{m+1,1}g_1 + \cdots + a_{m+1,r}g_r = v_{m+1} \\
 & \cdots \cdots \\
 & a_{n1}g_1 + \cdots + a_{nr}g_r = v_n
 \end{aligned}$$

表明两个地区的商品价格都等于其成本。

$$\begin{aligned}
 (3) \quad & D_1 = F_1(I_1 \cdots I_s, p_1 \cdots p_m, v_{m+1} \cdots v_n, x) \\
 & \delta_1 = \Phi_1(J_1 \cdots J_s, p_1 \cdots p_m, v_{m+1} \cdots v_n, x) \\
 & \cdots \cdots \\
 & D_n = F_n(I_1 \cdots I_s, p_1 \cdots p_m, v_{m+1} \cdots v_n, x) \\
 & \delta_n = \Phi_n(J_1 \cdots J_s, p_1 \cdots p_m, v_{m+1} \cdots v_n, x)
 \end{aligned}$$

表明两个地区对各种商品的共同需求。

$$\begin{aligned}
 (4) \quad & I_1 = t_{11}q_1 + t_{12}q_2 + \cdots + t_{1r}q_r \\
 & \cdots \cdots \\
 & I_s = t_{s1}q_1 + t_{s2}q_2 + \cdots + t_{sr}q_r \\
 & J_1 = d_{11}g_1 + d_{12}g_2 + \cdots + d_{1r}g_r \\
 & \cdots \cdots \\
 & J_s = d_{s1}g_1 + d_{s2}g_2 + \cdots + d_{sr}g_r
 \end{aligned}$$

决定了两个地区所有人的个人收入

$$\begin{aligned}
 (5) \quad & a_{11}(D_1 + \delta_1) + \cdots + a_{m1}(D_m + \delta_m) = R_1 \\
 & \cdots \cdots \\
 & a_{1r}(D_1 + \delta_1) + \cdots + a_{mr}(D_m + \delta_m) = R_r \\
 & a_{m+1,1}(D_{m+1} + \delta_{m+1}) + \cdots + a_{n1}(D_n + \delta_n) = S_1 \\
 & \cdots \cdots \\
 & a_{m+1,r}(D_{m+1} + \delta_{m+1}) + \cdots + a_{nr}(D_n + \delta_n) = S_r
 \end{aligned}$$

表明两个地区的所有各种要素的供求平衡。

$$(6) \quad \delta_1 p_1 x + \delta_2 p_2 x + \cdots + \delta_m p_m x = D_{m+1} v_{m+1} + \cdots + D_n v_n$$

为区间交易方程式,表明两个地区各自的进出口平衡。

上述六套方程组便是前述 5 个假定条件下区间(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型。由该模型可以推断出,当两个地区要素的相对价格一致从而技术系数一致,或所有商品的生产要素都以相同比例结合时,则区间贸易将不出现。由

该模型还可以推断出,即使 A 和 B 两个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生产要素,且各自产品也不相同,但仍然会出现区间(国际)贸易的均衡。而这后一论断恰好是古典的比较成本说所无法得出的。

二、区间(国际)贸易的原因及其后果

由上述基本模型可知,两个地区出现分工和贸易的直接原因是起码有部分商品在两个地区孤立条件下的价格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又是源于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在两个地区不一致,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又是由于两个地区各自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比例或禀赋有所不同,且这种要素供给上的差别又无法为两个地区在商品需求上的差别所抵消。简单地讲,不同地区(国家)分工和贸易的产生,源于它们在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差异。这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差异,使得每个地区(国家)进口那些生产中需用较多本地区缺乏从而昂贵的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并出口那些生产中需用较多本地丰富从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这就是所谓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

除了不同地区(国家)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差异之外,导致地区(国家)间分工和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俄林认为是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所导致的大规模生产的节约,或者说是规模报酬递增法则。由于这一原因,即使两个地区(国家)的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完全一致,但仍然可以出现区域分工和贸易,只要地区内部某些物品的市场不够大到足以容许最有效的生产规模。由此可知,他事实上是提出了区间(国际)贸易的两个原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差异,大规模生产的节约。但通常介绍他的国际贸易思想时往往略去他对后一原因的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俄林认为,通过区间(国际)贸易,会产生三个后果:一是需求的变化;二是要素供给的变化;三是所谓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趋势,及由该趋势引起的产量增长。他指出,贸易通过改变个人嗜好来影响他的需求,商人不仅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促使人们向往得到他们打算出售的东西。

俄林认为,从长期来看,各个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深深受到区域分工和贸易影响的。但对于这种影响的性质,他承认这是一种复杂的问题,尚无法进行扼要的概括。他只是指出了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建立在要素相对稀缺性差异基础上的贸易,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这种差异,因为贸易会提高一个地区原先丰富的要素的价格,从而使它更加丰富,会降低一个地区原先缺乏的要素的价格,使它更加缺乏。二是建立在大规模生产的节约基础上的贸易,会使一个地区的要素供给发生更适于这种大规

模生产的变化。

俄林认为,区间(国际)贸易作为要素跨地区(国际)流动的替代,会减少同地区(国家)要素相对稀缺性之间的差异,从而产生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趋势。而这种均等化趋势会给贸易双方带来利益。这有两方面的原因:(1)它可以改善各个地区(国家)内部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从而增加产量。(2)它使地区(国家)内部的交换比例比贸易前更为有利。

俄林同时也指出,这种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以及由此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并不是必然出现的。这是因为不同地区(国家)生产要素之间质的差异,不同地区(国家)使用完全不同的技术的可能性,大规模生产的节约,经济稳定性及税收的差异,将使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趋势变得不确定。

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把俄林关于要素相对稀缺性差异造成区域分工和区间(国际)贸易,以及贸易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论点,称作广义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这一定理概括了俄林区间(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部分,但并不全面。它遗漏了俄林关于大规模生产节约对区域分工和贸易的影响的观点,以及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受阻的观点。而正是这些观点可以用来解释许多不能用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来说明的区域分工和区间(国际)贸易现象。因篇幅所限对此不再细述。

三、转运费用与要素流动

俄林首先是在假定不存在转运费用、不存在要素流动的条件下分析区间(国际)贸易的原因及后果,然后进一步分析转运费用和要素流动对区间(国际)贸易的影响。转运费用是指运费、关税、运输损耗等等一切与商品的空间位移有关的费用。其中运费往往是主要的。

俄林关于转运费用对区域分工和贸易的种种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缩小贸易的规模,并进而缩小许多产业的生产规模,使得大规模生产的节约无法充分实现。二是改变贸易的构成。在不存在转运费用时,两个地区之间几乎任何商品都可进入交易,通过交易使几乎任何商品在两地的价格都相同。转运费用使得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两地会保持一定的差距,以不高于转运费用为界。转运费用使得所有商品分为两大类:区内市场商品和区间市场商品,前者是指孤立状态下两地的价格差异不超过转运费用的商品,后者是指情况相反的商品。区间(国际)贸易只在区间市场商品中进行。在不存在转运费用时,区间(国际)贸易的对象可以是原料、最终产品,或某个中间阶段的半成品,但转运费用使得生产纵向各阶段的产品中,只有转运费用最低的才成为贸易对象。

俄林关于要素流动对贸易影响的论点可概括为两点:(1)由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差异所造成的贸易,与要素流动具有替代性,即当要素的转运费用相对低于商品时,则要素的流动将替代商品贸易,反之则是商品贸易替代要素流动。这种替代关系是因为要素流动(商品交易)造成的要素(商品)价格均等化使得商品交易(要素流动)不再有必要,(2)由大规模生产节约造成的贸易,与要素流动会互相促进。

俄林认为,在生产三要素中,自然这一要素是不会流动的,能流动的只是劳动和资本。他还进一步分析这两种要素流动的原因和阻碍,以及两者流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分析了与资本国际间流动有关的种种问题。

关于俄林的上述区际(国际)贸易理论,西方经济学者一直有两种偏向:一是缩小这一理论的涵盖面,把它仅仅看作是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二是扩大它的涵盖面,把它看作是说明一切国际贸易现象的基础理论。俄林本人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修订版中加入的附录Ⅱ:《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表明了自己对这两种偏向的不满。首先他认为国际贸易实在只是生产布局(或区域分工)问题的一个特殊部分,而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说明布局问题,所以远远不只是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其次,他明确承认他的基本模型(他称之为生产要素比例模型)是静态模型,并主要适用于说明像英国和新西兰、澳大利亚这类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不适用于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其实生产要素比例模型只是他分析的起点,他书中后来的分析远远突破这一模型的限制条件,具有动态成分。他的整个理论是不能用赫克歇尔—俄林定理来完全概括的,这一定理只是他的生产要素比例模型的定理,是静态性质的。

第十一章 奥地利学派的新发展

自从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于 19 世纪末创建了奥地利学派之后,在他们的熏陶之下,20 世纪初从维也纳大学又走出四位后来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埃德勒·冯·米塞斯、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弗里德里希·A. 冯·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其中米塞斯和哈伯勒还曾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由于种种原因,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先后离开了奥地利,因此人们通常不把他们全都看作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但实际上从他们所遵循的传统来看,他们在 30 年代及其以前所作出的学术成就,可以称作是奥地利学派的新发展。这一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货币理论、经济波动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理论。而在货币理论和波动理论方面的新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北欧学派的奠基人威克塞尔经济思想的影响。^① 所以本书把这一新发展看作是深化第二次综合(尤其是威克塞尔所完成的综合)的一部分工作。本章将分别介绍米塞斯、哈耶克、熊彼特及哈伯勒的有关思想。

第一节 米塞斯的经济思想

路德维希·埃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Edler Von Mises, 1881 - 1973 年),出生于奥匈帝国伦贝格(今位于苏联乌克兰境内)。1906 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1909 - 1934 年任奥地利商会经济顾问,1913 - 1938 年任维也纳大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服军役,战后至 1920 年任国际联盟奥国赔偿委员会主任。1926 年任新成立的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副所长。1934 - 1940 年迁居瑞士日内瓦,任国际研究生院教授,1940 年迁居美国,在国家经济研究所作研究工作。1942 年赴墨西哥国立大学任教授。1945 - 1969 年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其主要论著有:《货币与信贷理论》(1912 年),《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1922 年),《自由和繁荣的国

^① 参阅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2 页。

家》(1927年,有中译本),《币值稳定与经济周期政策》(1928年),《经济危机的起因》(1931年),《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年),《国民经济学:有关买卖和经济的理论》(1940年),《人类行为》(1949年),《经济科学的根本基础》(1962年)。

一、货币与波动

米塞斯关于货币与波动的理论,主要见之于《货币与信贷理论》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了后人所称之为纯货币的波动理论,这一理论在他的学生哈耶克那里得到充分展开和说明。该书分为四篇:(1)货币的本质;(2)货币的价值;(3)流通手段及其与货币的关系;(4)关于货币及流通手段之将来的管见。他把货币定义在交换过程中最能完成交换目的的财货,或最能发挥一般交换手段这一功能的财货。他认为货币价值由其购买能力所决定,而这种购买能力有历史的连续性,由过去,经现在而达于将来。溯本求源,货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被用作货币的财货,其当时所有的价值。至于货币价值变动的原因,他认为取决于作为货币的财货的价值的变动,而导致这种变动的因素之一是货币数量,另一因素是对该财货的主观需要。由此可见,他并不完全赞同货币数量说。他区分了货币和银行或其他经济主体发行的可充作流通手段的信用凭证。在此区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流通手段或信用的理论,认为银行不仅仅是信用的媒介,即不单是以别人托存的货币转贷他人,同时也自行创造流通手段。这种流通手段可替代货币,但与货币的区别在于其数量富于高度弹性。正是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信用的这一特征,在银行信用不要什么限制可自由变化的条件下,会引起货币利率与均衡利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的利率)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消费品价格具有不同影响,从而引起通货膨胀或紧缩,造成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

这种关于经济周期的观点,与威克塞尔的相同之处在于强调两种利率的差异在形成周期中的作用。区别在于:(1)米塞斯认为造成两种利率差异的主要是银行信用的高度弹性,是货币利率的变化造成差异;而威克塞尔则认为自然利率因技术进步等原因造成的时断时续的变化引起两种利率之间的差异。(2)米塞斯的周期理论突出强调了两种利率不一致所引起的消费品资本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在形成周期中的作用。^①对这一论点的深入展开,便构成哈耶克的周期理论。

基于上述纯货币的周期理论,米塞斯认为,能控制信用数量的金本位制

^① 参阅海约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27页。

是最好的币制。在1928年出版的《币值稳定与经济周期政策》中,他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周期反复出现的原因,认为是“因为企业家和政治家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思想,把利率降低看作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把膨胀式信用扩张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法”^①。“因此,经济周期接二连三地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属于思想性的。”^②他还进一步指出,商业银行之所以能一次次地扩张信用,是由于中央银行的支持,而中央银行之所以能有力量支持,是由于它垄断了纸币的发行权,假使纸币发行不由中央银行垄断,各银行都有权发行可自由兑换法偿币(黄金)的纸币,则人为增发货币扩张信用的现象将大大减少。因为不稳健的银行将被淘汰,只有稳健的银行才能存在下去。^③这一废除中央银行纸币发行垄断权的思想,无疑对哈耶克后来于70年代提出的自由货币的主张,^④有着直接影响。

二、经济自由主义^⑤

米塞斯在他1927年发表的《自由主义》(中文版译名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中全面概述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纲领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他强调,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类相互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领域,成为个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础,对人类物质进步和精神文明发挥了深远影响。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私有财产称之为个人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他强调,是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导致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先驱。

米塞斯主张自由劳动,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迁移。他认为自由劳动之所以比奴隶制劳动更值得追求,并非是出于慈善观点,而是因为自由劳动可以创造远远高于奴隶劳动的生产率。同样,他为自由贸易和劳动力自由迁移所提供的依据也是它们比贸易保护制度、禁止劳动力迁徙制度更具有效率。

米塞斯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认为人人都有参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权力。但他并不主张收人

① 参阅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1-82页。

② 参阅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1-82页。

③ 参阅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1-82页。

④ 参阅厉以宁《哈耶克的自由货币学说》,《国外经济学评价》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⑤ 参阅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平等和财富平等,因为收入平等将降低财富的总量。财富的总量是与收入分配方式密切相关的。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还有第二个功能,即它造成富人的奢侈行为,而这种行为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是经济生活的动力源之一。概括地讲,他主张法律面前的平等,但反对收入的均等化。他认为只要废除了特权,私有制并不会导致不同地位的凝固化。在自由社会中,有钱的富有人也必须不断改进自己的生产方式,以确保自己的财富,否则便会被竞争所淘汰。

米塞斯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政府的任务是: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保卫和平。他坚决反对政府对私人活动领域的干预,认为这种干预一旦开始,就意味着要有越来越多的干预,直至接受极权主义的经济计划原则。政府一旦干预商品的价格,为之规定最高水平,就会导致短缺。为了消灭短缺,政府就必须进一步干预供给,干预生产,最终将发展为对各种商品的生产和价格进行干预。

米塞斯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要有效地限止政府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就必须实行民主制度,使一般的公众有权力选择政府。他认为民主是一种使公民能够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下让政府符合自己意愿的形式。否则,人民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和内战来选择政府,而这将意味着极高的社会成本。

米塞斯从自由主义出发,主张在思想领域实行宽容,建立一个个人可以按照自己所选择的世界观和道德标准来塑造个人生活的社会,政府在世界观上保持中立和宽容的态度,同时制止任何人任何团体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的企图。概括地讲,他认为自由主义就是要允许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

三、共产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分析共产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门格尔那里已初见端倪,他提出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是所有财货都不再具有稀缺性。^①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对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的看法不像门格尔那么苛刻,承认共产主义仍然可能存在着稀缺财货,他们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经济应当如何运行进行了推测。维塞尔重点考虑了资源配置问题。根据对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经济功能的看法,他提出即使共产主义的管理是尽善尽美的,管理者都是廉洁的,公民都是无私的,同时其他失误也不存在,但只要产品要素(尤其是土地和资本)具有稀缺性,那就仍然应当有由边际效用

① 参阅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页。

决定的产品的自然价值,应当有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自然利息和自然地租。若不按稀缺的非劳动资源的边际生产力确定其价值,不把这种价值记入产品价值中,单纯按劳动耗费决定产品价值,则将无助于非劳动的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无法合理地解决它们的配置问题。当然共产主义的地租和利息将不再成为私人收入,不再是分配范畴,而是纯粹的经济核算范畴。^① 庞巴维克重点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积累问题及利息的功能。根据对利息的控制生产迂回程度的经济功能的看法,他提出,共产主义也将有利息,如果计划当局不愿犯重积累轻当前消费的错误的话,共产主义的利息将具有控制生产迂回程度的经济功能,但不再是少数人的收入,而是全体人的收入。同时,若个人收入的分配按工作成果的大小来进行,则利息还将具有另一功能,即把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获得的工作成果贴现为现值,以便比较在不同迂回方式中进行工作的劳动者的工作成果。^②

维塞尔、庞巴维克两人对共产主义经济应当如何运行的上述看法无疑对米塞斯有着重大影响。他于1922年,也就是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接近尾声的时候,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一书。该书共分五编,分别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在1927年,他又出版了《自由主义》一书,在这两本书中,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结论是,“由于每个工作者的收入并不取决于其贡献,因为他的全部工作量只是整个社会工作量的一个极小部分,故全社会的工作总量不会因他们懒惰而受到明显影响。一旦这种想法普遍化,社会总产量将受到明显影响,社会主义将因为普遍的偷懒而降低效率。在经济方面,他的基本结论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缺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缺乏在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反映了消费者主观偏好和资源的客观制约的,商品和生产资料(要素和半成品)的价格,社会主义经济在动态条件下不可能做到合理的经济计算,从而不可能合理配置稀缺资源,使既定资源条件下消费者的满足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是一种合理的经济。他还进一步论证说,社会主义也无法通过建立人为的产品市场,并让经理人员追求利润最大化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允许存在资本市场,不可能允许存在在资本市场上活动的资本家。这就使资本这一最重要的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可以做到使企业经理们模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① 参阅维塞尔《自然价值》,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9、140、204—206页。

② 参阅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6、357、358、359、360、362页。

③ 参阅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章第4节。

同行的行为,但却不能找到执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的人。这种职能便是权衡收益和风险来决定积累多少资本,以及把这些积累的资本投向何方。^[1]

米塞斯通过对官僚主义的分析,对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作出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国有企业往往不能像私营企业那样以利润为唯一目标,必须兼顾其他政府认为主要的目标,这就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同时,作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上级部门很难对国有企业的工作业绩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最后,上级部门很难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的业绩作出公正的判断,因为他们往往是上级指令的决策者,而不是独立的决策者。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导致企业的官僚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将导致经济活动的低效率。

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直接引发 3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一方面导致后来哈耶克对社会主义所作的严厉批评,^[2]另一方面则使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尼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3]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第三方面则是使既精通西方经济学也熟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权运行模式。兰格以半是讥讽半是感激的心情写道:“一方面表示承认他的贡献,一方面经常提醒健全的经济会计的头等重要地位。麦肯斯(即米塞斯)教授的像应当在社会化部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占一个光荣的位置。”^[4]

第二节 哈耶克的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

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 1899

),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1年和1923年分别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2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1--1926年在米塞斯为主任的国际联盟奥地利赔偿委员会中任职。1927年受聘为新成立的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1929年兼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讲师。1931年移居英国应聘

[1] 参阅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转载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 见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3] 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4] 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1940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50年赴美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直至1962年。1962—1969年受聘任联邦德国弗赖堡大学政治经济学终身教授。1969年退休返回奥地利,仍任萨尔茨堡大学聘问教授,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论著有:《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1929年),《物价与生产》(1931年,有中译本),《货币的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年),《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年),《资本的纯理论》(1941年),《通向奴役的道路》(1944年,有中译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48年,有中译本),《自由的宪章》(1960年,有中译本),《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1967年),《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法则与秩序》(1973年),《货币的非国有化》(1976年),《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社会公平的幻想》(1976年)和第三卷《自由人的社会秩序》(1978年),《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新研究》(1978年)等。本节将主要介绍他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的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

一、中性货币

“中性货币”是北欧学派创始人威克塞尔首倡的概念,其含义是指货币数量使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投资等于储蓄,货币的币值(即一般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从而货币对实际的经济过程保持一种中立状态,即货币因素这时不是一种影响实际经济过程的因素。

哈耶克采用了“中性货币”这一术语,但不同意威克塞尔对它的定义,因此对这一术语的含义作了相当大的变动。这种变动,与他对当时流行的货币理论持不同的看法密切相关。他指出,以约·穆勒和费雪为代表的流行的货币理论,以及威克塞尔的货币理论,都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只有在引起一般物价水平变动时才会影响相对价格;而只要币值稳定(即保持威克塞尔意义上的中性),一般物价水平不变,货币就不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也不会影响经济过程的实际方面。他认为,这种货币理论无法说明货币数量变化如何影响经济中个人的决策,所以与研究个人经济决策为中心的一般经济理论发生了隔离。

哈耶克认为,货币对物价和生产的影响,完全与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无关,几乎货币数量的任何变动,无论它对物价水平有无影响,总会影响到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到受相对价格制约的生产数量和方向。因此,他要建立的货币理论,主要是要说明货币在什么条件下对商品相对价格,从而对生产数量和方向发生影响,说明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我们可以把哈耶克的上述观点与其他当时流行的货币理论的区别,用图 11-2-1 简示出来。

其他货币理论:货币数量变动 → 一般物价水平变动 → 相对价格及生产变动 哈耶克的理论:货币数量变动 → 相对价格及生产变动(一般物价可能变动也可 能不变)
--

图 11 2 1

上图表明,在其他货币理论中,一般物价水平是联系货币与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逻辑中介;而在哈耶克那里,这个中介是不需要的。

由于相信货币数量变动会直接影响相对价格,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的含义就不再是威克塞尔所强调的一般物价水平不变,而是指货币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发生影响,不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引起生产方向的误导,即货币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中性”或保持“中立”。在如此规定货币中性的含义(我们可以把这种含义的中性称作哈耶克中性,以别于威克塞尔中性)后,他认为,构成货币影响生产的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不是币值是否稳定,而是货币是否保持中性。于是货币理论的目标是说明使货币保持哈耶克中性的那些条件。这些条件有三个:第一,货币总流量一定;第二,一切价格随供求状况的变化而完全伸缩自如;第三,一切长期契约都建立在未来价格运动的正确预测的基础上,这三个条件对于保持货币中性是缺一不可的。

其中第一个条件,并不意味着货币总流量绝对不变。哈耶克指出,为了保持经济过程的均衡,保持货币的中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变动货币总流量。这些条件之一就是哈耶克所命名的“货币交易系数”的变化。货币交易系数指货物总流量与其中以货币成交的那一部分之间的比例。哈耶克强调,货币交易系数不能与货币支付数量对贸易的实物量的比例相混淆,后者受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而前者则不然,整个社会的货币交易系数只取决于企业组织的纵向综合程度(即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是由一个企业来完成还是由若干有着纵向联系的企业来完成),生产者自给性生产的比重、物物交易占整个交易量的比重,以及货币在经济体系中各个货币交易系数互不相同的部分之间的分布。显然,当整个社会的货币交易系数发生变化时,货币流通量应发生反方向的变化。

除了货币交易系数的变化以外,需要货币总流量在保持中性的前提下发生变化的另一个条件是货币流通速度,哈耶克提出,当流通速度变化时,必须以货币总流量的相反变化来加以抵消,以便使货币对相对物价与生产保持中性。由此可见,货币保持哈耶克中性的第一个条件应当表述为:在货币交易系数和流通速度一定时,使货币流通量保持不变。

哈耶克的中性货币概念,首先是一个理论概念,用来分析货币因素是如

何影响实际的经济过程。他指出：“任何试图解决理论问题的必要的出发点，就是承认这一事实，即在物物交易条件下必然存在的供求相等的情况，当货币成为交易中介时，就不复存在了。物物交易被分为两个单独的交易以后，一个交易发生时并不辅以另一个交易，这时就出现了货币的‘一面’的影响。因此，此时的问题就是把货币的这种影响游离开来加以考察。”^①由此可见，货币中性概念主要是一个把货币影响游离出来进行考察的一个分析工具。

同时，哈耶克的中性货币概念对他的货币政策主张也很有影响。他认为中性货币概念为判断实际货币政策是否合理提供了一个虽非唯一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准则。从这一准则出发，他反对当时颇为普遍的“弹性”货币的政策（即中央银行应当使货币量随生产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因为这种政策不是像他所要求的那样按货币交易系数和流通速度的变化而相应变动货币流通量，而是使货币量随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这在他看来，必然导致相对价格和生产结构的扭曲，破坏货币的中性。哈耶克还分析了导致“弹性”货币主张的两个认识上的原因：一是混淆了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生产规模的变化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范围中的比重的变化，那么该国货币数量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不能认为还有同样的事情。弹性货币的提倡者没有区分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对货币数量的不同要求。二是弹性货币的提倡者混淆了人们对某一种货币的需求与对一般通货的需求之间的区别。事实上，随商业循环而变化的是人们对某种货币，尤其是现金的需求，而一般通货则不但包括现金，而且包括各种起着流通媒介作用的信用。哈耶克否定了“弹性货币”的政策主张，而他关于货币政策的正面建议，与其周期理论联系密切，后面再专门介绍。

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理论是他全部经济观点的基础，他的周期理论是以货币保持中性的第一个条件遭到破坏，货币量变动破坏相对价格的均衡为前提的。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则与他的货币保持中性的第二个条件有逻辑关系，完全伸缩自如的价格体系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能实现。他的第三个条件，即一切长期契约都以对未来价格运动的正确预测为基础，实质上要求经济决策者对未来具有完全的信息，而这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也就意味着实际生活中货币是难以保持中性的，从而周期的波动，作为货币中性被破坏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理论没有明确表述但却逻辑地蕴含着的结论。

^① 海约克（即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二、经济周期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表述于他1931年出版的《物价与生产》一书之中。它直接受启示于奥国经济学家米塞斯的信用周期学说,其根源则是威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和奥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哈耶克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在“一切可用的资源都被使用”^①(即充分就业),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和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这一比例也反映了对这两类产品需求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②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给之比,我们可以把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哈耶克的均衡,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他看来,均衡必然意味着充分就业,至于非充分就业现象,只是经济失去均衡的结果,正是周期理论所要加以说明的现象,非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不成立的。充分就业不仅是他的均衡的组成要素,也是他周期理论的逻辑前提之一,他整个周期理论的推导,如后面所述,是离不开这个前提的。

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这个概念在他的周期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迂回的生产包括若干顺次相继的生产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以上一阶段的产出为投入,又以自己的产出为下一阶段的投入。除了最后一个阶段以外,其他阶段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这种具有纵向顺序的诸生产阶段全体,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生产结构。当生产的迂回程度不变时,生产结构一定,当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时,就意味着出现了新的生产阶段,使生产的纵向结构不断扩张,生产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的变化,在哈耶克看来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周期的出现有重大关系。而生产结构是稳定还是变化,皆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的企业家的赢利情况,而赢利情况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此,相对价格是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

哈耶克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均衡比例的变动,生产结构会由

① 海约克(即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

② 海约克(即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第二讲。这一均衡状态可用如下方程式来表示: $M_1/M_2 = (C_1/I_1) - C_2/I_2$, M_1, C_1, C_2 分别代表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对消费品的需求量和消费品产量, M_2, I_1, I_2 分别代表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对资本品的需求量和资本品产量。

于两种原因而变化：一是货币数量不变时社会的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比例发生自愿的变化；二是消费与储蓄之间意愿的比例不变，但货币数量有了变动。

哈耶克认为，当生产结构由于比如说自愿储蓄增加而变化时，只要货币数量一定，经济体系就会经过一个平稳的自发过程建立起新的均衡。从某一均衡状态出发，若消费者决定把收入中的较大份额用于储蓄，即出现自愿储蓄的增加，则这种自愿储蓄的增量在哈耶克看来将毫无疑问地全部转变为投资。因此，自愿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减少消费需求，增加资本品需求。从而引起消费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上升。但各种资本品的价格不会等量上涨，也不会全部上涨。较晚的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那些阶段中，其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由于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可能下降，但下降幅度必然小于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而较早阶段产出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则肯定上升。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导致较晚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下降，而较早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则相对上升；从而使资金及非专门性货物¹由较晚阶段向较早阶段转移，甚至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即使得生产方法更加资本化或更加迂回，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结果，是消费品产量相对减少（绝对量则未必下降，因为更迂回的方式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消费品产量），而资本品产量则相对增加。与此同时，用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接近消费品生产的其他较晚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减少，用于较早生产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增加。结果，随着自愿储蓄的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趋于相对减少，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也趋于相对减少。因此，只要自愿储蓄的增加是稳定的，那么最终将建立新的均衡，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将再次等于它们之间在供给方面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将小于自愿储蓄未增加时的比例。

当自愿储蓄减少时，将出现相反的结局，新的均衡比例将大于储蓄未变动时的比例。

生产结构除了由自愿储蓄的变化而引起变化之外，还会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引起变化。前一种生产结构的变化，如上所述，将引起均衡比例的移动，但这种移动是平稳的，不会造成经济波动。后一种生产结构的变化则不同，一旦货币数量发生变动而消费—储蓄之比不变，且货币交易系数和货

¹ 非专门性货物是指那种可用于一个以上生产阶段的原始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与之对应的是专门性货物，指那种只能专门用于某一个生产阶段的原始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这是哈耶克所用的两个概念。

币流通速度也不变时,旧的均衡将被打破,而新的均衡只有在经历了波动之后才能出现。

哈耶克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对均衡的扰动,会因为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而有所不同,由旧均衡走向新均衡的途径会有所不同。

如果是以银行向生产者发放贷款的形式增加货币数量,为此必须使货币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即威克塞尔的自然利率)。货币利率降低使原有各生产阶段的企业家实行要素替代,即用资本品替代原始生产要素。这种行为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初始的充分就业状态中释放出—部分原始生产要素,并投入更早的生产阶段,使生产阶段增加,迂回程度加深;二是引起资本品生产,尤其是较早生产阶段的利润相对增加,非专门货物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其他较晚生产阶段向较早生产阶段流动,在经历一段耗尽消费品原有储备所需要的时间后,非专门货物的这种流动将引起消费品减少。

如果这种消费品减少伴随着消费者自愿储蓄的相应增加,那么货币数量变动引起的经济扰动将平稳地过渡到新的均衡,但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并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消费水平和原有的消费—储蓄比例,即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少,消费需求维持原状,消费品供给却减少了,结果便是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这种价格上涨没有被消费者货币收入的相应提高所抵消,消费者将被迫减少消费水平(实物意义上的)。这就是出现了强迫储蓄。但消费者货币收入最终将由于货币量增加而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即原始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了使用方向;所以企业家用新增货币进行投资的结果将使新增货币逐渐转移到原始要素所有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手中,这就使消费者们有可能用更多货币购买消费品,结果消费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将更快上涨。

如果这种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势头被银行对企业家的进一步放款所抵消,那么,已经拉长的生产过程将继续保持。但是由于法律或营业习惯的限制,银行不可能持续地扩张信用,于是出现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

如果企业家在银行供给的货币资本出现短缺之前,借助于新增加的货币,已经胜利完成了为时较长的新的生产过程,那么就可以生产出较多消费品以供消费,于是消费者增加货币收入后恢复原先消费水平(实物意义)的行为,也不会改变已经加深的生产迂回程度;如果企业家尚没有完成为时较长的迂回生产,而货币资本已告短缺,那么,只要自愿储蓄不增加,银行增加货币贷给企业家将引起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一度提高,生产迂回程度的一

度加深,但最终将由于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而出现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非专门性货物又从较早生产阶段流回消费品生产阶段和较晚的资本品生产阶段,剩下的那部分非专门性货物不够完成较长生产过程之用,曾经一度拉长的生产过程将出现纵向收缩。^①在生产过程收缩之后,较早生产阶段将出现专门性货物,尤其是专用设备的闲置,这正是萧条的特征。哈耶克认为,正是生产过程这种一伸一缩的情况,使经济出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

以上是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时的情况,如果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新增加货币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那将出现相反的过程。这时消费品价格以及较晚阶段中生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将相对提高。在短期中甚至超过最后将达到的均衡水平。于是大量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早生产阶段流向较晚和最终的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将缩短,在短期中甚至有过分缩短的倾向,即实际生产过程在短期中甚至比新的均衡比例出现后会有的生产过程还要短,原先一些较早阶段中的专门性货物将由于与之配合的非专门性货物的不足而闲置,不仅专门性货物会闲置,在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已无法维持,而新的较短的生产方式又没有充分完成到足以吸取全部非专门性货物的程度时,连非专门性货物也会出现一定的闲置,于是整个经济出现萧条现象。

哈耶克认为,专门性货物,尤其是耐用设备的闲置,并不能证明消费不足,如果没有足够的非专门性货物可以使耐用设备达到充分利用的话。他比喻说,一个孤岛上的居民打算制造一部巨大机器以供应他们的一切必需品,结果发现在这部新的机器能够生产出它的产品之前,已经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储蓄和可以动用的自由资本。于是居民们便只好放下这项工程,而把他们的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全部用来生产他们每天的食物。只有当食物供应解决之后,他们才能继续原来的工程。在这个例子里,工程的停顿,设备的闲置,生产过程的缩短,并不是因为消费不足,而是由于非专门性货物——劳动——不得不投入消费品生产中去。由此可见,在哈耶克看来,萧条,或者说资本品闲置,并不是因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少其对资本品需求,而是因为消费品相对说来太多,消费品生产抽光了使较早阶段的专用资本品得以发挥作用的非专门性货物。所以哈耶克的周期理论被人称作消费过多论。而消费品生产之所以能够抽去大量的非专门性要素,又源于银行不肯充分供应货币资本以支持企业家的投资,所以他的周期理论又被

^① 关于生产过程被增加的货币拉长之后的两种后果,参阅海约克(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52页。

人称作资本短缺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哈耶克提出了关于对付经济周期的政策主张。他认为避免周期的方法是使货币保持中性。这就要求货币当局只能在不干扰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的比例的条件下变动货币量。但他认为,这一要求实际上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对货币政策能够得出的唯一的实际准则,也许是一个消极的准则,那就是:生产和贸易的增加这个简单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扩张信贷的正当理由;除了严重的危机时期以外,银行家用不着顾虑到过于谨慎会妨害生产。……如果要作超出这个范围的尝试,也只能由一个具有全世界性的货币当局来作;任何单独一个国家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①。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不能因产量变化而变动货币量,尤其不能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增加货币量,以免人为增进繁荣。同时要求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以保证各种商品的价格完全伸缩自如。一旦萧条已经出现,则不能寄希望用小小的通货膨胀来克服萧条,这将是危险的。也不能用增加消费和公共开支的政策来对付萧条,因为这将使生产结构更加缩短,使萧条拖得更长。唯一的办法是让生产结构去缓慢地自发地适应自发形成的消费品需求与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

概括地讲,哈耶克反对建立当时许多人如卡塞尔、庇古,凯恩斯等所主张的弹性货币制度(又称管理货币制度),主张继续维持半自动化的金本位制度,依靠这种货币制度下的自由竞争,来避免经济的波动。

哈耶克的上述经济周期理论,从逻辑上看,是放弃威克塞尔累积过程理论的一个不现实的假定的结果。这个假定是说各个行业的生产期都固定为一年,不可缩短也不可延长。^②在此假定下,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差异自然不可能引起生产迂回程度的变化,从而不导致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于是这种变化在形成经济周期时的作用便被排除出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哈耶克的周期理论放弃了上述不现实的假定,从而说明了相对价格变化在形成经济周期时的作用。

哈耶克的周期理论的命运,在西方经济学界呈现为随时间而变化的U型线。凯恩斯革命以前,他已经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周期理论专家,因他在1929年2月就已经警告人们提防即将来临的经济大危机而使世人感到震惊^③。后来由于凯恩斯革命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家中逐渐占了上风,而他由

① 海约克(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9—100页。

② 参阅本书第七章第四节。

③ 参阅《哈耶克——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学家》,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

上出版了《通往奴役的道路》而在知识分子中丧失了信誉,他的周期理论也就成了被殃及的池鱼了。¹⁾以后直到70年代,滞胀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之后,哈耶克的周期理论才重新为人们所重视。他本人也部分由于对经济周期的出色分析而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耶克的周期理论,有两个重要前提:充分就业和忽略技术进步。关于充分就业这一前提,前面已作介绍,关于忽略技术进步这一前提,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两次提到他所说的引起经济波动的生产结构变化,并不是由于技术知识的进步所引起的,而完全是由于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的自愿或强制变化而引起的。²⁾

这两个前提既造成他的周期理论的短处,也造成其长处。忽略技术进步,使他的理论不能说明技术进步这一常见现象对经济波动有无影响和如何影响(解决这一问题是熊彼特的周期理论的长处),这是短处;但忽略技术进步却使哈耶克有力地证明了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也将不会平稳发展,仍会由于其他原因而出现波动,这是长处。充分就业这一前提并不意味着哈耶克否认非充分就业状态的出现,而是说他的周期理论不承认会出现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哈耶克的均衡,是由他的结构分析方法得到的,并不是一种总量均衡,而是一种结构均衡,即对产品的需求结构(需求比例)与供给结构(供给比例)相等。但产品结构均衡实际上可以在不同的总产量水平中实现,即结构均衡不给出任何关于总量的结论。³⁾因此,从逻辑上看,哈耶克必须为自己的理论体系确定一个关于总量的假设性前提,他选择了充分就业作为自己的结构均衡的前提。这一前提的短处是他的理论无法说明产品的总量是如何决定的,把总产量的决定这个需要分析说明的问题用一个假定处理掉了。

充分就业这个前提在哈耶克体系中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了分析的出发点,而且还在于他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基本上不承认在经济失衡和均衡移动时,会出现闲置的非专门性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这种原始生产要素),只会出现非专门性要素的配置变动和专门性要素的闲置。即他基本上不承认失衡会导致劳动者的大量持续失业,只会造成专用设备的闲置。于是他的理论就不能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那样更有说服力地解释30年代那种持续出现

1) 参阅《哈耶克论通往自由的道路》,载《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

2) 海纳克(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第76页注(1)。

3) 这一点,从数学上看是一目了然的: $C_1/I_1 = C_2/I_2$,在此等式中,是无法得知关于 C_1 和 C_2 或 I_1 和 I_2 的水平。

大量失业劳动者的萧条。

哈耶克关于结构失衡和均衡位置变动时,非专门性要素只会出现配置情况的变化而不会出现闲置的论点,与他只注意货币因素的变动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忽视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的观点是有联系的。确实,如果一般价格水平不变,只有相对价格变动了,那么总量就没有什么理由变化,只有结构会变化。所以他的充分就业前提蕴含着一般物价水平不会因货币因素而变动的结论。

充分就业前提的长处在于,哈耶克证明了,即使非专门性要素不出现闲置,即经济保持充分就业,也并不能避免经济波动。这一结论对于凯恩斯以后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哈耶克实际上分析了另一种类型的经济萧条。与凯恩斯所分析的不同,凯恩斯所分析的萧条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非充分就业萧条,其特征是各种要素(包括专门性和非专门性两类生产要素)都出现闲置现象。这种萧条可以通过扩大总需求来消除。但克服了凯恩斯式的萧条并不能避免哈耶克式的萧条,哈耶克式的萧条是在充分就业基础上发生的,是结构均衡被货币因素破坏而造成的,其特征是只出现专门性生产要素的闲置,不出现非专门性要素的闲置。

哈耶克式的萧条的这种特征,使他的周期理论更适用于那种由于各种原因而能保持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国家。明确地说,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也许比凯恩斯的理论更有借鉴意义,因为由于制度性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往往是充分就业的。哈耶克在比喻中所提到的那个孤岛上发生的情况,不正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经常看到的现象吗?他的结构均衡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两大部类之间、积累中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之间、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具有均衡的比例关系。他的周期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不仅要注意货币因素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还要注意货币因素对结构的影响;不仅要注意保持总量均衡,还必须保持结构的均衡。

第三节 熊彼特的经济创新理论和周期理论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特利希镇。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当时的法律系要求学生学习政治和经济,他是奥国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学生,深受奥国学派经济理论的影响。在大学期

间,他又结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并由此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906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之后,熊彼特来到了英国,求教于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埃奇沃思。1907—1908年,他在埃及开罗的国际混合法庭从事了短时期的法律工作。1909年回到维也纳,由庞巴维克推荐,任奥地利布科文纳省捷尔诺维茨大学教授。1911年改任葛拉兹大学教授。1913—1914年作为奥地利的交换学者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并被授予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回到了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奥地利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联合内阁。经当时政府的外交部长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以经济学家身份出任财政部长。1920年,他由于反对与德国结盟和反对工业国有化政策而被迫去职。1921年他担任了维也纳私营彼得曼银行总经理,但该银行于1924年破产,使他多年之后还不得不用自己的薪水继续还债。1925年,熊彼特应德国政府教育部的邀请赴波恩大学任教,任教期间,他两次到哈佛大学讲学,1932年他移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教授,直至1950年去世。

熊彼特一生著有15本书和2000多篇文章。其主要经济理论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1908年)、《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初版,1935年第4版,有中文版)、《经济理论与方法史上的阶段》(1914年初版,1924年第2版)、《租税国家的危机》(1918年)、《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39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有中文版)。熊彼特去世以后,他所著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有中文版)和《经济分析史》(有中文版),由他夫人、经济学家伊利莎白·布迪·熊彼特整理后,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出版。

除了著书立说之外,熊彼特还从事了大量的学术活动。1930年,他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共同倡导成立了计量经济学会,并于1931—1941年间担任主席,1948—1949年,他第一个以非美国人的身份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49年西方经济学界筹设国际经济学会,曾一致推选他为第一届会长。

一、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可以用三句话作一简洁的概括,这就是以一般均衡为出发点,以创新概念为中心,以历史的、统计的、理论的分析相融合为特点。

熊彼特虽然直接师承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但他最推崇的

还是瓦尔拉斯,认为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的优点和古典学派的综合的优点统一起来,这是唯一可与理论物理学成就媲美的一个经济学家的作品。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给予熊彼特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但他并没有像一个循规蹈矩的高材生那样,只满足于对先师的庞大建筑物作一些使其尽善尽美的修补工作;而是像那些最出色的学生那样,一方面给先师的建筑物以充分肯定,同时立即在其基础上,着手修造更宏伟的大厦。

熊彼特的理论体系,迥然不同于瓦尔拉斯体系,但前者无疑是以后者为其逻辑上和分析上的起点的。没有一般均衡这样一个出发点,很难预计熊彼特是否能构筑成他的宏伟体系。关于熊彼特的体系与一般均衡理论之间的关系,最好引用熊彼特自己的话来加以阐明:“……然而,当我着手研究瓦尔拉斯的概念以及瓦尔拉斯的分析技术时(我要强调指出,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与其他任何影响相比,受惠最大的就是这个概念和这个技术),我发现这个概念以及分析技术不仅在性质上纯系静态性质,而且只适用于一定不变过程。……所谓静态理论,不外乎是阐明均衡的条件和均衡在受到任何微小的扰乱之后能再生出来的道理,别无其他。……所谓一定不变过程,是指实际上不以它自己的起动力而变化的过程,毋宁说它是在与时间相伴随的循环流转中再生产出实质收入的一定率的过程。纵使这个过程有变化,那也是在诸如自然灾害、战争等与过程本身无关的外在事物的现象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我痛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深信在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一种能源,正是这个东西本身使得将要达到的均衡遭到破坏。假如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种理论,一种能阐明并非由于经济以外的因素而使经济体系发生从一个均衡推向另一个均衡的变化的纯经济理论。我打算创立的就是这样的理论。”¹

熊彼特虽然把一般均衡理论作为体系的起点,但他决心跨越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一套从经济体系的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理论,因为他深信经济体系内部必定存在一种由它自己打乱均衡的动源。

重视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注意从经济体系内部去寻找造成发展的因素,这是熊彼特理论体系方法论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这种对“发展”、对“内部因素”的重视,就不会有创新理论,就不会有熊彼特借以自豪的整个体系。

熊彼特重视“发展”和“内部因素”,这很可能与他在维也纳大学时曾接

¹ 引自熊彼特1937年为《经济发展的理论》日文版撰写的序言,转引自日本伊达邦存《瓦尔拉斯与熊彼特》,载于《经济学译丛》1981年第9期。

触过马克思主义有关,据考证,他当时的同班好友中有三位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莱德勒、鲍威尔和希法亭。在同学之间的辩论中,耳濡目染,他可能无形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多年以后,熊彼特自己也谈到,关于应当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促进经济体系发展的动力源的观点,他和马克思是完全相同的,并且“我的结构只包括他的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①。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便是他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发展动力源的结果。他认为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发展,其根源就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并且经济生活中的周期现象,也与创新活动的特点有重大的关系。他不仅用创新活动来说明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发展,还用以论证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和社会主义自动实现。总之,“创新”成为熊彼特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动态现象——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和波动到资本主义崩溃新制度出现——的中心概念。就像劳动二重性概念在马克思的体系中成为枢纽一样。

“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并不是一个技术概念,不是单纯的技术上的新发明,它是一个经济概念,是指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它包括下述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发掘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5)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如建立垄断地位或打破垄断地位。概言之,就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②“对从事活动方法方面的这种历史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③,就是“创新”。为使创新能够实现,一是要靠银行信贷,二是要靠企业家。

按照熊彼特的解释,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不等同于一般的经理,他们必须具有创新思想、冒险精神、先见之明。按照熊彼特的看法,研究静态经济需要假设经济人作为经济主体,而研究动态经济则需要假设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作为经济主体。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所从事的创新活动,这在熊彼特看来就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的基本线索。

把历史分析、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融为一体,是熊彼特方法论的特征。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8页注。

② 参看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版,第66页,转引自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页。

③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页(下面如不注明,皆指这一版本)。

他的两大卷关于经济周期的巨幅著作的副标题,就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

熊彼特的理论分析,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创造和使用概念与原理,并且用它们去理解事实的艺术”¹,他提出“创新”概念并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现象,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第二方面的意思便是强调采用数学方法,当他还只有23岁时,就写文章呼吁在经济理论中使用数学方法,以后也一直提倡。1916年,他还与别人合写了《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需用的数学初步》一书,以便在经济学界推广使用数学,熊彼特对数学方法的推崇,与他对经济科学以及一般科学的看法是密切相联的,他认为经济科学中之所以还存在大量的分歧意见,就是因为它的精密程度还不够,而数学化是提高精密程度的可靠途径。同时,他还认为,经济科学采用数学方法,有助于提高经济科学的成熟程度。在积极倡导运用数学方法的同时,熊彼特也清醒地认识到,数学方法并不是经济学家所需要的全部,而“仅仅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辅助手段”²。

在经济学中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是德国新旧历史学派的一贯主张,作为历史学派对立面的奥国学派的弟子,熊彼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门户之见。相反,他对于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莫勒“所采用的方法的程序及其成果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³。熊彼特明白,单纯运用理论分析,必须要排除掉许多对经济现象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这就不免使经济学在反映现实时受到损害。补救的办法就是引进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不忽略社会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因素的影响。

熊彼特除了进行理论分析、历史分析之外,还重视统计分析,这表现在他重视统计数字,注意用统计资料来印证或矫正理论分析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三种分析方法在熊彼特那儿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融合,形成一个互补的三位一体结构,他的每本重要著作,可以说都是体现了这三种分析方法的出色结合。他从这种三位一体的方法中,确实获益不少,提出了一些不同凡响的论点。例如对于垄断现象,单纯的理论分析总是

¹ 熊彼特:《现代经济学家的思想态度和科学装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1期,第3页。

² 熊彼特:《现代经济学家的思想态度和科学装备》,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1期。

³ 日本大野忠男:《熊彼特的经济学体系与方法》,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1期。

给予不利的评价。而熊彼特运用他三位一体的方法来分析垄断现象,就提出了全新的见解,且不论他对垄断的看法是对还是错,能够一反众议提出新论,就充分反映了熊彼特三位一体方法的作用之所在。

二、创新与经济周期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表述于他1939年出版的二卷本巨著《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他在该书序言中强调,这本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除了这部巨著之外,熊彼特的周期理论在1935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变化分析》中,也得到了简略的叙述。

经济周期通常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经济数据依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波动变化,熊彼特定义说:“从统计上来说,‘周期’这个术语含有两个意思:第一,历史时间上的(与理论时间相区别)经济数量价值的连续并不表现为单调的增或减,而是表现为这些价值本身或者其一阶或二阶导数重复出现(不规则);第二,在每个这种时间系列中,这些‘波动’都不是独立地发生的,而相互间总是表现出有着短暂的或较长的联系。”^①这个定义强调了经济数据的波动性,以及各个“波”之间的联系性。

现实世界中,引起经济数据变化的因素是众多的,有的引起波动,有的则单纯地引起单调变化。熊彼特把引起经济数据变动的因素分为三类:外部因素,增长因素和创新。其中增长因素是指人口的增加这类变化,其特点是不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波动或周期。因此熊彼特强调在分析周期问题时,应当把这类非周期的增长因素排除掉。

外部因素是指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化、经济政策变化、银行和货币管理、支付习惯,以至黄金生产变化等等。熊彼特认为这些外部因素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一个明显的重要根源。但他强调指出,仅仅从外部因素去探索经济周期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问题是“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任何产生于商业社会行为本身、并在制度的和自然的社会结构保持绝对不变的情况下

①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页。

也能观察得到的波动”。熊彼特认为,即使把外部因素造成的波动排除掉了,资本主义经济仍将呈现出周期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着创新活动。

熊彼特在应用“创新”概念来说明商业和社会内在的周期现象时,首先提出了一个只包括上升期和下降期两阶段的单纯模型。他首先假定一个一般均衡的经济体系,在该体系中,每个家庭都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即收支相抵,且支出的格局长期不变;每个企业也都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即收入与成本正好相等,利润和利息皆为零,并不存在任何获取利润的机会;而整个经济不存在非自愿的闲置资源。在这样一种静态均衡中,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会给他带来利润。而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创新活动所造成的盈利机会,会促使其他企业纷纷起来模仿他,结果就形成了创新掀起的风暴,这个风暴扩大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而由于在初始的均衡状态中,是不存在非自愿闲置的资源的,因此,企业家只有支付更高的价格,才能获取生产资料,于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便出现了涨势。而为了进行支付,企业家便扩大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引起信贷的扩张。物价上涨和信贷扩张,便造成了经济的上升阶段。他特别强调了信贷在导致创新活动时的作用,认为信贷的作用在于为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提供了实现要素新组合所需要的购买力,在于把资源从循环流通过程中转移出来投入创新。^②但是,这种由创新掀起的风暴无疑是对初始的均衡状态的一次大搅乱,因此,经济必然向着新的均衡发展,结果,就导致了经济的下降阶段。熊彼特认为,下降阶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创新掀起的风暴使企业家们为获得创新或模仿所需的生产资料而展开竞争,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上升,成本提高;同时创新和模仿造成产品的产量大量增加,以致价格下降;于是创新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守旧的企业则趋向消失,与此相伴随,对银行信用需求也开始紧缩。经济出现了下降阶段,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熊彼特认为,创新活动之所以只能造成周期波动而不是经济的持续繁荣,是因为创新活动的特征之一是它的不连续性,它是集中在一个时期,时断时续地出现的。因此一次创新造成的下降就不能被下一次创新造成的上升所抵消,于是经济生活就呈现出周期波动。^③

②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页。

③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6、119页。

④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49页。

上述经济周期的单纯模式只包括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在这个单纯模式中,抽象掉了创新所诱发的各种从属现象,如创新者的投资活动所引起的各种连锁反应,以及随着繁荣的逐渐到来而造成的投机心理和投机活动。熊彼特认为这种种从属现象将大大加强周期的振幅。他把这种诱发出来的各种从属现象的总和称为“从属波”¹⁾。

为了把从属波引起的后果考虑到周期理论中,熊彼特建立了关于经济周期的四阶段模式,该模式把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阶段。熊彼特认为,由于从属波的作用,即由于创新所引起信贷扩张和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张,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新设备的增多,也增加了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整个社会出现大量投资机会,出现过度投资,出现大量的投机活动;因此,创新活动所引起的上升将越过新均衡,以致形成虚胀或过度繁荣。

熊彼特认为,从属波造成的许多投资机会发生于与创新活动无关的部门,这时的信贷扩张也与创新无关。仅仅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活动提供资金,这意味着从属波看来声势颇大,但并无或很少有自身的推动力,它的动力源于创新活动。而一旦创新活动促使高涨的推动力消逝,从属波便往往戛然而止。这就使经济的下降过程越过单纯因创新停止而造成的衰退阶段,进入萧条。在萧条阶段,不仅投机活动消失,许多正常的活动也受破坏。在萧条阶段,从属波的影响逐渐消失,于是便进入复苏阶段。复苏阶段将使经济由低于均衡的水平趋向均衡。如果要使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那就需要新的创新活动,以使经济越出复苏阶段所达到或将要达到的均衡水平,趋向新的高涨。熊彼特强调指出,虽然复苏和繁荣两个阶段,经济都趋于上升,但造成上升的动力在两个阶段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使上升运动有可能构成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

以上便是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四阶段的解释。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从属波的存在,才使周期由单纯因创新造成的两阶段变为四阶段。为了直观地把握两阶段模式与四阶段模式的区别,我们绘制了图11-3-1和图11-3-2,两图的横轴都表示时间,纵轴都表示总产量水平,具有正斜率的直线都代表均衡水平随时间推移的轨迹。图11-3-1中的波形线表明了两阶段周期,其特点是完全居于直线之上,表明繁荣是因创新活动使经济跃出原有的均衡,而衰退则意味着回到新的均衡位置。图11-3-2中的波形线表

¹⁾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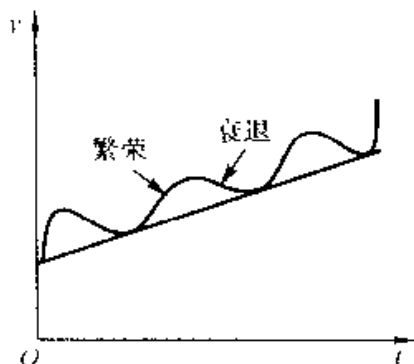


图1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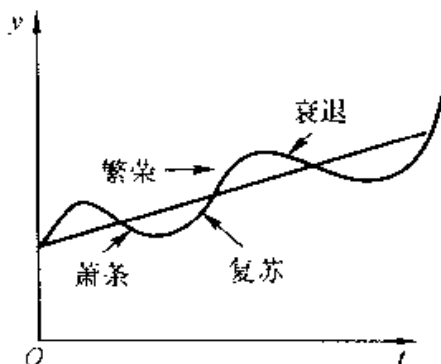


图11-3-2

明了四阶段周期。其特点是繁荣和衰退两阶段位于直线之上。而萧条和复苏两阶段则位于直线以下，表明从属波的作用使经济在下降阶段出现过度行为，以致越过新的均衡位置，从而需要一个复苏阶段来恢复均衡。

对于熊彼特的四阶段周期模式，西方经济学家斯托尔泼有一个相当精练的评价：“熊彼特相信每一个周期包括四个阶段，他把复苏阶段和衰退阶段看成是适应的过程，而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则表现为离开均衡位置的一种运动。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繁荣阶段和衰退阶段对于资本主义过程说来是本质的，而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则不是本质的，由于尖锐的社会和个人障碍发生于非本质阶段内，所以政策能够消除它们。”^①

熊彼特指出，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对经济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不同。它们有的“带来较短的波动”，有的则“导致较长的潜在高涨”^②。因此，如果认为只存在一种周期，并以为它会以非常显著的规则表现出来，那是不现实的。同时，创新的进行也不是连续平稳的，而是有时密集，有时稀疏，一次成功的创新活动会在一定时间里引起一个创新的“群集”，即引起一连串的创新活动，如汽车工业的出现。而由于创新群集的大小不同，所引起的周期也有所不同。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所实际表现出来的周期运动实在是若干个时间跨度各不相同的周期相互迭加的结果。

于是，为了有效地说明现实的周期运动，熊彼特提出“把三个周期图式

① 斯托尔泼：《熊彼特》，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4卷，1968年，第60页。转引自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9页。

②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页。

提出来作为一个很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假设”^①。这句话表明他并不肯定就只有三种周期,也没有排除存在其他周期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也提到了其他周期。三种周期的图式,实际上只是熊彼特为了分析现实的周期现象而选择的一种理论假设。他认为这种假设有助于人们分析复杂的周期现象。作为一种假设,三种周期图式比四阶段模式更接近现实。因为四阶段模式虽然刻画了每个现实周期所经历的路程,但并不能说明现实生活中各个周期何以在时间跨度、波动幅度等方面会有千差万别。而三种周期的图式则能够较好地回答这一问题,起码是朝着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向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

在熊彼特所提到的三种周期中,第一种是长达五十多年的经济长周期,或称长波。因它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又称为“康德拉捷夫周期”。熊彼特沿袭康德拉捷夫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长波大约是从1783年到1842年,即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波大约从1842年到1897年,即蒸汽机和钢铁时代,或者可以称之为世界铁路化时代。第三个长波大约从1897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被称作电气、化学和汽车的时代。

第二种周期是平均9年到10年的中周期,又称为中波。因它由法国经济学家尤格拉于1860年首先提出,故又被叫做“尤格拉周期”。

第三种周期是平均40个月(3到4年)的短周期(短波)。因它由美国经济学家基钦于1923年首次提出,又称为“基钦周期”。

除了上述三种周期之外,熊彼特还提到“其他形式的周期波”^②。如库兹涅茨周期及存货周期等。

熊彼特认为,一个康德拉捷夫周期大约包括6个尤格拉中周期和18个基钦短周期;一个中周期中包含约三个短周期。长周期是对中周期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并影响着中周期借以发生的背景。中周期的繁荣和萧条的程度,受到长周期的特定阶段的影响。中周期与短周期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上述三种周期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情况,在熊彼特看来,正好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三种周期中的任何一种都与一定的创新活动相联系。尤其是长周期,与重大创新群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至于中周期,他根据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逊的研究成果,认为把它们与一些特殊工业和特殊创新相联系

①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页。

②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

也是可能的。¹ 只是对于短周期,虽然从理论上讲也是创新活动的结果,但要把某个特定的短周期与某项特定的创新活动联系起来,似乎是不太容易的。

在用创新活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同时,熊彼特对于各种倾向于用货币因素,用信贷的扩张收缩来说明周期的理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首先,他把银行和货币管理看作是导致经济变化的外部因素,并认为单纯用外部因素来解释周期是不够的。第二,他认为单纯用投资和信贷的变动来解释周期,将导致错误的政策主张。“如果我们停在对投资过程的分析,并假设投资本身有自己的机制之上,我们不仅不能抓住事情的本质,而且还会发现在做结论上难于避免作出如下极端的推理,即由于投资的增长和信贷扩张与繁荣阶段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扩大信贷来造成繁荣。”² 第三,他并不否认投资和信贷这些与货币密切相关的因素在周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倾向于把它们与他所谓的“从属波”联系在一起。他希望最终能够建立起一种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兼顾货币因素影响的说明资本主义周期的理论模式。他认为周期理论的目标是“确立创新图式的有效性和说明创新是如何与货币的补充作用一起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内部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波,而且这种波是与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类似现象并行发生”³。

综上所述,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强调创新活动所起的作用。这样,经济周期就不像他以前以及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表现,或自发势力造成的不必要的痉挛;而是经济进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表现形式。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熊彼特并没有否认其他所谓的外部因素,包括货币政策等人为因素对周期的影响作用(虽然他对创新活动的大肆渲染往往给人以这种印象)。实际上他指出了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振动的两个振源,内生振源——创新活动,外生振源——各种外部因素。其中一部分外部因素,主要是与信贷、投机等相联系的投资活动,以从属波的形式影响着经济周期。熊彼特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幅内生振源作用机制的工笔画,同时对外生振源的作用机制也留下了一幅

¹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页。

²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页。

³ 熊彼特:《经济变化分析》,载《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7页。

粗略的画面和不少伏笔。他并没有对周期现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但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冒昧地推断出,他可能承认人为的政策干预会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来自外生源的影响,但除非禁止创新活动,来自内生源的振动将不能被任何人为政策加以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熨平而非消除西方经济波动的史实,是否能够成为上述推论的证据,是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

三、创新与经济发展

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他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而过程的基本动力源便是创新活动。甚至可以说,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就包括着经济发展。研究经济发展,就是研究资本主义。

为了充分论证创新活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熊彼特分析了创新活动发生的原因,创新活动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机制。为此,他首先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其中不存在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从而也没有创新的发展,企业收支相抵,经理们只获得管理工资,没有利润,也无利息,整个经济在同一产出水平上不断循环,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是无发展可言的。

为了说明发展,熊彼特在市场机制的纯粹理论中增加了有关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的假设。他认为企业家是和通常意义上按照常规进行活动的企业经理不同的人,他把企业家定义为专门从事创新活动,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的人。^①在他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看到,通过创新活动打破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能够给他带来额外的盈利机会。即追求利润的动机是导致创新活动的重要原因。在强调利润动机的同时,他也并不忽略其他文化、心理上的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刺激作用。他认为追求事业成功,争取出类拔萃的那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在推动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②他把这种精神称之为企业家精神。这种从多方面追寻企业家创新动机的思想,反映了熊彼特思想中历史学派的影响。

熊彼特认为,利润是企业家因为进行成功的创新活动而获得的功能性报酬。它在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中是不存在的。而创新所导致的生产要素

①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7页。

②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3-105页。

的新的更合理的组合,就构成了利润的源泉。因此,他反对把利润看作是承担风险的报酬,强调承担风险是资本所有者的职能,而非企业家的职能。¹至于利息,他认为其来源是利润,就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²。因此在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中,它也由于利润的不存在而消失。至于资本,他认为那是企业家为了进行创新活动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³总之,在熊彼特这里,利润、利息和资本这些概念都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们不再是经济理论的中心概念(如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而是成为他的创新概念的一些辅助概念,一些仅仅与创新的动机和条件有关的概念。

创新活动引起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可以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这一概念来概述。带来额外利润的创新活动,将导致为分享这种利润而开始的“模仿”,并进一步引起那些采用旧方式的企业为保卫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适应”。这是一个激烈的竞争过程。这种因创新而引起的竞争,“所打击的不是现存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在打击这些企业基础,危及它们的生命。这种竞争和其他竞争在效率上的差别,犹如炮击和徒手攻门间的差别,因此,按其通常意义来考虑竞争能否更敏捷地发挥作用,就变得比较不重要了;长时期由扩大产量降低价格的强有力的杠杆,无论如何总是用通常竞争以外的其他材料制成的”⁴。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许多新资本投入了,同时那些“适应”能力太差的企业被淘汰了,毁灭了。创新所掀起的风暴,通过创造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推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对旧资本、对守旧企业的毁坏。这就是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含义。

熊彼特认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波动是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周期来实现的,可以说周期性的波动正好体现了经济增长中那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他提出,创新和创新成果的吸收,就组成了商业周期。创新和模仿造成了经济的繁荣,但由于创新活动的不连续性,繁荣终将结束。随之而来的衰退和萧条将造成那些适应性差的企业毁灭(伴随着旧资本的破坏)。这样,一个周期就构成一次创造性的毁灭过程。

熊彼特从资本主义是一个由创新活动引起的变化过程这一认识出发,对自由竞争状态和垄断状态作出了与前人迥然不同的评价。

熊彼特首先提出,完全竞争的假设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到此为止,他

1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2页。

2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6、254页。

3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9—136页。

4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7页。

并没有提供多少新观点。他进一步提出,只有在生产方法既定,产品既定,产业结构既定,除了新增的人力新增的储蓄联合起来以便设立现存类型的新商行而外什么也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也就是在静态条件下,完全竞争才作为一种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完全竞争不利于刺激创新活动,因为任何由创新所引起的新事业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模仿,新行业立即被过多的企业所涌入,以致于创新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挫伤创新的动力。同时,在完全竞争时,各企业的内部效益要小于垄断企业。第三,完全竞争的行业比垄断行业更易受到萧条的打击。因此完全竞争状态并不是创造性毁灭过程所依存的理想环境。熊彼特承认,从某个时点看,完全竞争可能比其他市场组织更有效率,但从一个长时期看,它在效率上不如垄断,因为它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

熊彼特提出,以往的经济理论断言垄断不如竞争有效率,是以“既定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在竞争情况下和垄断状况下是一样的”这一不现实的假定为前提的。“可是现代大实业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出产数量的巨大,它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比完全竞争制度下同一产业部门的需求状态和成本状态远为有利,并且这是不可避免的。”^①他提出,人们之所以对垄断如此深恶痛绝,是因为由历史所形成的一种习惯,“即他们实际上把自己不喜欢的商业上的任何东西都归于垄断这种恶势力”。^②为了澄清概念,他定义垄断者“只是面对着一定的需求表的独家卖主,而需求高低既绝对的不受垄断者们自己行动的影响,也不受其他企业对垄断者们的行动的反行动的影响”^③。而按此定义,纯粹的长期垄断的事例比完全竞争的事例还要少见,除非是受到政府保护。

熊彼特一方面否认个别企业可以不依靠政府而长期保持垄断地位以致影响社会的总产量,另一方面也承认个别企业会在短期内处于垄断地位。而这种短期的垄断地位,在他看来,不仅不是社会的祸害,相反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他指出统计资料表明,现代生产的发展,群众性消费的出现,是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垄断——即大规模生产、大企业——的出现并行的,因此断言垄断不利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各种垄断行为,诸如专利权、长期合同、限制产量、刚性价格等

^①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

^②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5页。

^③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4页。

等,在静态经济条件下,确实造成完全竞争时不出现的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但在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它们都是经济进步的推进剂。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针对不确定的未来而设立的一种保险机制,没有这种保险机制,创新活动是大受阻碍的。他特别分析了人们经常所指责的刚性价格和技术垄断,指出,从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看,刚性价格并不像人们通常想像的那么坏,因为:(1)新产品的出现、质量的提高,是无法从衡量价格刚性的指标上反映出来的;(2)刚性价格通常是短期的,因为旧产品终究要为新产品所代替;(3)刚性价格措施,是大企业为了避免季节性的不规则的周期性的价格波动给自己造成伤害而采用的保护性措施。人们之所以痛恨刚性价格是以为它在萧条时期加剧了萧条,但这种指责要以萧条时期需求的价格弹性大于1为前提,因为只有这一前提成立,萧条时的刚性价格才会压抑总产量,但这一前提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相反的情况:需求的价格弹性小于1,因此刚性价格可能比非刚性的价格更有益于扩张总产量。因此一概反对刚性价格是不行的。至于技术垄断,他认为,人们对大企业的阻碍技术进步的指责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大企业有能力、通常也极愿意建立研究机构,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大企业暂时不用新技术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是出于其他方面的合理考虑,主要是对成本,对保持旧有资产价值的考虑。而只要新技术导致的全部未来成本低于原有技术的相应成本的话,大企业是不会拒绝新技术的。另一方面的考虑是,如果某一方面的技术进步不是一次性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接连发生的,那么大企业就没有理由不顾原有资本的相继损失,在技术进步的每一个环节上都采用很快又变旧的新技术,大企业的通常做法是暂时不采用尚在完善过程中的新技术,而采用最后相对定型的新技术。所以,人们对大企业垄断专利,阻碍技术进步的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

熊彼特还进一步指出,新产品的独家生产者是不能称作垄断者的,因为他面临着旧产品生产者的竞争,没有自己既定的需求表,需要创立自己的需求表。他们的垄断性质,是创新行为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为创新者争取到了发展所需的时间和空间。这些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颁给革新者的奖金。他进一步肯定说,如果没有各种垄断行为给大企业带来的垄断利润,创新行为将不会出现,大规模生产也无法形成,也就是说,垄断利润不再是以往人们所说的那样一种剩余性质的报酬,而是一种刺激创新的功能性报酬。

熊彼特对垄断行为的肯定,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实际上,他所赞成的主要是那些与大规模生产并行出现的垄断。对于缩小规模的垄断,例如不完全

竞争条件下的垄断现象,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认为,不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短期现象,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稳定现象,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会通过创新活动来扫除这种现象。而对于寡头,他却认为,虽然从短期来看,寡头的限产和维持刚性价格等做法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但以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为背景来看,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和人造丝工业中的寡头现象来证明这一点,指出这两个行业如果不是出现寡头而是存在完全竞争的话,就不会给消费者带来由于出现寡头而带来的那么多的利益。对处于不完全竞争地位上的规模缩小的厂商的反感和对于寡头的偏爱,反映了熊彼特对于垄断的选择倾向。

在熊彼特那儿,垄断与创新的关系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将使任何厂商都无法保持垄断地位,除非借助政府帮助;相反,它使厂商之间的竞争突破传统教科书所说的价格竞争的范围,出现质量竞争和销售竞争,企业面临的是创新造成的更高层次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的决定性有利地位的竞争”^①。这些非价格竞争比价格竞争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创造性毁灭过程从长期看是深化竞争,排除垄断。另一方面,短期的垄断地位、垄断行为虽然从短期来看是不利于生产发展,但却是创新活动,从而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短期的垄断地位和垄断行为,创新活动是难以出现的。也就是说创造性毁灭过程是以创新者的短期垄断地位为基础的,而这个过程又使任何人无法使自己的垄断地位长期保持下去。

熊彼特以下述意见总结了他对垄断的看法,与大规模生产相联系的垄断行为,“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最有力的发动机,尤其已成为总产量长期扩张的最有力的发动机,总产量的长期扩张不仅不管这种在个别事例中或个别时点看来那么富有限制性的战略而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战略而实现的。就这点来说,完全竞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低劣的,它没有权利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模范。因此,把政府管理产业的学说置于下列原则的基础上是错误的:应该让大企业像各个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完全竞争制度下面那样工作”^②。

如果把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一番比较,就更容易看出其特征。在斯密那儿,生产性劳动人口和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因此,促进有

①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6~107页。

②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3~134页。

效配置的自由竞争和反对垄断,是他所力主的经济政策。而在熊彼特这里,单纯的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并不能打破循环流转的静滞状态,不造成发展。只有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而资源的重新组合,则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助于创新活动的垄断,而不是自由竞争,才是能最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我们可用以下表 11-3-3 来表示熊彼特与斯密的发展理论的区别:

	发展的基本要素	发展的主要途径	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环境
亚当·斯密	生产性劳动者资本	资源有效配置	自由竞争
熊彼特	创 新	资源的重新组合	短期垄断

也可以把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罗德—多玛模型所表述的经济增长理论作一比较。在分析增长问题时,哈罗德—多玛模型偏重从宏观、从总量方面去考虑;而熊彼特则偏重从微观、从企业行为方面去考虑。在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上,哈罗德—多玛模型虽然承认波动难以避免,但并不是必定与增长过程相伴随的现象,通过合理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使经济在免除波动的情况下获得增长;而熊彼特则把经济波动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实现形式。

强调创新活动,强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经济发展与垄断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三点可以说构成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特征。

第四节 哈伯勒的经济周期理论

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 1900—),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3、1925年分别获维也纳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博士,1927—1929年任伦敦大学、哈佛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1928—1936年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统计学讲师、教授,1931—1932年任哈佛大学客座讲师,1934—1936年在日内瓦国际联盟金融处工作,1936年受纳粹威胁去美国,1936—1957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50—1951年任国际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1955年任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1957—1971年任盖伦·L·斯通讲座国际贸易教授,1963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65—1978年任美国财政部顾问。其主要论著有:《国际贸易》(1933年),《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在商业政

策上的应用》(1936年),《繁荣与萧条》(1937年,有中译本),《经济增长与稳定》(1974年)。

一、国际贸易理论

哈伯勒在《国际贸易》一书中,以奥国学派的机会成本说为根据,引进传统的古典学派贸易理论,建立起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学派主要根据劳动价值论或真实成本论来建立比较成本学说,但无法解决价值或真实成本的衡量和计算。他在书中首先以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论证比较成本说的正确性,而后改用机会成本说来论证比较成本说的正确。这就避免了价值或真实成本的衡量和计算问题。

二、经济周期理论

哈伯勒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表述于1937年出版的《繁荣与萧条》一书中,该书主要分为两篇,第一篇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到凯恩斯《通论》发表为止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的各种观点,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的纯货币论,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投资过度论,斯庇索夫、卡塞尔等人的非货币投资过度论、消费不足论、心理理论以及农业收获论。^①第二篇则是他在综合各派观点的基础上,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他强调:(1)像经济周期这样一种复杂现象,是不能用任何一种个别因素来说明的;(2)各派观点的差异与其说是他们各自列举的原因有所不同,不如说是他们各自强调的重点有不同;(3)在造成周期的因素分类上,重点应当区分可控因素与不可控因素,而不必区分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4)经济体系自身便存在着固有的不稳定性,外生因素作为内生程序的发动者或干扰者,起着加速、推迟、阻碍或扭转周期运动的作用。

哈伯勒主要分析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只在最后才涉及经济周期的国际方面。他把经济周期区分为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以及危机和复苏两个转折点。他首先分析了扩张和收缩这两个过程,然后再分析扩张过程何以终结——出现危机,以及收缩过程何以终结——出现复苏。

关于扩张过程,哈伯勒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1)为什么扩张过程具有累积性;(2)为什么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比非耐用消费品在扩张过程中有更快的增长。对第一个问题,他分别从实际面和货币面进行了分析。

在实际方面,哈伯勒认为,扩张过程通常始于各种资源处于未充分就业

① 该书1939年的第二版还进一步包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周期理论。

的状态下,故一旦开始扩张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各种资源的价格将不会上升或很少上升,而产出价格将不再下降,同时各企业的固定成本将分摊到越来越大的产量上,这就造成厂商的利润的上升,造成乐观预期,这种预期导致进一步的扩张。另外,因资源未充分就业,故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是相互促进,消费品生产的扩张推动资本品生产更大的扩张,资本品生产扩张引起的各要素所有者收入的提高又反过来推动消费品生产的进一步扩张。扩张过程持续到大多数资源充分就业之后,扩张将可能因生产方法的改进,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继续下去,但扩张的落点将逐渐由产量提高转移为价格提高,且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的相互促进将转变为相互牵制,相互争夺资源。这就预示了扩张的终点即将到来。

在货币方面,哈伯勒认为,扩张过程意味着总需求的不断增长,他重点强调了弹性货币供给对扩张过程的重要性,分析了可投资资金市场在扩张过程中的变化,由于总需求不断增长,导致可投资资金需求曲线不断右移。而可投资资金供给曲线也将发生相同的右移,这是因为可投资资金供给来源于总储蓄(折旧加净储蓄)以及纸币和银行信用的增加、贮藏资金的外流(反贮藏)。资金需求曲线右移引起的利率上升虽然不一定导致储蓄的增加,但扩张过程导致的乐观预期肯定会刺激公众和银行的反贮藏行为,这就导致资金供给曲线的不断右移。

关于扩张过程中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比非耐用消费品有更快增长的原因,哈伯勒是用加速原理来加以解释的,但他不同意固定系数的加速原理,认为在扩张初期存在闲置设备多余存货时,加速系数应当等于零,当扩张使设备都投入使用、非意愿存货消除之后,加速系数的大小还要考虑利率的影响,不同的利率会导致生产的不同迂回程度,从而导致不同的加速系数。最后,当扩张使大多数资源充分就业后,加速原理将受到阻碍。同时,他还指出,弹性货币供给是加速原理发挥正常作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关于收缩过程,哈伯勒同样回答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收缩过程具有累积性;为什么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比非耐用消费品有更猛烈的缩减。

关于第一个问题,从实际面来说,收缩过程中资本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会出现相互制约的关系,消费品生产下降导致资本品生产下降,后者引起公众收入下降,又引起消费品生产的进一步下降。另外,由于收缩造成的产品价格下跌,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又进一步引起悲观预期,又引起企业削减产量,而这种削减将因为固定成本的存在而进一步提高平均产品成本,进一步降低利润,如此累积下去。从货币面来说,收缩意味着总需求不断萎缩,可投资资金需求曲线因悲观预期而不断左移,可投资资金供给曲线也因公

众、企业、商业银行出于各自的各种动机而追求资产的灵活性而不断左移。至于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更剧烈的下跌,他同样是用加速原理来说明。

在分析了扩张和收缩这两个阶段之后,哈伯勒才进一步分析为何在扩张过程和收缩过程的终点会出现危机与复苏这两个转折点。他首先指出导致转折的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偶发的,不是扩张和收缩过程本身招致的;另一种是扩张和收缩过程本身招致的。

关于危机,哈伯勒认为,扩张过程以弹性的要素供给和货币供给为必要条件,而扩张越到后期,货币供给和要素供给便越是缺乏弹性,这就使整个经济体系对各种导致收缩的冲击越来越敏感,而一旦发生这种冲击,收缩也就越来越加剧。所以扩张到后期是极易发生危机的,而且具体导致危机的有三种因素:一是扩张到后期,很可能会有某些局部行业由于需求相对饱和而出现衰退。这种局部行业的衰退若是引起其相关行业的连锁反应,或引起银行贷款回收的阻碍,就可能触发全面衰退。第二个因素是扩张后期往往出现国际贸易的逆差,导致硬通货的外流,使银行系统准备金下降,迫使其收缩信用,这就触发了危机。第三个因素是扩张后期往往使生产迂回程度过长,资本品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比例失调,所以一旦银行紧缩银根之后,就无法使总需求维持原来的状况,必须通过一场收缩来矫正被扩张过程扭曲的生产结构。

关于复苏,哈伯勒认为,收缩越到后期,货币供给和要素供给的弹性便越是恢复,要素供给弹性的恢复是由于收缩使大量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货币供给弹性的恢复是由于公众和银行对其资金灵活性的要求由于收缩过程中的贮藏行为及价格下跌造成的实际财富的增加而得到了满足,从而愿意采取反贮藏行为。所以收缩后期只要有导致扩张的因素出现,便会出现复苏。而导致扩张的因素有的是由于收缩过程本身招致的,如货币工资乃至实际工资的下跌所引起的成本下降,货币贮藏的累积所引起的反贮藏倾向,因价格下跌实际财富增加所引起的消费支出的回升,被推迟的重置投资,新涌出的投资机会,以及收缩后期价格跌势的趋缓,厂商信心的恢复。另一方面,政府扩大公共开支,提高关税(以别人不报复为前提)等行为,也会导致复苏。

哈伯勒的经济周期理论在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史上处于一个转折点的地位,30年代以前,西方的经济周期理论大多以文字形式表述,30年代以后,则主要通过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来研究周期,他的周期理论正是那些到30年代为止以文字形式表述的周期理论的一个系统综合,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

第十二章 新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

第一节 德国新历史学派

一、历史背景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历史任务。普法战争后,德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从法国得到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占领了盛产煤铁的鲁尔区。这一切加速了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由普鲁士所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农业改革”实现了在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的“普鲁士道路”。

与英国经济基本上在自由放任状态中发展起来的情况不同,德国的经济发展是在政府进行大量干预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导致新历史学派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的工人运动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在1877年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工人政党曾获得50万张选票,1893年选举中有44个工人政党代表当选为议员。社会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德国新历史主义的经济学家,使他们获得了“讲坛社会主义”的称号。

新历史学派的出现,不仅有着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背景,同时也是先前已有的经济理论发展演化的结果,尤其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旧历史学派有关。

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到李嘉图,达到其顶峰,形成一个以成本(主要是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运用抽象演绎法,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在李嘉图的弟子如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手中,不再是一种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的不断发展的知识,而是成为一种教门的信条。在这些弟子看来,重要的不是如何根据现实需要而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体

系,而是尽可能防止别人对它的攻击。^①

这种自我封闭的体系自然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德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可能很好地用来解决这些问题。它自然受到了德国新旧历史学派的唾弃。

德国旧历史学派是新历史学派的直接渊源。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对历史的强调直接影响了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虽然后者并不完全同意前者的一切观点。

二、代表人物

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年),其代表作为《国民经济学大纲》(1900—1904年)。路德维希·约瑟夫·布伦坦诺(Ludwig Joseph Brentano, 1844—1931年),主要著作有:《现代劳动行会》(1871—1872年),《历史中的伦理和经济》(1901年),《价值理论的发展》(1908年)。阿多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 1835—1917年),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基础》(1876年),《财政学》(1877—1901年)。阿·谢夫勒(Albert Schaffle, 1831—1903年),主要著作有:《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活》(1875—1878年),《社会主义要义》。卡尔·布歇(Karl Bücher, 1847—1930年),主要著作有:《国家经济学的起源》(1893年),《工作和节奏》(1896年)。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三位被熊彼特称作最新的历史学派的学者:^②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ss, 1873—1957年),其代表作为:《作为历史理论的一般国民经济学:论经济类型》(1932年)。魏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年),其代表作为:《现代资本主义》(1902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年),其经济方面的代表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年),《论罗雷尔和克尼斯与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逻辑问题》(1903—1905年),《经济通史》(1919年),《经济与社会》(1914年)。在上述这些人物中,最能代表新历史学派的是施莫勒,在当代人看来最有成就的是韦伯。

① 参阅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参阅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8页。

三、基本观点与政策主张^①

新历史学派与旧历史学派一样,不认为从少数假设前提出发,通过演绎推理所得出的规律性命题和政策蕴涵具有普遍的有效性。确切地讲,他们并不是明确地否定任何经济规律的存在,只是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发现规律的方式和关于经济规律的普遍性绝对性命题。他们认为经济规律以及以发现规律为宗旨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都是相对的,是随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任何经济理论及其推导出来的政策主张都绝无可能保持其永恒的适当性,只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适当性。这是因为历史发展中不断出现新的事物,这些新事物新现象是原有的经济理论不可能完全考虑到的。这就导致了理论和政策的适当性的暂时性。同时,一切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适当性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它们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一旦条件发生了变化,其正确性合理性便会受到影响。新历史学派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即自私的经济人假设,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是多样而复杂的,即使在经济世界中,个人利益也决非唯一的动机,还有诸如虚荣心、荣誉感、责任心等等。只承认私利动机的作用,势必导致错误结论。

新历史学派责难英国古典经济学滥用了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理论不应该是从少数几条假设前提出发的演绎体系,主张用以观察为依据的归纳法来代替演绎法。这种见解,在施莫勒与门格尔之间关于方法论的论战中,得到充分表达。卡尔·门格尔1883年出版了名为《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的一本书,在书中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进行了辩护,强调了这一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攻击了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此书引起了施莫勒的回击,他认为需要通过逐渐积累的、叙述性和统计性的历史材料,经济学才能具有新的前途。新历史学派在争论中把自己的方法称作历史统计方法,主张通过大量搜集和利用统计资料及历史资料,并运用当时已经逐渐发展起来的统计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他们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在于努力收集大量的资料,历史的和当前的,然后运用归纳法从中得出若干结论。新历史学派也确实在实践中运用了他们所主张的方法,埋头于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史料的搜寻和整编,在19世纪后半期发

^① 参阅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8—98页;夏尔·李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四编第一章。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0—304页。

表了大量关于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的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经济生活的专著,对于门格尔和施莫勒之间的这场著名的方法论论战,熊彼特认为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应当承认各种方法都有其一定的适用性。事实上施莫勒在别的场合也承认演绎法和归纳法一样,都是经济研究所不可少的。这就是说双方的分歧并不像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大。熊彼特认为争论的激烈程度并非源于意见的实质性分歧,而是由于其他三个原因:大量的相互误解;学者的气质不同,有历史气质(更注重历史过程)和理论气质(更偏爱定理的推导)之分;派别倾向。

新历史学派强调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反对从单一因素出发去说明经济现象,反对把复杂多变的经济世界纳入少数几条简单的分式,强调要用有机的系统观点而不是简单的机械观点去看待经济现象乃至全部社会现象。因此在研究中他们反对采用所谓的隔离性,即把经济现象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如法律、道德和心理等隔离起来进行研究的做法。应当看到,这种研究经济现象的做法,最终在马克斯·韦伯那儿结出了硕果。

在政策主张方面,新历史学派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主张通过改良主义的手段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具体地讲,他们主张利用政府,通过各种法令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们要求修改关于自由、权利、财产和契约等法律。他们所提倡的社会经济政策涉及工厂立法、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劳资纠纷仲裁、孤寡救济、干预劳动合同等。他们还要求实行河流、森林、矿产、铁路、银行等生产事业的国有化,要求限制城市土地私有权,实行财政赋税改革,等等。由于这些改革主张,新历史学派往往又被人称作“讲坛社会主义”。

四、简短的评价^①

新历史学派注重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从事经济的研究,确有可取之处,同时他们注重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为后人提供了一大批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方法虽然不能替代抽象演绎分析方法,但不失为后者的有益补充。他们对普遍性规律的否定虽有偏颇,但能引起人们对各国经济生活特点的研究。他们把经济、法律、伦理及心理诸现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做法,也很有可取之处。他们的改良主义政策主张,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必太多计较,它们很可能也是适合当时德国的国情的。总之,虽然后人一般认为新历史学派在经济理论方面建树不多,但不能否认他们对于促进经济科

^① 参阅布哈林《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1页。

学的发展,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 美国制度学派

制度经济学是一个主要流行于美国的,对现实资本主义持一定的批判态度的,并主张改良的经济学流派。它与人们今天经常谈到的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没有渊源关系。制度经济学三位早期代表为凡勃伦(Veblen, 1857—1929年)、康芒斯(Commons, 1862—1944年)和米契尔(Mitchell, 1874—1948年)。三人在研究方向和方法及观点上各有特点,形成三个流派:凡勃伦代表制度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派,重视分析社会制度的稳定与演化;康芒斯代表制度经济学中的法律学派,重视法律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决定作用;米契尔代表经验统计学派,主张通过统计资料来研究经济现象。下面主要介绍凡勃伦和康芒斯的思想。

一、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年代,是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年代,也是工商巨头们恶性竞争、尔虞我诈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年代中,正统的经济理论(主要是以J. B. 克拉克和陶西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拙于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阴暗面,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作出解说的理论。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巨大成功,正反映了公众的这一情绪。在这样一个大变幻的年代里,美国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向将是什么,也成为一个大挑战性的问题,凡勃伦的《企业论》便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这样一个年代里,劳资关系问题也成为一个问题,如何调整这一关系,构成康芒斯学术研究的主旨。

制度经济学的直接思想渊源是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同时它还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及职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因此它在所关注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所得到的结论诸方面都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思潮不一致。

二、凡勃伦

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是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美国中部农村的挪威移民家庭。大学时曾受业于J. B. 克拉克,但显然未继承克拉克的衣钵。后曾在康奈尔、芝加哥、密苏里等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但教学生涯并不如意。他曾广泛阅读考古学、心理学、生物学、哲学等方面的论著,

具有广泛的知识面,其主要代表性论著有:《有闲阶级论》(1899年),《企业论》(1904年),《科学在现代发明中的地位》(1919年),《既得利益》(1919年),《工程师和价格制度》(1921年),《不在所有权》(1923年)等。

凡勃伦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中,以批评资产阶级的角色出现,揭露有闲阶级的寄生性,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奢侈浪费,并揭示这种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和社会根源。他指出有闲阶级通过这种炫耀性的消费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快感。他对有闲阶级消费方式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一般公众对于美国社会中的暴发户和强盗贵族的反感。同时,他的有闲阶级论也为阶级社会的稳定性提供了注解。^①他指出,虽然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社会上层与下层并不是始终处在剑拔弩张状态,因为下层人总是竭力仿效有闲的上层,为他们的炫耀性消费所吸引,力图使自己通过社会等级的阶梯走到上层社会中去。

在其他论著中,凡勃伦展开了他关于制度进化的看法。他把制度看作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公认的生活方式”等。认为经济学应当是一门进化论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应当是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他把制度发展的动因归结为人类的心理因素,并认为制度发展的特征是只有渐进而无飞跃,同时制度变化的未来趋向带有不确定性,除了短期趋势之外,其他都是不可预期的。

凡勃伦提出人有两种本能:工艺本能和获取本能。前者导致物质生产技术,后者导致私有财产制度。这两种基本本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分别表现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机器利用”的结果是无限制的商品生产,而企业经营的目的却是利润最大而非产量最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商品过剩、利润下降这种长期的慢性萧条。为了克服萧条,商人们便通过垄断来维持商价。他认为商人对社会的控制是不可能长久的,“机器利用”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冲突最终将导致“技术工程人员苏维埃”。技术工程人员已经日趋控制生产过程,只是暂时尚未控制经营过程。但总有一天技术工程人员们将根据大规模有秩序的原则来管理经济,消除“机器利用”与“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

凡勃伦对制度的重视,对制度进化的关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矛盾的揭示,对技术工程人员未来社会功能的预想,与正统经济学相比确有格外引人注意的地方,对美国经济学非主流思潮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① 参阅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2页。

三、康芒斯

约翰·洛克斯·康芒斯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其父母是思想开明的废奴主义者。康芒斯当过排字工人,入大学后受到奥伯林学院的经济学家凯里的教诲和另一位经济学家霍普金斯大学的伊利的影响。他曾任教于多所大学,因同情社会主义而被迫多次转校,最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稳定的教席。他一直关心劳工问题,参与制订了一系列劳工立法,被人称作劳工问题专家。他曾担任过美国货币学会会长,经济学会会长等。其代表作有:《劳工法原理》(1916年),《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1924年),《制度经济学》(1934年),《集体行动经济学》(1950年)等。

康芒斯把经济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就是由集体去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他认为正统的经济学一直只注意个体行为而忽视研究集体行为。他把集体行为解释为从无组织的习俗,到各种组织机构的广泛系列,包括家庭、公司、行会、工会、银行、法院乃至国家等。他认为集体行为之所以要控制个人行为,一是因为利益冲突,二是因为资源稀缺性。

康芒斯认为制度的基本功能便是利益协调。而利益协调的基本成分便是交易。他认为交易而非商品应当成为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他把交易分为三类:买卖交易,即物品所有权的转移;管理交易,即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限额交易,即政府部门对公众的管理,权力的分派,他认为交易双方存在三种关系:冲突,即利益的不一致;依存,即双方的相互依赖;秩序,即双方通过协商达成旨在消除冲突的一系列行为规定。

康芒斯认为现代社会中有三种协调利益的方式:经济方式、法律方式和伦理方式。他认为法律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应当归功于法制,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调整而得以克服。

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的重要性的看法以及他对法律的重视,使他与现代的以科斯、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了一定的渊源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第二编

—— 19 世纪下半叶国际工人运动中非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
第二国际各派理论家的经济思想

第十三章 19世纪下半叶国际工人运动中 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第一节 19世纪下半叶国际工人运动 和社会主义运动概述

19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兴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斗争中获得发展。该时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至19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在这个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剥削的加强,促使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从而使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形成了新的高涨。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不仅开始在本国范围内组织起来,而且要在国际范围内加强合作,联合进行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

1863年1月,波兰爆发了反对沙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起义,得到了欧洲各国工人的声援和支持。同年7月22日,英、法工人在伦敦联合召开了抗议沙俄暴行、支持波兰独立的群众大会。会后英国工人又向法国工人发出了《呼吁书》,呼吁世界各国工人进行联合斗争,并建议召开各国工人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呼吁书》得到了法国和其他国家工人的热烈响应。1864年9月28日,英、法工人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再次召开声援波兰人民起义和促进各国工人联系的国际工人大会。在参加这次大会的2000多人中,不仅有英、法两国的工人代表,还有德、意、波和爱尔兰等国的工人代表。马克思应邀出席了大会,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大会根据法国工人的提议,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的决议,并当即选出了由英、法、德、意等国21个代表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临时委员会(11月1日起称中央委员会,1866年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临时委员会的委员。同年10月,

临时委员会决定采用“国际工人协会”(当时简称“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才称为“第一国际”)作为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的正式名称,并选出它的领导人员:主席和总书记,分别由英国工会联合会领导人乔治·奥哲尔(George Odger, 1820—1877年)和威廉·朗达尔·克里默(William Randall Cremer, 1838—1908年)担任,著名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Johan Georg Eckarius, 1818—1889年)担任副主席,马克思担任德国通讯书记。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国际联合的崭新阶段。恩格斯指出:“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①马克思就是这支工人阶级联合大军的“灵魂”。恩格斯说:“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②

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时,巧妙地做到了“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即采用了当时工人水平所能接受的形式来表达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实质。《成立宣言》宣告:“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③,”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④。在《成立宣言》的结尾,重申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临时章程》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⑤《临时章程》规定,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由马克思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在1864年11月1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这两个重要文献,为第一国际奠定了一条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

第一国际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导地位的日益加强,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反抗也日益激烈。他们企图把自己的教条强加于第一国际,因此,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这种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为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与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指出:“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

在第一国际时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有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当时,对国际危害最大的,主要是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是法国著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之一。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蒲鲁东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于50—60年代日益臻于完善,并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国泛滥,其中在法国的影响最大,蒲鲁东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和平的无政府主义”,其核心是极力保护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蒲鲁东主义幻想通过“合作社”、“交换银行”实现工人的解放,建立一个没有国家和权威,人人都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蒲鲁东主义者所鼓吹的这套反国际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遭到了坚持《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对。经过多次论战,特别是在国际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金属矿、煤矿等工业生产资料和铁路等交通手段“必须属于整个社会”,土地应“成为公共财产”的决议,给蒲鲁东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粉碎了他们妄图永远保存小私有制的反动思想体系。在这次代表大会后,蒲鲁东派分裂、瓦解。以瓦尔兰(L. E. Varlin 1839—1871)为代表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毅然抛弃了旧的观点,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们赞成生产资料公有,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瓦尔兰后来成为巴黎公社的杰出领导人。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1811—1876年)出身于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是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主义,其最主要之点是他的国家理论和对于政治活动的态度。恩格斯指出:“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

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1] 巴枯宁“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2]。这一理论是巴枯宁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他由此得出工人阶级应当放弃一切“政治活动”^[3]的结论。恩格斯在驳斥这种谬论时说:“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唐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4] 并指出,巴枯宁的理论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5]。巴枯宁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危害,不仅在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还在于他的分裂主义的宗派阴谋活动。他在国际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分裂活动,竭力扩张其宗派势力。马克思指出:“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害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6]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谬论,以及巴枯宁集团的阴谋分裂活动,遭到了坚持《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在187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出席并领导了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巴枯宁集团的首要分子巴枯宁和吉约姆(J. Guillaume, 1844—1916)等开除出第一国际,取得了反巴枯宁主义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不久后,巴枯宁集团发生内讧而作鸟兽散。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间的传播,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7]。巴黎公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它在世界上创立了第一个“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8]。巴黎公社虽只存在72天,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9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9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9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9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9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44页。

[8]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页。

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¹。

第二个阶段,从巴黎公社失败至19世纪末。这时,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跟前一个阶段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带有“和平”的性质而没有发生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东方尚未具备实现这种革命的条件。列宁在概括这个阶段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时,指出:“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²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虽然成为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之间斗争的结束。伴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在欧美许多国家仍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中主要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和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法国的“可能主义”,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俄国的民粹主义等。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战友,为了帮助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健康成长,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关于该时期国际工人运动中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里,仅在以下两节中,对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思想作一概述。

第二节 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一、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年)生于德国布勒斯劳市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少年时期,他在莱比锡学习经商,在布勒斯劳上中学。1840年后,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影响,阅读过歌德、席勒、莱辛、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77页。

²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8—439页。

伏尔泰和海涅等人作品,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1843年通过高中毕业考试,进入布勒斯劳大学,后又转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古典艺术和语言学等,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在大学学习期间,拉萨尔还阅读过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同情工人运动。大学毕业后,拉萨尔在柏林充当律师。从1846年初开始,拉萨尔承办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和财产诉讼案。为了取得有关证据,他因指使别人盗窃伯爵情妇的首饰匣而被捕、坐牢。1848年8月获释出狱后,拉萨尔被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卷了进去。他在莱茵省的杜塞尔多夫市参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并成为该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时,他认识了马克思,并同马克思领导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委和《新莱茵报》建立了联系。1848年11月,拉萨尔因支持抗税斗争和建议议会以武装反对王室而被反动政府逮捕,直到1851年4月才被释放。鉴于拉萨尔在狱中和法庭上表现较坚定,马克思于1850年6月曾建议共产主义者科伦区委吸收拉萨尔为盟员。在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拉萨尔留在德国,曾表现出他一定的勇气,也曾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这期间,他的主要精力仍是用在承办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讼案上。他先后花了整整8年时间,于1854年8月才了结此案。他曾在36个法院打官司,“采取了最无耻的手段,并且和最无耻的人勾结在一起”^①,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争得30万塔勒的财产,而拉萨尔自己也从这位伯爵夫人那里得到每年7000塔勒的固定年金。从此,拉萨尔过着奢侈享乐生活,故意疏远工人,而向贵族代表人物献媚。对此,恩格斯曾痛斥拉萨尔已成为一个“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②。

1857年,拉萨尔以保证“奉公守法”为条件,得到反动当局准许移居柏林,从事著述活动,1857年11月,发表了其唯心主义哲学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9年4月,发表了他鼓吹唯心史观的历史剧本《费兰茨·冯·济金根》。同年6月,他又发表了替路易·波拿巴侵略政策辩解和维护普鲁士王朝利益的《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这三本书,均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这时,拉萨尔为配合资产阶级同容克地主阶级争夺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撰写了一系列鼓吹天才论和英雄史观的哲学著作,如《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罗生克拉茨的逻辑学以及黑格尔体系中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1859年)、《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莱辛》(1861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9页。

年)、《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费希特的哲学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意义》(1862年)等。拉萨尔在这些著作中,宣扬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调和一致,反对德国人民通过破坏现实来完成自己的民族事业。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构成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这时,拉萨尔还企图利用马克思的威望来实现他篡夺德国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野心。1861年3月和4月,他两次向马克思建议,在柏林合办一份报纸来指导德国工人运动。1862年7月,拉萨尔在伦敦又狂妄地要求同马克思“共同领导”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当面谴责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鼓动计划,拒绝“同他搞政治合作”¹。1862年底,马克思同拉萨尔断绝了关系。后来,马克思在说明他与拉萨尔决裂的原因时指出:“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身份来反对我和旧的党。”²

60年代初,德国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引起了德国统治集团的恐慌,它们力图控制和利用新兴的工人运动。1862年9月,“铁血宰相”俾斯麦(O. Bismarck, 1815—1898)一上台,就采取反革命两面手法来对付工人运动。他一面镇压工人的革命行动,另一面又收买工人阶级以对付资产阶级。拉萨尔为适应俾斯麦这一反动政策的需要,“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³。1862年4月12日,拉萨尔在柏林郊区奥兰宁堡手工业协会作了题为《工人纲领——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阶级思想的特殊联系》的演讲,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他在这次演说中,提出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观点。同年的4月16日,拉萨尔发表了《论宪法实质》的演讲,同年12月,他又以《现在怎么办?》为题发表了关于宪法问题的第二篇演讲,既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又向王国政府讨好。同年的5月19日,在纪念费希特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费希特的哲学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意义》的演讲,鼓吹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德意志民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8页。

族至上等反动观点。1863年3月1日,拉萨尔又发表了《给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的小册子,更系统地阐明了他在《工人纲领》里所提出的机会主义观点。同年的1月和5月,他还出版了《科学与工人》、《工人读本》等小册子,这标志着作为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主义的形成。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拉萨尔当选为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在德国十多年黑暗反动统治后建立起来的独立工人组织。马克思对拉萨尔进行鼓动的功绩是肯定的,他在给施韦泽的信中说:“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①同时,马克思又指出拉萨尔“犯了很大的错误”^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拉萨尔错误的一个方面是,他在工人运动中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即所谓的拉萨尔主义。拉萨尔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决定的;只有建立工人自己的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才能获得全部劳动所得;而要组织建立工人的生产合作社,就必须依靠国家的帮助才行;而要取得这种超阶级的国家的帮助,就必须争取普选权;而要争取普选权,就必须组织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来进行和平的合法的宣传鼓动。总之,拉萨尔主义的实质,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它是主张通过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帮助”和实施普选权来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拉萨尔的这种社会主义称为“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③。作为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主义,不仅在德国工人政党内阴魂不散,而且成为许多机会主义理论的蓝本,伯恩斯坦走向修正主义时,贩卖的也是拉萨尔主义的教义。

拉萨尔错误的另一方面,即其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方面是,他为适应俾斯麦的需要,从1863年5月11日起,就与俾斯麦秘密勾结,多次进行密谋和通信,极力支持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内外反动政策,妄图把德国工人运动引上与普鲁士君主专制结盟的反动道路。例如,1863年5月11日,俾斯麦写信给拉萨尔,约他就工人问题进行密谈,在5月12—13日,拉萨尔与俾斯麦进行第一次会面,即向俾斯麦乞求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他表示支持俾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页。

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同年6月8日,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表示愿意接受国王的“社会独裁”,并把《全德工人联合章程》奉献给俾斯麦审阅。同年6月10-15日,拉萨尔与俾斯麦进行第二次密谈,向俾斯麦汇报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情况,并同俾斯麦商讨反对资产阶级进步党的共同行动。同年10月23日,拉萨尔与俾斯麦进行第三次密谈,商讨在国会选举时工人联合会与俾斯麦的保守党结盟问题。1864年1月9日,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要求就普选权问题举行密谈,同年1月12日,拉萨尔与俾斯麦进行第四次密谈,并由俾斯麦委托拉萨尔起草选举法草案。同年1月底,拉萨尔与俾斯麦进行第五次密谈,并向俾斯麦呈上他起草的选举法草案。同年2月5日,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并将自己刚出版的著作《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经济学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寄给俾斯麦,告知该书的主旨是为俾斯麦箝制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服务的,并乞求接见。同年4月底,就实施普选权等问题,拉萨尔与俾斯麦进行第六次密谈,并再次表示支持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支持普鲁士王国对丹麦的战争。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拉萨尔“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¹⁾,他“存心要把工人政党出卖给俾斯麦”²⁾,”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³⁾。

1861年8月28日,拉萨尔在瑞士与罗马尼亚的贵族扬科·腊科维茨(Janko Racowit)为争夺巴伐利亚驻瑞士联邦代办的女儿海伦娜·塞尼盖斯,进行决斗,腹部中弹。于8月31日,即第四日因受重伤,死去。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感到“很痛心”⁴⁾。马克思说:“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⁵⁾同时,马克思又说:“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⁶⁾,”如果拉萨尔在瑞士不同那些军事冒险家和戴黄色羔羊皮手套的革命者周旋,就决不会发生这种惨剧。”⁷⁾

拉萨尔虽然死了,拉萨尔在工人运动中所散布的那套机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纲领,仍继续毒害着工人阶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是,拉萨尔的追随者贝克尔(B. Becker, 1864—1866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施韦泽(J. B. Schweitzer, 1867—1871年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2页。

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全盘继承了拉萨尔的观点和策略,继续顽固地进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工人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团结在倍倍尔(A. Bebel, 1840-1913)和李卜克内西(W. Liebknecht, 1826-1900)的周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在1867年与以拉萨尔的追随者贝克尔、施韦泽为首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决裂,于1869年在埃森纳赫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通常称埃森纳赫派),并宣布加入第一国际。这样,德国工人运动就分裂成两派,即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埃森纳赫派与执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拉萨尔派。但是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工人运动的统一。埃森纳赫派为统一工人运动、共同对敌的需要,曾多次建议两派联合,均遭到拉萨尔派的拒绝。到1874年拉萨尔派出现危机时,才要求两派合并。关于两派合并,马克思、恩格斯原则赞成,但他们一直提醒埃森纳赫派领导人,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合并,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1]。但是,埃森纳赫派领导人迷恋“一时的成功”没有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告诫,匆匆忙忙与拉萨尔派商谈合并,参加起草了一个《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1875年3月7日在双方的机关报上发表,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两派合并大会上通过,这就是所谓的《哥达纲领》。这是一个充满着拉萨尔主义谬论的机会主义纲领。当马克思、恩格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纲领草案时,都非常气愤。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会使党堕落的纲领”^[2],这个“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该加以批判的”^[3]。1875年4月至5月初,马克思抱病撰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这一名著中,对《哥达纲领》草案逐条进行了批判,这是对拉萨尔主义的清算。它“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原则和策略的态度”^[4]。

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他从经济学方面来论证其机会主义路线的经济观点,它是拉萨尔主义的基本内容。这里,仅概述以下几点:

(1)“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不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5页。

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增长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他说:“在现今的关系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¹这是“一个中心点”²。“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工人结婚和繁殖后代就会增加,工人人口就会增加,从而人手的供应就会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³当然,“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流动、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⁴。因此,“平均工资限制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在现今条件下支配着工资的严酷的铁的规律”⁵。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⁶。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⁷。拉萨尔企图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般规律,把社会的规律说成是自然的规律。这说明“拉萨尔并不懂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⁸。很明显,拉萨尔的这个“铁的工资规律”的论据,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⁹。此外,拉萨尔还从德国诗人“神妙的”诗句中抄了“铁的”这个词,所以“铁的工资规律”这一命题中,“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¹⁰。马克思指出,“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¹¹。资产

¹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4页。

²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4页。

³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5页。

⁴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5页。

⁵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5页。

⁶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5页。

⁷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5页。

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页。

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¹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¹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阶级“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①!马克思的这一反证,点破了拉萨尔及其信徒鼓吹这种谬论的阴谋,其目的就是要掩盖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真相,企图证明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从而否认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这说明,拉萨尔的工资理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它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服务的。

(2)“依靠国家帮助”实现社会主义。在拉萨尔看来,国家不是什么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是个人在一个道德整体中的统一”^②;“国家的真正的道德本质,国家的真正崇高使命”^③,“就是使人的本质能够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换句话说,就是真正实现人的使命,即实现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文化……”;因此,“国家的宗旨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④,“就在于实现这种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向自由的发展”^⑤。拉萨尔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为了一切人而存在的”^⑥。他还以普鲁士王国政府 1851 年公布的统计表为依据,说收入在 400 塔勒以下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占 96.25%,由此他得出结论:国家就“是劳动阶级的巨大的组织,巨大的合作社”^⑦。他向工人们说:“国家是属于你们受苦阶级的,而不是属于我们上层等级的,因为国家是由你们组成的!……什么是国家?现在你们可以从少量的数字中比从几厚本书籍中更明确地找到答案:你们贫苦阶级的大合作社——这就是国家!”^⑧

拉萨尔从这种超阶级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出发,提出了通过“国家帮助”来实现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主张。他认为,只有靠国家出资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企业主,废除“铁的工资规律”,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从而社会主义也就到来了。他说:“解放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废除那个置工人阶级于死地的决定工资的严酷规律的唯一道路,是通过国家帮助促进并发展自由的个体的工人合作社”^⑨,“使工人等级成为它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7 页。

②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71 页。

③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71 页。

④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71 页。

⑤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71 页。

⑥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239 页。

⑦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141 页。

⑧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137 页。

⑨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第 141 页。

己的企业主”¹⁾；而“国家的事业和任务就是使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把工人等级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的伟大事业抓到国家手中，促进它，发展它，就是要把向你们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合作社提供资金和可能性当作国家最神圣的义务”²⁾。拉萨尔还算了一笔账，只要国家拿出一亿塔勒，就可逐渐为全德工人的解放开辟道路。他说：“一亿塔勒能使四十万工人加入合作社；假定每家平均人口为五人，那末就是二百万人口；以每年一千万的利息计算，这就每年又可以使四万工人，即又有二十万人口可能得到自由和福利，或者说在开头十四年，我们假设每年只得到五百万利息，这至少每年又可以使另外二万工人及其家属得到自由和福利，这样在一定的时期内就为你们大家，为社会上一切劳动阶级摆脱贫困状况开辟了道路”³⁾；只要“合作社化一旦着手进行和发展起来，每年就有大批工人可以实现合作化。从而进入自由和福利的世界”⁴⁾。因此，他呼吁：“我只向国家要求一个小手指！而其余的一切就会以一种持续的生命力自然而然地有机地发展起来。在采取这个措施五十年之后，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不可辨认了！”⁵⁾ 依靠国家出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摆脱贫困，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点。

拉萨尔还主张通过实施普选权来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实现”⁶⁾。他向工人宣称：“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不仅是你们的政治原则，也是你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是一切社会帮助的基本条件。这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一手段。”⁷⁾ 因为只有取得普选权，才能把普鲁士专制国家变为“自由国家”，并由“自由国家”把用于战争的钱拿来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摆脱贫困；而为了取得普选权，工人阶级就“应当建立独立的政党，而且应当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这个党的原则口号和旗帜。工人等级在德国的立法机构中拥有代表资格——这是它能够在政治中满足自己正当利益的唯一的東西。为此而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和平的合法的鼓动，这就是而且应当是工人党的

1)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31页。

2)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31—132页。

3)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84页。

4)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85页。

5)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88页。

6)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41页。

7)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42页。

政治纲领”^①。马克思指出,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②。向这样一个国家要求普选权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早在拉萨尔提出这一谬论时,“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③。马克思讽刺道:“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④

(3)“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在照搬拉萨尔思想观点的《哥达纲领》草案的第一条中写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⑤对此,马克思曾作过详细的评析。这里,仅从以下两点,作一概述。

首先,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⑥。这就是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创造物质财富除了劳动这个因素之外,还必须有自然界所提供的自然物质因素。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⑦。这就说明创造物质财富,不能离开自然界,即劳动不能离开与其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就是“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⑧。劳动只有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来。因此,“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能

①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页。

⑤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¹⁾。假如劳动者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由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就会“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²⁾。这是从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到它的灭亡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³⁾。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奴隶、农奴和无产阶级总是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生产资料被奴隶主、农奴主和资产阶级所占有。因此,处于资本统治和奴役下的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铲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社会祸害”⁴⁾。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条件下,必然使“平等的权利”、“公平分配”成为空话。而空谈“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从根本上勾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要将工人运动引向机会主义的泥坑。

其次,马克思指出,在浸透着拉萨尔思想观点的《哥达纲领》草案中,把“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社会”、“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放在一个条文里进行阐述,“只不过是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⁵⁾。马克思指出,“劳动所得”这一用语,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究竟是指“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⁶⁾?而“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句话,在逻辑上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劳动收入平等地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那么,不劳动的人也应获得收入了。这样,“‘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儿呢”⁷⁾?如果收入只给劳动者,“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儿呢”⁸⁾?但纲领草案在第三条中又提出要“公平分配劳动所得”⁹⁾,其实质,就是要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9)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¹⁾。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²⁾,它在用于劳动者个人分配之前,必须先扣除以下几项: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³⁾;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⁴⁾;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⁵⁾。马克思认为:“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⁶⁾ 社会总产品在作了上述三项扣除后剩下的作为消费资料的部分。用作消费资料的部分在进行分配之前,还得扣除以下几项: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⁷⁾;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⁸⁾;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⁹⁾。马克思认为,作为消费资料的部分只有在作了这些扣除之后,才能进行个人分配。这样,“‘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¹⁰⁾。

马克思还指出,纲领草案关于分配问题的阐述,除了上述这些错误外,“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¹¹⁾。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¹⁾而纲领草案根本不谈生产条件的分配,根本不谈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却空谈什么“公平的”分配。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²⁾而拉萨尔及其追随者们,正同庸俗社会主义者一样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³⁾。

总之,拉萨尔鼓吹通过“国家帮助”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代社会的基石,从而保存现代社会本身”⁴⁾。

上述拉萨尔主义和拉萨尔的经济思想,曾对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产生过一定影响,而对伯恩斯坦的影响则更大。

第三节 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思想

一、费边社会主义的形成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1883年,一批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伦理思想感兴趣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伦敦创立了新生活联谊社,其宗旨,是要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寻找一条最高的伦理原则。该组织成立后不久,即发生分裂。1884年1月,一部分从新生活联谊社中分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创立一个定名为“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团体。“费边”是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统帅克文图斯·费边·马克西姆(Quintus Fabius Maximus,约前280—前203)的名字。费边统率的罗马军队在同汉尼拔(Hannibal)统率的迦太基军队进行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08—前201)中,费边采取了避免决战的、缓进的待机策略,使罗马取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以此费边称著史册。费边也得到了“孔克达特”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1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3页。

(“Cunctator”意即“缓进者”)的绰号。创立“费边社”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以“费边”为社名,就是表明他们也要采取费边那样缓慢的渐进策略,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费边社在成立时公布的座右铭是:“要像费边与汉尼拔作战那样,尽管许多人指责他拖延时日,他还是极其耐心地等待时机;一旦时机到来,就得像费边那样,全力出击,否则就白等了一场,徒劳无功。”^①

费边社成立后,探讨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贫困问题。到1884年4月,该社从最初的几个“费边社创始人”发展到了二十余人时,以《为什么很多人贫困不堪》为题,出了该社的社刊《费边短评》第1号。在这个四页的小册中写道:“假若资本社会化了,劳动者将受益无穷;然而,要是资本掌握在一小撮人的手中,贫困就必然会多数人的命运。”^②又说:“你们这些享受着舒适而考究生活的人,你们的安逸和奢侈是以他人的苦难和贫困为代价的!你们的骄奢淫逸是产生贫困的根源。”^③在1885年出版的《费边短评》第3号中,费边社“首次公开宣布:它是社会主义的团体”^④。到1886年初,费边社成员发展到了四十余人。在同年的9月,费边社在无政府主义还是议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作出了抉择,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为了达到使整个社会全面地控制土地和生产资料以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这一目的,社会主义者应把自己组织成一个政党。”^⑤1887年通过了《费边社纲领》,公布了《社会主义者须知》等重要文献;在这一年刊出的《费边短评》中,“首次阐述了这样的信念(这成了费边社纲领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即任何‘洞悉真相’的明智者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至少是能够接受关于目前讨论的任何问题的社会主义政策;而且,通过资本主义卫道士们口头所说的,或更正确地讲,通过他们所出版的材料,就可以充分说明资本主义是无效的、残暴的、荒诞的”^⑥。在这个篇幅不长的《短评》中,曾两次肯定了“渐进主义的原则——通过说服和传播知识来实现社会主义”^⑦。到1888年4月,当费边社社员发展到近百人时,该社选出了由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休伯特·布兰德(Hubert Bland)、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西德尼·奥利维尔(Sydney Olivier)、乔治·肖伯纳(George Bernata Shaw)、格雷厄姆·华莱士(Gra-

①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页。

②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③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④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页。

⑤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3页。

⑥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页。

⑦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页。

ham Wallas)和悉尼·詹姆斯·维伯(Sidney James Webb)等七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到那时,该组织认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把社会主义传播给明智的英国公众的时刻已经来临”,因此决定“在每两星期一次的社员大会上(这种会议允许客人参加)……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就社会主义的情况和意义作演讲”¹。于是,在1888年的秋冬两季,费边社的七位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各自就社会主义的有关问题作了系列演讲,系统地阐述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该执行委员会还决定将这系列演讲稿整理、汇编成书,并任命肖伯纳为编辑该书的主编。该书经肖伯纳编辑定稿后,定名为《费边社会主义论丛》,于1889年出版。²该书出版后,费边社会主义,才成为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这本《费边社会主义论丛》,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其中包括四篇论文,即由肖伯纳撰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维伯撰写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威廉·克拉克撰写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西德尼·奥利维尔撰写的《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第二部分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两篇论文,即由格雷厄姆·华莱士撰写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产》,安妮·贝赞特撰写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第三部分阐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中包括两篇论文,即由肖伯纳撰写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休伯特·布兰德撰写的《社会主义的远景》。该书第一次印刷的1000册,在一个月之内就销售一空,在一年之内又销售了重印、再版的2.5万册。于是社会主义成了热门话题。到1891年4月,费边社已有361名正式社员,此外,12个地方的费边社也有300多个成员。该社的社刊《费边短评》总印刷量达到3.5万册,几乎是前七年总数的5倍。这时,费边社的执行委员会,也由7人扩大到15人。到1893年4月,费边社的正式社员已达到500以上,此外,70多个地方费边社的成员也“绝不会少于二千”,这年,费边社的《年度报告》曾夸口说:“在这个王国里,几乎没有一个重要城镇不存在一个地方费边社”³。

19世纪90年代初,费边社正式社员的骤增和许多新的地方费边社组织的纷纷建立,形成了费边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兴旺时期”。玛格丽特·柯尔认为,这一兴旺时期的形成,“要直接归功于《费边论丛》,归功于该书所唤起的要求”⁴;也表明这些人对费边“社会主义越来越大的兴趣,显示了《费边

¹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页。

² 该书的中译本,定名为:《费边论丛》,由三联书店于1958年出版。

³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页。

⁴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页。

论丛》的影响”^①。其实,《费边论丛》和其他费边社文献中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得到资产阶级欢迎和赞助的费边牌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费边社“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②。他还认为,“费边社不过是自由党的一个分支”^③。

在19世纪90年代初,费边社会主义兴旺时期的形成,除了它适应当时英国的国情外,它还与当时费边社执行委员会的有效领导分不开的。玛格丽特·柯尔认为,那时的费边社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异常稳定”的、努力工作的领导集体,它们15名成员不管“多么一致,看上去平等”,而“主要的领导责任仍落在五六个领导人身上”^④。那时,执行委员会内的肖伯纳、韦伯、格雷厄姆·华莱士和西德尼·奥利维尔,被称为费边社的“四巨头”^⑤。休伯特·布兰德曾任那个时期该社的司库二十多年。而爱德华·皮斯(Edward Pease)则是该执行委员会领导班子中的“好秘书”,他被称为费边社“忠实的监护人和看门狗”^⑥。但“费边社执行委员会里,肖伯纳和韦伯是最突出的两个”^⑦。他们俩是费边社最著名的创始人和台柱,都博学多才;他们俩不仅在社内居于领导地位,而且向社外积极宣扬费边社会主义。

乔治·肖伯纳(1856-1950年)是英国大文豪。他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都柏林的威斯理学院肄业。1876年迁居伦敦,起初在一家电话公司当雇员,后即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发表过《未成熟》(1879年)、《一个不善交际的社会主义者》(1884年)、《不合理的婚姻》(1885-1887年)、《凯色尔·拜伦的职业》(1885-1886年)、《艺术家的爱情》(1887-1888年)等一系列小说。在这期间,他还为文学和音乐杂志当过艺术评论。1882年,他听了美国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演讲并读了他的《进步与贫困》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884年9月加入了刚成立的费边社,开始宣传费边社会主义。1885年1月,他被选

①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33页。

④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6-58页。

⑤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61页。

⑥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2页。

⑦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页。

为该社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885年至1911年,他一直是费边社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任该社劳工研究部主席多年;1896年,他还代表费边社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初,他曾采用政论形式宣传和倡导费边社会主义,曾主编过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论丛》(1889年),并撰写过《费边社宣言》(1884年)、《警告天佑的地主和资本家》(1885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1889年)、《向社会主义过渡》(1889年)、《无政府主义没有可能性》(1891年)、《费边社早期历史》(1892年)、《社会主义的幻想》(1896年)、《费边主义与帝国——费边社宣言》(1900年)、《富翁的社会主义》(1901年)、《费边主义与财政问题》(1904年)、《社会主义和超级头脑——答马罗克先生》(1909年)等论著。以后,他感到创作戏剧作品来宣传费边社会主义比撰写政论、经济论著更有效。他从1885年至1949年,共创作了51个剧本,其中大都从各个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他宣扬的虽然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起,他就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1921年,他曾将自己出版的剧本《回到马修斯拉时代》(该剧本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精神上的危机)寄给列宁,并附有这样的题词:“赠给列宁,在欧洲的国家活动家中只有他具备一个担任如此重要职位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才干、性格和知识。肖,1921年6月16日。”^[1]肖伯纳的剧作经常在那时的苏联剧院上演,1931年,他曾访问过苏联,并在那里庆祝他的75岁寿辰。1932年,他曾来中国访问,在上海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会面。1944年,他出版了《政治指南》一书,重申他缓进的改良主义观点,但他同时又指出,“苏联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榜样”^[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反对法西斯主义。1949年美国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领袖时,他发表文章谴责美国政府,声援美国共产党。1950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时,他公开表示反对,并谴责美帝国积原子弹威胁世界和平。尽管肖伯纳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但他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同情共产主义。

悉尼·詹姆斯·维伯(1859—1947年)是英国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曾在瑞士、德国受教育。他16岁离开学校,先短期从事商业,后在陆军部任职,并坚持自学,1885年,获伦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成为律师;同年,经肖伯纳介绍,加入费边社,成为该社的领导和理论家。1887年,他为费边社撰写了《社会主义者须知》的小册子,具有较大影响。1889年,他在《费边社会主义

[1] 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8页。

[2] 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8页。

论丛》中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一文,被认为是费边社的纲领性文献。1891年起,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讲师,1912—1927年间,任该校教授。1892年,他与比阿特里萨·波特尔(Beatrice Potter)女士因志同道合结为夫妻,人们尊称他俩为“维伯夫妇”。由于比阿特里萨·波特尔女士与悉尼·维伯结婚而改称比阿特里萨·维伯(Beatrice Webb, 1858—1943年)。她也是英国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她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未进学校,通过自学成为学者。她从1887年起参加社会活动,任伦敦工人和失业者生活调查委员会委员。她与悉尼·维伯初次相遇时,正在撰著《英国合作运动》一书,该书于1891年出版。同年,她经悉尼·维伯介绍加入费边社。1909年,她又加入皇家济贫委员会,并任该委员会委员。1918—1920年间,她在妇女地位委员会工作。维伯夫妇长期居住在伦敦格斯维诺路11号,该住宅“成为他俩产生一系列著作的工厂、精神活动的热闹场所和一种独特而严肃的社交中心”^①。他俩除了长期领导费边社工作外,还合作撰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主要有《工会运动史》(1894年)、《产业民主》(1897年),列宁曾翻译过此书的一卷,并校订了第二卷的俄文译本;该书的俄译本书名为《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美国职工运动的理论与实践》(1900—1901年)、《大不列颠社会主义联邦宪章》(1920年)、《论消费合作社》(1921年)、《英国地方政府》丛书9卷(1906—1929年)等。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宣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平解决工人问题的改良主义思想,但它包含有极丰富的工运史料。除了他俩的合著外,他们各自还撰写过许多著作。1891年,悉尼·维伯凭借当时费边社纲领当选为新伦敦州议会进步党代表。他在伦敦州议会中,大部分活动“在教育方面,被人们称作伦敦教育体系之父”^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悉尼·维伯等人转到了社会沙文主义阵营,列宁称他们为“无耻地背叛社会主义”^③。同年,悉尼·维伯任英国工党的战时紧急委员会委员,负责该委员会的对内政策指导,撰写了《劳动和新社会秩序》宣言。英国工党在1918年、1922年和1924年竞选中,就是以这一宣言为号召的。在1915—1925年间,悉尼·维伯代表费边社参加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918年他代表伦敦大学任议员,1922年代表西亚姆港当选为议员,1923年他又当选为工党主席,1924年,他任贸易大臣,1929—1931年,他任自治领和殖民地大

① 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9页。

② 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9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1页。

臣。俄国十月革命后,维伯夫妇对苏联寄予深切的同情。1932年,他们访问苏联后,撰写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1935年出版,在其后的十年内曾重版四次)。当时,他们面对着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而在苏联所看到的却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情景。他们认为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世界”¹⁾。

二、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观点

关于费边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费边社纲领》,以及由七位费边社执行委员所作的于1889年出版的《费边社会主义论丛》中。这里,仅概述以下几点:

(1)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个逐渐演化过程。悉尼·维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中写道:“英国社会的以往历史,在20世纪中,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所标示的各种理想的不可抗拒的动力。这一世纪英国社会历史的记载,是以一个几乎是完全的工业个人主义的试行和它的彻底的失效而展开的。……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制度里,持久的因素是很少的。所以,随着政治解放运动的发展,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已经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管理、限制和废除;……20世纪的经济史乃是一种几乎毫无间断的社会主义发展史。”²⁾在悉尼·维伯看来从一个旧社会到一个新社会,不过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他指出,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以来,“社会有机体不断成长与发展的必要性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了。哲学家们现在不再去寻求什么别的东西,他们所要求的乃是从旧制度逐渐进化到新制度,并且认为在这种进化过程当中,任何时候都无需破坏整个社会组织的连续性或者把整个社会组织突然地加以改变”³⁾。他还强调说:“我们在历史上还找不到乌托邦式的革命的突变例子。”⁴⁾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的“每一种行为都会促使他们所轻视的那种社会主义得以实现”⁵⁾。悉尼·维伯正是从他的这种历史进化论出发,提出了对社会进行渐进的、和平变革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民主主义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才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才能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二)渐进的

1) 参见《新帕尔格雷夫大经济学人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7页。

2)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1—82页。

3)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2—83页。

4)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3页。

5)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5页。

变革,因为只有如此,无论进步的速度多快,才不致引起脱节现象;(三)被人民大众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才不致在主观上对他们来说是败坏道德的;(四)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至少在英国应当如此。”^①由此看来,费边社会主义者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2)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厂立法、捐税制度和市政府企业“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威廉·克拉克在《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中,列举了英国从19世纪初以来陆续订立的“道德与健康条例”、“矿业条例”、“矿区管理条例”、“花边工业条例”、“烟囱清扫业和陶器业条例”、“商业和手工业工场管理条例”以及各种“工厂条例”后,指出,这些工厂立法“在事实上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它包括着集体对个人贪婪的防止以及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把资本的利润加以削减”^②。费边社会主义者还认为,向地租和利息征课捐钱就是社会主义。悉尼·维伯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中指出,通过政府的登记、检查和控制,财产所有者就“将被迫从他的租金与利息收入中,把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让渡出来用于公共事业”^③。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就在经济方面所涉及到的,就是把地租和利润利息“从现在窃据着它的那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全民手里”^④。他们还认为,地方公营共用的市政企业也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悉尼·维伯说,通过立法,“几乎每一种可以想得到的贸易,不论在什么地方,现在都由教区、市政当局、或中央政府本身来进行而用不着任何中间人或资本家的干预了”^⑤。在费边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没有“资本家的干预”的市政企业,如邮政、电话、电报、电车、自来水和煤气等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了。费边社会主义者之所以会把资本主义的工厂立法、捐税制度和市政企业,看成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他们把资产阶级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代表全体人民利益而所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

①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7页。

②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7页。

③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5页。

④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8页。

⑤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2页。

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¹

(3) 费边社会主义者在经济纲领上主张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市政社会主义”。费边社1887年通过的《费边社纲领》中写道:“费边社由社会主义者组成”,因此“它的目的是以下述方式对社会进行重新改造:使土地和工业资本从个人和阶级的所有制下解放出来,把它们转归公社所有,以谋公众的福利。只有通过这个方式,国家的各种自然的和获得的利益才能够公平地为全国人民所共享”。² 关于如何实现土地和资本的社会化问题,格雷厄姆·华莱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产》中解释说:“具有进步性的土地和资本的社会化,必须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那就是:通过对地租利息征税并由公家用这种税收所得到的资本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从而把土地和资本直接转归社会所有。土地和资本的社会化,是不能单纯用规定一系列限制它们用于私人剥削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³ 肖伯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又进一步解释说:“无偿的土地国有化这种呼声确乎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带有灾害性的暴动;……土地应当像情况所需要的那样,老老实实地加以购买;购买土地所需钱以及为这笔钱所付的利息,将要像资本一样是以向地租征税的办法取得的。”⁴ 具体说来,就是土地耕种者出钱(交租),由资产阶级国家(市政当局)以赎买的形式向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而土地所有者取得赎金将土地交给市政当局后,还可购买公债逐年取息。在费边社会主义者看来,通过“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理的不断加强,市区行政的发展,以及租税负担直接地向地租与利息的加速转移,在这三个方面都标志着政治家们不自觉地放弃了陈旧的个人主义,而且也标志着我们无可抗拒地要滑进集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⁵。这里所说的“市区行政的发展”,就是发展市政事业,实行地方自治,这就是费边社会主义者所谓的“市政社会主义”。悉尼·维伯在谈到他们所倡导的这种“市政社会主义”的作用和意义时说:“在任何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众多的社会里,广泛的职权不应该为过去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划归‘国家社会主义’而应该划归‘市区社会主义’;我们明白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各种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而实际上等于自治的地方管理机构所应该担负的重要作用。我们终于很清楚地理解到,这些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3页。

2 《费边社纲领》(1887年通过),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辑,第270页。

3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04页。

4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61—265页。

5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8页。

地方管理机构的多方面的作用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它替我们取消唯一的全国性的雇主（这种雇主其本质是不可避免地要官僚主义化的）的假设的专制，另一方面也把我们普遍的社会生活一律化的恶梦中解放出来。”^① 列宁认为，费边社会主义者宣扬“市场社会主义”的阴险目的，就是“企图使社会忽视全部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结构的根本问题，而去注意地方自治的细小问题。在前一种问题方面，阶级矛盾最为尖锐；……正是这一问题根本触及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基础。所以在这方面，局部实现社会主义的市侩反动空想尤其没有实现的希望。于是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地方性的小问题上，这些问题并不关系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这种统治的基本工具，而只是关系到怎样来利用豪富的资产阶级丢下来供‘人民需要’的残羹冷炙。”^②

和上述“市政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相适应，费边社会主义者还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鼓吹“议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他们认为通过议会选举、采用民主方法就可实现社会主义。肖伯纳说，我们采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就是用它来表示我们“企图通过民主”来建立一个“把所有的人民都包括在内的政府”^③。他们甚至把当选议员、并争取多数看作是当务之急。安尼·贝赞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中说：“现在，社会主义者的命令就是：‘改变选举人的信仰，并且夺取州议会’。”^④ 在他们看来，夺取了州议会，就等于瓦解了全国性的国家政权。他们迷恋议会选举，就是要放弃暴力革命。关于这一点，肖伯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曾明确写道：“社会主义者无需为他们首先建议（如他们做过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和普遍起义而感到羞愧。这个建议被证明了是行不通的；而且它已经被英国社会主义者们所放弃了”^⑤。由此可见，费边社会主义者鼓吹“议会主义”，在地方自治等细小问题上兜圈子，其根本要害，就是“害怕革命”，恩格斯认为这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⑥。列宁指出，费边社会主义“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⑦。

上述体现在《费边社纲领》（1887年通过）和《费边社会主义论丛》（1889

①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5-336页。

③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2页。

④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0页。

⑤ 肖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7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

⑦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7页。

年出版)中的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是费边社的前期思想,这也是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费边社会主义论丛》出版后的几十年间,费边社会主义虽有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然而,它与其前期思想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不是为了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们所追求的都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但费边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却对英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第十四章 第二国际各派理论家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演化

一、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前期活动

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遭到各国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但各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进行着艰苦的积聚力量工作,并向反动统治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经过约十年艰苦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国际工人运动又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到80年代后期,建立新的国际已成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共同要求。188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圣加伦代表大会通过最近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与此同时,法国工人党也提出了国际联合的要求。正当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筹建新的国际组织时,以法国的马隆(B. Malon, 1841—1893年)、布鲁斯(P. Brousse, 1844—1912年)为首的可能派机会主义者,纠集了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美国的劳动骑士团等机会主义组织,利用各国工人要求增强国际团结的愿望,妄图抢先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国际组织。鉴于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有被可能派篡夺的危险,当时年已68岁高龄的恩格斯,立即“像一个青年人一样投入战斗”^①。在恩格斯的大力推动和帮助下,1889年2月,各国工人党代表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在荷兰海牙召开了一次筹建新国际的会议。会议决定在同年7月即可能派开会的同时,在巴黎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成立革命派的国际组织。

在海牙会议前后,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大会能够战胜、压倒机会主义者的会议,恩格斯进行了紧张、热烈的活动,无情地揭露了可能派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反动实质,他还给各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倍倍尔、拉法格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教导他们认清可能派等机会主义者的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0页。

真面目,要他们不要放弃原则,一定要把大会开好。恩格斯还向他们阐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问题使人们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可能派等机会主义者,“他们是一伙企图使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他们个人目的的阴谋家和骗子;另一边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¹。恩格斯认为,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他指出,这场斗争实际上是第一国际内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的继续,“对手还是过去那个,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换成了可能派的旗帜;同样是向资产阶级出卖原则,以换取小小的让步,主要是为几个领导人谋取一些肥缺(市参议员、劳动介绍所的领导人员等等);而策略也还是过去那一套”²。恩格斯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以及有关的教导和指示,是这次代表大会能够成功地召开,第二国际得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胜利建立的重要保证。

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人民攻占巴士的狱100周年纪念日那天,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如期在巴黎开幕。参加大会的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以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工人组织都有代表参加。恩格斯因忙于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未能出席大会。大会由德国工运著名活动家李卜克西、倍倍尔和法国工运著名活动家瓦扬(E. Vaillant, 1840—1915年)、拉法格等人主持。国际上知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如德国的蔡特金(C. Zetkin, 1857—1933年)、法国的盖得(J. Guesde, 1845—1922年)、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都出席了大会。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Eleanor 1855—1898年)也出席了大会。会场上悬挂着马克思像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巨大横幅标语。大会讨论了国际劳动立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任务、取消常备军和实现全民武装以及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问题。大会上,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就上述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基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这次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虽没有制定正式的纲领章程和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但它决定今后国际社会主义者将定期召开代表大会,这就在实际上恢复了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联系和合作,宣告了第二国际的建立。

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开幕的第二天,即7月15日,法国可能派和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等机会主义组织也在巴黎召开了代表大会,不过,他们的会议则完全被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革命声势所压倒。这两个大会都提过合并的建议,但因分歧无法弥合,而未能实现。这也是马克思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2页。

主义对机会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恩格斯指出：“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取领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得更惨。”^①可是，在第二国际内的成分，仍很复杂，一方面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拒绝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否定一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鼓吹冒险主义策略的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领导者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时，错误地夸大了议会斗争的作用，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而且，他们自身的右倾思想，也在日益滋长，以致右倾机会主义成了那时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因此，恩格斯在指导第二国际的活动和斗争中，在坚持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同时，更着重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针对当时德国党内以福尔马尔(G. H. Vollmar, 1850—1922年)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獗，以及第二国际领导人中的严重右倾思想。恩格斯于1891年连续向右倾机会主义者投出了三颗“炸弹”。

恩格斯向右倾机会主义者投出的第一颗“炸弹”，就是于1891年1月冲破了党的领导者的阻力与抵抗，坚持公开发表了马克思于15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使全党了解马克思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实质和意义，以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

恩格斯向右倾机会主义者投出的第二颗“炸弹”，就是在1891年3月，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出版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恩格斯在他撰写的《导言》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以及《法兰西内战》发表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痛斥了那些反对暴力革命、鼓吹通过和平的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议会迷”们。他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②因此，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在自己政党的领导下，用革命手段“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③。恩格斯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时，写道：“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④

恩格斯向右倾机会主义者投出的第三颗“炸弹”，就是他在1891年6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9页。

所撰写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他在这一名著中,痛击了“那种和和乎乎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①。恩格斯在揭露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实质和危害性时,写道:“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②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③

恩格斯连续投出的这三颗“炸弹”,有力地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气焰,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此外,在1895年3月,恩格斯还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了一篇著名的《导言》。这是恩格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章。该文回顾和总结了1848年以来工人阶级斗争的历程与经验,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为无产阶级制定了新形势下斗争策略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工人阶级要善于利用合法斗争手段,以争取群众,积聚力量,但决不应放弃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为了将来举行武装起义,进行最后决战,现在就必须进行充分准备,“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并且“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④。

第二国际自1889年7月在巴黎举行了成立大会后,在1889年7月至1896年7月的前期活动中,先后曾开过三次代表大会,即1891年8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93年8月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896年7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对第二国际的活动十分关怀,他曾亲自参加了在苏黎世召开的那次代表大会。当时,已72岁高龄的恩格斯,在大会上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过去了。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些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⑤在演讲结束时,他高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9—180页。

“国际无产阶级万岁!”¹

在恩格斯的关怀和指导下,第二国际初期的活动,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但不幸的是1895年8月5日,癌症夺走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生命。这是继1883年3月14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后,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巨大损失。列宁在悼念恩格斯逝世的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²。恩格斯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³。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⁴。

二、第二国际后期的演化及其破产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到来,需要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作出解释和回答。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个想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解释和回答的,是当时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之一的伯恩斯坦。不过,他不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这种种问题以科学的解释,而是作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结论。他在1896年10月至1898年6月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副标题为《一个人的观点和传统观点》),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公开宣称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伯恩斯坦的这一系列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98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后,伯恩斯坦为了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又写成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于1899年2月出版。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列宁指出,该书“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⁵。“伯恩斯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页。

⑤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

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¹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在他的著作中以“最完整的形式”出现后,博得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喝彩,引起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共鸣,他们都以伯恩斯坦为“中心”、为“靠山”,特别是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的米勒兰(A. E. Millerand, 1859—1943年),1899年6月加入法国共和党资产阶级内阁事件后。于是,各国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²。从这时起,修正主义变成一种国际思潮,伯恩斯坦主义就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思潮的代表。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当时就激起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在德国党内,坚决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是以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和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年)为代表的革命左派。在法国是以拉法格、盖得为代表的革命左派。此外,在保加利亚、奥地利以及意大利、荷兰等国的革命左派,也都积极参加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1900年9月,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是米勒兰入阁事件。因为这一事件,不仅是米勒兰个人是否应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它涉及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这次大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第一次直接交锋的国际会议。在交锋中,形成了左、中、右三派。

以伯恩斯坦和法国独立社会党人让·饶勒斯(Jean Jaurès, 1859—1914年)等人为代表的右派,竭力为米勒兰辩护。他们把米勒兰入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他们被称为“入阁派”。他们甚至把入阁说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列宁深刻地揭露他们狼狈为奸的实质:“米勒兰作出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斯坦和福尔马尔都来极力为米勒兰辩护,并且对他大加赞赏了!”³

以卢森堡、盖得等人为代表的左派,严厉抨击了米勒兰的叛变行为,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因此,他们被称为“反入阁派”。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会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其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注(1)。

3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6页。

结果只能使党的队伍腐化和混乱。他们在盖得—费利决议草案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这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要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①

当时持中派立场的考茨基，则以维护国际的统一为名，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手法，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决议草案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在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末，这是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对此发表意见。”^②结果，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提出的那个折中决议草案。这样，巴黎代表大会以隐蔽的方式认可了米勒兰的内阁。

这次代表大会，还决定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1905年后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作为第二国际的常设机构，地址设在布鲁塞尔，由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者艾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rvelde，1866—1938年）任执行局主席。

上述情况表明，在这次巴黎代表大会上，右派和中派占了上风。从此，第二国际进入一个由机会主义者盘踞、开始蜕化变质的时期。

1904年8月，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左派虽然进行了激烈的反对修正主义右派的斗争，但由于中派头子考茨基继续施展调和主义的手法，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操纵下，通过了要各国建立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错误决议。为了贯彻这个决议，盖得派向机会主义派投降，于1905年，法国的两个社会党实行合并。这次大会，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问题上，还通过了改良主义性质的决议。这都反映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势力的滋长、猖獗，表明第二国际沿着蜕化的斜坡继续滑下去。这也表明，第二国际左派已抵挡不住业已猖獗起来的修正主义思潮这股逆流了。粉碎修正主义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肩上。

面临着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疯狂进行扩军备战之际，于1907年8月，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反对军国主义问题。列宁作为俄国党的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出席国际大会。这时第二国际的领导权，虽被中派和右派所篡夺，但在这次大会上，列宁高举

① 引自刘普昌等《世界史》（近代史下），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② 引自刘普昌等《世界史》（近代史下），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团结了各国左派,运用正确的策略,挫败了修正主义者,使大会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决议。列宁指出:“总的说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1]这次大会也表明,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左派正在迅速成长。

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后,列宁为了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如1908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他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9年又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在这些论著中,他深刻地论述了修正主义的实质以及反修斗争的意义,他满怀信心地宣告: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2]。

1910年8月,列宁又出席了第二国际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尽管“中派和右派仍占优势,但列宁进一步团结了左派,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仍通过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决议,重申了反军国主义决议的主要论点。这次大会,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决裂的不可避免。列宁指出:“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标志着工人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可以说,它主要是向广处发展着,并且开始把无产阶级合作社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已显露出来,但是离修正主义提出独立的纲领的日子还远。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拖下去了,但是这个斗争将来是不可避免的。”^[3]

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和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形势下,于1912年11月,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这是第二国际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专门讨论反对军国主义和防止战争威胁问题。由于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情绪十分高涨,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不敢在会上公开阻挠,因而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的宣言,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这篇宣言,谴责和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和正在酝酿着的战争的侵略实质。列宁认为,这篇宣言“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4]。

[1]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5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3]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2页。

[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5页。

1914年秋,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酝酿已久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大战的炮声一响,各交战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头目就“完全背叛自己的信念,背叛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决议中所作的最庄严的声明”^①,公开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指出,“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②。当然,“国际的破产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③。

第二国际,于1923年改组为工党和社会党国际,于1940年解散。第二国际主要活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它需要解释和回答新时代所提出的种种课题,来教育、训练、组织阶级队伍,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论战中,推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在其活动过程中,造就了一大批理论家,其中有些曾犯过错误甚至严重错误。

关于第二国际各派理论家的经济思想,这里,仅就右派伯恩斯坦、中派考茨基和希法亭、左派拉法格和卢森堡的经济思想观点,在以下各节中,分别作一概述。

第二节 伯恩斯坦的经济思想

一、伯恩斯坦的生平和著作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nstein, 1850—1932年)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演变成修正主义的鼻祖。他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新教徒。少年时代的思想,深受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柏林《人民报》创刊人——其伯父阿伦·伯恩斯坦(Aaron Benstein, 1812—1884年)的影响。由于家境贫寒,未读完中学,就于1866年在柏林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三年后成为银行职员,一直干到1878年。这12年的“商人生涯,塑造了伯恩斯坦处世精明的商人气质和作风。他在任银行职员期间,曾受到德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有了一些自由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开始阅读马克思、拉萨尔和杜林(E. K. Dühring, 1833—1921年)的一些著作。1872年,伯恩斯坦作为一名杜林主义者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

1878年10月,伯恩斯坦辞去银行职务,经老友、股票经纪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施拉姆(K. A. Schramm, 1849—1914年)介绍,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曾创办和资助许多具有改良主义倾向报刊的赫希柏格(K. Hochberg, 1853—1885年)的私人秘书。同月,德国俾斯麦反动政府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整个德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于是他们三人分别迁居瑞士苏黎世,从此伯恩斯坦开始长达20余年的流亡生活。第二年,即187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由他们三人组成委员会在苏黎世编辑出版党刊《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年8月,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斯坦三人化名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宣称放弃暴力革命,“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并把工人党变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党。这就是被称为“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这篇文章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这对伯恩斯坦的思想,有很大触动,使他对参与宣扬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从此,他开始疏远赫希柏格而向倍倍尔靠拢。1880年12月,伯恩斯坦跟随倍倍尔去伦敦拜见马克思、恩格斯,受到了更深刻的教育,承认了自己所犯的右倾错误,从而赢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任。

1881年1月,经倍倍尔推荐,伯恩斯坦被任命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临时主编,在这年的秋天,正式出任主编。直到1890年该报停刊。在这10年间,在恩格斯的关怀、帮助、指导下,伯恩斯坦为办好这份党的机关报,为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贯彻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支持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革命派同党内错误作斗争等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揭露俾斯麦反动政府的“两手政策”、在批判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撰写并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分析力、说服力的文章,如《国家援助吗?》(1881年1月9日)、《国家社会主义和阶级国家》(1881年10月6日)、《皇帝的咨文和社会民主党的答复》(1881年10月24日)、《曼彻斯特主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改革》(1881年12月1日)、《关于“社会王国”的童话》(1883年)、《社会主义和国家》(1883年)、《由国家贷款的生产合作社》(1884年)等。伯恩斯坦的这系列文章,有些得到了恩格斯的好评。恩格斯曾认为,伯恩斯坦“和那种粘在

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倒是真珠子”¹¹。伯恩斯坦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的这10年间,显露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的才能,从而使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乃至在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好名声”¹²;并“赢得了‘党的理论家’的称号,成为恩格斯生前指定的遗嘱的执行人之一”¹³。当然不是说,伯恩斯坦在这10年期间没有错误,特别是在这10年的最后两年,他的思想已开始发生变化。

1888年5月,伯恩斯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被迫由苏黎世迁往伦敦,从那时起,直到1901年,常年侨居在伦敦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丽的资本主义都市里,他通过耳濡目染,开始对英国的经济繁荣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日益发生兴趣;同时,他还受到那时正在盛行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1890年,他故乡德国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被议会否决,俾斯麦首相被迫下台,允许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活动,紧接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又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于是,一向惯于捉摸时局变化的伯恩斯坦,憧憬着德国未来民主制的实现;并由此,他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发生“怀疑”,开始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例如,1890年4月,他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一文中说:“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¹⁴;1892年2月,他在《卜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中又提出,英国呈现出“一幅得到长期保证的社会和平状态的景象”,“社会革命不依赖于暴力的袭击和流血的叛乱”¹⁵;同年7月,他在《自我广告》一文中认为,党没有“必须遵守的教条”,“理论即使在一定的时刻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承认,仍旧要不断地受到批判,受到自由的讨论”¹⁶。伯恩斯坦90年代初的思想转变虽未完全显露出来,但恩格斯在世时,已敏锐地觉察到了他的一些变化,并恰如其分地说他“越来越像他那个在《人民报》的绝顶聪明的伯父”¹⁷。

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潜伏在伯恩斯坦思想深处的机会主义、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5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③ 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3页。

④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6页。

⑤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0—11页。

⑥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2—1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0页。

正主义观点,就公开暴露出来了。从1896年10月起,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折衷主义》、《英国农业的发展》、《空间和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区域理论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德国工业发展状况》和《社会主义中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等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进行公开“批判”。1899年2月,伯恩斯坦又出版了他全面、系统“修正”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该书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最完整的形式”伯恩斯坦自己也承认,这本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的理论和政治倾向的说明”^①。这样,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10年左右,伯恩斯坦又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演化成为修正主义的鼻祖。后来他在自传中说:“人们谈到我时,不是把我当作一般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当作‘大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确,我所提倡的是修正。”^②

1901年,伯恩斯坦结束22年的侨居国外的生活,回到了德国。返回故乡后的伯恩斯坦十分活跃,发表演讲,著书立说,兜售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1902—1909年,他以演讲稿形式发表了《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可能的?》、《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和《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等小册子,系统宣扬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1904年,他出版了《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一书,宣称要“复活”拉萨尔“留给工人阶级的丰富的精神遗产”^③。1905,在《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再一次宣扬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的许多修正主义观点。1901年9月、1903年9月和1904年8月,伯恩斯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吕柏克代表大会上、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和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辩解,为米勒兰的叛变进行辩护。从1902年至1906年,伯恩斯坦连续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从1912年又连续到1918年,成为一名“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后,他在议会中赞成军事拨款,公开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德国11月革命后,伯恩斯坦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任国家金库(相当于现今的国家财政部)助理,成为政府的核心成员。1920年,伯恩斯坦又当选为德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届议会议员,并连任至1928年。

— — —

①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43页。

② 引自高放《社会主义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页。

③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09页。

1921年春,伯恩斯坦受政府委派,在柏林大学开设“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讲座,并编成《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于1922年出版。同年,又出版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哥里茨纲领》一书,宣扬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21年哥里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修正主义新纲领。1924年,出版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同年,又出版了他的自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叙述了伯恩斯坦从幼年时代到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发展过程。

伯恩斯坦的晚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于1932年12月8日,在柏林逝世。

二、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面“修正”

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和其他有关论著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全面“修正”。这里,择要概述以下几点:

(一)“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概括说来,就是马克思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并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他在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和哲学得到一个“总的结果”,即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一经得到这个“总的结果”,就把它进一步“用于指导”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①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创作了《资本论》这部“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③。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修正”,就是从“修正”马克思的这个科学方法论原理开始的。

在伯恩斯坦看来,用辩证法来思考,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就会产生“任意构想的危险”^④。于是他进而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最致命之点”^⑤，“马克思学说中的贩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④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97页。

⑤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99页。

⑥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03页。

伯恩斯坦认为,“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¹,他把“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看成是一种“独断的措辞”²,是“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³。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词”,“一开始就附有一般同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连在一起的一切误解”⁴。由此,伯恩斯坦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应该叫“经济史观。”⁵

伯恩斯坦之所以篡改“修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科学方法论原理,就是要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不过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中的一个,它必然要被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伯恩斯坦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必然性”的论证,认为是“宿命论”⁶。

(二)“修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伯恩斯坦因袭了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调子,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为前提的,如要“把个别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抽象掉”,要“把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别抽象掉”,要“涉及价值的转化为市场价值或价格时”的背离现象“抽象掉”,此外,还要“把高级的或复杂的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或抽象的劳动”,“这样一来”,伯恩斯坦就认为,“价值就失去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⁷。这里,伯恩斯坦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歪曲成“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这完全是有意的歪曲。其实,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研究,完全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的,他只是借助科学的抽象思维,通过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只不过把不同的劳动化为无差别的、同样的、简单的劳动,简言之,即化为质上相同因而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这种简化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人都在进行的抽象”,因此,这决不是“不现实的抽象”⁸。列宁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

¹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81页。

²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82-83页。

³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83页。

⁴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91页。

⁵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91页。

⁶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83页。

⁷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13-114页。

⁸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19页。

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¹⁾

伯恩斯坦在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就进一步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修正”,妄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他写道:“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²⁾在伯恩斯坦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马克思用来揭示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一把钥匙”,但不幸的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³⁾,而由此引出的最大的、致命的“错误”,就是用劳动价值作为“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⁴⁾他断言:“即使作为整体的社会出发并且把劳动工资总和同其他收入的总和对比,那时剩余价值率作为这一尺度也是错误的。”⁵⁾伯恩斯坦歪曲和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否认用剩余价值率来说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其目的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他曾不加掩饰地说:“仅仅根据雇佣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和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的”⁶⁾。这是伯恩斯坦公然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明证。大家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⁷⁾，“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⁸⁾。这个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恩格斯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并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⁹⁾

1)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1页。

2)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14页。

3)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21—122页。

4)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22页。

5)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22页。

6)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2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2页。

(三) 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经济危机理论。伯恩斯坦在阐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时,完全撇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内在趋势,空泛地谈论“剩余产品”的“吸收”问题。他写道:“现代生产方式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它的后果是同样巨大的生产提高——使用品的大量生产。这一财富留在哪里?或者……可以这样说:工业的雇佣工人超出他们自己的以工资为限的消费以外所生产的剩余产品留在哪里?‘资本家巨头’哪怕有着比民间笑话说他们具有的还大十倍的肚子,并且有着比他们实际所有的还多十倍的仆人,但是同每年的国民生产产品的量比起来……他们的消费仍旧像是天平上的一根羽毛。”¹ 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斯坦认为,被“资本家巨头”消费后所留下来的大量“剩余产品”,要么产生“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要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流入无产阶级手中”。² 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同从前比起来远没简单化,不如说它无论就收入水平还是就职业活动来说,都高度地分级和分化了”³。这样一来,伯恩斯坦就完全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着:资本占有阶级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生产阶级的贫困和劳动折磨的积累,从而也就根本否定和背叛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理论。

在伯恩斯坦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交通、通讯的改进和世界市场的扩大,随着现代信用制度和卡特尔等垄断组织兴起等“新情况”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就“不可能发生”了。他写道:“世界市场的巨大的地域扩展同消息传递和运输交通所需时间的异常缩短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抵消各种扰乱的可能性如此增加,欧洲工业国家的大为增加的财富同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工业卡特尔的兴起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地方性或局部性扰乱对于一般营业情况的反作用力如此减少,以致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可以把像从前那种类型的普遍营业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⁴ “地区的和部分的景气是不可避免的,而普遍的停滞……并不是不可避免的。”⁵ 其实,伯恩斯坦所说的这些“新情况”,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

1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26—127页。

2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27页。

3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26页。

4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37页。

5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30页。

根源。这里,他所说的交通、通讯的改进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虽可加速资本周转,促进生产扩大,暂时缓和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矛盾,但也会造成市场虚假繁荣,加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且,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就会扩及更广的领域,破坏性也就会更大。关于信用制度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①至于说卡特尔等垄断组织能够调节生产和消灭危机更是毫无根据,正如列宁所说:“所谓用卡特尔消灭危机,这完全是拚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其实恰巧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紧张,更加剧烈。”^②总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列宁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③。

(四)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把社会的发展,看作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新情况”的出现,只要从事一点一滴的改良,就可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对势力的一切抽搦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④他还强调说:“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0页。

③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页。

④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90页。

遍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①伯恩斯坦的这种谬论,不仅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而且实践上也已被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粉碎。

(五)否定“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伯恩斯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公式。他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②伯恩斯坦否定“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背叛。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的这个修正主义公式时,写道:“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③

我们从上述五个方面,简要地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面“修正”,但也应看到,在伯恩斯坦的论著中,也有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例如,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着“更为巨大的扩展和改进的魔力”,其“发展延续得更为长久”,“这一经济形态现在就完全不可避免地会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来”。^④这说明,伯恩斯坦已“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会马上灭亡”^⑤。伯恩斯坦的这些看法,是可供我们借鉴的。

①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78-79页。

②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40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④ 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5页。

⑤ 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5页。

第三节 考茨基的经济思想

一、考茨基的生平和著作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演变成机会主义者。他生于布拉格(当时属奥匈帝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祖父和父亲都是画家,他9岁随父母迁居维也纳,在多瑙河畔的梅尔克中学毕业。他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

考茨基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为其前马克思主义时期;从80年代初至1910年以前(有些人把这个时期延长到1914年以前)为其马克思主义时期;^①从1910年至1938年他去世,是他背离马克思主义演变成机会主义的时期。这样的划分仅是大体上相对而言的,即使在其活动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他也没有摆脱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庸俗解释和错误;同时,在其活动的后期,在他堕落成无产阶级的叛徒时,“他的某些理论方面的著作仍含有积极的内容,具有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价值”^②。

1874-1879年,考茨基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开始研究历史、经济学和法学。

考茨基在中学学习时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政策不满。巴黎公社起义,激起了他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与同情。1874-1879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注意研究历史、经济学和法学,开始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那时,他感兴趣的是路易·勃朗、拉萨尔和约翰·穆勒等人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和不信任的态度”^③。1875

① 列宁在谈到考茨基活动的第二个时期的断限时,指出,考茨基在1910年前“是机会主义的敌人,只在1910-1911年才转向维护机会主义,而完全彻底的转变只是1914-1916年”,转引自《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85页。

③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页。

年1月,考茨基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开始为该党的机关刊物《平等报》,以及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与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撰稿,并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建立了联系。1877年,考茨基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在加入社会民主党后的几年里,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较模糊,并且是建立在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直到他于1883年出版的《动物界的社会本能》一书中,仍是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的。

1880年1月,考茨基应卡尔·赫希柏格之邀,从维也纳迁居苏黎世,任赫希柏格的学术助手及《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和《政治经济论丛》的固定撰稿人。在苏黎世,考茨基接触了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阅读和研究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开始从事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1881年3月,考茨基通过倍倍尔在伦敦首次会见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次会见,他给马克思、恩格斯的印象虽然不算好,但这毕竟是他与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直接接触的开始。从此,他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育、帮助、影响下,开始信仰、并站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同年7月他回到了苏黎世,从此,他一直同恩格斯经常有书信往来。1883年1月,考茨基在斯图加特创办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新时代》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的一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杂志。考茨基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一直到1917年,共达35年之久。

1885年11月,《新时代》编辑部由斯图加特迁到了伦敦,从而考茨基有幸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工作、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教导和帮助使他“忘掉”在大学学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①。在1885年至1910年前的20多年间,考茨基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主义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虽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写成的,恩格斯称这些著作以唯物史观作为“引线”得到“恰当的应用”来说,是“一些不坏的作品”^②。列宁称这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③。许多国家的革命者曾把这些著作当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这些著作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6年)、《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8年)、《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1889年)、《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年)、《土地问题》(1899年)、《社会革命》(1902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0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3页。

年)、《伦理和唯物史观》(1908年)、《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等。在此期间,考茨基还受恩格斯和马克思女儿劳拉与爱琳娜的委托,花了十多年的艰辛劳作,整理、编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遗稿,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名称分三卷于1905—1910年出版。从而为完善和传播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1896年10月至1898年6月间,伯恩斯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文章时,《新时代》编辑部竟未加任何评论,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伯恩斯坦这组文章所宣扬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最初批判时,考茨基又没有及时站出来表态,表现出少有的“沉默”,这表明考茨基立场“很大的动摇”^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默”和“动摇”后,在广大党员的压力下,当考茨基看到了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系统阐述的修正主义观点时,才意识到伯恩斯坦在全面攻击、“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于是,考茨基才改变“沉默”、“动摇”的态度,而转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投入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1899年3—4月,考茨基开始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伯恩斯坦的理论观点。同年9月,考茨基又在这些批判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系统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观点的专著——《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考茨基的这本书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曾得到倍倍尔等人的好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还说过:“考茨基之所以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外,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斯坦进行了论战。”^②

在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围绕着米勒兰事件的争论中,考茨基持中派立场。其后,随着战争和革命形势的临近,考茨基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批判改良主义上,而是用在反对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斗争上,逐渐表现出他害怕人民群众革命行动的情绪,并愈来愈暴露出他向修正主义的蜕变。1910年,考茨基同鲍威尔(O. Bauer, 1882—1938年)、希法亭等人组成了第二国际中隐蔽的“中派”集团,成了中派思想家。列宁指出:“‘中派’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1871—1914年的阶段转到新阶段的过渡现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级许多特别需要的宝贵的艺术,即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的艺术;自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辟了社会革命的纪元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是必然的。”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们公开背叛革命,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拨款,拥护“保卫祖国”的口号以欺骗人民去当炮灰。而作为“中派”领袖的考茨基,则拒不支持党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左派,而采用对表决军事拨款弃权的办法,暗中帮助右派,他还连续发表了《战争的影响》(1914年9月)、《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10月)等文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们的沙文主义行为辩解。正如列宁所说:“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已经滚进机会主义泥潭,并以特别虚伪、庸俗和高傲的诡辩来为机会主义辩护。”²随后,考茨基又相继出版了《帝国主义》(1914年9月)、《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年4月)、《再论我们的幻想》(1915年5月)、《俾斯麦和帝国主义》(1915年12月)以及《帝国主义战争》(1917年2月)等著作,公开歪曲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侵略本性,鼓吹“超帝国主义”论,以麻痹各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这样,考茨基就成了“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³。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先后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年)、《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930年)等小册子,鼓吹“纯粹民主”,肆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诽谤苏维埃制度。1918年,考茨基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中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社会化委员会主任等反动官职。对此,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中,严厉地痛斥了考茨基的叛变行径。1927—1929年,考茨基还出版了一部两卷集的《唯物史观》,用进化论来替代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其机会主义叛变行径作论证。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考茨基从德国迁居维也纳。1938年德军侵占奥地利时,他逃到捷克,后又逃亡荷兰。同年10月17日,考茨基在穷困潦倒中病死于阿姆斯特丹。关于考茨基的经济思想,仅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概述。

¹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页。

²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

³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二、考茨基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通俗宣传

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后,迫切需
要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思想迅速让工人了解和掌握,早在1868
年,恩格斯就曾向马克思建议,由他本人写一本《资本论》的简述本,但一直
未能实现,马克思逝世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通俗阐释《资本论》的这一
任务,就显得更为迫切。在当时的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虽出版过一些《资
本论》的简述本,但都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和错误,即使是法国社会党人杰
维尔(G. Deville, 1854—1940年)所写的那本“至今出版的简述中是最好的”¹⁾,也
“不顶用,因为叙述部分有严重缺陷”²⁾，“理论部分也存在许多不太
准确之处”³⁾。因此,恩格斯建议由考茨基来担当这一任务。于是,考茨基在
1886年写成了一部在通俗阐释《资本论》的著作中享有盛名的《马克思的经
济学说》,于1887年在斯图加特出版。据考茨基说,该书的手稿曾经过恩格
斯的审阅。

考茨基的这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
一卷的内容,比较忠实地保持了原著的基本思想,这首先表现在该书的结构
上。该书将《资本论》第一卷七篇二十五章,简缩为三篇二十章。它的第一篇
“商品、货币和资本”,相当于原著的第一、二篇;它的第二篇“剩余价值”,相
当于原著的第三、四篇;它的第三篇“工资和利润”,相当于原著的第五、六、
七篇,两相比较,除个别章节有所调整、变化外,《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绝大部
分章节,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都得到保留,在顺序安排上也无大的变
化。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确实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简述本。从内容
的表述上看,《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也比较忠实地体现了原著的精神。马克思
的许多深刻思想,考茨基都是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
“甚至使用艺术形象,把文章写得很生动”⁴⁾。例如,考茨基在阐释马克思关
于商品生产以及商品价值的社会性质时指出,“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条
件下,由劳动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即
产品)之间的关系的形式”⁵⁾;这样,商品的自然形式就“加上了一种神秘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

4)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俄译”本出版说明,第2页。

5)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页。

属性”，好像“物神崇拜者在自己的物神上面硬要加上物神实际上所根本没有的特性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商品看成是一种具有超感觉特性的但又可以被感觉的物品。马克思‘把这叫做拜物教。只要劳动产品是当作商品来生产，它就必须会具有这种属性’”¹。因此，考茨基认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一节，是《资本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是每个阅读这本书的人必须特别注意的。但是，恰好是这些章节几乎没有引起马克思学说的反对者的注意，甚至往往也没有引起马克思学说的拥护者的注意。”²他提醒人们在阅读《资本论》时，特别是在阅读“最难理解的”该书第一卷第一章时，“首先不应该被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迷惑住，不应该把商品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当作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如果我们始终记住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生产，其中每一个经济单位虽然不是共同地从事生产，但它们是为一对方的需要进行生产，记住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掩盖在物质外壳下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记住所有这些事实，那么，我们就将知道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学术著作中的基本原理”³。

再如，考茨基在阐释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理论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里，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市场价格并不是围绕价值，而是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但生产价格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因此，考茨基写道：“离开价值规律，生产价格是无法解释的。”⁴他把以平均利润率为转移的生产价格，看作是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中间环节。

再如，考茨基把《资本论》第一卷中篇幅不长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节，看作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进行科学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性的一节，因此，他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把这一节作为一个专章来阐述，并且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末日”⁵。这一个醒目标题。

考茨基在此书中对马克思经济学说所作的这种种阐释，曾得到恩格斯的比较肯定的评价，认为这是对《资本论》第一卷基本思想所作的“独立叙述，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⁶。考茨基的这本书自1887年出版以来，到1930年曾再版过25次，并被译成18种文字，可见，它对马克思经

¹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10页。

²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页。

³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页。

⁴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7页。

⁵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94页。

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9页。

济学说的传播,曾起过多么大的作用。

三、考茨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发展趋势的分析

考茨基对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富有独创性的贡献”¹,这体现在他于1899年出版的《土地问题》一书中。该书被列宁称为“是继《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最新经济学著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杰作”²。考茨基自己说过,引起他对农业问题的兴趣,虽然早在80年代的后期就已发生,并在那时的刊物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但引起他系统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直接动因,却是为了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论战。那时伯恩斯坦以德国社会中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小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发生两极分化为借口,来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正确性,来否定资本主义灭亡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考茨基就是针对伯恩斯坦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而撰写《土地问题》这一专著的。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他撰著此书就是为了要以《资本论》为依据,来说明农业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似乎与马克思学说不相符合”的现象问题;他认为“这并不是学院式问题,而是急切的实际问题”³。他指出,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未全部完成,而且即使按照“他的工作计划”,“完成了他的全部著作”,也“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德国农村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即“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形态之作用”问题,因而马克思的著作也不能全部用来“解决在现时使我们发生兴趣的一切问题”⁴。尽管如此,《资本论》对我们研究德国现时的农业经济问题,仍然是一本“最可宝贵的,这不仅就它的结论而言,它的方法论也足以使我们在这一领域内顺利地继续这一已经开始的工作”⁵。

考茨基还针对伯恩斯坦等人随便从资产阶级的统计材料中摘取一些事实,来为其修正马克思主义作论证的错误方法时指出,要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就要把诸如“大生产与小生产间之关系、债务继承权、劳动者的缺乏、海外竞争之类都当作……单一与一般过程的局部

1 《新帕尔格雷夫大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3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页。

4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页。

5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页。

现象来观察”¹，只有系统地研究了“农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起的一切变化”²，才能“在全部混乱的事实中发现其间的联系，阐明隐藏在现象里面及决定现象性质的诸根本倾向”³。

依据上述方法，考茨基首先以宗法式的和封建的农业经济作为研究的起点，揭示它是如何演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的。他指出，中世纪的农村经济完全是或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它不仅生产自己消费的食料，而且自己建筑自己的住宅，自己制造家具及家用器具，自己做大部分自己的简单工具、鞣制皮革、加制亚麻及毛、自己缝自己的衣服等等。……在市场上他出卖的仅仅是他生产出的剩余产品，而购买的（除铁以外）仅仅是奢侈品，在这种情形下，他尽可能省吃俭用”⁴。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是不易破坏的”⁵，农民手工业“为城市工商业所排挤就是此种经济变革的第一步”⁶；而“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加速这一过程，使其到处对于农村人口之生活条件表示出决定的影响”⁷。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更加把自给的农民生产之不同部门转化为商品生产部门，加强农民对于货币的需要，用雇佣劳动来代替家庭劳动”⁸。这样，“城市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发展就已经能够使从前农民生存的基础发生完全的变革”⁹；从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侵入农村，甚至侵入农民的家庭并且破坏了利益之间的和谐及共同性”¹⁰。因此，当“资本一旦充分地加强起来，它便使农业屈服于自己”¹¹。考茨基认为，在现实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已占统治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存在于现代社会内的唯一的生产形态，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还可遇到保存到现代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另一方面，在国家或公社经济的某些形态与协同组合内，已经发现新的较高的生产方式的萌芽。资本家与雇佣无

1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页。

2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页。

3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页。

4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页。

5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页。

6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页。

7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页。

8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页。

9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页。

10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页。

11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页。

产阶级间的矛盾还不是现代的唯一矛盾。除这两个阶级以外及这两个阶级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阶级……他们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形态的产物，一部分是资本主义本身底需要所产生的，或最低限度是资本主义在其成长中所保留下来的”^[1]。在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前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在现代社会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认为，要“研究支配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就应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纯粹的形态中，在完全摆脱围绕它的其他生产形式的残余与萌芽的典型形态中去研究它，……如果以为资本家及无产者是现代社会活动中的唯一因素，而注意所有其他的阶级，那就会陷于极大的错误。”^[2]。

考茨基在阐述了欧洲农村经济的变革、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入农业使“农民生存的基础发生完全的变革”后，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他指出：“现代的农业企业要是没有货币，或者说，要是没有资本就无法经营，因为在现代生产方式下，每一笔款子，只要不是作为个人消费之用，就可以变为，而且往往会变为资本，变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3]因此，他认为：“现代农村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它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底一切特征，不过在农村经济内这些特征则具有特殊的形式。”^[4]为了说明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所具有的特殊形式，考茨基“对马克思关于利润和地租的学说作了简明通俗、然而非常确切、非常天才的叙述”^[5]，并表明“租佃制和抵押制只是马克思指出的农业企业主和土地占有者分离这一过程的两种不同形式”^[6]。他指出，在英国得到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租佃制，农户与土地的分离是“非常明显的”，而在欧洲大陆正在飞速发展的抵押制，这种分离则“不那样明显，也不那样简单，但本质是一回事”，因为土地的抵押，就是“地租的抵押或出卖”，因此，实际上“在抵押制下也同在租佃制下一样，地租的获得者（=土地占有者）是同企业利润的获得者（=农户、农村企业主）分离的”^[7]。在考茨基看来，以抵押借款增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土地与农户分离，无疑也是“整个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趋

[1]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页。

[2]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14页。

[3]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2页。

[4]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2页。

[5]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6]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7]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4页。

向”的一种^①。列宁认为,考茨基“完全”而“清楚地说明了抵押的真正意义,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土地与农户的分离是农业社会化的一个条件),以及它在农业资本主义演进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考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阐述,在理论上都有极大的价值”^②。

考茨基为了进一步说明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所具有的特殊形式,他还阐述了大生产和小生产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优越性。在他看来,大农业生产在以下几个方面,如同大工业生产一样,是远远优越于小农业生产的。第一,大农业生产“在节省劳动力及物资方面优于小的家庭经济,这个情况是不需要证明的”^③。第二,大的农业经营在“厩舍”、“谷仓”、“井”、“道路”、“篱笆”和“围墙”等等的建筑方面,可比小农经济更为节省^④。第三,大农业经营比小农节省土地和减少劳动耗费。他说:“地块愈小,则就其地面而言,界线亦愈长”^⑤;而“地块的界线越长,则在用于播种时,必然要撒落在田边的种子损失就越多,耕种土地时劳动底耗费也更多”^⑥。因此,“就同一的面积而言则地块愈小,耗费越大”^⑦。第四,大农业经营比小农节省劳动工具和有利于更合理地使用农业机械。他说:“有许多生产工具,尤其是机器,只能顺利地应用于大生产内”,小农“就不能适当地利用它们”^⑧。第五,大生产内可以更合理地使用和“节省畜力”^⑨。第六,大农经营比小农经营“更会大规模地利用分工的优点”,只有采取大经营才可能“充分推行那种专门化及使工具和器具适合各个机能,这就是现代的经营所以胜过前资本主义经营的地方”^⑩。第七,“体力和智力的分工”是实行大生产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优点”^⑪。他说:“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正是提供大生产以最丰富的科学和技术手段,这些手段使大生产有可能在受过专门教育的经济工作者帮助之下保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

③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7页。

④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7页。

⑤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7页。

⑥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8页。

⑦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8页。

⑧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9页。

⑨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2页。

⑩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2页。

⑪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3页。

证自己在各方面的优越。”^①第八,只有实行大农业生产,才能更充分地利用较大的“灌溉和排水设施”^②。第九,大农业经营在生产领域除了有上述“这些优点之外,在信用和商业领域内还有许多优点”^③,如“善于了解市场”^④、“获得货币”的方法“简便”^⑤,等等。

大农业经营比小农业具有上述种种优越性表明:在农业中,资本和生产集中规律也在发挥作用。不过,这一规律在农业中所起的作用,不像在工业中那样明显,农业中的小生产远较工业中的小生产“稳固”。考茨基认为,造成这种特点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小农经济的“稳固”,往往是由于小农的“过度劳动”^⑥和他“自己的极低的需要”^⑦。他指出,小农“拿什么来对抗”大农业“经营的优越性呢?那就是劳动者最大的勤劳和努力(他和雇农不同,他是为自己而劳作)以及小农业经营者之极低的需要(比雇农的需要还更低)”^⑧。在考茨基看来,“农民的努力奋发情况是比他们的勤劳和低度的需要好些。努力奋发在农业生产中一般讲来比在工业生产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无疑的,为自己而劳作的人比雇佣劳动者容易具有这种特征,即使不就一切大经营而言,就是单就资本主义的经营而言,努力奋发确是小经营的优点。但是我们不必要过分重视这一点。小生产反对大生产的另外一些斗争手段——过度劳动,营养不足以及愚昧都可使他的热忱减低。劳动者工作愈多,营养愈坏以及对自我的教育所耗费金钱及时间愈少则他的热忱亦愈小”^⑨。第二,在农业中资本和生产的集中要受到土地面积有限和土地私有制的限制。他说:“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是“不能任意增加”的^⑩;“私有财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土地的私有权”也就“牢不可破了”^⑪。考茨基认为,这是大农业经营的“一种极

①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2页。

②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6页。

③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6页。

④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7页。

⑤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1页。

⑥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2页。

⑦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5页。

⑧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2—133页。

⑨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0页。

⑩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5页。

⑪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6页。

其重要的障碍”¹。第三,在小的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购买小块土地进行大农业生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农民地产分散在各地”,“甚至要是小地产容易找到买主,就把它们分碎,把它们弄成更小的地产”²。这是小农业“向农业大生产(无论它怎样胜过小生产)发展的一个强有力障碍,是工业所碰不到的一种障碍”³。第四,农业经营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往往是同农业经营的土地面积的缩小相辅而行。考茨基说:“经营愈约,投入同等地面的资本愈多,则地产之最大限度的扩张——超过这个限度,他的收入就会减少亦愈小。”⁴他认为,“这个规律在相同的方向内也发生作用”⁵。第五,资本主义大农业经营并不是绝对的排斥小农业经营,这二者又有一定的“互补性”。他指出,“在近代社会中大地产要消灭小地产或完全排挤小地产是谈不到的”。因为“这里小经营从生产品底出卖者变为大经营‘生产得过多’的生产品底买者;小经营自己生产得过多的商品,正是大经营所特别需要的那种生产资料——劳动力”⁶。因此,“大的农业经营和小的农业经营,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制约,像资本家和无产者一样,——而且小农经营者也就更加具有后者(无产者)底性质”⁷。

此外,在农业中还存在着地租提高,由财产继承权而来的土地碎分,城市剥削农村,以及农村人口的逃亡城市等等的影晌,而阻碍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村的绝对统治。尽管如此,资本和生产集中的规律,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还是顽强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上。考茨基在阐述农业发展的前景时写道:“大农经营所占的面积,大农经营的更加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租佃制与抵押制底发达,农业的工业化,这是替农业生产社会化准备基础的诸要素。农业生产同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一样,必不可免地要从无产阶级未来的统治发生出来,它和工业生产的社会化更加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⁸

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发展趋势所作的上述分析,曾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本书是《资本

1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6页。

2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6页。

3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7页。

4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9页。

5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9页。

6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9页。

7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9页。

8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4--355页。

论》第3卷出版后当前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一部系统地考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著作。现在考茨基用他的巨著(共450页)中的第一部分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的发展》(第1—300页)填补了这个空白。”¹⁾列宁在评述考茨基关于农业中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以及小农经济“稳固”性的分析时,称赞“考茨基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材料是使人心悦诚服的”²⁾。

四、考茨基鼓吹的“超帝国主义”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由隐蔽的“中派”首领公开堕落成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在1914—1917年间,他在《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再论我们的幻想》和《帝国主义战争》等论著中,提出了歪曲帝国主义本质的“超帝国主义”论,来为其可鄙的叛变行径辩解。列宁指出:“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和国际性伪装起来的一种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论。”³⁾为了剥去考茨基的巧妙伪装,我们得先从他是怎样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谈起。

什么是帝国主义?在考茨基看来,首先要弄清帝国主义一词的涵义。他说:“关于帝国主义一词的意义的问題,看来也许是单纯的字眼争论或者完全是咬文嚼字。但是我们除了通过词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互相了解。而且只有我们大家都将同一个概念与同一个词结合起来时,才能够了解。”⁴⁾因此,“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帝国主义,我们就必须问问自己,这个词是怎样产生的、它一向表示的是什么东西。这个词是从拉丁文来的,它表示同一个世界帝国或帝国(imperium)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意图。就我所知,它最初在拿破仑第一的帝国统治下的法国出现,人们用它来表示帝国的政策。如果法国同志们今天还把帝国主义这个词按照相似的意义用于德国,用来表述他们相信能够在德国发现的帝国政权取得世界霸权的意图”⁵⁾。“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英国”,人们还用“这个词”来说明这样一种“帝国政策,其中起决定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0页。

④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5页。

⑤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5页。

作用的是对殖民地的兴趣。特别要通过关税政策的特殊措施使殖民地与宗主国紧密结合”¹。因此,英国虽“没有首创这种新政策”,但“给它起了名字。这种政策一般称作帝国主义”²。这里,考茨基把帝国主义一词,看作是一种政策,是一种政治范畴,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在解释中还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殖民扩张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对外特征的一种。考茨基这样错误解释的关键,是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基础——垄断割裂开来。

考茨基在对帝国主义的涵义作了一般解释后,进一步从不同角度给帝国主义下定义。第一,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他说:“大约一个世纪以来,英国人把帝国主义一方面理解为把巨大殖民国家的所有部分同宗主国合并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意图,另一方面理解为日益扩大这个国家的意图。”³但“并不是任何扩张本国领土的意图都可以称作帝国主义”⁴,因此,“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⁵。第二,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它“不表示一定的‘经济阶段’,尽管它必然和这个阶段联系在一起”⁶。他坚持说:“论述帝国主义的不同作者对这一政策的细节理解不同,但是几乎全体一致把帝国主义看成政治制度,不是‘经济阶段’、不是‘前进了的、加强了了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层的政策。”⁷第三,考茨基还从资本运动形式与政权结合的方面来论证帝国主义。他说:“经济的发展,使货币资本以及同它相适应的政策比工业资本早得多就掌握了政权。但是在上一个世纪里,工业资本掌握

①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96页。

②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6页。

③ 考茨基:《帝国主义》,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8页。

④ 考茨基:《帝国主义》,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9页。

⑤ 考茨基:《帝国主义》,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69页。

⑥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7页。

⑦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97页。

了政权,并且把货币资本家在国家中影响显然排挤到次要的地位。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阶段。这个阶段终于被另一个阶段所取代,在后一阶段,工业资本采取了股份公司的形式,……于是工业资本中最大和最强有力的部分就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同时还替金融资本同大地主庄园取得协调铺平了道路。”^①因此,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是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②。考茨基的上述帝国主义定义,曾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第一,考茨基歪曲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和实质。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即垄断阶段。他说:“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③而考茨基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④。因此,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⑤。第二,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充分,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⑥。在考茨基“定义中的经济方面”,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⑦。第三,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定义只是“片面地”、“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⑧;而他又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⑨,恰恰没有联系时代特征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⑩又说:“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病态的可以纠正的偏差(并不像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庸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而是资本主义基础发展的必然结果。”^⑪第四,列宁指出:考茨基的

①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90页。

②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89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3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9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⑦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⑧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⑨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⑩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6页。

⑪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7页。

帝国主义定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其“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来,世界领土上的分割……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①。

考茨基就是从上述错误的帝国主义定义出发,提出并论证他的“超帝国主义”论的。他说:“现在从帝国主义大国的世界大战中也能够产生其中最强大的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将结束军备竞赛。”^②由此,考茨基认为,“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③。即“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④。考茨基还分析了目前帝国主义战争可能出现的两种发展趋势和结局。他说:“目前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可能使金融资本家间的民族仇恨达到极点,使军备竞赛继续进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必不可免,从而完全摧毁超帝国主义的嫩芽。”^⑤这是一种可能的结局。但是,他又认为,“战争也可能有另一种结局。它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可能加速在和平时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⑥。如果情况发展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那末“实现裁军和持久和平,……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义上日益破产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⑦。这样,“超帝国主义暂时可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造成新希望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1—812页。

② 考茨基:《帝国主义》,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84页。

③ 考茨基:《帝国主义》,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84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2—813页。

⑤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7页。

⑥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8页。

⑦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8页。

和新期待的纪元”^①。考茨基为论证他的“超帝国主义”论,还提出了五条所谓的论据,即:(1)“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削弱”;(2)“美国关税的降低”;(3)“裁减军备的意图”;(4)“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迅速缩减”;(5)“各种金融资本集团的国际交织日益加强”^②。考茨基在提出这五条论据后说:“所有这一切都使我考虑到:现在的帝国主义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③考茨基还坚持说,他“不把帝国主义看成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并且考虑了通过金融资本本身的另一种类型的政策把它克服的可能性”^④。

考茨基的这种伪装巧妙的“超帝国主义”论,列宁从方法论、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严厉批判。第一,在帝国主义之间互相厮杀和硝烟弥漫的战争面前,考茨基竟然鼓吹帝国主义的矛盾趋向缓和、联合的“超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讽刺他说,“超帝国主义”论,像“超农业论”一样,“是超等废话”^⑤。这就充分暴露了考茨基的唯心主义和回避现实的立场。在爆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他用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方法,用无法实现的没有战争的“超帝国主义”来欺骗、麻痹群众。列宁指出:“考茨基为了替机会主义者辩护,却无耻地加以歪曲。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其间。”^⑥第二,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几个字完全没有表达出作者所要

①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8页。

②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6—117页。

③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7页。

④ 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17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3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2—643页。

说的意思)是表明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¹⁾。他鼓吹“超帝国主义”论,其实“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²⁾。他“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助长帝国主义辩护士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³⁾。第三,列宁指出,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的抽象设想,“这在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者,他为了幻想将来的不紧急的任务,而否认了当前的紧急的任务。从理论上讲,这就是为了这些幻想而不依据实际的发展,随意地脱离了实际的发展。毫无疑问,现时正在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财政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⁴⁾第四,列宁还评析了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五条论据。考茨基把“英国保护关税运动的削弱”和“美国关税的降低”作为他论证“超帝国主义”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论据。列宁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这哪有“一点点新纪元的趋势呢”⁵⁾?他指出,“走到极端的美国保护关税制是削弱了,但保护关税制却仍然存在,正像对英国有利的英国殖民地的特权即优惠税率仍然存在一样。我们回想一下,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现代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显然……这种垄断企业的发生和发展(这个过程在英国和美国大概都还没有停止呢?即使是考茨基恐怕也未必敢否认战争加速和加剧了这个过程)使以往的自由竞争成为不可能了”⁶⁾。关于作为考茨基论证“超帝国主义”的第四条论据——“战前几年法德两国资本输出的迅速缩减”。列宁指出,据1912年统计,法德两国,“每一国在国外的资本约有一百五十亿马克(约一百七十亿卢布),而英国一国就要比它们多一倍以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输出的增加从来就不是平衡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5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5页。

4)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7—98页。

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

6)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

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平衡的。至于谈到资本积累的削弱,或国内市场的容量例如由于群众生活状况的大大改善而改变,那是考茨基连提也不敢提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两国几年来资本输出减少的事实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新纪元到来的结论”^①。关于考茨基论证“超帝国主义”论的第三条和第五条论据——“裁减军备的意图”和“各种金融资本集团的国际交织日益加强”。列宁指出:“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世界著名的‘大炮’(和一般生产军用品的)公司为例。就拿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吧……该公司的利润从1905—1906年的六十万零六千英镑(约六百万卢布)提高到1913年的八十五万六千英镑和1914年的九十四万英镑(九百万卢布)。这里金融资本的交错甚为密切,并且在日益增强;德国资本家‘参与了’英国公司的事务;英国公司替奥地利制造潜水艇等等。国际上交错的资本在扩张军备和战争方面正干着得意的买卖。要想从各国资本联合和交错成统一国际整体的事实中,得出裁军的经济趋势的结论,就等于用小市民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愿望来代替阶级矛盾的真正尖锐化。”^②

总之,列宁认为,考茨基在1914—1917年间所阐述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③。因此,列宁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3—63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1页。

第十五章 第二国际各派理论家的经济思想(续)

第四节 希法亭的经济思想

一、希法亭的生平和主要著作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年)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后来演变成机会主义者。他出身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其父为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中学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190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01—1906年,曾担任过儿科医生。希法亭早在中学读书时,就接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开始受其影响。他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时,加入了社会主义大学生协会,并投身于学生社会主义社团的组织工作。从1899年开始,希法亭常在各种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文章。1902年希法亭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从事理论活动,开始为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撰稿。1904年他和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 1873—1937)一起编辑出版《马克思研究》丛书(1904—1923年),该丛书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希法亭在该丛书第一卷中发表他撰写的长篇论文——《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这是“对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最早的反批判”^①。这使希法亭“在德语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赢得了声誉,被视为思想尖子”^②。1906年,希法亭应邀到柏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任教,并参加《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同年,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191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政治编辑,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从1907年起,希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第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4页。

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8页。

法亭还定期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创办的机关报《战斗》撰稿。与此同时,希法亭还深入进行了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于1910年,出版了他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专著:《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从而希法亭“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①。他从19世纪末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至1914年止,这是他一生活动的第一阶段,在这阶段的希法亭,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1年希法亭逝世,这是他一生活动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希法亭,则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虽表示反对投票批准战争拨款,但在战争中,他却极力拥护考茨基的“中派”立场,主张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统一”。1915年,他作为医生被征为奥匈军队野战军军医,直到1918年为止,他一直在意大利前线领导一个野战军流行病医院。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德国,加入德国籍。1917年4月,他加入考茨基等“中派”分子所组织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任该党的执行委员,成为该党改良主义政策的主要代表。1918—1922年希法亭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并任该党机关报《自由报》主编。进行反对德国共产党活动。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参加第二国际活动。1922年,希法亭又赞成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谢德曼分子重新联合,成为联合后的机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之一。1923年4月,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希法亭出任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施特劳斯曼(Stresmann)内阁的财政部长,因未能制止通货膨胀而于同年10月辞职。1924—1933年,希法亭曾任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和联合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的主编;其间,他于1928—1929年又出任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缪勒(Muller)内阁的财政部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的前夜,由于议会拒绝他所提出的税收建议,使他整顿财政收支的努力归于失败。在20年代期间,希法亭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所面临的经济政策问题上了。有位观察家把当时的希法亭说成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政治联盟的理论家”,却“无视即将到来的法西斯危险”^②。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上台后,希法亭因自己是犹太人而逃亡国外。他先经丹麦到瑞士,然后到法国,在巴黎参加了《新前进报》的编辑工作,出版了《社会主义杂志》,起草了德国流亡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布拉格宣言》。法西斯德国侵占法国后,希法亭被维希市(非占领区)政府引

① 上辅民:《金融资本》“中译本前言”,载《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页。

②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8—709页。

渡给盖世太保,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1年死在狱中。希法亭至死未向希特勒法西斯屈服投降。

希法亭的主要著作,就是他于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该书的“基本要点”在1905年就已大体完成了。他在1909年所写的该书《前言》中说:“这部著作的基本要点,在四年之前已经大体就绪。外部的情况却一再推迟了它的完成。”^①希法亭写作《金融资本》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经历深刻变化时期,即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他在概述该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时,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②希法亭的主要著作《金融资本》一书(正文由五篇二十五章构成),基本上就是按照上述的两条线索展开论述的。他在正文中将上述的第二个方面,即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间的密切关系,作为分析的主线进行论述。他在该书的第一、第二篇中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第1—10章)首先加以论述;上述的第一个方面,即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被放在第三篇(第11—15章)中加以考察;第四篇和第五篇则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考察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对危机,以及对各主要阶级的政策的影响(第16—25章)。希法亭在该书中,基本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为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随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思潮也迅速泛滥开来;这股思潮,也对当时的希法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他的这部《金融资本》中留下明显的痕迹,出现“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④。

二、希法亭对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分析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对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所作的分析,根据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8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8页。

该书的基本结构,这里仅概述以下几点:

(一)信用、银行与金融资本。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研究,是从货币开始的。他认为“只有从货币的正确分析中才能认识信用的作用,从而认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①。他虽分析了货币产生的根源与货币的职能,但他并没有对货币职能作全面的分析,更没有认识到纸币的本质及流通规律;他仅仅说明了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并由此来说明信用产生的可能性;接着,他便转入了对信用的分析。

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信用扩张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都产生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资本周转过程中。正是在资本的反复不断的周转中,货币资本才不断地周期地被游离出来和被闲置起来,从而为信用的扩张提供了前提;而被游离出来的和被闲置起来的货币资本,又都要尽快地转入生产过程之中,这就给货币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压力,从而加速了信用的扩张。希法亭写道:“货币资本的任何游离都意味着这一货币资本通过信用的中介用于把它游离出来的个人资本之外的其他生产目的的可能性。”^②因此,“一切导致资本闲置的原因,现在都同样成了信用关系产生的原因;一切影响闲置资本量的因素,现在都决定信用的膨胀和收缩”^③。

希法亭在分析了资本主义信用产生和扩张的原因后,进而研究信用的各种形式及其作用。他在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信用区分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基础上,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又将银行信用按使用目的区分为流通信用(即代替商业信用的银行信用)和资本信用(即向生产资本家提供新资本的银行信用);同时,他还进一步将资本信用按资本信用回流方式分为流动资本信用和固定资本信用。希法亭通过对信用形式和作用的分析,来阐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利益的趋同与关系的密切化,从而引起银行职能和信用发生了变化,即银行由主要是支付中介向主要是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向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这就是说,过去银行向产业提供的主要是流通信用或流动资本信用,银行与产业之间还处于一种暂时的利害关系,而现在,银行向产业提供的主要资本信用尤其是固定资本信用,从而造成越来越多的银行资本长时间地束缚在产业中。这样,就使银行与产业“由暂时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4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3—74页。

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①。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就会不断扩大,因而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性也就相应地加强。当信用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竞争就会迫使资本主义企业必须利用信用,因为对个别职能资本家来说,利用信用就意味着增强他的资本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从而提高他的利润率。而且信用利用越多,他的优势就越显著。这样,希法亭便说明了信用和银行业务的扩张在金融资本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股份公司与金融资本。希法亭在分析了信用和银行业务的扩张在金融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后,进而研究股份公司在金融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他指出,“不理解股份公司的胜利及这种胜利的原因,就根本不能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②在希法亭看来,在高度发达的信用关系基础上产生的股份公司,不仅是各种垄断企业的最好组织形式,而且它还促进了银行资本向工业资本的渗透,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形成。

在希法亭撰写《金融资本》的时期,股份公司已成为普遍的企业形式,虚拟资本及其运动已成为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希法亭所提出的“创业利润”,便是对这种经济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一个重要范畴。他从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和收入资本化的理论出发,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公司的理论。他指出,股份公司的建立就使资本家从企业家的职能中解放了出来。希法亭写道:“我们最先考察的产业股份公司,首先意味着产业资本家职能的变化。因为它从根本上带来了在个人企业中只是偶然才能出现的东西,即产业资本家摆脱产业企业家的职能。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职能的变化,赋予投入股份公司的资本以纯粹货币资本的职能。货币资本家作为债权人,同他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完全无关”^③。资本家投入股份公司的资本成为股票形式上的货币资本并获取股息收入。在股份制度尚不发展和股票不进行自由买卖时,股份资本等于现实资本,股息也等于利息加企业主收入的平均利润;但是,随着股份制度特别是交易所的普遍发展,股票成为商品,股息也由于竞争而趋于利息水平。这时,原先股票中所包含的相当于企业主收入的部分,便按照利息率资本化为股票价格中超过票面价值的部分。这种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所形成的差额,就是归创业者所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3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5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5页。

有的创业利润。希法亭写道：“这种差额表现为‘创业利润’，是仅仅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利润的源泉。”^①他认为：“创业利润既不是欺诈，也不是补偿或报酬，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范畴。”^②不仅在创建股份公司和把个人企业变为股份公司时会产生创业利润，而且在股份公司追加投资和增发新股票时也会产生创业利润。巨额创业利润的诱惑，使银行产生对产业进一步渗透和控制的强烈冲动，而它的不断积聚和集中所造成的强大实力，又使它与产业在创业利润的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与此相应，银行的职能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银行这时已主要不再是通过信用关系向生产资本家提供资本，从而获取利息；而是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向市场提供可以转变为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从而获得更为优厚的创业利润。

除了“创业利润”外，希法亭还分析了银行和资本巨头积极利用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通过“金融技术”来控制他人资本进行掠夺。他说：“随着股份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技术，它的任务是以尽可能小的自有资本保证对尽可能大的他人资本的控制。”^③控制他人资本的“金融技术”之一，就是所谓的资本“掺水”。资本“掺水”，就是银行和资本巨头以低于票面价值发行股票的方法，掌握更多的股票数额，以在新创公司里取得表决权和控制权；而这种活动又有利于他们隐瞒企业经营状况，以便克扣股息和进行股票投机。希法亭说：“掺水是把创业者的份额提高到超过创业利润的适当的金融技术手段。”^④希法亭指出，银行和资本巨头控制他人资本的“金融技术手段”，还可通过对其他企业的“整理”和“改组”等办法。他们通过这种活动以降低亏本企业的股份资本额来达到获利和实行控制的目的。希法亭指出，“对于银行来说，这种整理和改组有两重意义：第一，作为带来利润的业务；第二，作为使这种公司依附于自己的机会”^⑤。

希法亭当时虽还没有使用“参与制”这一术语，但他对银行和资本巨头建立控制体系和实行个人联合的论述，实际上已揭示了“参与制”这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特点。他指出，股份制度本身的特点，一方面使它们通过掌握大量股票而对小额股票持有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股票的分散化，整个股份公司的支配权是归于掌握一半以上股权的所有者的，但“在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1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1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0页。

④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

⑤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9页。

实践中,足以控制股份公司的资本额通常还要小,只是资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甚至比这个数目还小”¹。而通过这个公司又可以控制一系列的附属公司等,从而形成庞大的控制体系,使它们力量和势力范围极大地膨胀开来。希法亭认为,随股份公司和资本集中的发展,银行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股份公司,从而必然造成银行与产业之间的个人联合,从而“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与控制产业的资本所有者,越来越合而为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大银行愈益获得对虚拟资本的支配权时,更是如此”²。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便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日益结合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越来越取得对整个社会的统治。

(二)垄断与对阻碍利润率平均化诸因素的克服。希法亭在分析了信用和股份公司对金融资本形成中的促进作用后,进而研究垄断问题。他把资本主义垄断形成的原因,归结为对阻碍利润率平均化的克服。对此,希法亭从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一根本目的出发进行分析。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旨在获取利润,获得最大利润是每个资本家的动机,也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必然产生出来的经济行为的指导原则”³。但是,“刺激各个资本家去获得最大利润的主观努力所达到的客观结果,却是为一切资本创造相同的平均利润率的趋势”⁴,而要“达到这种结果,必须通过争取投资领域的竞争,通过资本不断流向那些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和离开那些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然而,资本的这种不停流动却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⁵。这就是说,当资本一旦投入某一生产部门它若再想向另一部门转移就相当困难了。在希法亭看来,这就构成了利润率平均化的第一个障碍。

希法亭认为构成利润率平均化的第二个障碍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企业固定资本相对投入加大和增长加快,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造成企业利润降低,同时也造成资本转移的困难,从而造成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他写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技术的进步,表现为等量活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的日益增加。在经济上,这个过程反映为资本有机构

1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0页。

2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

3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1页。

4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1页。

5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1页。

成的增加,反映为总资本中不变资本额比可变资本额的增长。”^①同时,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变资本组成部分内部的变化。固定资本组成部分比流动资本组成部分增长更迅速”^②。固定资本部分的迅速增长“意味着:资本一旦投放出去,其转移就变得日益困难了”^③。而且,“固定资本越大,它的数额越多,它在投资中的比重也就越大,占总资本的份额也就越大,不遭受巨大损失而实现其中包含的价值,并在以后把这一资本转移到更为有利的领域中去,也就越困难”。^④从而也就越是阻碍利润率平均化。

希法亭认为,造成利润率平均化的“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障碍是,“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领域中,新建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巨大的规模,它的建立会立刻大大增加这个领域的生产。技术的规则不允许那种也许是市场的吸收能力所要求的生产提高的渐进性,生产的显著增加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利润率的影响。如果说利润率以前高于平均水平,那末,它现在却降到平均水平以下”^⑤。这就给利润率平均化造成了更为严重的障碍。而且这种“障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⑥。

希法亭在分析了上述阻碍利润率平均化的诸因素后指出,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同时还有一些起反作用的因素存在。当单个资本积累很难达到新建企业所需资本的投入量时,通过资本联合的形式很快就可达到;而且,这是克服利润率平均化障碍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由于股份制度的发展和资本的联合,就使得利润率的平均化可以通过新积累的资本大量投入利润率较高的部门来实现。希法亭写道:“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上,利润率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趋势是怎样由完全不同的原因产生出来。在资本力量足够强大的地方,这种趋势现在又唤起克服自己的相反趋势。这种相反的趋势最终导致自由竞争的消除,从而导致长期形成利润率不平均的趋势,直至最后这种不平均本身由于生产领域分离的消除而消除。”^⑦希法亭还指出,产业资本内部的这种“消除”自由竞争、实现资本联合和垄断的这种“趋势”,受到了“银行资本利益的促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资本和产业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1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2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5页。

④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5页。

⑤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8页。

⑥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8—209页。

⑦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1页。

资本消除竞争的趋势是一致的”^①。

在希法亭看来,通过资本联合的形式将大量资本投入利润率较高的部门,这仅仅是克服利润率平均化障碍的方法之一,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方法。他认为克服利润率平均化障碍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企业之间的联合(即实行联合制)和建立垄断企业。希法亭把企业之间的联合,分成纵向联合和横向联合两种基本形式。纵向联合是指有着密切联系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企业的联合,这种联合制企业,缩小了社会分工,扩大了企业内部分工,又可节省流通费用,这不仅可使企业利润率相对稳定,而且还可有一个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横向联合是指同一生产部门内企业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制企业,废除或限制了部门内的竞争,人为地保持高价,是防止利润率下降的有效办法。这种联合制企业,不论是纵向联合制企业还是横向联合制企业以及混合型的联合制企业,在经济上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希法亭将这种巨大优势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联合制使行情差异持平,从而为联合制工厂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商业的消除。第三,联合制造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从而与单纯工厂相比获得超额利润。第四,在严重的萧条时期,当原料价格降低与成品价格降低不同步时,联合制加强了联合制工厂对单纯工厂竞争中的地位。”^②

希法亭还研究了企业联合的不同形式。他指出,企业的联合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实行联合的企业仍然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联合只表现在它们之间成立一种协定,各企业须按照协定的规定来经营,因此,这种企业联合实际上只是一种联营企业。如果联合的各企业失去了各自的独立性而融合为一种新企业,这就是兼并企业。联营企业、兼并企业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垄断性的;但不论是联合企业还是兼并企业都要“尽可能地囊括所有企业、旨在通过尽可能完全地排除竞争来提高价格从而提高利润”^③。希法亭说:“卡特尔是一种垄断的利益共同体”^④;“托拉斯是一种垄断的兼并”^⑤。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垄断组织,在确定价格控制市场、提高利润以及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不尽相同,而托拉斯一般说来,是优于卡特尔的。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资本雄厚,因此它们比局外企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从而加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1-212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8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0页。

④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0页。

⑤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0页。

强了它们的经济垄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希法亭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即从对阻碍利润率平均化诸因素的克服来说明垄断的产生,这比单纯从竞争与垄断相互转化来说明要深刻得多。但他对垄断的分析是不完备的,有缺陷的。例如,他没有从生产的集中这一根本原因来说明垄断的产生,他也没有把垄断理解为帝国主义的实质等。

(四)金融资本的形成及其经济影响。希法亭在分析了银行支持产业资本的集中以及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产生后,便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垄断组织形成后又是“如何反作用于银行制度呢”^①?他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阐明了金融资本的最终形成及其实质。

希法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性质,是由它们各自所拥有“资本力量的强大程度”决定的^②。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都是拥有巨大资本力量的企业。因此,银行为了在与这些垄断组织的往来中不被控制,它在促进产业企业的联合过程中自己也进行了“联合和扩大”。希法亭写道:“卡特尔化本身助长了银行的联合,正像银行的联合反过来助长了卡特尔化一样。”^③它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由产业资本家建立的利益共同体造成这样的结果:两家以前竞争的银行有了共同的利益,首先在某一领域中进行共同的活动。产业的联合制式的联合也以类似方式影响银行在产业领域的活动的扩展。银行以前可能仅活动于原料工业部门,而由于联合制也不得不把它的活动延伸到加工工业”^④。

其次,由于卡特尔化的结果,造成“产业中的自由竞争被消灭,首先使利润率提高了。这种被提高的利润率起着重要的作用”^⑤。它为银行参与增发股票或创办新企业以攫取高额的创业利润创造了条件。对于银行来说,获取高额创业利润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是促使银行“垄断化的非常重要的动机”^⑥。

再次,“卡特尔化也意味着卡特尔化的企业的收益有较大的可靠性和均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0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0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0页。

④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0页。

⑤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1页。

⑥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1页。

等性。经常威胁个别企业生存的竞争的危險被消除了。这些企业的股票市价一经因此而提高,就意味着在新发行时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投资于这些企业的资本的可靠性大大地增强。这使银行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产业信用,从而从产业利润中获得比以前更大的份额。因此,由于卡特化,银行和产业之间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¹。在希法亭看来,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发展虽然促进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而银行资本却仍然是借贷资本,二者并未达到融合的地步;但是,“金融资本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产业的垄断化而达到它的顶点”²。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希法亭对金融资本这一概念及其实质作了如下的表述:“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³。因此,“金融资本,即归银行支配的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⁴。

希法亭还强调指出,随着产业的日益依赖于银行资本和财产的日益集中,这“正像资本本身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上变为金融资本一样,资本巨头、金融资本家也合于一身,越来越以支配银行资本的形式支配整个国民资本”⁵。

在希法亭看来,随着卡特化和托拉斯化,随着金融资本的形成,货币资本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改变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在社会中的地位。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作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货币资本,对资本积累和手工业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变,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⁶。后来,生产利润的产业资本“开始反抗”,并使高利贷资本从属于自己,使它“作为货币经营资本”为商品的形态变化服务。作为货币经营资本的

1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1页。

2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

3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2页。

4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

5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

6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

银行资本“在生产资本家之间开展信用业务。资本的动员和信用的不断扩大,逐渐引起货币资本家地位的彻底变化。银行的权力增大,它们变成了产业的创立者以及最后变成产业的统治者。它们作为金融资本掠夺产业利润,就像以前古老的高利贷者以自己利息形式掠夺农民的收益和地主的地租一样。……这是否定之否定:银行资本是对高利贷资本的否定,而银行资本自身又被金融资本所否定。后者是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综合;在一个无限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占有社会生产的成果”^①。

然而,商业资本发展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希法亭指出,随着“金融资本达到了它的权力的顶峰,而商业资本却经历了最严重的衰落”^②。当产业资本发展起来后,就逐渐把商业资本“从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的对生产的统治地位上排挤下来”^③;而金融资本的发展又“绝对地和相对地降低了商人的重要性,把过去如此傲慢的商人变为被金融资本垄断的产业的代理商”^④。

(五)金融资本与国家的对外对内政策。希法亭认为,在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使原来处于不同领域的各种资本都被置于金融资本的统一控制之下,形成了资本巨头与金融资本家合于一身的统治,并使国家越来越变成为少数金融巨头掌握的工具。从而,金融资本的形成也改变了国家的对外、对内政策。这里,仅概述以下几点:

首先,推行关税保护政策。希法亭指出,卡特尔等垄断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各国自由贸易政策或“培育性”关税政策向保护关税的发展;不过这时的关税保护政策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保护政策有着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早期实行保护政策的目的是,主要是为了对付发达国家的竞争,加速国内产业的发展。一旦这种保护政策完成了“培育性”的使命后,当“国内产业发展起来能够满足需要并造成出口的可能性,保护关税便失去自己的意义”^⑤。而在资本主义垄断时代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正是那些具有最强出口能力的产业支持高额保护关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毋庸置疑的”^⑥。因此,“卡特尔化的产业对保护关税额度的大小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利害关系。关税越高,国内价格也就越能提高到世界市场价格以上”^⑦。这样,“卡特尔不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4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3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4页。

④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4页。

⑤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0页。

⑥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1页。

⑦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1—352页。

仅从对由它自己生产的产品实行保护关税中得好处”¹，而且，保护关税还向“卡特尔提供了超过由于卡特尔化所达到的超额利润的超额利润，并赋予卡特尔向国内人口征收间接税的权力。这种超额利润不再来自卡特尔雇用的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也不是对其他非卡特尔化产业的利润的扣除，而是对国内整个消费者阶级所课的贡赋”²。

其次，推行资本输出和殖民政策。希法亭认为，由于卡特尔等垄断组织的发展，使积累因超额利润而增加；同时，又使国内投资受到限制，因而引起了对外投资的迫切要求。他指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资本输出的迅速发展”³。他在阐明“资本输出”的涵义时写道：“我们所说的‘资本输出’，是指用来在外国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输出。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剩余价值仍然留归国内资本支配”⁴。因此，“资本输出相应地减少了国内资本量，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国民收入”⁵。希法亭认为，资本输出“能以两种形式进行”，即“作为带来利息的资本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它又可以执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职能”⁶。而作为带来利息的资本移往国外则执行借贷资本的职能。他强调指出，作为“产业资本输出的影响远比借贷资本形式的输出重要得多。这也就是产业资本形式的资本输出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转到外国市场，使这一市场完全摆脱了自己消费力量的限制。这种新型生产的收益实际保证了资本的增值”⁷。所以“资本输出加速了对国外市场的开发，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它们的生产力。同时，它在本国也增强了那种必须提供被作为资本输往国外的商品的生产。因而，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随着资本输出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狂飙与突进运动的时期”⁸。而且，随着资本输出，尤其是“它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式输出以来，大大加速了所有旧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并把整个地球包容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⁹。

1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2页。

2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2页。

3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1页。

4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0页。

5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0页。

6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1页。

7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3-364页。

8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4-365页。

9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70页。

希法亭在阐明资本输出对那些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以强大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全世界扩张资本统治的同时,还分析了那些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的各金融资本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他写道:“金融资本越发展,金融资本为民族资本而把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垄断化的努力越强,这种斗争也就越激烈;而垄断进程越是向前发展,为争取世界市场的剩余部分所作的斗争也就越残酷。”^① 特别是那些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集团,同那些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希法亭曾预言,它们之间的争斗,必然要“最后诉诸暴力解决”^②。

希法亭还研究了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集团与输入资本的落后国家、殖民地及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输出资本的殖民者,对土著人民采取了种种欺诈、蒙骗和暴力手段,其中“主要的手段是对土著人的剥夺,夺走他们的土地,即夺走他们迄今为止的生存基础。……这种剥夺同时也在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土著居民中创造出—个无产阶级,他们必定成为任人摆布的剥削对象。征服者的要求自然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因而使剥夺本身成为可能。殖民者的暴力行为本身引起冲突,这种冲突使国家干涉成为‘必要’”^③。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扩张和资本输出的发展,金融资本统治集团“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以暴力手段克服经济障碍。这就导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国家政权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把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强加于这些地区的越来越急切的尝试,而不管是保护还是毁灭迄今为止的政权。同时,争取新开投资场所的竞争,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之间造成新的对立和冲突。而在新开发的国家自身内,被输入的资本主义加剧了—对抗,激起了民族意识日渐苏醒的人民对—人侵者的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对—外国资本采取危险性的措施。旧的社会关系被彻底革命化了,那些‘无史民族’的千年来的农业纽带被斩断了,它们自己也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之中。资本主义本身逐渐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欧洲民族过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作为—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目标现在也成为被征服者的目标,这种独立运动恰恰在欧洲资本的最有价值和前途的开发地区威胁着欧洲资本”^④。因此,“一切在外国有利益关系的资本家,

①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80—381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81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6页。

④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9—370页。

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凭借它的权威保护自己即使是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的利益”¹⁾。对此,列宁认为,“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²⁾。但列宁还指出:“要补充一点。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牌国家也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³⁾

第三,力求建立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希法亭写道:“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它对个别资本家的独立性毫无兴趣,而是要求对后者的束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希求组织,当然只是为了能够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展开竞争。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维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国家通过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保证其国内市场,并有助于它征服外国市场。它需要政治上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其商业政策上不必考虑其他国家的对立利益。它需要强大的国家使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国外,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把于己有利的供给合同和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最后,金融资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便能够推行扩张政策并吞并新殖民地。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国家的强权政治的反对者,那末,它却企图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向贵族和官僚提供国家权力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支配权,对抗贵族和官僚的原有权力。因此,没有任何限制的强权政治便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要求”⁴⁾。希法亭还强调指出,在金融资本时代,“寡头统治的理想代替了民主平等的理想”⁵⁾。但他又认为,这种情况在对外政策上和国内政策上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他指出,“这种理想在对外政策范围内表面上还包括整个民族”,而“它在国内政策范围内却加强了雇主对工人阶级的阵地。同时,工人日益增长的力量,也加强了资本进一步强化作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保障的国家权力的努力”⁶⁾。

最后,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统治集团推行各种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作了如下三点概括:“第一,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第二,通过保护关税壁垒排除外国竞争;因而,第三,把这一经济区变成民族垄断联盟的开发地区。”⁷⁾

1)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79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9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9页。

4)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85页。

5)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87页。

6)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87页。

7)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75页。

这里,希法亭所谓的“经济区”,其实就是“殖民地”。因此,列宁将希法亭所概括的三项金融政策目的,归结为:“殖民地”、“保护关税政策”和“垄断”^①。由此可见,金融资本集团对外政策的实质,就是实行殖民扩张;其对内政策的实质,就是实行垄断统治。

(六)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回答只能是社会主义。希法亭认为,无产阶级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的,而且“在各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也是以这种对立为特征的”^②。他还针对那时机社会主义者宣扬金融资本政策会导致战争从而导致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应反对帝国主义的谬论,而强调指出,“对金融资本的政策必然导致战争的发展从而必然导致革命风暴的信念,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放弃它对帝国主义和战争政策的敌意。同样也不能因为资本的扩张政策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的最强大的促进者,就支持这种政策。相反地,这种胜利只有从反对这种政策的不断斗争中才能产生,因为只有到那时,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这种政策必然导致崩溃的继承人”^③。因此,无产阶级要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对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不断的、义无反顾的斗争”^④,才能达到。

希法亭不同意伯恩斯坦否定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在金融资本集团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时,只能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他写道:“如果说资本除了奉行帝国主义政策之外不可能奉行任何其他政策,那末,无产阶级也不能用产业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时期的政策同帝国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的事业,不是用自由贸易时代和敌视国家的已经被克服的政策同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自由贸易,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策的目标,现在不可能是已经变得反动的恢复自由竞争的理想,而只能是通过克服资本主义而彻底消除竞争。无产阶级以如下回答摆脱了要保护关税或是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的困境:既不是保护关税,也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社会主义。”^⑤在希法亭看来,一旦无产阶级实现了有组织的生产以及“对经济的自觉调节(不是通过和为了资本巨头,而是通过和为了社会全体)。到那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4页。

②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2页。

③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4页。

④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5页。

⑤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5页。

时,社会就像它自发现自然运动规律以来而使自然服从于自己一样,也最终使经济服从于自己。社会主义不再是遥远的理想,甚至不再是仅仅对‘当前要求’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最终目的’,而是变成了无产阶级直接的实际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¹。

希法亭认为,在金融资本统治时代,社会主义已具有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他写道:“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²

正由于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在上述几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作出了较系统的“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因此,列宁称该书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并将它运用于经济生活中的最新现象的书”³。

三、希法亭鼓吹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

希法亭在分析金融资本的形成时,就认为随着产业企业的扩大及其与银行联系的密切,即随着银行资本对产业企业控制的加强,从而增强了对危机的抵抗能力,使危机不易发生。同时,他在分析垄断组织的发展趋势时,又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可能形成一个总卡特尔,到那时会出现有意识的调节,从而消除危机。随着这种看法的逻辑发展,到他生平活动的第二个阶段,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逐渐形成一种叫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观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个“名词”1915年由他首先在《战斗》上使用,然后在1921年的《社会》上加以充分阐述”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于是,希法亭就宣称一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了。他在192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所作题为《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的报告中总结了这一理论。他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纯粹由盲目的市场规律所统治的自由竞争时代基本上被克服

¹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5页。

² 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9—430页。

³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9页。

⁴ 《新帕尔格雷夫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9页。

了,我们达到了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组织化,也就是从各种力量的自由比赛的经济达到了有组织的经济。”^① 希法亭还论证了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这种“有组织的经济在技术上的特征是,除了蒸汽,除了电力以外,由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已经成熟到可以用于工厂技术的合成化学愈来愈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化学的应用在原则上意味着某种新的东西。由于它在原则上寻求从到处大量存在的无机物人工制造出重要原料,它就使资本主义经济不依赖于一些原料的出产”。^② 正由于种种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就“能够以巨大的爆炸力变革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技术的整个基础的崭新事物”。^③

第二,这种有组织的经济“特征是:资本主义工业——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科学方法——从一开始就力图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利用各种新的可能性。突出的是,新兴的工业不仅像前一时期那样一开始就以最大的技术规模建立起来,而且同时也组织起来,也许是在全世界组织起来”。^④

第三,这种有组织的经济特征“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国际化,把国家垄断、卡特尔和托拉斯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企图。谁同资本主义经济界发生接触……谁就会感到惊讶,这些战前在经济观点上局限于民族范围的人现在多么热衷于寻求国际联系,关心与国外的关系,对国际组织的渴望是多热烈”。^⑤

第四,这种有组织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私人企业,各个企业主的经济领导也不再是这个企业主的私人事情了”^⑥。特别是随着“康采恩的形成,愈来愈多的企业联合成一个最高的领导,对于各企业来说意味着自由竞争的

①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1页。

②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1—222页。

③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2页。

④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2页。

⑤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3页。

⑥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4页。

消除”¹⁾。因为“康采恩领导人最关心的是能否随时确定在个别企业中……取得最大利益。为了用科学的竞赛方法来代替自私心的竞争,制订了非常出色的方法。这样一来,我们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就获得了我们的经济领导原则。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自己放弃了它能够提出来攻击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对社会主义的最后的心理上的反对意见也就落空了。因此,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在原则上用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原则来代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原则,这种有计划的、自觉地管理的经济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有可能受到社会的自觉影响……即国家的影响”²⁾。

由此不难看出,希法亭所鼓吹的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通过和平的、改良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他第二阶段生涯中陷入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最为明显的表现。他的这种抹杀帝国主义矛盾、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观点,理所当然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事实上,距希法亭宣布、总结他的这种理论仅仅两年,就在1929年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他的这种理论已为历史发展所否定。

第五节 拉法格的经济思想

一、拉法格的生平和著作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年)是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列宁在谈到拉法格所处的时代时,指出,“在拉法格的身上结合着两个时代:一个是法国革命青年同法国工人为了共和制的理想进攻帝国的时代;一个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坚定的阶级斗争、迎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的时代。”³⁾

拉法格出生于古巴岛圣地亚哥(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的一个法国移民

1)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人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4—225页。

2) 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人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25页。

3)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6页。

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圣地亚哥的一个箍桶匠,后来经营一个不大的种植园,以后又从事葡萄酒买卖,他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小种植园主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来自法国波尔多的移民,他的祖母是圣多明岛上的一个黑人与白人的混血女子,他的外祖父则是该岛上的一个犹太人与法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外祖母则是牙买加岛上土居的印第安人。因此,费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46—1919年)在一篇纪念拉法格的文章中说:“他的血管里混合着三个被压迫种族的血液。”¹

拉法格是他父母唯一的儿子,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钟爱。他在当时圣地亚哥最好的一所学校受到启蒙教育。在9岁那年,他随父母回到法国,在故乡波尔多定居。他先后在波尔多和图卢兹上学,于1861年通过中学会考,进入巴黎大学医学院学习,准备当一名医生。在大学生时期,他参加了被称作“拉丁区之狮”的共和主义大学生团体,积极参加反对帝制的革命斗争。当时,在思想上他追随蒲鲁东主义,并同时受到布朗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1865年1月,拉法格加入了新成立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同年2月,他受巴黎支部的委托前往伦敦,向第一国际总委员汇报法国工人运动状况。在那里,他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这次会见,给拉法格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他从蒲鲁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起点。

1865年10月,拉法格出席了在比利时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大学生代表大会,回国后被反动当局开除了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学籍。1866年初,拉法格到伦敦圣巴托罗缪医院附属医学院继续学医,并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活动,同年2月,他当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3月,任总委员会西班牙通讯书记,不久又任比利时通讯书记。在伦敦期间,拉法格除了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外,他还经常到马克思家里作客,有机会直接聆听到马克思的种种教诲。在和马克思的谈话及傍晚的散步中,马克思曾不知不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传授给了拉法格。拉法格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年来我总是陪他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作晚间散步,就是沿着草地散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许还不觉得就把《资本论》第一卷的全部内容,随着他当时写的情节,一步一步地解释给我听了。每一次回到家里,我就尽我的能力把刚才听到的东西记录下来。”² 拉法格还特别提到一天晚上,马克思和他谈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情景。他说:“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一样,我生平第一次清

1 李兴耕:《拉法格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2 《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I》,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楚地看到了世界历史的逻辑,在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现象中,找到了它们的物质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惊讶,好几年后这一印象还留在我的脑海中。”^①1866年7月,拉法格在《左岸》周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斗争》一文,提出“阶级斗争是历史运动的条件之一”^②。这标志着拉法格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表明他已由蒲鲁东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拉法格在伦敦的三年间(1866—1868年),在与马克思一家的交往中,对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产生了真挚的爱情。1868年4月,他和劳拉举行了非宗教的结婚仪式,从此他们结成“生死与共的爱侣和志同道合的战友”^③。1868年7月,拉法格在圣巴托罗缪医院附属医学院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医院外科任助理医生。同年10月,他和劳拉一起回到巴黎,参与创建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任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在法国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拉法格携全家从巴黎迁居波尔多,在那里重建第一国际支部,任支部书记。1871年3月巴黎公社起义后,他组织波尔多工人声援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并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会见陷入重围的公社领导人。公社失败后,拉法格遭到反动当局通缉,他不得已逃往西班牙。在那里他作为第一国际的全权代表,积极参加了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1872年9月,拉法格作为国际新马德里联合会的代表和国际葡萄牙联合会的代表,出席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同巴枯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后,他协助恩格斯撰写全面揭露巴枯宁派阴谋活动的重要文献——《社会主义民主联盟与国际工人协会》。在海牙代表大会后不久,拉法格一家迁居英国伦敦。在侨居英国期间,他协助盖得为创建独立的法国工人政党,作了大量的思想、组织工作,促进了法国工人党于1879年10月在马赛成立。1882年4月,拉法格全家同盖得一起返回法国。回国后,拉法格和盖得共同领导了法国工人党,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并同党内的机会主义特别是以布鲁斯(P. Brousse, 1844—1912年)、马隆(B. Malon, 1841—1893年)为首的可能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1884年1月,拉法格在法国工人党举办的工人理论讲座上,作了题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的系列演讲,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也得到恩格斯的好评。恩格斯在看了拉法格的演讲稿后,认为他叙述得“极其引人入胜”,并指出,“只要他更加注意一

① 《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② 李兴耕:《拉法格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③ 李兴耕:《拉法格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些理论上的问题(主要是对一些细节),那他就会成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盏明灯”¹。

拉法格为筹建第二国际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恩格斯的指导下,他同法国的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挫败了可能派等机会主义者妄图篡夺新国际组织领导权的阴谋,1889年7月,为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他起草了呼吁书和通知书,亲自主持了大会,并在大会上代表组织委员会致开幕词。根据大会决议,为组织1890年和1891年的五一节示威活动,他进行了大量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1891年11月,拉法格作为工人代表,当选为众议员。他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维护工人阶级的斗争。1892年5月,拉法格在巴黎地理学会大厅就共产主义问题,同“反社会主义联盟”创建人德莫连(E. Demolius, 1852-1907年)进行激烈的辩论,有力地驳斥了德莫连所散布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的谬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发展规律。1896年7月,拉法格出席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就土地问题作了发言。1899年6月米勒兰入阁事件发生后,拉法格强烈谴责了米勒兰的背叛行为。1900年9月,拉法格出席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发言中批驳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

拉法格在晚年,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在1908年法国社会党图卢兹代表大会上,既反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改良主义,也反对完全否定议会斗争的无政府主义。在1911年4月法国社会党圣康坦代表大会上,他批判了所谓“市政社会主义”的观点,重申了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拉法格从19世纪80年代起,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的论著,除有个别缺点和错误外,正如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费兰茨·梅林所说:“全部都属于那些有永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列。”² 他的主要著作有:《阶级斗争》(1880年)、《工人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1880年)、《法国工人党纲领绪论部分解说》(1883年)、《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勒卢阿-博利约的批判》(1884年)、《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的批判》(1884年)、《资本的宗教》(1886年)、《赞成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拉法格和德莫连之间的辩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118页。

2 引自《拉法格文选》前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892年)、《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回答让·饶勒斯》(1895年)、《财产的起源和进化》(1895年)、《交易所的经济职能》(1897年)、《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1903年)、《忆马克思》、《忆恩格斯》等论著和大量的通信、演说,以及他们夫妇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译成了法文,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1年11月25日,将满70周岁的拉法格和他的忠实伴侣劳拉一起,“怀着无限欢乐的心情离开人世”。他在遗书中写道:

“我的身体和精神都还很健康,我不愿忍受无情的垂暮之年接连夺去我的生活乐趣,削弱我的体力和智力,耗尽我的精力,摧折我的意志,使我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累赘。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我先行结束自己的生命。

“多年以来,我就决心不逾越七十岁这个期限,我确定了自己离开人世的时间并准备了把我的决定付诸实行的办法:皮下注射氢氰酸。

“我怀着无限欢乐的心情离开人世,深信我为之奋斗了四十五年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取得胜利。

共产主义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万岁!”^①

1911年12月3日,巴黎的两万工人为拉法格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人组织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出席了这一隆重仪式,各国的十多位代表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说,都对拉法格和劳拉一生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并对他们的去世表示深深的哀悼。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出席了这一隆重葬礼,并在演说中赞扬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强调从拉法格“著作中直接汲取欧洲工人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重要意义^②。

关于拉法格的经济思想,仅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概述。

二、拉法格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资本论》的反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

随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在19世纪70年代初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工人群众中得到了广泛而系

① 李兴树:《拉法格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6--287页。

统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法国统治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恐惧。那时出来攻击《资本论》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比埃·保尔·勒卢阿-博利约(Pierre-Paul Leroy-Bealilu, 1843—1916年)和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k, 1816—1901年)。他们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所谓的“批判性考察”,并吹嘘在他们的批判和打击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像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倒塌了”^①。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狂妄挑战,拉法格于1884年9月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保尔·勒卢阿-博利约的批判》一文;接着,在同年的10月,拉法格在恩格斯帮助下,又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洛克先生的批判》一文,驳斥了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歪曲和攻击。

针对勒卢阿-博利约把资本看作从古就有的永恒范畴的看法,拉法格指出:“资本不是万古不变的事实,而是不久前才发生的暂时的现象。”^②他论证说,“野蛮人的石斧和鲁滨逊的手推车”,“虽然这些工具都是劳动产品,并能提高它们的拥有者的劳动生产率”,然而它们在野蛮人和鲁滨逊手中,只是“劳动工具,生产资料”,而不是资本,这正如同一个为自己衣食而种田织布的农民所用的是工具不是资本一样。^③不过,一旦农民不再为自己的衣食种田织布,而是“雇佣织工用自己的织机进行劳动”,并将织物出卖给商人,“也就是说,他的织机被他用来剥削雇佣劳动”,这样,他的织机就“变成了资本”^④。因此,“劳动工具所具有的资本形式并不是从史前时期就已存在并将存在到世界末日的必然的社会形式,恰恰相反,这种形式就像奴隶制、家庭生产和个人占有土地等等一样,只不过是生产和交换手段发展的暂时形式”^⑤。这样,拉法格就正确而通俗地阐明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且不是一种永久性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

针对勒卢阿-博利约顽固地坚持机器“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拉法格非常机智地反驳道:“鞭子曾被当作提高奴隶劳动生产率的劳动工具,但是鞭子也像机器和建筑物一样并不创造剩余价值,鞭子只不过从人类劳动中

① 《拉法格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② 《拉法格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③ 《拉法格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④ 《拉法格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⑤ 《拉法格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吸取剩余价值罢了。汽灯本身不会发光,虽然它从一定量的煤油中吸取了光,而且光度比普通煤油灯要亮。因此,只有活的人类劳动才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源泉,正像光是以燃油为源泉一样;机器和建筑物只不过为吸取剩余价值而服务。”¹恩格斯认为,拉法格驳斥勒卢阿—博利约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战文章,“不仅文笔非常好,而且内容也非常好”²。

三、拉法格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易所和股份资本作用的分析

拉法格在分析了交易所中种种有价证券(包括国债券、城市债券,信贷机构和产业公司的债券等等)的平均价格和平均股息率的变动情况后,指出“一切证券,不管属于哪一类,都是互相密切相联,互相影响的。……就像互相汇合的运河一样,大量的资本在这些渠道里流通着,力求达到一个平均利息率”³。当然,这种利率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静止不变,它会受到各种意外情况的干扰,但它在受到某种干扰后,会迅速得到“恢复并尽可能地接近平均水平,……而交易所经纪人就必然能支配强大的手段迫使各类资本整个地投入运动并使之互相推动,……推动大量资本以便使证券资本化,从而使之具有一个同利息率相近的股息率,这就是交易所的经济职能”⁴。

拉法格进一步指出,交易所为推动资本运动,它向资本家“提供了两个手段:现金交易和延期支付交易”⁵,以促使“资本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公司,从欧洲转移到美洲”⁶,以便资本家“不放过任何获利的机会”⁷。因此,“交易所的职能就在于使一切资本的利润率和利息率趋于平均水平,它是这样完成这些职能的,也就是当利息率偏离这一平均水平时,它就提高或降低股票、有价证券的价格”⁸。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延期支付交易的买卖双方,都利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切脱节现象,来改变价格,以影响投入这些商品生产的资本所取得的收益,使它接近于平均股息率。由此,拉法格认为,如果在利息率较为稳定,投在“交易所证券上的资本就像液体一样具有

1 《拉法格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2页。

3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4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5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6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7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8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极大的灵活性”¹，从而，交易所就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拉法格指出，对于交易所的这一“重要职能”，交易经纪人是“没有想到”的，同样，“他们也不可能”想到这个职能必然带来的社会后果和富有革命性的后果。²

拉法格认为，股份公司“是达到最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典型形式”³。他指出，投入国债和交易所买卖的有价证券的股份公司的资本，构成了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除了这部分巨额资本外，还有相当多的尚未采取股份资本形式的资本，处在农业、工业、商业和银行业中，但这部分资本，也会受到交易所发行的证券的影响，围绕着由交易所证券形式流动的巨额资本所决定的平均利润率而波动，而且这些行业还会不断地转化为股份公司。这正如艾米尔·贝列拉(Émile Pèrcire)所说：这股“交易所的投机旋风”，“迟早要把全部资本主义财产吞没”⁴，拉法格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公债，股份有限公司，一句话，其股票和证券在新旧大陆的交易所里买卖的所有企业，形成一个连通器，里面来回流动着大量不知是谁的、不分国籍的资本。”⁵

四、拉法格通过对垄断组织托拉斯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演进到垄断阶段的一些重要特征

拉法格是最早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现象、揭示资本主义演进到垄断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1896年12月所撰写的《驳对卡尔·马克思的批评》一文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他写道：“自由和竞争所引起的机器工业会吞食掉自己的生育者，就像某些昆虫一样，它们从卵中孵化出来后就吞食自己的母亲。竞争越是自由地展开，它就越会缩小自己的活动地盘，限制互相竞争的工业家和商人的入数。竞争使商人和工业家破产，把他们从有限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内赶出来，只留下一些巨头，而这些巨头最终又会联合起来。”⁶ 竞争一旦“摆脱了羁绊”，就会创造出“巨大的垄断组织”，从而创造出“无比巨人的垄断”⁷。拉法格进一步指出，

1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2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3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4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5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8页。

6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7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在那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正在走向垄断”取消“经济自由的社会”¹,原来在这个社会里“自由和竞争”这两个“伟大的神将成为过去,就像希腊的宙斯和罗马的丘必特已经成为过去一样”²。

到1903年4月,拉法格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这一专著中,明确地论述了由于资本和生产的大量集中,资本主义经济已演进到一个由垄断组织占统治地位的“特殊阶段”。他指出,随着垄断组织托拉斯的产生和发展,“首先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所拥有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资本。资本以前所未见的惊人规模大量集中,单是这一现象本身就是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已演进到特殊阶段了”³;这就是说,那时的“资本主义正在演变到它的最后阶段”⁴。在这个阶段,垄断组织托拉斯用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提高了雇佣劳动者的生产率,同时又加速了财富的集中,从而孕育着经济危机和革命风暴的到来。拉法格认为,托拉斯就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最近四十年来发生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和科学的现象都退居第二位了”⁵。

拉法格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这一专著中,不仅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已演进到了垄断阶段,他还着重论证了资本主义演进到垄断阶段的一些重要特征:

首先,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形成了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垄断组织。拉法格依据当时的统计资料指出,到1903年1月1日为止,美国“已有七百九十三家托拉斯,其中包括四百五十三家‘工业托拉斯’和三百四十家地方的和自然力的垄断组织,后者包括自来水公司、瓦斯和电灯公司、城市铁路公司、电报电话公司”⁶。不仅如此,它们还在“各种公司的名义掩盖之下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⁷。而且,那时美国的各托拉斯还“倾向于结合为一体,力图建立一个囊括全国一切生产部门的组织”⁸。因此,拉法格认为,“大托拉斯都对较小的托拉斯的行政管理施加影

1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2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3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页。

4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

5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6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7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8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230页。

响。由于在托拉斯的理事会里几乎总是碰到同一伙人,这就证明已经产生了一个资本主义总指挥部了;这个指挥部力图使美国全部有组织的生产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¹¹。

其次,工业和银行联合起来,形成了金融资本和少数金融资本家集团的统治。拉法格在论述银行在资本集中方面所起的作用时,写道:“今天,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中去。不断把资本集中起来的银行,只有把这些资本贷给工商业才能有利可图;有时银行也直接参与工厂商业的活动。”¹² 由于托拉斯体系必须通过银行的统一组织将工业联成整体,由此形成了由少数人控制的联合银行和银行同盟。这种银行同盟“使资本主义总参谋部易于组织其中央生产管理机构,这里面就包含着托拉斯体系的趋向”¹³。在拉法格看来,工业和银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结合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积累的资金已不能满足建立工矿企业的需要,因而工矿企业要依靠银行提供必要的资金。另一方面,银行集中了国家公债所吸收不了的、在小型工业中找不到市场的资金,为了养利生息,它们也得把资金贷给大型的工业公司”¹⁴。拉法格认为,“托拉斯之所以能够组织和扩展自己的大企业,是因为它们拥有雄厚的资本。这就是说,托拉斯必须以资本的高度集中为前提”¹⁵。因此,“托拉斯的组织者在筹建银行托拉斯的金融集中化过程中起了强有力的作用。比如,皮·摩根的公司加入三个银行集团,而石油托拉斯则加入两个银行集团。托拉斯的利益同银行利益溶合在一起”¹⁶。

据拉法格统计,在20世纪初,美国793家托拉斯拥有的资本总额已超1000亿法郎,但支配这1000亿巨额的“金融资本家人数”,却少得“令人惊讶”。¹⁷ 他指出那时的美国金融资本家们,组成了五个“著名的金融资本家集团”,即“摩根集团、古耳德-洛克菲勒集团、哈里曼-库恩-罗比集团、万德比尔特集团和宾夕法尼亚集团”¹⁸。就是“这五个集团的金融资本家们,在各种公司的名义掩盖之下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

¹¹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

¹²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¹³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¹⁴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¹⁵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¹⁶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页。

¹⁷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¹⁸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他们从铁路、银行、煤、矿场、铁、铜、银、金,以及钢、粮食、肉类等等的经营中攫取收益。所有美国的农业生产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都向他们纳贡”¹。

第三,托拉斯不仅统治着国家的经济领域,而且使人民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受它的控制和影响。拉法格指出,像摩根、洛克菲勒等集团的垄断资本家“也兴建教堂和创办大学,他们把数以百万计的款项赠给这些教堂和大学”,以使“牧师和教授都千方百计地设法迎合这些富豪的愿望”²。那些作为社会舆论工具的报刊、电台、通讯社等也都掌握在这些富豪手中,成了为“资本家的利益制造社会舆论”³的工具。在美国控制着托拉斯的金融资本家们,还“拨出成百万元的巨款用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互相竞争的选举上”⁴;政客们的“贪污受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而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⁵;以致“同一伙金融资本家既可出钱支持民主党,又可出钱支持共和党。摩根财团和万德比尔特财团都不必屈尊争任各种政治角色,而宁愿像耍傀儡戏那样把线牵在自己手里,指挥着参议员和众议员、部长和总统。他们在那个有形的、但却是纸上的政府之上组织起一个无形的、却是真实的政府。宾夕法尼亚矿场的矿主,起初曾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矿工罢工时期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调解建议,但是后来摩根出来一说话他就接受了。这件事最好不过地证明:的确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权存在”⁶。

第四,一小撮金融资本家不仅剥削本国人民,而且把手伸到全世界,各金融资本家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竞争。拉法格指出,“北美石油托拉斯和掌握在路特希尔德手中的俄国辛迪加分别在东西两半球进行剥削。这两个托拉斯根据共同协议规定煤油的价格”⁷;洛克菲勒集团组织起来的海洋运输托拉斯,“给法国的海运业务规章造成了混乱”⁸;美国的烟草托拉斯确立了在本国的“全能统治之后,又使自己的活动越过大西洋,进入了英国。英国人为了与之抗衡,组织了反抗托拉斯”⁹;美国的玻璃托拉斯“已经把比

1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2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3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4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5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6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7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8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9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利时的许多玻璃工厂买到手了”¹。美国的金融资本家依靠“投机倒把和玩弄交易所的把戏”，把他们在国际竞争中所控制的资本，“输入欧洲用以剥削欧洲的工业”²。

第五，由各个大金融资本家组成的资本主义总司令部不仅管理和控制着全国的财富，而且还操纵着国家的对外政策。拉法格指出，那时的美国金融资本家，正在“准备搞泛美联邦，同时提出包含侵略野心的门罗主义”³，从而“促使政府摒弃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政策。把政府推上帝国主义和掠夺殖民地与市场的道路”⁴。那个“资本主义司令部为了销售其商品以谋取利润，准备像阿梯拉⁵那样用火与剑毁灭世界”⁶。

以上，拉法格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演进到垄断阶段及其特征的系统分析，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刚刚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候作出的，它比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还要早7年。这充分表明拉法格是一位目光敏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五、拉法格关于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以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论述

拉法格在《财产的起源和进化》一书中，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了财产的起源及其在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后，指出，“从史前期的简单的和粗糙的共产主义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将回到复杂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当资本主义的文明消灭了财产的私人性质之后，就为共产主义准备了因素”⁷；并认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由文明民族的这种革命的压力中产生出来”，并且“只能是国际的”⁸。他说：“国际的共产主义，像母腹之内的婴儿，在现代社会里成长和运动。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变（其到来的时机是不可预料的），将打破那隐藏它和束缚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于是它就降生

1.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2.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3.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4.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5. 阿梯拉(Attila, 约公元406—453年) 匈奴帝国国王(公元433—453年)。在他统治的极盛时期，匈奴帝国拥有从里海至莱茵河之间的广大地区，东西罗马帝国均被迫纳贡。阿梯拉以残暴凶狠著称，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原编者注（《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6.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7.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8.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下地并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形式确立起来。”¹¹

后来,拉法格在《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书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因垄断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财产非个人化”倾向。他指出,“股份有限公司割断了连接所有者及其财产的最后纽带,使财产非个人化”¹²;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股份有限公司,“重新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归拥有若干股票证券的集团所有的集体财产,这一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所有制完全没有用处”¹³。随着托拉斯体系的扩大和发展,更“明显地证明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毫无用处的,把资本家阶级的寄生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¹⁴。拉法格认为,托拉斯的活动家们虽“没有人类的同情心”,他们在“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和剥削工人时毫不感到内疚”,“不管他们是否自觉,是否违背他们原来的意愿”,他们“正在创造一种经济形式,人类的未来将会从这种经济形式中被铸造出来”¹⁵。拉法格满怀信心地写道:“通过对托拉斯体系的研究,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理想得到了新的信心。他们可以更加坚定地确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不论是牧师的祷告,还是经济学家的虚构,或者政府当局的欺骗和镇压,一分钟也延迟不了社会危机的到来。这种社会危机将使被剥削者通过猛烈的进攻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寡头统治。”¹⁶“托拉斯体系正在从人员和事件上为这一巨变准备条件。”¹⁷

尽管托拉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准备了因素”和“条件”,但拉法格认为,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夺取“全国政权”;其二,是对资本实行“经济上的剥夺”¹⁸。而这两个条件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创造出来。他指出,国家机器主要是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断头台等暴力机关所组成,因此,无产阶级不可能和平地夺取政权和剥夺资本家。他“号召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暴动”夺取政权,强调无产阶级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时才能获得解放”,“人类社会只有用炸毁对它已变得过分狭隘的经济

11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12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13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14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15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16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17 《拉法格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18 拉法格著:《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页。

形式的方法才能发展”¹⁾。

第六节 卢森堡的经济思想

一、卢森堡的生平和著作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年)是波兰、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女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著名领袖与理论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她于1871年3月5日生丁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扎莫斯城镇(当时被沙皇俄国所占领)。两岁时,卢森堡随家迁居波兰王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华沙。她的青少年时代即在那里度过。

卢森堡生长在一个有良好文化素养的,并不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她的父亲是一位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犹太木材商人,同时也是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她的母亲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犹太妇女,对子女的教育很注意,对五个子女中最年幼的罗莎更是关心。卢森堡从幼年起,就常听到父母关于政治的议论及其对波兰和外国诗人作品的诵读,因此,她很早就开始对政治与诗歌发生兴趣。1880年6月,卢森堡进入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学习。她爱学习,肯用功,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诗歌是她的特殊爱好。在当时华沙青年中爱好自然科学之风的影响下,卢森堡逐步摆脱了宗教影响,成为无神论者。1887年6月,卢森堡中学毕业后,便勇敢地踏上了革命征途,加入了波兰“无产阶级”党的青年组织,参加了秘密宣传工作,开始阅读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889年该秘密组织被警察当局发觉,卢森堡不得不偷越国境,逃往国外。从此,她开始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流亡生活。

1889年底,卢森堡流亡到瑞士苏黎世后,有幸结识了一批从俄国和波兰流亡来的革命者,其中与卢森堡关系最为密切、影响最大的是比她年长几岁的波兰同胞、波兰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利奥·约吉希斯(梯什卡)(1867-1919年),稍后,她不仅同约吉希斯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该党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而且她还与约吉希斯结为夫妻,并在政治事业中终生密切合作。1890年卢森堡进入苏黎世大学社会政治学系学习。她学习兴趣广泛,在头几年,她除了学习哲学和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统

¹⁾ 拉法格著:《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0页。

计学、社会学外,她还饶有兴趣地学习数学与自然科学;在语言学习上,她除了能流利地说波兰语、俄语、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外,还熟悉古典拉丁语;此外,她仍十分爱好诗歌,并经常写诗。卢森堡在该校学习的后几年,除了学习法学外,她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并着手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卢森堡在这一专题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在波兰的发展,从而阐明了波兰工人运动前进的道路。1897年5月1日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卢森堡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卢森堡在苏黎世大学学习的七年中,一直在注视和研究波兰、德国、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从未间断过革命实践活动,她经常出现在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各种集会上。在第二国际的历届代表大会和国际会议中,掌握多种语言的卢森堡经常给各国代表充当翻译和担任联络工作,得到大家的赞扬和爱戴。从1893年初起,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以及该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主编的卢森堡,直接参与了波兰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896年7月,卢森堡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正式代表,参加了第二国际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就波兰问题发表了动人的演说。这位青年无产阶级女革命家,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

卢森堡以优异成绩在苏黎世大学毕业后,于1898年5月即迁居柏林,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并担任《萨克森工人报》主编。同时,她继续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处于德国殖民统治下的波兰西里西亚、波兹南地区的波兰工人中从事工运工作。卢森堡到达德国后面临的主要斗争,是反对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卢森堡一开始就站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早在1898年6-7月间,她就开始致力于撰写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文章,1898年9月下旬,她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组连载批判伯恩斯坦从伦敦给大会寄来的一份《声明》,以卢森堡和蔡特金(C. Zetkin, 1857—1933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战略任务和策略路线的发言,严厉地驳斥了修正主义的谬论。她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讲,特别是她在各地群众大会上所作的多次演讲,深受工人的称赞和爱戴。但却刺痛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他们诬蔑她是“危险的煽动分子”,1904年1月,德国当局曾以所谓“褻渎”德皇威廉二世的罪名,判处卢森堡三个月监禁。在这场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卢森堡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

第二国际著名的左派领袖。

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大好形势感召下,卢森堡和几个波兰革命者一起,偷越德、俄国境,于12月底,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华沙,亲身参加和领导波兰王国地区的革命运动。1906年初,波兰各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革命火焰震撼着沙皇的殖民统治。在这场斗争中,卢森堡出生入死,经常出现在斗争的最前线,进行组织和宣传鼓动,被工人群众称赞为“革命之鹰”。当革命转入低潮时,于该年3月初,她和她的丈夫利奥·约吉希斯一起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于同年6月底以就医为名,交保证金获释。同年9月,卢森堡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下,从芬兰转道汉堡回到柏林。在同年9月下旬,卢森堡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就群众罢工、工会和党为题作了发言,并到处介绍“俄国的斗争方法”,受到工人群众和革命左派的欢迎。1907年5月,卢森堡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她第一次会见了仰慕已久的列宁。在1905年革命时期,卢森堡虽在民主专政问题,建党问题和农民等问题上发表过与列宁不同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看法,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尤其是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她是拥护列宁的主张的。在这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完全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错误。

1907年底,卢森堡接替希法亭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任教,先讲授政治经济学,后又讲授国民经济史,直到1914年才离去。在此期间,她除了讲课、研究经济理论、撰写经济学专著外,还积极投入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1907年8月,卢森堡出席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战争和革命问题上,她驳斥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并和列宁一起对倍倍尔决议案提出了原则性修改和补充,从而制定了对待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正确路线。以后,又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1910)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上,卢森堡和列宁一起团结战斗,使这两次代表大会都通过了重申斯图加特决议精神的反战决议和反战宣言。1913年10月3日,卢森堡在柏林作题为《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演讲。1914年2月,她又在法兰克福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演讲,德国反动当局曾以所谓“反战鼓动”的罪名,悍然判处卢森堡徒刑一年,但未实行拘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卢森堡仍一直在各地继续作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演讲。1914年6月29日至7月4日,柏林资产阶级法庭制造了控告卢森堡“侮辱德国军队”审判案。在敌人法庭上,她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她骄傲地阐述了自己的正义斗争,严词驳斥了所有诬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把敌人推

上了被告席,斥责了德国反动政府是真正的战争罪犯,愤怒控诉和揭露了德国统治阶级推行军国主义、进行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欺骗群众充当炮灰的种种罪恶。许多群众也来证明德国士兵受虐待的情况,法官弄得手忙脚乱,只得无理宣布“延期审判”。

1911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交战国的社会党首领们,已堕落成可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代表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投了反对票)。对此,卢森堡愤慨地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一具僵尸。”^[1]

当夜,卢森堡在自己寓所召集梅林、利奥·约吉希斯等左派领袖讨论当前局势,决定进行有组织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决定出版定名为《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刊物。卢森堡担负了组织革命左派的重任,向全国各地拍发了邀集左派组织会议的数百份电报,还为筹备出版刊物和在群众中开展反战宣传积极活动。1915年2月18日,卢森堡以所谓“叛国罪”被反动当局逮捕,被判一年徒刑,囚于柏林巴尔尼姆妇女监狱。4月,她和梅林等筹备的《国际》杂志出版。从此,团结在该杂志周围的德国左派,被称为国际派。此后,卢森堡在狱中不断为该刊撰稿。1916年1月,德国革命左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斯巴达克派”,在狱中的卢森堡还为该组织拟定了行动纲领——《国际社会民主党任务的指导原则》。1916年2月18日,卢森堡刑满出狱,她不顾因狱中的折磨而体弱有病,又立即站到了斗争的前线。在这一年的五一节“斯巴达克派”领导了全国各大城市工人集会和游行示威。卢森堡和其他左派领袖,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挡,参加了柏林市中心广场的反战示威游行,并发表了满怀激情的演说。1916年7月,卢森堡再度被捕入狱,先囚于柏林巴尔尼姆妇女监狱,后移至弗龙克要塞监禁,最后又转到布勒斯劳监狱。在这两年多十分艰苦、疾病缠身的监狱生活中,卢森堡仍坚忍不拔地为“斯巴达克派”撰写了许多传单,并为该派的地下刊物撰写政论、书信等文稿。1917年11月,卢森堡在狱中热烈欢迎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号召下,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1918年11月初,基尔港水兵起义,首先在德国土地上升起了革命红旗。11月7日夜,起义者从布勒斯劳监狱中解救了卢森堡。11月9日,柏林的工人、士兵起义,占领了整个柏林,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帝制被推翻;但革命领导权却被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首领篡夺,成立以艾伯特(F. Ebert, 1871—1925年)、谢德曼(P. Scheidemann,

[1] 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页。

1865—1939年)为首的所谓“人民全权代表”政府。“斯巴达克派”为了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立即创办了《红旗报》,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11月10日,卢森堡来到柏林,和其他“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人一起,负起了领导这一革命的重任。11—12月,卢森堡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艾伯特—谢德曼政府的反动实质,号召推翻这个政府,废除资本统治;宣传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斯巴达克派”领导人总结了历史经验,于1918年12月30日到1919年1月1日,在柏林召开了建党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在这次建党代表大会上,卢森堡作了“我们的纲领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她明确指出,“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去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从而“使社会主义成为事实和行动,把资本主义连根拔掉”^①。在1919年1月上旬,为了反击反动势力的全线进攻,卢森堡参与发动、领导了推翻艾伯特—谢德曼反动统治的柏林工人大罢工和武装起义。起义失败,1月15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捕,当日被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残酷杀害。列宁在获悉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的消息时,怀着极大的悲愤写道:“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下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去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②

卢森堡战斗的一生,虽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革命之鹰”。她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她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著,其中包括几部大型著作、数百篇论文和政论,以及大量的书信。1970—1975年,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曾出版过《卢森堡全集》(1—5卷);我国三联书店在1959年和1962年曾出版过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国民经济学入门》等,1984年和1990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过《卢森堡文选》(上、下卷),198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在卢森堡的论著中虽然存在一些错误,有些甚至是严重错误,但总的说来,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宝贵遗产的一部分。列宁认为,“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③。

关于卢森堡的经济思想,仅就以下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概述。

① 引自程人乾《卢森堡》,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0—181页。

二、卢森堡站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捍卫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卢森堡不仅早在1898年9月就发表文章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不仅在历次党的国际会议上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分子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而且,她在1899年4月最早出版了系统批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专著——《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因此,费·茨·梅林称她“站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列”^①。这里,仅概述以下几点:

(一)针对伯恩斯坦“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个公式,揭示了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实质。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在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所表述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斯坦自己最中肯地、最精确地表述了他的见解,他写道:‘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②卢森堡认为,“只有最终目的才构成我们社会主义斗争的精神和内容,并使这一斗争成为阶级斗争,……在建立一个未来社会之前必须先……夺取政权”^③。他向伯恩斯坦针锋相对地提出:“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说来就是一切。”^④卢森堡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没有比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更加实际的问题了。”^⑤它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⑥。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最终目的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要不顾风吹浪打使之实现”^⑦。而伯恩斯坦却一开始就“为了运动放弃了最终目的,但没有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社会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那么他的结局就必然是连运动本身也一起抛弃掉”^⑧。

(二)针对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问题”总标题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

①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⑤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⑥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⑦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⑧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

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于1896—1897年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信用的扩展、垄断组织的出现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等,发表了系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文章,“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灭亡本身”^①。对此,卢森堡驳斥了伯恩斯坦的有关论点,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作了解释。

首先,针对伯恩斯坦关于信用的扩展增强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周期性危机已不可能出现的论点,卢森堡着重指出信用虽然起着“平衡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对立关系,消除或缓和它的某种矛盾,因而在某一点上把束缚住的力量解放出来”的作用^②。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信用却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1)“加剧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2)“加剧了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3)“加剧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4)“加剧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③。总之,“信用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复制出来”,并“加快了它走向自己灭亡(崩溃)的速度”^④。

其次,针对伯恩斯坦关于企业主联合组织对生产进行调节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的论点,卢森堡指出,卡特尔的经济目的和作用只是力求在一个部门内清除利润分配上的竞争,如果把它扩大到一切重要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随之消失。同时,为了提高国内市场上的利润率,卡特尔通常还把国内的闲置资本用之于国际市场的生产,这就会加剧同外国资本及其卡特尔组织的竞争,从而导致国际市场出现更大的无政府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卡特尔同信用一样,也是一一定的发展阶段,它们归根到底只能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加剧,使它的一切内在矛盾暴露出来并趋于成熟”^⑤。

第三,针对伯恩斯坦关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否认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论点,卢森堡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解释。她既指出了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进程中恰恰起着技术革命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旧的、稳固的、深深扎了根部门应

①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③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④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⑤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4页。

用新的生产方法;另一方面,建立一些新的、还没有被资本所利用的生产部门”¹,从而使中小企业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技术革命的先锋作用”²。同时,她也阐明了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地逐步走向灭亡,“而是表现在:第一,在旧的工业部门中,企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本额逐渐增加了;第二,小资本独立地利用新工业部门的时间越来越快了。因此,就个别小资本来说,生存期间越来越短,生产方法和投资方式的变动越来越快。就整个阶级来说,社会代谢越来越快”³。因此,那种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中,中小企业将沿着直线逐步走向灭亡的观点,当然是错误的,而伯恩斯坦用中小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来证明大企业增长的趋势是微不足道的,并由此得出否定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结论,那更是错误的。

(三)针对伯恩斯坦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作“纯粹的思维的构想”的论点,卢森堡不仅解释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而且揭示了劳动价值论与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断然地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这表明“伯恩斯坦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一窍不通”⁴,他根本不懂得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卢森堡写道:“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它不存在于马克思的头脑中,而存在于商品经济中。它不是想像的东西,而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⁵只要“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体系有几分了解的人,不用多说就会明白,如果没有价值规律,整个体系就完全不可理解,或者具体地说,如果不了解商品和商品交换的本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它的种种联系就必然是一个谜”⁶。马克思正是有了劳动价值论这把“有魔力的钥匙”,才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从而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不仅看到自然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⁷。

伯恩斯坦在劳动价值论上与马克思的对立,这表明伯恩斯坦完全依附于唯心主义历史观,说明他是把社会主义本身从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变成一个抽象的“原则”。卢森堡正确地看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他的

1.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2.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注2。

3.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4.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5.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6.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7.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他写道：“正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像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①

三、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的理论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是在她的《资本积累论》以及被称作该书续篇的《反批判》（即《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这两本著作中阐述的。这是卢森堡的两本主要经济理论著作。她在这两本著作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曾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和争论。这里，仅就以下三点，作一概述：

（一）卢森堡撰写《资本积累论》和《反批判》的动因。卢森堡在向群众作宣传、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就已注意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通俗化问题。1907年，当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校为讲授政治经济学而准备讲稿时，就准备编写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入门书。1911年，她在整理、修改讲稿，为《国民经济学入门》一书^②的出版作准备时，她遇到了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如何以该理论来说明帝国主义的问题。对于她当时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困难，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今年1月国会选举之后，我打算再着手把马克思的经济学通俗化。至少可以将原理那部分完成；但是，当时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困难。显然在具体的情况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以及分析它的客观历史限界，我感到没有什么把握。等到进行精密地考察之后，我就抱着这样一种见解：即此处不仅存在着说明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理论上牵涉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的内容，以及有关现今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和它的经济根源的问题。倘若我能成功地把这些问题给以科学的正确地处理，那么，这本著述将不仅是有理论上的兴趣，而且在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实际斗争中，也将具有一些意义。”^③当时，卢森堡被她遇到的问题所吸引，也被她“自己的假说所激动”^④。于是，她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② 卢森堡的这本《国民经济学入门》，由于撰写《资本积累论》，由于被逮捕、坐牢等原因，直到她逝世后，1925年才第一次于柏林出版德文版。

^③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页。

^④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如痴如醉地’写作,在 1 个月的时间内,她写了 500 多页,‘甚至一次也没有读过草稿’就把它交给出版商,这就是她的杰作《资本积累论》”¹。在写作《资本积累论》的 1 个月中,卢森堡像“一座喷发思想洪流的火山”一样,因此,在此书中“熔进了一系列拾而复弃的想法,悬而未解的问题和矛盾的意图”²。

1913 年初,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在柏林出版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以及甚至其他方面都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连卢森堡本人似乎也大为惊异”³。卢森堡认为,她的《资本积累论》遭到如此猛烈的攻击,是“相当不正常的”,例如,1913 年 2 月 16 日发表在《前进报》的那篇“评论”,“即使对于那些不大关心的读者来说,亦看出它的语气和内容都是惊人的;由于这本被批判的书都是客观的论述而且纯属理论上的探讨,不是针对任何一个活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所以就更令人惊讶。这还不够,这个中央机关报甚至采取了高压手段,反对那些发表评论肯定我那本书的人。这件事显得有点滑稽,而且是罕见的——对一个抽象的科学问题进行纯属理论性的研究,居然受到一个政党日报的所有人员的责难。”⁴1915 年,卢森堡为了回答各方面对她的《资本积累论》的批判,她不顾在狱中的艰苦条件和体弱有病,以极大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撰写了《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简称《反批判》)一书。这本“《反批判》虽然是对批判者作出的答复,但自成体系,可以说是一本单独的著作,因为它以无可辩驳的形式概括了散见于原著中的论点”⁵。但从该书所“使用的轻蔑口气和高度论战性可能部分地说明了卢森堡对于她遭到猛烈攻击感到的惊讶,但也一定同当时支持或反对战争的争论有关。由于当时严厉批评《资本积累论》的许多人——虽然不是全部——同时也是支持德国进行战争的人,毫无疑问,这使卢森堡在捍卫自己的理论主张方面产生一种自以为正确的感觉,从而使她看不到她的对手们提出的某些正确的论点。毕竟当时关在监狱里的是她,而不是那些批评她的

1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4 页。

2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74 页。

3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3 页。

4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页。

5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 页。

人”¹⁾。

从“批判”和“反批判”这两方面情况看来,卢森堡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撰写这两本书,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总的说来是由于帝国主义问题——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德国垄断资本结合的具体形式,才使一些表面上抽象的问题卷进激烈的政治争论”²⁾。因此,只有把她的经济理论研究,放到她当时所从事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整个斗争中,才能了解她撰著这两本书的真正动因。

(二)卢森堡在上述这两本书中提出了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责难。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是一种未完成的理论,它并没有解决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由利润动机支配的。生产只在它给资本家的钱袋带来‘纯收入’时才对他有意义,就是说,利润最终仍然要成为他的投资金额”³⁾;为了这个目的,资本家“不仅仅是或者不是主要地把那些剥削得来的成果用作个人享受的,而是要越来越多地扩大剥削本身。他把获得的最大部分利润重新变为资本,用以扩大生产。资本就这样不断增加,或者如马克思所称作的‘积累’”⁴⁾。要做到这一点,“单靠资本家的好意是不够的”⁵⁾,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其二是必须有足够的销售市场。卢森堡认为,这两个基本条件中的第一基本条件,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资本主义一旦已经运行”就能创造出“充足的劳动力”,它主要“通过使工人刚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以进行进一步的剥削和再生产”⁶⁾。“通过使中等阶级无产阶级化和使工人面对与机器的竞争来形成一支常备的工业无产阶级后备军。”⁷⁾

1)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2)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3)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4)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5)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6)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7)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页。

关于这两个基本条件中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卢森堡认为,仅仅依靠资本主义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对此,她作了如下的论说:

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即资本的不断积累,是与同样不断增长的社会需要相联系的”¹。那么,社会需要是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全部社会产品不外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类。在这全部产品中,必须有一部分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产品,“用于更换上一年度消耗掉的生产资料。这些是原材料、机器、建筑物,等等(马克思把它叫做不变资本)”²。这一部分产品可以在资本家相互交换中实现。另一部分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产品,用于满足工人及其家属生活需要,以便生产出供资本家需要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资本家都必须付给“必要的货币资本来购买他的劳动力——马克思称为‘可变资本’”³。这一部分产品是通过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交换来实现的。这一部分产品实现的数量,要受工人出卖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数量限制。此外,还有一部分产品以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形式存在,它是为了满足资本家及其仆从生活的需要。这一部分产品也是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实现的。为了实现积累,全部社会产品在扣除了以上三部分之后,还必须有一部分剩余,这是用于资本化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从整个社会来看,谁需要这部分产品并能购买它们呢?卢森堡认为,这就“接触到了积累问题的核心”⁴。他指出,购买这部分用于积累的产品的人,不可能是工人,因为“工人除了从他们的雇主那里得来的用于购买微量必需品的工资之外,并无其他手段”⁵;而且,他们用工资所能购买的那部分产品,亦“被压缩到社会允许的最低限度”⁶。按照前提,这部分用于积累的产品,也不能由资本家消费。如果资本家自己“穷奢极

1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2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3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4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5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6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欲”地、“像流水似地花费掉全部剩余价值”，那还有什么积累呢？卢森堡指出，“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所有资本家来说，把剩余价值作为奢侈品全部消费掉，这是彻头彻尾的精神错乱，经济自杀，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积累”¹⁾。此外，社会上还“存在着如公务员、军界人士、牧师、学者和艺术家等各种阶层”²⁾，他们能否成为消费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的主顾呢？如果从单个资本家看，当然是可以的，但从整个社会来看，这又是不行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有那些阶层在经济上只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的附庸。如果我们要问这些公务员、牧师、军官、艺术家等等从哪里获得他们的购买手段，我们发现，它的一部分来自资本家的钱袋，一部分来自劳动工资（通过间接的税收制度）。从经济上说，这些阶层不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消费者阶级，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购买力来源”³⁾，他们只可算作“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消费中的寄生虫”⁴⁾。最后，卢森堡还提出，“也许我们就像那个骑着毛驴的人还在拼命找他骑着的毛驴哩。也许资本家互为其余那部分商品的顾客”⁵⁾，不过“他们没有乱用它们，而是用它们来扩大生产，进行积累”⁶⁾。可惜，正当卢森堡接近问题的正确答案时，又立即离开了正确轨道，她针对自己最后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进行反驳道：“这样的解决办法只是把问题从这个时刻推到下一个时刻”⁷⁾。因此，即使用这个办法解决了当年的积累问题，并使生产得到了扩大，可是到明年又会遇到更为严重的同样的问题。如果每年都同样采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积累问题，那就会得到一个完全违背资本主

1)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2)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3)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65页。

4)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5)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6)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7)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义生产目的结论——“为生产商品而生产商品”。这样，“这些资本家们就成为了一种为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的糊涂虫了”⁴¹。

总之，卢森堡认为，仅仅依靠资本主义自身是无法解决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的。在她看来，这和马克思研究该问题方法论上的错误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扩大再生产时，像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样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是独一无二的生产方式；正是由于他在研究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时抽象掉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才使他无法说明资本积累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卢森堡写道：“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我们说，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只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的唯一代表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的。”⁴² 他认为，这种抽象，在分析简单再生产时是可以的。因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全部剩余价值都是由资本家消费的。在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本身，就排除了工人和资本家阶级以外第三者存在的。可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情况就根本不同了。因为如果在剩余价值中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由资本家消费掉，而是用作扩大再生产。这样，资本化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根据前提，即不能由工人消费，也不能由资本家消费；这样，在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的社会里，这部分剩余产品就无法实现了。由此，卢森堡认为，根据马克思理论的精神，研究资本积累时就“需要放弃《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前提”⁴³，即抽象掉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资本主义当作独一无二的生产方式加以研究的前提。而必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非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即必须把“积累作为一个总进程包括资本的新陈代谢和它的历史环境来进行研究”⁴⁴。因此，卢森堡认为，“马克思自己只是对总资本的积累提出了问题，但他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他首先选择那个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他分析的基础；但是，他不但没有把这个分析引导出结论，而且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停住了。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建造了一些数学模式，但当他正要开始论述它们对于

41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42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2页。

4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3页。

44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45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页。

社会实际可能性的意义和从这个观点出发检验它们的时候,疾病和死亡迫使他停止写作。很清楚,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就留给他的学生去解决了”¹。

关于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的理论的责难,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下)》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卢森堡的责难并不是以科学的分析为依据的,相反,是由于她曲解了马克思的理论。她实际上并不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在最抽象的层次上来探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再生产可以毫无矛盾地顺利进行。……由于私有制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得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只能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实现。由于矛盾通过危机有所缓解,从而使社会生产得以继续进行。”² 卢森堡实际上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浪漫主义者及民粹派一样,犯了看不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矛盾可以“缓解”的同样“错误”³。

卢森堡正是通过对资本化剩余价值实现的尝试探索,使她感到了“缺乏足够的需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障碍”⁴,从而使她成为现代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

(三)卢森堡在上述两本书中所论证的剩余价值的实现与帝国主义。卢森堡认为,研究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就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即把资本主义同它的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加以系统地研究,这是因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正是同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交流中实现的。她写道:“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地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资本家消费基金存而不论,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阶层。我们是说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

1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71页。

2 陶大镛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3 陶大镛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6页。

4 《新帕尔格雷夫大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阶层或社会阶级来实现的。”^①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交换,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超过自己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供给非资本主义阶层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以棉织品供给殖民地国家;另一种以超过自己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供给这些国家,如19世纪前半期英国以铁路建设材料供给美、澳等国。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情况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表明:“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之间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积累就无法进行。从这一角度看,积累本身是这些生产方式的解体与被同化。因此没有非资本主义的形态,就不可能有资本积累,正如这些非资本主义形态不可能继续同资本主义积累并存下去一样。只有在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解体的情况下,才能为资本积累提供条件”^②。卢森堡分析了资本积累过程的历史趋势,并得出结论说:“积累过程的趋势是普遍地以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积累过程力图在一切国家和一切部门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统治,使资本主义生产成为唯一的、绝对的生产方式。”^③然而,一旦这个“最后的结果达到”^④,积累就将停止,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扩大发展的停止,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历史必然性。所以“问题的解答,根据马克思来看,是在辩证法的矛盾中。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作为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保证的条件”^⑤。

卢森堡在自己的经济理论研究中,特别强调论述资本积累问题的重大意义。她认为,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和帝国主义的必然性都可以从这里得出。她写道:资本积累“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同我们时代最突出的事实相联系的东西: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典型的外部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获得殖民地、势力范围、投资机会而进行的竞争,国际贷款制度,军国主义,关税壁垒以及金融资本和托拉斯在世界政治中的支

①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6页。

②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引自《列宁全集》第59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二版,第420页。

③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引自《列宁全集》第59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二版,第420页。

④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引自《列宁全集》第59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二版,第420页。

⑤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9页。

配作用,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¹。“根据经验常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积累方法。”²

卢森堡有时把帝国主义看作一种积累方法,有时又把帝国主义看作一种政策,但在多数场合,她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时代或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看法。这里,仅就卢森堡把帝国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一基本思想,概述以下几点:

第一,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积累是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卢森堡把帝国主义与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视为资本积累发展的一种方式和一个历史阶段。她认为,为了实现剩余价值,顺利进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非资本主义经济,就需要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这就构成了帝国主义。卢森堡写道:“毫无疑问,关于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推断出来。”³她还根据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她说:“资本主义历史地生育并发达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中”,“这里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资本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⁴。这最后一个阶段所指的,就是帝国主义阶段。

第二,帝国主义导致“世界竞争”和战争。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⁵,这个阶段是在20世纪初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她还看到了帝国主义是和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她指出,资本积累“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⁶。卢森堡在分析国际借款制度时,还涉及到资本输出问题。她指出,资本输出是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控制输入资本的“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手段。她在分析资本输出时,还注意到了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的联系。卢森堡特别注意研究了“资本的世界竞

1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2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3 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4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90—291页。

5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4页。

6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64页。

争”导致军国主义、军备竞争与战争。她在分析现代军国主义的特殊性质时，写道：“最好地暴露今天军国主义的这一特质的，首先是军国主义在一切国家中因竞赛而普遍高涨，即所谓受本身的内在的机械动力的推动而普遍高涨。这是一二十年前还没有的现象。其次是日益临近的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命定的性质，……军国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疾病。”^[1]她在分析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推行军国主义政策时，又说：“今天，军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正在竞争中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的斗争手段；第二，它无论对于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第三，它是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2]正由于她注意到了帝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战争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联系，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卢森堡，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她要求各国工人政党要“竭尽全力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崩溃”^[3]。

第三，帝国主义时期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解放。卢森堡认为：“资本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换言之，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包含对迄今为止的资本落后国家——在那里资本原来实现它的剩余价值的——进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解放。”^[4]她指出，在这个阶段，通过“外债、铁道建设、革命与战争”^[5]，促进了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她说：“铁道网的发展，大体上反映了资本的人侵”，而“与铁道建设及军备有关的公债，并伴随着资本积累的一切阶段，如商品经济的人侵，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解放等而发生。”^[6]又说：“正如通过战争、社会危机和社会整个机构的破坏，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又代替了简单商品经济一样，现今在经济上落后国家及殖民地，也通过革命与战争，达到了资本主义的自主。革命在资本主义的解放过程中是必要的。落后国家必须摆脱它们陈旧的政治组织以及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残余，从而创立一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近代国家机构。”^[7]这里，卢森堡拘泥于资本积累的

[1]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2]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3] 《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4]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4页。

[5]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4页。

[6]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5页。

[7]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4页。

考察,着眼于殖民地附属国非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没有研究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斗争对于粉碎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从而导致了她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因此遭到了列宁的批判。^[1]

第四,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生命的最后阶段。卢森堡指出:“对于资本而言,积累的停顿意味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的矛盾行动的道理。”^[2]这说明卢森堡已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她还从她的资本积累理论作了论证。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向世界的扩展,非资本主义领域不断缩小,当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全世界,排除掉一切资本主义关系时,由于剩余价值的实现无法进行,资本主义就必然要崩溃,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她写道:“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道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的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它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普遍的经济形态。”^[3]

权威性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曾作过如下的评价:“历史研究使罗莎·卢森堡相信在古典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之间不存在‘中国长城’。这是因为政治的暴力行为对她来说只不过是经济进步的推进器(1951年版,第452页)。由于非经济因素在过去和未来的资本主义积累中重要性的认识更为清楚,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提出了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更为广泛的解释。资本不止生来就‘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以后更以同一方式生长,直至崩溃。因此,罗莎·卢森堡对帝国主义本质和特征的解释是非常广的。首要的是,一个非资本

[1] 参见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和《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567页、第846—860页)等。

[2]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33页。

[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76页。

主义体系的枯竭导致战争和革命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外部市场,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地区和基本的原材料。她认为,没有这一环境作为‘饲养场’,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资本积累论》的主要成就或许在于,在争论资本主义体系进一步发展还是崩溃时,把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放在一个中心位置。”¹

第七节 第二国际时期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与宣传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² 按照这种观点,第二国际就成了机会主义的同义词,第二国际时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断层。这样,第二国际时期的一大批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的历史功绩就被完全抹煞掉了。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因而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仅以卢森堡、拉法格、希法亭、考茨基等人为例,来概述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所作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在工人运动中播下了种子,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它传播的范围还很有限,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这种情况的根本改观,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³。这种新局面的形成,既是时代变化的反映,也是广大理论战士和一大批理论家创造性活动的结果。而第二国际时期理论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主要有:

第一,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重要论著,使之在世界各国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用德文写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造成语言上的障碍。为了使本国本民族的读者能够直接阅读、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点,第二国际各国党开展了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重要论著和文献的工作。例如,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遗稿,就是由考茨基于

1 《新帕尔格雷夫大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2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9页。

1905 - 1910 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名称整理、编辑、出版的,为完善和传播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针对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和理论战线面临的问题,需要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材料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向群众进行宣传 and 鼓动。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体系恢宏。要弄懂它,没有相应的理论修养是难以办到的,像《资本论》那样伟大的巨著更是如此。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比较通俗的形式,便于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并得到普及,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家们,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例如,考茨基 1886 年撰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基本理论,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并多次再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就是通过此书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他在 1892 年撰写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曾被译成 18 种文字,成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必备读物。又如,希法亭和卢森堡等人都在党校讲授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卢森堡的《国民经济学入门》就是当时讲课用的讲义;再如,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跨进法国议会门坎、并善于利用议会讲坛的雄辩家,曾被人们戏称为“社会主义的推销员”。

第三,当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泛滥时,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积极起来与其针锋相对进行论战,并显示出很强的说服力。在这方面,卢森堡表现得尤为出色,她为此撰写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集中批判了伯恩斯坦在经济和策略方面的修正主义观点。考茨基在斗争开始时,曾一度表现“沉默”和“动摇”,但随后即撰写了系统批判伯恩斯坦的专著——《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该书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演进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对此,第二国际时期的好几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垄断阶段的新现象,创造性地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在他们当中,从事这一工作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拉法格、希法亭和卢森堡。在拉法格于 1903 年所撰写的《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中,在希法亭于 1910 年所撰写的《金融资本》中,在卢森堡于 1912 年所撰写的《资本积累论》及其后所撰写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等论著中,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作出了“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为列宁创立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

由此看来,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家,应该说是处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中间环节的历史地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断层。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以及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
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第十六章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以及列宁主义的诞生

第一节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及其以后俄国的经济政治概况

俄国是从不发达的奴隶制进入封建农奴制的,原始公社瓦解时遗留下来的农民村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继续保存了下来。从19世纪开始,俄国的农奴制进入衰落和瓦解时期。这时的村社,在形式上虽是农民组织,实质上则是封建主用来统治和奴役农民的工具。在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与占统治地位的农奴制度发生了尖锐矛盾。农奴制经济的矛盾特别反映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上,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起义,日益频繁发生。据统计,1826—1861年,农民起义达1000次以上。在农奴制工场手工业中,也爆发了农奴的反抗运动。到50年代,特别是1853—1856年沙皇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溃败。这次俄国战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败性。这次战败,全国群情激怒,使原来已经危机四伏的农奴制,可能被立即爆发的革命所推翻。在克里米亚战败后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农奴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与其让农奴们自下而上爆发革命,还不如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农奴制的办法,来继续维持其统治。于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颁布了废除农奴制法令,其主要内容是:(1)宣布农奴获得人身自由,地主不得买卖和交换农奴,农民可以拥有动产和不动产;(2)宣布农民可以获得土地,但必须交付比实际地价高出两三倍的赎金,农民可先缴纳全部赎金的20%—25%,其余由国家垫付,在19年内按年偿还并付利息;(3)沙皇政府利用农村原有的村社组织,重新设管理农民的组织机构,将几个村社组成300—2000注册人口的乡,村社和乡名义上实行自治,实际上仍处于地方贵族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

从这次农奴制改革的内容来看,这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财物和金钱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掠夺,以致使广大农民在改革后无力独立进行农业生产经营,而成为“对分制农民”,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向地主、商人告贷,做零工度日。这样,农民从人身依附于地主,变成了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从而农奴制残余被保存了下来。因此,这次改革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致使农民暴动和骚乱事件有增无已。列宁指出:“农民同地主的利害冲突,像一条红线贯串着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①但是,这次改革,毕竟使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扩大了国内商品市场。改革后的地主经济也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巨额赎金则成为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1861年农奴制改革,成为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俄国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转变。列宁指出:“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几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由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②这次改革,使上层建筑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前进的一步”^③。但是,俄国沙皇封建君主专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沙皇政府奉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是以不危害沙皇统治为限的。

在这次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农业经济日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农村中产生了大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贫雇农和使用雇佣劳工、采用新式农具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富农。到80年代,占农户总数20%的富农在各个不同的州里占有耕地面积的29%到36.7%;而占有农户总数50%的贫农却只占耕地面积的33.2%到37.7%。同时,由于国内外市场对农业原料与商品粮食需要的逐年增多,有不少地主为了牟取高额利润,也采用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而使俄国的地主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从19世纪80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中逐渐开始占据优势。随着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俄国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这次农奴制改革后,大大加速了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到19世纪80年代末,在俄国各主要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已逐渐排挤手工劳动而占据统治地位,基本上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俄国的工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在1866—1890年间,欧俄大工厂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3页。

(100工人以上)的生产额,由20107万卢布增加到58797万卢布,差不多增加到了二倍;工人由23万增加到46万人。纺织、食品等轻工业生产,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地增长起来。棉织品的产值,由1860年的5000万卢布增加到1890年的2亿卢布。重工业增长的速度更快,1890年的煤产量比1860年增加19倍,钢产量增加3倍。这时,除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工业中心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和工业区。例如,顿巴斯成为煤炭工业和冶金工业区,巴库成为石油工业区,克利沃罗格成为铁矿工业区,波罗的海沿岸成为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区等。

随着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贵族地主阶级虽然仍旧是统治阶级,但它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发生了某种分化。许多地主不能适应新的条件和情况,很快花掉了赎金,出卖或抵押了自己的土地和庄园,从而使贵族地主阶级的领地减少了许多。而在俄国中部地区却保持了自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营的大领地贵族地主,是那些有爵位的贵族和服公职的上层官僚,成为俄国经济、政治上最保守的力量,那些大权在握的省长、总督、高级军官和大臣也都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他们还把持了参议院这个从农奴制时代保存下来的沙皇咨询机构。同时,也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型的地主,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势力比较小,在60年代改革中建立的地方自治局是他们的支柱,这个所谓的“白山贵族”集团企图同执政的上层分子达成协议,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在专制制度范围内建立代议制机关。其次,俄国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形成,昨天的商人、包税者、粮食贸易者、发财的乡村富农和高利贷者,变成了铁路、工业、银行的巨头。另外,从“被解放”的农民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也加入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队伍。这个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极其薄弱,缺乏阶级组织,同他们的经济力量不相适应,他们中的大多数追随“自由贵族”,希望在沙皇领导下继续推进有利工业化的改革和代议制改革。而实行贵族地主阶级专政的沙皇专制国家,也不能不在越来越人的程度上考虑这个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列宁在评述那时俄国政治制度的实质时,写道:“……沙皇就是统治阶级即大地主阶级的首脑,……这些大地主已经同大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准备用一切暴力手段来维护他们的垄断、特权和利润。”^①第三,俄国现代无产阶级形成,随着俄国工业革命的进展,俄国工业无产阶级亦随之形成和发展,这是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重要现象。到19世纪末,据可靠计算,在俄国的人口,属于无产阶级各阶层的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3页。

总数不下 2200 万人,其中农业雇佣工人,工厂、矿山及铁路工人,建筑工人,木材工人以及在家庭中工作的工人,约为 1000 万人。俄国无产阶级身受本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并且高度地集中在大企业,它的组织性和革命性很强,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第四,俄国居民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民。尽管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工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和新兴工业区。但是,俄国经济的发展程度仍远远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9 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仍旧是一个农业国,它的绝大多数居民还是农民。直到 1899 年,俄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五。俄国的广大农民群众,在农奴制改革时就被剥夺得一贫如洗,在改革后他们又遭受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与压迫。因此,俄国农民始终是 19 世纪 60—70 年代,即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俄国革命运动的主要动力。

从 1861 年农奴制改革起,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国社会的发展,明显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变中,新的和旧的社会力量的代表,都提出了他们各自的主张。俄国社会上层利益的代表者,一部分留恋传统村社世界的宗法权威与等级权益,害怕自由分化冲垮等级壁垒;另一部分则痛感村社的老传统阻碍资本积累与契约关系,主张仿效西方,实行市场经济与立宪政治。俄国社会下层利益的代表者,一部分醉心于传统村社世界的“平均”与“集体主义”,害怕资本主义与贵族沙皇的“占有”与“个人主义”破坏了宝贵的村社传统因素;另一部分则痛感村社传统成为专制与奴役之源,要求把人从村社中解放出来,发展为独立、自由的个性。他们之间在 19 世纪 70—90 年代围绕着村社的命运问题展开了论战,从而形成了四派,即官方正统派、自由派、民粹派和社会民主派,这就构成了那时俄国政治思想界的四个基本阵营。按照逻辑划分,这四个基本阵营可以相对应于贵族地主(官方正统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农民(民粹派)和工人(社会民主派)四个阶级。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首先爆发的革命运动,即由民粹派所发动的民粹主义运动。

第二节 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由于农村中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紧密结合,广大农民遭受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农村阶级

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斗争日益高涨。正是在这一斗争中,一批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青年知识分子冲上俄国的政治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力图通过发动农民来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从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以人民的“精粹”和农民的代表自居(当时所谓“人民”一般就是指农民),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到农村去(即所谓“到民间去”),身体力行地做发动农民的宣传鼓动工作,因此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或“民粹派”。他们鼓吹的这种民粹主义,是一种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社会主义,它是在俄国这样一个小生产者占有优势的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曾在俄国历史上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民粹派的基本思想、理论,就是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肯定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指出:“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鼓舞他们,唤起成千成百的人去向政府作英勇斗争的东西。”^①这种将俄国村社制度理想化的思想、理论观点,最早是由俄国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因此,民粹派把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他们的精神领袖,并不是偶然的,尽管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基本人不是民粹派。

民粹主义在俄国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在这半个世纪发展、演化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表现为革命民粹主义即旧民粹主义(19世纪60—70年代),70年代是俄国解放运动的高涨时期,革命民粹派思想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这个阶段,民粹派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他们在基本思想、理论上虽然是一致的,但在革命策略上却截然不同。

彼·拉·拉甫罗夫(И.И.Лавров, 1823—1900年)出身于俄国一个陆军上校军官的家庭,曾任彼得堡炮兵学校教员;他于1862年参加秘密革命团体“土地和自由社”,1866年被捕,次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在那里,他匿名撰写了对俄国民粹主义知识界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信札》。该名著成为70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圣经。1870年,他从流放地逃到巴黎,加入第一国际,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活动。1871年5月,他受公社的委托去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相识。1873年,他在巴黎创办了民粹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刊物《前进》杂志,他把人类的进步视为“具有批判头脑的个人”活动的结果;因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此,他被认为是民粹主义“英雄”和“群氓”理论的精神始祖。拉甫罗夫始终认为农民是俄国的革命阶级。他同其他民粹主义者一样,认为俄国农民村社的传统足以使它成为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他同时又认为,由于俄国农民仍然相信并期待沙皇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因此,他认为俄国人民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革命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以便将来经过人民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由于他的这种“长期宣传”的主张,而被视为“宣传派”的代表人物。

米·亚·巴枯宁(1814—1876年)这位被公认为国际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在19世纪70年代曾对俄国革命者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个阶段的巴枯宁,除了相信俄国群众本能的社会主义之外,还提出了俄国农民生来就具有革命气质的新观念。他劝告俄国的秘密团体不要谋求与沙皇妥协,而要摧毁这个专制国家。他认为农民始终反对国家这个最大的祸害,俄国到了任何乡村随时可能发生起义的程度。因此,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启发农民的潜在革命意识,唤起他们被沙皇制度压制了几十年的革命本能,立即组织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国家。他写道:“你们这些年青人,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1]那时的一些革命民粹派相信巴枯宁关于农民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准备起来反对沙皇专制的观念。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宣称:“为了人民得到政治解放,我们主张首先彻底摧毁国家,废除一切国家制度,包括它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军事官僚的和非军事官僚的、法律的、学术的、财政经济的设施。”^[2]列宁认为,这种革命民粹主义“永远”不能同“左的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3];并指出,“俄国革命的民粹派采取空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村社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否认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认为这是争取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设施的斗争”^[4]。由于巴枯宁的这种“立即组织起义”的主张,而被称为“暴动派”的代表人物。

彼·尼·特卡乔夫(П. Н. Ткачев 1844—1886年)既不同意拉甫罗夫“准备革命”方略,也不同意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的主张,他是民粹派中主张由少数革命者组织密谋团体和采取恐怖手段去夺取政权的代表人物。他认

[1]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2]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3]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1页。

[4]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页。

为,资本主义的火焰已经燃烧到俄国的社会制度,正在毁灭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石的村社原则。因此,他主张现在必须立即“敲起警钟”,毫不延迟地实行变革。他大声疾呼:“任何犹豫不决、任何拖延耽搁都是犯罪!”^①他针对拉甫罗夫派“准备革命”的方针说:“你们总是说准备,准备,这已经够了!”“革命家不是准备革命,而是干革命。”^②同时,他还针对巴枯宁派到民间去发动农民起来暴动的主张,指出群众的特点是惰性。因此,革命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集中的有战斗性的组织来进行。他主张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密谋团体,来摧毁沙皇专制国家,建立人民的新国家和以自治村为基石的新社会。特卡乔夫的这种主张,是从沙皇政府在俄国没有牢固的基础,与各个阶级的利益没有联系这一错误推测出发的。在他看来,俄罗斯国家是“悬在空中”的,只要组织训练少数几个密谋恐怖分子就可摧毁它。特卡乔夫的这种错误观点,曾遭到恩格斯的尖锐批判。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指出:“既然特卡乔夫……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开始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③

在民粹主义运动兴起时,拉甫罗夫派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但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组织农民起义、暴动的巴枯宁派对革命青年来说,比长期准备起义的拉甫罗夫派更能引起共鸣,尤其是特卡乔夫派的主张在一部分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但这两派在实践中也没有取得成功。这说明民粹派发动“到民间去”的运动,并没有把农民真正发动起来,反而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这一运动的失败,证明民粹派关于俄国村社农民具有“社会主义本能”的认识是幼稚的。在1875—1876年间,民粹派采取了比较实际的最低纲领,即争取土地和自由,并建立了“土地和自由社”,拟定了《土地和自由纲领》,出版了《土地和自由》杂志。该社提出的要求是:“土地成为耕者的共同财产;自由成为人人能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普遍权利。”^④该社的建立,标志着民粹主义运动由分散进入集中领导的阶段;同时,这个团体的名称也表明,它要继承并发扬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领导的“土地与自由协会”的革命传统。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页。

②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1页。

④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页。

在“土地和自由社”成立时,仅仅把采取个人恐怖行动作为次要的自卫手段,但随着沙皇的镇压以及由此产生的憎恨情绪的增长,恐怖行动愈来愈显得突出,尤其是在1878—1879年间,民粹派的谋杀行动接连不断,这在“土地和自由社”内引起了关于斗争策略的严重分歧,从而引起了民粹派的分化和蜕化。有些人因此离开“土地和自由社”,另外组成“土地平分社”,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大多数民粹派革命家则组成了“民意党”,他们活动的重心很快就转到个人恐怖行动方面。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沙皇政府出动全部军警进行镇压。于是民粹主义运动一度趋于沉寂。至此,60—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阶段,就告结束。

到19世纪80—9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自由民粹主义占了上风,从而革命民粹派也就演化成自由主义民粹派,即新民粹主义;旧的革命民粹主义“以发动农民进行反对现代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纲领,已经变成以在保存现代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去补缀和‘改善’农民状况为目标的纲领了”^①。尽管自由主义民粹派,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时甚至追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但他们仍然是代表农民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在新的条件下民粹主义对维护俄国社会生活的旧的封建基础却起了反动的作用。列宁要求把民粹主义的反动方面和进步方面严格区别开来。他指出:“民粹主义是反动的,因为它提出的措施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旧的生产方式上面,如禁止转让份地等等,……对民粹派纲领的这类条款当然必须无条件地反对。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些条款,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②

80—90年代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代表有尼·康·米海洛夫斯基(Н. 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1842—1904年),瓦·巴·沃龙佐夫(В. И. Воронцов, 1847—1918年),谢·尼·尤沙柯夫(С. Н. Южаков, 1849—1910年),尼·弗·丹尼尔逊(1844—1918年)。他们仍坚持俄国村社可以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断言剩余价值因找不到国外市场实现资本主义会自动垮台,鼓吹改良主义。他们90年代宣扬的这种自由民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严重障碍。

尽管各个阶段的民粹主义有着不同的代表人物,他们具有各种不同的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2页。

观点和主张,但列宁把民粹主义的一般特点,概括为具有这样三个特点的世界观体系:第一,“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第二,“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理想化等等”;第三,“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①。这种特点的民粹主义是一种矛盾的结合,其中既有社会主义的空想成分,同时又表达了农民的革命民主要求。列宁指出:“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②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与普列汉诺夫的革命活动

俄国近代的先进人物差不多都阅读或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们中的一些先进人士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知道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后,就受到了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那时,他们正在寻找改造自己落后祖国的武器。因此,他们迫切想把该书翻译成俄文。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两年,即1869年,当时第一国际的成员、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就已开始着手把它翻译成俄文,但他刚刚着手翻译便停下来,放弃了这项工作。1870年1月,侨居在伦敦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格·亚·洛帕廷(G. A. Lopatin, 1845 - 1918年)在得到马克思的允诺和帮助之后,便埋头从事《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工作,译出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二至五章,相当于该书德文第二版的第二至六篇。1870年底,洛帕廷被召回俄国,去西伯利亚营救流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而中断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译事。洛帕廷从伦敦去西伯利亚在经过彼得堡时,曾将已译好的这部分译稿留给了他的同志丹尼尔逊。丹尼尔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亲自帮助下继续并最终完成了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1872年3月由洛帕廷和丹尼尔逊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在彼得堡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论》外文译本。这个俄文版印数为3000册,这个印数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多的,很快就销售一空。马克思非常称赞这个俄文译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41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2页。

本。他在1872年5月28日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非常感谢，这本书装订得很美观，翻译得很出色。”¹《资本论》第二、三卷，也是由丹尼尔逊独自一人译成俄文的，第二卷于1885年在彼得堡出版，第三卷于1896年出版。由此，俄国就成为第一个用本国语言研究马克思主要著作的国家。

《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一出版，立即受到了俄国进步的知识、理论界的重视和欢迎。当时彼得堡的一些报刊发表满意而中肯的评论。例如，1872年4月20日《圣彼得堡消息报》的《书报评介》栏里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²又如，1872年5月号《欧洲通报》上发表了彼得堡大学教授伊·伊·考夫曼(И. И. Кауфман, 1848—1916年)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该文作者正当马克思的方法在德国被攻击为黑格尔式的诡辩时，却公正而客观地指出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则是“德国辩证法的”³。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大段摘录了考夫曼的文章后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⁴

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受到俄国知识、理论界如此重视和同情是有深厚社会原因的。当时俄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那时俄国知识、理论界对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一些人认为，由于俄国的历史特点和村社制度的存在，马克思依据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所揭示的经济规律不适合俄国，俄国可以村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避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那种悲惨情景。另一些人则拥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他们痛恨俄国的地上官僚专制制度，敬重马克思对各种经济关系本质的揭露。但那时，也有少数反动分子对马克思及其主要著作《资本论》进行了攻击。不过这少数反动分子的攻击，却在俄国的知识、理论界激发了一场论战。

1877—1879年间，在俄国报刊上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论战，参加论战的有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政论家。这场论战是由国家银行行长尤·加·茹柯夫斯基(Ю. Г. Жуковский, 1822—1907年)挑起的。他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78页。

2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注。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在1877年9月的《欧洲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一书》的文章,他在该文中把马克思描写成空想社会主义者,说他的理想是恢复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生产关系;他歪曲资本与利润的形成,赋予各经济范畴以超历史性质,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和永恒。针对这篇文章,出现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包括由尼·弗·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寄去的民粹派理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于1877年10月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卡尔·马克思在尤·加·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以及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尼·伊·季别尔(Н. И. Зибер, 1844—1888年)于1877年11月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对于尤·加·茹柯夫斯基先生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的若干意见》一文;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尼·契切林(В. Н. Чичерин, 1828—1904年)在《国务知识汇编》1878年圣彼得堡第6卷上发表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一文,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尼·伊·季别尔于1879年2月在《言语报》上又发表了《波·尼·契切林反对卡尔·马克思》一文,对契切林攻击马克思的观点作了反驳。

米海洛夫斯基在上述文章中,批判了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攻击,指出他的所有指责都不过是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马克思老调的重复;米海洛夫斯基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但他却否认这些经济规律也适用俄国。他一方面认为是“把逻辑力量同渊博知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¹;另一方面又不懂得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些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武断地认为,马克思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了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要求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的道路。在一个月后,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著名信件中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显然曲解了我的思想,“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²。马克思为此解释道:“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是一把万能的钥匙,由此可以把握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结果,相反,“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³。但对于东方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作了如下谨慎而原则的回答。他写道:“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

1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①

季别尔教授刊登在《祖国纪事》杂志和《言语报》上的这两篇文章,批判了茹柯夫斯基和契切林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的攻击,指出他们的许多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许多地方表明了他们的无知。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上,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遗产。他认为:“马克思在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只是改变了优秀的古典经济学家搞不清楚的那个错误的术语,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至于作为商品的劳动(马克思公正地称它为劳动力)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早就已经确定了的。”^②当然,季别尔没有看清楚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完成的革命变革,但他是坚决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同庸俗的辩护理论对立起来的。季别尔教授在这两篇文章中,还正确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实质,阐明了资本积累和集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马克思本人对季别尔教授的著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③季别尔教授在俄国普及《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上,做了许多工作。他还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批判了民粹主义,促使了一些俄国进步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原苏联学者卡拉达也夫和雷金娜对季别尔教授在俄国宣传马克思《资本论》原理的作用,曾作过如下的评述:“季别尔促进了在俄国先进的著作中树立劳动价值论,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的正确概念。所有这些,不仅对于俄国的著作来说是崭新的,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著作来说也是崭新的。当时,不论在哪个国家里,都没有像季别尔这样的马克思学说普及者和宣传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思想开始在俄国著作中的有系统传播,是同季别尔的名字分不开的。”^④当然,季别尔在领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科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② 引自卡拉达也夫、雷金娜著《经济学说史(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伟大十月革命)讲义》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④ 卡拉达也夫、雷金娜著,《经济学说史(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伟大十月革命)讲义》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43页。

思想时,并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

关于1877-1892年俄国报刊上围绕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所进行的这场论战的意义,我国学者马健行等曾作过如下的评述:“正当西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以沉默来扼杀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时,俄国的这场辩论无异于一道耀眼的闪电,它划破了乌云密布的夜空,使《资本论》的基本思想迅速在俄国的大地上传播开来,并最终于1917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① 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已在俄国开始传播,但在19世纪70年代,在俄国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是在19世纪8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与普列汉诺夫的活动分不开的。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俄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也迅速成长起来,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已开始觉醒起来,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在罢工运动的基础上,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已开始组织起来,在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就是俄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已明确提出了“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纲领。到80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1881-1886年,俄国共发生348次罢工,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885年在莫罗佐夫工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争得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厂立法。该工厂法规定,工厂主不得任意向工人罚款,所得款项也只能用在工人身上。工人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到80年代,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在认真探寻民粹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努力寻找革命真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其中有些人通过刻苦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俄国的社会问题。他们在总结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团体。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就是普列汉诺夫领导建立的劳动解放社。

格·瓦·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 1856-1918年)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功绩。他也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和著名的理论家。他一生的活动同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后来成为机会主义者,晚节不忠。

^①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普列汉诺夫于1856年12月11日出生于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小贵族地主家庭。他幼小时曾幻想当一名军官,早年学习军事,后来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在那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他走上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道路。1875年底,他同革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在彼得堡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1876年,各地的革命民粹小组在彼得堡建立“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1878年改称“土地和自由社”),普列汉诺夫成为该团体的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到1879年的7—8月间,“土地和自由社”在组织上发生了分裂。相当一部分民粹派分子,对于“到民间去”的方针失去信心,主张采取个人恐怖的策略,这部分人被称为“政治派”;另一部分民粹派分子则反对个人恐怖手段,坚持“到民间去”进行宣传鼓动的方针和策略,这部分人被称为“农村派”,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一派的主将。1879年9月,他同阿克雪里罗得(И. Б. Аксе́ро́в, 1850—1928年)等人重新建立了“土地平分社”,普列汉诺夫起草了该社的《宣言》。同年12月,该社又出版了由普列汉诺夫任主编的《土地平分》杂志。由于该杂志的印刷所被破获,从而警察当局加紧了对普列汉诺夫的追捕。1880年初,他不得不逃亡国外。从此,开始了普列汉诺夫侨居国外37年之久的流亡生活,在其流亡国外的头两年(1880—1881年),他作为“土地平分社”的领导人,在国外继续出版书刊,宣传民粹派的理论观点。

在1882—1883年间,普列汉诺夫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刻苦磨炼,使他从一个民粹主义者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自从流亡西欧以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系统学习和刻苦钻研,特别是1881年底至1882年初,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并结合他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和西欧工人运动的亲身体验,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两极分化情况,促使他对民粹派一系列观点的怀疑和动摇。到1883年9月,普列汉诺夫正式宣布同民粹主义决裂,并与过去“土地平分社”的成员查苏利奇(В. И. Ча́су́лич, 1851—1919年)、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在日内瓦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他们在成立《通告》中宣布:彻底放弃民粹派理论,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该《通告》写道:“土地平分社的旧同人现在改变了自己的纲领,就是要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单独政党,现在组成——‘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倾向彻底

决裂。”¹《通告》给该组织规定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最重要的著作以及适合不同修养程度的读者的原著译成俄文，用这种办法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且从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劳动居民的利益的观点来解释俄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²“劳动解放社”从1883年成立至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布解散劳动解放社为止的20年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列宁曾多次颂扬过它的历史功绩，称它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者”³；它为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深湛的理论知识、广阔的政治视野、丰富的革命经验”⁴；它“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奠定了基础”，“走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⁵。普列汉诺夫作为这个组织的主将，因此，在这个组织存在的20年间，正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革命活动的20年，也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普列汉诺夫在其一生活动的这个最光辉的20年间，为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他在俄国原来的民粹派革命家中，第一个站出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地批判了民粹主义，驱散了积压在俄国思想界上空的民粹主义阴霾，给俄国工人阶级指明了解放的道路，为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次，以普列汉诺夫为主将的“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俄文出版并运往国内发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普列汉诺夫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列宁指出：“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⁶在这些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第三，他和列宁一起于1900年12月创办了无产阶级报刊《火星报》与《曙光》杂志；在1901—1902年间，他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拟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写上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写道：“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需要和保证社会全

1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转引自高放、高敬增著《普列汉诺夫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2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转引自高放、高敬增著《普列汉诺夫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3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页。

4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8页。

5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5页。

6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9页。

体成员的福利,为了完成自己的革命,无产阶级应该自己掌握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使他们能够无情地排除走向自己伟目标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¹这些都促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在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了这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站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孟什维克,被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大会还委任他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的代表。第四,作为第二国际倡始人之一的普列汉诺夫,曾参加了第二国际从1889年创立到1914年破产前的历次代表大会活动,从1900年成立第二国际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起,长期担任执行局委员,他经常提出并坚持正确的主张,从而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第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不仅是第二国际前期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坚强战士,而且他在欧洲各国工人党领导人中间,也是最早站出来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宣战的伟大旗手。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斯坦的最时髦的‘批判’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做得完全正确。”²以后,他又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变种——米勒主义、经济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等。

普到汉诺夫及其所领导的劳动解放社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进步思想界寻求正确革命理论的杰出代表。列宁在总结这一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寻求正确革命理论过程时写道:“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³

在普列汉诺夫领导劳动解放社进行革命,在俄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俄国的彼得堡、喀山等许多地区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然而,无论是劳动解放社或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都还只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狭小团体,有些团体还程度不同地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它们都很少

¹ 引自《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²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³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5--6页。

联系工人群众,都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这样,在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克服劳动解放社和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局限,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并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统一组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领导俄国人民去推翻沙皇专制政府,进行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的肩上。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导俄国人民胜利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第四节 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大家知道,斯大林曾给列宁主义下过一个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这一定义,精辟地概括了列宁主义产生的时代及其历史根源,明确地揭示了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统治,使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日益激化并全面地暴露出来,它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第三,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

上述矛盾和斗争,使无产阶级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不断加强;使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而战争使帝国主义彼此削弱,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极有利的时机。这一切表明:帝国主义已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斯大林在阐明列宁主义产生的时代及其历史根源时,写道:“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准备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

^[1]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¹⁾。那么,为什么列宁主义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够发达、经济、政治都比较落后的俄国呢?

列宁主义产生在落后的俄国,这是由俄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民族条件造成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也过渡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但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更为发展和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俄国帝国主义除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俄国垄断资本与经济、政治中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紧密结合。在经济上,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在工业中占统治地位并有相当发展;另一个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封建剥削方法,与资本主义剥削结合在一起,在农村经济生活中占据优势。同时,许多垄断组织本身也具有半封建特征,常常采取封建性的管理方法和剥削形式。在政治上,俄国是沙皇专制制度统治,沙皇制度是贵族地主同大资产阶级相勾结的联合专政。由于经济中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和政治上的沙皇专制制度,使俄国帝国主义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另外,农奴制残余的束缚,使垄断资本感到国内市场狭小,极力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这样,沙皇俄国特别富于侵略、扩张的性质。第二,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受西方帝国主义的一定控制。由于俄国农奴制残余大量存在和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廉价的劳动力和工业品价格的昂贵,因而成为外国垄断资本获利的大好场所;同时,沙皇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也需要外国资本的支持。第三,经济技术上落后于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直到1913年,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还是农民。它的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7%,仅及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

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垄断资本和农奴制残余融为一体,沙俄帝国主义的利益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益交织一起,对内实行野蛮的专制统治,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是一个反动性、野蛮性、落后性和侵略性突出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二)当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那时,俄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特点,决定了俄国社会存在着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第一,在沙皇俄国,存在着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地主的、资本家的和民族的种种压迫和剥削。因此,无产阶级与垄断资本、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农民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内各被压迫民族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矛盾异常尖

¹⁾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5页。

锐；第二，沙皇俄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忠实同盟者，它任凭外国资本操纵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靠借外债维持沙皇制度的腐朽统治，因而，俄国劳动人民与西方垄断资本的矛盾非常尖锐；第三，沙皇俄国在与其他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和争夺中，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镇压世界的进步运动，充当了“世界宪兵”的可耻角色，从而世界被压迫民族同俄国帝国主义的矛盾，沙皇俄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由此，俄国成为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它孕育着即将爆发革命的一切客观条件。

(三)当时的俄国存在着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力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正在兴起一场深刻的人民革命运动。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俄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在大企业里，身受三重压迫，因而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组织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于1903年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因而俄国无产阶级有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同时，俄国无产阶级又拥有广大的农民同盟者。另外，当时长期处于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德国，由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加强而日益丧失其先锋作用。这些条件集中到一起，就使世界革命的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了俄国。

历史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站在世界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并在革命斗争中为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者创造出适合于时代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适应时代的需要，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承担了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并结合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由此，俄国就成了列宁主义、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故乡。

第五节 列宁的早期革命活动， 列宁主义诞生的标志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创始人、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1870—1924年)原姓乌里扬诺夫，于1870年4月22日诞生在伏尔加河岸辛比尔斯克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И. И. 乌里扬诺夫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他的哥哥А. И. 乌里扬

诺夫是革命民粹主义者,因参与刺杀沙皇于1887年被杀害。由于家庭的影响和对俄国人民苦难生活的了解,使列宁在少年时期就萌发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资本家阶级的革命思想,并且开始探索不同于民粹主义的道路。他虽然十分敬佩哥哥的英勇精神,但他已看到用恐怖手段同沙皇专制制度斗争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那时他曾说:“不,我们决不会走这样的道路。所要走的不是这样的道路。”^①

1887年列宁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辛比尔斯克中学,获金质奖章。同年,随全家迁居喀山,进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参加革命学生集会于同年12月被捕,后被学校开除,并被流放。一年后,列宁又回到喀山,加入了当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889年,列宁随全家迁居萨马拉。在那里,他通过了校外大学毕业考试,获得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考试委员会发给的一级毕业证书,并取得承办诉讼案件资格。在那里,列宁还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对伏尔加河流域的进步青年产生过很大影响。在那里,列宁还撰写过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专题报告,并在各地的秘密小组中进行演讲。从喀山到萨马拉这一时期,列宁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定了职业革命家的方向。

1893年,列宁到达当时俄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彼得堡,投入那里的革命活动,很快就成为俄国首都马克思主义秘密组织的领导人。1895年秋,列宁把彼得堡全市所有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起来,组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该“协会”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与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在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该“协会”便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雏形。同年12月,列宁被捕入狱。1897年初,列宁被判刑三年,流放西伯利亚。在监狱和流放期间,他利用通信等各种方式同马克思主义小组建立联系,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并从事写作。1897年底列宁撰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小册子,专门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和策略。他在该小册子中十分强调革命理论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一著名论点。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列宁进行了艰苦的科研工作,撰写了许多批判民粹主义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表明,列宁在那时已完成了从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

① 《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3页。

1900年,列宁流放期满获释后出国,在慕尼黑创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种全俄政治报纸《火星报》。该报为在俄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1902年1月,列宁以他在《火星报》上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为大纲,撰著了《怎么办》一书,于同年3月出版。在该书中,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只要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的谬论。列宁指出,经济派的基本错误是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无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列宁认为,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列宁这部名著,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先在布鲁塞尔举行,后移到伦敦继续举行)。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完成1898年3月在明斯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未能完成的建党工作。这次大会的最重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和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在讨论党纲时,经过激烈争论,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取得了胜利。大会通过的党纲上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个将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为党的基本任务的党纲。此外,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还规定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农村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把地主夺去的“割地”归还给农民等有利于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要求。在讨论党章时,围绕党章第一条,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组织严密的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在大会上,尔·马尔托夫(И. Мартов, 1873-1923)出来反对列宁的这一建党原则,他提出了一个机会主义的党章条文,主张任何人皆自行列名入党,党员不必参加党的组织,服从党的纪律。马尔托夫的这个条文由于得到了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以微弱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代表大会最后“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②。大会议程进行到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时,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火星派的变化。结果,在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的选举中,团结在列宁周围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从而列宁及其拥护者在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

① 引自李植耕《宏观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② 引自《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克(俄语少数派一词音译)”^①。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它指引了布尔什维克党沿着俄国争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道路不断前进。因此,布尔什维主义的形成,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对此,列宁后来曾写道:“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②

①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第十七章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第一节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研究

列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导俄国革命、实现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同自由主义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和制定党和俄国革命的纲领、路线,以及实施这一纲领、路线的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俄国的社会性质、经济关系及其演变趋势,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经济论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端的。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为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制定党和俄国革命纲领的过程中,不得不同敌视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斗争的中心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以及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市场和再生产问题。列宁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艰巨的经济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著,其中主要有:《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3年)、《论所谓市场问题》(1893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市场理论问题述评》(1898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等。在这些论著中,特别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继《资本论》之后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巨著中,围绕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这个中心问题,在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详尽地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全面研究和分析了俄国的经济与社会阶级结构,科学地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基础,完成了从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派的任务。

在1901-1913年间,列宁在准备、发动和组织领导帝国主义时代俄国第一次革命过程中,在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围绕着土地问题这一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经济研究,撰写了一系列的经济论著,其中主要有:《土地问题与“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6-9月和1907年秋)、《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1907年)、《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1908年)、《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1910年)、《“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1912年)、《论现政府的土地政策(一般的)问题》(1913年)等。在这些论著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揭示了俄国土地问题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了资本主义在农业发展中的规律,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

这里,我们仅就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关于市场和再生产问题,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在以下三节中,分别作一概述。

第二节 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分析

列宁针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的观点,根据大量事实分别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表现形式。

一、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列宁利用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弗·叶·波斯特尼柯夫(B. E. Постников, 1844-1934年)所著《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以及若干俄国地方当局所汇编的关于俄国19世纪80-90年代有关土地、牲畜、农具、雇佣劳动、农民生产水平和生活状况的大量资料,按照经济类型在对统计资料加以科学分类的基础上,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角度,即农民经济和地主经济,以及商业性农业三个方面,全面地阐明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1)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特征——俄国农民的分化

列宁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说,1861年农奴制度废除后,俄国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得到迅速发展,到19世纪末,俄国农民已处于商品经济的环境中,农民中的经济关系表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如:竞争,抢租和抢购土地,生产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落人

无产阶级队伍,并受到商业资本的盘剥;同时,在农民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如:租地、买地、农业技术的改进等等,都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矛盾形式。这说明,村社农民的经济关系与民粹派所说的恰巧相反,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最牢固的基地。

列宁认为,农民中一切经济矛盾的总和导致农民分化,农民分化过程意味着旧的宗法式农民的瓦解和农村居民新类型的形成。列宁强调指出:“旧的农民不仅在‘分解’,并且在彻底瓦解和消灭,被完全新型的农村居民所排挤。这种新型的农村居民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基礎。这些新的类型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即农业中的商品生产者阶级和农业雇佣工人阶级。”^[1]可见,农民分化是农业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重要因素。农民分化的原因是私有制下商品生产的矛盾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农民分化程度实际上也就是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志。

列宁还对农民分化后形成的农村中新型的阶级或阶层作了概括说明。^[2]第一种新的类型是农村资产阶级或富农,包括各种形式的商业性农业的经营者等等。其特点是:经营规模在多数情况下都超过了家庭劳动力和份地的范围,经常雇佣日工并对其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在俄国农户中所占比重虽小,约占15%~20%,但在农业生产上,却占绝对优势。第二种新的类型是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包括无地的或只有小块份地的雇农等等。其特点是:经营规模极为狭小,经济处于衰落状态,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甚至还比不上没有份地的工人。在当时的俄国,最典型的农村无产阶级是具有少量份地的雇农,他们约占农户总数的一半。介于上述两种农民新类型之间的是中农。他们的特点是:商品经济之最少发展,基本上自给自足;经济地位不稳定,不断地发生分化;爬到富农队伍的为数极少,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使他们沦为雇农,他们在当时俄国农户总数中约占20%左右。

在肯定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和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经济发展趋势是农民分化的同时,列宁还指出,俄国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独立发展,特别是农奴制的残余——工役制,起着阻碍农民分化的作用。这些因素的存在,不利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3]

[1] 列宁全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2] 参见列宁全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150页。

[3] 参见列宁全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158页。

(2) 俄国地主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改革后向资本主义的演化

列宁把俄国农奴制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经济结构作为考察的起点。他指出,俄国的地主经济在改革前是徭役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全部土地分为地主的土地和农奴的土地。农奴用自有农具耕种自己的份地来谋生。地主的剥削表现在农奴必须用自有农具为地主耕种土地,而劳动产品则全部归地主所占有,这种徭役地租是典型的封建地租。实行徭役制条件,除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把农奴束缚在份地上等等外,地主对农奴还必须保持有“超经济”的权力。否则,地主就不可能强制农奴在其土地上服徭役。

列宁指出,徭役制的主要基础虽然已随着农奴制改革而宣告破产,但由地主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可能一蹴而就。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如:庞大的雇佣劳动者队伍、地主农具代替农民落后的农具、企业化的农民经营组织等,所有这些条件只能是逐步形成的。第二,旧的徭役经济只是被破坏,并没有被最后消灭;地主手里掌握有农民份地的极重要部分:森林、草原、水池、牧场等等,农民还无法独立经营。所以,“超经济的强制”仍然存在。因此,旧的经济关系虽已崩溃,而新的经济关系又不可能立即形成,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是把徭役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两者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过渡制度。改革后俄国地主经济的特点,就是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奇妙结合。工役制是徭役制的直接残余,虽然形式繁多,但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只有自备耕畜、农具的农民业主才能承担的工役制;其二是,没有任何耕畜和农具的农村无产者也能承担的工役制。工役制向资本主义过渡,表现在:其重心由前一种工役制类型向后一种工役制类型转移。由于农民的分化和自然经济的日益瓦解,加速了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进程,表现在地主经济为了应付竞争,使生产合理化,而不得不经内部改革,由工役制逐渐向资本主义过渡。这里,列宁以地主恩格尔哈特的农场经营史作为典型,来说明从工役制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及其必然性。^①

列宁还考察了改革后俄国农业中广泛使用机器的事实,并阐明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意义:“一方面,资本主义正是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② 从而,用机器或改良农具替代原始农具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过程。因为工役制“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19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

守的技术和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¹。它缺少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引起广泛的农业技术改革运动。农业中广泛使用机器,无情地排斥着工役制的支柱——中农,必然导致农民的加速分化和工役制的衰落,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展。

同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也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矛盾,如:引起生产集中,排挤雇佣工人,以女工和童工代替男工,形成劳动后备军,提高了劳动强度等,从而孕育着日益发展的阶级矛盾。另外,机器的使用,促使俄国农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队伍的发展。表现为“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农业雇佣工人的大量移动,造成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所固有的特殊形式——劳动力市场,加速了农业工人阶级的形成。

(3) 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研究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指出,改革后俄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愈来愈带有商业性质。商业性是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特征,它和自然经济的农业不同,是以商品的生产、无限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因此,改革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农产品生产量的增加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对外输出量的增加,专业化农牧区的形成,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发展,市郊经济的形成等等。这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促进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各种商业性农业形式的发展同样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国内市场。

列宁在考察了商业性农业的各种形式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后,对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发展的历史作用作了总结。他写道:“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力量。”² 第一,“资本主义把务农者”或“依附农民变成了同现代社会中其他一切业主一样的手工业者”³。第二,“农业资本主义第一次打破了我国农业数百年来停滞状态,大大推动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⁴。第三,“资本主义第一次在俄国建立了以机器的使用和工人的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⁵。第四,“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第一次连根摧毁了工役制和农民

1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99 页。

2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9 页。

3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9 页。

4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0 页。

5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1 页。

的人身依附关系”^①。列宁接着又指出同时也不应忘记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质和它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矛盾。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论述过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从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农业生产三个方面专门研究了改革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特点,由此构成了完整的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马克思对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土地关系曾进行过研究,但当时俄国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才开始萌芽,马克思没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详细研究这个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列宁完成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他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深刻地阐明了农民村社经济结构的性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彻底驳斥了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第二,对小农经济发展的特征——农民分化的详尽研究,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贡献。列宁的研究证明资本主义同样在不断地分化着小农经济,只不过它在农业和在工业中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已,从而彻底驳斥了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鼓吹的所谓马克思关于工业中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不适用于农业的观点。第三,列宁对于俄国农民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的分析,对于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化的整个过程的分析,等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彻底粉碎了民粹派否认农民分化并把地主经济理想化的企图。

二、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和形式

与农业比较,资本主义在俄国工业中获得远为显著的发展。列宁根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划分阶段的原理,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考察了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即小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

(1) 农民家庭工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最初诸形式

列宁指出,家庭工业是自然经济的必然附属物;工农业相结合和自给自足是农民家庭工业的主要特征。由家庭工业的发展所形成的手工业,是脱离了宗法式农业的第一种工业形式。它按照消费者的订货来生产或替消费者加工,因此在这种工业形式中还没有商品生产,只出现商品流通,基本上仍没有超出自然经济的范围。当手艺人一旦和市场接触,便逐渐转变为小商品生产者,手工业发展为小手工业。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者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破坏了宗法式的安宁,为工业同农业的分离以及两者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页。

间的相互交换奠定了初步基础。

列宁指出,手工业者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分化,即分化出作坊主和雇佣工人。从趋势上看是愈来愈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建立资本主义作坊。列宁把这称之为“商品生产的辩证法”^①。当手工业者建立起比较大的作坊,这表明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已从分散的小生产中发展起来,并向比较高级的工业形式过渡。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与手工业者分散的、依靠本人和家庭劳动的生产不同,它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雇佣劳动进行生产,从而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基本的因素。

手工业者中间不仅分化出作坊主和雇佣工人,而且还分化出商业资本的代表——包买主。列宁指出,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孤立性和他们之间存在的经济摩擦与斗争,以及生产、销售的小规模和市场日益扩大之间的矛盾,是产生包买主的条件。包买主利用他们的垄断地位,对手工业者进行残酷剥削。这也是促使小生产者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时的俄国,包买主主要采取如下几种形式:第一,向小商品生产者收购制成品,并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低制成品价格,榨取商业利润;第二,通过和高利贷的结合来盘剥小手工业者,使他们成为债务人,在经济和人格上依附于债权人;第三,以商品偿付制成品,这是乡村包买主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剥削是双重的(包括商品销售利润);第四,以商品形式付给小生产者需要的原料或辅助材料,作为收购他们的产品的代价。这里不仅有双重剥削,而且还割断了他们和原料市场的联系,使手工业者彻底屈服于包买主。列宁认为,最后一种形式只差一步就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即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发给手工业者去进行生产,并付给一定的报酬,“手工业者事实上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转为产业资本”^②。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可见,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最初阶段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

工场手工业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列宁指出,俄国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形成的:其一是,雇佣较多工人的作坊逐渐地实行分工,使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变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其二是,以包买主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从对手工业者商品销售的控制发展到为其生产的直接支配,即使生产者降为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人。列宁认为,“工场手工业在资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本主义工业形式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¹⁾，它是手工业和带有原始资本形式的小商品生产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环节。

列宁对当时俄国十多个行业中的各种生产类型的工场手工业进行了考察后，论述了工场手工业经济结构的特征：第一，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基础使其不可能有力地排挤小生产，形成少数手工业工场与大量小作坊、小生产者同时并存的局面，“非农业中心是俄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最典型特点”²⁾。第二，工场手工业是建立在大量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大生产。广大工人是非独立的，往往依附于资本，既没有原料，也没有成品，只是赚得工资。因此，“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工人间的鸿沟，已经达到颇深的程度”³⁾。第三，“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之间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工场手工业最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⁴⁾。手工业工场主往往同时兼包买主身份，否则就无法支配小生产者在场外加工进行协作。第四，“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它是工场手工业的最大特征”⁵⁾。在小生产或大机器工业中，没有家庭劳动，生产仍可进行，而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工人还同土地保持着联系，同时又没有能力把全部生产过程置于工场内进行，因此需要家庭劳动的配合，家庭劳动则成为工场手工业不可缺少的附属物。

其实，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是一种最残酷的榨取血汗的制度。工人工资低下，并流行以实物偿付，使工人需求水平降低，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日长，大量吸收妇女和儿童参加生产。由于家庭工人的分散和中介人的众多，使盘剥盛行，并造成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列宁指出，“家庭工人几乎是我国资本主义‘后备军’中最大的一部分”⁶⁾。

(3) 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

列宁指出，大机器工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生产技术发生了根本变革，推翻了几百年积累起来的工匠手艺，决定性地破坏了旧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工业与农业及其宗法式生活传统彻底分离，使劳动大量社会化等等。因此，“大机器工业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是它的消极因

1)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
 2)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页。
 3)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
 4)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9页。
 5)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1页。
 6)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6页。

素和‘积极因素’的最高峰”¹。

列宁经过对俄国官方、私人的统计材料进行科学加工、分析后证实：俄国工厂数目在改革后增加得相当迅速，同时工人人数也迅速增加了。俄国无产者与半无产者阶级已占全俄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俄国工业人口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因此，俄国这个“年轻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有古老国家的先例与帮助而大大加快了”²。

列宁在考察了俄国加工工业中几个最主要的行业后，论述了大机器工业发展中的若干重要特点：第一，工业生产高度集中，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其集中程度也日益增长。如：“在1879年，大工厂占全部‘工厂’的4.4%，集中了工人总数的66.8%与生产总额的54.8%”，到了“1894—1895年度，大工厂已占全部‘工厂’的10.1%，集中了工厂工人总数的74%与生产总额的70.8%”³。第二，大工业发展高度不平衡。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如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输入、幅员广阔等因素，发展的不平衡尤为突出。表现在“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⁴。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俄国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较其他部门增长得更为迅速。第三，工业技术落后。仅从大工业使用的机械动力而言，1875—1878年，其总马力数为111900余匹，到1892年增加到345000余匹⁵。虽然在16年间，增加了两倍，但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相比，相距很远。这是俄国资本主义落后性的具体表现之一。

列宁在考察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论述了俄国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相互关系。他写道：“这种发展有三个主要阶段：小商品生产（小的、主要是农民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大机器工业）”，这“三种工业形式的联系与继承性是最直接和最密切的。”⁶事实已完全驳倒了民粹派关于“工厂”工业与“手工”工业分离的观点。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小商品生产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形成工场手工业，而工场手工业又极其迅速地成长为机器大工业。列宁认为，俄国许多大工厂主本人就曾是小手工业者，他们经历了上述依次相连的三个工业形式的发

1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5页。

2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9页。

3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0页。

4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6页。

5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6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7页。

展阶段。列宁还分析了三个阶段在技术、经济关系、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征。最后指出,俄国工厂工业的迅速发展,不断建立着巨大的国内市场。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大量统计资料,对俄国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发展所进行的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深刻地阐明了1861年改革后至19世纪末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已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俄国按其经济特征和居民的阶级结构来说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上仍很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是缓慢的,原因是俄国仍存在着很多农奴制残余,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生产者的状况恶化。“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①列宁在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作了总结后指出,俄国资本主义既具有历史进步作用,也具有历史暂时性,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基础。

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分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革命实践意义。首先,完成了从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派的任务,同时也揭露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本质,从而为建立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制定正确的纲领、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分析,不仅捍卫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小商品生产的分析没有构成专门的一部分。他在考察“资本原始积累”时,曾指出其实质是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夺,使农民脱离土地。但除此之外,原始积累过程还有它的经济方面,即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分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②因此,马克思详尽考察了这一过程的后一方面,即对小生产者的强制剥夺,而没有专门考察前一方面,即小生产者在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发生的资本主义分化。列宁则专门考察了小商品生产者在商品经济发展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发生的资本主义分化。全面地分析了由小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以及它们间的联系和区别,研究了这一分化过程的特点和形式,揭示了价值规律在其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1页。

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原理。

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分析,从经济上论证了工人阶级作为俄国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力量的作用和它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以及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作用,并且后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和策略的根据,对俄国革命实践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列宁关于市场和再生产的理论

列宁针对民粹派所谓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小生产者的破产而日益缩小以及无法开拓国外市场等,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指出,“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的自身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1]。因此,必须从考察简单商品经济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来研究市场问题。

列宁强调指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2]由于社会分工,使生产者各自的产品互相变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互相成为市场。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使自然经济迅速瓦解,劳动力也变为商品,从而商品经济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制造业与农业分离。这种分离必然形成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各部门的内部也加强了专业化过程。与此同时,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商业性农业在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使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新工业中心的出现和新城市的兴起,工业人口必然增加而农业人口减少。这样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从而市场日益扩大,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因此,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的关键。

民粹派看到农奴制度废除后,俄国小生产者(以农民为主)发生大量破产的现象,就错误地认为居民的购买力在日益下降,必然使资本主义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列宁指出,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建立。事实说明,小生产者的破产并没有造成国内市场的缩小,相反地,扩大了国内市场。因为,一方面,

[1]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2]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生产资料变成了新占有者的资本,被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变成了商品,这就提供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另一方面,小生产者破产后,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工资,向市场购买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就扩大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列宁指出,国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建立的,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则决定其发展水平。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所以,国内市场问题,决不能作为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无关的孤立问题而存在。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把国内市场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的。

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实现问题,是当时俄国市场问题争论的一个焦点。民粹派重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错误,从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现论出发,断言资本主义不能在其内部实现产品的剩余价值,要实现剩余价值只有通过不属于资本主义范围的小生产者和不属于本国资本主义范围的国外市场,而俄国的小生产者破产,国外市场又早已被其他国家瓜分完毕,因此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基础。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则修正马克思主义,企图把实现论篡改改为按比例分配,否定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原理。列宁彻底揭露和批判了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观点,全面论述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市场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

首先,论证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及其与市场的关系。列宁指出,民粹派把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困难仅仅局限于剩余价值产品的实现是错误的。因为讲到实现的困难,那是由于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引起的,它不仅在实现剩余价值时,而且在实现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时都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资本主义生产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时,民粹派断言没有国外市场,剩余价值便无法实现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列宁写道:“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每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态(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替换它的另一部分产品。”^①至于这种替换是在一国的范围内进行,还是在几国的范围内进行,这对实现过程的实质不会有所改变。因此,应当撇开对外贸易,把它扯到一起就使问题从一国转移到数国,这丝毫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为从国内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从国外输入同量价值的另一种产品。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民粹派把国外市场问题扯起来,说明他们既不了解实现问题的实质,也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

列宁还揭露了民粹派的实现论的理论渊源。民粹派从西斯蒙第那里承袭了“斯密教条”,把年产品价值只划分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两部分,而抛弃了不变资本部分。因此,民粹派与西斯蒙第一样,根本不懂得社会产品实现的规律,既从社会产品价值中抛弃了不变资本,又从社会产品的物质形态上抛弃了生产资料,而把社会产品的实现仅仅归结为个人消费品的实现,把实现的困难归结为消费能力扩大的速度赶不上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因而不得不寻求国外市场。列宁强调指出:“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本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其产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品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全部困难正在这里。”^①民粹派和西斯蒙第看不到这一点,必然得出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结论。所以,列宁写道:“西斯蒙第(以及我国民粹派)所以作出相反的论断,完全是由于根本不懂得实现的基本规律,不善于将产品按价值分为一部分(而不是两部分),按物质形态分为两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的论点,不过是庸俗地重复斯密对实现的糊涂看法。”^②

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的同时,又从正面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实现论。列宁首先指出,马克思的实现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如下两个原理,即:社会产品按价值应分为三部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产品按其物质形态应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个原理对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包括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列宁说:“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③

列宁接着扼要地论述了马克思的实现论。指出,马克思从上述原理出发,发现了社会产品得以全部实现的基本条件,即:在进行简单再生产时,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应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相等;在进行扩大再生产时,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应该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

①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3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 页。

其次,分析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变化的必然趋势,科学地论证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列宁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最早是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大家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直接明确地表述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的有些地方提示了这一原理的要点。马克思说过:“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①又说:“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②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提示和《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公式,在该文中把技术进步的因素纳入到他自己制定的再生产公式中,并用统计图表分析、比较了一个在四年扩大再生产中社会产品各部分的增长模型。^③然后得出结论说:“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④;并指出,“这个结论是直接根据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原理得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以往各个时代无法比拟的高度发展的技术”^⑤。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在论述了马克思的实现论以后,根据上述原理,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⑥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些,也就是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因而这些部门必然要比制造消费品的部门增长得快些。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⑦。

这样,列宁便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方面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创造出为自己的发展所必需的国内市场,彻底驳倒了民粹派把国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9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

④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⑤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⑥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6页。

⑦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市场仅仅看成是个人消费品市场,宣称由于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国内市场缩小的谬论。

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实现论的同时,又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的实现论篡改为按比例分配论,断言资本主义市场根本不依赖于消费品市场的错误观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创造着一个市场,只要按比例生产,无论消费水平如何低,供给也不会超过需求,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因而也不存在危机,并宣布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一致。这实际上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①又指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不依赖”个人消费,这就必然产生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个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是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因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即在周期性危机的过程中发展的。所以,这一矛盾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说明它要求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原因和条件。

列宁对市场和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有关原理。第一,马克思虽曾在《资本论》中阐述过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形成原理,但在列宁以前,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哪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作过专门的研究。列宁在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详细地论证了国内市场形成的理论及其过程,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市场学说。第二,列宁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有关原理,在与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中,以资本主义发展、技术进步作为前提,研究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及其后果,直接作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结论。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所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贡献。这一原理不仅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观点,以及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方面有重要意义,而且成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第四节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和纲领

列宁在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他在反对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撰写了许多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著,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的土地纲领。

在 20 世纪初,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谢·尼·布尔加柯夫(С. И. Булыгаков, 1871—1944 年)在其所著《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中,极力宣扬“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并作为其“农业发展理论”的基石;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地租学说;否认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主张小农经济稳固论。同时,西欧修正主义者赫茨(F. O. Hertz, 生于 1878 年)在《土地问题及其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和爱·大卫(E. David, 1863—1930 年)在《社会主义和农业》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并广泛流传。

为了击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进攻,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中,运用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揭露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本质,捍卫和阐明了马克思的地租学说,并用丰富的材料证明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批驳了小农经济稳固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

首先,揭露了布尔加柯夫等人鼓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实质。列宁指出,布尔加柯夫继承马尔萨斯的衣钵,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一所谓超历史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作为他的“农业发展理论”的基石,并宣扬这一“规律”“具有普遍意义”,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①。

这个为资产阶级学者所颂扬的“规律”,其主要论点是:每次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不是相应增加而是递次减少的。它的论据是:“如果后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所提供的产品不是递次减少而是数量相等,那就根本用不着扩大耕地了……‘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② 列宁批驳了布尔加柯夫的这个论点,指出,这是一个毫无内容的抽象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它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8 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8 页。

抛弃了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这些最重要的东西；第二，追加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革新为前提的。因此，要在土地上大规模的投资，就必须相应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即使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每次追加投资所带来的生产率也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一定会降低。所以，列宁指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而只是极其相对地、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没有改变的情况”^①。显然，它根本不是普遍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②。

列宁引用了美、俄、法、德等国的统计资料后，指出：“19世纪的全部历史，用极为不同国家的大量资料确凿地证明：技术进步的‘暂时’趋势使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完全不发生作用，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的农村人口为日益增多的总人口生产愈来愈多的农产品。”^③

列宁在揭露布尔加柯夫等人宣扬“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实质时，写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自然要设法回避农业落后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而把这种落后归咎于‘自然力的保守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这个臭名远扬的规律所包含的无非是辩护术和糊涂思想。”^④

其次，批驳了布尔加柯夫对马克思的地租学说的歪曲，捍卫和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地租学说。

布尔加柯夫在鼓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同时，歪曲马克思的地租学说，抹煞马克思的级差地租论和李嘉图的级差地租论的差别。他说：“尽管马克思对这个规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持明显的否定态度，但是就一些根本原则来说，他还是汲取了李嘉图的以这一规律为基础的地租理论。”^⑤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有意歪曲。因为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李嘉图的地租论同他错误的土地肥力递减学说之间的联系，而且非常明确地揭露了李嘉图的错误。列宁强调指出：“正是马克思使级差地租论摆脱了它同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一切联系。马克思指出，对土地的不同投资产生不同的生产率这一事实，是形成级差地租的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因此，由优等地转到劣等地也好，由劣等地转到优等地也好；对土地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也

①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③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④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⑤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95页。

好,提高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¹⁾因为在现实中,往往各种情况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任何一个总原则都无法概括这些情况。而形成级差地租的唯一条件是各类土地的优劣不等。

列宁还从以下两个方面批判了布尔加柯夫对马克思地租论的修正:第一,在布尔加柯夫看来,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的平均化,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构成地租的观点是不对的。他认为,由于土地占有权的垄断,排斥了自由竞争,因此农业资本没有参与利润的平均化过程;第二,他否认有绝对地租的存在,认为绝对地租不过是级差地租的一种特殊形式,把二者区分开来等于对同一事实任意作了两种解释。列宁认为,布尔加柯夫的上述错误在于他混淆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两种不同的垄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地租。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土地有限造成的垄断是指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而不是指对土地的所有权。这种对土地经营权的垄断,由于土地有限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使粮食价格不是由中等地的生产条件所决定,而是必然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条件。这种价格不仅能补偿农业资本家的生产费用,并能给他的资本带来平均利润。而经营优等地的资本家便能得到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就形成级差地租。可见,级差地租的形成与土地私有制毫无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级差地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村社的、国家的、无主的土地上经营也是这样。列宁又指出,从土地有限只能得出全部土地将被农业资本家占用的结论,而不能得出农业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必然受到限制的结论。西欧各国的历史证明,尽管存在着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尽管各种所有权的形式层出不穷,但是在农业中还是形成了自由竞争。布尔加柯夫的第一个论点的错误在于,他把土地经营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混淆起来了。

列宁接着又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除了有作为经营对象而存在的一种垄断外,还有作为私有权的对象而存在的另一种垄断。那么,这种私有权的垄断对地租产生什么影响呢?列宁说:“土地占有者将依靠他的土地所有权,向农场主索取级差地租。”⁽²⁾这就是说,土地私有权并没直接造成级差地租,而只是使级差地租从农场主手中转到土地占有者手中,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对地租的影响不仅限于此。列宁又说,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业资本家不仅经营自己私有的土地,而且还经营从土地占有者那里租来的土

(1)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2)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地。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向农业资本家索取“土地的租金,这种租金就是绝对地租,它和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毫无关系,它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1]。因此,布尔加柯夫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即他修正马克思地租论的第二个论点也是错误的。

列宁在反对布尔加柯夫的斗争中,恢复了马克思的关于农业垄断的思想,明确地指出了关于对土地的两重垄断的差别,并深刻揭示了由两重垄断所产生的两种地租之间的区别,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地租学说。

第三,驳斥“小农经济稳固论”,论证和发展马克思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

俄国的布尔加柯夫和西欧的赫茨、爱·大卫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小生产富有生命力,而且比大生产优越,提出“小农经济稳固论”,否认农民分化和否认农业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规律。针对他们的这种观点,列宁首先指出,“农业机器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问题,经常成为‘批评家’‘驳斥’马克思主义的论据”^[2]。“批评家”们通过夸大农业的自然特点,在细节上大做文章,把农业的自然特点与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规律混为一谈的手法,来避开其问题的本质,即“机器的使用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机器使用的增加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是否有联系?”^[3]

列宁认为,虽然农业本身具有自己的特点,农业的经济技术水平就当时来说还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生产和资本在不断积聚和集中,由于资本主义大农场逐渐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如机器、电力等,必然会不断排挤和吞并小生产,而农业中广泛使用机器正是大生产的特征,也是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的表现之一。因此,既不能把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工业中的基本特点和不同形式混淆起来,也不能因大农业采用先进技术会遇到困难就否定其优越性。列宁写道:“当然,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道路不会是平坦的,而是曲折的。但是,新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采用,农业必然会革命化,这是无可怀疑的。”^[4]

列宁为了彻底批驳“批评家”们提出的“小农经济稳固论”,对当时俄国、德国和丹麦的农业经济资料作了科学的分析,以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证明,马

[1]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2]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页。

[3]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4]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原理,既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农业。农业和畜牧业中存在着尖锐的资本主义矛盾,农业生产日益集中,大生产不断排挤小生产。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正在继续发展,不仅是农业工人,而且农民也愈来愈多地从农村逃往城市,农民的分化过程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列宁指出:“农民的分化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其产生和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的极其深刻的矛盾。充分估计这些矛盾,就必然会承认小农的境况是毫无出路的和毫无希望的(置身于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之外,就是毫无希望的)。”^①因而,他们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才能摆脱悲惨的处境。列宁的分析和论述不仅彻底驳斥和粉碎了“批评家”们主张的“小农经济稳固论”,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工农革命联盟的理论基础,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学说。

列宁在1907年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以及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法颁布和实施后,俄国资本主义农业演进两种形式的客观趋势,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以前的土地纲领,全面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国有化纲领。

列宁认为,要正确地说明俄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还必须了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消灭农奴制土地占有关系可能有的两种方式或两条道路,即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种形式。

第一条消灭农奴制土地占有关系的道路,是所谓“地主方式”或称为“普鲁士”的道路,这是改良主义的即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的道路。在俄国历史上,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地主割取农民的土地,施用暴力来推行新的土地制度。这就是如列宁所说的,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第一次“清洗土地”。以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法又鼓动富农去掠夺半封建式的村社,用暴力来打破原有的土地占有制,掠夺农民并使他们破产变为贫农和雇工,以便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这就是所谓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第二次“清洗土地”。很明显,如果俄国农业经济沿着这条“普鲁士”道路发展,必然会保存农奴制土地关系的残余,农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将发展得十分缓慢,农民则不仅遭受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要遭受封建农奴制的盘剥。

第二条消灭农奴制土地占有关系的道路,即所谓“农民方式”或称为“美

^①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国式”的道路,这是革命的即农民和无产阶级提出的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要求用暴力来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但它是广大农民用革命暴力彻底废除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制度,并在农民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实现土地国有化。可见,如果俄国农业经济沿着“美国式”的道路发展,就会使农奴制土地占有关系及其政治统治彻底消灭,为资本主义建立起“理想”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将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列宁在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有的两种形式,并指出俄国当时明显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种形式后,一方面考察了与这两种形式相适应的在土地纲领上反映出来的两条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又科学地总结了社会民主党以前提出的各种土地纲领。对于前一方面,列宁指出:“在俄国革命中公开活动的各个政党和阶级,它们的土地纲领明显地分为同两种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形式相适应的两种基本形式。”^①这就是“右派”和“左派”的土地纲领,前者代表地主利益,主张“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后者代表农民利益,主张“农民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

列宁认为,根据俄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俄国资本主义农业演进两种形式的客观趋势,为使农民土地革命得到彻底胜利,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只能主张土地国有化。否则,农民土地革命只能得到很不彻底的和陷于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已完全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②。

列宁根据马克思的地租学说论证了党的土地国有化纲领。马克思的地租学说包括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是因为土地有限而被资本主义的农场占有而形成的。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这种地租由农场主转归土地所有者占有。当废除土地私有制后,它转归为国家所有。因此,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级差地租仍会形成。绝对地租则以土地私有制为前提。这种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而产生的地租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土地占有者交纳的一种贡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物。所以,废除土地私有制而实行国有化,在一定条件下资产阶级也是赞同的。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有些激进的资产者能在理论上反对土地私有制,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缺乏勇气,“因为对某一种私有制形式的冲击……对于其他的私有制形式也是很危险的。况且资产者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4页。

自己也有了土地”^①。列宁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自己还没有“土地”,也不害怕“冲击”的“激进资产者”是有的,这就是俄国农民。所以,列宁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就是为了消灭土地私有制和绝对地租,也就是号召广大农民使用革命的手段消灭一切封建农奴制土地制度及其政治统治,把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这一纲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要求。同时,实行土地国有化还有利于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土地国有化既然在土地方面废除了私有制,这就同时给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沉重打击。因此,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顶峰’,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②。

列宁对土地国有化纲领的全面论证,不仅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学说,而且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联盟、工农民主专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① 引自《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8页。

第十八章 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一节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对帝国主义的系统研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自由竞争逐渐为垄断所代替,从而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在这一世纪转变之际,列宁就已重视对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论著,指出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并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垄断的一系列重要表现。1899年,列宁在《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文中,就指出美国是一个卡特尔国家,“卡特尔限制了国内市场的生产,却扩大了为国外市场的生产”;“卡特尔使小工厂倒闭,积聚和垄断了生产,实行了革新技术,使生产者的境况大大恶化”。^①1903年,列宁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中,就谈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的问题。他在说明19世纪后半期和当时的时代区别时写道:“当时和现在,一个是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一个是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反动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十分紧张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②1908年,列宁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直接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并对帝国主义经济政治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他强调指出:“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显著、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无论就每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来说,或者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崩溃来说都是如此。”^③1913年,列宁在《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一文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同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盟关系。这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揭露逐步深入,但在1914年以前,列宁还没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8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7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

有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因而还没有提出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他说,不研究、不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①1915年年中列宁来到瑞士伯尔尼后,就开始编制有关的参考书目,拟写大纲,广泛收集和分析整理各种材料,写了大量的摘录、札记和批语,他仔细地研究当时所能得到的有关帝国主义书籍,包括经济和政治、科学和技术、历史和地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等各方面的文献资料。从他留下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来看,列宁参考了几百种基本上是用外文出版的书籍、学位论文、小册子、报刊上的文章和统计汇编,他将148本书(其中德文的106本,法文的23本,英文的17本,译成俄文的两本)和49种期刊(德文的34种,法文的7种,英文的8种)上的232篇文章(其中德文的206篇,法文的13篇,英文的13篇)作了摘录。这些材料,既丰富又典型。不但有详细数字、统计图表,还有关于帝国主义研究的专著和观点,不仅摘引许多资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学者的材料和观点,而且节录了不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重要论述。列宁利用他所收集的材料,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写成了20本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和其他一些单独的札记和材料,后来收入《列宁全集》第四版第39卷的这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②,共约1000页,600余万字。在这部研究笔记的基础上,列宁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其中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是他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成、于1917年4月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精心研究的科学总结,是列宁所创立的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内部矛盾和发展趋势,从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现象中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实质及其规律。列宁特别重视帝国主义研究中的科学方法,始终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他在这一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1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自由,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① 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深入研究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显然,这是同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研究,对战争和革命问题的研究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相联的。

在这一著作中,列宁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原理,以及恩格斯对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一些新现象的论述,研究了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情况和变化,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的各种谬论,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出版后,列宁还写了许多有关论著,例如《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等,又在一些重要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二节 列宁对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揭示和阐述

列宁经过大量研究后,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②。他对这五大特征,作了如下的阐述:

一、生产和资本集中必然产生垄断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由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必然产生垄断。他运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被垄断的资本主义所代替;生产积聚和资本集中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垄断。这一方面是因为几十个巨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订立协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企业规模宏大使自由竞争受到妨碍,从而产生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2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页。

断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就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对资本主义垄断问题的研究是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

列宁坚持从生产领域出发来研究垄断,他指出,生产集中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是企业(单个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能力的增长,以及相当大的部分或者甚至绝大部分人力和生产资料集中到最大的企业中去,这个过程在工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1] 列宁以当时德国和美国为例,说明了工业中生产集中的迅速发展。马克思曾把竞争看成是集成的“最强有力的杠杆”^[2]。列宁进一步注意到了垄断对生产集中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自由竞争的统治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成为产生垄断的基础。但是垄断一经形成,由于其本身的统治又会加速集中的过程。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集中过程是在自由竞争统治的基础上进行的,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这一过程则是在垄断统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列宁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发展情况。资本主义世界连续爆发了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严重的危机加剧了竞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猛烈、规模巨大的企业兼并与吞并的浪潮,使生产集中迅猛发展。列宁指出:“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3]

列宁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的整个过程。他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和资本不断集中的过程,垄断正是集中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研究了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组织发展的几个基本时期,阐明了垄断组织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帝国主义形成的过程。他指出:“垄断组织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还只是一个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过广泛的发展,但是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3)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4] 列宁还分析了资本集中和垄断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如卡特尔、辛迪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7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2页。

[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4—746页。

加、托拉斯等。此外，尤其还注意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所谓“联合制”。列宁认为“联合制”不同于其他形式那样在同—个部门中通过合并或排挤从横的方面来扩大生产规模，而是把互相有联系的不同生产单位从纵的方面联合起来。列宁还分析了不同的国家生产集中和垄断发展的不同情况及它们的共同趋势。列宁指出：“事实证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还是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期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引起垄断，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现阶段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¹ 列宁在研究中还论及了垄断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计划性之间的关系。随着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垄断统治的建立，有可能对社会的生产和流通实行垄断调节，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不仅在企业内部，而且在整个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具有计划性，但这种计划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列宁还分析了垄断和竞争的关系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垄断是在竞争中实现的，就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垄断的实现不能消除竞争。大垄断企业具有巨大的规模和技术力量，这是自由竞争时期的企业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此前提下产生的竞争就具有更加残酷更加激烈的特点。列宁对帝国主义条件下垄断和竞争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考察后指出：“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物，但是我们看到，自由竞争开始变成垄断。”² 另一方面，“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³。列宁关于竞争和垄断关系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资产阶级学者、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常常从两个不同极端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或是以竞争否认垄断，否认垄断的统治，或是以垄断否定竞争，否定资本主义的矛盾，以掩饰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的分析克服了这两种错误倾向。

二、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金融资本的统治

在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中，银行具有特殊意义，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银行新作用问题的研究，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列宁是从分析银行资本的集中和积聚开始研究帝国主义时代银行的。他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3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7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7—808页。

指出,在竞争的作用下,银行的数目和企业的数目一样,在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货币资金集中于少数最大的银行。这种集中过程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大银行直接吞并小银行,把小银行不断地排挤掉,使它们在全部存款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日益降低。另一种是大银行用各种方法去“联合”它们,尤其是通过“参与制”这种隐蔽的银行资本集中和积聚的形式,使它们变成其实际上的分行,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在集中过程中,少数仍然处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领导地位的银行,它们成立垄断协定,组织银行托拉斯。此外,一些最大的银行把越来越多的银行业务和利润集中在自己手中。银行的集中发展到最高阶段就形成银行的垄断。因此,列宁认为,“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成就还是垄断”¹⁾。

在银行的集中形成垄断后,银行作用起了根本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银行,主要是作为支付的中介发挥作用,它收集社会上闲散的货币和资本贷给资本家使用以获取借贷利息的差额。而在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则不同,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替几个资本家办理往来账,似乎只是执行着一种纯粹技术性的、纯粹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账及其他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最后则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这种新作用就是:银行“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²⁾。

列宁在研究了工业和银行的垄断以及研究了银行新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金融资本和金额寡头的统治。希法亭在1910年《金融资本》一书中也曾经研究过金融资本,并把它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但是,希法亭根据流通占首位的观点,忽视了生产集中和垄断与金融资本形成之间的本质联系,片面地强调了工业资本对银行资本的依赖。列宁克服了希法亭的缺陷,从生产占首位的原理出发,给金融资本下了一个科学定义:“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³⁾。列宁强调了金融资本同生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3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53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9页。

产集中和垄断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了金融资本的实质:金融资本既不是单纯的银行垄断资本,也不是单纯的工业垄断资本,而是在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基础上,由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资本。自由竞争时期是工业资本占统治地位;帝国主义时期则是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帝国主义时代,就是金融资本统治的时代。

列宁首先分析了金融寡头在国内的经济统治。金融寡头在经济上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参与制”,利用掌握一定股权的方式对企业实行支配。金融寡头控制着总公司,总公司通过收买股票、掌握股票控制额的办法使别的公司从属于自己,成为自己的“女儿公司”,各“女儿公司”又以同样的办法控制更多的“孙女公司”,从而形成了金融垄断的金字塔,站在塔尖上的是一小撮金融寡头,下面层层控制着大量社会资本。这样,就能以较少的资本支配着比自身大得多的资本,以至把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同时,列宁还指出了金融寡头通过其他方式,如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来攫取巨额利润,加强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然后,列宁又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寡头在政治上的统治。金融寡头既然统治了整个社会经济,那“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¹。金融寡头同政府的“个人联合”;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金融寡头已成为事实上的真正的统治者。因此,“垄断资本家不仅在个别国家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从金融上、产权上,有的甚至从生产上,控制了整批的工业部门。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少数大银行、金融大王、金融巨头的空前未有的统治,他们实际上甚至已经把最自由的共和国变成了金融君主国”²。列宁多次分析过的金融资产阶级上层与国家机关混合生长的情况,已被以后不断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三、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国内进行全面垄断统治的金融资本,必然要对外扩张,它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资本输出。列宁认为,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相对过剩资本。列宁指出,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垄断统治,一方面,使少数在世界上处于垄断地位的最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手里,集中了数量极其巨大的货

¹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79页。

²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316页。

币资本;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在一些企业、工业部门和国家的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形成了大量的相对过剩资本,这些“过剩”资本必然要被输出到国外去,以谋取高额垄断利润。帝国主义的垄断统治,决定了资本输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要在国外谋取高于国内垄断利润的利润。列宁认为这种“过剩”资本具有相对的性质。如果能把它们用来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如果能够全面地组织社会生产,那就不会有“过剩”资本。

列宁对资本输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资本输出的必要条件是:在先进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已经积累起来的“过剩”资本,但在国内已找不到能保证垄断利润的合适的投资场所,必须输出。列宁又认为,这些资本输出的可能性在于:“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是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而“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①。资本主义垄断的不断发展造成大量的资本输出,其基本形式是:生产资本的输出和借贷资本的输出。

资本输出为垄断资本家带来惊人的利润。由此,列宁指出,资本输出已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它造成了“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②;而且,“资本输出这种特殊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③。因此,列宁认为,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④。

四、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列宁认为,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的基础是垄断。由国内垄断到国际垄断,这是垄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垄断是在国内垄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国内垄断。当国际垄断形成之后,垄断组织分割的已经不限于国内市场,而是扩大到世界市场。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是垄断资本家首先在不同程度上把本国的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然后极力

①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78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3—884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8页。

向外扩张的“自然”结果。资本家瓜分世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¹。国际垄断在当时的主要形式是国际卡特尔。各资本家垄断同盟之间通过订立全世界的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列宁认为这种国际垄断的出现，意味着垄断的巨大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标志着全世界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无比的阶段。

列宁区别了“资本家同盟在经济上分割世界”和“国际同盟组织”，认为这两者不能等同。任何超越了一国界限的垄断组织都是国际垄断组织，这在帝国主义以前就有了。“因为凡是有几国资本家参加的股份公司都是‘国际的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同盟’”，“帝国主义的特征是 20 世纪以前所没有的，这个特征就是国际托拉斯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按照合同把世界各国划分成若干销售区”²。

列宁所说的“直接的分割世界”是指各国最大的垄断财团，经过激烈斗争，形成国际垄断同盟，以协议的方式对世界市场进行直接分割。列宁揭示了这种分割不可能形成竞争的终止，而把世界分割“完了”，相反在激烈的竞争中，对世界的这种经济上的分割会引起不断的再分割。列宁指出，资本家垄断同盟在经济上对世界市场的分割和重新分割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帝国主义各国的金融巨头企图用国际垄断同盟来消除竞争、共同分割世界，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协议，有的甚至是政府出面来达成，并且到处吹捧这些协议。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认为这会给人民带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可以实现和平的希望。列宁指出，“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骗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³。列宁认为，大垄断组织之间分割世界的协议是不稳固的，不断地从经济上重新分割世界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垄断组织为了攫取巨额垄断利润，通过协议在经济上瓜分世界，当这些协议已经变得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时，它们就必然要破坏这种协议，进行再分割。因为垄断资本瓜分世界的唯一原则和可行的办法是“按资本”、“按实力”，可是原来的实力并不能长期保持平稳，它总是随着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发展而不断变更着。当“实力”变更到和旧的势力范围不相适应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新的冲突，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各国垄断组织之间的国际协议是暂时的相对

1.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95 页。

2. 《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11 页。

3.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95 页。

的,而它们之间的竞争与斗争是长期的绝对的。列宁指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①

由此,列宁阐明了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并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关于国际垄断同盟会消除矛盾,实现和平的谬论。

五、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世界

列宁认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这一特征,与前一特征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前一特征是指对世界市场的瓜分,这一特征是指对世界领土的瓜分,这两个特征都揭示了金融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列宁指出,“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在经济上分割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与此有联系的是,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在从领土上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②;“瓜分全世界(不仅指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而且指国际辛迪加和卡特尔,同时还指侵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经济的基本事实”^③。

列宁在研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领土扩张、世界领土被分割及重新分割的情况后指出,垄断资本取代了自由竞争的统治,便“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④。列宁同意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把1884—1900年这个时期划为欧洲主要国家加强‘扩张’(扩大领土)的时期”^⑤。列宁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未被占据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分割完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不可避免的”^⑥。列宁充分地利用了他所能得到的从1876—1914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8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8页。

⑤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8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6—797页。

年列强分割世界的材料,具体地分析了世界领土被分割的情况:“1876年以后,殖民地领土有极大的扩张:六个最大的强国的殖民地领土增加了一半以上,……其中有两个强国在1876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强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没有。到1911年,这四个强国获得的殖民地面积为二千四百一十万平方米,即大致等于欧洲面积的一倍半以上,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一亿。殖民地领土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在六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¹²及经济上最落后的俄国。金融资本统治加剧了各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国家占有的殖民地与它的实力不相称,必然要求重新分割世界。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抢占殖民地、分割世界,其目的主要在于满足金融资本的控制、掠夺原料、资本输出和销售商品、追求统治的趋向以及转移国内矛盾等多方面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采取多种形式来分割世界,其中最基本的形式是侵占殖民地,殖民地的特征是对宗主国无限的、全面的从属关系,即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从属于宗主国。因为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支配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列宁还对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造成的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这些国家尽管在政治上、形式上可以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摆脱不了经济上的附属关系的。

列宁对帝国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分析,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各种基本经济关系,阐明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但是,列宁的理论,依然是我们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途径。

第三节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列宁是从垄断出发来研究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的。他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垄断阶段,指明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正确地阐明了垄断的产生及其本质,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由此而形成的其他范畴,从而正确地说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¹¹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1页。

¹²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3页。

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列宁又指出,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这种驾临于垄断之上的竞争,将是特别剧烈的。既然与竞争并存的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列宁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第一,由生产集中产生的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经济生活中取得了完全的优势;第二,垄断地占有国内外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第三,银行变成了金融资本垄断者,为数极少的金融寡头把持着全国绝大部分货币资本和货币收入,控制着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第四,垄断地占有殖民地。通过上述分析,列宁正确地把垄断看作是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基本的生产关系,垄断不仅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而且广泛地占有国内外各种社会生产要素。然而这些垄断形式又总是与各种形式的竞争结合在一起。在国内存在着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垄断组织与非垄断企业、以及非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上又有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等等。正是这种基本的经济条件,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趋势。

列宁首先研究了由帝国主义垄断所引起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这一趋势。列宁指出,“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①。帝国主义的寄生和腐朽性质的表现是:第一,具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一切垄断所特有的”腐朽趋势;第二,形成庞大的食利者,即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阶层;第三,资本输出是“加倍的寄生性”的表现;第四,追求的是统治,不是自由,表现出政治上的全面反动,进行垄断统治所特有的大规模出卖、贿赂和收买;第五,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身上的寄生虫。

在生产和技术发展上同样也存在帝国主义的垄断所引起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这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垄断价格的存在。垄断形成后,垄断资本家可以通过规定垄断价格的办法来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垄断价格,而以前那种促进技术改革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消失,缺乏市场对技术的激励机制。第二,由于资本家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垄断组织拥有雄厚的资本,他们为了维持垄断价格和避免原有机器设备报废或贬值,可以人为地阻碍技术的进步。第三,由于帝国主义“占有特别广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2页。

大、特别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这样，宗主国不用通过改进技术就可以从殖民地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因而也会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势。

然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也出现另一种趋势，由于各个垄断集团各帝国主义大国不平衡的发展，其产生的竞争的压力又制约着帝国主义的腐朽性的发展。列宁特别注意在生产和技术方面的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两种趋势。一种是停滞和腐朽的趋势，另一种是迅速发展的趋势。由于垄断不能够完全排除竞争，改良技术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以促进技术的变革。这两种趋势交替出现。列宁认为腐朽趋势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他写道：“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① 事实说明列宁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

列宁认为，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发展，由自由竞争发展而来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列宁从垄断出发，又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认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按照列宁的理解，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就在于它的过渡性。列宁论证说：“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走到最全面的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自由竞争过渡到完全社会化的新的社会制度。”^② 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新的社会制度”，就是指社会主义制度。

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垂死性，是指它是将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资本主义。在列宁看来，不能把帝国主义的垂死性理解为帝国主义在较短时期内就会死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单单根据一时的革命形势的估计所作出的。

按照列宁的分析，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急剧发展。生产由于集中的发展而进一步社会化，但是，生产资料依然是私人占有，因而经济危机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又造成内外社会矛盾的发展。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会趋向激化。由于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垄断的金融资本对内残酷奴役人民，对外加强侵略扩张和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2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8页。

行殖民主义政策,从而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①。

列宁很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一过渡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②。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加强同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有机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帝国主义战争大大推进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但是,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自身的性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性质。不能把它说成是“国家社会主义”。

列宁明确地肯定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它对实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了“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和物质生产基础,建立了“在生产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有计划的国家组织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社会管理机构。只要无产阶级夺取并掌握了政权,就可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机构。当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

由上述可见,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历史趋势,根据唯物辩证法作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垄断引起腐朽停滞的趋势,但也指明资本主义经济有可能更迅速地发展;他指出帝国主义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又具有垂死过渡的性质;他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但又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指明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当时列宁的分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逐渐成熟的时期进行的,因此,他着重分析了由垄断所引起的矛盾发展,指出其腐朽垂死的过渡性质,而对生产社会化的增进,经济会迅速发展等内容,则未作充分展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4页。

第四节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

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揭示和论证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及其表现。在列宁看来,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呈跳跃式的不平衡发展。

早在1908年,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列宁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时写道:“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的统治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均衡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是跳跃式的、曲折的,就是说,它忽而迅速前进,忽而暂时降低到原有水平以下。”¹到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²这一著名论断。那时他还在其他论著中多次提出和重申这一论断,不过那时列宁还没有对这一规律加以阐述和发挥。而只有在他拟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提纲时,再三思考“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才确定了叙述的顺序:第一,“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生产)特征”,第二,“世界经济的对比情况”,第三,“发展的不平衡和世界的‘重新瓜分’”³。这就是说,列宁决定从考察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出发,进而考察“世界经济的对比情况”,然后在这一基础上论证“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正是按照这一思路,论证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尤其是在该书的第七章中,引用和分析了关于“世界经济区”和铁路这两个综合材料。第一个材料是理·卡尔韦尔(R. Calwer, 1868—1927年)在《世界经济入门》中说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综合经济材料。这个材料把整个世界分为五个“主要经济区域”: (1)中欧区(指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

1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4页。

2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1页。

3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6—247页。

个欧洲)；(2)不列颠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洲区；并把殖民地列入各自所属的“区域”。通过对这一具体材料的分析，列宁指出，三个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区域，其中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不列颠区和美洲区，二者政治上高度集中，但又有极大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而后者的殖民地最少；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非常尖锐，而另两个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区，这两个区在人口密度和政治集中方面大不相同；而且，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这样，列宁从当时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综合情况中，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揭示了各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尖锐的矛盾。

列宁根据的第二个材料，即1890年至1913年世界铁路统计的综合材料，进一步论证金融资本的垄断加剧了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以及由于这种跳跃式不平衡发展造成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列宁的分析表明：第一，在1890—1913年的几十年间，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或半独立国，这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得特别快，继美国之后，新兴的帝国主义日本又出现了；第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将近80%的铁路集中在美、英、俄、德、法等五个最大的强国手中，而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大得不可比拟；第三，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它的铁路网增加了10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三倍，但是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比英国快得无比。因此列宁指出，“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结”^[1]。这种总结表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这样，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具体深入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跳跃性和不平衡性，随着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而达到极端尖锐化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而斗争，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必然会引起它们争夺市场、争夺投资场所、争夺原料产地，甚至争夺领土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尖锐化。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即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时代，资本主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3页。

义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比自由竞争时代表现得更为尖锐和激烈。这种跳跃式不平衡发展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造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阐述,得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获得胜利的结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可能出现“地域性”共产主义,但是“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①。因此,恩格斯于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②。而在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向上发展和下降的国家加以区别,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形势的不平衡。马克思在1858年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③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和思考的,是少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存在和巩固的问题。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起义,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热情支持、高度评价公社的事业,科学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在70年代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谈到俄国、德国可能会发生革命。例如恩格斯在1892年谈到德国的革命形势时说:“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的工人运动在最近二十五年所获得的进展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前进着。……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吗？”¹⁾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正如他们所指出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情况,得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获得胜利的结论。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²⁾ 1916年9月,他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³⁾

列宁这个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一结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得到理论论证。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使得无产阶级能够冲破帝国主义整个链条上的薄弱环节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个别国家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列宁对这种反动的理论曾经给予尖锐的批判。

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和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正确道路。这个理论,已经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证实,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证实。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3页。

2)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1页。

3)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

第四编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以及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第十九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经济 和经济思想演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化过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加剧。按照王亚南先生的说法,“1840年鸦片战争,是所谓欧洲资本主义的文明和中国封建的野蛮第一次的搏斗。这次搏斗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重炮的作用,同时也证明了资本主义的鸦片的效果。中国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宁当看为是欧洲资本主义对中国封建主义胜利的开端,同时也正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端。”¹ 在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有三种经济因素或经济力量是值得关注的。第一种经济因素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直接经营的诸多轻工业企业和部分重工业企业。《马关条约》后,日本人,继而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开设了大批纺织厂、面粉厂、火柴厂等等;外国人还取得在中国开矿、筑路等特权,从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第二种经济因素是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兴起的官僚买办经济。这种经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军事性质,但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后来又开始创办一些民用工矿交通企业),如李鸿章在1862年设立的上海制炮局及后来(1865)在此基础上扩建的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设立的金陵机器局、1876年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81年在天津设立的电信总局、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建马尾设立的船政局、1876年设立的甘肃织呢总局,等等。这些企业的设立显然大大有助于官僚买办资本的积累。第三种经济因素是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企业。很显然,正如王亚南先生分析的那样,“外资像洪水似地流入中国”之后,“他们的高额利润,和利权外溢的刺激,激发

¹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了民族商工业者集资创办纺织工厂及其他各种轻工业的热望”^[1]。民族工业虽然有大量的新式工厂,但实力一般较小,难以与洋务派创办的官僚资本及其经营的企业比肩。不过,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出现的由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经济,其意义却非同小可。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着互为对抗、互为依赖的关系。其中,由洋务派官僚创办并经营的新式工业,不论以何种名义,是“图强”,还是“挽回权利”,均是深得外国侵略势力容许甚至支持的。《马关条约》后,清政府也鉴于光“图强”仍不能避免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之战惨败的教训,而感到有必要“致富”了,因而对于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奖励措施。“所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松弛了对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压力的时候,以纺织业为主的中国民营工业就迅速成长起来。”^[2]至于洋务派所创办和经营的新式工业,虽与外国入侵经济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本身又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由最初兴办军事工业,以“图强”,而逐渐兴办一些民用工矿企业,在经营上也逐渐采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与民族资本相结合,借以控制、利用民族资本为其服务;而民族资本也正好从初期被控制而受保护,到慢慢成长,争取独立发展,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总之,该时期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的同时,对中国社会经济也进行了渗透,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因此而发生明显变化。近代新式工业尤其是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不断增长,中国农产品以及部分初级工业品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日益明显地被动摇。

本章所要考察的,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各个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所坚持并不断发展的经济观点和思想。当然,正像胡寄窗先生所言,该时期“所谓新经济观点,均系由国外引进的久已形成体系的现存理论”^[3],而并无多少中国思想家自己的创见,从而,总结分析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应侧重分析各种新旧经济思想的斗争演变过程,旧的如何消灭及何时消灭,新的如何发展传播及其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传播情况”^[4]。该时期的经济观点或思想,动态地看,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1]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3]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第一种是统治阶级内部顽固派所坚持的经济观点。这是典型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对已被宋代以来开明学者,尤其是明清启蒙思想家批判过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等传统教条抱残守缺,抵制资本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反对采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如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刘锡鸿,虽担任过驻德公使,对西方近代工业和社会经济政治有亲身体验,但仍敌视科学技术和新式工业,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这种思想意识本已陈腐,但在当时国家倍受外国侵略势力掠夺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欺骗性。它往往以封建“正统”自居,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同资本主义侵略行为混为一谈,打出“攘夷”旗号,并将各种社会经济改革思想斥为“离经叛道”、“卖国”,而“把内脏炖空了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说成是能够造成普遍幸福的和谐的制度”。¹ 总体而言,这一类思想意识较少“经济”的成分,也不成体系,在经济思想史上并无重要的地位,惟因其以当时有利的政治地位,对洋务派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活动和言论发起过多方诘难,故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在此简单提及是必要的。

第二种是洋务派的经济观点。洋务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并活跃在当时统治舞台上的一个政治集团,它通过办洋务的活动,接触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接受了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的一些观念,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制度方面与同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洋务派毕竟是直接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服务的,其经济思想不但仍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而且存在很强烈的买办色彩,有学者甚至认为它“实际上是传统封建思想和外国殖民奴化思想的混合物”²。洋务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为李鸿章、张之洞。李鸿章曾批评当时的顽固派知识分子是“器器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于尊主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³的俗儒,认为“能自强则必先变法”⁴,而所谓变法,主要是学习西方诸国的军事技术,建立新式军事工业。他还强调“强与富相因”,宣称“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⁵。张之洞曾作为清流派的一员对洋务派进行批评,后来思想有所转变,变成了洋务派的中坚人物。他反对维新变法运动,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点,主张在保持封建制度的前提

1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页。

2 姚家华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67页。

3 李鸿章:《复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折》,《李文忠公全集》。

4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六》,《李文忠公全集》。

5 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

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洋务派的经济思想虽较顽固派更开放些,但一方面如上文已分析的那样买办意识较浓厚,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官僚垄断的倾向,在兴办新式工业中,其“官督商办”的管理主张落脚点还是在“官督”上,“商办”只不过是手段,而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因此,遭到后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反对是必然的。

第三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是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代表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商人、地方官僚利益的政治派别。改良派较多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以及哲学和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求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国内,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改良派思想家针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国内清王朝的顽固而落后的封建统治,提出了一些在不触动清王朝封建君主政权的前提下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主张。但早期由于其自身力量的单薄,往往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洋务派身上,其经济主张也往往附和于洋务派的主张中,如王韬、马建忠、郑观应、陈炽等人的经济观点。随着民族资本的日益发展,以及洋务运动的破产,改良主义思想家开始与洋务派分道扬镳,其经济主张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和个性,成为维新变法及此后改良派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的经济观点和主张。

第四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经济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要求,反对改良派企图在不变更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良的道路来振兴中国实业的观点,而主张在推翻满清政权的前提下,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而表现出与改良派经济思想的本质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经济思想在20世纪初叶曾有过颇为激烈的论战。前者虽曾在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斗争中表现出民族气节和历史进步性,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渐趋保守,尤其是当后者逐渐形成并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性时,遂转而把矛盾指向后者;而后者则在与前者的交锋、论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之一。当然,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经济思想领域,各种思潮朝来夕往,你方唱罢我登场,并且也多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点。而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以前可以说尚未开始。

第二节 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一、马建忠的经济思想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年少时即因感受到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危害,而放弃对科举功名的追求,从事西方语言和西方科学的学习研究,掌握英、法、拉丁等语言。31岁时被派往巴黎政治学院留学,其间兼任清政府驻英、法使馆翻译。回国后曾奉派在一些官营或官督商办企业任职^①。马建忠的求学、任职经历,使他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代表的经济理论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作为从洋务派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对洋务派实施的某些政策、措施产生过一定影响。据《清史稿》列传称,他曾多次向李鸿章条陈意见,答复征询的经济问题,颇受李鸿章赞赏,故“所议多能采行”^②。

马建忠对经济问题的论述主要在其所著的《适可斋记言》中。其经济思想主要包括对外贸易思想和工矿业经营思想两部分。

1. 对外贸易思想

马建忠的对外贸易思想已与其同时代其他一些思想家仅将观点建立在一定的贸易常识基础上不同,它以当时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国际贸易理论为依据,因此有较高的理论起点。他对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差额问题已有较理性的认识,认为“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③。对于“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的结论,是需要在对对外贸易的实质以及对贸易双方的比较利益有较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出的,梁启超在为《适可斋记言记行》所作的“序言”中也阐发说,“通商,万国之所同也,客帮之利五而主国之利十,未或以为害也”。这虽尚不能说是受到马建忠观点的影响,但至少表明梁启超也是极为赞赏马建忠关于贸易差额的见解的。

马建忠的对外贸易思想还具有较浓厚的保护贸易色彩。他认为,“须中

① 《清史稿》,列传卷1。

② 《清史稿》,列传卷1。

③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富民说。

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①。那么如何做到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呢？马建忠认识到“外洋恒商之商首在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认为“税轻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②。换句话说，只要减轻对出口商品的关税，就能使这些商品具有价格上的优势，便于与外国同类商品进行竞争，并在竞争中获胜，从而增加国际上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而正因为国际市场增大了，即使关税比例降低，亦能增加本国总的关税收入。但对个别“国内独有之土产，不畏他人争利者”，马建忠还是认为“不妨于出口重征之”^③。与出口的一般原则相反，马建忠为了保护国内工商业，认为要“重征进口货”。他主张除对“进口货”中的“国内所产者少，必仰给于别国者”，或者“有其货为民生所必需者”，可以“宽征”之外，对于“外来制成之货，本国亦有者”，或“其货惟富豪始能置者”，或“民虽不得不用而究不能多用者”，应“重征之”，“以护商民”^④和节约开支。可见，马建忠主张对大部分进口商品课以重税，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藉以减少进口，使民众转而购买本国商品，保护本国商民的生产和贸易；二是减少奢侈商品的进口，以节国用，从而减少白银的外流。可见，马建忠已充分认识到利用关税这一杠杆来调节进出口商品的流动。

2. 工商企业经营思想

马建忠曾奉派担任过一些官营或官督商办企业的负责人，因而对工商企业经营有所了解，也有所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和思想。

(1)通过举债、集股方式，兴办工商企业。马建忠曾系统地学习过西方的财政金融理论，对“债务”的理解自不同于当时其他一般官员和工商业者。他根据对中外政治经济状况的对比分析，认识到“立富强之基者莫铁路若也”，而因封建财政困乏，富商又多疑虑，故只有通过举债或集股两种方式，方能解决大规模兴办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他大声疾呼：“国帑虽空独不能賒贷而化无为有乎！民资虽竭独不能纠股而集少成多乎？”^⑤

关于举债，尤其是举借外债，马建忠认为，这是在民间集股风气未开，集股艰难的情况下，“无已则有借洋债之一法”，认为这于商务是非常可行的，只要能坚持“取信之有本”、“告贷之有方”、“偿还之有期”这三条“借债之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富民说。

②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富民说。

③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富民说。

④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富民说。

⑤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铁道论。

径”。马建忠还对举“洋债”的特点及种种具体办法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介绍。比如,他懂得举“洋债”只要能提供精确的工程设计方案,以及未来的利润预期“以示外洋”即可,而绝不需以国家关税或抵押品作担保,从中可见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融资和财务活动均有较系统的认识。

至于集股经营,马建忠认为它可以“集少而成多”,解决大规模企业资金来源问题。他考察了西方各国集股经营的各种方式,“或纠集于商,或取给于官,或官与商相合办”。^①具体而言,有的是“官先创造而交商经理,或商先创造而官为经理”;有的是由于“利入甚微,制造经理之费难于取偿,始有官商合办之一法”;有的则是因无利可图,“于是官自办之”。^②对于“官商合办”之法,又可有不同的情形:“有官租地与商而不取其值,权其利息之厚薄以定租地之久暂,限满归官者;有商自造自理而官为津贴者;有商股难集而官代为偿其息以鼓舞之者;有需股甚厚难以纠集而告贷于人难以取信,于是官为具保者。”^③马建忠的集股经营观点仍带有明显的官督、官助色彩。这一方面可能与其本人系从洋务派集团中分化出来有很大关系,但另一方面,正像胡寄窗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在工商业刚起步尚很弱小阶段,政府参与工商业活动,本来是应该有帮助的,“在那种既无集股习惯而资本市场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出现一批官营的或官府参与的带有不少缺点的近代大工业,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它们时要好些,好得多些”^④。

马建忠对大资本经营或大规模生产的优点有较深的认识。比如,他在论述纺织生产时说:“织布机器费用浩大,少织则费重而本有所亏,多织则费减而利可稳获……”^⑤在谈论对外贸易时又说:“散商股归并为数大公司,……则采办价易于会商,无高抬之虞,资本既厚,贷款少而利息轻,货到各口不必急于求售,自无需仰承洋商鼻息,待时而估则亏本者鲜矣。”^⑥这种认识与他集股经营的见解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陈炽的经济思想

陈炽(? - 1900),字次亮,江西瑞金人。早年即“留心当世之务”,曾历任

①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铁道论。

②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铁道论。

③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铁道论。

④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页。

⑤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富民说。

⑥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4,上李伯相说漠河开矿事宜禀。

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等职。为寻求国家自强之道，他钻研西学，游历考察沿海及香港、澳门等地，向有识之士求教，形成了其较具特色的改良主义思想。陈炽于甲午战争前著成《庸书外篇》四卷，提出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1896年刊行《续富国策》，以自己的理解阐发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续富国策》分《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部分，共64个项目，涉及到农林水利、农产品及其相关轻工产品的加工生产、采矿、冶金、建筑、机械制造、公司经营、金融保险、交通等等，可谓熔各种庞杂的经济、管理和生产经营知识于一炉。陈炽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一种典型的“旧瓶装新酒”的倾向，即以中国古老的观念、思想附会新的事物，包括当时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和经济概念，从而得出“故知彼物之本属于我，则无庸显立异同；知西法之本出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①的有趣结论。但不管如何，陈炽并没有教导人们去“复古”，而是激励人们毫不犹豫地学习“西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其观点客观上还有其积极意义。陈炽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三方面。

1. 重视农业与工业的生产至上观点

陈炽认为，财富的生产必须是真正的创造，而不是靠“移”或“夺”而获得。他说：“三代后之言财用者，皆移之尔，或夺之尔，未有能生之者。……若生财之道，则必地上本无是物，人间本无是财，而今忽有之。”^②从这个基本的财富生产概念出发，陈炽分析阐述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及经营方式和原则的重要性。他通过考察认为，“法、德、奥、意诸国，其立国之大利，皆在于农”^③。而“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④。可见，他对农业、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已有充分的认识。陈炽还谈到农业生产经营的不同方式。如“讲农学、用机器、一人之力足抵五十人、一亩之收足抵五十亩之获”，这实际上是英国式的大规模农场经营方式；又如用集约经营的方式生产城市需要的农业作物，一般以牲畜耕作而不采用机器，这又类似于法国式农业生产方式。陈炽认为，农业生产不仅仅是种粮食，而且还要生产经营蚕桑、木材，甚至咖啡、葡萄酒等，以抵制这些物品的进口，减少货币的漏卮。至于对工矿业生产，陈炽认为，古代圣人一向是重视“百工”的。“圣贤之言，谆谆以百工与士大夫相提并

① 陈炽：《庸书内篇》卷上，自强。

② 陈炽：《续富国策》自序。

③ 陈炽：《续富国策》卷上，农书水利富国说。

④ 陈炽：《续富国策》卷上，创立商部说。

论”，“学者进德修业之心，与工师制器尚象之义，功分体用，义判精粗，本末稍殊，源统则一，此治国平天下之实功。故曰，劝百工则财用足也”^①。针对“机器夺民生业”的责难，陈炽认为，开办工厂不但不会夺民生业，相反还成为“养民”的有效手段。他说：“每厂工作万人，或数千人，少亦数百人。使中国各行省工厂大开，则千万贫民立可饱食暖衣，安室家而养妻子。”^②他还说：“一手一足之劳，岂足以济四万万众牛民之日用”，只有改用机器生产，则“人之目所不能见者，以机器见之；人之耳所不能闻者，以机器闻之；人之手不能举者，以机器举之；人之足所不能及者，以机器及之；人之心思智慧千力万气所不能成者，以机器成之”^③。在陈炽看来，机器（应指广义理解为机械生产）比之于人力，其生产力不知要提高多少倍！可见，陈炽不但认定开办工厂可以为穷人找到谋生的出路，而且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机器生产突破了人力劳动的生理极限，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手段。陈炽对之作结论性表述：“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厂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易。”

2. 关于商业经营与商业贸易的思想

前已论及，陈炽已意识到只有生产才能创造财富，流通不能创造财富，认为“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用在工”。但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商业贸易，而只能说明他对生产与流通的相互关系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事实上，陈炽不但相当重视商业经营和贸易，而且对商业经营和贸易的原则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陈炽分析他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是“无商是无税也。无税是无国也。……然则商之于国也，国之于商也，固已共戚同体，迥非昔比矣”^④。因此，他坚决主张创设商部，制定“商律”，在各城各埠设商务局，遍立商务学堂，以“保商”、“护商”、“激扬鼓舞，整齐教诲诸商”^⑤。可见，他并不停留在一般的概念或观念上，而是把保商与律商结合起来，从而更为贴近经济现实。

陈炽对商业经营制度和经营手段、原则有较为深刻的见解。首先，他赞成集股设立公司，认为这样对国内贸易而言，可以减轻成本，易获赢利；对出口公司而言，可以“自擅权宜”，避免因洋商大资本操纵市价而受损。其次，他

① 陈炽：《救国富策》卷3，广书·劝工强国说。

② 陈炽：《续国富策》卷3，广艺养民说。

③ 陈炽：《续国富策》卷3，广艺养民说。

④ 陈炽：《救国富策》卷3，商书创立商部说。

⑤ 陈炽：《续国富策》卷1，商书创立商部说。

强调商业贸易必须了解对方(包括对象国)的商情信息。如对外贸易上,应考察各国的商品多寡、税制情况、交通运输状况等等;国内贸易上,也应设专官广泛了解商品情况,以作商品经营者参考。¹此外,陈炽还特别强调在市场竞争中把握时机,即“占先”的重要性。他说:“所谓占先者,一埠为人未往我先往。一货为人未运我先运,一物为人未售我先售,前知亿中,合节同符。独争天下之先,不落他人之后。此泰西诸国所兢兢然心慕手追,而英人独称巨擘者也。”²当然,在市场竞争中“占先”,这与殖民主义利用船坚炮利进行经济掠夺,并不是一回事,但竞争提供了向外拓展市场的制度背景,这也许是陈炽已经领会到了的。

此外,陈炽在其《续富国策》中还专门谈到了银行、货币流通等问题。他认为银行的作用是“通商惠工之真源,怀远招携之实效”³,若通商而不设银行,这无异“是犹涉水而无梁,乘马而无辔”⁴。至于货币问题,则陈炽的言论实无多少值得称述之处。

三、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年轻时曾在英人傅兰雅的夜校学英语,后独立经营过航运及商业;期间还在英国人开办的太古洋行当过买办,以商股身份担任过洋务派控制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的总办等职务。可见,郑观应经历丰富,身份复杂,是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家,或者说是一个由买办分化出来的民族资本家。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较集中地反映在其于1893年刊行的《盛世危言》一书中。《盛世危言》比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和陈炽的《续富国策》还早刊行三年,因其“所具有的真实感和针对性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绝大多数著作家所无法比拟的”⁵而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前一再被清廷大员推荐给清帝,并被敕令印发给有关官僚看阅。《盛世危言》的内容主要有:

1. 鼓吹“商战”,为商业、商人的发展和利益创造条件

郑观应观察到,“各国兼并,各国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

1 参见陈炽《续富国策》卷4,商书考察商途说。

2 陈炽:《续富国策》卷4,商书纠集公司说。

3 陈炽:《续富国策》卷4,商书创开银行说。

4 陈炽:《续富国策》卷4,商书创开银行说。

5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之先导”^①。换句话说,商业是强国的根本,西方各国的外交甚至军事活动,皆以通商为核心,又以商务、商人为先导。因此,郑观应认为要“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②,因为“兵之吞并,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③。

郑观应列举了商战的十大项目,包括“鸦片战”、“用物战”、“食物战”、“零星杂货战”、“矿产战”等,甚至还包括“货币战”。其总的原则是大力发展传统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为了在竞争中取胜,要千方百计提高质量,以敌得过外货,还要降低运销成本,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市场的商品销售情况,只有“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

郑观应既然鼓吹“商战”,自然就对工商业活动以及商人,包括产业资本家予以重视,即使在讨论农事时,也不忘“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俱,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④;在讨论“商战”时,更指出“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⑤。强调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足见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对商业及商人资本的重视。

2. 主张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

郑观应的“商战”概念,并不单单强调商业、商人资本的作用,而事实上涵盖了包括工业、运输业、农业在内的有关商业经营活动。他十分重视工矿业的作用,认为“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诚为急务”^⑥，“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耳”^⑦,从而应“有工以翼商”^⑧。郑观应既十分重视工矿业,就自然会关心工矿业的生产手段问题。对他总的观点是: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

他在《盛世危言》中指出:“尝阅西书,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但知购买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始能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⑨。他反对一味进口实际上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商务二。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商战上。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商战下。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农事。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商战下。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开矿上。

⑦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技艺。

⑧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商战下。

⑨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5,商务五。

能自己制造的机器,而主张“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裕人材”,培养能制造机器的技术人员。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即使在今天看来,恐也未曾完全过时。

第三节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康有为(183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年轻时曾苦研佛家典籍,“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以经营天下为志。1882年开始钻研和宣扬西学,并受中法战争刺激而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途径。1885年开始写作《人类公理》,历经两年后于1887年完成。1888年在北京应试时,第一次上书清帝要求变法,未果。第二年回广东从事讲学。1895年上京参加会试时,正逢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遂与其弟子梁启超等发动1000多名同时参加会试的举子联名上书清帝,即史称的“公车上书”。后发起并组织强学会。1898年,其变法主张终于获光绪皇帝的支持,遂出现了短期的自上而下的革新变法运动,即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百日维新”遭到以皇太后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扼杀。康有为逃亡国外,从事保皇活动。辛亥革命后回国,但面对日益发展的形势,其思想渐趋保守,反对共和政体,曾帮助张勋复辟,后又以失败告终。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位政治上极具悲剧性,思想文化上又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典型人物。其著作颇丰,其中,《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理财救国论》、《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等著述,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经济观点,尤其是戊戌变法后著成的《大同书》,较集中体现了康有为最主要的经济思想。

本节分四方面进行讨论。

一、“富国”、“养民”思想

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从其完整的政策主张来分析,这里所谓的“富国为先”,实际包含了增进国家财政收入,改善民生两方面的内容,即“富国”和“养民”。具体而言,康有为提出了六项“富国之法”和四项“养民之法”。

六项“富国之法”为:钞法、铁路、机器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实际上包含了近代信用事业和近代交通、采矿业。康有为主张除货币发行和邮政业外,其他一切工矿交通事业均可“一付于民”,“纵民为之”。他坚决反对洋务官僚兴办的近代官营或官商合营企业,认为那种垄断式的官督商办经营方

式是“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¹。他主张发展铁路、采矿、机器轮舟等民营化的企业，并将之与发展货币信用制度、邮政事业等结合起来，共同构成“富国之法”，表明他已经从传统的依靠政府直接经营经济事业，达致富国目的的思维模式中超越出来，而意识到只有发展非官僚的、非买办式的民族工业，才能最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富民即富国。应该说，这在当时民族工业已经开始从官僚、买办经济的夹缝中壮大起来，成为一种新生力量的背景下，是试图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鼓与呼，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要求。

四项“养民之法”为：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实际上是传统的基础产业，再加上对贫穷无业劳动力的妥然安置。当然，从康有为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的所谓务农、劝工、惠商、恤贫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农工商业的重视，而是已包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利益原则等内容在内了。

二、“定为工国”的工业化主张

康有为曾持有以商立国的主张。²但在戊戌变法时，他的这一主张有了较大的改变，提出了“定为工国”的口号；他通过对西洋诸强国的考察分析，总结说：“大国富强乃十倍于我，小国亦与我等，其理何哉？深考其由，则以诸欧政俗学艺，竞尚日新，若其工艺精奇，则以讲求物质故”。“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乃理之相寻，视其新导而已……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值乎？皇上诚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则所以导民为治，自有在矣。”³可见，康有为已经开始倡导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了，只不过其并没有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分析工业化的意义，而仅仅从农国“守旧日愚”而无法与工业国的“日新日智”相抗衡来证明“定为工国”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康有为的“定为工国”主张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因此，被称为“中国主张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⁴是并不过分的。

1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2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3 康有为：《游历工艺奖创新折》。

4 姚家华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3页。

三、“大同”理想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之前的1885-1887年间写成的《人类公理》一书中,已经对未来“大同”社会作了某种程度上的描绘。比如,他认为,到大同社会时,劳动者每日只需做几刻时间的劳动,劳动的产品可能百倍于现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也可能十倍于现时。人们每天除工作几刻时间外,其余皆为行乐之时。^①在戊戌变法后,他写成了《大同书》。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人类公理》的大同思想,根据《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说法和《公羊春秋》的“三世说”,结合他亡命海外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亲身经历,提出了一个详尽、理想的“大同”社会构想。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共分十大部。其有关经济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庚部《去产界公生业》与癸部《去苦界至极乐》中,涉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规划、商品与货币、产品分配、消费等多项经济范畴。

具体内容如下:

1.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康有为认为,要实现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②。也就是说,要取消私人拥有财产、资产的制度实现公有化,农、工、商各业概莫能外。

2. 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农、工、商等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消除因无序竞争造成的危害,以做到“工人之作器,适与生人之用器相等,无重复之余货,无腐败之殄天物”^③。

3. 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应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享受充分的休息、娱乐和学习。他设想“一人作工日力,仅三四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④。

4. 在消费方面,追求让人民的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如住房是“云窗雾槛、贝阙珠宫,玉楼瑶殿”,衣着方面是“雾縠珠衣”,饮食方面是“列座万千,日日皆是无遮大会”^⑤。

5. 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和奖金制,除劳动者靠领取货币工资外,包括由富人、大富人担任的各行业的领导人也是领取奖金,只不过奖金的数额可非

① 梁启超:《南海先生传》。

② 康有为:《大同书》。

③ 康有为:《大同书》。

④ 康有为:《大同书》。

⑤ 康有为:《大同书》。

常大,非工资可比。也正因此,整个经济社会中,货币及银行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同社会里开设有“公银行”,主办货币出纳和全社会货币收支的核算工作,吸收存款并支付利息。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还包括“去国界”、“去级界”、“去形界”、“去家界”、“去种界”等国际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内容,主张废除国家、消灭等级差别、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契约制度、消灭种族压迫与奴役,但其手段却是消灭或改变除白色人种外的其他种族,做到“无人种之殊”。由于这些内容不属于典型的经济观点,本书将不再展开分析。

四、经济救国思想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除《大同书》外,还出版过《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三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中强调,救国之法“惟有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实行“金主币”制度是“起死之第一方”;而通过遍设银行、发行纸币等“理财”手段,可以“富力无敌于天下”;等等。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救国”思想。

在《物质救国论》中,康有为说:“以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较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①他认为,空谈民主、革命、平等、自由是有害无益的。他甚至不惜否定自己维新变法之举,悔恨自己“鄙人愚妄,实变法之前驱,实为罪魁宜讨者也”^②。他一改自己过去的言论,鼓吹只有讲求“物质”和“物质之学”才能救中国,这还真有点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事实上,康有为发表此观点时所面对的情势已发生了变化,他所着急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越来越壮大,其“危险”的言行越来越危害到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有着向资产阶级转化要求的商人、地主和官僚的利益,因此,不惜搬出曾被自己否定过的洋务派的“船坚炮利”政策思想,甚至不惜否定以前为其博得声名的维新变法之举,懊悔自己以前没能为“船坚炮利”有所作为,可见其用心是何等之良苦!单从经济思想的价值而言,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实无多少新意可言。当然,康有为也不是断然否定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是认为这些思想尚未适时。比如,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宣传“或进以社会至平之义,岂不持之有理哉!无若未至其时而

①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② 康有为:《中国还魂论》,《康南海文集》,转引自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页。

误行之，徒足以召乱也”。这尽管是荒谬的观点，但从中我们似也可见他是以动态的观点去认识社会的发展的。

在《金主币救国论》中，康有为认为，中国贫穷积弱的原因，是没有实行金本位制，因为在世界诸多国家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中国仍实行银本位，就必然导致金贵银贱，使民族陷于危亡之中，“夫以五千年文明古国，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所以致亡之由，不过为银落金涨之故”¹。因此，“中国生计之命，决于此两年间，能改金币而善图之则存，不改金币而坐守旧法则亡”²。

康有为对金本位制的推崇，以及将中国陷于危亡的原因归咎于守旧法，实行银本位不变，这多少有些夸大其辞，甚至本末倒置。比如，他例举“银落金涨”的具体弊害时指出，中国因制造业落后，不能自制机器，所有机器均依赖于向欧美进口，所以金贵银贱将使购置机器者蒙受损失。这是典型的“就事论事”之见，缺乏宏观的、动态的分析。首先，币值贬低，如若作为一种主动的贸易保护手段，在一定阶段对国内生产是有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刺激作用的。他所谓的“吾国未能自置机器也”，从动态看应不能作为定论或前提。第二，即使短期内，因进口机器蒙受因金价上涨而导致的部分损失，也不能将之提到关乎国家危亡的高度。事实上，机器只是当时进口商品中比例极小的部分。

康有为所例举的弊害中，认为因金涨银落造成“偿外债息，补镑大亏”，这从现象上看自然是事实，但“偿外债息”本身并不是“金涨银落”所致，相反恰恰是中国贫弱的结果。因而说不实行金本位制造成中国贫弱是本末倒置。如果说，“金涨银落”的情势给已经处在危亡中的中国“雪上加霜”，则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

在《理财救国论》中，康有为主张遍设银行网，大量发行纸币。他说：“善用银行者，无而能为有，虚而能为实，约而能为泰。”³ 还宣称“将欲救国，将欲富民，将欲建海陆空，将欲变行新法，一切皆银行是赖”⁴。他非常赞赏西方的金融富豪，认为如若中国亦有诸多这样的大富豪，则“岂止内地之农、工、商、矿可大起，即远边之辽、蒙、回、藏之实利可速拓殖，中国之贫民，岂复

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论》。

2 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论》。

3 康有为：《理财救国论》。

4 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论》。

忧生”¹。可见,他简直把银行说成是万能的“点石成金的魔指”。至于金融发展的基础是什么,银行业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如何,康有为未有合理的分析,这使他的那番理财救国“宏论”流于空泛,甚至因果倒置。康有为还鼓吹城市土地投机,认为利用银行进行土地投机、发展建筑,可以增加财富。他宣称并分析道:“夫市街宅地之抵押,尤为兴起国富之要图。建筑愈多则地价愈涨,人民坐增其富源,农、工、矿亦随之而盛长,于是国富大增焉。”² 这实在找不出经济理论上的依据,我们倒是可以从其在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口号的同时整理出版《理财救国论》、鼓吹金融垄断和土地投机的种种表现中,嗅出一点政治的味道来。

第四节 严复的经济思想

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年幼时开始家道不济,14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于1877年奉派赴英国的海军学校留学,两年后学成回国,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和总办等职。甲午战争后,鼓吹维新变法。1897年译成赫胥黎的《天演论》,对维新变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严复虽为长期受洋务派培养和任用的官员,但并未对洋务派的“船坚炮利”政策推波助澜,相反在政治上鼓吹君主立宪,为维新派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而事实上,他虽鼓吹立宪变法,却又未曾实际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变法活动,辛亥革命后,甚至仍主张恢复帝制。从本质上看,严复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因其学识渊博、视野广阔而曾被誉为“五四”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大代表”之一,³一位思想和信念多变却著译不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来定位他,才能超脱开他晚年日益落伍甚至反动的政治思想观点,对其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严复写过不少政治论文,如《论世交之亟》、《原强》等,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思想意识展开尖锐的抨击。他所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作为当时在

① 康有为:《理财救国论》。

② 康有为:《理财救国论》。

③ 另一位代表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思想意识领域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资产阶级式的理论武器。1900年,严复译成亚当·斯密的《原富》,并于1902年正式出版,^①从而使其成为“我国登入英国古典经济学殿堂的第一人”^②。严复的经济思想也基本表现在为《原富》译本所作的各种按语及“译事例言”中。下面我们择要予以分析介绍。

一、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垄断与干预

严复在其政治论文《原强》中已指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③这事实上已经把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与人民富强、国家强盛结合成一组逻辑命题。在《原富》按语中,他更直截了当地说:“民之生计,只官听民自谋,上惟勿扰,为裨已多。”^④也就是说,政府只要放弃干涉政策,不扰民,让人民自由地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了,也就是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了。严复坚持认为经济自由能解决一切经济上的问题,甚至认为英国历史上由贫转富、由弱转强,均是实行亚当·斯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所致,因此他对国家干预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指出国家干预是“强物情,就已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⑤。严复联系当时中国实际,指责洋务派把持新式工业,实行垄断制度,办了几十年的工业,只是“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⑥。他根据斯密的经济观点,主张只有极少数的经济活动可以由国家直接进行管理或控制。这些经济事项包括:(1)邮政、电业等不宜分散经营而由国家直接经营比较有效率的行业;(2)学校等事关重大而由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事业;(3)某些私人无力出资的大企业,在整个社会尚未形成集资经营风气之前,可由国家创办“为之先导”。但这实在是“主不得正而后为之”,决不可以为常,像洋务派官僚那样,“攘臂奋肌,常以官督商办为要图”^⑦。

二、笃信供求价值论,反对劳动价值观

严复崇尚经济自由主义自是与在国内反对洋务集团对新式工业垄断有

① 即现行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及性质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最初译本。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③ 严复:《原强》,《严几道诗文集》卷1。

④ 严复:《原富》,第346—347页“按语”。

⑤ 严复:《原富》,第57页“按语”。

⑥ 严复:《原富》,第509页“按语”。

⑦ 严复:《原富》,第724页“按语”。

关,在理论上则是与其笃信市场供求价值论密切相关。我们知道,斯密的价值学说中同时存在着供求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两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理论观点,给以后的经济学者提供了各自需要的学术营养。严复可能受到后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价值论影响较深,从斯密价值学说中找到依据,认为供求价值论是“斯密所独到”¹,而对斯密价值学论中的劳动价值观则予以否定,评论说:“斯密氏以产物之功力为物之真值,值之高下视功力之难易多少为差,其言虽近理,然智者千虑之一失也。盖物无定值,而纯视供求二者相剂之间,供少求多,难得则贵;供多求少,易有则贱。方其难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²。他还批评斯密对“供求相剂之例往往信之不笃、守之不坚”³。殊不知,这恰恰就是斯密有别于以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地方。不过,从另外的角度看,严复毕竟看出了斯密价值学说的矛盾之处,而这无疑是需要较全面的经济学功底的。在当时中国已算凤毛麟角了。

三、主张本末并重,反对“贵本而轻末”

严复在介绍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还不时运用其中的许多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对中国传统经济范畴进行分析或重新解释。其中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的“改造”可谓典型之一例。在农商关系上,严复仍使用传统的“本末”范畴,即把农业称作“本”,把工商业称为“末”。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严复试图迎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以便更能接受其经济观点,更重要的还在于,严复认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剩余产品是工商业之所以独立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农业不振,则社会财富就不能增长,社会分工难以发展,从而“工商之业”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将作为工商业立业之本的农业称为“本业”,将从农业衍生出来的工商业称作“末业”,也就不难理解了。

严复的“本”“末”观不同于传统教条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本”与“重要”、“末”与“不重要”划等号,而是非常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工商业和农业都是“相养所必资”。他也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事实上对农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比如,他就移民之事发表议论说:“若政府只为移民备车牛,借种子,置屋庐,而不顾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则移民们就会因农产品销不出去而不过两三年即“委之而去”,移民新垦的土地将重新沦为荒地。这样,还何谈发

¹ 严复:《原富》,第62页“按语”。

² 严复:《原富》,第76页“按语”。

³ 严复:《原富》,第195页“按语”。

展农业呢？可见，严复虽然承认工商业“理实有本末之分”¹⁴，但不主张贵本而贱末，认为“本业”和“末业”同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应是“于国为并重”¹⁵。

当然，严复所处的时代已是西方资本主义长足发展的时代，他视野中的农业已决然不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式的农业，而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的近代农业。也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他的那种对农业剩余产品及其运输、销售的分析，那种对运输、销售给农业造成影响的判断，才能自圆其说。

四、主张有条件的崇俭，反对“不生不养”的守财行为

严复在原则上仍然赞赏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崇俭”主张，认为应“以俭为宝”，但他的“崇俭”也不同于“崇俭黜奢”的传统教条。他认为“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俭将有所养，俭将有所生也”；第二种情况是俭而“不生不养”。就第一种情况而言，节约消费是为了将更多的钱作为“母财”，以增加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不断引起资本的增值，因此，这实质上已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了；就第二种情况而言，节约仅仅是为了敛财，而并没有将节约下来的钱财作为积累，用于再生产以实现财富的增值。严复认为，只有第一种情况值得推崇，而第二种情况则不应提倡。他说：“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生不养，则财之蠹贼而已，何得有富国足民之效乎？”¹⁶ 他甚至警告，若俭而使财货停滞不通，将使国家缺乏创造的动力，反而趋于贫困。结果“其害烈于侈靡”¹⁷。

严复既主张“以俭为宝”，自然就反对奢侈，认为从宏观来看，过度的消费，使“财耗而不复，必竭之道也”¹⁸。但他也不是一概反对增加个人消费。他评论说：“今使一国之民，举孜孜于求富，既富矣，又不愿为享用之隆，则也蔽民而已。况无享用则物产丰盈之后，民将缙然止足，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¹⁹ 也就是说，过度节俭，使社会需求减少，人们继续求富的动力也减弱，对社会并不利。消费要以不妨碍积累为原则。超过这个限度的消费

14 严复：《原富》，第4页“按语”。

15 严复：《原富》，第114页“按语”。

16 严复：《原富》，第339页“按语”。

17 严复：《原富》，第302页“按语”。

18 严复：《原富》，第339页“按语”。

19 严复：《原富》，第350页“按语”。

将影响到积累,从而也影响到再生产,则这种消费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奢侈的消费;至于在这个限度内的消费则都是应当允许并且鼓励的。他总结说:“是故理富之术,在一国之母财,支费相酌为盈虚。支费非不可多也,实且以多为费。……顾事必求其可长,而养必期其无竭。”¹ 这表明,严复对积累与消费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对消费的作用的认识,已有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五、其他经济观点

严复曾广泛涉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也实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故在对外贸易、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乃至救荒等诸多问题上均有论述,提出自己特有的看法。下面仅择几点作简要介绍。

关于对外贸易,严复不同意只有贸易顺差才能使国家致富,而逆差则使国家蒙受损失,导致“漏卮”的观点,认为衡量一国贫富、强弱的标准,不在于拥有金银的多寡,而在于国民财富生产的多少。他强调为“国中贸易,利国过于国外贸易”²,只有国内生产是对外贸易的前提和立足点。

严复也认识到国际贸易中因贸易条件的不同而导致实际进出口的不平等。如欧洲各国对于进出口货物是“务出熟而进生”,而中国通商之货是“常出生而进熟”,用现代的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中国常出口附加价值低的初级产品,而进口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品,这显然于我们不利。对此,严复并不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或干脆闭关,而是倡导在国外的使臣了解、掌握当地对中国商品的市场需求情况后,开拓国际市场,甚至不惜“自备轮舟运往外国”,以抵制国外垄断并“开无穷之利源”。³

严复还洞察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尤其是对其存在的贫富悬殊和垄断压迫提出非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实为亘古之未有”。但其结果却被“奸雄”所垄断,而“垄断即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⁴。贫富分化又必然导致“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⁵。不管严复的主观意图如何,这种分析毕竟多少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确实存在的部分脆弱“神经”。

1 严复:《原富》,第350页“按语”。

2 严复:《原富》,第426页“按语”。

3 严复:《原富》,第365页“按语”。

4 严复:《原强》,《严几道诗文集》卷1。

5 严复:《原强》,《严几道诗文集》卷1。

第五节 谭嗣同和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谭嗣同、梁启超同为维新变法活动的重要成员。本节将对两人各具特色的经济思想分别进行简要的考察分析。

一、谭嗣同的经济思想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但因受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倾慕西法,先后创立算学社、时务学堂、南学会等,刊行《湘报》,从一名“视察风土,物色豪杰”的游侠青年,逐渐转变为维新运动的主要鼓吹者之一。1898年入京任清政府的军机处章京,直接参与了康有为倡导的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放弃逃亡机会,选择牺牲以殉理想,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的经济思想,较集中地反映在其代表作《仁学》中。《仁学》中的核心哲学概念是“仁”,它类似于西方自然科学家马克斯威尔假设的弥漫于太空的一种传导体“以太”,它“无形焉,而为万物之所丽;无心焉,而为万物之所感”^①,其最本质、最核心的特点就是“通”。仁与不仁的衡量标准,就是通还是不通。“通”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谭嗣同的经济观点基本上是从“通”的概念,尤其是“中外通”与“人我通”中引申出来的。下面重点介绍两个方面:

1. 自由贸易观点

谭嗣同从“人我通”与“中外通”的概念出发,阐述了对国际贸易的看法。他指出:“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则所易之金银,将不复持去。”^②也即是说,国际间的贸易对各方均有利,符合“仁”的精神,外商向我国出口对我国有用的货物,同时又以其所得金银向我国进口其所需要的货物,双方均从中得到彼此需要的货物。免去自行生产的劳费,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谭嗣同极力主张国与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但工业发达的国家之间该实行自由贸易,而且即使是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也可以“蒙通商之厚

①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卷1。

②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利”¹，即从对外贸易中得到好处。因为它本身无法生产或需要花费更大的费用去生产的那些有用货物，毕竟只需要用“无用的”金银去向外国换取。用他的原话是：“金银则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用它去偿付进口商品，系“以无用之金银，易有用之货物”²，这也是“中外通”的具体表现，即使因工业落后，会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从而要为此付出大量金银。

谭嗣同认识到，在对外贸易中，中国之所以会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由于中国落后的农业国地位，工业不发达，只能进口大量别国工业品以满足需要。可见，即使逆差造成损失，也错不在自由贸易，只有工业发展到与西方国家同等水平了，实行自由贸易就不会造成所谓“无穷之漏卮”或“通商致贫”³。总之，要消除贸易逆差，最好的办法不是实行保护政策，禁止自由贸易，而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蓄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⁴。

应该指出，谭嗣同对国际贸易中金银的作用的认识是片面甚至不正确的，因为事实上，金银并非“无用之物”，而是一种特殊的货币商品。他倡导自由贸易，反对“海禁”、“闭关绝市”，其出发点是正确的，但也缺乏一种对国际贸易的动态分析，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过无论如何，谭嗣同已认识到对外贸易总体上是“主客两利”，双方均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这是非常符合对外贸易的实质的。他主张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鼓励发展工商制造业，增加本国实力，这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这需要一个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当时并没有。但他的落脚点是正确的：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要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关键在于本国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包括工商业。

2. 鼓励投资新式工业的观点

谭嗣同从“人我通”的概念出发，阐发了其投资建立新式工业的主张。他解释说，人我通就是人与人之间做到“其财均以流”¹。如何做到“均以流”呢？谭嗣同认为，只要富人把通过地租、高利贷等手段获取的财富，投资于新式的工商业，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也就是把财富作为资本投入流通，即可达到“人我通”或“均以流”的目的。在他看来，“均”并非将富人财富“悉以散诸

1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2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3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4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贫无货者”^①，而是通过投资新式工商业，实现资本流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使更多的贫穷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这是富人以自己的财富“沾润于国之人”^②，是实现“人我通”、“均以流”的根本途径。他表述自己的观点说：“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③

总之，谭嗣同竭力歌颂大工业，认为投资大工业是增加财富，活跃流通，实现富人与穷人“两利”的主要途径，从而也是实现“人我通”的关键。这充分反映了新兴的工业资本实现扩张的时代要求。当然，大工业的确有其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尤其在促进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方面，其作用超越了此前所有的生产方式，但谭嗣同并没有认识到大工业本身与大工业赖以支撑的制度之间是有多种可能的结合方式的。断言大工业一定会给所有的富人、穷人带来福音，愿望虽然美好，但并非总是能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

3. “大同”理想

谭嗣同也像严复一样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局限。认为在西方，垄断及国际垄断巨头的出现，使贫富分化不但不趋于缓和，反而有加剧之势。他这样描述道：“富者日盈，往往埒于国家，甚乃过之。贫者惟依富者聊为生活，终无自致于大富之一术。……于事理最为失平。于是工与商积为深仇，而均贫富之党起矣。”^④但即使如此，谭嗣同并没有因此而认定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值得学习和仿效的，而是认为这种“失平”现象仅是西方“富而奸者”的操纵或某些富人“褊心所招”。中国在今后发展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但在“创始”阶段，应鼓励富人开办新式企业，等到工商业发展到使中国臻于富强时，才能采取对“过者裁抑之，不及者扶掖之”^⑤的均富措施。为什么呢？谭嗣同的解释是：“以目前而论，贫富万无可均之理，不惟做不到，兼恐贫富均，无复有大利者出而与外国争商务，亦无复有贫者肯效死力，国势顿弱矣。”^⑥归根到底，谭嗣同的主要兴奋点还是发展当时的新式工商业。

当然，谭嗣同也对未来提出过自己的“大同”理想：“无国则畛域化，战争

①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②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③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④ 谭嗣同：《报唐佛学书》，《谭嗣同全集》。

⑤ 谭嗣同：《报唐佛学书》，《谭嗣同全集》。

⑥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息……君主陵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1]也就是说，他眼里的“大同”，是没有国家，没有战争，没有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没有贫富差别，处处统一，人人平等的社会。他主张通过“尽改民主以引井田”^[2]的政治经济措施，来达到“大同”，使“地球之政，可合而为一”^[3]。可见这只是一一种多少带有幻想的、糅合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封建主义经济纲领的远景规划，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如果说谭嗣同把“大同”作为今后长远的理想，那末，关于实行自由贸易，发展实业，以及在“守成”阶段对社会经济的弊端作某种改良等等，就是他的“小康”主张，而这些主张恰是谭嗣同经济思想的核心或重点。

二、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7岁时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到北京参加戊戌变法，后逃亡海外。自1896年起至流亡日本，曾先后主编和创办过《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进行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后曾在北洋军阀政府中任高职，晚年致力于国学研究。梁启超的主要著作有《饮冰室合集》，其主要经济思想也反映在该著作中。这里择一二予以介绍分析。

1. “生利”、“分利”说

像谭嗣同一样，梁启超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歌颂者。认为要使国家富裕，只有依靠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并带动其他各种行业。他宣称：“凡富者，莫善于出其财以兴工艺贸易，子母相权，己可以获大利，而佣伴衣食于是焉，工匠衣食于是焉……”^[4]他将社会经济中的人分为“生利者”与“分利者”两大类，认为“生利者”是国家致富的主导力量。他说：“国之兴衰，一视其总资本总劳力之有所复无所复而已。有所复者资母孳子，大学谓之生之者，生计学家名之曰生利；无所复者蚀母亡子，大学谓之食之者，生计学家名之曰分利。”^[5]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劳动(体力和心力)，增加了新的价值，从而不但不蚀资本，而且使财富得以衍生，才算是“生利”的生产劳动，才能使国家兴盛；反之则是“分利”，于国家有害无益。可见，梁启超把“生利”、“分利”提高

[1]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2]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3]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4]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

[5]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

到关系国家兴衰的层面上来讨论。

梁启超在谈论“生利”概念时,还将“生利之人”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类:“生利之人有两种:一曰直接的生利者,若农工之类是也;二曰间接的生利者,若商人,若军人,若政治家,若教育家之类是也。而其生利之力亦有两种:一曰体力,二曰心力。心力复细别为二:一曰智力,二曰德力。”^①可见,他不但将商人,保护生产者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府官吏,军人,学者列入“生利者”之中,而且还将智力和品德也作为“生利”的重要因素。

在谈论“分利”概念时,梁启超将乞丐、盗贼、惯骗、僧道、纨绔子弟、优妓、奴婢,以及经营制造鸦片、酒、烟等有害商品者列为“分利者”,他甚至还将中国封建官吏列为“分利之魁罪”,认为“他种之分利者,大率由彼辈而先生者也”^②。

梁启超主张创造条件使大多数分利者转化为生利者,使其“资母孳子”,成倍地增加生产资本,促使中国由贫穷转变为富强。

梁启超对“生利”、“分利”的划分自然缺乏经济学理论上的科学意义,但也表现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在谈论经济问题时的广阔视野和道德情怀。

2. “以工立国”说

梁启超把发展资本主义视为国民经济的中心。他认识到,拥有财富之人若能投资开办资本主义工厂,则不但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而且还能产生对其他行业的联带作用,使全社会经济都得以发展。他说:“凡富者,莫善于出其财以兴工艺贸易,子母相权,已可以获大利,而佣伴衣食于是焉,工匠衣食于是焉。”^③他还举例说:“如兴一机器织布之厂,费本二十万,而造机器之人得以若干,种棉花之人得其若干,修房屋之人得其若干,工作之人得其若干,贩卖之人得其若干。而且,因买机器也,而炼铁之人得其若干,开矿之人得其若干;因卖棉花也,而赁地种植之人得其若干,造粪料、造农机之人得其若干;因修房屋也,而木厂得其若干,窑厂得其若干。推而上之,炼铁开矿以至窑厂等人其货物又有所自出,彼之所自出者,又复有所自出。如是互相牵掇,沾其益者,至不可纪极。且工作贩卖之人既聚,既有所贍,则必衣焉、食焉、居焉、游焉,而于是市五谷蔬菜者得其若干,市布缕丝麻者得其若干,赁屋庖者得其若干。而此种种之人,持其所得者复以经营他业,他业之人有所

①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

②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

③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

得,复持之以经营他业。如是互相摄引,沾其益者,亦不可纪极。”¹¹

在这里,梁启超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发展工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一是从生产资料方面看,带动了机器制造、原料材料提供、厂房建筑等相关行业;从这些行业的发展中,又有与其相关的其他行业得到益处。依此类推,可以推演至整个国民经济。二是从生活资料方面看,带动了衣、食、住、行等服务行业;而通过这些服务业取得收入后,又可以投资于其他行业。从而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产业链,这种分析,颇有现代经济学投资乘数(Investment multiplier)效应的意味。只不过梁启超没有建立一种具有某种固定关系的数量函数或模型罢了。

梁启超既有上述投资于工厂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联动效应的认识,其以“工业立国”的主张也就顺理成章了。他宣称,一国富力之大小,“不以地为界,不以人为界,不以日为界,当以力为界。凡欲加力使大莫如机器。各种机器,农矿工之机器也”¹²。“是故一亩所出,能养百人,……一人作工,能给百口食”¹³,因此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¹⁴。

3. 利用外资主张

变法之前,梁启超是一个坚定的对外开放论者,他反对“锁港闭关”,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变法失败后,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强大,梁启超开始主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但对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梁启超主张要有前提地利用,而不能一概拒斥。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我国人民的生活及国家政治基础,因此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是很危险的。他说“外国纷纷投资本以经营各事业于我腹地,直接生影响于生计上,并间接生影响于政治上”¹⁵。“今日之中国,有形之瓜分,不足畏也;所可畏者,乃在外国资本家渐握我生计界之特权,全吸我精髓,以为其利羸,使吾民悉陷于劳动者之地位,而永劫不复”¹⁶。但是,梁启超又说,对外资的态度“要以政治组织能否改革为断”,“苟政府财政之基础稳固,而所以运用之者适其宜,则外资之必不足为国病明矣”¹⁷。换句话说,只有在政治上求改革,财政上有可靠稳固的收入来源,能恰当地运用外资在国民经济关键的生

1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

2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

3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

4 梁启超:《交法通议》,《饮冰室合集》。

5 梁启超:《外资掺入问题》,《饮冰室合集》。

6 梁启超:《利用外资与消费外资之辨》,《饮冰室合集》。

7 梁启超:《外资掺入问题》,《饮冰室合集》。

产部门时,是可以考虑利用外资为我所用的。他针对一部分反对外资的主张驳斥说:“外资之来,非特投资者享其利也,而主国亦食其赐。此实不刊之公例也。故不审实情,而徒畏外资如虎、憎外资如蝎者,未可谓为完全之理论也。”¹梁启超在阐述外资的作用时,还对外资的用途作了限制性规定。他认为,“生产之要素三:曰土地,曰劳力,曰资本。我国土地、劳力皆胜居优,惟苦乏资本。……故利用外资,诚为中国今日生计政策之最妙法门”²。这也就是说,他的利用外资,是要用在生产上的。因为“用于生产的往往食外资之利,用于不生产的势必蒙外资之害”³。此外,他还认为,利用外资,必须讲究“管理法”,要在引进和偿还时间及部门上安排得当,用他的原话即是:“能全盘布局,分期偿还,则虽多而或不为病;反是则末路之悲惨,则不可思议”⁴。

梁启超对经济问题的议论远不止上述几点。总体上,他是其同时代及其以前的学者议论经济问题最多的一位。由于他的其他经济议论并无多少突出之处,为节省篇幅,我们不再展开分析。

1 梁启超:《外资掺入问题》,《饮冰室合集》。

2 梁启超:《利用外资与消费外资之辨》,《饮冰室合集》。

3 梁启超:《外资掺入问题》,《饮冰室合集》。

4 梁启超:《外资掺入问题》,《饮冰室合集》。

第二十章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民主派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民主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在其产生的初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和要求,同地主阶级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与洋务派官僚集团的某种渊源关系,他们同洋务派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体现了一定的共同立场,但在如何达致富国强兵的道路或途径选择上,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渗透的态度上,改良派思想家又与洋务派集团产生了矛盾。总体而言,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各种思想在早期对处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民众起过不可忽视的启蒙作用。他们的经济思想,已初步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主要理论和观点的熏陶,即使其使用的范畴或概念还是中国式的,但已开始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来考察分析中国现实经济。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强,改良主义思想家在现实面前逐渐陷于尴尬,其理论更不能自圆其说。尤其是面对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力量的增强及其理论的“革命性”,改良主义思想家逐渐失去了早期的某种先进性,转而渐趋于保守甚至反动。从1905年到1908年,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思想家在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有名的大论战。

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阶层的要求。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要求,主张在保持封建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良的道路来振兴中国实业,反对平均地权和对资本的节制;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则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要求,坚决主张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振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强调防止垄断资本主义和贫富两极分化,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可见,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矛盾。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指出对方的所谓错误,都曾从西方经济学说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观点,作为思想理论武器。这也在客观上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思想领域得以广泛地流传。

尽管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章太炎等曾通过演讲或著文批驳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关于保皇、革命等问题上的言论,但严格而言,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之间的论战,是1905年革命民主派成立同盟会、创办《民报》,宣传与改良派主办的《新民丛报》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以后开始的。1907年,随着革命民主派势力的壮大,《新民丛报》自动停刊,1908年《民报》亦被日本政府查禁。至此,这场论战宣告结束。这场论战的主题就经济领域而言包括这几个方面:

1. 关于垄断资本

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认为,“托拉斯”是“物竞天择自然之运”,是“国民社会之公益”¹,即使它让劳动者受其害,也应藉由其为社会进步的益处而忍其痛苦,而不能“以小数之不便不幸”而阻碍全体之利益。一些改良主义者甚至高喊“吾爱中国,吾尤爱托拉斯”的论调。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垄断,认为托拉斯导致劳动者成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²,因此,它是“商界魔王,工界蠹贼”,是较君主和贵族更坏的“大毒物”³。

2. 关于土地国有问题

改良派认为,地主拥有的土地是通过勤俭起家、不断贮蓄扩充而来的。因此,地主获得地租是“勤劳所应享之报酬”⁴,把土地收归国有是“掠夺人民勤劳的结果”⁵。改良派进而还主张“非惟本属私有者,不宜收归国有而已,即本属国有者,亦当渐散而归诸私有”⁶。改良派还以西方经济学说中关于“人类利己之心”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观点为依据,告诫说,如将私有财产中的“最重要部分”,即土地收归国有,则“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

1 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饮冰室合集》。

2 参见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四本;摘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页。

3 参见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四本;摘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页。

4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室合集》。

5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室合集》。

6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室合集》。

半”¹，将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则认为，土地是自然之物，只不过地主或他们的祖先采取强占的手段据为己有，从而出现了土地买卖问题。因此，地主的地租收入是依靠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取得的，是典型的“不劳而获”²，而并非勤劳应享的报酬。革命民主派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其手段是通过向地主支付土地原价，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而对土地增价部分则无偿归公，不予支付任何报酬；土地国有并不取消小农，小农只要有农具，即可“向国家请愿而租地”，而“不受地主私人之削”³。

革命民主派宣称，土地私有制是造成社会不平，生产发展受阻的祸根；实现土地国有，则不仅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可以将原来地主通过垄断土地不劳而获的地租收入转用于工商业投资，从而达致“社会之资本日益增”；工商业使用土地也比原来更加方便、更有条件；农民也因摆脱了沉重的剥削，因而更有对国有土地进行充分利用的积极性。总之，“土地国有之制行，国中之生产事业必大进”⁴。

3. 关于外国经济侵略问题

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双方均持反对和抵制的态度，惟其抵制的手段及对何为经济侵略的认识不同。

改良派思想家认为，大资本家、大公司是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主要力量。梁启超宣称：“中国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力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不大者，只能宛转瘦死于其脚下。”⁵应该指出，改良派并不反对利用外资，相反，梁启超甚至曾表示，利用外资“诚为小国今日生计政策之最妙法门”，但在这次大论战中，他们或许是有所忌讳而并未着墨于此，以至遭到革命民主派的抨击。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反对改良派利用大资本家、大公司抵御外国经济侵略的主张，认为“一公司之成败，私人之得失，不足以为一国经济竞争胜负

1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饮冰室合集》。

2 胡汉民：《民报三六大主义》，《民报》第一号。摘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3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十二号。摘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353页。

4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十二号。摘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353页。

5 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八十六号。摘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之左券”¹，中国不能靠“一两大资本家与人殊死战”²。革命民主派在攻击改良派忌讳利用外资的同时，积极倡导利用外资为我服务，甚至对商品输入也大唱赞歌，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农工商业发展不快，为维持人们生计，外国制造品之输入是绝对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经济侵略与合理利用外资为我所用以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界线。

此外，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还就社会革命及其方式、手段等问题展开论战，惟因其已超出经济思想的范围，这里不再介绍。

第二节 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德明，号逸仙(曾化名中山樵从事革命活动)，出身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一个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家庭。孙中山12岁时随母亲被其兄长接去美国檀香山念中学，17岁时回国，并先后在广州博济医院、香港西医书院学医。1892年毕业后，分别开设过中西、东西医局。可见，孙中山接连11年接受西式教育，较少受传统封建教育影响，对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认识比同时代其他绝大多数人更为深刻。孙中山于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曾上书李鸿章，力主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未被采纳。同年甲午战争惨败后，他抛弃了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幻想，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该年秋天他即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1895年回广州发动了近代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在日本东京联合各派反清力量成立了同盟会。1911年，在同盟会领导下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实际上也是推翻了存在于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次年元旦，孙中山被推选为新建立的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后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的逼迫下辞职。1912年任新成立的国民党理事长，1913年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7年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并任大元帅，1919年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广东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组织

¹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十二号。摘引自胡奇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页。

² 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十二号。摘引自胡奇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页。

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退居上海。1923年又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任海陆军大元帅,次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组织北伐。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因病去世。

孙中山一生从事革命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继承中国传统的“厚民生”、“裕民生”等“道统”思想,研究西方的社会科学,从而不断丰富自己的革命理论。他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其中“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到1921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他仍将“扶助农工”作为三大政策之一。可见,民生问题贯彻于他革命实践的始终。至于对经济理论政策的吸收、研究,他于1896年在伦敦蒙难前后就开始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包括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等,对德国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策也深感兴趣。辛亥革命后的几年中,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两大核心内容——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可以说,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其他方面都是从这两大核心内容中衍生出来的。

一、平均地权的经济纲领及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大纲领。但在其早年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是最根本的甚至可以说是全部的内容。他在《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中说:“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末,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①孙中山从亨利·乔治关于国家通过强征单一地价税的手段达到消除土地私有垄断,实行土地公有化目的的思想中汲取了主要“营养”,指出土地是自然力,“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并不是通过购买的手段,而是通过垄断独占的手段获得土地,因此,土地收入是“不劳而获”,是对自然资源的盗劫。基于此,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方案及具体措施:由地主自行申报土地价格,政府按地主自行申报的土地价格征收1%~2%的地价税,并保留按地主申报的地价予以收买的权利;地价申报以后,对于因社会经济发展而造成的土地增价部分,则无偿收归国有,为国民所共同享有。^②

可见,孙中山并不主张无偿没收地主土地,而是采用按原价征税或赎买,对增价部分则充公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化。由于孙中山心目中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必然出现地价与地租

① 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6页。

② 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页。

上涨的现象,如果国家听任发展,则必然产生大资本或大垄断。只有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初即实行土地国有化,才能杜绝垄断,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否定,也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垄断将给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造成极大障碍的洞见。应该说,这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土地纲领,它比亨利·乔治的土地方案更接近实际而少了许多空想的成分。尤其是按地主申报地价征收地价税,并保留随时按申报价格收购土地权利的规定,既最大限度地顾及到原土地持有人的利益,从而保证该方案的推行,又给土地实际上的“国有化”开辟了道路。当然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土地国有化方案,而不认为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方案,因为其根本出发点,还是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而不是真正意义的全体国民的利益。

孙中山早期的平均地权纲领的主要着眼点是城市土地问题,而对农村土地问题则较少论述,即使有所提及,也多是概念性的。^①到了1924年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首次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列入平均地权纲领中,宣布“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孙中山还在此后的演讲中公开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说“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正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正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②。又说:“我们要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种意思就是农民得到自己劳苦的结果,要这种劳苦的结果不令别人夺去。”^③

孙中山在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主张的方式上作了一定的考虑。他曾说过,如果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有很好的团体,“政府可靠农民做基础,……便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纳税到私人,要纳税到公家”。这就是说,第一步是对地上照地价抽税,利用和平解决的办法,地主可以收回地价,不受损失,农民亦可以得利。第二,如果地主不肯纳税,则强行没收其土地,交给耕种的劳动者,劳动者取得土地后,只须向国家纳部分租税,即可享受其自己的劳动成果。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虽然已经看到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采取强行剥

① 孙中山第一次公开论及“耕者有其田”主张,是1912年8月与袁世凯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非易。欲求解决农民自力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摘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页。

②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10页。

③ 孙中山:《耕者要有其田》,《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65页。

夺的手段的可能性,但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更希望地主与农民“慢慢商量来解决”,使“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无论如何,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主张极大地丰富了其早年提出的“平均地权”纲领的内涵,从而也成为新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

二、节制资本的经济纲领

“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中的又一重要经济纲领,是在他对资本主义垄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在较晚的时期提出的。其目的是在适度发展私人资本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国家资本,防止因私人资本膨胀而造成的垄断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节制资本”在1921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首次公开被列为政纲。孙中山在该“宣言”中称:“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可见,节制资本的对象,是有独占性质的企业;节制资本的目的,是“使私有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节制资本的手段,是通过国家对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的企业直接“经营管理之”。从而也就可以看出,所谓节制资本,实质上包含了对私人资本的适度控制和对国家资本的大力发展两个方面;或者说,通过在特定领域发展国家资本,杜绝私人资本垄断的可能性,达到在整体上“节制资本”的目的。

孙中山总的思想倾向是,对私人资本制度发展持肯定甚至鼓励的态度,但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的排挤和压迫及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害,提出将有垄断性质的或规模巨大的企业收归国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对其他私人资本采用对工人发放失业救济、制定劳工法、抚恤废疾、征收累进所得税等间接节制的办法。这实质上是在发展国家资本、规范中小资本的同时,也为中小私人资本发展扫清道路,消除障碍。应该说,就资本制度这一层面而言,这是一种在节制、限制政策中表现出积极的资本理念的经济纲领。孙中山对发展国家资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宣称:“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①。这表明,他发达国家资本的目的,不但为消除私人资本垄断,为中小资本发展提供条件和保护,扫清障碍,而且还有借助

^①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2页。

国家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国家经济,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这样一种内在要求。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到对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企业收归国有,转变为国家资本时,包括了外国企业在内。也就是说,外国企业只要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也仍在“收归”之列;而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这类外国企业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经济侵略势力,且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孙中山果断地提出这一主张,表明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本质和任其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反帝立场。

三、振兴实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规划

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纲领,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外乎是振兴中国的实业,实现工业化;或者说,振兴实业,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逻辑发展。因为在他看来,发展和振兴实业不但是救贫求富、救亡图存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使中国亿万人民摆脱贫穷落后、抵御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关键。

孙中山于1912年写成了一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著作《实业计划》。全书分六部分,包括:在中国北部渤海湾、东部杭州湾及南部广州等地各修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即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修建达10万英里的铁路,组成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内地及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使汽车能通达全国一切地区;整治大运河,疏浚甚至开凿其他内河小道;大规模移民垦荒,实现农业机械化,建立大批农业基地;大规模开采煤、铁、石油等矿藏,设立冶铁、炼钢、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以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轻工业。可见,他非常注重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矿、钢铁等原料、材料工业的发展。据他自己的解释是“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①。这表明孙中山对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已有较科学的认识。

对于发展和振兴实业,孙中山主张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他说:“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②也就是说,要同时允许私人与国家一道发挥各自的优势特长来发展实业。他认为,“凡于事

① 孙中山:《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总理全集》第1集,下,第1016-1017页。

② 孙中山:《实业计划》,《孙中山选集》十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页。

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展于中国,则从来所行的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之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输之以利便交通”¹。

可见,孙中山对私人企业、国家经营企业的职能及任务是各有要求的。上文提到的“实业计划”的重点,是发展交通运输等基础建设,农矿、钢铁等原料、材料工业,这主要是由国家来经营的;但很显然,尚有非常多的企业,包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生产企业,自然由私人资本来经营。国营大企业不但杜绝了私人资本容易导致的大资本垄断,而且通过基础建设和原材料供应,为私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私人中小企业则在国家的鼓励和保护下,发挥为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提供商品的职能。这样,国家经营企业、私人企业共同构成了振兴实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整体力量。

为了解决实施“实业计划”的资金问题,孙中山曾提出利用外资的设想。他一方面分析了当时许多人视外借为蛇蝎的心理,认为这是在过去有过教训的缘故。他说:“惟借债修路一事,在满清之时已成弊政;国民鉴于前者之覆辙,多不敢积极主张。殊不知满清借债修路,其弊在条约之不善,并非外资不可借。”²也就是说,他把借外债造成的“弊政”归罪条约之不善,认为举借外债本身并没有错。另一方面,他竭力证明举借外债的好处,认为“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³,只要“使借债这条约,不碍主权,借债亦复何妨”⁴。至于具体的借债事项,孙中山指出必须掌握几条原则,即:举借的对象不能集中于一国,而须有多个国家;按合同雇佣外籍技术人员时,须要求其严格履行义务,期满由我国决定其去留;应选有利之图以吸引外资,以免不利于偿还;举借外债的具体经办者应具备这方面的必要知识和经验。这些原则要求充分表明孙中山既懂得借外债对实现其“实业计划”的重要意义,又能在具体操作中不顾此失彼,懂得紧紧掌握利用外国资本和人才之决定权,而决不授之于外人的重要意义。

¹ 孙中山:《实业计划》,《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页。

² 孙中山:《建设铁路问题》,《总理全集》第2集。

³ 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总理全集》第2集。

⁴ 孙中山:《建设铁路问题》,《总理全集》第2集。

第三节 章太炎和朱执信的经济思想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思想中,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无疑是最杰出的,其他成员,包括朱执信以及曾一度是革命派成员的章太炎等也有一些值得称述的思想和观点。本节就对他们的经济思想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章太炎的经济思想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是近代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通晓中国古代典章文物、文字声韵和儒道法墨诸家之精义,对西方哲学和印度佛学也造诣颇深。在政治上先追随康、梁,拥护变法;20世纪初又信奉孙中山,1906—1907年,曾主持革命派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刊物《民报》的工作;后又反对孙中山,劝袁世凯称帝;最后,又与孙中山再度合作。可以说,章太炎在学术思想上以广博著称而非专精于一隅;在政治倾向上善变而并非抱定信仰一走到底。我们在这里以“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名义来论述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是指他在20世纪初叶(大致是1902—1907年)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其经济议论中所体现的经济观点和思想。主要包括两点:

1.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观点

章太炎在1902年流亡日本后,开始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民主思想,包括平均地权的经济纲领和主张。不过章太炎理解的“平均地权”虽据他自己说是孙中山的意思,其实与孙中山在多种文件和讲演中所表述的颇为不同。其中的原因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重点。我们注意到的,恰恰正是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部分“曲解”,反映了章太炎自己对解决土地问题的思想倾向。

章太炎在其《馥书·定版籍》中转述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主张,说:“方土者,自然者也。自然者非材力,席六幕之余壤,而富斗绝于类丑,故法均人。后王之法;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无。故买鬻者,庚偿其劳力而已,非能买其壤地也。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①对“平均地权”的这种转述或阐释,与我们上文介绍过的孙中山早期平均地权主张的不同之处在于:(1)它把重点放在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上,且已明确指出“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的

① 章太炎:《定版籍》,《馥书》。

观点,而这与二十年后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才正式列入“平均地权”纲领中的“耕者有其田”主张已比较接近了。(2)关于平均地权的依据。章太炎的“转述”认为,土地是自然之物,不是人为地通过劳动而获得的,因此,它不像工商业靠经营起家从而“不可均”,而是应该遵循“以力成者其所有,以天作者其所无”的原则,规定“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从而达到“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孙中山在其公开的言论及论著中,较多地从防止“垄断”的角度来论证平均地权纲领的正确性,以及“耕者有其田”的合理性,至于是否自然之物,或即使是自然之物,是否也要在土地国有化时给地主以原地价的补偿,孙中山原则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而这又恰是与章太炎“转述”中否定占有自然物,推崇“以天作者其所无”的主张相悖的。不管章太炎的所谓“记录”是否合乎历史事实,是否借孙中山之“口”,表达自己的主张,能作如此阐释,就不能不在“思想”中记上一笔。事实上,我们固然看到孙中山在两个阶段逐渐完善的“平均地权”纲领更为实际(尽管也未实现)。但何尝不能感受到章太炎的转述或阐释更为具体详尽。

章太炎还从社会稳定的角度,主张“均田”,宣称“田不均,年衰之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瘵而不足以养民也”^①,甚至还提出过非常具体的均田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基本推翻了自己赞赏的“平均地权”主张。

2. 轻商思想及关于官、商相互隔离的观点

章太炎虽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曾主张让工商业不受限制地发展,但这并非是其真实的或一以贯之的思想。他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②;他认为最美好的生活方式是“农为游农,工为游工,女为游女,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上易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著而生陵夺”^③。因此,工商业是不需要甚至有害的。比如,他曾发表议论说,“自古以重农为国是,……商日益横,工日益多,农日益减,稔岁已忧其不饱,……雄桀转徙他方为盗贼,甚至揭竿噪哗,……要之尊奖商人,

① 章太炎《定版籍》,《丛书》。

② 章太炎:《五无论》,《民报》第十六号;转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371页。

③ 章太炎:《五无论》,《民报》第十六号;转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371页。

其末流不得不至是也。”^① 作为一个国学大师,章太炎给日益发达的工商业扣上了一顶排挤农业、危害社会安定的“帽子”。可见,章太炎的真实思想倾向是排斥工商业、排斥商人的。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陈腐的观点竟全是发表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藉以同梁启超《新民丛刊》论战的舆论阵地《民报》上。

章太炎轻视工商业,自然是陈腐的思想,但他提出的一项从商者与为官者必须有所分离,不得兼营或兼任的主张,则是别有意味的。他议论说:“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籍其产;身及父子方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②。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担任政府官职,则不但其本人不能再经营工商业,而且其上下各一代的直系亲属也不得经营工商业;若冒别人之名从事工商业活动以营利的,则应重处,不惜罚没其家产;反之,有上下各一代的直系亲属从事工商业者,其本人也不得担任官职。章太炎的这种主张,与汉初的“商人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从中恐怕也不能仅仅将其原因归之于章太炎的“轻商”倾向。因为他也明确地说,这是约束做官者或想做官者“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因此,尽管章太炎的主张颇有家族牵连的味道,并不符合个人主体独立的原则,但在封建意识浓厚、亲缘关系与血缘关系远远高于业缘关系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他的这种见解又何尝不具有某种“预警”意味呢?

二、朱执信的经济思想

朱执信(1885—1920年),名大符,广东番禺人。1904年以官费赴日本留学,学习经济学;第二年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被迫逃亡香港;武昌起义后,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广阳军务处督办、广东核计院院长等,曾在上海编辑《建设》杂志,协助孙中山草拟《建国方略》。1920年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时牺牲。朱执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也是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其经济思想的主体部分是阐释孙中山的学说,尤其是对民生主义的极力弘扬,其著作有《朱执信集》。

朱执信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概要内

^① 章太炎:《五朝法律索隐》,《民报》第二十二号;转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70页。

^② 章太炎:《代议然否记》,《民权》第二十四号;转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9页。

容。

朱执信于1905年11月就在《民报》第20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生平事迹，感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贤于俾士麦辈万万也，……自今日视之，欲不宗师而尸祝之，其安能也”。他高度评价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本质、由来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以及关于价值、剩余价值的学说，指出：“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所闻也。”又说：“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引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酸削劳动者以自肥尔。……凡财皆从劳动而出。故真为生产者，劳动之阶级也。然则有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者，非劳动者而谁乎。……资本者，本劳动者所应有之一部，而遂全归于彼掠夺者，与循其本，吾不知其所以云也。溯而穷之，欲不谓资本为掠夺之结果而劫取自劳动家所当受之庸钱中者，不可得也。”他基于多方的观察与分析，宣称：“故尔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¹可见，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观点和概念的理解，是比其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更透彻、更准确的。

在此基础上，朱执信对当时中国不少人提倡发展实业的观点作了评论，认为提倡实业不能“提倡来，提倡去，还是他自己有利的实业”²，主张兴办实业必须从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就业机会，从而改变劳动者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入手。他表示“我决不做无条件的反对提倡实业，却是我批评提倡实业，要注意在分配一层”³。

就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理解，以及对发展实业问题的观点而论，朱执信在追随孙中山的基本经济主张的前提下，表现出了更为激进的思想倾向。

2. 提出“社会经济组织上的革命”的主张。

朱执信不但认识到社会贫富悬殊是社会革命的直接动因，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善造成了分配上的不公平，导致贫富分化，最终导致社会革命。他说：“贫富悬隔者，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之结果也。”⁴按照这样的逻辑，要解决贫富分配不均问题，就必须进行社会经济组

1 该段所有引文均见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朱执信集》。朱执信在此将马克思译成“马尔克”。

2 朱执信：“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朱执信集》。

3 朱执信：“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朱执信集》。

4 朱执信：《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引》，《朱执信集》。

织上的革命,改变“不完全的”社会经济组织,使之完善起来。

在朱执信看来,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主要表现在“放任竞争”和“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这两方面。他认为“惟放任竞争一不过问,故其竞争之结果,生无数贫困者,而另一方胜于竞争者积其富日益以肆矣”,“故放任竞争与贫富悬隔,有必然之关系者也”^①。至于“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朱执信认为这同样直接导致贫富悬隔的产生。总之,放任竞争和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二者具存,而后贫富悬隔之现象得起”^②。

要改革上述不完全的社会经济组织,使之变为完全的社会经济组织,其途径或方式是对“放任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私有财产制度从“绝对承认”变为“相对承认”。他认为在当时中国已是放任竞争并绝对承认私有制,因此已有贫富之分,但尚未贫富悬隔,故为防患于未然,“不可不革命”。

可见,朱执信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分配方式上谈论贫富不均问题和社会革命问题,而且已从社会经济组织,从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寻找导致贫富分化、贫富悬隔的本质原因。这又是其大大高明于同时代其他许多思想家之处。当然,朱执信并未开出如何限制“放任竞争”,及对私有财产制度从“绝对承认”变为“相对承认”的“药方”。他认为土地国有化后,即形成对财产私有制的“相对”承认。这虽具有政治宣传上的作用,但至少在理论上是有些勉强的。

总之,朱执信作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其经济观点和主张不但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构成了有益的补充,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① 朱执信:《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引》,《朱执信集》。

② 朱执信:《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引》,《朱执信集》。

第二十一章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西学东渐” 与近代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一、欧洲大批传教士东来传教

发生在 15 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使中世纪统一的罗马教会产生了分裂,几乎半个欧洲都挣脱了罗马教廷的统治。正当此时,地理大发现为宗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罗马天主教的目光立刻投向东方。大批传教士融入早期殖民者的队伍,到海外去开辟新的天地。其中,西班牙人罗耀拉组织的耶稣会是最活跃的传教团体。

最早沿好望角新航路前来中国的耶稣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在 1541 年作为罗马教廷派往远东的使节,从里斯本起程,走海路到达印度。1549 年沙勿略到日本传教,发现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影响很深,于是决定来中国传教,认为中国人信仰了基督教,日本人自然也会信仰基督教,1552 年,沙勿略来到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因为当时明朝海禁很严,他一直未能找到机会进入广州,不久就病死在那个小岛上了。此后近 30 年,欧洲传教士始终无法进入广州。直到 1578 年耶稣会派到远东的教务巡视员范礼安仍在澳门对着中国大陆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呵,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范礼安建议之下,耶稣会派意大利人罗明坚来到澳门。罗明坚先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随前往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到了广州。1580 年,他获准在广州肇庆传教,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人。

不过,真正为在小国传教事业打下基础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 年)。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进入该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与神学。1578 年,利玛窦从里斯本乘船前往东方,首先抵达葡萄牙人在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大本营——印度果阿。在果阿,利玛窦进入沙勿略创办的修道院攻读神学。1581 年,利玛窦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文

字,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作准备工作。不久,利玛窦在那里兴建了一所欧式教堂。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教堂还展出了从欧洲带来的“西洋奇器”,如自鸣钟、三棱镜、天象仪器、圣母画像等等。大厅里悬挂的一幅利玛窦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格外引人注目。利玛窦绘制这幅世界地图,真是费尽苦心。地图用中文标出地名,以便中国人能看懂。为了适应中国人天朝居中的观念,特地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他把这幅地图送给当地的总督、知府等官员。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利玛窦到达中国以后,就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别号“西泰”。利玛窦口说汉语,并学着中国礼俗打躬作揖,欠身下拜,这些举止行为,大大便利了他的传教活动。他广泛结交当地官员和读书人,连端州(肇庆)知府王泮都为他的教堂题词作诗。后来,他从肇庆前往韶州,结识了礼部尚书之子瞿太素。瞿太素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知识,如天文、数学等,后皈依了天主教。他还劝利玛窦改穿中国读书人穿的服装,以便使士大夫阶层容易接受。从此,利玛窦脱去袈裟,换上儒服,成了一名“西儒”。为了确保自己在华传教事业有一个牢固的根基,利玛窦不满足于在肇庆、韶州已有的成绩,而是想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他辗转南京、南昌等地,著书、传教,广交朋友,大大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在他结交的官员儒士、学者名流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我国明代大学者徐光启。1601年初,利玛窦到达北京,献上了他给万历皇帝的贡品,包括天上图像一幅、天主母像两幅、《天主经》一部、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座、《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同时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个奏疏,自称是“大西洋陪臣”,因为敬仰中国,所以才渡海而来,历时三载,行程八万余里,并表示愿意为明朝在天文历算方面效力。万历皇帝虽然没有接见利玛窦,但允许他在中国传教、留居。于是,利玛窦定居北京,直至去世。死后,万历皇帝特赐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利玛窦在华期间,著有《乾坤体义》、《经天该》、《天主实义》等著作,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

明末时期,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三位中国官员同利玛窦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对天主教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利玛窦来华,为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了新的一页。在耶稣会教士中,他首先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并对当时中国社会上层及以后在传教事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传教。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教,所输入的也不是近代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但客观上确使当时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同时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人。自他以后,中学的西渐及其对启蒙运动的影响,都是非常令人注

目的事情。在这些方面利玛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利玛窦去世以后，意大利西西里人龙华民继掌中国天主教教务。他对于利玛窦认为无关紧要的，如祭天、祭祖、拜孔等仪式，都视为迷信，禁止教徒参加。社会人士因而产生反感，反教乃至排教风潮随之而起。

后来，明末因满族崛起，边防危急，以及历法失修，推验失误，需要借助西方传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被驱逐的教士复又召回。在徐光启的推动下，邓玉函、龙华民、阳玛诺、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罗雅谷等先后来京供职，取得合法身份，有了传教的便利。崇祯初，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三人甚至可以出入宫禁，天主教也因此深入宫廷。1630年，御马太监庞天寿首先由龙华民领洗奉教，不久，由汤若望陆续领洗40人。宫中为汤若望特设圣堂一所，几年内受洗者竟有540名之多。清兵入关后，耶稣会教士毕方济、瞿纱微等继续活动于南明宫廷，而北方教务，由汤若望等留居北京，随即应付，以免被清廷所禁绝。汤若望因而成为清初在华耶稣会教士中最负盛名的人。

汤若望，德国科隆人，1620年随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来华，1622年抵达广州，随即到北京学习汉语，后被派往西安传教。1629年，徐光启主持开局修历，举荐龙华民、邓玉函参与其事。

转年，邓玉函死于北京。经徐光启推荐，从开封、西安两地调罗雅谷、汤若望进京，参加《崇祯历书》的编辑工作。汤若望受命管理历局，制造天文仪器，推演算术，翻译西书，同时它利用为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进行传教活动，领洗入教的有御马太监庞天寿等。1636年汤若望奉旨督造火炮，两年中设厂铸炮20门。为了替各省的天主教徒谋取合法地位，他在1638年，奏请明思宗赐题“钦褒天学”四字，并制匾分送各地天主教堂悬挂；1640年，因再铸火炮而立功；两年后，奉旨将制炮技术传授兵仗局，并译述《火攻要》。

清兵入驻京城后，下令城内居民三日内迁居城外。汤若望为保全历书书版、天文仪器、传教经典、历法书籍、供像礼仪等，上疏摄政王多尔袞给予保护，获得特许。多尔袞下令保护其地，不准士兵滋扰。1644年6月，汤若望进呈预推8月朔日食分秒时刻及起复方位；7月，进呈所制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舆地全图等，并上书修订历法，进呈新编历书一册；8月，经观象台测验，汤若望的新法推算密合天行，从此受到新王朝的信任，与龙华民一起奉命“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订历法。11月，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印信，历局并入钦天监。1645年，汤若望将徐光启主编的《崇祯历书》改订易名，以《西洋新法历书》进呈，顺治帝亲批“依西洋新法”，定名为《时宪历》，下令印造颁行天下，汤若望就任清朝钦天监监正，次年加太常寺少卿衔。汤若望是大

清天监第一任外国监正。

汤若望身为耶稣会北京会长,随其政治地位的上升,北京的传教活动也逐步发展。1650年,顺治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原天主堂旁空地一块,重建新教堂。1652年新教堂落成,顺治御笔亲题“钦崇天道”匾额。1654年又赐阜成门外利玛窦墓两旁土地为日后教会墓地,汤若望在其地建造圣母院一座。1657年,顺治又亲笔题写“通玄佳境”,赐为宣武门教堂堂额,并有御制天堂碑记,以示宠信。此后,汤若望先后获准请传教士约20人分批到各地公开传教。

康熙初年,发生了钦天监教案。徽州人杨光先撰文攻击天主教,并于1644年诬控汤若望谋反。汤若望和一批涉嫌的传教士被捕入狱,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汤若望本人也病故。杨光先则被任为钦天监监正。直到1668年,康熙帝命杨光先和传教士南怀仁分别测出正午的日影,结果,杨光先测得极不准确,而南怀仁则测得分毫不爽。于是康熙皇帝将杨光先免职,由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汤若望的冤案也获得昭雪。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熙帝对于传教士颇为尊重。只是由于后来罗马教廷完全不顾中国国情,蛮横干涉中国人民的礼仪习俗,禁止中国基督徒祭祖尊孔,挑起了所谓“礼仪之争”(当时的传教士遵守利玛窦的遗法,允许中国入教的教徒保存其原来的习惯仪式,祖先的崇拜与孔子的崇拜概不禁阻。但利玛窦传教之法,后来为教中别派的人所反对,上书罗马教皇,说前此传教之人,破坏了基督教的教义。1740年,罗马教皇派铎罗至北京,发表教皇的教书,命不从教皇命令者退出中国。清圣祖大怒,逮捕铎罗,押送澳门,并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者,一概出境。此即“礼仪之争”),此后,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才改变态度,禁止天主教。^①至此,长达百年之久的清初天主教合法传教结束。

在汤若望等传教士备受重用的同时,天主教传教活动也有很大进展,在1664年至1701年不到40年的时间里,受洗教徒几乎增加了1倍。据1701年的统计,全国13个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教士住屋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达30万人。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另一派系东正教中的俄罗斯正教,也从我国东北地区传入内地。

二、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得以初步传播,出现了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

^① 杨东纯:《本国文化史大纲》,北新书局1934年,第271页。

的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人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沿用至今的阴历。他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六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纬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輿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輿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原书十五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四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着关外崛起的满族,对西方先进的火器自然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火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320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掣要》,这是专门传播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火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说”。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曾改造过一个英国贡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学、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曾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闰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还要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完成《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称《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重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也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现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插图。

传教士们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也带到了中国。人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时期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帝之命主持的。

第二节 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一、实用科学的传入

近代西方实用科学的传入,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叙述。

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近代西方文化以雄厚的实力,显示出了自己的优越性。西方文化以野蛮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出了征服世界的通道,当它用最不公平极富侵略性和奴役性的条约的绳索将中华民族裹挟进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之中时,同时也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地置于一个崭新的参照系中。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在这场充满血与火的厮杀中败下阵来。自此以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面对现实,睁眼看世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

第二个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改变夜郎自大态度,他们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代表人物有奕沂、文祥、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①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人大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

实用科学传入的第三阶段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震动和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当时许多爱国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它采取了西方先进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向日本学习。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大声疾呼要求设厂自救,提出了自办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主张。

二、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

洋务派可以说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改革派。他们看到了自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全集·明僚函稿》卷一,1905年金陵刻本。

已赖以生存的满清王朝的落后,力图通过向西方学习军事、经济来挽救清王朝。他们睁眼看西方,也开始学西方,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当时的有识之士。然而,他们不可能意识到满清王朝的落后与它本身的腐败;以及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思想对社会发展的羁绊。他们想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靠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先进军事器械来挽救清王朝并把中国引向富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及一批仁人志士对洋务派的批评,导致了新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出现。一些曾经热衷于洋务活动的人士,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对洋务派只重视西方“船坚炮利”和某些技艺,而不愿改革封建政体,以及贪污成风、中饱私囊等丑恶现象,进行了种种揭露和抨击。他们开始着眼于政治制度的变革,提出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改良主张,并最终形成一场全国规模的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运动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时期。从1895年到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建立了103个学会,64家报馆,135所学校。¹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是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译书机构。在维新派的倡导下,大同译书局、东亚译书局等一批译书机构相继出现。维新派创办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等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宣传西学的主要舆论阵地。在这场大规模的宣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最主要代表。

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维新派集会结社,上书言事,打破了朝廷的禁令,改变着社会风气。他们废科举,办学堂,设报馆,译西书,大力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打破了几千年所形成的闭塞心理和狭隘守旧的传统思维,否定了封建正统观念的神圣地位,因而从根本上转变了以往向西方学习的自发状态和被动局面。

辛亥革命前后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传播的第二个时期。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救亡图存,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愿望的破产。从此,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过程中,涌现出孙中山、章炳麟、邹容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梁维新派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巨大差异,就是他们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对封建专制公开鞭挞,彻底

¹ 见张其昌等《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否定,在政治取向上,更加明确地提出建立欧风美式的共和政体。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海外,身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回国后,他们便把那充满活力的新社会政治学说输入中国这个古老的机体。因此,与维新运动相比,辛亥革命时期的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是更加直接的“西学东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传播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胡适、刘半农、吴虞等人举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帜,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服务的封建旧理论、旧道德。科学主要指提倡科学的思想,反对崇拜偶像,宣传进化论和无神论。很多留欧、留美学生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积极组织学会,创办刊物、传播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政治理论学说。“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启蒙性的文化运动表现出向深层次发展的趋向,各种学会和刊物、学说和思潮纷纷出现。包括“五四”运动前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在内,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增加到400多种,各种社团大约有300—400个。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个人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哲学流派,统统被作为新文化和新思潮介绍到中国,并且引发了激烈的论战。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大师杜威、罗素来华讲学,更为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架设了桥梁。一批有志青年远涉重洋,以勤工俭学为手段亲赴欧洲寻求真理,为下一时期改变中国面貌准备新的思想武器。^①

三、各种学术思想的传播

西学即西方近代文化,它既是多元的统一体,又有许多层次。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近代文化,只是就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言。其实,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西方的无产阶级就有了自己完整的文化形态。所谓西方文化,主要就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文化构成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先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随后是无产阶级文化,相继传入中国。确切地

① 参见张其昌等主编《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期间,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基础之上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构成的资产阶级文化。

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传入中国的同时,各种科学学说也传入中国。19世纪6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学、物理、化学等知识大量传入。公私机关和各学术团体、书局,如同文馆、广学会、上海排印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益知书会、墨海书院、湖南新书局、时务报社、上海译书局、东亚书局、格致书室、湘学报社、天津机器局、天津学堂、农学报社、华美书馆、汇文书院等等,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载于《东西学书录》的,有1000多种。傅兰雅、徐寿、徐建寅编译有《格致须知》、《代数学》、《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化学考质》等。林乐知译有《格致启蒙》。谢家荣编译有《算学三种》。藤田译有《物理学》。潘慎文、谢洪赉译有《八线备旨》。李天相译《化学新编》。王术烈译有《物理学》三编、《植物学》。黄英译有《动学》、《生理学》等。以上所列为较著名者。

历史学也大量传入。1895年,李提摩太、蔡尔康、周庆云等编译有《泰西新史揽要》八册。1902年,秦瑞蚨编有《西洋历史》。1903年,樊炳清译有《东洋史要》、《西洋史要》,胡景伊译有《欧罗巴通史》。1904年,邵希雍译有《万国史纲》。1906年,作新社编有《万国史略》,张木月译有《日本历史》。1909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有《世界文明史》、《泰西民族文明史》、《世界近世史》等。这时期译的各国专史有《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英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之史》、《瑞士建国志》等。这些著作不但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而且增长了中国人的斗志,特别是《法国革命战史》、《意大利独立战记》、《彼得兴俄记》、《波兰衰亡史》等书,起到了政治著作的作用。

西方伦理学也传入中国。1903年,樊炳清译有日本上哲次郎的《伦理教科书》数种,广智书局译有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中学教育伦理学》,大学堂译书局译有《东西洋伦理学史》,樊炳清译有《伦理教科书总说》。1907年,戴裕著有《伦理学讲义》、《女子伦理教科书》。1909年,四川速成师范编有《伦理学》。《伦理学》的传入,对中国几千年的纲常名教是一个大冲击。争女权、男女平等成为新的社会改革的潮流。女子不缠足、男子死后女可再嫁、夫妇不相合可离婚、男子不娶妾等观念在社会上渐有影响。

20世纪最初几年,西洋教育学输入中国。1903年,大学堂译书局译有《培氏实践教育教学》五册、《欧洲教育史要》三册、《格氏特藏教育学》、《独逸教授法》。1909年,四川速成师范编有《教育史》,孙清如著有《教育史》,商务印书馆编译有《教育学》,中国图书公司编有《教育学》、《心理学》、《幼儿保育

法·, 文明书局编有《小学校训练法》、《各种教授法》等。临时政府成立后,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 制订了教育革新计划。资产阶级对教育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革命党人的热心倡导下, 各省和各种专门性质的教育会纷纷成立, 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张謇等人, 都为教育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外国教育家杜威、蒙台梭利、海尔巴脱、纳法尔等人的教育学说也介绍到中国, 教育理论开始研究。

此时, 逻辑学及语言学也传入我国。1903年, 马建忠著《马氏文通》, 根据拉丁语法, 设计出汉语语法, 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语法书; 同年, 艾约瑟译有英国哲芬斯所著的《辨学启蒙》; 严复译有英国穆勒著的《名学》, 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逻辑学著作。1906年, 章士钊著《中等国文典》, 这是比《马氏文通》更加实用的语法书。1909年, 商务印书馆编译有《汉文典》、《英文典》、《英文教程》。1910年, 商务印书馆编《初学英文规范》、《简要英文法教科书》、《英语作文教科书》等。逻辑学与语言学的传入, 对同时开始的白话文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法学也在这时传入中国。法学名著如孟德斯鸠的《法意》, 卢梭的《民约论》, 约翰·弥勒的《自由原理》, 斯宾塞的《干涉论》、《社会学原理》等已于20世纪最初几年由严复、杨廷栋、赵兰生等介绍到中国来。1909年, 四川速成师范编译有《行政法人意》、《法学通论》等法学著作。

同时, 大量的文学作品传入中国。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 翻译小说近400种, 实际主要超过此数。在翻译小说方面最著名的人是林纾。据统计, 他翻译的小说共171部, 主要有英国99部, 美国20部, 法国33部。他所介绍的著名作家, 在英国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和司各特等, 在美国有欧文、斯托夫人, 在法国有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 在挪威有易卜生, 在西班牙有塞万提斯, 在俄国有托尔斯泰。他所翻译的作品影响最大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及《黑奴吁天录》。除林纾外, 翻译名家还有吴椿、陈冷血、包笑天等。吴椿译有《薄命花》、《塞桃记》、《车中毒针》、《银纽碑》、《黑衣教士》等。陈冷血译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土里罪人》、《大侠记》等。包笑天译有《铁世界》、《秘密使者》、《一捻红》、《侠奴血》等。外国小说的传入, 不但“有关世道人心”, 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创作, 当时的小说家, 从取材到描写、取法于外国小说的地方不少。

科学研究之风也由西方刮入中国。1914年6月, 留美学生组织科学社, 次年由任鸿隽、赵元任、杨淦等人发起刊行《科学》杂志, 向国人灌输科学知识, “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 并广译各国科学书籍, 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 组织科学演讲团, 以促进国内实用科学的发展。1916年留日学生陈

启修等组织丙辰学社,印行《学艺》杂志,讲求科学真理,促进科学交流。此后,讲求科学的风气在留学生中逐步推广,国人也逐渐认识和重视科学的价值,科学研究风气初开。

第三节 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一、传播的渠道

该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渠道主要有三条:^①

第一,留学生、出国考察人员、因政治原因避居海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在国外接受了经济学教育。

有关中国在海外学习经济的最早时间,至今未见确切的文字记载。容闳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留美毕业的学生,但他在其所著《西学东渐记》中,没有记载是否学过该门课。由他率领的于1872年留美的首批官费生,专业中安排有“经济”一门,是否真有人学了,不得而知。后来,马建忠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法国攻读政法学位时,就曾计划翻译“货财敛散之故”一类书,回国后写下了《富民说》,宣扬重商主义观点。严复在90年代写的时论文章,经常提到西方理财法;他在1898年又动手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原富》。可以肯定,他70年代留学英国时系统学过西方经济学。孙中山在90年代中期逃亡英国伦敦时,系统地钻研过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等人的经济思想。以上是戊戌变法之前的情况。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避居海外者大增,到海外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从这时起,中国人同西方经济学的接触迅速发展。20世纪初我国已有专门攻读各种经济学科的留学生,他们分别攻读农科、商科、经济科。留日经济学科学生最多,据1900年的记载,光是就读于日本高等商业学校的本科和专科生就有6人。他们回国后,或执教于学堂,或出任政府官员,或编书办报,好多人成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传播者。有些非经济学科留学生,接触过较多经济学,深感这一学科的重要性,也纷纷执笔介绍西方经济学。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清末所以能较广泛地传播,主要得力于留学生。

第二,国内兴办新式学堂,聘请外国教习或留学归国的中国人讲授西方经济学。

^① 参见戴金珊《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载《世界经济文汇》1985年第4期。

国内最早开设经济学课的要数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初建于1862年,据说在1867年就聘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富国策”(即经济学)教习。不过,同文馆上经济学课,可能要到70年代。当时所用的教材,乃是英国人法思德所著《富国策》。除此之外,登州文会馆、中西学院等教会学校,也讲点经济学知识。在学习时间安排上,经济学一般放在最后一年,例如同文馆学制八年,到第八年才设该课;登州文会馆则在第六年设。

进入20世纪,经济学课的开设便相当普遍,且教学时间亦有增加。据光绪二十八年《钦定学堂章程》中有关高等学政科,必设“理财学”课,讲授经济学原理。教学时间为每周两小时,第二、三年连上。教习聘请由外国人担任。同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进一步规定:比政科高一级的仕学馆,一到三年都开“理财学”课,每周讲授四小时,仕学馆的学习内容也广泛得多,其顺序如下:第一年学“理财学通论”;第二年学“国债、公产、理财学史(经济学说史)”;第三年学“银行、保险、统计学”。“以上各科,均用译出课本书,由中国教习及日本教习讲授”。随着大学堂的增多,经济学的分科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第二,在各种出版物上宣传西方经济学理论。

与出国留学、国办新学两种传播渠道同时并存,清末的报刊和书籍也在不断传播西方经济学。戊戌变法前有五家报刊登载了如下重要连载文章:林乐知《论谋富之法》等两篇,艾约瑟译《富国养民策》,马林《富民策》等六篇,嘉托马《富国新策》,陈炽《重译富国策》,古成贞古译《日本名士经济学》等。以上除了陈炽是中国人外,其余都是外国传教士及外籍人。这种状况到戊戌变法后有了根本改变。

20世纪初,当传教士开始放弃政治性宣传之后,中国人自办刊物恰似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所传播的经济学,内容更广,种类更多。从1990年至辛亥革命,报刊经济学文章数量比戊戌变法前增加不下十倍,绝大多数是我国人自己译著的。其中最重要的如《译书汇编》社所译德国李士德的《理财学》,《大陆报》的《最近经济学》,王景芳编《普通经济学》,梁启超编写《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章宗元的《生财论》、《交易论》等等,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各派的经济学观点,使国人大开了眼界。

同报刊上的经济学传播一样,戊戌变法后比变法前所出有关西方经济学的专著也迅速增加,译著者身份也由传教士为主体变为国人为主体。戊戌变法前,直接阐述西方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的书至少出了5种,译著者都由外国人主持。戊戌变法后至辛亥革命时期,有关西方经济学的书出了不下70种,其中原理性书有18种,财政金融书18种,经济学史4种。即使单算

国人编著数目,经济学原理书也有 24 种,财政金融不下 12 种。

二、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阶段与内容。

该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

1. 19 世纪至五四运动前,是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第一阶段。最先传入而有案可查的,是北京同文馆,它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培养翻译人才在 1826 年设立的机构。如上所述,大约在 1867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 年)为同文馆开设“富国策”即经济学讲座,最先把西方经济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当时他所用教材是英国经济学家 H. 福西特(旧译法思德,1833—1884 年)1863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1882 年这份讲稿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取名《富国策》。

不久,第二本比较重要的西方经济学中译本《富国养民策》,在 1886 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它是英国经济学家 W. S. 杰文斯 187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一书的译本。

在 19 世纪 80—90 年代,除了上述两部译本外,还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译本,著名的如介绍银行制度的《保富述要》([英]布来德著,[英]傅兰雅口译),介绍财政赋税制度的《列国岁计政要》([英]麦丁富力编,[美]林乐知口译),书中也叙述了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学说,此处,不少在华的洋传教士,也以西方学说为论据,纷纷发表经济政策主张,著名的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 年)写的《局外旁观论》、《生利分利之别》(1894)、《新政策》(1895)、《养民有法篇》(1896)等等。据粗略统计,到 1898 年已出版与西方经济学有关的著作的译著约 12 种、26 册,由于上述著作的译者都是传教士,对经济学一知半解,汉语表达能力又差,所以译文质量很差,错漏甚多。这些译本的出现并未引起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重视。

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逐渐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在戊戌变法(1898)失败后,改良派仍企图通过君主立宪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或者效法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宣传法国启蒙学派的政治学说、C. R. 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和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或者效法日本,走“明治维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始翻译出版一引起日本经济学者的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书。1902 年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了严复

^① 参见李竞能《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旧中国的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

译的《原富》，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一部中译本。这本书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曾经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最先引起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注意。由于这本书宣扬了“任民自由”的思想，论述了由此使国富增加的具体途径，因此受到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

大约在1903年，日本人杉荣三郎(1873—1965年)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习，编写了《经济学讲义》，它很可能是第一本取名“经济学”的中译本。这种所谓搜集欧美各经济学大家著作编成的讲义，当年就出版了四本之多，在辛亥革命前后仍不断印行，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日渐减少。

1903年最先出版的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部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它们的出版，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引起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富强之路时企图比较不同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途径。

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在这期间出版的与西方经济有关的著作，大约有42种、54册。其中直接阐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译本，约有16种、24册。此外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书，较重要的也有15本之多。当时比较流行的经济学译本，一是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J.L.罗林(1850—1933年)原著，奚若译述的《计学》；一是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美国R.T.伊利(1845—1913年)著，熊嵩熙等译的《经济学概论》。后者曾风行一时，到1916年已经出第四版了。

2.“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以前，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二阶段。

从20世纪2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有关的译本和论著成倍地增加。从事这种传播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主要的场所是大学经济系科的讲坛和有关报刊杂志，出版有关译著主要用作大学教材。

这个时期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涉及各主要学派和代表人物，但是所介绍的内容一般比较粗浅。在20世纪开头的20多年间，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说曾经颇为流行，不少人赞成采取保护关税政策发展中国工商业，直到3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W.罗雪尔的《经济学历史方法论》(即《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和G.冯·施穆勒的《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等书。但是在30—40年代，在中国最流行的西方经济学以奥地利学

派 E. 冯·柏姆-巴维克为代表,以边际效用学说为核心的经济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许多大学通用的经济学教材,还是一本美国教科书,即 F. R. 费尔柴尔德等人所著的《经济学概论》。柏姆-巴维克的代表作都有中译本,如 1934 年黎明书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崩溃》(即《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93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肯定论》、《资本实证论》,1948 年出版了《资本与资本利息》。此外,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作的中译本,还有 193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J. B. 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和 1936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杰斯的《经济学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理论》)等,这些书都在当时的中国广为流传。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 A. 马歇尔和 A. C. 庇古的学说在 30 年代以后也颇为流行,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在 1932 年已有刘君穆译本,但译文质量欠佳。当时许多大学开设高等经济学课仍采用《原理》的英文原版作为教材。

该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代表作,如郭大力译、1933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 T. R.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人口原理》),郑学穆译、194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J. B. 萨伊的《经济学精义》(即《政治经济概论》),郭大力译、1936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穆勒经济学原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1931 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斯密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 D. 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即《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林光澄译、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出版的 A. 杜尔哥的《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即《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等书。

这个时期出版了大量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据统计,在 1921—1938 年共出版经济学说史书近 50 部,仅 1929 年就出版了 12 本。它们的种类繁多,观点庞杂,其中比较流行或有影响的如 192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C. 基德(1847—1932 年)和 C. 里斯物的《经济学史》,1925 年出版的 L. 韩纳的《经济思想史》,1932 年出版的 J. K. 英格拉姆(1823—1907 年)的《经济学史》,1936 年出版的 W. 司科特的《经济思想史》等译本。

从 20 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宣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书籍大量出版。据粗略统计,在 1921—1948 年间,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类书籍已在 30 本以上。这类书籍对西方经济学确有研究者仅为少数,能用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更是凤毛麟角。这类书籍中比较流行或较有影响的,最早有刘秉麟的《经济学》,1919 年已出修订本,从 1925 年至 40 年代初曾再版十余次。再版次数最多是赵兰坪的《经济学》,从 1933—1947 年印行了 26 版。这本书在体系上采用四分法,以边际效用论为核心。马寅初的经

济著作比当时许多同类著作更注意反映西方经济学的新流派学说。他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书中，除宣扬个体主义的经济思想外，也介绍制度学派和瑞典学派代表人物的经济观点。在1943年出版的《经济学概论》中简要地介绍一般均衡、无差异曲线，消费倾向、乘数论等当时比较时髦的西方经济理论。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曾一度广为流行。对马歇尔以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最先作系统和概括介绍的，要算1948年底印行的徐毓树的《当代经济理论》一书。在这部书中，J. M. 凯恩斯、庇古、J. R. 希克斯、E. H. 张伯伦(1899—1967年)、J. 罗宾逊等人的主要理论得到比较准确和扼要的阐述。

本卷主要参考文献

1. R. D. C. 布莱克等:《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2. [奥]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3. [奥]弗·冯·维塞尔:《自然价值》,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4. [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5. [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6. [法]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7. [意]巴罗尼:《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 年版,第 3 期。
8. [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9. [美]菲歇尔(费雪):《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10.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11. [瑞典]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2. [瑞典]威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
13. [英]A. C. 庇古:《论失业问题》,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14. [英]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15. [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
16. [瑞典]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7. [瑞典]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8. [瑞典]俄林:《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19. [奥]海约克(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20. [奥]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21. [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关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22.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23. [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二、三卷),商务印书馆 1991、1992、1994 年版。
24. [美]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25. [英]凯恩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6.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7.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8. [法]A. A. 古诺:《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9. 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0. [苏]伊·戈·布留明:《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1. [德]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32. [苏]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载《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3. [匈]安道尔·马加什:《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卷年版。
34. 晏智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5.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6.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现代国外经济学文选》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7. 杨德明:《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8. 蒋自强、张旭昆:《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9. 《拉萨尔言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
40. [英]萧伯纳:《费边论丛》,三联书店1958年版。
41. 《费边社纲领》,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辑。
42. [英]玛格丽特·柯尔:《费边社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3. 《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
44. [德]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
45. [德]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
46. [德]考茨基:《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
47. [德]考茨基:《帝国主义》,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版。
48. [德]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载《第二国际修正

- 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
19. 德]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50. 德]希法亭：《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 1976 年版。
 51. 《拉法格文选》(上、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52. [法]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 1962 年版。
 53. [法]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54. 李兴耕：《拉法格传》，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55. 《卢森堡文选》(上、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1990 年版。
 56. [波兰]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1959 年版。
 57. 波兰]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载《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58.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39 卷，人民出版社 1958—1975 年版。
 60. 《列宁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61.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1—8 卷，第 29—59 卷，人民出版社 1984、1985、1986、1990 年版。
 62.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 2、3、4、6、13、15、16、17、21、22、23、24、26、28、33、38、39 卷，人民出版社 1956—1963 年版。
 63. [英]乔·柯尔：《费边社会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64.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65.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66.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67. 刘祚昌等：《世界史(近代史)》下册，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68. 李植耕：《宏观世界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69. 马世力：《世界史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70. 张友伦：《第二国际》，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
 71. [苏]斯·布赖奥维奇：《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
 72. [苏]罗·叶夫泽罗夫等：《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73. 程人乾：《卢森堡》，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

74. 《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I》，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5. 联共(布)中央附设马恩列学院：《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76.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1995年版。
77. 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8. 郭继严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9. 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0. 丁建弘：《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1. 高放、黄达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2.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83. 陶大镛：《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4. 商德文：《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5. 顾鹏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6. 蔡中兴、蒋自强、沈海山、徐永禄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7. [英]萧伯纳：《费边主义》，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辑。
88. 陶大镛：《社会主义思想史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89. 王进国：《国际共运人物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0.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I、II、III，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91. 高放：《社会主义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2. 《孙中山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93. 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下册)，中华书局1982、1980年版。
94.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95.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96.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7. 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8.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